

河上肇自传

下 卷

〔日〕河上肇著

儲元熹譯、龙 仁校

內 部 读 物

商 务 印 书 馆

目 次

入獄后之秋	5
移押到小菅刑務所	5
重罪監獄小菅刑務所	9
昼夜獨居房	14
牢房里的情况	20
和妻見面	25
鉛字拆版作業	32
运动和洗澡	37
單調的單身牢房生活	42
渴望普通社交	46
真知子的釋放和喜志子的進京	53
特赦的夢	59
別了,1933年!	59
獄中迎接1934年元旦	64
兩條退却綫	68
紀念节的特赦	72
昼夜獨居的解除和假釋的夢	76
和津田青楓見面	81
假釋的夢	89
翻譯作業	89
和一別七年的佐野學見面	95
佐野學的回忆(一)	101
佐野學的回忆(二)	105
从希望假釋到期待假釋	110
对于服刑期滿下定決心后的心境变化	116
向所長反击	120

在獄中享受最大限度的自由	127
图书室工作	132
假释的风声	138
听到假释的风声	138
批准写自传	144
妻对服役的杞忧	150
天长节假释的风声	156
白做了一场假释的梦	161
呈报假释后的经过情况	165
作原博士的助手	169
原博士的刑事人类学的统计研究	173
假释出獄的犯人們	179
急于想得到假释的大貫大八	185
病房生活	191
住进病房	191
准病房生活	195
准病房里的人們(一)	200
准病房里的人們(二)	206
准病房里的人們(三)	209
真知子的結婚	217
离开病房	217
隔了半年才见面的真知子	221
真知子的結婚	223
下坡	229
所余无几的刑期。和伊藤証信见面	229
严格单独看管的牢房里的人們	233
思想犯所写的讀后感	237
对于《释放后的生活方針》的意见	244
和吉村檢察官的一問一答(一)	249
和吉村檢察官的一問一答(二)	256

《1936年岁暮之歌》	261
出獄前后	266
和藤井推事见面以及下定决心服刑滿期	266
未见天日的《獄中贅語》(一)	273
未见天日的《獄中贅語》(二)	279
做好了出獄的准备	286
出獄的日子快到了	291
最后一天	296
回到自己家里	300
学究生活的告終	305
头一年里的獄中通信	313
严格单独看管时期身心方面辯証的变化	313
1934年——从冬天到春天	319
1934年——从夏天到秋天	322
故乡以及童年的回忆	326
給母亲和女儿的信	334
給真知子的信中所提到的青年时代的回忆	339
回忆(断片部分)	349
螃蟹、鸚鵡和朝鮮鯽魚	349
荒木寅三郎的头	355
教师自画像	364
豆沙糯米糰子和腊八粥	375
大死一番	388
木下尙江老先生	422
獄中的食物	438
記憶中的种种食品	448
1. 山头的豆餡年糕	448
2. 油炸鯽魚	449
3. 猪肉火鍋	454
4. 美味的面包	456

5. 瓢亭的 日本菜	464
常 爱出錯	472
拙于 生計	482
随 笔《断片》	492
歌 五首	505
小国 寡民	505
談 饅头	510
河上肇 年譜	524

入獄后之秋

这篇獄中記的笔調和以前大不相同，可能会引起不少讀者的奇怪：为什么河上独独把这篇獄中記整个写成小說体裁，而且用本田弘藏这个名字来描写自己，另外一些人也用了假名字呢？关于其中的緣由，可以参看《开始写〈自传〉时的心境》。

末川博

入獄后之秋

萧萧风雨小江秋，
不是愁人亦合愁。
至今犹想荒川雨，
手械东过白首囚。

移押到小菅刑务所

为了把本田弘藏从市谷刑务所押送到小菅刑务所去，一辆护送汽車，上面同坐着一个强盜犯，由一个看守长和一个看守部长护卫着，冒着夹有冰雨的烈风，开过架設在荒川溢洪道上的鉄桥，在堤防下凹凸不平的馬路上一直往南駛去，不久就到了小菅刑务所的正門。两个囚徒立即下了护送車，走进鉄栅栏門，被混凝土的大建筑物吞沒了。那一天是 1933 年 10 月 20 日，恰好是弘藏五十五岁的誕辰。

他們头上戴了草笠，手上加了手铐，站在警卫事务室門前的走

廊里等了許久。两个人都背朝着过道，提心吊胆地听着身后走过的看守們的皮鞋声音，目不旁視地馴順地面壁站着。誰一看都知道他們是新犯人。

弘藏一手拿了老花眼鏡，一手提着包袱。这里的外走廊，样子就像隧道一般，穿堂风大得厉害。随风吹进来的雨点，把混凝土过道弄得湿淋淋的。大概是北风把西伯利亚方面的寒气帶了来，冷得不像秋天了。弘藏站在那里渾身直哆嗦。

他們站在那里的走廊背后，是間大屋子，門框上釘着一块“警卫办公室”的黄銅牌，里面有几个穿制服的工作人員，有的伏在桌子上正做着什么，还有两三个人，围住屋中央的四方形大火鉢，抽烟的抽烟，喝茶的喝茶。随后，其中有一个看守，打了个哈欠，站了起来，离开火鉢，走进附設在办公室旁边的一間又小又暗的屋子里。他把弘藏和那个强盜犯叫了进去。

在那个屋子里，他們換去了身上所穿的全部衣服。新发給的衣着，只有四件：赭色夹袍、衬衣、短褲和短腰带。衣服全都是洗得褪了色的，和过去市谷刑务所所发給的没有什么两样。弘藏心里想：“这从哪儿說起呢！”

他們在离开市谷刑务所以前，身上原来穿的赭色囚衣让換成了浅葱色囚衣。那是小菅刑务所送去的，叠得好好的，用同样顏色的短腰带捆着。解开腰带，衣服里包的是同样顏色的衬衣、褲衩和短褲，还有手套和草鞋。对刑务所生活一无所知的弘藏，在換衣服的时候，心里还想，即将押解去的小菅方面，除了浅葱色的褂子而外，还让穿褲衩，这就太好了（因为冷得受不了，所以有条褲衩包着光身子，心里就很高兴）。现在才知道，一切都只是护送路上的临时措施。由于褲衩让脫掉了，頓时觉得格外冷了。

接着开始检查他們的東西，一样样地决定哪件該代为保管，哪

件該退回家去。

一个穿了看守部长制服、上了年紀的保管科看守，带着恶狠狠的脸色解开弘藏包袱。拿起一个月前弘藏下獄时脱掉的骯髒白单衣，冷笑着說：“这种东西，干么一径留在身边？退回家去吧。代为保管，固然也可以，不过等到出去的时候，全烂了呀。”

不知道为什么，过去关弘藏的市谷刑务所，规定只要一下獄，所有携带的东西，一律不許退还家去。因此，下獄当时身上所穿的衣服，只好一径寄存在保管科里。可是他也不想分說，只是回答道：“都是些沒用处的东西，如果可以退回家去的話，希望全部退回去。”

保管科的看守說：“你說什么？可以退回的呀。那末全都退回家了。”他一边这样說，一边开始照着市谷的移送单一件一件地清点弘藏所带的东西。每念出移送单里所登載的某样东西，就叫弘藏取出那样东西，放在桌子上。后来，从衣服下边抖落出来两三本书和預审决定书。保管科的看守迟疑地讀了一下书名：《炭色馬》。

原来，那本书是忘了退回家去的、路卜洵写的《灰色馬》^①。头脑迟鈍得出名的弘藏，一时想不起来，弄得挺僵。

“这是什么？預审决定书么？让我看一下。”保管科的看守拿起几张用格子紙訂在一起的文件，开始大声念道：“被告人原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什么？……被告人原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素来信奉馬克思列宁主义，1928年辞去該大学教职后……”

才念到这个地方，他脸上突然露出一副怪相，停止了朗讀。

^① 路卜洵 (V. Ropshin, 本名 B. Victorovich Savinkov, 1879—1925), 旧俄反动作家, 十月革命后, 领导反革命的“保卫祖国和自由联盟”, 失败后逃往外国。1924年秘密越境时被捕下獄, 在獄中自杀。——譯者

原来，这个看守，虽然在这个刑务所里工作了多年，已经到了領恩俸的年岁，一时却分辨不出弘藏的身分，还以为这个年老的新犯人也許是保了火险而故意放火的罪犯，結果想不到竟是有名的思想犯，因此他着慌了。

检查完毕所带的东西以后，保管科的看守出去了，这时又进来了一个佩带金肩章和金袖章的年輕看守长，审查两人的身分。弘藏首先被审查；审查的时候，那个年輕小伙子重新让站到走廊里。审查的項目，是住址、家属、职业、朋友关系等等，都是丰多摩和市谷已經审查过的，现在又重新审查一次。照說，移送犯人时，所有材料是跟着走的，可是不知为什么，每个刑务所总要把同样的事情重复一遍。

审查完毕以后，年輕的看守长訓戒弘藏說：“不讲也該知道，必須好好遵守規則，好好做工，懂得么？”

后来，就把那个年輕小伙子叫了进去，让弘藏站在走廊里。年輕小伙子的身分审查，費了許多時間。弘藏重新戴上草笠，背朝着过道，面朝着牆壁，老是在那里站着。北风越来越大，它有时夹着雨在走廊里呼嘯，就像在海峡里施虐一样。

大約过了三十分钟光景，那个小伙子总算审查完毕，走到走廊里和弘藏站在一起。两个人一句話都不說，只是从草笠縫里死瞅着牆壁，老是站在那里。光着身体只穿一件夹袍的弘藏，觉得衣服下襠漸漸被雨淋湿了。全身都发冷，哆嗦得越发厉害了。

后来弘藏被帶到医务室去检查体格和診斷健康。因为他抖得厉害，医务工作人員笑着說：“这样冷么？”

健康診斷完毕以后，可以洗澡了。——当他拿到一块毛巾，听到說是现在要去洗澡的时候，他欢喜非凡。看守帶他去的那間屋子，中央摆着一张大桌子，桌子周围放了六、七把椅子。这是犯人

接見外來訪問者的屋子。桌子一角，有個穿淺蔥色獄衣的犯人坐在椅子上，兩邊是穿了西裝的年輕小伙子。這兩個人，一個是在場監視的刑務所里的教誨師。另外一個是來探監的耶穌教牧師。牧師對着那個犯人，用一種裝腔作勢的聲調飛快地叨嘮着。弘藏僅僅在他身旁走過，就知道又在強迫推銷耶穌教了。

按照最初的設計，這個接見室也許是準備作為犯人的號房的。打開那個屋子角落里的門，就是個小小的浴室。那間浴室像個小倉庫或壁櫥，里面一個窗子也沒有，幾面都是混凝土的牆，白天都是漆黑的。弘藏照着看守的吩咐，在拚命叨嘮着的牧師身旁脫下赭色獄衣，搭在空椅子上，走進了浴室。

浴湯熱得幾乎可以燙傷皮膚，根本不能下池子，只能打出一些，擦擦身體。儘管這樣，因寒冷而發抖的弘藏，還是有蘇生之感。

已經記不清是怎樣走的了，他由一個看守帶領着，乘上電梯，到了龐大的樓房的三層樓上。緊靠電梯口的走廊里，有個看守站立在一張小桌子前面。

帶領弘藏的看守，交代了一句“這就是三層樓上的主任”，就下樓去了。

“753 號。”

這就是弘藏的番號。主任看守用這個番號叫着，把他領到南面東頭的一間單身牢房里。弘藏在小營刑務所里的生活，就這樣地開始了。

重罪監獄小營刑務所

這個小營刑務所，如果照英國的說法，它不是 local prison（地方監獄），而是 convict prison（徒刑監獄）。換句話說，是個重罪監

獄。关在这里的大部分犯人，不是无期徒刑，就是二十年或十五年的长期徒刑犯。哄动一时的有名强盗或杀人犯，远在京都、大阪、神户以至四国地方的，都关到这个监狱里来。

因为它是重罪监狱，是关长期徒刑犯的特殊刑务所，所以设备很好，在东京府刑务所还没有建成以前，号称为远东首屈一指。再加有些老犯人，比许多看守的资格还老，不但对于刑务所里的情况和传统非常熟悉，而且长年每天见面，工作人员和犯人中间也就自然产生出一种感情，所以这里的工作人员对犯人的态度，比起一般刑务所来，要宽大许多。在这方面，长久担任这里的所长有马典狱长的出名的彻底温情主义的遗风，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像弘藏这种刑期较短的人，而关到这个刑务所里来，乃是一种优待。

刑务所的房子，是东京大地震后全部重新建筑的，除了工厂（在监狱法上称为“劳役场”）而外，主要部分全是钢筋混凝土建筑。从上面往下看，这个刑务所的房子就像仙鹤伸长了头颈展翅飞翔一样。相当于鹤颈的正面进门的地方，是钟楼兼瞭望台（白天台上经常有一个看守在监视着整个刑务所内的动静），它像粗大的烟囱那样矗立在半空里。头颈下面相当于仙鹤躯体那部分，乃是刑务所的正房（办公楼），那是一片二层楼的楼房，楼上分成教诲堂、会议室、所长室、庶务室等等，楼下分成警卫办公室、教务室、医务室、职员食堂、夜班室、犯人用的接见室等等。

关犯人的房子，使人联想起欧洲古代城堡的遗迹（弘藏到欧洲留学时，曾经坐了汽船，沿着莱茵河顺流而下，在船上看见过山头的古城堡；这里的牢房，事实上就使他回想起那时所见到的城堡），那是一点装饰也没有的灰色三层楼，又高又大。它就像鸟的两只翅膀那样，挟着正房，一南一北，对称地摆着，中间由带有屋顶

的走廊相溝通。大部分犯人，白天從自己的牢房裏到工廠去做工；夜里下工後，一千二百多個犯人（病房裏的除外）一律被拘禁在牢房裏。他們多麼渴望着“自由”啊！

南北兩幢獄舍，每幢又分為第一舍、第二舍、第三舍。第一舍是東西兩頭長的長方形建築，第二舍從它的中部斜伸向西南，第三舍從它的中部斜伸向東南；整個獄舍，構成一個K字形。

第一、第二和第三舍，都是一樣高度的三層樓。雜居房（每間關八人）只設在第一舍的一樓和二樓，其餘都是關一個人的、同樣大小的單身牢房，一間一間分得就像蜂窩一樣。這種單身牢房，每舍每層大約有五十個。

北部那幢獄舍，白天屋子裏一個人也沒有。犯人全都上工廠干活去了。而南部那幢獄舍，大約有一百五十間晝夜獨居房。關在那裏的人，白天黑夜都被拘禁在屋子裏；照刑務所裏的說法，這叫做“嚴格單獨看管”。

這種晝夜獨居房，南部各舍，每舍都有一層。第一舍、第二舍都設在三層樓上，只有第三舍設在一樓。

這個“三舍一樓”或簡稱“三下”的一層樓房，是小管刑務所裏的特殊部落，是一個魔巷；這裏關着這樣一些人：

第一類是精神病患者以及精神耗損者。這些人如果放在三層樓上，怕他們跳樓自殺（三樓和二樓的走廊，中央都是挖空的，就好比市內馬路的行車道那樣；這樣，樓上樓下，一目了然，都可以監視到。倫敦的新式監獄裏，那挖空的地方是張着鐵網的；這裏不知道為什麼，沒有仿效那種辦法），所以全部關在樓下了。這個刑務所，在設備方面雖然號稱遠東首屈一指，却同樣沒有專關精神病患者的特別室，所以凡是精神不正常，隨時可能發瘋的人，厲害一些的，整年上了手銬，不讓出去運動，也不讓洗澡，日日夜夜關在牢房

里。弘藏刚入所的时候，精神耗损者，有些还关在三层楼上，可是不久就都关到一楼去了。

第二类是正在调查中的违反所规的人、受惩罚的人、或惩罚后仍然不解除严格单独看管的人等等。其中有被处两个月的“屏禁”的。这种人完全被禁止看书、运动、洗澡、理发、做工等，头发和鬍鬚长得乱蓬蓬的，身上骯髒不堪，整天端坐在臭气冲天的窄小的牢房里。要是情况严重、被处“重屏禁”的，得上皮手铐。那皮手铐是在一条厚皮腰带上，安上两个皮手环，有前手铐和后手铐的区别。所谓后手铐，是把两手背在身后铐在皮手环里，再加上锁，使无法动弹。因此，上了后手铐的人，每当开饭的时候，只能悄悄地背着手把放在牢房门口的汤盏拿起，放在一个适当的地方，犹如猫狗那样，把嘴凑到碗盏上去喝。夜里也得反绑着两手睡觉，大小便乱撒。这种手铐，照《监狱法施行规则》的规定，使用对象只限于有可能发生暴力行为、逃走或自杀的犯人以及解送中的犯人；可是实际上呢，却往往用它来拷问和惩罚犯人。要是在议会里质问司法大臣，他一定会答辩说，一切都照规则办事；但是事实上，犯人无论怎样循规蹈矩，如果管他的看守借口说他有发生暴力行为或自杀的可能，那末一切也就完了；所以规则的运用，是“灵活”得很的。像后手铐这种刑具，不折不扣地是日本国内的封建遗制的典型象征。这是有健全思想感情的人类社会中所不可能存在的一种丑恶东西。

最后，第三类是违反治安维持法“思想犯”中的那些不肯在思想上转变方向的人。这类人中间的重要分子，一般都被押送到遥远的北海道的网走地方去；弘藏入所的时候，那样的人，里面一个也没有了。可是，等到第三个年头上，就有三个被关进来。在行刑当局看来，这些人可能是可恨的非日本国民，同时还是道地的精神

病患者吧。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們才有那样的光荣，和日夜大声嚷嚷的疯子們一道呆在魔巷里生活。

不过，尽管是魔巷，比起网走刑务所来，可能还是好得多。查看一下旧记录，1891年那一年中間，死在网走監獄里的囚徒，就达一百八十八名。而它所关的犯人数，在1892年10月，是七百七十人。要是根据这个数字来計算死亡率的話，那末一年中間就要死掉約四分之一。由此也就完全可以推想得到，当时犯人所受到的，是怎样一种非人的待遇了。现在的网走刑务所，就继承着这样一个传统，而刑务所这样的地方，传统的作用很大，所长握着大权，犯人的待遇，由于刑务所的不同，非常悬殊，因此，网走刑务所里犯人的生活，甚至到现在也还是不堪設想的。遇着大雪紛飞的隆冬天气，連开水都会一下子結冰；鄂霍次克海的无情的狂风，也許会穿透关在那里的思想犯人們的心脏吧。和那里比較起来，能够在这儿的魔巷生活的人們，光是在能和家属见面这一点上，就不能不說是强多了。

住在巴黎的柳澤健，写过一篇文章：《查理·莫拉斯（Charles Maurace）的出獄》。莫拉斯这个人，在人民战綫內閣已經成立的民主共和国法国，是高唱王政复古的大反动派之一。他以教唆杀人罪坐过二百五十天牢，最后被释放出巴黎的桑德刑务所。柳澤在他那篇文章中写道：

“日本的情况我不知道，在法国的監獄里，政治犯似乎受到特别的待遇。这从大杉荣的一篇文章里也可以知道，大杉荣在那篇文章里說，当他在巴黎因搞政治煽动演說而被捉进監牢的时候，只要拿出錢来，一日三餐，每頓都可以喝到葡萄酒。莫拉斯虽說犯的是教唆杀人罪，其实很明显地是政治犯性质；在这一点上，他的坐牢，也許是不折不扣的‘到別墅去跑一趟’。总之，在他坐牢

期間，他写出了五本书！（最初我还不知道，他在牢里所写的五本书，我在无意之中买了两三本。）不仅如此，在他坐牢的期間，他几乎每天都用貝利蓀的化名在他的机关报《法兰西行动报》上发表时事評論！所以当他清晨被释放出獄的时候，对訪問他的新聞記者所說的那番話，可能完全是他的真心話。他說：‘变换一下环境，是很好的休养。反而因此能够潛思默想，能够讀書，还能够写作……’而且他今年已經七十一岁了！不过，監獄究竟是監獄。有心人一致认为，如果不是莫拉斯那样的人物，沒有他那种信心和精神，决不能做出那样多的工作来。”

写这篇文章的柳澤，大概也是“有心人”之一吧。如果是这样，那末我希望他万万不要小看了日本的政治犯。要知道，同样是監獄，早就經過有名的法国大革命的国家的監獄，和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都沒有完成的并摻有大量封建遺制渣滓的我們这个国家的監獄，两者之間的差別，正和別墅同地獄的差別一样。年紀过了七十岁的莫拉斯之流，尽管只坐二百五十天牢，要是被送进网走監獄的話，那末也許等不到释放，就死掉了。

昼夜独居房

扯得太远了，还是回过头来談小菅刑务所吧。

小菅刑务所里的昼夜独居房，除了已經說过的第三舍一楼而外，第一、第二舍，都設在三楼上。

第二舍的三楼，当弘藏入所的时候，是政治犯的薈萃之区。那里以佐野、鍋山、三田村、田中（清玄）那批重要的共产党叛党分子为首，一切左翼思想犯，除了两三个获得特別信任、被送到工厂去劳动的而外，都和右翼政治犯一起，关在这层楼上。比弘藏晚一步

进来的风間丈吉，也关在这里。牽連在五·一五事件里的爱乡塾的橘孝三郎和井上日昭那批人，也关在这层楼上。

可是，关弘藏的地方，既不是第三舍的楼下，也不是第三舍的三楼，而是第一舍的三楼。这个“一舍三楼”或簡称为“一上”的一层楼，就好比是新到来的犯人的旅館那样；是个送旧迎新、人来人往的地方。新来的犯人，先要关在这层楼上，观察一个时期，然后派到一定的工厂里去。（牽連在五·一五事件里的海軍軍官們以及和二·二六事件有关的那批人沒有关进来以前，这里关的全是判处徒刑的人；判处禁錮的，一个也沒有。判处徒刑的人，原則上都必須到工厂做工。这种囚人劳动，在日本資本主义建設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到现在对于獄外的工資劳动者还是一种压力。）等到进了工厂以后，夜里囚禁的牢房，也就要按工厂来划分；这样，自然要把犯人迁到另外的地方去。关在这种經常人来人往的地方而像住公寓那样老呆着不走的人，多半是有着某种坏毛病、不便让他和大家混在一起的、丑名昭彰的特殊犯人。不过，弘藏入獄后过了两三年，和五·一五事件以及二·一六事件有关的政治犯，有时也关到这里来（他們判的不是徒刑，而是禁錮；《監獄法》上本来规定，“徒刑監、禁錮監如在同一監獄內，应予分界”；可是事实上，这种分界却一点影子也沒有）；同时，大概因为左翼思想犯越来越多了吧，这种犯人也七零八落地关到这层楼上来了。不过，在这以前，算得上思想犯的，除了弘藏以外，这里一个也沒有。

“南部、第一舍三楼、第四十号房間。”这是入所那天起，弘藏关了好几年的牢房。（他的牢房，自始至終，一直沒有变动过。这种情况是极少有的。）

所有犯人，每次写信都得递申請书，得到許可。这个申請书，要逐一經過主任看守、看守部长、看守长、警卫科长、所长盖章，才

算批准。每次递这种申请书的时候，弘藏都得把牢房号码和犯人番号（这就等于他在监牢里的住址）写在上面。“独居。南部第一舍三楼第四十号房间，七五三号。”这个头衔，也不知写过了多少次，因而也就成了他终身忘不掉的一串文字。

关弘藏的东头那间牢房的西面，直到主任看守整天站在那里监视的中央部为止，同样形状的牢房，光是南面半边，就有九间。他被关进去的时候，那里一并列住着下面这样一些好汉：

第四十一号房间——盗窃以及侵入建筑物。徒刑十五年。五十五岁，和弘藏年纪相同。七入（所谓七入，就是第七次入狱的意思）。

第四十二号房间——强盗伤人。徒刑十八年。四十五岁。四入。

第四十三号房间——一、盗窃。徒刑七年。二、强盗伤人致死。无期徒刑。五入。（也就是说，这个人在无期徒刑之外还有七年轻刑。他是一辈子也没有希望再呼吸到监狱外的空气的了。）

第四十四号房间——盗窃及放火。徒刑十年。六入。

第四十五号房间——强盗、预谋杀人。徒刑二十年。初入。

第四十六号房间——强盗伤人。徒刑七年。初入。

第四十七号房间——一、强盗及盗窃。徒刑六年。二、强盗未遂，逃走，侵入住宅。徒刑八年。初入。

第四十八号房间——强盗。徒刑七年。朝鲜人。

可是初关到这里来的弘藏，只知道自己是在三楼上，至于邻居是些什么人，却一点儿也不知道。不仅如此，刑务所的整个建筑是怎样，他的牢房在整个建筑里占有怎样的位置，他也不知道；还有，关于整个刑务所的位置，他也只知道大致是在东京市的东头，其余就完全弄不清楚了。再加时间也弄不十分清楚。连到今天有几

号、星期几，也都经常忘掉；至于现在是几点几分，那就完全无从捉摸了。由于自己所处的地位，无论在空间方面或时间方面都是这样茫茫然，一点也不能具体地知道，这就叫囚犯感到一种渺茫、空虚而不着边际的不安。——弘藏正怀着这样一种不安的心情，遵照看守的吩咐，把坐垫（像蒲团一般的四方形席垫）在牢房的地板中央铺好，背对着窗，面朝着房门，像老鼠装死那样地端坐着，忽然喀嚓一声锁响，房门开了，主任看守把他叫出去说：“所长叫你去。”这时他在牢房里安顿下来还不到二十分钟。

东西两头长、成一长方形的第一舍三楼的中央部分，是警卫工作的一个要害地点。那儿的走廊里，主任看守经常穿着制服、戴着制帽、佩了剑，站在高高的小桌子（那个桌子称为主任台）后面监视着。也许是为了一有什么事情拔起脚来就可以赶去吧，那里不放椅子；身上穿的是制服、脚上穿的却是麻里草鞋的主任看守，上班时间就一径站在那里。以主任台为中心，第二舍伸向西南，第三舍伸向东南，所以从那里不仅一眼可以看到第二、第三舍的走廊，而且由于走廊中央是挖空的，二楼、一楼的情形也大致可以看到。整天站在那里的主任看守的背后，设有一间窄小的检查室。弘藏这时就是被叫到那里去的。

走进屋子，把草笠放在屋角（关单身牢房的人，即使走出房门一步，也得戴上深深的草笠，以防别人看到他的脸），抬头向正面一看，只见一个穿了黑色西装礼服、留着薄薄的八字髭鬚的中年绅士，把笑咪咪的一张脸朝着他，背对着窗早已坐在桌子跟前等待着了。弘藏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礼，所长就指着桌子对面的一张椅子，很快地说了两遍：“请坐，请这里坐吧。”

弘藏又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礼，然后坐下，心里有点感到意外。

当初关在市谷刑务所的时候，他曾见过一次警卫主任；那个警卫主任给他的印象，派头可真大。当时在他所呆的那间牢房的附近，同一幢房子里就设有会见室，可是那个警卫主任不来，却把弘藏叫到离牢房很远的办公厅的接见室去。弘藏于是让跑来找他的看守带领着，去到接见室。那是一间小屋子，里面一半是土地。他穿了草鞋，手里拿着草笠，就站在土地上。屋子的另外一半，铺着地板，高得就像一个舞台。地板虽说只有站在那里的弘藏的胸口那么高，可是印象里却觉得高到齐眉。狭窄的台上，放有一张桌子，还有一张几乎拦墙阻碍着交通的老大老大的旧圈身椅。弘藏站在湿漉漉的地上，等候了好久；那个警卫主任终于突然推开另外一边的房门，走了进来，一屁股坐下，两臂搁在扶手上，仰靠在椅子上。那时正当盛夏，他穿了一身纯白的制服，仰靠在椅子上，翘起了腿，一只右脚的白皮鞋的底，只管在弘藏眼前摇晃。这位警卫主任身体很结实，可是也许是因为神经衰弱的缘故吧，右颊的肌肉不断痉挛着，还不住地眨着眼睛。因此，对于弘藏来说，他那副样子，与其说是使人感到威严，倒不如说是使人暗暗觉得滑稽。不过同时，看到这样一个小官吏，居然在一个还没有确定是否有罪的被告之前毫不客气地发挥出他那副犹如野蛮人的酋长一般的自尊自大的作风，就感到这确实是日本政治机构中大量保留着的封建遗制的一种表现。——弘藏因为在市谷刑务所领教过警卫主任那番自尊自大，所以来到这里安顿下来不久，这里的所长很随便地亲自来到牢房，隔着一张桌子面对面接见他，不能不使他感到非常出乎意外。

但是事实上，他并没有被随随便便地对待。所长从早晨就一直等着本田弘藏押送进来。“收受”本田的手续办完之后，所长又等着把本田安顿在指定的牢房，没有干旁的事情。他把教务主任

(被这里的犯人通称为老和尚的教誨师)叫到所长室里,吩咐說,今天进来的本田弘藏,将完全由所长亲自直接进行“教誨”,教务科方面以后一切都不用管。当主任看守打电話报告他說本田已經关进指定的牢房的时候,所长正在招待客人。客人刚走,他就跑来,开始对他从早晨就抱着一种不安和好奇心等候着的囚犯本田弘藏进行“教誨”。

他飞快地說:他本人是法律命令的执行官;日本的法律命令,全都是天皇的广大无边的仁慈的体现;例如叫徒刑犯做工,不外乎是为了养成勤劳的习惯,这也是天皇的深厚的慈悲心的一端;我国的行刑精神,不是一报还一报主义,而是教化主义;換句話說,对于做了坏事的犯人,不是要罰他受罪,而是要教育感化他,使他成为能够适应社会生活的良民,这就是刑务所的基本精神。說完又加上一句:“这几点,得預先說明一下,免得你誤会。再則,你如果有什么要求,现在可以对我說。”然后像是唾沫都說干了那般的閉攏了嘴巴。

本田不懂所长为什么要对他热烈宣传天皇的仁慈,因为作为一个馬克思主义者,照說他是最能批判地理解日本天皇制統治的本质的。他只觉得这位所长有些不好办。不过,所长問他有什么要求,这总是一件值得感謝的事。由于实在冷得受不了,他就趁此机会,毫不躊躇地說:“没有什么要求,只是冷得受不了。在市谷刑务所的时候,承蒙让我多穿一件衣服。要是这里也准許多穿一件衣服的話,就請您加以照顾。”

所长回答了一声“可以”,就站起身来,对看守說:“他說怕冷,让他写一个加添衣服的申請书来吧。”交代完毕,他就走了。

“所长对工作人員說話很傲慢,对我說話倒滿客气哩。”弘藏一面这样想,一面望着所长的背影,自言自語地說:“这家伙相当不好

对付呀！”

牢房里的情况

新进来的徒刑犯，头三天不用做工，同时却被规定“不許閱覽文件图书”。弘藏什么事情都不做，成天让端坐着，他在这三天中間把室内的設備和窗前的样子都察看了一番。

屋子似乎比三张席垫略为大一些。天花板和周围的墙壁都是混凝土的，塗上一层略带淡黄色的白石灰。地下鋪有地板。

鉄板房門上鑲着厚厚的木框；門上齐眉高的地方，开着一个宽一寸、长五寸的眼洞（窺孔）；門的下部，大約三分之一的部位，有通风用的木制百頁窗。眼洞上张着鉄絲网，外部还有一个可以上下启閉的金属盖子，用鉸鏈釘牢着。这門只有外面有把手，一旦关上，里面要开門，也沒个着手处。而且，如果把外面的那个把手向左擰一个直角，門就上了鎖，沒有钥匙，連外面都不能开。这跟弘藏在丰多摩刑务所和市谷刑务所所见到的沒有多大差別。

正对着房門的窗戶，和普通房子的窗戶一样高。（弘藏在被告时期所呆过的丰多摩以及市谷的旧牢房，却把窗戶开得高高的，眼睛都够不到，再加窗戶又小，被关进去的人，就像掉在深的箱底一般；至于新式牢房的窗子，就都和普通民房的窗子一般高低，沒有多大差別了。）窗子是鋼骨玻璃窗，可以回轉启閉，窗口鑲有两根纵向的鉄棒，所以即使开了窗，头还是不能探出窗外去。不仅这样，窗外还装有栅栏，坚固的鉄条密密地嵌牢在上面。除此之外，窗外有一条像露台那样的走廊，工作人員走过那里，可以从玻璃窗里冷不防地視察监犯的举动。可是，尽管有窗子，从牢房里面望出去，視野还是受到极大限制的。不仅头探不出窗外，而且露台外方还

有一座高高的混凝土障壁，像屏风那样围绕着；如果不站到马桶上去，那末在牢房里就只能看到纵横被黑铁棒（玻璃窗骨架是黑铁的，窗口镶的棒是黑铁的，窗外栅栏的格子也是黑铁的）所分割的一小角天空。这有限的一小角天空，正是弘藏今后几年中每天从他的牢房里所能看到的天空的断片，而在他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后来，出狱后有一段时间里，不论他贪看春天鸢鸢的天空里飘浮的白云也罢，仰望秋夜发着清辉的月亮也罢，黑铁棒总像幻影那样出现在天空里，无法加以摆脱。不过那是几年以后的事，现在还是言归正传吧。

伦敦的刑务所，通常把厕所设在牢房外边；而日本的刑务所，牢房和便器却成了拆不开的东西；尽管是暂时关一关传唤来的被告的法院临时牢房里，也都一一备下便器。因此，窄小的牢房里臭气冲天，没有一个人不叫苦。这个小营刑务所，设备方面究竟号称远东第一，厕所全部是抽水装置。弘藏呆的那间牢房，抽水马桶就装置在窗下，马桶上装有用铰链钉牢的木盖，可以放下来当作凳子坐。马桶旁边是洗脸台；洗脸台上也装有用铰链钉牢的木板。因此，在马桶上放了坐垫，坐下之后，洗脸台就成了桌子。无论看书、吃饭或干某种活，就都利用这种桌子和凳子。

抽水马桶每天只有在三顿饭和夜里停工后才能放出水来，而且时间很短。因此，监犯们为了不时之需，必须用配备的小铅桶舀了水存起来。那个铅桶，规定放在洗脸台下面。因此，昼夜单独囚禁的人如果坐下做工，就得把身体塞在固定的洗脸台和凳子中间，两腿夹着水桶，脚踩在水桶旁边的很小一点空地上。这就仿佛挤在客满的三等火车里，行李多得连脚都没个安放处，而一天天继续着旅行那般。

洗脸台的里边，有一个同样高低的、壁橱似的放东西的地方。

那里半中間装有一块攔板，碗盞和书籍等就放在攔板的上面，而笤帚和擗子等杂七杂八的东西就放在攔板的下面。这个放东西的地方，装有一个粗鉄条的門。

靠窗子那边，馬桶、洗脸台和放东西的地方三样刚好占得滿滿的。

临窗的右手半边(正对弘藏那間牢房的朝北一带牢房，在临窗的左手半边)，床榻就像靠在墙上那般地叠放着。床是鉄的，边框很粗，中央是不到一寸宽的薄鉄片編成的五寸见方的一个一个格子(就好比是一个大型的、烤东西吃用的鉄网架)，上面鋪了一条薄薄的席子。席上放着褥子和折成两层的被子，用两条拴在床两头的皮带縛牢在床上。鉄床的四条腿，靠墙——窗子右边——的两条固定在地板上。白天不用的时候，可以把床推上去，使它伏在墙上，和墙平行。这样折叠起来以后，左边的两条床脚就悬空了，貼在床底，而固定在地板上的两条床脚，就支撑住整个床榻。

把牢房里的情况仔細察看过后，弘藏自己給自己打气道：“这就是今后五年里幽囚我的地方么？好吧好吧，一定熬过这关，让大家看看！”

* * *

生活极端单調的監獄里，尽管一点儿小事情，就会頓時传到全体犯人的耳朵里。本田弘藏入所当天，送午飯的炊事夫們，早就听到了四十号牢房“新进来的”是法学博士，从前当过簡任教授，是有名的思想犯。他們中間的一个，看到弘藏把陶器飯碗和湯碗摆在牢房門口，提着水壶站在那里，就說：“先生，怎么样，冷吧！”然后在湯碗里給滿滿地盛了一碗菜，算是照顾。

每个人的菜的分量，本来大致有一定标准，可是根据盛菜的人的手高手低，却大有伸縮性。

在这个一千几百名长期囚犯全是男性的刑务所里，不說多少年中間看不到一个女人，就連画有女人的东西也不准看，所以年輕小伙子就被当作异性来关注了。尤其是遇到新从少年刑务所移送进来的人如果是一个美少年的話，那就会听到“絕色的兔子到了呀！”风声一下子就传遍整个工厂；爱好此道的，为了爭先博得对方的欢心起见，就会千方百計地赶快去和他接近。由于这种关系，一般地說来，年輕的犯人，刚进监牢就能得到种种方便，被大家另眼看待。菜啦什么的，自然也比一般人分到的多。最可怜的是年迈力衰的老年人。这种人本来正應該好好地看待，但实际上誰也不理睬他。年紀快到六十岁的弘藏，才进监牢就受到这样的照顾，給盛那么多的菜，算得上是例外又例外了。

可是，弘藏本人当时却并不知道这一层。（因为昼夜单独关在一間牢房里，别的牢房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所以尽管他一径受到特別照顾，分到的菜总是特別多，他还一心以为这个監獄里的伙食特別丰富哩。）不过，对于那好容易分到的特別多的菜，他却无法对付。那是蘿卜干丁煮的沙丁魚干。沙丁魚硬得犹如木块。取去风干了的魚头，把黑黝黝的魚腸和扎嘴的白刺剔出，尝了一两口，怎么样也嚼不动。煮得不透的蘿卜干丁，也嚼不碎。他把一大半菜都倒在簸箕里了。那个用馬口鉄片把一头稍稍弄弯做成的又小又浅的簸箕里，扔滿了残肴剩飯，那个髒劲，始終使他不自在。

入所那天，正赶上他五十四岁的生日，他的妻重子在家里煮了赤豆飯，烧了带着魚头的小銅盆魚，供在空位上，祝禱他的健康，他也无从知道。

晚飯的菜是醬湯。这个監獄早晨和晚上总是吃醬湯。醬湯里面，放的是扔在地下也不会有人拣的、又长又粗的裙帶菜。腸胃不好的弘藏，看到这种东西就害怕，不敢吃。他沒法处置，仍然把它

扔进簸箕。

因为听说只要摇过铃就可以睡，所以吃过晚饭，弘藏端坐在铺在地板上的坐垫上，面朝着房门，尽等候摇铃。这时，换班的夜班看守，连属于别的岗位的也都好奇地来到四十号门口，一个接一个地从眼洞里偷看弘藏。呆呆地端坐在那里，发觉房门上的小眼洞中突然有两只乌黑的眼珠子在发光，这不仅使人心里不痛快，还有些使人胆寒。晚饭后，走廊里就铺上棕毯。穿着制服却趿拉着草鞋的夜班看守，走在棕毯上，一点声音也没有，所以即使他走到了你的门边，你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来的。

上灯后不久，只听到楼下走廊里叭嗒叭嗒地走过大批的人。等到人声静下来之后，又听到像和尚念经一般的声音，然后是“共计若干名”的高声喊叫，又是砰砰的使劲关门声。那是白天在工厂里做了一天工的犯人，晚上回牢房，开始在点名。弘藏那个牢房里所听到的，是楼下杂居房的点名声。像和尚念经般的声音，乃是夜班看守在有节奏地很快地点呼关在同一间杂居房里的监犯的番号：“二十八号，一千零四十三号，三百七十五号，九百七十四号，一百五十九号，六百七十二号，八百二十九号，七百三十八号”。他们因为天天反复干着同样的事情，几乎背都背得出了，手里摊开一本花名册，就好比和尚念经那样，心不在焉地念着。不过，新来的弘藏当然不会知道这种情由。所以，他不知道那是在做什么，只管竖起了耳朵暗暗倾听。

不一会，楼下也寂然无声了。尽管在大家都进牢房之后，光是南部的一幢建筑里就关了六百名左右的犯人，但是因为一律禁止高声谈话，所以建筑物的内部，静得就像坟场一样（虽然夜里从外面看上去，这三层楼的混凝土大建筑，就像不夜城那般地高耸着，每个窗子里都射出明亮的电灯光）。

弘藏就在这种寂靜里，一直等候着搖就寢鈴。

等来等去，等到搖鈴，中間仿佛經過了老长老长一段時間。其实，根本也就是如此。依照十月份的作息時間，吃晚飯是四点四十分，就寢是九点，中間几乎相隔四个半小时。

今天的一天，時間觉得特別长。弘藏才把疲劳的瘦躯体放倒在床上，就馬上睡着了。无论是那张沒有床边的、可能会滾落到地上的鉄床也罢，或是正对着头的电灯也罢，都沒有妨碍他的熟睡。

和妻见面

那天夜里，当弘藏睡得正香甜的时候，重子在家里，正和小叔武雄两人，一边听着风吹得木板套窗发响的声音，一边担心着弘藏的境况，談得很起劲。

那天早晨重子接到通知，要她馬上到阪本警察署去。她不知道是什么事情，急急忙忙換好衣服跑去一問，原来是团迫的老婆照子要释放，叫重子做保人。团迫是和歌山高等商业学校毕业的青年，来东京后，得到本田的照顾，暂时寄居在本田家里，后来参加了共产党系統的工会运动，搞地下工作，这时已經被捕了。他的老婆照子，在团迫被捕后不久，也被捉了去，暂时拘留在K警察署里，在拘留期間生了病，病得很厉害，因而被释放了。病中一直和重子住在一起，好容易才复原，勉强可以外出了，就到以前居住的公寓里去取行李，岂知又被阪本警察署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捉了去；重子为她奔走的结果，被拘留一星期后的今天，才被释放。

重子照警察吩咐，給照子作了保，一道离开阪本警察署之后，她就馬上急急忙忙地赶到市谷刑务所去。因为今天是弘藏的生日，两个月以前就約定今天去看他的。

可是，当她走进市谷刑务所大門的时候，載着弘藏的护送汽車，早已駛过小菅刑务所的大門了。听到弘藏今天早晨被解走了的意外消息，她吃了一惊。传达室里的看守，觉得过意不去，就对她說，小菅刑务所很远，现在去已經来不及了，还是明天去的好，并且詳詳細細地告訴她怎么个走法。

那时，冷风越刮越大，下的雨像冰雨一样。

重子冒雨去到东京地方法院，见了戶澤檢察官，恳求他宽大处理一直被拘留在大崎警察署里的小女儿真知子，还請他对她今天保出照子这件事加以諒解，因为她怕被怀疑庇护左翼分子。直到天黑的时候，她才精疲力尽地回到家里。她心里思忖着，即使回到家里，也沒有一个可以說說話的人，正在感到孤单，岂知一脚跨进門檻，武雄就从屋子里面走了出来。他为了想从嫂嫂这里打听今天和哥哥会面的情形，早就来了，等着她回来。他一談談得很久，直到末班电車进厂之后，才冒雨摸着黑回去。

第二天是个大晴天，天上一点云都沒有。重子早晨九点钟就出門，到小菅刑务所去。当她在东武电車綫的小菅車站下車的时候，已經将近十一点钟了。零零落落点綴着几家人家的武藏野平原上，用混凝土高墙围着一大片地皮的小菅刑务所的高聳的了望台，立刻出现在右手的一边。

她沿着荒川堤，在滿是泥濘的路上急急忙忙地走着。

通向刑务所正門的馬路两边，排列着許多職員宿舍，混凝土墙上爬滿了常春藤。那常春藤的叶子，被霜打得发紅，散落在地上，仿佛通知人家寒冬将到，教人耽心。以后的几年中間，她一直独自一人，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在这条路上；这常春藤叶子的枯荣，經常打动她的心。

从外面看上去，刑务所的房子非常森严可怕。可是，大門外边

却没有阻止通行的站岗看守，直接就可以走到传达室去，这和去惯的市谷或丰多摩都不一样，虽说是件小事，却叫人心里感到轻松。再说，传达室里的人也和藹可亲。这正是由于有名的温情主义者、耶稣教徒有馬典獄长长时期当过这里的所长，所以这些地方至今保留着当年的遗风。

重子来到之前，先有一个老太太在等候着接见。这里没有给探监者准备等候室。原来，这里关的犯人，一大半都是从远方送来的长期囚犯，所以比不得一般的刑务所，尤其比不得市谷刑务所那样的未决监，来探监的人极少。几年中间没有一个人来探监，也接不到一封信，像这种无依无靠的犯人，也不在少数。——重子站在走廊里，等了三十分钟光景，同犯人见过面的老太太含着一泡眼泪走出来了。接着重子就被叫进接见室。

那屋子有十张席垫大小。南面对着天井，秋天的太阳光射满在玻璃窗上。室内还有暖气设备。屋中央有一张长方形大桌子，桌子上摆着万年青盆栽，周围放着五把椅子。北面是走廊，那儿的门窗都是透明玻璃的，走廊里的人可以看见屋子里的情形。这和市谷刑务所的接见用的小房间完全不一样。

重子走进那间屋子以后，又等了三十分钟光景，就有一个衣袖上嵌了一条银线、年纪将近六十的看守部长走进来。他问过了重子的现在的住址和年龄，然后给她讲述有关接见的注意事项。他很和气地讲给她听：这里和旧式刑务所不同，采取的是最新式的行刑方针，所以接见室也特意用了这种敞亮的屋子；接见时间规定在三十分钟以内，可是只要别无妨碍，也可以略为延长；同犯人见面的人，同时可以有三个。总之，一切都比所预期的要温和得多，这使她心里很高兴。

*

*

*

这天早晨，五点半钟起床喇叭一响，弘藏就起身，把床铺收拾好，打开全部窗子，浑身用凉水擦过。因为，他觉得，身上穿的是从来没有那样单薄的服装，为了要战胜今后行将进一步袭来的寒冷，除了采取积极攻势而外，没有别的办法，所以决心从今天起，采取绝对不气馁的方针。

起床后不久，开始了早晨的点名。手里拿着花名册的一个看守，一边喊着一个一个单身牢房里的监犯的番号，一边走过走廊。另外有一个看守部长跟在他后面，从眼洞里察看每个牢房里的监犯的情况。照规矩，这时监犯必须对着房门端坐在地板上，向外行礼；可是，不了解情况的新犯人，有时却踞坐在马桶上。于是察看牢房的看守部长就停下步来，大声斥责，有时还用拳头捶打牢房门。

“喂！不好好坐着可不成。把这儿当做什么地方啦？不是来玩儿的呀！点名的时候，必须坐得规规矩矩。知道么？懂了吗？”

因为牢房里并不贴出任何规则，所以新进来的犯人，由于受到这种斥责，才逐步懂得了各种各样的规矩。

在牢房里受到这样点名的，只限于昼夜独居的人。至于到工厂做工的犯人们居住的夜间独居房或杂居房，起床后洗过脸，就把每个牢房的门打开，监犯都到走廊里排队，在分栋叫了番号之后，看守就高声喊道：“第一工厂！”“第二工厂！”于是犯人就排成一字纵队，依次向工厂出发。

弘藏端坐在牢房里，侧耳倾听着楼下发出的人声和脚步声，诧异不知在干啥。

开早饭的时间，规定为起床后三十分钟。等到楼下一安静下来，不久就开始分发早饭。

吃完早饭，弘藏今天一整天的工作，仍然是把坐垫铺在地板

上，面对着牢房的門端坐着。

他呆不慣这个窄小的混凝土牢房，感到憋得受不了。他不想关紧窗子，就让可以看到天空的窗子半开在那里。

跑来巡視的主任看守看到他把窗子半开着，亲切地对他說：“既然怕冷，把窗子关起来得了。誰都不像这样开着窗子的。至于說是为了空气流通，那末这里有通风孔。”并且把天花板角落里絡着鉄絲网的小小的通风孔指給他看。但是弘藏沒有听从他的亲切的忠告。因为他不想采取消极的方法来对付寒冷。

終于要吃午飯了。这里吃午飯的时间，不分冬夏，一律规定为上午十一点二十分。今天的菜是黄豆煮鬼芋。弘藏又剩下了一大半。

他从一早晨就盼望着接见，結果直到午飯后才被叫出去。一个看守押着他，沿着昨天走过的走廊，把他带到警卫办公室旁边的一間小屋子里，在那里脫去了赭色囚衣，换上了浅葱色囚衣，然后走进昨天他看见年輕牧师向一个犯人热心說教的那个接见室。

他看见重子已經在那里。一个看守部长和一个教誨师，为了临場監視，早就把一本“犯人档案簿”放在桌子上，等候在那里了。昨天还在这間屋子屋角里的暗房一般的浴室里洗了热水澡，今天方才知道这間屋子原来是犯人的接见室。这儿既不像市谷刑务所那样让犯人在箱子一般的小房間里接见，也不用鉄絲网把两边隔开，双方可以坐在椅子上談話。看到这个情形，他暗地里感到高兴，觉得这真是值得感謝。

他一见到重子，馬上就問：“真知子怎样了？”

在这以前，当弘藏馬上就要下獄的时候，和重子见面的当儿，也曾为真知子的命运捏过一把冷汗。不过那只是轉瞬之間的事，随后他一想，还以为可能是自己想得过火了。后来他注意到，重子

似乎有些垂头丧气，但是又觉得对于一个眼看着年老体弱的丈夫要去坐五年牢的女人来说，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每次拿起她寄来的几封信，总是读得特别仔细，但是他纵然敏感，平常最能从笔墨中看出人家的心事，也一点没有发现信里有发生什么事情的丝毫迹象。

可是到10月初，弘藏收到了曾劝他撤回上诉的老朋友作田的一封信，信里有下面这样一段话：

“接到你太太的通知，说是上诉已经撤回，我总算放了心。猜想你也许感慨很深，不过判决确定，究竟是一种决定；这样，你就可以确定你今后的生活方针，作出安排，心情也会有所改变，对于你的健康可能也有利。今后但愿珍重身体，不要生病。

“我想可能还有一件事情叫你痛心，不过我觉得结果也许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当时真知子的行踪不明，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最后那句话，也可能就是指这件事，可是弘藏却又担心它暗示着更多的东西。但是，现在每月只准发一次信，和家人见一次面，所以他也无从查明其中究竟。

还有，昨天他解来这个刑务所的时候，警卫人员曾经详细盘问他家属的现状，却一点也没有问起小女儿真知子的情况，这也使他觉得奇怪。所以，弘藏一见到重子，首先就问真知子。

结果知道，果然出了乱子：真知子在弘藏快下狱之前被捕了，已经在大崎警察署里拘留了四十多天。

那时弘藏脑子里，有两个疑问像箭一样地掠过。一个是大须贺的两支手枪交给了真知子，不知道她究竟是怎样处理的。另一个是长时期过着地下生活，真知子是不是已经无可奈何地和男同志同居了。当弘藏一听到真知子被捕的消息时，这两个疑问就像

决堤的洪水那样，流过了他的脑子；可是顾虑到旁边有刑务所里的工作人员在场监视，不好说出口来。不过，重子说的话里有这样几句：“被捕时据说和另外一位女同事同居在只有两张席垫大小的屋子里，过着极节俭的生活。那样一个包在纸包里养大的孩子，居然能够靠自己的力量苦撑了好几个月，真使人感到欣慰。”因此关于第二个问题，马上放下了心。但是，手枪的问题究竟怎样，直到他出狱那天为止，都没有机会问个明白。

重子还说，真知子精神非常好；给她送吃的东西去，她总推说不要；在警察署的拘留所，三张席垫大小的屋子里，要关十几个人，夜里不能同时睡觉，只能分成两批轮流睡，一批睡的时候，另一批就站着，据说这是最痛苦的事；还有，她身上传染了疥疮，非常难受，已经给她送去了疥疮药，等等。——后来才知道，被捕的头四、五天，真知子受到了严刑拷打，衣服上全是鼻血，两条腿被打伤，肿得鼓鼓的，发着紫褐色，直到第八十天释放的时候，还跛着腿走路；不过这些话当时因为怕被旁边的监视人员听到，重子都没有讲。（这份稿子要是幸而能让下一代的人看到，他们也许会感到奇怪，不知道为什么要这般拷打她吧。不过在当时，像这种拷打，是毫不稀奇的。并不一定是为了逼问出什么口供，仅仅作为对被拘留的人的一种惩罚，管拘留所的巡警就可以半开玩笑地随心所欲地毒打你一頓。年轻女子，在这种时候，照例被剥光衣服。特别是拘留真知子的那个大崎警察署，管辖的是工厂区，经常有搞工人运动的人关进来；警察署里有两三个嫻于武术的狠将，专门靠殴打人民的“勤劳”，领月薪养家活口。这些人，遇到下雨天或酒醒时，为了排遣他们的脾肉复生之叹，就无缘无故地把拘留的人叫出来，作为他们试验腕力的对象。他们就像外科医生要是一天不动手术就觉得短少了什么东西那样，要是不打人，就觉得虚度了光阴：他们

正是这样的一种变态心理者。举个例来说，正月里大冷天弘藏关在中野警察署的时候，有几个还是暑天捉进来的搞左翼运动的青年，继续被拘留在那里，内中有一个青年，还是弘藏为了拥护马克思主义而几次把来作为论敌的已故著名学者福田博士的大儿子，这些人一再被警察当着弘藏的面一把拉住头发在地上拖来拖去，用穿着皮鞋的脚踩踢。这是故意打给弘藏看的。弘藏看到这副情景，心想如果那位性情急躁的福田博士现在还活着，看到这种情形的话，那末准定会立刻怒发冲冠吧。而真知子所关的那个大崎警察署，这种事情干得更是无法无天。有一位妇人，丈夫因违犯治安维持法被捕，不肯转变方向，被押送到遥远的网走刑务所去了，她本人在一年以前就从无产者医院的看护妇室被捉了来，尽管调查早已完毕，却始终没有释放，时常被叫出监房，用糙木棍子毒打一頓。处在军部的、警察的专制政治的日本帝国主义下的人民的所谓“自由”，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东西。）

重子一气把真知子的事情说完，才透了一口气，说是这件事情过去一直隐瞒着没讲，心里很痛苦，这一来却卸下了沉重的包袱。然后又笑着对我说，由于那孩子已经被捕，她反而放心了。

一眨眼，三十分钟的接见时间就过去了。在这一刻工夫里，出乎意料之外的种种情景，就好比闪电一样，在弘藏眼前忽明忽灭；到后来，他突然又回到沉寂孤独的世界。他同家属见面的时间，只有三十分钟，而为了见一次面，他却必须等待一个月，也就是七百二十个小时。

铅字拆版作业

入所后第四天的早晨，主任看守打开弘藏的牢房门，把捆在一

起的褪了色的赭色獄衣砰地扔在地板上。弘藏还以为申請增加的衣服迅速发下来了,而且发了那么一大摞,着实可感哩。

“是添发的衣服嗎?”

“不是,这是干活穿的衣服。”

“穿这个干什么呀?”

“从今天起,得干活了。因此白天就要换上这套工作服。身上那件长衣,本来只是睡觉穿的。”

市谷刑务所里,沒有另外的工作服,黑夜白天都穿着同一套衣服,而这里却另外有所謂工作服。弘藏解开带子查看了一下那捆衣服,里面一共有五样东西:类似工人穿的号衣模样的夹上衣;短衬衣;短腰带;短褲;褲衩。

于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穿上了日本农民和泥水匠所穿的那种劳动服。后来他长时期內搞錯了褲衩带子的結法,因此褲衩經常从他瘦削的腰骨上滑下来,弄得他很窘。其实呢,只要把褲带穿过褲襠結起来,問題就解决了;可是这点儿小事,他自己始終沒有发现出来,直到两年多以后解除了“严正独居”,能和另外几个犯人聊天的时候,才由別人教給了他。那时他格外痛感到,孤立的个人是多么无力。

派給他做的工作,是鉛字的拆版。这个刑务所,办有一个大印刷厂;鉛字拆版,就是那个工厂的零碎活儿。由于牢房里地方小,难于搞复杂的工作,因此,該拆的版,先由工厂把所有的汉字拣出,然后把剩下来的日本字母送到牢房来。弘藏的工作,就是把那批日本字母的鉛字按照い、ろ、は的次序拣出来,把“い”放回“い”那个小匣子里,“ろ”放回“ろ”那个小匣子里。有些刑务所,也有把織布机搬进窄小的牢房,让織提花布的;可是这里的独居房里的活儿,却主要是搓麻绳、糊封筒和糊气球。至于鉛字拆版,单拿沒有

一定指标来说，就被一般人认为是比较轻松的活儿了。

这个铅字拆版工作干了不久，弘藏就注意到，和汉字混在一起使用的日本字母，用得最多的还是“て、に、を、は”；至于“ろ”、“ほ”之类，就极少用到。三十多年来每天写文章的他，还是到了这里之后，才第一次注意到这一点。

他干活非常认真。作息时间，按月不同；至于他刚到这里的十月份的作息时间，是这样的：

起床，上午五点三十分；

早饭，上午六点；

上工，上午六点三十分；

休息，上午九点到九点十五分；

午饭，上午十一点二十分（吃饭时间四十分）；

休息，下午两点到两点十五分；

晚饭，下午四点四十分（吃饭时间三十分）；

停工，下午七点四十分；

就寝，下午九点；

工作时间，白天九小时三十分，夜里两小时三十分，共计十二小时。

这十二小时，他一点也不休息，完全花在工作上了。所以，懒惰的人，一天只能拣两匣铅字，而他每天却能拣十匣以上。

只有就寝是摇铃，其余所有作息时间，都吹喇叭。上工喇叭一吹，他马上开始干活，直到吹停工喇叭，工作时间里他几乎从来没有歇过手。因为所干的活是用手指摆弄铅字，所以饭前必须洗手；可是因为他一直工作到吹吃饭喇叭还不住手，所以要是饭送来得早了，都赶不上取出碗盖。

他那间牢房，前面曾经说过，门口和窗口两面都有走廊（关别

的思想犯的单身牢房，窗口沒有走廊，也沒有砌在走廊外側的鋸形障壁，所以監犯從窗子里能夠自由自在地看外面。像弘藏所住的那種牢房，稱為鋸房，是為了特別嚴加監視而設計的），無論從房門的眼洞里或窗口方面，獄吏都能隨時來個冷不防，視察室內的情形；可是巡視人員一次都沒有發見弘藏在工作時間里閑着過。

弘藏天性厭惡懶惰。如果在工作時間里可以讀書的話，倒也罷了，要是光只枯坐着的話，他却寧可手指冷一些，還是干活，覺得比攏着手不干活好得多。而獄吏方面呢，因為他確實在認真干活，所以開始對他產生了好印象。再加，無論對哪一層下級獄吏，他總是彷彿完全忘掉了自己過去的社会地位一般，彬彬有禮。因此，他來了不久，看守們就頓時對他放下了心，而且逐漸對他表示好感。

刑務所里的獄吏中，普通看守占大多數；普通看守上面有看守部長，看守部長上面還有看守長。做到看守長的人，不用說對犯人，即使對下級看守們，也是官架子十足。他們肩上戴着金色肩章，袖口釘着一條金綫，腰里挂着漂亮的劍。特別是逢到大節日，肩頭挂着銀絲穗子，威風八面，一般鄉下人還只當他們是什麼海軍將校哩。（不過，儘管看守長這樣架子十足，一查職員錄，也只是委任官，最初的月薪只不過五十圓左右。這樣一個小官，却穿着神氣十足的服裝，看上去未免滑稽；不過總的說來，官吏制服的神氣十足，乃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權威的象徵，所以殖民地的獄吏的制服，那種耀武揚威的樣子就更厲害。與此成為對照的是，像蘇聯的斯大林那種人，雖然資產階級報紙把他稱為俄國的獨裁者，他却終年穿着土黃色的立領制服，和普通工人所穿的沒有什麼兩樣，在家出外，都是那一套。）刑務所里，只有三個人是荐任官待遇，一個是被犯人稱為老和尚的教務科長（真宗僧侶出身的教誨師），一個

是做工厂技师的作业科长,还有一个是医务科长;至于正式的荐任官,一般的刑务所里,就只有一个所长,小菅刑务所也是这样。难怪当过簡任一級官的本田来了之后,那些对于处理思想犯本来就有过不止一次的棘手經驗的獄吏們,要感到不安,觉得不容易应付了。而結果呢,和他們的預期恰好相反,像这样容易对付的犯人,簡直从来沒有见过。

本田弘藏这个人,对人本来就很有礼貌;在大学教书的时候,不用說对学生,即使对待听差們,說話都很客气。现在做了監獄里的囚犯,对獄吏們彬彬有礼,在他倒并非出于什么政治策略,只不过是天性如此而已;可是这对于獄吏們來說,却一开始就給与他們一个非常良好的印象。

再加,在平常时候,他是一个看上去极溫和的人。还是中野警察署把他押送到丰多摩刑务所去的那一天早晨,他正在警察署楼上办公室的屋角里吃早飯,一个不認識的体格魁伟的巡警走上楼来,在楼梯半中央,的溜溜地看着他。当时他立刻感觉到,也許就要由这个人押送他去丰多摩,于是放下了筷子,向那个巡警点头招呼。那个巡警仿佛遇到了什么出乎意料的事情一样,和旁边另外一个巡警唧唧咕咕了一阵,然后走到他面前,又像輕蔑又像同情地說:“你就是本田么?我还以为是怎样一个猙獰可怕的人哩,哪里知道非常老实。我和新近死了的堺利彦那批人以前不知打过多少次交道。听說你是非常时期的共产党的理論方面的指导者,总以为是个了不得的魁梧奇伟的人,哪里知道意外地瘦小呢。今年多少岁数呀?……是么,今后得吃几年苦咧。干的多蠢的事情呀。真可怜,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这个脸色通紅的矮个儿老巡警,多次和有名的社会主义者打过交道,肚子里可能在想:“这家伙容易对付得很”,但是脸上却露

出称赞的样子，好奇地上上下下打量着本田的外貌，仿佛忽然觉得做了一笔赚钱买卖一般，说道：“简直是专程来见识一番了。”说完就出去了。其实他另有公干，只是搭上从警察厅开来押送本田的汽车，顺便到这里来的。

这是在中野警察署发生的一幕。可是，这个小菅刑务所的狱吏们，对于本田，或多或少地全都有同样的印象。

他立即博得了好声名；入所不久，就直接从所长嘴里听到夸他是模范犯人的话。

运动和洗澡

像本田这样拘禁在昼夜独居房里的人，走出牢房的机会，就只有运动和洗澡。

只要天不下雨，早饭过后，就让作三十分钟的运动。（《监狱法施行规则》上，有这样一条规定：“在监人犯，除雨天外，每日应使作三十分钟以内之户外运动，但视作业之种类，认为无运动之必要者，不在此限。前项运动时间，于独居拘禁之人犯，得延长为一小时以内。”）拘禁在昼夜独居房的十几个人，编为一组，到时候就由一个看守带领着，到三楼的屋顶上去，在屋顶上跑步，或是做广播操。东京广播电台广播操的第一次广播，是每天早晨六点钟开始。多半总是利用那次广播。

提起这屋顶上的运动，弘藏脑子里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情。

他所难于忘怀的第一个印象：屋顶也完全是混凝土的。运动场的周围，是大约六尺高的混凝土障壁。要是把身子靠在障壁上向下望去，非但刑务所院内的情形一目了然，就是混凝土高墙外边的小小的狐仙庙的屋脊，也可以看到，而且还可以看到狐仙庙旁边

年代悠久的老松树背后隱隱約約的魚肉飯糰鋪的招牌。自行車在相去不远的荒川堤的青草上馳行，火車在鉄桥上开过。涨潮的时候，荒川里蕩漾着滿河的潮水，河对过西南半边烟雾迷漫的灰色天空里，聳立着大大小小无数的烟囱，冒着灰色的烟，那是日本皮革工厂、千住制絨所、毛織物公司、大日本紗厂、钟淵紗厂、煤气公司、三共制药厂、日本化工厂、东京洋紗厂、富士造紙厂、日本制绳厂、大和橡胶厂等工厂的烟囱。再回头往东边望去，在一览无遺的武藏野平原的尽头，可以看到紫隱隱的筑波山。

不过，被围在混凝土障壁里、头上戴了深草笠、排了队在跑步的弘藏，自然看不见这些东西。

弘藏第一次被領到屋頂上来的时候所接触到的伟观，是高聳在遥远的空中的死火山的光景。

10月24日早晨不到六点钟，弘藏第一次被領上这个屋頂的时候，正当深秋时分，碧天如洗，初升的太阳耀眼地照射着。无意之中向西方一看，富士山犹如美人脫了衣服那样，露出了它的雪白的上半身。这时他觉得生平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美的东西。

从1月到10月，曾經拘押过他的丰多摩刑务所和市谷刑务所为被告設置的运动場，都是在平地上。那里包括几个扇形的、栏檻似的場地，中間用混凝土牆分隔着，地形狭长，一头尖尖的；相当于扇根的地方，設有了望台，一个看守始終站在那里監視着。绝对禁止交談的被告們，一个一个地被关进各自的栏檻，就像动物园里的狐狸或狗熊，鼻子碰得到墙上，在仅有一、二十尺长的空地上走来走去，就算是运动了。（关在病房里的监犯們，在另外的空地——建筑物与建筑物之間的一些空地——上做运动，情况也大同小异。）十个月中間只是做着这样的运动的弘藏，被送进小菅刑务所后，接連三天又关在混凝土牆的窄小的单身牢房里，整天什么事情也不

干，端坐在坐垫上；而现在，第一次登上屋頂远远地看到富士山的光景，这对于他来说，的确是个伟观。难怪很少接触到人工美的古代日本人，要歌咏赞叹喷烟的富士山的雄姿了。当时弘藏心里想，这样美的风景，一生中间，不见得能看到第二回了。

他所难忘的第二个印象：排成一字纵队的十几个囚徒（平常为了不让弘藏和旁人有交谈机会，他总被严重地安插在队伍的最后一），都穿着褪光了色的、赭色的、马褂似的“短衣”（“短衣”是这种衣服在小菅刑务所里的称呼），和同样颜色的骯髒褲衩，头上戴着深草笠，遮没了脸，赤脚穿着磨坏了的草鞋。到了屋頂，他们先要齐步走一会儿。那时，拉长了音调喊出来的凄厉而有气无力的“一二一”、“一二一”的吆喝声，如泣如诉，就像从遥远的地獄底里传来的一般。这种凄厉的声音，人世上是再也找不到的。接着就开始跑步。为了不让风把草笠刮去，一边按住草笠边缘，一边慌慌张张跑步，那副怪样子，世上也不可能再有；恐怕任何名画家所作的百鬼夜行图，也比不上这个。如果一般人突然看到这副光景，也许会大吃一惊，而产生一种恐怖的感觉。总是排在队伍最后的弘藏那时所受的印象，恐怕到死都不会消失。他不禁想起了所长才在三天以前对他讲过的“天皇的广大无边的仁慈的体现”那句话说来。

跑完了步，就开始做广播操。弘藏已经三十多年不做操了。可是，尽管不习惯，他还是拼命地做着。

一批思想犯，总是差不多在同样的时候，在同一屋頂上离开弘藏一段路的地方做运动。内中还有听过他的课的鈴木安藏、小林直卫等人；他和他们往往远远地互相用眼睛打招呼。特别是鈴木安藏，看到弘藏那样热心做操的样子，与其说是觉得可怜，不如说是觉得可笑。后来鈴木先释放出獄，去到弘藏家里，模仿弘藏做操的滑稽样子给重子看，引得重子笑得什么似的。

“严格单独看管”的人，走出牢房的机会，除了运动以外，就是洗澡了。前面曾經一再說过，对待犯人，每个刑务所都不一样；洗澡的次数，也各不相同。至于这个刑务所里，除了正在受惩罚的人不能洗澡外，即使严正独居的人，每星期也可以洗三次澡。二层楼上有一个大浴室，可以容纳许多人同时洗澡，那里装有铁管，从伙房输送蒸汽。普通犯人，也像运动时那样，十几个人编成一组，排好队，被带进浴室，在看守的响亮的号令之下，同时跳进浴池，又同时爬出浴池。洗澡的时间，规定为六分钟。浴室的柱子上，挂着一个细长的小盒子，里面盛着砂；那是一种砂钟。盒子的中央，有一块隔板，隔板中央有一个小孔；所有的砂从小孔里往下漏完，恰巧是一分钟。管洗澡的看守，就看着那砂钟发号施令。

“入浴！”

一声号令，大家争先恐后地跳进第一个浴池。这时砂钟里的砂默默地开始往下漏。等到全部漏完了，看守马上把砂钟颠倒过来。于是，翻到上面的砂，又开始慢慢地往下漏。刚一漏完，看守就发出号令：“出浴！”

于是所有的人一齐跑到冲洗的地方，抢肥皂，擦洗全身。肥皂全都是没用过的。用剩下来的肥皂，看守把它包在旧报纸里带回家去，作为自己的外快。（看守经常把公家的东西偷回家去；监狱里所有电灯泡上都写着“小菅刑务所”字样，就是为了防止看守的盗窃。）

过了两分钟，又是一声号令：“入浴！”于是大家又跳进第二个浴池。等到第二次出浴的号令发出，这一天的洗澡就算结束了。这不仅关在昼夜独居房里的人是如此，就是那些在工厂做工的人，尽管入浴次数是每天一次，除了极少数佩带“独步”章、享有特权的犯人以外，无论经过多少年，入浴方式也永远不变。

不过，像弘藏这种重要的思想犯，就不去二楼的大浴室洗澡，而是单独在三楼的小浴室里洗澡。还有极少数其他种类的犯人，由于种种理由，必须完全隔离的，也享受到同样的待遇。

在关弘藏的一舍三楼，他总是第一个洗澡。（二舍三楼的洗澡日子，是和一舍三楼错开的；那儿第一个洗澡的，总是佐野学。）洗澡，一吃完午饭马上就开始了。弘藏吃饭特别慢，当管洗澡的看守开牢门叫“洗澡”的时候，他的嘴里经常还在嚼东西。到后来，管洗澡的看守随机应变地把洗澡时间适当地推迟了一些。

单独拘禁的人的浴室里，虽也挂有“洗澡时间六分钟”的牌子，可是既没有钟，也没有人发号施令，所以有些脸皮厚的家伙，尽在里面泡着不出来。但是，弘藏却总是赶快洗好了出来，有时反而让管洗澡的看守说：“已经洗好了么？”那个看守甚至还不止一次地对弘藏说过这样的话：慢慢地洗也不要紧，会给予适当的照顾。可是，弘藏却留心着尽可能不让自己因为这种好心好意而放肆起来。

可是，说实话，对于关在监狱里的人来说，洗澡可算得是最大的享受了。他本来就极爱洗澡，而现在，洗澡又是取暖的唯一机会。

他比谁都长得瘦，平常就最怕冷；现在年纪快到六十，初次在监狱里过年，身上只穿着薄薄的狱衣，老是冷得发抖。他比别的犯人多领到一件短短的单衫。所以，到11月上旬为止，他上半身穿着两件单衫和一件夹衣，下半身穿着一件夹短裤。每年要到11月中旬，才能穿到棉上衣和布袜子。不过到那时，尽管上衣已经换了棉的，短裤却仍然不变；无论天气多冷，下半身也只贴肉穿一条夹短裤。呆在书斋里的时候，每到秋深，他就怕冷了；一到冬天，下身总得穿两条长毛衬裤，膝上裹上羊毛毯，脚上穿了苏格兰羊毛袜，还加上厚厚的呢鞋罩；而现在，连一条棉毛衫都穿不上，却在

见一絲火星的牢房里，坐在馬桶盖子上，背靠着洋灰墙壁，从早到夜只动着几个手指；因此到了隆冬，任凭他怎样打起精神，身上还是嗦嗦发抖，毫无办法。所幸每天三頓飯时，可以在銅壶里分到一杓子开水。他捧着那馬上就会冷却的銅壶，总算能暖和片刻手指头。除此以外，能从外部暖和一下身子的，就是晴天从窗外射进来的阳光，和每星期三次的“洗澡六分钟”。他是多么珍視这洗澡呀。要是洗澡那天，刚巧遇到大节日，那就做工虽然豁免了，可是洗澡也作罢了。遇到这种时候，他就老是这样想：只要能洗到六分钟的澡，整天做工都不妨。因为，他在未坐牢以前，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从来沒有哪天不洗澡呀。

单調的单身牢房生活

午飯后洗好澡，除了十五分钟的休息时间之外，又要干那单調活儿，一直干到晚飯时为止。弘藏在洗脸台上放好整理鉛字的架子，馬桶盖上鋪好坐墊，坐着干活。本来，坐在馬桶上，两脚伸在洗脸台下，正好是对着桌子坐在椅子上的姿势；不过脚边地位小，放着一只盛洗手水的小鉛桶（按照牢房里的規則，水桶必須放在那个地方），身子一动也不能动，累得受不住。不仅如此，当时已是深秋，两条腿伸在外面，冷得要命。沒奈何，他只得經常屈腿坐在馬桶上；可是，如果把两条腿垫在屁股下面坐着的话，脛骨磕在馬桶盖上，又痛得很；如果盘腿坐着的话，身体就往前滑，非用一只膀子支撑在洗脸台上不可；如果身体往后靠的话，那末身上的一点体溫就会全让洋灰墙壁吸收了去。

这种情况，不仅干活时是这样，吃飯、讀書时也是这样。——用了三十年的他书斋里那张碩大无朋的櫟木桌子，他所中意的宽

闊的棉坐墊，坐墊中央由綫結子做成的那個柔軟的窩窩，這些東西就像幻影一般經常出現在他的眼前。

他坐的地方當着窗口，天氣不好的日子，從玻璃窗的鐵框和洋灰牆中間的空隙里吹進來的風，冷得可以。不過他那間牢房是朝南的，所以如果是大晴天，暖和的陽光就照到屋子裡來。（比起朝北的牢房來，溫度據說相差四、五度之多。）起先，西邊牆上射進一絲絲晨光。不久，射到的地方越來越大，光綫也越來越濃。（起床時間，按月不同，可是總和太陽升上地平綫的時刻相差無幾。弘藏常常站在馬桶蓋上，觀看武藏野平原上的日出。那光景實在叫人心曠神怡：臉盆一般大、火一般紅的雄壯的朝日，一面把靉靄的云腳染成千變萬化的顏色，一面徐徐升起；至於一年、兩年一直被單獨關在朝北牢房裡的人，有的由於牢房的方向關係，終年連月亮都看不到。）等到光綫爬到牆上、落在地板上的時候，就一窗子都是日光了。這時即使想要學古人的樣，用長繩把白日拴住，地球仍然無拘無束地以每秒二萬九千七百米的速度循着軌道運行着。地板上的鐵柵欄的影子，一點點地斜向屋角，不久陽光就像閉了帷幕一般地消失了，只剩下窗口障壁上淡淡的一片夕陽，那光景可淒涼得很。最後，連天空里的落日的殘照也越來越淡了。到了那個時刻，往往聽到馬路那邊吹起賣豆腐的悲涼的喇叭聲。吃晚飯的時刻已經到來了。

晚飯的分發，10月份是下午四點四十分，11月份是下午四點十分，12月份是下午三點四十分。豁免做工的日子，還得提早一小時。（那是因為輪到在放假的日子值班的看守們，要想把犯人快快關進牢房，鎖上牢門，好早些結束自己的工作。）因此，12月份的豁免做工的日子，晚飯在下午兩點四十分就開了。這樣早的晚飯，全世界恐怕找不出第二個吧。

晚飯后的干活時間，10 月份是三小时，11 月份是三个半小时，12 月份是四小时。（有的工厂还得加班；至于昼夜独居房里，却从来不加班。）弘藏觉得一天之中最痛苦的就是这晚間的活。到了晚間，牢房里越加冷了。他总是一面用滿是裂口的双手摸弄着冰冷的鉛字，心焦地等着吹停工喇叭。

从 10 月份到 12 月份，停工時間是下午七点四十分。将近七点四十分的时候，刑务所內远处的工厂开始发出号令的声音，不久就是繼續不断的咯嗒咯嗒的声音。这种声音，呆在牢房里听起来，显得非常凄凉。全体犯人夜里睡觉的房子和大部分人白天服劳役的工厂中間，有馬口鉄屋頂的走廊相通。走廊的一边，鋪着踏板，早晨和晚間都在踏板上鋪了棕垫。犯人就打那里早晨从牢房里快步跑去工厂，晚上又从工厂跑回牢房。弘藏在自己的牢房里老是听到的咯嗒咯嗒的声音，长时期以来，对他是个謎；其实就是这踏板的声音。天气冷了，尽管是下雪天，也得冒着风雪，赤脚在踏板上走过。

夜晚呆在靜悄悄的牢房里，干活已經干得累到极点的时候，一听到咯嗒咯嗒的声音，不久楼下就发出大伙儿蜂拥回牢房的嘈杂声。停工的喇叭就在那时候吹。

从 10 月份到 12 月份，停工后直到九点钟搖就寢鈴为止（12 月份开晚飯的時間是下午三点四十分，中間經過五个多钟头），中間有一小时又二十分钟的休息時間。如果想讀書的話，只有利用这个時間。可是，在这个時間里，弘藏却总是先收拾那排列在洗脸台上的鉛字整理架和鉛字匣子，用鉛桶盛好水（牢房里除了三次开飯時間而外，只有夜晚停工的时候，鉄管子里才放得出水），用抹布抹了洗脸台和地板，然后脫光衣服，像早晨那样用凉水擦全身。如果不做这些事情的話，就冷得抗不住。擦完身，又把坐垫放在地板

上，盘腿坐着，做西式健身操。这是一种坐在那里前后摇动头部、左右弯曲上半身的运动：这种运动对于关在窄小的牢房里的囚徒来说，是最合适的室内运动。

做完西式健身操，那时他几乎已经精疲力尽，再也不想看什么劳什子书籍了。

最初他手边有公家借给他的两本书。入所不久，看守就把图书卡片箱交给他，叫他从中挑选两本他所想借的书。那个卡片箱是个分格的马口铁箱子，里面放着三百来张卡片，每张卡片上写有书名和著者名，分成修养、宗教、传记、地理、历史、文学、读本、作文、农业、商业、工业、法制、经济、哲学、数学、语言学、辞典、经典等类目。像弘藏这种新犯人，每月只能从其中借阅两本修养和宗教方面的书。他翻看了一遍书目卡片，没有发现什么想看的书。没办法，只好借了一本《八宗纲要讲义》和一本《真实的宗教》。

借来一看，原来《八宗纲要》是六百十几年以前死掉的非常博学的凝然和尚三十九岁时所写的书。把它编成讲义的，就是担任这个刑务所教务主任的教诲师；不过弘藏连所长的姓名都不知道，自然不会去注意是谁编的了。版本似乎很旧，可是因为没有版权页，所以也弄不清它是几时出版的。——这样的书，弘藏再也不想硬睁着由于日间工作而疲劳已极的双眼来看它。

《真实的宗教》是1931年发行的一本比较新的书，著者是文学博士、医学博士富士川游。平素手不释卷的弘藏，从10月到11月的一个月里，只读了这本不到两百页的书。

有一天，刚从行刑局回来的所长，突然光顾弘藏的牢房，从眼洞里问他读些什么书。弘藏据实回答了他，所长马上接下去用责备的口气说：“呆在牢房里不读书是不成的。只知道干活，是不抵事的。我希望你在这里静静地多读些书，把过去的思想重新检查

一下。将来你固然不再搞什么了，可是如果你的思想不改变的话，作为行刑当局者的我，是交代不过去的。马克思主义是和日本的国体水火不相容的；一个日本人，要是抱着这样的思想，那就辱没了日本人的称号。希望你多读一些书，好好考虑考虑，明白这一层。”他把这些话说了好几遍，然后板着脸孔走了。

所长走后，弘藏就向站在所长旁边听到全部谈话的主任看守诉苦说：“只叫我读书，时间一点也没有，哪里行？如果豁免半天的活儿让我读书，倒还罢了；现在我整天拚命干活，反而说是干活不抵事，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停工以后，固然有一些时间，可是打扫打扫屋子，马上就过去了。”

小心谨慎而不大说话的主任看守，也觉得弘藏怪可怜，安慰他道：“夜晚虽说有点时间，可是干了一天活，也就累了。我听去也觉得不怎样行得通。”

弘藏心里暗自嘟囔：“这里的狱吏都很好，唯有所长不好对付。”

渴望普通社交

天天过着刻板的、毫无变化的生活。不仅这样，一天十几个钟点，几乎全是毫无变化的时光的单调的连续。特别是弘藏这种拘禁在昼夜独居房里的人，除开每天一次杂役夫来收集簸箕里的垃圾时有机会和他偶尔讲一两句话之外，有时往往接连好多天整日不说一句话。这种生活，是没有内容的生活，虽生犹死的生活。长久被拘禁在这种昼夜独居房里的人，才会懂得尽管是朝夜见面那一套无谓的应酬话，对于人生是多么贵重。

东西在失去之后，方才知道它的可贵。弘藏被关在未决监的

时候，送进来的盒子飯吃不了就經常剩下。而现在呢，不知有多少次心里在想，即使能吃到一次以前所吃剩的盒子飯，又多好呀。从丰多摩刑务所移押到市谷刑务所以后，家里再也不能送吃的东西进来了；想吃甜食的話，只能买到每袋一角錢而在数量上却有五、六个的便宜点心。弘藏虽則爱吃甜食，当时还不想买这种便宜点心吃。长久缺乏糖分的他，现在不知多少次空想着，那种一角錢一袋的点心，要是这里有得买，买上一袋也是好的。不过，人类适应环境的能力也确实伟大，当刑务所里的麦飯吃得越来越觉得香的时候，貪馋獄外东西的程度也就逐渐减退了。那样爱吸烟的他，近来也不想抽烟了。但是，唯有談話的欲望，始終沒有减低。無論同誰都成，他心里渴望着同人家說說話。

几年以后他被释放出獄，每次人家問他在監牢里最感痛苦的是什麼，他总毫不躊躇地回答說：“最感痛苦的是不能講話。”而且每逢这种时候，他就意識到现在能这样自由地講話，真是幸福。他怕別人体会不到他所感觉的幸福的程度，所以一遍又一遍地說着这样的話：“能够把这样跟人家說話当作幸福，这完全应当归功于監獄。过去认为沒有什麼而现在觉得可貴的事物，着实不少。人家听起来，也許以为我在自己安慰自己，其实，我从来沒有像现在这样觉得自己时时刻刻都生活在幸福之中。今天我才真正懂得这个道理：失去了的东西一旦能够收回，价值就格外高。說来似乎可笑，今天像这样說着話，我就觉得幸福非凡了。”

如此深深盘据在他心坎中的对普通社交的渴望，也并不是終年全然得不到滿足的机会。犹如百尺古井里的水一般的他的心，通过极有限的通信和接见的一条細管子，也稍稍接触到一点儿地面上的空气。

最初每月只許发一次信。牢房里不准放紙笔。批准发信后，

会发下一张写信用的格子紙和一个薄薄的信封。等到要写信的时候，可以托主任看守借墨水和玻璃笔。

他老是琢磨着下次豁免做工那天在那张面积有限的信紙上写些什么，伸长了头頸等候所指望的豁免做工的日子到来。他爱好写作胜于一切，现在一个月里只能写一頁字，难怪要伸长了头頸等候那一天的到来了。

写信用的那张格子紙，每格只許写一行字。一张格子紙上，只有二十六行，这就是弘藏一个月中間可以写字的最大限度。过去三十年中間除了生病之外沒有一天不写东西，他就像餓猫捉住活耗子那样，想在发給的一张格子紙上最高度地滿足自己的写作欲，把字写得尽可能小，可是笔尖折断的玻璃笔，刮着那薄薄的紙，写字不能称心如意。

獄外来信，沒有限制；但是只限于亲属，外人一般不許来信，来信就在信封上打一个“释放时交給”的戳子，原封不动地扔进倉庫去。这样的信件寄到以后，也不通知受信人。等到犯人坐滿五年十年的牢、释放出獄的时候，才能領到这种信件。（几年后弘藏出獄时領到的“释放时交給”的信件里，甚至夹杂着胞弟寄来的暑天問候的簡簡單單的明信片。）

不过这方面的待遇，大有不同，就要看是什么样的犯人了。像牽連在五·一五事件里的那批海軍將校（暗杀总理大臣犬养毅的那批家伙），一开始就被当作“国士”对待，任何事情都受到特殊的待遇。海軍省每星期三次派語学教員来教他們中国話，还每月一次派人坐了汽車来給他們送整笔的图书費。从全国各地寄給他們的书籍杂志也非常多，內中还有一个小朋友每月給他們寄《少年世界》来。除了《改造》和《中央公論》这两种杂志不許可而外，其余一概无限制地交給他們；在那批人中間，还可以完全自由地互相轉

借(在一般情况下,是禁止轉借的;如果违犯这規則,要受到严重的懲罰);因此,他們每个人都能看到大量的图书杂志。寄来的信件,也无例外地一律交給他們。当初他們坐牢的时候,輿論对他們的贊美、敬慕和同情,是十分热烈的;因而他們中間,有人一天甚至收到十几封信。

可是,像弘藏这种左翼思想犯(这个刑务所里,和五·一五事件二·二六事件有关系的人,不用說了,就連暗杀井上准之助、团琢磨和滨口雄幸等那批不学无术、沒有思想的年輕小伙子,也都被称为思想犯),除非毅然决然轉变方向,否則就絕對不可能受到这种恩典。

再沒有比关在昼夜独居房里收到別人来信更高兴的事了。

还是关在市谷刑务所里的时候,在8月底,弘藏收到过他那嫁在京都的大女儿喜志子的来信,信上說:

“去由良的期間,在报上看到您被判处五年徒刑的消息,我真伤心透了。但是我所更惦念的,是您近来的情况。昨天媽媽寄来她所繕发的《致至亲好友》,从中得知您的心情很沉着,非常欣慰。一时深深地感到刑罰的慘酷,觉得什么都可詛咒;但是后来又觉得除了百折不挠地活下去而外,沒有別的办法。您信里最使我难忘的,就是手巾那件事。我也不由自主地悲哀起来,很不好受。”

“刑罰的慘酷”这几个字,給了弘藏很大的刺激。把“残酷”写成了“慘酷”,不知是有意呢还是无意。不管怎样,使喜志子写出这几个字的那种感情活动,弘藏是能真切体会到的。——信里所提到的手巾那件事,指的是弘藏有一次信上所写的这样几句话:“坐牢坐了七个月,所用的一条手巾,已經破烂不堪,今天申請报废了。我不禁觉得悲哀起来。”

自己女儿写来的信里的这种詞句,弘藏觉得永远也忘不掉。

这种信，尽管在别人看来，算不得什么，可是做父母的，读了却由衷地欢喜。

秋尽时节，喜志子寄来的绘画明信片上，写着这样一首短歌：“攀动枝蔓、花子像泪点那样地掉下来的秋天的牵牛花，多叫人伤心呀！”弘藏觉得这首短歌也非常凄婉。无论什么信件，在牢房里不能保留一星期以上。弘藏把这个绘画明信片竖立在洗脸台上时刻欣赏着，满了一星期，还舍不得放手。

不管有事没事，重子每隔四、五天就给他写一封信，从未间断过。她因为听说任何信件都不能搁在座右一星期以上，所以就想出这个办法，使弘藏身边永远有至亲所写的信。（在弘藏坐牢的那几年里，她始终如一地每隔四、五天就给他一封信，从来没有耽误过。给连报都不让看的犯人写信，内容是严格限制的，不能随便写。还有，信在交到本人手里之前，要经过好些人检查。在这样一些情况之下，几年中间毫不间断地每隔四、五天就写一封信，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弘藏本来想，将来自己出狱以后，大须贺谅必还关在牢里，那时一定每星期至少给他写一次信。可是等到后来出狱之后，这个计划却没有能实现，因为尽管有话想说，也大都成问题，不便在信里说。直到那时，他才对重子当初那番心血有了一个充分的评价。）

比等待来信更心焦的，是每月一次的接见。因此，如果等来等去的那次接见未能“正常地”进行，那末那番可气可恨，就没法说了。

那是11月中旬重子第二次来探监时的事。弘藏被叫出牢房，来到所长室，发现所长背对着南窗，面朝着大桌子，坐在一圈圈身椅上。他身穿黑礼服，海獭皮背心。换上了浅葱色囚衣的弘藏，被指定和等候在那里的重子隔着桌子并肩坐在所长的对面。

所长把点着的香烟放在烟灰碟子上。由于暖气开放，似乎嫌屋子里太热了，头顶的气窗敞开在那里。冷空气微微地从窗口吹进来。袅袅直上的香烟的烟，在头顶摇曳。放下香烟的所长，得意洋洋地对弘藏夫妇讲了一阵之后，朝向弘藏说：“今天让你们在这里见面。你们谈吧。”

弘藏肚子里暗想：“尽管叫我们说话，这副光景，话怎么说得出呢。”才讲上一两句，没等重子回答，所长就抢着接了过去；弘藏讲一句，他倒要说上四、五句。弘藏觉得这个爱叨唠的所长实在讨人厌，但是毫无办法。

首先谈到的是弘藏的健康情况。

“真是意想不到地平安。近来饭也和大家吃得一样多了。夜里睡得也很好。照这样下去的话，也许还能平安地出狱哩。”

弘藏这样一说，所长马上接过去说：现在的刑务所，特别讲究卫生；关在里面，虽则失去了自由，身体却不让糟蹋，所以对健康反而有好处。他飞快地叨唠了一番之后，又补上一句说：“出狱的时候，一个个都很健康，体重也都增加了。死在刑务所里的人，一个也没有哩。”

气得不成的弘藏，永远特别清楚地记住所长这两句话。后来他奉命担任教务科的杂役夫的时候，每逢有人自杀或生病死掉，到尸体室去作棺前诵经的准备，就是他的任务；有时一个月里甚至连续死掉两三个人。还有，刑务所里每年要举办一次追悼会，追悼那些死在牢里的犯人；从这个刑务所设立以来，死在牢里的，总数达一千七百多名之多。每逢这种时候，弘藏就暗自气愤这个刑务所的所长的信口胡言，说什么“死在刑务所里的人，一个也没有”。

接着重子提到送书进来的事。

“小島先生寄书来了，刚才已经办妥了送进牢的手续。小島先

生寄书来的时候，信里說：手边恰巧有家里人讀过的书，弄得有些髒了，现在寄奉，望勿见怪，請代送进牢去。”

“是么？什么书呢？”

“《陶淵明集》和《老子》。”

“《老子》是独册的么？”

因为手边只許保留两册个人的书，所以弘藏要問《老子》的册数，因为，送书的人既然是汉学家，那部《老子》就說不定是薄薄的两本綫装书。

“啊，《老子》么，那是分上、下两册的。”沒等重子开口，所长又插了进来。“一般人讀《老子》总誤解其中的意义，所以那是一部危險的书。可是，像本田先生这样的人，就不用担心讀不懂这部书，不妨好好地讀它一下。最近我也讀过《老子》。上星期日人家請我演讲，我还引証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这两句話哩。請勿见怪，本田先生，研究經济学，是沒法懂得真正的人生的。不妨讀一讀《老子》，好好考虑考虑这方面的問題。”

弘藏比較深入地钻研《老子》，还是三十年以前的事。洪川和尚所著的《禅海一瀾》里的“我大雄(释迦)以一音演法，伯阳(老子)抱一以为天下式，宣尼(孔子)亦以一貫立宗旨”。这几句話，是他背都背得出的爱讀的句子。听到所长用看了一部小說似的口气說“最近我也讀过《老子》”，冒充淵博，就觉得好笑。

因为所长只管自顾自起劲地叨唠着，重子閑得无事可做，就拿起摆在她面前的茶杯。那是弘藏还没有走进所长室之前女佣放在桌子上的，杯子里的茶已經完全凉了。重子正要喝的时候，所长举起手来制止她說：“接见的时候，不能喝茶。”她让所长这样一讲，难以为情地把茶杯重新放回桌上。弘藏在旁边看到这副光景，就仿佛自己受到了侮辱一样。

这时所长露出他自己所要讲的话全部讲完了的神气，宣布说：“今天的接见到此为止吧。”就此结束了接见。弘藏心里充满失望、不满和忿恨，一面回头看着脸容尴尬的重子，一面戴上草笠走出了所长室。

盼来盼去才盼望到的接见，竟落到了这样的下场；他满肚子的不满情绪，简直没法比喻。

真知子的释放和喜志子的进京

弘藏被捕时，他的七十多岁的老母，雇了一个小姑娘，独自住在家乡山口县岩国市。弘藏的情况在报纸上广泛报道以后，她就一天到晚呆在家里，避免和人家见面。弘藏的小弟弟武雄，是一个水彩画家，所以身体最自由。他等弘藏的案件审判完毕，回家乡去看了一次母亲，发现母亲所受的打击太大了，觉得照这情况，自己只有回到家乡，住在母亲的身边了，终于在11月底，离开住了二十五年的东京，收拾家私，带同妻子，搬回家乡去住。

“回到家乡去以后，有时可能遇到不愉快的事情，得忍耐着一点儿。”

这是武雄被准许特别接见，向他哥哥辞行，临别的时候，他哥哥在小菅刑务所的接见室里嘱咐他的话。

到临动身那天的11月30日的上午，武雄上法院去求见户泽检察官，告诉他本人当天就要回家乡去，请户泽今后多多照顾还拘留在警察署里的真知子。

经过他这一申请，那天下午两点钟的时候，检察院就来了一个命令，传重子去。重子急急忙忙赶去一看，原来真知子也从大崎警察署被提到了那里，据说调查已经完毕，马上就可以领回去。大崎

警察署跟来的两个刑事警察，要重子們先到警察署去一次，于是母女两个又到大崎警察署，直到天黑，才回到家里。

这样，真知子在大崎警察署拘留了八十天，到离开家庭后的第二年，才回到了她母亲的怀抱。临行前的武雄夫妇和他們的两个孩子，也在家里等着。

大家把小小的餐桌拼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吃完晚飯，武雄夫妇們就坐上八点半钟的夜車，离开了东京。

第二天早晨，火車到达京都車站。当时曾到車站上去送别的喜志子，給监狱里的弘藏寄来了这样一封信。

“今天早晨到京都火車站去见武雄叔叔，同他在候車室里大約談了两小时話。知道爸爸精神很好，十分欣慰；尤其高兴的，是真妹昨夜平安回到了家里。驟然听到这个消息，喜欢得連話都說不出。（我們还没有讀到今天的晨报。）媽媽一定高兴极了，爸爸也大大地放心了吧。但願真妹今后前途光明順利。高高兴兴地回到家里一看，媽媽又寄来了爸爸的信，从信上詳細了解到您的日常生活情况，知道您精神好，委实高兴。今天天气又好，整天欢欢喜喜地过去了。大家再就是等爸爸回家了。12月1日夜九时。”

还有5日那天的来信里，后面附有这样几句话：“这些日子天气比較暖和。今晨接到媽媽和真妹来信。我决心来东京一次。正在考虑放寒假时走呢，还是早一点、过两天就走。反正不久就能见到爸爸了。祝您身体健康。现在我要去給百合子送飯了。上午十时。”

真知子平安回家的消息，不时吸引着喜志子，結果沒有等到放寒假，她就动身了。12月7日，她把两个大孩子留在京都，抱着一个最小的儿子，来东京了。

她也有两年沒有见到媽媽了。还是重子在她将生产这次带来

东京的小外甥的时候，临盆前后去京都照料她的那次聚首的。重子当时在京都听到弘藏遭法西斯团体袭击，临时离开自己的家而寄居在武雄弟弟处，只好匆匆回到东京。从那以后，弘藏一直继续过着惶惶不宁的生活，因此重子直到今天都没有和喜志子见面的机会。

两年不见，这次见到了喜志子，做母亲的自然非常高兴。重子心里再三转念：“女儿的主妇风度，更加落落大方了。”

她们给监狱里的弘藏去了一封信，告诉他：三、四天內母女三人就来探监。那时弘藏在回信里写了这样的话：“在变幻无常的人世里，这不是在做太甜蜜的梦么？”

他已经三年没有见到喜志子了；至于小外孙，还是第一次见面。翻阅他的判决书，开头是这样写着：“被告人……一向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1928年4月辞去大学教授职务后，专门从事马克思经济学等的著述，同时参加新党筹备会和劳农党的运动，后来认为这种合法无产阶级政党反而只会阻碍日本共产党的发展，于是带头发起所谓解散运动，……”就在他致全力于这个解散运动的时候，1931年2月，他去京都演说，曾到喜志子家里住了一夜。从此以后，他一直沒有能再去京都，外孙后来出世，他也一次都没有见过。现在他在监狱里，多么想见见他们母子俩呀。至于想见见好容易被释放、分别两年后回到母亲怀抱的真知子，就更不用说了。

12月11日星期一那天，清早就是大晴天。重子、抱着娃娃的喜志子、真知子三人，上午相偕来到小菅刑务所的传达室，申请同弘藏见面。

早就知道她们要来探监的所长，事前吩咐传达室里的人说，她们一到，就马上领到所长室里来。

把三个女的叫到自己办公室里的所长，不知他打的什么主意，

首先板着脸盘問真知子的“思想”，狠狠地教訓了她一頓。真知子本来乘兴而来，目的是看看爸爸，不料却碰上这个吹毛求疵的所长的执拗的盘問，弄得她心里很难过。等到她开始掉眼泪的时候，所长才不再盘問她，却又开始去盘問喜志子的思想。过了好一会，才去叫弘藏出来。

正在自己牢房里拣鉛字的弘藏，一听到“所长叫！”的声音，就好比吃了苦汁那样地皺起眉头。他想好不容易盼到的接见，今天又要在所长室里进行，心里异常气愤。

弘藏换上細袖的浅葱色长衣，束好同样顏色的腰带，走进所长室，摘下草笠，只见她們母女三个，犹如也犯了罪那样的，面对着所长，并排地坐在大桌子前面。他一眼就瞧出，在他到来以前，所长已經訓了她們一頓。他脸上頓時露出忿懣之色。

奇怪的是真知子眼睛紅紅的，面頰上还带着泪痕。最近弘藏所收到的这个小女儿的明信片里，还說：“請您放心，我的身心都比您所想像的要健康得多。”今年1月里，在他被捕前夕，他和意外来到他藏身处所的真知子談了一整夜的話，第二天早晨紧紧握着手分別了。那时在他看来，真知子不仅十分可爱，同时又非常勇敢。她那时的模样，一直活生生地留在他脑子里。他做梦也想不到这一次会看见她哭紅着眼睛的脸。

弘藏心里猜想，一定是所长說了什么刻薄話，才使她哭了。于是，他的气愤程度越发高了。

后来，过了四年，到弘藏不久就要出獄的时候，真知子在写給牢里的父亲的信上說：“在小菅刑务所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初次看到您身上穿着青色囚衣，心里十分难过；一想起您以后不得不在这个地方坐上几年，就伤心到极点；自从我长大成人，还没有像那样地哭过。……”直到那时，弘藏才明白当初她的眼泪里还夹杂着这

种成分；然而当时却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层。当时，他平常穿的是洗旧了的赭色囚衣，那衣服非常难看。尤其是他的身材比一般人特别长，光身穿着一条夹短裤，那副样子，格外凄惨。逢到接见的时候，平常穿的短裤脱掉了，赭色囚衣换上了浅葱色的长衣，本人还觉得比平常日子整齐多了，岂知即使这样，亲人看了他的样子，仍然不禁伤心落泪，这就不是素常过惯了悲惨生活的囚人们所能觉察到的了。

完全不考虑弘藏怎样想法的所长，让他也坐在那张桌子的旁边，立刻开了腔：“本田先生，你放心吧。我们谈了好些问题，你的女儿已经完全转变方向了。我敢保证，这就没有多大问题了。我问她为什么要参加运动，她说是因为同情工人的生活。我就解释给她听，像这类事情，政治家会好好安排，女人家该做女人家的事。经过我这样一解释，你再也不用担心了。”

脸上一团高兴的所长，好生叫弘藏气愤。现在他丝毫也不想听所长这套话。再说，他想，如果照此下去的话，今天的接见又要完蛋，这可受不了，而且女儿还是从百里外特地赶来的呢。因此，他一下子站了起来，打断所长的话头说：“今天请允许我们在普通接见室里接见吧。因为我女儿是特地从京都赶来看我的。”

他极力把脸色放柔和了，可是语气里却还是带着命令的调子。所长看到弘藏的坚决的神色，马上同意了，把管接见的看守部长叫进来，吩咐说，今天准予在另外的屋子里接见，“免除见证人”。

弘藏等由看守部长领着，走向另外的屋子的时候，真知子也一道离开了座位。这时所长伸手阻止她说：“你不能去。刚从警察局里放出来的人，还不能享受这种自由。”

因为生杀予夺的权力完全操在所长手里，所以说怎样，也就只好怎样。和古代的王爷一样，一切都要听他高兴。

重子回头安慰真知子說：“你是随时都可以来的，就在这里等一会儿吧。”然后走出所长室。

他們被領去的地方，是走廊对面的大会議室的一角。弘藏、他的妻重子、抱着娃娃的大女儿喜志子三个人，坐在一张考究的皮沙发上。（刑务所工作人員所用的家俱等类，比别的衙門里不知讲究多少。因为可以用十分便宜的价錢把自己所里的出品买下来。）弘藏坐在中間，左边坐着重子，右边坐着喜志子。小外孙身上穿了西服，外边罩着一件白毛綫衣，喜志子把他抱在膝盖上；他是弘藏初次看到的第三个外孙。弘藏一边两手托着圓滾滾地包在白羊毛袜子里的外孙的小脚爱撫着，一边說道：“因为穿的是这样的衣服，今天就不抱他了。”

他們犹如被风暴毀掉了窠儿的小鳥那般，挤在一块儿，唧唧嚶嚶地說着話。看守部长和他們成一对角綫地站在另一屋角里，远远地带着善意的眼光在監視他們。一眨眼就过了将近二十分钟。这时，敞开着的會議室門口，所长刚一露面，就对看守部长說：“差不多了吧。”于是，弘藏盼来盼去盼了多少天的接见，就此結束。

弘藏心想，所长大概是个沒儿沒女的人。看守部长把他帶回牢房的时候，他趁机問起了这一层。果然不出所料，所长連一个孩子都沒有。

看守部长順便还透露：这个所长是不到一年以前才从函館刑务所升上来的。弘藏心想，果然是个村里村气的官儿。

特赦的夢

別了，1933年！

12月11日，也就是入所后的第五十天上，弘藏出乎意外地被准許买了筆記簿、墨水和玻璃筆，放在自己的牢房里。他本来早就死了心，以为今后五年的牢獄生活中，座右不能放置紙筆，哪里知道被批准了，因此特別高兴。从前苏子美曾經說过：“明窗淨几，笔硯紙墨皆精良，自是人生一乐。”现在弘藏呆的是监牢，桌子是洗脸台，笔是最粗劣的玻璃筆。然而，得到了这些东西，他却有稍稍恢复了生趣的感觉。

筆記簿的封面上，印有“感想录”三字，里面是三百七十頁的格子紙。每天写一頁，恰巧可以用一年。封里是《使用笔墨紙的規則》，里面写着这样的話：“感想录并非著述性质，它的目的在使人用日記体裁記錄修养上的教訓、职业上的知識以及每天的感想。所以不能記入議論或批評，也不能記入对于待遇的意见。感想录随时要受檢閱。违背本規則的感想录，予以沒收；濫用笔墨紙的，停止其使用。”

弘藏受到这个規則的威胁，想写的重要感想，全都沒有能写。由此可知，那些每天仔仔細細記日記的人，往往反而会把最重要的事情略而不写。

可是弘藏在那本“感想录”中，从来沒有写进一行违心的話。本来，世上大概沒有比犯人所写的“感想录”更荒唐的东西了。大多数犯人，毫不害臊地故意大书特书当局所中意的东西，一开始就

摆好架势，专门等着检阅。而当局方面，也不管犯人写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只要看见表面上写得冠冕堂皇，心里就欢喜。这也难怪，因为不说别人，就连教诲师本人，也就惯于大声宣说违心的说教，天天吃饱了饭不干别的，专写捕风捉影的报告，向上司汇报。因此，犯人无论写多么虚伪的东西，谁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了。但是，尽管在这样的气氛中间，弘藏却始终没有写过一行违心的话。

12月底，皇太子出世了。弘藏的“感想录”里，29日那天只写着这样几句话：

“皇太子诞生了，今天是举行命名仪式的日子，所以下午停止做工。”

被拘禁在单身牢房里，当时他什么都没有知道。原来这个皇太子出世的喜报，使许多犯人都欢呼起来。在工厂里做工的人们，听到这个喜报，都哄闹起来，停下了工作，内中还有高兴得手舞足蹈的。

在日本，遇到皇家有什么吉凶大事，照例要对全国囚徒实行大赦。这种时候，除了一部分强盗杀人、杀害尊长、放火等重罪犯人而外，其余一律会减刑：无期徒刑减为二十年有期徒刑，其余一律把刑期减去四分之一。这个小菅刑务所是重罪监狱，关的是全国各地的长期囚犯，他们早就盘算到即将到来的1940年，是日本开国后的二千六百年，那时将大大地举行庆祝，到那一年的纪元节^①，准定要实行大赦，每人都指望着减刑，有人甚至还清清楚楚计算出减刑以后，到某年某月某日他就可以满期，眼巴巴地等候着那天的到来。大家因为都这样盼望着大赦，所以自从听到皇后不久将要生产的好消息，就一心指望菩萨保佑，生个皇太子，这样自

^① 纪元节在2月1日。——译者

己就可以早日出獄了。

听到皇太子出世的消息，挨不上大赦的人，当然馬上就很不自在，綑着脸呆在一边生气；而大多数人呢，相反地完全高兴得手舞足蹈了。主任看守因为事情不比寻常，不能和平常日子那样斥責，叫大家“靜点！”也只好让怠工状态繼續保持下去。等到吃完午飯，就正式宣布临时停工，让大家回牢房。由于赶不及做豆餡年糕，就从点心舖子里买来了紅白炒米糕，分給了全体犯人。

第二天早晨，和往常一样地来收垃圾的杂役夫，輕声地对弘藏說道：“先生，你在这里是呆不长的，不久就要放出去了。我已經坐了十几年的牢，監獄里的事情，什么都知道；像你这种情况，会通过特赦释放出去的。至于普通监犯，就通过大赦而减刑。我是杀人强盜，所以无论赶上怎样的机会，也不会减刑。真叫我难堪极了。尽管我的罪行的性质恶劣，可是人总不免犯点儿錯誤呀。不是有‘鬼使神差’这样一句話么？像先生这样的人，还这般地来坐牢哩。……我經常思忖，尽管罪行的性质恶劣，对于第一次犯罪的，难道不能从宽发落么？这番我已經第三次沒有挨上减刑了。一起进来的无期徒刑者，都大搖大摆地出去了，我却永远关在牢里，而且永远是无期徒刑，这实在太不公平了。請为挨不上大赦的人設身处地想一想看，世上沒有再比这更痛心的了，真是。不知道你以为怎样。这不是辜負了皇家的一片使人皆大欢喜的慈悲心么？因为挨不上大赦的人，要怨恨的呀。你如果释放出去的話，我想請你帮个忙，主张一下。我們这种人，說話根本不抵事；可是像你这样的人，要是能为我說几句話，一定会有用的。只知道坐办公室的当官的，懂得什么呢？”

弘藏畏畏縮縮的，对于落到自己身上的特赦的問題，尽管很想問个明白，却仍然沒有問出口，結果只問了他减刑的办法。从杂役

夫口中，他才知道无期徒刑是减为二十年有期徒刑，有期徒刑是减
去四分之一。

杂役夫还对他讲了这样的话：“大赦大概在明年纪元节边。据
说纪元节前的一个星期里，全国将举行盛大的庆祝，也许就在那时
候颁布大赦。反正你在这里是呆不长的，只要再稍稍忍耐一些时
候就是了。”

弘藏什么情况都不明了，听到杂役夫这番话后，肚子里独自
思忖：“我居然不久就要出去吗？我的运气虽说一向不错，可是，才
只坐了不到半年的牢，就要出去，运气也未免太好了。这究竟是真
还是假呢？”

弘藏并没有认为杂役夫所讲的话全都可靠。可是在另一方面，却也
没有一点根据来否定它。相反地，他还一心想找些根据来
肯定它。他回想到三十年前在大学读书时代所听的宪法课。

“按说天皇的大权中，该包括大赦、特赦的权力。照杂役夫那
番话，两者之中，我似乎将得到特赦。可是得到特赦的犯人，到底
要具备哪些条件呢？”

想来想去，从前所听的课程的详细内容，再也想不起来。可是
不知不觉中间，有一种想法隐然支配了他，再也打消不掉，那就是，
他觉得自己不久就可以出去了。

不管是哪一类的罪犯，所有的犯人，都抱着一种普通人所难以
想像的对自由的如饥如渴的憧憬。这种憧憬犹如魔鬼一般，日
日夜夜无可奈何地占据着他们的心灵。随着这种渴望的增强，他们
经常只要稍稍受到“你能出去了”的暗示，心就突突地乱跳，犹如淹
在水里的人，连稻草都要抓一把，也来不及加以批判和反省，立刻
信以为真，耽于可笑的空想，或者出可怜的洋相；尽管一而再、再而
三地失望，直到出狱为止，仍然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种经验。一

般的情况是这样，弘藏也不例外。

听到杂役夫那番話的当天，他在半信半疑之間就开始抱下一个梦一般的希望：“我也許能出乎意外地早日出獄。”这个希望每逢遇到什么机会，就如同黑夜里遥远的海波中間忽隐忽现的漁火那样，不断地明明灭灭。

正当弘藏独自沉溺在这样的梦想里的时候，真知子为了和她姊姊在一块儿过年，12月28日上午十二点钟左右，乘火車离开了东京，預定在姊姊家里呆十天。那天是个又冷又凄清的阴天。重子到火車站上送走了真知子，回家的路上到好几家鋪子去买帝国美术学院画展的美术明信片。她是想到弘藏喜欢繪画，所以打算买一些他所中意的东西。她从銀座的上方屋一直問到新宿的美术明信片鋪子，都沒有买到，后来听人家說，池袋电車站附近有得出卖，終于一直找到那里，可是这种明信片哪家鋪子都还没有发卖。

她在那天的日記里記下了这样的話：“傍晚时候，精疲力尽地回到家里。回到家里，也沒个人等我，真想哭出来了。入夜，小雨。”

終于12月也只剩最后一天了。弘藏一家多灾多难的1933年也毕竟过去了。大除夕的晚上，重子攏起火桶里快将熄灭的炭火，独自沉思了半天。临睡的时候，她在日記里記下了这一些話：

“多事的1933年終于过去了。对于我来说，从今年1月份开始，就是接二連三的大事件。除了武雄小叔以外，沒有一个骨肉至亲可以商量，几乎全凭自己一个人的主张来处理所有的事情，可能产生了不少差錯，也得罪了許多人。

“丈夫弘藏的下獄和真知子的平安回家，总算都告一段落。

“但願弘藏今冬太太平平地过去。但願真知子和我都有一个光明的前途。这两件事是我唯一的心願，別的一切都不放在心上。

“写完了給一向来往的亲戚朋友的賀年信，正在写这日記的时候，无綫电收音机里传来了京都真如堂、知恩院、銀閣寺、法然院等寺院的大除夕的钟声。这些寺院离喜志子家都很近。想必喜志子和真知子姊妹两个这时候正手挽手地在談心吧。

“一想起住了二十年的京都时代的事情，沒来由地眼角就发热了。

“京都那边也許过年过得很熱鬧吧。但願真知子健快。我沒命地想念着自己的亲骨肉。”

獄中迎接 1934 年元旦

1934 年 1 月 1 日到来了。

大除夕晚上比规定時間早一小时，下午八时就睡觉。元旦那天早晨，六点二十分起床喇叭吹响以前半小时，弘藏就醒来，洗过了脸，用凉水擦了全身。

站在馬桶盖上向东方一看，武藏野平原尽头的地平綫上，像脸盆那样大的血紅的太阳，映着一带紫色的云朵，正要上升。平常日子看不见青色的东西，心想今天是元旦，大概不至于挨罵，他就在馬桶盖上站立了好一会，观看那平原的景色。

早飯后，天气晴朗得不见一点云，窗口射进来的阳光越来越暖和。像弘藏这种“严格单独看管”的思想犯，元旦上午在教誨堂里的集合也不让参加，于是他就整天盘腿坐在馬桶盖上，翻看着老朋友小島祐馬送来的《陶淵明集》。

“淵明固不喜宋……但念先祖家声，則非仕晋而复兴晋室不可。唯其志趣在隱遁閑居，两者交攻于心而不能决”——这样一位詩人的詩，据說“血气方刚时，讀此詩如嚼枯木；及綿历世事，知决

定无所用智”^①。好容易綿历了世事的弘藏，现在坐在牢獄里翻看一千六百多年前的这位詩人的遺作，首次想到一般所說的隱遁者們的深刻的內心生活。

他以元旦試筆的心情，取出“感想录”，在元旦那天的感想里用玻璃笔抄了《归园田居》中的一首：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誤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恋旧林，池魚思故淵。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后檐，桃李罗堂前。曖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鳴桑树顛。戶庭无尘杂，虛室有余閑。久在樊籠里，复得返自然。”

这一首里的“曖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鳴桑树顛”，和另外一首里的“采菊东籬下，悠然见南山”，被认为是古今絕唱，据說东坡称赞这几句詩，“大率才高意远，則所寓得其妙，遂能如此。大匠运斤，无斧凿痕”^②。弘藏独自一人在監獄里一面安靜地反复低唱这些詩句，一面玩味从字里行間飄出来的清香，以及它的发音(即使照日本人讀中国古詩的方式讀)的美妙的韵律，就好比喝了滿滿一琉璃盞的芳醇美酒一样，不知不觉地把時間消磨过去了。他深深地觉得自己多少識几个字的幸福。

这位詩人，除上面所举的平淡的一面而外，还有“历览千載书，时时见遺烈。高操非所攀，深得固穷节”、“丈夫志四海，我願不知老”、“先师遺訓，余岂云墜。四十无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虽遙，孰敢不至”^③这种雄渾豪宕的另一面。同一詩人

① 黄山谷跋《淵明詩卷》語，見四部丛刊本《陶淵明集》总論。——譯者

② 原出《冷齋夜話》，四部丛刊本《陶淵明集》总論所引。——譯者

③ 分見《癸卯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杂詩十二首之四》、《荣木》各篇。——譯者

的心境里，既有消极的、看来软弱的因素，又有似乎和这相矛盾的、积极的刚毅有力的因素，这也使弘藏特别感到兴趣。

他把这些诗句也都抄在“感想录”里。玻璃笔尖刮在纸上，不能称心如意地写字。他想，如果今天是在自己家里的话，一定会研好墨，展开宣纸来挥毫作乐吧，于是联想起有间皇子被囚之后在旅途中悲叹自己的遭遇的那首短歌：“在家的時候，飯盛在漆器里吃；出門在外，却把它托在柯树叶上。”

* * *

新年的三天中間，刑务所里也要吃一年一度的特种好菜。

元旦——早飯：除平常的麦飯外，另有切成三角形的烤糕三大块；猪肉、牛蒡、洋芋大杂燴；海带包魚两个；紅腌生姜；柿餅三个；橘子一只。午飯：麦飯；和早晨同样的大杂燴；醋白蘿卜和胡蘿卜；腌火葱。晚飯：麦飯；煮黑豆和沙丁魚干；青魚子；黄腌蘿卜。

2日——早飯：麦飯外，另有和昨天同样的烤糕；和昨天同样的大杂燴；海带包魚两个；紅腌生姜；花生一袋。午飯：麦飯；醋章魚加炒牛蒡絲；黄腌蘿卜。晚飯：麦飯；煮面；鬼芋和白芝麻豆腐拌胡蘿卜；腌菜。

3日——早飯：和昨天同样的麦飯、烤糕和大杂燴；紅腌生姜；黄腌蘿卜。午飯：麦飯；和早晨同样的大杂燴；青魚子；腌火葱。晚飯：麦飯；和早晨同样的大杂燴；煮赤豆；黄腌蘿卜。

平常日子弘藏所吃到的食物极其单調，这三天能吃到这样出乎意料之外的好菜，他觉得非常稀罕。煮黑豆和煮赤豆里面都放了糖。这也是一年中間只能吃到一次。弘藏就好比难得吃到一次甜点心那样，非常欣赏煮豆里所带的赤砂糖的香气。

为了想让最爱讀他的獄中通信的老母更詳尽地了解他在監獄

里的生活，他利用年底年初的几天休假日子，在一张格子紙的每一格里，仔細地写三行至四行的小字，每天想到一点就写一点，把三天的菜单也詳詳細細地写了进去。他自以为这封信写得非常有趣，当他把写好的信重新讀一遍的时候，自己还很得意哩。岂知写了几天才辛辛苦苦写好的这封信，結果却不許寄发出去，竟就此作废了。他特别宝貴自己所写的东西，惋惜那封信，就仿佛剝去了自己身上一块肉那般的。

本来，行刑上的 *silent system* (沉默制度)，有一时期曾經被世界各国广泛采用；在这一制度下，不仅犯人中間严禁交談，刑务所本身对社会也严守沉默，監獄內部的情况，全部严加保密。但是，今天各个文明国家，早已废止了这个制度；现在所采取的方針，反而是尽量让社会上了解刑务所內部的情况。但是，日本的刑务所里，现在还几乎完全实行着这一制度；名义上虽然把監獄改成了刑务所，可是刑务所仍然不属于社会的一部分，而是排除在人类社会之外的牢獄；关于刑务所內的情况，始終墨守着一味隱瞞的成規。——弘藏不了解这种內情，辛辛苦苦地花了三、四天工夫，在一张格子紙上詳詳細細地写下身边的各种情况，还自以为过了一个有意义的新年而高兴哩；岂知一切都成了泡影。格子紙上，每行只能写一行字，这个規矩，他也是这回才知道的。

* * *

1月6日，弘藏接到母亲写給他的亲笔信，发信的日期是12月26日。

“在你回家以前，你的娘一定还健在，只希望你千万保重身体，不要有什么三长两短。”

弘藏讀到这一节的时候，掉下了眼泪。

两条退却綫

1月16日，教务主任把弘藏叫了去。所长倒經常移樽就教地亲自来到弘藏呆的那間牢房和他讲话；教务主任却一次也沒有来过。

教务室里本来附設着一个小小的接見室，可是教务主任不在那儿接見弘藏，却坐在他自己的办公桌前，把弘藏叫到那里去。他桌子上放着一个小小的屏风，他在屏风背后展开文件，手里拿着毛笔正在写什么东西，字写得很漂亮。过了一会儿，抬起头来招呼站在那里等着的弘藏說：“請坐，請坐。”

这个教务主任，是全国刑务所中資格最老的教誨师，他不是一個什么活动家，性格和所长不同，很沉着老练。在他酒徒似的猪肝色的脸上，露出了让香烟熏黑的牙齿，他安閑地問过了弘藏的健康情况和家属的安好与否以后，吩咐弘藏說：“我想了解一下你现在的思想情况。我觉得与其由我执笔记录，还不如你自己写。就請你簡單明了地把你现在对馬克思主义的想法写出来吧，不用长篇大論。”

弘藏从說話的口音中猜测这个教务主任是京都人。馬上他就被帶到另一間屋子，并且領到了笔墨紙硯。

这次談話，一开始他就认为目的是在为特赦作准备。当教务主任吩咐他写目前的思想情况的时候，他更加觉得是那样了。因此，他就在这种想法的支配之下写起来。

“实际运动，无論它是合法的或不合法的，决心完全和它断絕关系。从而，有关实际运动的主张和批判等等，也就是政論文章，今后将完全放弃执笔。

“关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也已經决心放弃了。从而，关于以宣传馬列主义为目的的文章，今后固然不再写，就連純粹学术性的理論研究文章和翻譯，今后也一概不再执笔。早在計劃中的《資本論》的翻譯，也决心不再进行。

“关于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論，在我过去所公开发表的論文和著作的范围内，觉得沒有加以根本訂正的必要。

“这些就是我现在想法。”

他想，要是能出去的話，那就不如趁此机会，爭取快些出去。因此，他极力把語气放得緩和些，以博取对方的良好印象；但是上面那些話，已經說到了头，超过这个限度，他再也不能說什么了。

他早就預备下两条退却綫。

第一条退却綫是从共产主义的实际运动中退却。

無論从他的能力、体力來說，或是性格來說，他这个人都不适宜搞实际的政治运动。这一点，用不着人家批評，他本人就非常清楚。可是，由于他确信共产主义的科学真理，同时又認識到现代共产主义运动的至高无上的价值，因此，尽管从他本人的趣味和爱好來說，书斋正是他的安住之地、精神的故乡，他却抛弃了它，而以老馬馱重載、硬被鞭策着登上险峻山坡的心情，参加到街头的实际运动里去。但是，等到一旦坐进监牢，却就盼望早日出去，第二次再也不願到这种地方来，所以他立即决心脱离实际运动。在目前形势下，任何形态的共产主义运动，已經全部不得成为非法的，所以他认为，实际上他只有逃避到书斋中去的一条路可走。这就是他的第一条退却綫。

在他最初公开宣布这一退却的时候，他也曾煞費苦心。因为，他十分明白，如果宣言“我宁死也要坚决繼續斗争，到死方休”，这

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显然有利；坚守着这种态度，乃是每个共产主义者应尽的责任。

可是，尽管自己招认了这种退却，要是同时能够有机会宣布自己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丝毫也没有动摇的话，这就无异于对外界做了一番宣传；这样，退却的招供仅仅暴露了自己的软弱，自己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失败，却不至于伤害日本共产党以及共产主义对于人民群众的威信。由于他同时有着这样的想法，所以实行第一线的退却，并没有费去多大躊躇。因此，他在公审之前，在市谷刑务所写的《獄中独語》里，就已经公开宣布了这一退却。这在前面已经详细讲过了。

不过，在那篇《独語》里，他还是说：“即使退隐到书斋里之后，我仍然将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学者。”说：“至于《资本论》的翻译，在我有生之日，却总想把它搞出来。”这还是一种留有后步的退却；对于他来说，背后还留有一条最后的抵抗线。——弘藏想，要是自己退到这里，敌人始终不放松追击，必须作出更大的让步，才能免去牢狱之灾的话，那就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放弃《资本论》的翻译以及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文章的发表了。这就是他的第二条退却线。

退到这第二线，对他来说，就意味着生命的终结，余生仅仅是行尸走肉而已。可是，只要能活下去，一有机会，这具行尸说不定还能发散出检察官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毒素”。自己过去已经做过一些超出能力范围的工作。实在没办法的话，落到这步田地，也没有什么后悔。

正因为抱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当他还关在市谷刑务所里的时候，就曾在写给审判长和检察官的申请书里，一度表露过退却到第二线的姿态。第一次公审他，是去年的8月1日；当时检察官要

求判他徒刑七年，这比弘藏所料想的要重得多，缓刑的希望，顿时一笔勾消。那时他非常后悔自己的退却程度不够，因为在《独語》里还只是退到第一綫。为了設法判得輕些，他左思右想，結果赶在8月8日宣判之前，在3日早晨向审判长和檢察官提出了那份申請书，里面表示了自己退到第二綫的决心。这在前面也已經說过了，这部书的忠实的讀者，想必也已經知道了。

当时他想到他竟不得不把作为一个馬克思主义学者的生命也亲手公开地葬送，真是感慨无量，一个人坐在监牢里，禁不住形影相吊。后来听到律師說，公审庭上早就把事实审理完毕了，递那种申請书，是一点作用也沒有的。那时弘藏又非常后悔自己慌慌张张地干了一桩蠢事。不过再一想，既然那个申請书无效，那末期滿出獄后，就仍然可以重新过馬克思主义学者的社会生活，此后一直沒有放弃这种想法。——所以他一直以为自己还只是退却到第一綫上。

結果现在，才只經過半年，他就梦想在不久即将到来的紀元节能得到特赦，再度表明退到最后的一綫。他认为，为了沾受意外的利益，这样一种让步是无可避免的。

总之，要是能出去的話，巴不得早出去一天好一天。虽則自己說什么也不願做叛徒；可是，如果做残兵的話，那末無論做怎么样的残兵都沒关系。他就这样一心一念地呆想着。

1月20日那天，也就是让教务主任叫去的几天之后，教务主任把弘藏的“感想录”拿去检閱了。他后悔12月29日那天的感想里只写着这样几句话：“皇太子誕生了，今天是举行命名仪式的日子，所以下午停止做工”，觉得这在一个希望特赦的人來說，未免写得太簡慢了。

紀元节的特赦

正当弘藏在这獄中痴心妄想着不久自己也許就会遇到特赦而出獄的时候，他家里却尽在担心这次虽說普通一般犯人都将减刑，弘藏也許不能减刑。这是因为报纸上流传着这样一种說法，就是这次的大赦，违反治安維持法的罪犯，将和强盜杀人、杀害尊长那批人同样对待，一律不得减刑。

2月6日傍晚，新聞联合社的記者跑去訪問重子。过去一再被新聞記者、杂志記者糾纏不清而感到头痛的重子，心想怎么又来了呢，不禁双眉紧皺。哪里知道今天却很难得，是专门来送喜信的，說是这次大赦，弘藏也有份儿。不久送到的晚报上也登載着这件事。重子心想事成大概是靠得住的了，就和专程来道喜的亲友們度了一个熱鬧的夜晚。

到了紀元节当天，弘藏第一次和一般犯人一同去教誨堂，因为这一天上午九时要举行庆祝典礼。

走进教誨堂一看，里面的人已經滿滿的了。今天因为不做工，所以犯人都穿着睡觉的衣服。大部分穿的是赭色衣服，內中也有穿浅葱色衣服的。穿浅葱色衣服的，都是些資格較老而級別較高的犯人。大家一律穿了一件单褂，外面加上一件小袖子棉袍，束着一条短腰带。聚集在一堂的一千两百个犯人，都刮光了胡子，剪了和尚头。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几乎絲毫变化都沒有。只有两三个头上沒有一根头发的秃頂，放着异彩。——真是世上少有的稀奇的集会。

因为大家都是穿了棉袍来的，屋子里到处是棉花屑；特别是屋角落里，堆得如同大风过后的落叶一样。有些看守，嘴巴上还带着

黑布的口罩。

全体犯人都让坐在长板凳上，一张长凳上坐八个人。弘藏坐在最后面。

礼堂正面是舞台那样的高坛，中央挂了紫色幕布，幕布上挂着大国旗。这儿本来是佛坛，因为第一任所长有馬典獄长是有名的耶稣教徒，所以尽管这是远东首屈一指的刑务所，它的佛坛的设计，比乡下的小刑务所的佛坛还简单。平常日子里，那紫色幕布上挂着一幅粗劣的阿弥陀佛像。高坛上国旗的两旁，严肃地坐着以所长为首的一批主管人员，如医务主任、教务主任、作业主任、警卫主任，另外还有一些看守长，余下的那些狱吏们，都成排地坐在坛下两边靠窗的地方。

特别威风的，是看守长的礼服。帽子上是宽阔的金边，肩上是簇的银色穗子，资格老些的或者从军人转业过来的，胸前还挂着几个勋章，这和一屋子犯人所穿的不成样的衣服对比之下，简直漂亮到极点了。后来弘藏听到这些看守长仅仅不过是委任官的时候，倒有些不相信起来。

典礼一开始，首先让全体起立，接着向宫城遥拜，然后和着风琴唱国歌，三呼天皇、皇后万岁，皇太子万岁。

大家坐下以后，所长离开座位，走到坛上摆好的讲台跟前。和往常不一样，从看守长直到普通看守，今天都穿了礼服；可是独有所长一人，依然穿着平常那套礼服，所不同的只是今天手里拿了一副白手套而已。

他首先讲到今年的纪元节因为是皇太子诞生后第一次的纪元节，所以特别可庆；然后讲到皇家的仁慈；最后说：本来以为今天可以给大家传达好消息，可是由于司法部门的命令还没有到，所以只能改日再宣布了。

所长讲完話，接着走到讲台前面来的是壮健矮小的教务主任。今天他身上穿的不是袈裟，而是燕尾服，胸前还佩帶了勛六等瑞宝章、大典紀念章和紅十字会會員章。他比所长更自然老练地先祝賀皇家的兴隆，然后談到日本精神。从他話中听来，仿佛全世界沒有一个国家比得上日本那样尽善尽美；中外古今沒有一个民族比得上日本民族那样优秀。

典礼就此結束了。进入会场时輪到最后的弘藏，这下倒过头来首先回到自己的牢房。

不久开午飯了。飯是赤豆麦飯，菜是牛蒡、芋头煨牛肉。还发給了喜事用的紅白豆餡年糕。

吃完午飯，犯人又被召集到教誨堂里。因为大赦的命令已經到了。自以为也許能受到特赦的弘藏，跨进教誨堂的門檻的时候，心里还在琢磨着：宣布大赦，不知道是怎样一个宣布法，說不定第一个就念到自己的名字。

所长一走到讲台边，穿了看守长制服的秃头文书科长就鞠躬如也地双手高高捧着一个白木盘，盘里放着一个紫色錦緞包袱，递到所长手里。所长帶着白手套，恭恭敬敬地从包袱里取出一頁文书，宣布說“天皇的詔书現在已經从司法部門送到了”，并且要大家起立。

所长宣讀了天皇的詔书：“朕冀与众庶同欢庆，爰命国务大臣頒行大赦。1934年2月11日。御名御璽。各国务大臣副署。”讀完詔书，他开始說明大赦的內容。

“根据罪名的不同，这次的大赦，也有一些挨不上的人。那些不幸而沒有受到恩典的人，在这个时候，應該再一次反省一下自己所犯的罪是多么严重；对于受到大赦的人，應該气度宽宏地表示由衷的祝賀。如果能充分表示出謹慎悔悟的情状，那末将来还可以

通过别的途径受到恩典，这一层务必好好考虑考虑。至于受到恩典的人，更应该深深体会皇家的仁慈是怎样地广大无边；反正今天一整天不用做工，回到自己的牢房去后，应该安静地端坐在那里，整天专心祈祷皇家的兴隆。”

说完这一段话，他才宣布：一般犯人，都减去刑期四分之一；那些已经坐满刑期一半的人，减去余下的刑期的一半。然后宣读了不在大赦之列的罪名。

“犯刑法第七十三条至第七十五条罪名的人。

“犯刑法第七十七条罪名的人。

“犯刑法第八十一条罪名的人。

“犯刑法第一百零八条至一百十条罪名的人。

“犯刑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至第一百四十九条罪名的人。

“犯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罪名，因而致人于死的人。

“犯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罪名，因而致人于死的人。”

这些条文，飞快地念了一会儿。

弘藏肚子里想，这样飞快地仅仅念出刑法第几条第几条，犯人是不会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的，为什么不稍稍亲切些，加以说明呢。其实一点也用不着他操心，每一个犯人对于本人所犯的罪名属于刑法哪一条，条文的内容是什么，都比自己的姓名还记得清楚；别人所犯的罪名虽然弄不明白，至于自己所犯的罪名，却没有一个人听错了的。经过这样一宣读，那些抱着万一的侥幸心理的强盗杀人犯、强奸杀人犯、尊长杀害犯、放火犯、通货伪造犯等等，自然心怀不满。

弘藏直到最后也没有听到违反治安维持法的一条，所以他想减刑四分之一总归是没有问题的了。可是因为特赦的希望彻底落空，所以他倒不如说是有点儿失望。减刑四分之一，本来他就认为

毫无問題，所以并不因此而高兴。

所长的話一讲完，就让大家回到各自的牢房里去。因为这个刑务所是重罪監獄，所以沒有挨上大赦的犯人大約有四分之一。那批人为了这次又沒挨上大赦，恨得眼泪直往肚子里咽。連到那些因为受到減刑而欢欣鼓舞的人，见了也替他們难过；为了不至于刺激他們，回牢房时分外安靜。

回到牢房里以后，弘藏还是絲毫沒有感到高兴。未来五年的徒刑，他主观上一向认为长得遙遙无期，所以他感到，犹如数学上的无限大減去一个数目之后仍然是无限大一样，光是把五年徒刑減去四分之一，还是換湯不換药。他一个劲儿荒唐地想：“既然认为刑罰对国家治安是必要的，那末說什么××××××××××××××××^①而減輕大家的刑罰，就叫人想不通。法律学家将怎样解释这个問題呢？”

昼夜独居的解除和假释的梦

弘藏起初认为最难对付的所长的态度，后来显著地变好了。

所长本来并不是一个坏人，不是一般所說的那种黑心黑肺的人。他不过是由于刚从乡下的刑务所高升到这儿来不久，就遇上本田这样一个大亨，心想在一开始的时候应该显示一番自己的威力，以便好好制服这个有名的思想犯，因而自己給自己打气打得太足了。刑务所里的獄吏，平常对付慣了文盲占十分之一左右的犯人，所以即使来了一个无名的律师，他們也总认为来了一个高出于他們的人，存着一种戒心。而现在，本田弘藏更是有名的大学

① 原文如此。——譯者

教授，曾經做過簡任一級的高官，所以盡管在所內是唯我獨尊的所長，也不得不產生低人一等的自卑感了。可是後來多打了几次交道之後，他也就理解了本田的性格。本來認為不好對付，所以板著臉接談了几次，哪裏知道本田並非那種一味搗蛋的人。覺察到這種情況以後，他逐漸對本田產生了好感。他在刑務所的獄吏中間，是一個非常心直口快的人；高興的時候，心裡所想的，什麼都說出來，也不管說得說不得。所以，他的態度上的變化，弘藏看得非常清楚。

大理院的推事、檢察官或上訴院院長這類司法部門的高官來刑務所參觀的時候，所長一定把他們領到弘藏那個牢房跟前來。於是那些人就像觀賞動物園裏新到的異獸那樣，好奇地看著弘藏身上穿了赭色短褲的那副模樣，這使他感到很不舒服。可是，每當這種時候，所長一定撇開參觀者，向弘藏說几句好話，算是“禮物”，例如說：“怎麼樣，不冷嗎？”或者說：“要是身體有什麼不舒服的話，馬上說好了。”

就利用這種機會，他曾經獲得多穿一條短褲的特許。——後來把那額外的短褲送到牢房裏來的該管看守部長囑咐弘藏說：“准許多穿一條短褲，這兒還是破天荒第一遭。搜查牢房的看守要是有什麼意見，你就說三浦准許穿的好了。”所謂三浦，就是這個看守部長自己。不是他准許的而硬要冒充是他准許的，這使弘藏不禁暗暗好笑。

2月26日那天，鈴木律師為了祝賀減刑而到刑務所裏來看本田。他事前和所長碰過頭，透出口風說所長對本田的印象非常好，有假釋的希望。

鈴木一回去，所長立刻把弘藏叫了去，問他願不願意即日改變工作，翻譯外國書。弘藏當下就答應了。

所长随后又说：“如果你想说的话，让你到图书室里去也可以。那里又有桌子又有火鉢，工作起来舒服得多。”这是所长极大的好意。本来，刑务所里最难受的是昼夜独居，也就是和其余的犯人完全隔绝，不妨说是囚禁在监狱中的监狱里。而思想犯原则上一律要“严格单独看管”，当时只有一两个人解除了这种单独看管，和一般犯人同样地去工厂做工。而另一方面呢，图书室却是犯人最羡慕的地方。在那里，享有不受监视而在所内各处自由走动的所谓“独步者”的特权的犯人，在没有狱吏监视的情况下进行着工作，冷天可以在火鉢里升起旺盛的炭火，自由自在地烧开了水沏茶喝，享受着犯人所能享受到的最大自由。室内收拾得也很干净，桌子凳子也和狱吏们所用的一样，丝毫没有监狱气氛，叫人诧异怎么会有这样的犯人的做工场所。从昼夜独居房迁到图书室去，无异于从监狱中的监狱“升迁”到了监狱中的王府。现在所长准备给弘藏这样一个“升迁”的机会，这就是对他的印象非常良好的最大证据。

可是弘藏因为一向被拘禁在昼夜独居房里，完全不知道所里的这种情况。再说，他一方面虽则比谁都更爱同人家亲近，另一方面却也一向怕同性情脾气不熟悉的人接触。虽则他已经尝够了昼夜独居的滋味，可是，一想到要和那些各有各的脾气、思想习惯完全不同的普通监犯处在一起，共同行动，对他来说，也许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所以心中踌躇莫决。因此他就问道：“图书室里有多少人呢？”

“图书室里才只三个人，可是隔壁屋子里还有五、六个计算工分的人和打杂的。大约总有十个人光景吧。”

弘藏心想，有十个人之多，可受不了。因此他拒绝说：“那么多人呆在一起，可能无法做翻译工作；暂时还是让我呆在牢房里吧。”

所长也没有勉强劝弘藏去，只说：“要是你不愿去图书室的话，暂时呆在牢房里也行。等到你愿意去的时候，再对我说吧。”然后又突然改变话头，说了这样的话：“前些日子看到你交给教务主任的报告，写得很好。你说从今以后彻底放弃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这就比过去有了很大进步。我已经到司法省报告了这事，那边也很满意。本田先生，话说了可要算数呀！”

“我不是那样的人，一旦写成报告提出后，决不会轻易反悔。”

“这就好。……你在这里品行挺好。不愧是个学者，简直是个模范犯人，佩服得很。再说，《监狱法》上有这样一条规定：刑期超过了三分之一，就可以假释；对于这事，我也有我的想法，请你沉住气好好干吧。”

所长终于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纪元节的特赦弘藏落了空，打从所长嘴里听到“假释”这两个字那天起，他又开始等候年底的到来了。因为他想，到12月的月半，刑期恰好满三分之一，到那个时候一定可以假释出去了；教务主任所以盘问他的思想情况，也许就是一个准备。

说起假释，这乃是全体犯人的最大的诱惑。比方说，那些判了无期徒刑的杀人强盗和杀害尊长的人，即使遇到天皇即位大典（这是皇家最大的盛典）的时候，还是挨不上大赦的恩典，所以无论等到什么时候，判了的刑，终身没有减轻的希望。他们重新回到自由天地的唯一的一线希望，就在假释上面。被活埋在百尺井底，他们的所以仍然不绝望，能在黑暗的地底里忍受着极单调的生活，就完全是由于把希望寄托在假释这一根线上的缘故。正由于他们一心一念想攀着这根容易断的细线重新走上地面，他们才凡事忍气吞声，出奇地起劲做工。要不是有这个诱惑，那末，像这样一个把大批狰狞的重罪犯人集中在一起的重罪监狱，将多么不容易管理

呀。

这个監獄里，被判处十五年到二十年徒刑的，占全体犯人的一大半；可是没有一个不盼望着出獄的一天。尽管是六、七十岁的老头儿，无期徒刑的累犯，也都不甘心死在監獄里，全都梦想着得到假释；要不然的话，他们就会躲过严重的监视而吊死了。

眼前弘藏就知道有这样一个例子。弘藏入所的时候，犯人中间资格最老的是 1864 年诞生的川村义太郎，他那时已经是将近七十岁的老头儿了。这人以前已经坐过七次牢，保持着三次被判无期徒刑的空前记录。但是，由于他居然一次也没有杀过人，所以在牢里呆了多年，几次遇到大赦减了刑，就出去了。可是好不容易才出去，又犯下强盗或窃盗罪，被判处了重刑。这样一而再、再而三，他的年纪已经快七十了，从十三岁上第一次被关进石川岛的監獄起，几十年来，在监牢外面生活的日子，总共不过三年多。实实在在，对于他来说，刑务所才是故乡，社会反而完全是异乡。可是有一次（这自然是许久以后的事），弘藏偶尔和他直接交谈了一下，那时使弘藏吃惊的是，这个因第七次犯强盗罪而被判处十二年徒刑的川村，竟每天都在盼望着获得假释的恩典！

《刑法》第二十八条有这样的规定：“被处徒刑或禁锢者，有改悛情状时，有期徒刑经过刑期三分之一、无期徒刑经过十年后，得以行政官厅之处分，准予假释出獄。”所谓假释，就是指的这个；如果最快地受到这条条文的适用的话，那末无期徒刑的囚犯，也只要经过十年，就能够重新回到自由天地；像弘藏这样被判了五年徒刑而已经减刑为三年零九个月的人，只要经过一年零三个月，就可以出去了。

依照一般情况来说，要是犯人的社会地位高的话，政治犯那就不用说，即使犯下了贪污、诈欺、窃盗、强盗之类罪行的人，也只

要坐滿三分之一的刑期，就几乎沒有例外地被释放出獄了。就拿和弘藏差不多同时入獄的人來說，犯下收受賄賂罪的前鐵道大臣小川平吉也罷，犯了同样罪名的前賞勳局總裁天岡某也罷，一到坐滿刑期的三分之一，都被释放了。可是社会地位低一些的人，除政治犯以外，尽管“改悛的情状”很显著，也极少这样快就被释放出去的。不过，像小菅刑务所这种长期囚犯占多数的監獄，还是几乎有一半人都受到“大廉价”而被释放出去。就連上面讲到的那个三次被判无期徒刑的川村义太郎，在弘藏坐牢期間，也都达到了假释的夙願，眼泪含在他那因淋病而几乎快要失明的眼睛里，离开了对他来说是度过将近六十年岁月的一生的故乡刑务所，兴冲冲地让他的孙儿接到完全的异乡“社会”上去了。

弘藏的开始对假释寄与希望，乃是出于上面所說的这种情况，不比前次他梦想特赦那样滑稽可笑。

* * *

自以为从所长那里得到了假释的暗示，弘藏高高兴兴地回到自己的牢房里。由于拆版工作今天就要結束，所以下午赶紧干完剩下的一部分活，从傍晚到夜間，把过去四个多月来使用的鉛字整理架打扫得干干净净，把所有的工具也都收拾停当。当夜他在那本“感想录”里写道：“尽管是和討厭的工作分手，一旦分手的时候，仍然觉得惆悵，正如討厭的冬天快要过完，一旦要和这冬天分手的时候，也觉得惆悵一样。”

和津田青枫见面

3月6日那天，每月定期见面一次的重子来了。弘藏的朋友、画家津田青枫也同来了。

可惜眼前仍旧缺一个你，旧梦怎能重溫呢？

春天不久就要到来了吧，哪天不在屈指算着呀！

曾經給弘藏寄来这样两首短歌的津田，动了一个心念，觉得如果能够见面的話，監獄里也无妨，想同弘藏见一次面；所以趁空閑時間来到这混凝土高墙里边。幸而他也获得了准許，可以和重子一块儿见到弘藏。

今天见面的地点还是所长室；可是所长說，他要出去办点事情，在他回来以前，可以就在他屋子里談話，說完他就走开了。結果就等于接見时免去了見証人，可以互相暢談了。被叫到所长室里来接見，弘藏一向认为是莫大的苦事；可是像今天这样的接見，那就比在普通接見室里接見还要方便得多。本来，免掉見証人的接見，規定必須在犯人的等級升得很高的时候才能許可；当时的弘藏，自然不够那种資格。不仅这样，直到后来他升到犯人的最高等級、有資格可以免去見証人以后，由于那时所长已經換了人，一般对待犯人变得严格起来，所以直到最后，他也沒有被許可一次免去見証人的接見。——弘藏最初遇着的这位谷內所长，由于他把有关弘藏的一切責任都亲自承担了下来，弘藏起初觉得这里的獄吏全都不錯，只有这位所长难对付；可是，后来所长对弘藏的印象好轉了，而所长处处地方又都凭他个人的主张办事，这对于弘藏就成了莫大的方便。由于所长的“关照”，弘藏于是就逐漸享受到了其他獄吏所无法給与的“特权”。免去見証人的接見，就是其中之一。

所长出去以后，寬敞的所长室里，一个獄吏也沒有了。有这样一個难得的好机会，照說首先應該对朋友——津田客套一番，謝謝他在各方面的照顾；可是弘藏却沒有心思来这一套。他急于想充分利用仅仅只有二、三十分钟的这个机会。想問和想說的話，在他

心里就像决堤洪水那样泛滥着。

他首先向重子問了真知子的情况。

在这以前，他曾听到重子說起过，真知子暂时还不想結婚，可是老是閑在家里又觉得无聊，所以打算去学习助产。当时弘藏举出了种种理由贊成真知子那个主意：第一，助产这門工作，是帮助人誕生的重要工作，無論站在任何立場上來說，都是有益于社会的工作；第二，助产妇的社会地位低微，可是我們毫不在乎这个；第三，普通的妇女工作，年紀大了就不行了，唯独助产这門工作，經驗越丰富越好，而且和男子不发生职业上的竞争，是非常有前途的一种妇女职业。所担心的只是像真知子那样让报纸上广泛宣传、好容易才不予起訴、刚从警察署里释放出来的人，能不能得到她自己所希望的庆应义塾大学附属医院助产妇养成所当局的准許，让她参加学习。后来，总算由許多人尽力帮忙，得到学校当局的諒解，做到不久将去受入学考試了。现在据重子說，今天早晨去学校看发榜，真知子已經順利及格，所以正式要去学助产了。

弘藏本来正在担心好容易打起精神想搞点什么的真知子，如果馬上碰个釘子，也許会灰心丧气；现在听到重子那番話，心里很高兴。

接着重子提起了大赦的話。

“大家都在談論，你对于紀元节的意外的减刑，一定很高兴。最初报纸上还說触犯了治安維持法的人，也許都挨不上大赦，我們在外面还老大担心，不知道究竟怎样哩。”

弘藏接过重子的話，出人意外地說：

“我才不那样高兴哩。……关于大赦这件事，我早就从杂役夫那里听說了。据那个杂役夫說，像我这样的人，可以受到特赦而馬上出獄；所以，我还以为今年的紀元节或許可以释放出獄哩。至于

減刑四分之一，我本來就認為沒有問題；所以結果不是高興，倒是失望了。真滑稽得很，事情完全和你們所想像的相反哩。”

重子聽到這些話，發愣了。她想，坐牢才只坐了半年光景，就一味盼望着出去，那末今後漫長的歲月，將怎樣度過呢？於是她就替弘藏難過，很想安慰他一番。可是，弘藏接下去卻說了下面這樣一番話。

“我的作風，就像你所深知的那樣，凡事總往有利的方面去想。腦子里老是想像着最有利的情況。可是，我也知道，除非交鴻運，否則這種合適的最有利的情況是不會有的；所以縱使一下子落了空，我也並不怎樣失望。我胸有成竹，一開始就準備好了後路。我的腦子里儘管空想着最有利的情況，心里却經常有着遭受最不利的情況的精神準備，所以請你放心好了。儘管落了空，也決不至於垂頭喪氣，這一層我是很有辦法的。因為我生來的性情，就是凡事事後釋然於心，決不回頭看第二遍。”

弘藏的這種性情脾氣，長年相處在一塊兒的重子，自然不是不知道。不過，重子的性情脾氣，卻和弘藏正相反，對於任何事情，如果不周密考慮到它的最不利的一面，就不放心；因此，在這個時候，也就馬上擔心到弘藏的將來了。如果說弘藏是個理論上的無神論者的話，那末重子就是生來的無神論者；無論遇到多大困難，她也決不會求神拜佛；假使她求神拜佛的話，大概也決不會求菩薩降福，卻是求菩薩免災。正如他瘦得出奇而她比誰都胖一樣，這一對夫婦，在種種方面都代表着稀奇的相反的兩極。

弘藏剛才自稱“我的性情是不回頭看”，這確實是他的一大特徵。每當飯後一家人圍着桌子喝茶談天的時候，重子經常講起的關於弘藏的逸事之中，有這樣一則：

還是弘藏以前在京都帝國大學教書的時候，有一天，吃完晚

飯，一家人都出去散步。那时他們住在大学附近的吉田町。出了門，向大街走不多远，就是圣护院和府立中学之間的一条窄胡同。将要穿过那条胡同的时候，弘藏手里拿着一条手杖，心里在想着什么，走在大家前头丈巴路，忽然看见重子的弟弟从对面走过来了。由于沒有想到会在这个地方遇见住在东京的小舅子，弘藏立刻摘掉帽子，高声招呼說：“喂！”

对方那个穿西装的人，看到一个陌生人突然向自己打招呼，露出一脸詫异的神色，帽子都不摘地走过去了。

弘藏心想，原来是认錯了人，随即头也不回地径直繼續往前走。重子她們随后赶上去問道：“錯认作誰来了？”

弘藏說：“还以为是庄藏弟弟哩。”大家听到这句话，当场都笑得什么似的。

“無論怎么說，住在东京的庄藏弟弟，这个时候也不会在这一带悠閑地散步呀。再說，你的样子也太可笑了。不管是誰，要是认錯了人，走开以后，总会站下来回头重新看一眼的呀。”

弘藏那时的样子，似乎留給重子一个非常可笑印象，以后她每次提起这件事，总要返复讲这几句話。

“尽管不回头看一遍，也馬上知道认錯了人了。”

从弘藏的作风來說，这时已經沒有回头重新看一眼的必要；馬上繼續散步，在他是很自然的。

他这种性情脾气，在种种方面都表现出来。他費了很多精力写出来的論文，一发觉有錯誤，就毫不犹豫地亲手加以废弃。他曾經发表过許多著作，这些著作几乎全都让絕版了。甚至那部有洛阳紙貴之誉的《贫穷故事》，正当它风行一时的時候，他也硬要躊躇莫决的出版商把它絕版了。人家說他这种举动值得佩服，他反而觉得人家这句话說得莫名其妙。他还常常和人家論战；即使正

当論战进行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他要是发觉自己有什么地方搞錯了，也总是馬上就坦白承认。

在社会主义的范围内也是这样。1929年年底新劳农党的建立，一般人都以为是大山、細迫、上村三人发起的，其实这件事情的最初点火人，就像前面已經說过的那样，是当时还住在京都的本田弘藏。这件事情，惹起左翼陣营内部的极端反对；弘藏周围的一批朋友，也全都不贊成；可是他却排除了一切反对，参加了新党的創立，不久把家搬到东京，为新党付出了許多时间和劳力财力。但是，等他一旦发觉自己的錯誤之后，他却为了解散那个自己以极大的热誠辛辛苦苦培育起来的党，以更大的热誠进行了种种活动。如果光从表面上看問題的話，人們看到他这种举动，也許要把他看成一个反复无常的人吧。可是事实上，他却前后一貫地抱着一个信心，那就是必須为日本共产党的发展尽最大的努力。当他深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必要創立新劳农党的时候，他就为这个党的創立和发展而尽力；等到他认为新劳农党的存在对于这个目的有害的时候，他就竭尽全力来解散这个党。在这种时候，他的行动看上去似乎朝秦暮楚，其实乃是由于他生性絕不留恋过去，而他的行动的变化，往往是以急剧的角度实现的。

等到他被捕之后，情形也还是这样。他最初盼望緩刑，但是結果緩刑落了空，被判了五年徒刑，这时他也毫不在乎。盼望特赦沒有盼到的今天，他还是不以为意；后来屡次盼望假释落了空，也还是如此。

弘藏讲完盼望特赦沒有盼到那番話，看见旁边沒有見証人，就趁机一气把監獄里的日常生活情形詳詳細細談了一下。他要談的虽說是監獄里的生活，他的話題却多半限于食物方面。事实上，像他那种日夜关在单身牢房里的人，除了談食物，生活方面再也沒

有什么可談的。他談到了每天吃的菜，紀元节那天发到的异常美味的紅白豆餡年糕，以及吃到五个饅头的事。关于那五个饅头，是这样一回事。不久以前，这个刑务所曾向一般犯人征求有关修养方面的标語，规定从收集得来的許多标語中間，評选出天、地、人三条，三条以外，再选出十条勉强合格的。而这評选的工作，教务主任就叫弘藏担任一份。当时教务主任命令他說：“職員方面当然也要参加評选，犯人方面也要产生出三个評选人来。现在你已被指定为三人中的一个，可以利用休息时间，在两天以內做完評选工作。”可是这休息时间，对于热心干活的弘藏來說，是非常宝贵的。上、下午每次十五分钟的休息時間里，他要做西式健身操。至于夜里停工后的休息時間，在大寒时节，已經取消，改为提前睡觉。因此，每天两次休息，对于弘藏來說，乃是健康上不可缺少的东西；现在教务主任交給他这样一个临时任务，他感到很不滿意。他想，长期干着刑务所教誨师工作的教务主任，居然似乎一点都不理解犯人的处境，真是莫名其妙，差点儿要去申訴这种情况了，可是最后还是耐着性子完成了交給的任务。过不几天，教务主任把他叫了去；他去到教誨堂一看，中了选的犯人，在那里开茶話会哩。因为弘藏是評选人之一，所以也参加了这个茶話会，領到了所长捐贈的高脚白饅头五个。这五个饅头，他當場就一頓吃光了，觉得味道美得簡直无法形容。他把这件事当作了不得的大事，觉得无论如何也要讲給重子听一听。实际上，对于受徒刑的人來說，这的确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因为后来他在将近四年的監獄生活中，虽曾吃到这个刑务所的伙房做出来的赤砂糖餡儿的荞麦饅头，可是再也没有尝到那时所吃的外边糕点鋪做出来的白糖餡饅头。——听他对重子說話的口气，似乎这五个美味饅头比减刑問題都重要。津田在旁边听着，感到說不出的难过。

在弘藏看来，这类事情，全都是重大問題，所以觉得肚子里装满了要說的話，說也說不完。他尽是一个人說着，几乎不让对方插嘴。一个月才冲破一次沉默的堤防，他就仿佛乘了特別快車在山蔭道上风馳电掣那般地应接不暇。

恰好过了三十分钟，所长回来了，今天的接见也就此結束了。弘藏只顾談他自己，直到最后也沒有顾得上和津田攀談。津田呢，看到曾經和自己一起有过翰墨清游的弘藏的細嫩手足，现在都变得粗糙不堪，滿是裂口(接见前弘藏脫下赭色囚衣，換上浅葱色囚衣的时候，把赭色布袜子也脫掉了，光着脚穿了草鞋)，时时两眼发热。因此，他始終俯倒了头，一句話也沒有說。

接见完毕，走出了刑务所的大門，津田回头对重子說：“本田先生变得很爱說話了。尽說些吃食方面的話，簡直和小孩子一样了。”这样，他吐露了他胸中所压积的感慨。

回家的路上，津田領重子去电影院看了一场喜剧电影，又到高島屋百貨店旁边的末广餐館請她吃了清燉鸡，然后用汽車把她送回了家。

假释的夢

翻譯作业

弘藏自从 1933 年 10 月移送到这个刑务所，直到 1934 年 2 月，被吩咐做的作业都是鉛字拆版。等到 2 月底，他的作业就改为翻譯外文了。

改变作业的同时，所长对他說，白天 he 可以到图书室去，在那里翻譯；而他呢，由于不了解所里的情况，結果还是挑选了比較熟悉的、向来的昼夜独居生活。这在前面已經交代过了。

当时所长对他說，以后什么时候 he 願意去图书室，随时可以让他去，尽管提出申請，不用拘束。可是弘藏后来仍然繼續过着昼夜独居的生活。他心里想，眼看着到 12 月半，刑期就要度过三分之一，到那时候，也許能让他假释出獄，独居生活虽則不自由，还是坚持一下，耐到那个时候算了。这个念头尽管很模糊，却相当强烈地支配着他，所以直到 12 月，他始終沒有提出什么申請，就那样地过去了。

从 2 月底到 12 月 13 日，不到十个月的一段时间里，他所譯出的东西，除去零星的不算，主要有以下七种。

Richard Kerschagl, Vom Widersinn des Marxismus. 1933.

(凱尔夏格尔著《馬克思主义的不合理》，德文)

这是一部异常浅薄的、攻击馬克思主义的著作。

O. Spann, Irrungen des Marxismus, 3te aufl. 1931. (斯邦著《馬克思主义的錯誤》，德文)

斯邦这个人，是个有点小名气的经济学家；这本书的初版，曾經由邏輯学家藤井健治郎譯出过。这次让弘藏譯的，是它的第三版，内容和初版几乎完全一样。可能是行刑局里的年輕書記官或檢察官认为，“这种书让本田翻譯一下，說不定会使他发觉馬克思主义的錯誤，帮助他轉变方向”，因此选定这样一本书給他譯的。而弘藏呢，肚子里却好笑，心想，“这种书我早就看过，现在来让我翻譯，倒真是叫人受徒刑了，”也就只好死着心眼儿把这部可笑的著作从头到尾譯了出来。

可是，再也沒有比翻譯这类反馬克思主义的书更容易的了。一眨眼他就譯好，請求給他別的材料。对于他的翻譯速度，行刑局里的人感到十分惊异，他們說，甚至找材料都赶不上。

D. Klagges, *Reichtum und soziale Gerechtigkeit*. 1933.
(克拉盖斯著《财富和社会正义》，德文)

这是納粹分子写的一本荒唐已极的著作，可以作为法西斯主义缺乏思想的大好标本。内容实在太无聊，弘藏譯到大約三分之二的地方就擱了笔，附上“这本书是多么无聊可笑的作品，上面的譯文已經可以充分証明。我认为再也沒有繼續譯下去的必要”的几句按語，把原书退回了。

接着送来的是有关刑务所的书，书名如下：

W. Mountain, *Life in London's Great Prisons*. 1930. (芒登著《伦敦大刑务所里的生活》，英文)

A. Crew, *London Prisons of Today and Yesterday*. 1933.
(克魯著《伦敦刑务所的今昔》，英文)

L. W. Fox, *The Modern English Prison*. 1934. (福克斯著《现代英国的刑务所》，英文)

这些有关刑务所的书籍，都使弘藏很感兴趣。特別有意思的

是，所长經常所說的“日本帝国的犯人的幸福和光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只要和英国作个对比，就很清楚。

例如，在克魯那本书里，对于英国过去曾經实行过的单独囚禁，写着下面这样一段話：

“在隔离制度下，每个犯人都被关在单身房里，那間屋子白天就是他的工作場所，夜里就是他睡觉的地方，这样，每一个人不仅沒有同别的犯人交談的机会，連让别的犯人仔細看上几眼的机会都不能有。訂下这样残酷的制度的、維多利亞时代的人們的心理状态，我們实在难于理解。朋东威尔監獄的一个教誨师，1856年曾經夸奖这个可怕的制度說，在这个制度下，罪恶不再能传染，坏习惯不再能繼續，人們的心里将充滿着悔恨，良心将恢复它的势力。訪問那些处在孤独囚禁的阴郁恐怖下的犯人的，只有那缺乏同情心的典獄长或是他的下屬人員。犯人每天只有一小时的室外运动，除此之外就沒有任何运动。这室外运动和到教誨室去听訓，就是破除可怕的单調的唯一机会。像对付什么危险的猛兽那样把人关闭在籠子里，只許看管的人走进去——在这样一种状态下面，通常那个人最后就会变得违反自然，变得真像兽类那样狰狞可怕。长期的孤独和单調的可怕抑压，在多数情况下，会使罪犯們不适于重新去过正常的市民生活，再不然，就会使他們走上疯狂的道路。”（原著第 82 頁以下）

作者克魯对于維多利亞时代的这种残酷行为表示着詫异。可是我們日本，到今天还对那些沒有有什么轉变方向的具体表现的左翼思想犯，处以五年甚至十年的更严格的单独囚禁，运动限制在三十分钟以內，教誨堂一次也不让去。这不能不說是值得惊异的事情了。

上面所說的三本书中，福克斯那本，是那一年出版的最新的著

作，而且作者又是实际負責行刑工作多年的人，所以最最有价值。弘藏几乎是以将用自己名义出版的忠实态度，把这部巨著的全文翻譯了出来。尽管他一边翻譯，心里却在想：哪怕出了許多錢派司法省的官儿去外国，也不见得能够把这样完整的可靠資料帶回国，可是我虽則这样精心地把它翻譯出来，也許沒有誰看它一眼，这实在太可惜了。

譯完上面所說的几部著作以后，作为翻譯材料送来的是德文版的希特勒著《我的奋斗》(Adolf Hitler, Mein Kampf 1927.)。那是納粹头子希特勒的一部类似自传的著作。在譯述这部书的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希特勒这个人，虽則毫无学識，思想非常浅薄，可是体力却异常旺盛，是个具有容易耸动流俗的演說才能的、大言不慚、世所罕有的蠱惑家。弘藏肚子里一面寻思：“听说我所認識的那个京大教授黑正，留学了一趟德国，儼然彻头彻尾地变成了一个納粹主义者。其实，被希特勒这样的家伙的煽动所感动，这正說明黑正是个庸俗不堪的学者。”一面勉勉强强地譯完了那部书。

12月12日以前，他把那部譯稿誊清完毕。他手里虽然还有一些关于刑事訴訟法的德文书，可是他因为对于法律，尤其是程序法，一窍不通，所以怎样也不想翻譯它。这时他独自想道：到这个月的15日，他正好度过刑期的三分之一，要是碰得巧，說不定两天里就可以假释出獄。要是那样的話，这类法律书，也就根本不用譯了。万一假释不成，那末所长早已有話在前，不妨乘此机会递个申請书，請求派到图书室去，帮着搞搞图书工作也好。何况已經接連十个月一味拚命搞翻譯，这个工作也委实搞厌了，所以即使假释不成，至少也要在这个时候使工作告一段落，否則再也忍受不下去了。——由于他有着这样的想法，所以12日把《我的奋斗》誊清完

毕，第二天他就只是把书本摊开在那里，茫然地坐在桌子前面，什么事也不做。

正当他这样坐着的时候，管他那个监房的看守部长大清早就来到他的牢房门口，对他說：“怎么样，昼夜独居的时期也够长了，不妨申請去个什么地方吧。要不要我給你关說一下呢？”其实，根本不需要“关說一下”，当时早已內定解除他的严正独居了。刑务所的飯吃了十几年的看守部长，仿佛什么都懂得地說了那样的話。

弘藏毫不迟疑地回答說：“我也正在这样想哩。本来所长早就說过，可以让我到图书室去。”

“是么？好吧，好吧，我給你好好关說一下吧。”

看守部长說完这句话就走了。过后弘藏独自思忖道：“部长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口口声声地說要給我关說一番；岂知所长早已有話在前，只要我一申請，准定是答应的。不仅这样，所长肚子里說不定还打算在两三天之中把我假释出去哩。”

不一会儿，看守部长又走來說，警卫室要他去一趟。就把他帶出牢房。

去警卫室的路上，走在头里的看守部长回头对弘藏說：“大概可以出去哩。”弘藏听到这句话，顿时一愣，因为他以为是說要把他假释出去了。

过去所长曾不止一次对他說：“刑期超过了三分之一，就可以假释；对于这事，我也有我的想法”。弘藏心想，处在負責地位的所长都这样清楚地讲了，一定沒有錯，所以老是想起那句话，早就急切盼望着年底的到来。后来，在一星期之前，他被教务主任叫了去，詳細盘問了出獄以后的生活方針。本来，关于这个问题，他在年初早就写了书面报告交上去了，可是教务主任还是不厌其詳地盘問着。

他还問弘藏：“你說不准备再翻譯《資本論》，出版者方面能答应么？既然和书店訂立了契約，出獄以后，会不会发生非譯不可的情况呢？”

又問：“释放时你打算回到哪里去呢？释放以后还准备繼續住在东京么？”这样寻根究柢地問过之后，他忽然說了这样一句話：“日子过起来，倒是挺快呢。”

弘藏心想：“这大概是暗示說，不久即将把我假释出去了。”却假装糊涂地問道：“您說的是什么呢？”

教务主任也含糊其詞地回答說：“没什么，本来只觉得你来这里还没有几天工夫，岂知一眨眼，刑期三分之一都快要过去了。”

当时弘藏对于刑务所里的情况仍然不大清楚，关于假释的手續和时机，也一无所知，一心以为只要所长和教务主任商量一下，說释放，当天就可以释放了。因此，那天教务主任叫他去詳細盘問释放后的情况，他认为一定就是不久即将把他假释出獄的准备工作。存着这种心念，再回想一下，就觉得教务主任前前后后所說的話，都不是沒有緣由的。因此，那天他和教务主任会面完毕回到牢房后，随即把《我的奋斗》的誊清稿整理好，暗地里准备着假释。所以，这天早晨看守部长来和他說，昼夜独居的时期已經很久、不妨申請去个什么地方的时候，弘藏心想：“部长完全不了解情况，所以才說那样的話，其实所长和教务主任早就打算不久把我假释出去，为此进行着准备。”由于他一心这样想着，所以当看守部长在走廊里回头对他說“大概可以出去哩”的时候，他还以为看守部长直到此刻才知道內定把他假释出獄的消息。这时他愣了一下，却又不便公然問看守部长指的是不是假释，所以一时装做沒有听清楚的样子，問道：“您說什么呢？”心想对方总会用另外一番話解释給

他听。这时看守部长像是炫耀他尽了力、有了功一般，回答说：“我向警卫室说了一下，看来，他们会解除你的独居也说不定。”

弘藏心里却想：“嗯，原来是指这件事么。”就像听到了什么不相干的话一般。

弘藏被叫进警卫室去，只是由一个看守长重新问了一下申请的事项，此外什么事情也没有了。

那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弘藏自然没有放弃假释的希望。

和一别七年的佐野学见面

这一天，已经是12月14日了。

弘藏今天仍然把德文的刑事訴訟法注释书摊开在工作台上，只管在那里痴痴地出神。过了今天这一天，刑期的三分之一就过去了。如果情况极端幸运的话，说不定明天就可以假释出狱。即使迟些时候，今年年内也总可以出去了。这样，1935年的新年，就可以又在自己家里庆祝元旦了。教务主任曾经说：“日子过起来，倒是挺快呢。”要是刑务所的生活居然就此结束，那就真地应了俗话所说的“生孩子比想像中要容易”，日子过起来，倒的确是挺快了。教务主任决不会无缘无故地说出那样的话，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说那话，准是暗示着假释。——这种念头，就好比霓虹灯广告牌那样，忽明忽灭地老是在弘藏脑子里打转，再也无法想到别的方面。

他虽则不知道假释将以怎样的形式宣示，可是觉得至少总要在前一天被所长叫去一趟。他因为心想也许今天就会来叫他，所以整天都注意倾听着走廊里的皮鞋声音。

好不容易等到吃完晚饭，所长果然派人来叫他了。他心就跳起

来了。

走进所长室一看，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佐野学已经先在那里，坐在所长的桌子前面了。

所长等弘藏在佐野旁边刚刚坐下，就开口说道：“本田先生，今天的谈话，要采取禅问答^①的方式，请你好好考虑一下吧。直到现在，我也曾费过一番心机，可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所以我也够为难的。我说，你的刑期几时才满呢？”

“哪年哪月哪日满期，还没有推算过，但是总之五年已经减去四分之一了。”

“是呀，你也受到大赦了。那末，什么时候满三分之一呢？”

“恰巧就是现在这个时候。”

由于所长问这些话时，是一副装聋作哑的神色，所以弘藏顿时死了心，知道照此情形，假释是完全没有指望的了。

所长接着说了这样一番话：

“尽管你说将来不再搞实际运动，也不再搞研究工作，那都不抵事。要是不承认从前的想法错了，那就不能认为你真正有所改悔。本田先生，你觉得怎样，马克思主义纵然不能说是错误的，可是它同日本的国体不相容，这一点，你总承认吧。学理上怎样，姑且置之不论；不过，作为一个日本人，站在日本人的立场上来想一想，你难道不会得出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极大错误的结论么？你以一个学者而长期研究了马克思主义，自然不肯说自己所专攻的学问是错误的。这一层我也体会得到。可是，一味埋头钻研一门东西，往往就看不到其他，容易犯大错误。我对于学问一道是外行，并不打算多加议论。不过，我是一个日本人，所以经常把国体的尊严

① 禅家的隐语式的互斗机锋的问答。——译者

放在心上。本田先生，今天我所要談的，就是这一点！怎么样，你可不可以姑且离开馬克思主义学者的立場，站到日本人的立場上来？我相信，这样一来，你一定会大大地有所发明。只要認識到这点，就好办了。关于这个問題，我想請你写篇文章，你看怎样？我心里也有我的打算，所以才劝你这样做的。这就是我刚才所說的以心传心的禅問答。不用顾虑，并不是馬上就要你答复，可以好好考虑一下再說。”

听凭弘藏坐在他前面一声不吭，像是在想着心事，他还是繼續嘮叨說：

“要是你想写点什么，我会給你一切方便。如果需要参考书，我可以給你买，或是从大学里借。这些我都可以为你設法办到，把你的要求提出来就是了。……还有，听說你願意到图书室去，这也可以照准，明天就可以去。还听說你累了，是吧？你的翻譯工作进行得非常迅速，連司法省都很佩服哩。我也深知你长时期辛苦了。一定相当累吧。好，从明天起，給你一星期的休假，你願意在自己的单身房里休息也好，願意去图书室休息也好。图书室里又有火鉢，地方又大，讀書或写作都便利得多。总之，給你一星期休假，你就从从容容地休息一下吧。

“还有关于佐野君，他现在已經完全轉变方向了。刚才我还一直听他发表他的感想，他的談吐中已經不帶絲毫赤色了。今天特許你們见一次面，就在这里慢慢談吧。”

弘藏于是回身朝向坐在他旁边的佐野叙了契闊。这时佐野說道：

“今天看起来，仿佛是和所长預先商量好、跑来劝你轉变方向一般，有点不对头；其实我被叫到这里来，事先什么也不知道。要是你不高兴同我见面和說話，我可以迴避，請直說吧。因为，听說

尊夫人对于我的转变方向，非常气愤哩……。”

“哪里，我内人决不会说这样的话。”

他因为深知重子决不是那种惹是生非的女人，所以一提到她，马上把佐野顶了回去。接着又说：

“再说，我本人也决不会为了思想立场不同而讨厌什么人，这一点大可放心。”

事实上，自从被捕以来一连被监禁在昼夜独居房里将近两年的弘藏，十分渴望和人谈话，几乎和杀父之仇都愿意在一起促膝谈心，何况佐野是一位老战士，过去曾经当过日本代表，出席过共产国际大会，长时期来一直占据着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的重要位置，并且是弘藏多年来一向钦佩的同志之一。所以，一见面，弘藏首先有一种亲近之感。

固然，弘藏也曾听说佐野在监狱里终于猛然来了一个转变方向，可是佐野在狱中所写的长篇意见书，他还没有看过，意见书里说些什么，他一点儿也不知道，自然对于佐野并没有发生什么类似憎恶的感情。长时期来一直在只做工不说话的萧索的狱窗下，能够和这样一个多年不见的老同志见面，他只觉得异常高兴。

他的表情使佐野放心了。佐野这才尽情倾吐了他的胸臆。

他所说的同理论全不相干，只集中在共产主义运动暂时没有希望这一点上。

他不厌其详地谈到：德国共产党一下子就垮台了，德国现在完全成了纳粹的天下；中国方面，蒋介石的讨共也终于获得成功，共产党终于不得不抛弃首都瑞金，逃到遥远的西北的偏僻山区；日本方面，共产党也完全垮台了，它已经被打击得再也爬不起来。

“日本的党简直完全堕落成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政党；照那样子，是一点希望也没有的。最后连抢劫事件都搞了出来，终于完全

失去了社会上的同情。說实話，我早就越来越厌恶它了。”

佐野一面說着这話，一面偷看弘藏的脸色。可是，出乎他意料之外，弘藏却不动声色，仿佛听了些无足輕重的話一样。

誠然，种种情节在弘藏还是初次听到。他本来一心以为德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已經迫于眉睫。而相反地，现在德国却成了法西斯主义的天下。这究竟是什么道理，他一点儿也弄不懂。关于中国的共产党放弃了首都瑞金，他过去連一点儿风声都沒有听到。可是，尽管这些事件出人意外，对于他对共产主义的信心，却是絲毫影响也沒有。

本来他从事馬克思主义研究，就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比方說，公爵近卫文麿在他回忆学生时代的文字中就写着这样一段話：

“当时的本田，已經在研究馬克思，經常对我們說，‘必須能讀通馬克思的著作，否則就不行’，却并不极端左傾。到他家里去作客，总是把我領去书斋，围着火鉢，吸着旱烟，心平气和地和我作長時間的談話。……想来，那时本田也許还在努力学习馬克思主义，和实际运动還沒有发生关系。不过嘴里老讲‘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人，应当經常做好被驅逐出国的精神准备’。”

那时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不用說日本和中国的共产党，連现在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都一点影儿還沒有哩。后来他終於坚决地信仰了馬克思主义，这純然是学术研究的結果，至于共产主义运动在最近将来的成敗利鈍，他根本就沒有加以理会。到最后，他参加了实际运动，这也只是受了自己的学术信念的驅使，可說是逼不得已而踏进了自己所最沒有把握的領域，并非是让領導实际运动的光荣和趣味所吸引而出头露面的。他所考虑的，乃是百年以后、二百年以后的世界。不管眼前的盛衰浮沉如何，他深信百年以后共产主义运动一定会取得胜利。在这一点上說，他对于共产

主义的信念,和从前迫害基督教时期被处磔刑、死而无悔的基督教徒的宗教信心和热情有几分相同。即使日本的共产党一时垮台,共产国际一时失败,也丝毫不足以动摇他在学术上的信心。

在这一点上說,他和佐野虽說毕业于同一个大学,同是讀書人,但是他們的出发点、动机和目标却有所不同。这一层,他到今天才清楚地了解到。他体会到:1923年在連做梦都沒有想到会有现在那种治安維持法的时候早就参加了运动、因而被牽連在第一次日本共产党事件里的佐野,和1932年正当疯狂逮捕共产党的时候拚着一条老命参加共产党的自己,是生存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的。

所以,尽管佐野費了大劲,不厌其詳地給他談了最近的种种事件,对于弘藏也不过是风馬牛罢了。

最后他們两人还作了如下的問答。

“现在想起来,馬克思主义簡直有点胡謔。我觉得唯物史观是彻头彻尾錯誤的。”

“是这样的么?我学識有限,不敢夸夸其談,不过至少在我所专攻的經济学范围内,馬克思主义是顛扑不破的。”

“是的,馬克思学說的可取之处,也只在經济学方面。的确,单拿經济学来說,也許倒是很出色哩。”

分手的时候,佐野回头看着弘藏,稍稍高声地說:

“总之,希望你能早点出去。这种地方是不宜长久呆下去的。同时,希望你也在出獄以前树立起坚强的信心。”

弘藏心里轉念:“哪里用得着现在再来树立什么信心呢?”却勉强和顏悅色地回答說:“多謝你。”說完却轉过头来苦笑了。

佐野学的回忆(一)

弘藏从所长室回到牢房里，一时之間觉得闊別了七年今天才又见到的佐野的神采老浮现在眼前。

佐野岁数比弘藏小得多，可是头髮秃了一大片。由于按照犯人的格式推了光头，巨大头顱上的通紅的皮肤全都看得出来。胖胖的紅脸，似乎有些虛肿；髭鬚长得乱蓬蓬的；鼻腔据说在发炎，塞了脫脂棉。他下獄比弘藏还迟，刑期又长，所以弘藏已經穿了浅葱色的獄衣，他却还穿着赭色獄衣。看上去他的手不很巧，衣服上到处都粘着黏气球或糊信封时用的浆糊，一搭灰一搭白的，这使那件褪了顏色、不成样子的赭色獄衣更加显得难看了。他箇儿矮小，穿了一件像棉袍那样臃肿的窄袖棉上衣，里面衬了一件同样顏色的衬衣，褪了色的赭色褲衩的膝部，鼓起得犹如吞下了青蛙的蛇，这样站立在那里的他的模样，簡直寒愴得可以。再加說話时結結巴巴的，声音又低。（弘藏以前一直不知道他有口吃的毛病。）总之，完全不像以前他所见到的佐野学了。

以前弘藏只和他见过一次面。那是在三·一五事件以后弘藏将要辞去大学教职的前几个月，也就是 1927 年冬天。

那时弘藏本来已經不大出門旅行，也难得去大学以外的場所演讲，那年冬天，为了出席《馬克思主义讲座》出版社主办的演讲会，好容易打起精神来到久别的东京。出席这种左翼团体举办的公开演讲会，在他还是生平第一次，而且后来这就成了他走向实际运动的一个轉折点，所以在他是十分值得紀念的。

《馬克思主义讲座》的計劃，发表于 1927 年的 11 月，正当 1928 年 1 月按照“普通选举”的办法举行日本最初的大选之前（因

为有这次大选，所以人民大众对政治的关心异常高涨；日本共产党就趁这时提出打倒天皇制的口号，公然出现在人民大众之前）。那个计划乃是当时马克思主义阵营的总动员，起到了马克思主义示威宣传的显著作用。执笔者里，包括有下面的许多人：櫛田民藏、猪俣津南雄、大山郁夫、佐野学、浅野晃、水野成夫、淡德三郎、村山藤四郎、关根悦郎、門屋博、藤井米藏、村尾薩男、細迫兼光、高山洋吉、是枝恭二、西雅雄、秋笹正之輔、野呂荣太郎、野坂鉄等。而本田弘藏和大山郁夫两人却是这个讲座的主编者。——这些人当时都是以正统派马克思主义相标榜的了不起的人物。讲座的出版，自然引起了社会上的注意。然而 1927 年年底日本共产党的公然出现在人民大众之前，却成了日本左翼运动的一个转折点。强有力的镇压，马上加了上来。在这种镇压的压力之下，有些人一下子就暴露了自己的本质，有些人却慢慢地暴露了自己的本质，有些人则过了几年突然地暴露了自己的本质；总之，各自得到了应有的归宿。讲座的计划发表以来还不到七年，可是当时那批执笔者，后来一个人一个下场，内中有些人，现在甚至光看到他们的名字，就会使人作呕。想到这里，弘藏觉得命运真太作弄人了。

那个讲座的计划发表的时候，弘藏曾经在计划书前面，写了一篇题作《谈谈自己参加马克思主义讲座的计划》的文章。文章说：

“我是坚决相信真理一定胜利的人。

“……我就在这样一个信心之下，度过了将近三十年的研究生生活，曾经几次出入于各家思想之门，今天终于参加到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深信至少在我所专攻的经济学领域内，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掌握那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理。

“要想利用电的人，首先应当掌握电的规律。电这样东西的本

质,不管你怎样忠告、說教或祈祷,总是客观地存在着。問題首先在于掌握鉄一般的內在的自然规律。有意識地自由利用电气,只有在和这种规律辯証地統一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水深火热中的亿万人民的自救,也只能这样;除此以外,更无他法。理解馬克思主义,也許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而普及这方面的理解,当然是我們义不容辞的任务。

“由于我抱着这样的信心,所以近几年来,专门从事馬克思主义的研究,同时为了它的普及,尽了一点自己所能尽的力量。只是,由于体会得不够深入,一再发生錯誤,害了大家,觉得非常惭愧。再加我性情偏狹,从来沒有和大家共过事,……今天我……参加到編輯这个讲座的事业中去,这是因为我深信我們中間的见解尽管可以偶或有所不同(按:这句话是为了提醒一下,当时有許多参加者都受了福本主义的坏影响),但是大家对于理解和普及真正的馬克思主义,却抱有同样的热情和决心……”。

这篇文章,当时受到枢密院里的几个老头儿的挑剔,那时的文部大臣水野鍊太郎通过京都帝国大学校长荒木寅三郎,要求弘藏取消这篇文章,还要求辞去讲座的主編(当时的經济学部部长神戶正雄,仓皇辞去了部长的职务,乃是因为他觉得事情不好办),可是弘藏从荒木那里听到这些要求时,当场就加以拒絕。事情就此告一段落。这是因为当时的大学教授和十年后的大学教授大不相同,誰都奈何不得,簡直是崇高的存在。

弘藏为了出席《馬克思主义讲座》出版会所举办的演讲会而特地从京都赶到东京时,周围的情况就是这样。那次进京,重子也同道去了,目的一半在于护卫丈夫。她在臥車里整夜沒合一合眼,因为当时弘藏的安全已經多少成問題了。

演讲会是在青山会館举行的,会场里几乎坐滿了人,很是热

鬧。首先登上讲坛的大山郁夫，开口不到四、五分钟，就被到場監視的警官勒令中止了。第二个走上台去的弘藏，摊开他的演讲稿，照大学里讲课那样讲起来。讲題是“稀有的遭难时代”；为了举出客观証据，他引用了許多对演讲十分不相宜的統計数字；因此，和刚才大山郁夫的洋洋洒洒的讲话相反，他的讲话倒像是学术演讲，平平淡淡，毫无刺激。和武雄一起在拥挤不堪的听众后面傍听的重子，也觉得讲得不够生动活泼。后来到快要結束的时候，語調越来越高，讲到“现在水的溫度已經有八十度甚至九十度，快到沸点了。东方的天空已經发紅，不久就要天亮了”，場內发出一陣响亮的鼓掌声，同时，監場的警官站起来勒令演讲中止。

开过演讲会的第二天，大家为他在日比谷的中国菜館晚翠軒举行了欢迎会。凡是左翼陣营的知名战士，几乎全都到会了。在会上，大山郁夫代表劳动农民党，是枝恭二代表《讲座》执笔者的核心团体政治批判社，最后佐野学以《无产者新聞》主笔的身分，一一致了热烈的欢迎詞。

平素和实际运动漠不相关、一味蟄居在书斋里的弘藏，对于自己的懈怠，本来也就經常感到一种良心的苛責，觉得非常对不起識与不識的朋友們。现在到会的人都是左翼战士，站在他們的面前，实在觉得慚愧得很。而同时，受到《无产者新聞》(当时他认为这份报纸无比地輝煌)的主笔郑重致詞欢迎，他內心的欢喜，无异于軍人获得了勳章。那天席位和弘藏离得很远的佐野，身上穿了黑色的西服，站在末座的一角，滔滔地說出洋溢着革命意气的、热情的欢迎詞的那种风度，在弘藏看来，簡直是英俊非凡。弘藏在牢房里逐一回想了这些情景，觉得今天的佐野所給与他的印象，几乎和从前判若两人，簡直有些叫人弄不懂是怎么一回事。

至于弘藏本人，也和从前不一样了。在往年，他自顾自担任着

大学教授，拿着优厚的薪俸，发表論文和著作还可以得到巨額稿费，优游自在地搞着自己所爱好的研究工作；他作为一个向馬克思学习的学子，对于这种生活，良心上总觉得有所不安，所以每次和一心一意地从事实运动的知識分子见面，不由得不自慚形秽。可是今天的他，走到任何人面前，也不觉得就比别人短一截。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經尽到了一切应尽的責任，除掉生命而外，可以舍弃的东西都已舍弃，良心上已經沒有一点內疚了。这次以冷靜的态度和佐野相见，觉得自己虽然瘦了些，可是身量却高得多，而对方实在显得既矮小，又萎靡不振。

佐野学的回忆(二)

弘藏不由自主地还想起了佐野学的另外許多事情。过去他和佐野虽則只见过一次面(如上文所說，那是 1927 年冬天，在东京的欢迎会上)，可是后来，他們之間却有过几次书信往来。內中佐野給他的两次明信片，弘藏到现在还忘不了。

他們初次见面的第二年(即 1928 年)的 2 月里，全国举行了依据所謂普通选举法的大选。統治階級对日本共产党在大选中的活跃，深感恐惧，就在第二个月 15 日的清晨，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統一大逮捕。这就是一般所說的三·一五事件；余波所及，弘藏也終于因此辞去了大学教授的职务。而佐野呢，非但巧妙地逃过了那次統一大逮捕，連第二年(即 1929 年)4 月市川、三田村、鍋山等主要干部被一网打尽时，也只有他一个人順利地漏了网，逃到了中国。他在北京呆了些日子，在将要离开北京远远地逃往莫斯科的时候，写了一封信向弘藏告別。信上写着这样一段話：“现在我正要出发到遙远的他乡去，旅途生死莫測。在交通不便的这个国家的內地，

我說不定什麼時候被人殺害，說不定哪年哪月在哪个地方一命嗚呼，因此特地給你寫這封信，向你道別。”當時弘藏接讀那封信，一邊馳想于萬里長空之外，一邊反復默念着“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句子。

事情的前後經過就記不清了，佐野後來從莫斯科回到上海，正打算和國內的同志取得聯繫，結果遭到逮捕，一時關在中國的監牢里。當時他仗着中國官吏對他的優待，利用上海公安局的公事信封，給弘藏寄來了一封密信。

那時弘藏已經辭去了大學的教職，所以佐野那封信，是寄給弘藏的朋友——在京都帝國大學擔任漢學教授的小島祐馬的。小島把信拆開一看，裡面封着一封給本田的信，他也弄不懂是怎麼一回事，就把信轉交給了弘藏。那封信的信封上沒有寫寄信人的姓名，拆開之後，弘藏才知道是佐野寫來的。信里大致說：

“使人驚異的是，同志中間似乎竟有人洩露了國際秘密，我現在被捕，關在這里的監牢里。現在我的性命，今天不知道明天。說來慚愧，事到如今，我很想念丟在祖國的妻兒。希望能告訴他們一聲，說我在上海。所幸的是，中國人深知‘士可殺，不可辱’，對我很照顧，現在我案頭上有着的一套筆硯。我想趁此機會盡量多寫些東西，以供同志們參考，還請多多幫忙，設法使我在這里所寫下的東西將來能由同志們印出來。這就是我的希望，不怕麻煩你們，就此拜托素所仰仗的你們兩位兄長。”

信裡面，受信人寫的是本田弘藏和大山郁夫兩個人的名字。弘藏一接到這封信，馬上派自己的小舅子大須賀去到東京，先把信拿去給大山看了一遍，然後送交給佐野的胞兄佐野彪太。

不知大山是何居心，信雖則是寫給他和我的，他對此却漠不關心。

佐野彪太是个知名的医学博士，在駿河台開設着佐野医院。他也曾以医生的身分到大山家看过病，所以，大須賀就拿了大山的介紹信連同原信，找到他的医院里。

对于这类事情还欠老练的大須賀，抱着身負重任的心情和彪太见了面。做过多年私人开业医生因而善于应酬的彪太，利用他的态度和动作，馬上使大須賀放了心。他装模装样地把帶給他的信反复看了一会，然后放低声音，改容說：

“下面一番話，是拚着我的社会地位而說的，千万請你体諒到这一点，絕對保守秘密。在你們看起来，也許不成什么問題，可是在我个人來說，我觉得我已經获得了相当的社会信用和地位，现在却想不顾一切和你談談，怎么样，你能不能答应絕對保守秘密呢？”

大須賀自然滿口答应了。于是彪太接着說出了这样一番出人意外的話：

“由于职业上的需要，过去我从来没有对誰吐露过，其实說句真心話，我对我弟弟过去所干的工作，一向非常同情。不是我夸奖自己的弟弟，那家伙从小就是好样的。他的眼光，毕竟与众不同，我內心里老早就佩服他。现在坐視不救，于心何忍？我所梦寐以求的，就是設法让他再大干一番，今生过几天更好一些的日子。好在錢的一层，尽管是較大的数目，我也还兜得轉，而且他现在坐的又是中国的监牢，所以，能不能設法买通当官的，趁现在让他逃出来呢？这样那样地麻煩你，真是过意不去，你回到京都后，請把我这番意思告訴本田先生，并且請他今后多多帮忙。”

說完这番話，他从西装礼服口袋里掏出綢子手絹，按在他那紅潤肥碩的脸上，做出擦汗的样子。

大須賀一本正經地听了这番話，回到京都，兴奋地一五一十給

弘藏传达了。遇着弘藏又是那样的人，也就把彪太的话全都信以为真。

他原是不谙世故的书呆子，自然任凭怎样动脑筋，也不可能想出让一个关在外国监牢里的人逃脱的计划。可是他想，现在救出佐野学，对于日本的共产党来说，乃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既然对方来和自己商量，也就顾不得一己的安危了。幸而他有一位心腹朋友，是个中国通，那位朋友又和一个多年住在中国、精通中国各种情况的朋友有来往。把情况敞开了和那位朋友一商量，据说只要有钱，那个计划是有希望实现的。

于是，弘藏就当真决定进行那个计划。为了这件事，后来他又相烦大须贺，两次去东京和彪太商量具体的办法。

彪太可太不像话。他根本没有想到弘藏会把他的话信以为真。他只是为了怕人家说他自己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却丝毫不管胞弟的死活，才随机应变地编出几句漂亮话来搪塞一番的。哪里知道人家却当成一回事来办，而且办个没完没了，这就使得他穷于应付。他本来自以为深通人情世故，梦想不到竟然发现世上还有这样的死脑筋，倒叫他左右为难。“照说我应当亲自去京都道谢，并且奉商一切，不过那样一来，又怕引起人家注意，所以预备派舍亲代我去一趟。本田先生那里，就不再另外写信了，请你代候吧。”他用这些话打发了大须贺。

可是，等来等去，他那位亲戚却始终没有到弘藏的地方来。不久，佐野学从上海被押解回国，事情也就自然而然地告一段落了。放下了心事的彪太，从此把以前对弘藏说过的话也都抛在脑后。他不仅一次信都没有给弘藏写，后来在弘藏结束了京都的房子住到东京来后，他也沒有来问候过一次。——直到那时，弘藏才明白了事情的真相。这样，他虽则丢掉一些火车费，却从此学了

一个乖：世上就有一种人，看上去一本正经，说的话却没有一句可信。但是，彪太更比他聪明，一个钱都没有花，却长了一个见识：世上竟有那样地道的傻瓜。

上面所说的弘藏至今还没忘掉的佐野的信，就是从中国寄来的那两封。后来佐野被关到日本国内的刑务所，在新劳农党解散后，也常和弘藏通信，弘藏还曾给佐野送书到监牢里去。可是，安然收到从中国寄的两封信这一层，却由于事关秘密，一直没有机会告诉对方。这次久别重逢，弘藏虽则经历了种种变故和感情上的变化，却仍然很想把收到那两封信时的感情，说给对方听。

弘藏一方面这样想，一方面又觉得和现在的佐野说这类话，实在是多此一举。他独自不胜今昔之感，觉得凄凉寂寞一阵阵地兜上心来，那个滋味，就仿佛事隔多年，忽然遇见从前的漂亮情人，发现她已经风尘落魄、变得卑鄙不堪。到最后，弘藏终于拿定了主意：没有必要再和他见面，还是请求所长不要再让自己和他相见吧。

关于那天他和佐野学的会面，他的“感想录”里只字未提；可是佐野却在他的“感想录”里写了这样的话：

“今天在所长室里会见了本田博士。这次和他重新见面，几乎相隔七年多。

“我和博士的认识，是在1927年，当时博士从京都来到东京，《无产者新闻》为他开了一个欢迎会，我以主笔的身分致了欢迎词。那时双方都怀有莫大的好感。

“后来博士的生活乃是暴风雨的生活。他从日本经济学界的泰斗、简任教授，一变而成为流浪者，再变而成为共产党员，三变而成为狱囚。不仅博士本人，连他的妻弟大须贺和他的女儿，都在非法运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全家都卷进暴风雨之中去了。我把共

产党一脚踢开，我本来以为他对我也許抱有恶感，岂知他却声称并无此事。

“听得人家說，博士声称决不放弃馬克思主义；可是从我們的談天中間，看得出博士的世界观还是东方式的观念論，决不是馬克思主义，这是我所感到愉快的。不过，博士的面容却不知怎的变得粗獷些了，这大概是監獄生活帶給他的最可貴的礼物吧！原来他那被知識的包袱压得透不过气来的蒼白而带几分懦怯的脸部表情，已經消失不见了。

“1931、1932年間，博士从獄外給我写了許多信，內中有一封信上，提到他辞去大学教职以后，大部分熟人立刻和他疏远了，感觉到人情像紙一样地薄。此番要是出獄的話，感慨也許将更深吧。

“本田先生呀，雄赳赳地走你自己的道路吧！不用顾虑世俗，独行其是好了！从明治时代起一直拥护进步力量、最后落到坐牢的博士，毕竟是时代的代表者。在獄中专心致意地做着苦工的他那副模样，是显得多么崇高呀。

“我对于本田博士本来也有些不滿的地方，可是见过面以后，这些不滿都消失了。本田先生的矛盾，不妨把它看成是人的苦悶的象征。

“我为本田博士的健康而祝祷。”

和佐野见面之后感到不愉快的弘藏，要是看到这篇文字，一定会于心不安，而觉得自己不对吧。

从希望假释到期待假释

弘藏一时由于和佐野见面而产生的兴奋状态逐漸鎮定下来的时候，又为假释暫時不能实现而煩惱起来了。

本来，人们的希望总是逐渐转化而为期待的。至于像弘藏那种性格的人，这个倾向就格外显著。单独囚禁了两年，越是希望出狱，他就越把一切材料往有利方面解释，焦急地盼望刑期届满三分之一。他那强烈的希望，特别是到了12月里，在他头脑里完全转化为明确的期待了。所以，今天他和所长见面的时候，他觉得所长这个人，平常只知道哄人，事到临头，却一把将人推下失望的深渊。弘藏非常生气他那种行为：从前几次三番暗示可以对弘藏实行假释，今天却居然满不在乎地装聋作哑。

可是，握有生杀予夺之权的所长既然说了那样的话，还有什么办法呢？弘藏心里思忖：这样一来，可能除非照所长说的那样，写些什么才成。

不过，弘藏怎么说也不愿和佐野同流合污，同时也不愿像所长那样，讲些欺瞒外行人的话，说什么“马克思主义在学理上虽然不错，但是作为一个日本人，却不能赞成”。因为，那样讲，无异于说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可是站在大资本家、大地主的立场上，却不便加以采纳。这点儿道理，他在听到所长那几句话时，当下就明白了。

那末，让对方满意的东西不是没有什么可写么？——他开始自问自答。

事情的确是这样。但是，什么也不写的话，假释也就没有希望。看来，好写的东西似乎还有。

有了，我来写篇论宗教的文章吧。近几年来，年轻人搞反宗教运动，往往有偏向，他们不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扬弃所谓宗教。这东西里面含有的内观真理——不妨称之为宗教真理。这是一个大缺点。其实，人的思想，无论它是怎样的思想，都不可能是绝对错误的。一条线从这一头到那一头由蓝色逐渐变为紫色，由紫色

慢慢变为紅色；如果只是看到它的一部分，就說它完全是藍色或紅色，那自然是錯誤的；不过，說它是藍或紅，却也有一定的根据，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那样說也可以认为是正确的。如果一味沒头沒腦地批評說藍大成問題，說紅根本錯誤，那就决不能使对方心服口服。为了揭露天动說的錯誤，光是主张地球圍繞着太阳旋轉，是不够的，必須說明为什么在我們看来，和实际相反，仿佛是太阳在圍繞着地球旋轉。天动說之所以产生，是有認識上的根据的，因为在感觉上太阳确实是在圍繞着地球旋轉。与此同样，人們的头脑里产生的一切思想，不問它是什么样的思想，一定有它的認識上的根据，有它的地盘。列宁曾說：“僧侶主义……它无疑地是一朵不結果实的花。”^①可是，尽管是不結果实的花，也都是有根基的。“是生长在活生生的、結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絕對的人类認識这棵活生生的树上的一朵不結果实的花。”^②历来的反宗教論，在这方面缺少說明。我就来写篇文章說明一下吧。要是这么做的話，看起来就会像是对目前日本的馬克思主义者的反宗教論进行批判，仿佛造成了同室操戈的局面，因此也許多少可以博得当局的欢心。而且，写这样一篇东西，并不至于歪曲自己的学术上的良心。

尤其是宗教不比科学，面壁九年才是它的特色，才是它掌握真理的方法。本来宗教的职能，就在于使人脫离现实的物质世界——外界——而沉潜到内在世界里去。如果要从事科学研究，那末在刑务所这种地方，一般說来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要进行宗教思索，刑务所却仅次于修道院，可說是个适当的場所。而进行宗教思索，我现在也沒有什么办不到的，而且保险出不了乱子。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12頁。——譯者

② 同上。

好，就是这个主意！我就写篇論宗教的文章吧。談論这个問題，我并不觉得內疚。而且一旦談到这个問題的时候，我并不想說什么见不得人的話。对，这是好主意！——他心里想。

可是，——他又考虑到，——假如由于我写了一篇論宗教的文章而被假释的話，社会上的人一定以为我抛弃了馬克思主义而皈依了宗教吧。在我的文章里，我自然准备充分地着重指出“宗教是民众的可怕的鴉片”，以及“在真实的历史上，神和佛始終是人們受制于外界自然以及階級奴役制度而陷于愚昧无力的結果而产生的各种观念的結合物，是加深这种意气沮丧并且麻痺階級斗争的各种观念的結合物”，可是，这些地方，說不定誰都不会加以注意，結果只会让人家誤解我是逃进了宗教的法門而抛弃了馬克思主义。因假释而早期出獄这一事实，无疑将加强这样的印象。这倒是值得好好考虑的問題。——他又前思后想地这样盘算起来。

在他看来，共产主义者在思想上轉变方向，有两种类型。第一种可以称作积极的轉变方向；佐野、鍋山等人，就是这一派的始作俑者。他們昨天还为楚效劳，今天忽然掉轉矛头，成了秦方的党羽，宣称今后将为討伐楚方而效命疆場，等不及放下武器，就精神百倍地擂起战鼓来。可是，在弘藏看起来，像这一类“弃暗投明”，不管它的立場如何，借口又如何，从古以来就一向受人輕視，成不了什么气候，所以不在話下。

第二种可以称作消极的轉变方向；例如有些人悄悄地放下武器，离开共产主义陣营，披上法衣，躲进宗教的另一世界，沉浸在礼佛誦經之中，他們的轉变方向，便是消极的轉变方向。而在弘藏看起来，这种消极的轉变方向，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來說，从而对于人类的进步來說，比积极的轉变方向为害更大。为什么呢？因为，打个比方來說，这就好比逃离了楚方的陣营，却又并不投到秦方的陣

营，而是抛弃了弓矢，完全退出战场，在表面上看来，并不归属任何一个阵营，而是置身于另一世界；其实呢，宗教那个所谓另一世界，暗地里却是扩展或拥护秦方势力的有力的一翼。即使个别转变方向者的主观意图中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其实多半是意识到的），可是它的客观效果，却是十分有利于削弱楚方的势力，这从司法当局非常欢迎这一种转变方向，就可以看得出来。即如刑务所里，初期也不让犯人读宗教以外的书，教诲堂当中供的是阿弥陀佛，教诲师几乎全是真宗的和尚。在今天，宗教和和尚是哪个阵营的奴僕，是十分清楚的。懂得了这个道理，也就可以明白：正如基督教社会主义乃是“社会主义”的最坏的变种、最恶劣的歪曲，消极的转变方向应当说是转变方向中的最坏的亚种。积极的转变方向，由于它的叛变态度过于显明而露骨，局外人很少受到它的迷惑，反而会有许多人对它抱反感。可是逃避到宗教世界，却予人一种真像那么回事的感觉，本人越是显得纯真，就越不容易让人家联想到他的卑鄙动机。正因为如此，所以反而有害。

现在，积极的转变方向的一方面，已经有了佐野那样的始作俑者，可是消极的转变方向的方面，却还没有和佐野相匹敌的有力的旗手。这种时候如果受人家利用充当这个旗手，那可吃不消。但是，——弘藏想，——自己将要动笔的论宗教的文章，很难说就不发生这种危险。本来在阶级社会里，一种言论在传播到群众中去之前，不管最初那个发言者的意图是怎样，由于客观的社会情况，必然会遭到一定的歪曲。所以，尽管自己的文章里所写的全都是真理，结果它将引起怎样的客观影响，也非充分加以考虑不可。正因为他学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所以他一想就想到了这许多问题。

弘藏这样想着，再看一看当时的形势，人们正在拚命利用宗教

运动作为反对馬克思主义的一翼。无綫电里每天早晨都广播着連續的宗教讲座，許多有名的和尚都被动員来讲解《叹异鈔》和《法句經》之类的佛教經典；把那些讲义速記下来印成的书，成了出版界的宠儿。另外，像友松圓諦那样的有才干的野心和尚們，发起了全国范围的“真理运动”，在各地分設支部，出版杂志，搞演讲会。这虽說是一时的现象，不久就烟消云散，然而至少在小資产阶级的知識分子中間，这类宗教运动，大有把遭受到极端鎮压的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取而代之的趋势。因此弘藏就想，即使自己所主张的东西絲毫都不錯，可是现在，既无提出这些主张的必要，也不是讲话的时候，如果只是为了希冀获得假释，明知很可能被人曲解誤会，却依然硬着头皮冒这个危險，說些可以不說的話，这实在未必妥当。想到这里，他就觉得論宗教的文章尽管也許可以博得当局的欢心，这个时候却万万写不得。

但是，如果不写論宗教的文章，又別无可写的东西。要是什么都不写，假释就会完全沒有希望。这多么难受呀。还是写吧。只要在写的时候，对各方面尽可能加以注意，全面地預防发生不良影响，就可以了。对，这个办法好！

尽管这样想，弘藏却仍然打不定主意。本来以为解决了的問題，一会儿又重新冒出头来。他沒完沒了地自問自答着。翻来复去，还是那个老問題，就好比解不开的草绳一样，糾纏在一起，永无止境地在他脑子里縈繞着。

搖了就寢鈴，睡到鋪上以后，那条糾纏在一起的草绳，还是好比临死的蛇那样，老是在他的脑子里翻騰蠕动着。他怎样都睡不着。随着四周归于寂靜，連心跳的声音都听得出来。虽則沒有听到脚步响，却觉得走廊里靜止的空气忽然动蕩起来，似乎有人在走动。睜开眼睛一看，往常可以从門上的窺孔里看到走廊里的灯光，

这时窥孔里却黑黑的。正在疑心电灯灭了，堵住那窥孔的眼睛忽然离开了，原来是夜班看守在那里张望。平常夜里睡得死死的，什么都不知道；这天晚上失眠，才知道大约每隔一小时都有人向牢房里窥探。

夜晚的牢房，静寂得如同坟地。本来，光是弘藏居住的南舍那栋监房，就关着六百名犯人，可是谁都不会想到有那么多的人住在那所房子里，几乎就像只有自己一个人睡在里面一样。仅仅由于偶然有人发出咬牙的声音，这才使人意识到邻近还睡着人。

越到夜深，就越寒冷。起来小便了好几次。总是睡不着。在脑子里，那根草绳还在纠缠。

不一会儿，楼下响起了开门的声音，接着就是几个人的脚步声。这是早班的炊事夫出去了。

天刚刚有些发白，起床喇叭随即吹起来了。

弘藏终于连瞌睡都没有打成一个。——自从被捕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失眠。他感到浑身瘫软，抚摸着瘦骨，离开了床铺，这样，眼巴巴盼望着的12月15日，终于毫无意义地来到了。

对于服刑期满下定决心后的心境变化

下午，重子带着真知子来探监。今天特许在普通接见室接见，而且免除了见证人。管接见的看守部长，只是站在走廊外面，隔着一重玻璃窗远远地瞧着而已。

弘藏急急忙忙地先把昨天所发生的事情扼要地说了一遍，还说，既是这样的话，无可奈何，这时只得写些什么了。

“我完全懂得，这是他们蓄意用假释来拚命引诱我，等到紧要关头，出题目要我做，利用我的弱点；可是我不够坚强，怎样都下不

了一刀两段的决心。不坐进监牢，万难理解坐牢人的心理；要知道坐进了监牢的人，一心一念只盼望出去。我现在觉得，佐野那种人，为了免于判处无期徒刑，做出那种转变方向的事来，固然很不体面；可是仔细一想，这也是出于人类的弱点，是无可奈何的事，很难加以责备。”

重子听到弘藏这番话，面色变得暗淡了。

“请您不要生气，今天我想把我的看法说一说。”她讲了这一句，等弘藏回答了“噢，好呀好呀，无论什么话，尽管说吧！”这才接下去说道：

“从我嘴里说出这样的话来，委实很难过，我早就耽心着怕您会有刚才所说的那种想法。去年您在市谷刑务所写的一篇《独语》，那是出于无奈，即使别人说长道短，我觉得那篇东西的内容也还没有什么不可以。像我这样没有见识的人，本来不配信口雌黄。可是我觉得，如果再写出比《独语》更进一步的东西来，就非常危险了。佐佐木先生、小島先生几位都说，本田先生终身一贯是个学者，但愿能始终保全学者的面目。尽管立场和您不一样，可是但凡真正为您着想的人，都是这个意见。我什么都不懂，多嘴说出这些话，也许您要生气……想到这儿，我真是难过。可不可以请您再好好考虑一下呢？”

说了这话的重子的脸上，露出一副只有在严重担忧的时候才显露的表情。这和已故的她母亲的脸容一般无二。弘藏看到这种表情，觉察到她的忧虑深到什么程度。然而，他心里却感到一种冲动，想顶她几句。他本想说：

“你所说的，是什么人的心理呀，这不是坐在看台上看赛马的人的心理么？要不是拚死命飞奔的话，坐在那里看的人，自然不感兴趣。不过，像我这样一匹瘦弱老马，还使劲鞭策，也就太残酷

啦。”

話已到口边，可能是觉得尽管对自己的老婆也都未免难以为情吧，好容易憋住了，沒有說出来。看着低了头的弘藏，重子停了一会，繼續說道：

“您說佐野先生那种人，也情有可原；但是，另外却有些人，被判了无期徒刑，送到北海道网走刑务所，都处之泰然哩。饶天之幸，您还遇到了大赦，即使服役到滿期，今后也熬不到三年了。当然，我深知这是不好受的，但是如果勉强設法出獄的話，尽管早日出去了，过后一定会后悔。这样一来，早出獄反而更不好受，我最担忧的就是这个。要是太太平平坐滿几年牢然后出獄，这就会像是卸下了毕生的大包袱，可以舒舒坦坦地度过晚年了。我只希望您能够这样。现在我就单靠这个慰藉自己哩。否則，即使您早日出去了，按照您的性格，到后来您一定会感到有所不安，总是觉得难以做人，心情得不到安宁。到那时，我在您身边看着也很不好受；那副光景，现在都不难想像。何况您已经不顾一切地行其所是，熬到现在这个地步呢……”

她說了这些話，含着眼泪，回头問身边的真知子說：“你觉得怎样呢？”

真知子側轉头迟疑了一下，然后答道：“媽媽的話自然說得不錯，不过爸爸說要写点东西，也决不会写什么昧了良心的东西；所以要是爸爸光写他心里的話，我想那也沒有什么不可以的。”

弘藏倒听得进女儿的語，就說道：“自然是这样。违心之言，我决不說。我不是昧良心的人。”

“不过，你爸爸的脾气，对任何事情都是偏执的，一旦有了某种想法，就专门为它找理論根据。何况摆道理又是拿手戏。你不这样想么？”重子回头看着真知子說。

被击中了要害的弘藏，等不到真知子答話，憤然駁斥道：“我才不干这种混帐事情哪。”

可是重子今天也不輕易屈服。

“怎样讲才好呢，我也說不上来了。我总觉得您有这样的脾气：平常对于任何一件小事情，都要摆一番大道理，定要把人說服，才肯罢休。”

“那是因为我好胜心强的关系，所以平常对于小事情也許的确有这样的毛病，可是遇到重要的学术上的問題，世上再也沒有比我更肯向真理低头的了。即使是我竭力主张的东西，只要发觉是我錯了，我馬上就认輸，这是我的脾气。在道理的前面，我永远是老实实在地低头的。”

“让您这样一讲，眼下我就輸了道理啦。再說些什么好呢？想說的也說不上了。”

“是嗎，哈！哈！哈！”

弘藏一笑，把話岔开了。不过，他并不是不知道重子担忧的是什么。况且，自己所要說的話都已說了，心里觉得十分爽快，仿佛冰块已經溶化了一般。最后他說这事还要好好考虑考虑，就和重子她們分別了。

回到牢房里的时候，弘藏已經暗暗下定了决心：

“好，我一定坚持！”

一旦下定了决心，觉得今后至多也不过再熬上三年，实在算不了什么。毫无必要再思前虑后。他觉得，昨天一整天那样地愁苦焦急，簡直太可笑了。就好比一个頑皮孩子，想偷紅熟的水果，把树枝拉到身边，后来撒开手，那树枝又弹了回去，恢复了原来的样子那般，他一下子抛开了所有怯懦的念头，仍旧回到了原来的决心。

他在“感想录”的 12 月 16 日項下，写了下面这样一段話：

“昨夜躺到鋪上就睡着了，半夜里連廁所都沒有上一次，一直酣睡到今天早晨。今晨天晴，阳光从窗口射进来，气候温暖。觉得心里很爽快。”

从此以后，他把承情叨光的卑鄙打算抛弃得干干净净。他在三年后出獄以前，虽則还曾遭到許許多多波折，可是为了假释而写点什么东西的念头，后来一次也沒有产生过。这使他的獄中生活变得十分轻松愉快。

向所长反击

弘藏重新振作起精神，当天就想来一个反击，他在他的“感想录”里，写了下面这样的一篇备忘录：

“今年 1 月中旬，当教务主任动問出獄后的方針的时候，我答称今后不仅不再参加实际运动，就是在純粹理論研究方面，也将不再从事一切有关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翻譯。这倒并非是我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估計到自己过去和现在的一切具体条件，再三考虑的结果，为的是一方面不伤害自己学术上的良心，另一方面采取最妥善的方針，使受到刑罰的本人，勉副行刑的目的。

“一般犯人，特别是思想犯，都具有各自的特点。我相信特别是我这个人，无论从年龄上說，经历上說，以至犯罪动机上說，在思想犯中具有最多的特点。为什么要在这里說这样的話呢？因为上面所說的放弃对馬克思主义的一切研究这件事，在某些人來說，也許算不了什么，可是在我來說，却并不那么簡單；为了使之实现，必須从坐在牢里的今天起，一步步地作起准备来，为此必須把事情交代清楚，請求諒解。

“作为左翼思想犯的一員，我犯罪的根源，似乎有着以下几个特点：

“(1)根子非常老。1903、1904年前后，我就翻譯了外国人写的一本关于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书；从那时起，直到被捕，我作为一个馬克思主义者而建立起自己的信心，大約花了三十年工夫。不用說，三十年前，社会上几乎还不知道馬克思这个名字；关于馬克思主义的日文著作和翻譯书，还一本都沒有。这就說明，我的逐步走向馬克思主义，不是学时髦，而是学术研究上的需要所促成的。这一点，和其他的人、特别是血气未定的青年們有所不同。

“(2)建基在理論上。我这个人，十分不适宜于搞实际政治运动，同时对于直接从事实际政治运动也不感兴趣，反而认为这是一件苦事。尽管如此，为什么到了晚年却参加自己所不怎么爱好的实际运动呢？那不过是由于我不願逃避对自己所怀抱的思想所負的責任而已。这种地方，也和那些本来就爱搞实际运动而不爱搞理論的人們大不相同。在本性爱搞实际运动的人來說，要是这个理論行不通，不妨換那个理論試試；但是，在我來說，实际运动可以放弃，理論却不能改变。

“(3)在理論方面曾揚弃过各家的思想。因为我现在的思想具有上述根源，所以我在得出最后的結論以前，必然也曾碰到許許多多相反的意见，結果我或則經過一番徬徨迷惑之后，把它們一一克服，或則对乍看似乎很难調和的思想，在一定的解释和条件之下，加以揚弃和吸收。所以，我决不是简单地盲信片面的理論的。关于这一层，我特別想讲一讲的，就是宗教問題和祖国問題。

“根据‘宗教是民众的鴉片’或‘无产阶级沒有祖国’这类簡簡單單的話，就随随便便地来概括馬克思主义对这类問題的态度，当然是錯誤的；不过我在这里不預备一一詳細討論这些問題，只想讲

一讲下面这一点。

“我很早就倾心于宗教。我最初所参加的社会运动，就是宗教运动，那距今已大约有三十年了。那时我所写的《人生的归宿》，这儿的图书馆里也收藏着。那虽是一本十分浅薄的书，却足以说明很早以前我就倾心于宗教了。还有，直到几年以前我迁居东京时为止，我屋子里一直挂着释宗演^①法师特地给我写的“真无我”的大字横额。这些地方，可能也和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不一样。至于说到日本民族和祖国的问题，我在1913、1914年前后留学外国时写的《回顾祖国》那本书里，已经多少有所表述；总之，我之爱祖国，决不落在人家后面。（《回顾祖国》这本书，我们这儿的图书室也收藏着，又市谷刑务所的图书室还收藏着同一时期我所写的《经济和人生》一书；这两本书都足以说明我所经历的思想过程。）要是用列宁的话来说，正由于我爱祖国，所以我才成了共产主义者。忘掉了祖国的国际主义，我认为那不过是幼稚的空想，本来和马克思主义绝不相干。日俄战争时，列宁希望本国打败，也许有人会认为那是出卖祖国，其实这种想法是个绝大的错误。因为，吃败仗的乃是沙皇的军队。正由于沙皇的军队吃了败仗，所以才有1905年的革命，而这个革命就成了俄国大革命的开端；至于在大革命中毁灭的，乃是沙皇，而不是俄国。由于那次革命，俄国的工人和农民从沙皇的暴力压迫下解放了出来，逐步在经济和文化方面获得了发展；结果今天的苏联不仅不灭亡，反而正在方兴未艾地发展着。

“总之，我在思想上得出马克思主义的结论，是长年累月研究思索的结果；所以我这个思想，——特别是我所专攻的经济组织这

① 释宗演(1859—1919)，号洪岳，临济宗的和尚。——译者

一部分，——很难指望它有所变化。

“(1)不論日本的社会形势以及俄国、中国、德国这些国家的现状怎样，今后将起什么样的变化，像这样的十年、二十年的眼前的事变，是不可能对我的思想体系起什么根本影响的。现今的共产国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苏维埃政权也是这样；然而我的思想却发源在这些事件发生以前，我早就抱定宗旨，等千百年后再来决定是非，所以很难想像我的思想会随着实际运动的盛衰而发生动摇。

“(2)纵使那些曾經为了共产主义运动出生入死的人，要是呆在在監獄里一連靜思几年，思想也很可能发生根本变化。但是，这样的靜靜的思索，——类似刑务所里单身牢房的生活，——我在未参加实际运动以前早就长年累月地經歷过了，所以尽管給我以靜思的机会，要想使我的思想在短时期中因此而发生根本变化，也几乎是絕不可能。

“(3)有一类人，进了刑务所才有机会第一次和宗教接触，从而在思想上起了根本的变化；这种人也許不在少数。至于我，正如上面所說，好歹早就傾心于宗教了，甚至可以說，要是不經過这样一番宗教的鍛炼，我也許根本入不了馬克思主义的門。布哈林曾經說过，真正的馬克思主义者，理論上是唯物主义者，同时实践上是理想主义者。

“(4)如果片面地观察問題的話，任何理論都是成立的；馬克思主义者深刻地認識到这一点，所以主张理論研究必須經常力求全面。馬克思那句名言——“搜集丰富的材料……”，就是由此而产生的。可是我們在刑务所里，却不可能搜集丰富的材料；能够到手的材料，都不免是片面之詞。在这样条件之下，自然談不到搞真正的学問。如果拱了双手靜靜地思考就能搞真正的学問的話，各大

学里的研究室、实验室以及图书室等等，就都是废物了。我觉得，对于这种想法，当然必须加以严重警惕。

“(5)有一类人，刑务所生活对他成了一种威胁，因此在思想上也可能发生一定的变化。但是，我从大学教书的时候起，早就知道在自己的思想进程的前面等候着的乃是免职和坐牢，心里一直作着斗争，所以再也不会因为刑务所生活的艰苦，而影响到自己的思想。

“上面的一番话，听来似乎毫无悔改的意思；可是，这里谈的不是行动，而纯粹是学术上的问题，所以，如果在认识上不起变化，单凭决心，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单凭决心所能办到的，就是关于这类事情，今后一概不谈，这就是我所能表示的谨慎的极限了。

“因此，前蒙垂询时，我答称今后如出狱，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不用说是不搞的了，就连纯粹理论方面的研究也将一概放弃，和马克思主义一刀两段。我要再说一遍：这无异是宣布我的学者生涯的终结，勾销我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社会存在，这是我表示悔改的最大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在我是绝对无能为力的。这一层，务望垂察，为此不怕冒犯，噜噜苏苏地说了上面这样一番迹近摆道理的话。

“根据上面所说的理由，我非但在思想上绝不可能发生变化，而且像这样要我在出狱后放弃一切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上的工作，这在我有生之日，实在是非常不合理、不自然而且困难的事。在我这方面说来，光是这一点，已经要算作是一生中最大的变化了；为了出狱时完成这样的脱胎换骨，正如上面所说，必须在监牢里就在精神上作好充分的准备。

“为了这个目的，我自从下狱以来，完全采取一弓一矢都丢得干干净净的态度，无论读书也罢，思索也罢，都尽可能避免接触马

克思主义。(只是,在那些奉命翻譯的书里,有关馬克思主义批判的书籍倒占了一大半,因此,完全不接触馬克思主义一层,实际上未能做到。)这一年里我所讀的东西,除了宗教书以外,就是陶淵明、白乐天、王維的詩集,通过这类书籍,我竭力想到达东方人特有的‘不得志則独乐其道’的境界。

“这样做,我相信前番所談的‘今后的方針’才有可能落实。

“可是,到了最近,却有命令让我在今后一个时期中对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考虑。我一时躊躇,过后才下定了决心,心想既然让我重新考虑,我就热誠地試試吧。(按:这个备忘录,写后曾加增訂,这里所抄录的,是最后的原稿。全文一字一句都照抄当时的原稿;为了如实传达他当时讲了些什么話,所以一字都未加增損。不过这里‘下定了决心’一套話,似乎是弘藏对所长用的一番手腕。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說这里他是說了一下謊的。)可是,我随即发觉,那样一来,我就又要拾起已經抛弃的弓矢,回到阶级斗争的全部理論的观点上来。而这件事情必然牵涉到我出獄后的方針問題。

“从我上面所列举的情况,我想您已經能够充分理解:今后在我从事思想清算工作的时候,为了有可能发现对自己向来的思想加以若干修正的必要,(假定会发生这种情况的話,那末为此,)我必須在相当长时期內专心致志地从事思索和研究。可是一个人——或者以我这个人的性格来說,——是不可能对不久即将放弃的問題費那么大的劲去专心致志地加以思索和研究的。換句話說,为了从事专心致志的思索,在本人內心里必須潛藏着将来出獄后还要繼續做那項工作的意志。这是在极不适当的各种条件下,为了进行专心致志的思索而不致損害自己学术上的抱負所不可缺少的条件。

“因此，我想放肆地声明：作为不以我的意志为轉移的客观情况变化的必然結果，我要在这个时候把一年前所提出的出獄后的方針訂正一下，就是說，我今后仍將繼續从事純粹理論的研究。虽說实則残生无几，气力衰憊，今后也研究不出什么东西，可是仍然希望留下一点余地，作为现在所从事的工作的刺激。情况备述如上，謹請諒察。”

弘藏写完这篇东西，12月17日那天主动請求和教务主任见面，把上面那个备忘录的内容詳詳細細、有条不紊地作了口头陈述，并且請教务主任轉告所长。他虽說干了許多年教員工作，可是向来总是利用筆記簿把教室里要讲的东西預先一字一句地整理好。辞去教职、开始从事无产階級运动以后，有很长一个时期，他向民众演讲时，也还总是預备好筆記。正因为受这种多年习惯的鍛炼，所以他能够把自己要想說的話几乎完全和备忘录一个样地原原本本地对教务主任說了。

教务主任默默地听着，答应把它詳細轉告所长。本来他对那位經驗不多、架子十足、关于弘藏的处理問題什么都不和他商量、凡事独断专行的所长，就心怀不滿，所以他把弘藏那番話传达給所长时，一点也沒有冲淡它的反击力。

后来，过不到一小时，教务主任就亲自找到图书室里，对弘藏說了下面这样的話。

“刚才所讲的一番話，已經詳詳細細地轉告所长了。所长說，他明白了。他还說，既然那样的話，他昨天所讲的話就全部作为罢論；至于出獄后的方針，还請你照从前所說的那样办吧。”

弘藏偷偷地吐了一下舌头，心想反击果然发生了效果。

在獄中享受最大限度的自由

一个人如果无所求的話，即使在監牢里都会变得理直气壮起来。过了两三天，弘藏觉得虽說反击了，要是換湯不換药、仍然老样子的話，未免沒趣，所以想更前进一步。

他心想，我說出獄后不再研究馬克思主义，这在我說来，原是退到了最后的陣地。所长对此似乎很重視，再三劝我不要改变这个决心。其实，我之所以退到这个地步，为的是得到假释。现在假释既然絕望了，出獄以后做什么，那是我的自由。我年紀已經过了半百，精力也衰退了，如果再坐三年牢，即使出去，可能也干不出多少事情了；但是尽管如此，自己束縛自己，却大可不必。能保留多少自由，就应当保留多少自由。

經過这样一番思索，他于是在12月21日那天，向所长提出《关于决心的改变》一文。

在这篇文章里，他先說：“12月17日见了教务主任，作了大致像下面所說的这样的一个申請。”然后抄出了事先留好底稿的那个备忘录的全文。抄写的时候，他把那个底稿略略补充了几处地方。这是因为，他和教务主任见面时，曾經說了一些备忘录里沒有写进的話，所以现在就把那些話补充了进去。（作者为了方便起见，在前一节抄录了已經补充过的原稿。）然后又写道：

“我向教务主任口头申述了大致像上面所說的那樣一番話，过了一两个钟头，教务主任来轉达您所长的貴見說：‘情况已經明白了；关于出獄后的方針，还望維持从前的决心；至于对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考虑一节，可作罢論。’”

他所以这样写，是因为他觉得要是不把这些話写成书面材料，

日后怕沒有凭据。（犯人所提出的书面材料，都装订入本人的“档案簿”里，永远保存下去。）

这样写过以后，接着就写道：“然而我却不能輕易这样做。”并且列举了以下的理由：

“一、历来我对学术研究几乎献出了性命，因此，今后再搞或不再搞的問題，不像‘原来想散步，现在又不想散步了’那样簡單，要我改变决心比較困难。

“一、最近所发生的事，对于我的学术良心是个考驗。我由此得出了这样的自信：我决不至于为了希望获得假释的恩典而昧去学术良心。这是我所十分欢欣鼓舞的。同时，这次得出这样的自信这件事，看来不能不多少影响到我的决心；驟雨过后的波动，到现在还没有平息。

“一、当我被判处五年徒刑而下獄的时候，对于自己的身心健康抱着很大不安，担忧日后自己将不知說出什么来，因此决心趁早結束自己的学者生涯，今后对馬克思主义一字不提。因为我认为，这一則最能符合行刑的宗旨，二則在消极方面，也不致伤害自己的学者生命。所以到今天一直保持了这个方針。

“一、可是现在情况却有了很大的变化。剩下的刑期只有两年半了，也就是只有当初所預期的五年的一半了。因此心里感觉到，我已翻过山头在走下坡了。再加，刑务所里的生活也十分习惯了，再也不用对身心的健康抱什么很大的不安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最近所发生的事情又使我意識到了上面所說的那种自信。既經产生了繼續从事学术研究的决心，不願抛弃学术的想法，也就趁机时时抬起头来了。”

接着又写道：

“根据上述种种理由，今年 1 月里所提出的出獄后的方針，拟

更改如下。

“一、不問合法与否，和实际运动断絕关系；絕笔不写政治論文（有关实际政治运动的評論）；放弃写以宣传馬克思主义为目的的著作、論文以及小册子一类的东西——以上几件事情，和原来的决心沒有任何变化。

“一、至于純粹理論的研究，出獄后再搞不搞，现在尙属未定，此点尙希垂察。因为如果像最近所发生的事情这样，突然发生了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情况，我可能不得已要改变初衷，所以最后的决定，希望到出獄时或出獄后再說。”

这个书面报告交到所长手里的时候，他皺了眉头把它讀完了。他后悔逼得过火了。于是他亲自来到图书室找弘藏，先是和顏悅色地談了一会天，然后說道：“不是我强人所难，关于出獄以后的方針，希望你仍然維持原来的决定吧。”弘藏只是煞有介事地回答了一句：“让我好好考虑考虑吧。”可是后来一想，如果頂撞了在監獄里握有絕對权力的所长，今后遇事都将吃亏，所以到了26日那天，又复写了一个书面报告，內容大致說：“关于出獄后的生活方針，將維持今年1月里的原議，尙希諒察。”

这样一来，結果还是換湯不換药，依然故我。

可是，这次的游击战，並沒有使弘藏吃亏。不但沒有吃亏，由于这次游击战，他还获得了很大的好处。怎說呢，因为从这个时候开始，所长肚子里才打定主意，心想照这个样子下去，再过不到半年，等到明年天长节的时候，只好向上司呈請对弘藏实行假释了。由于这层关系，弘藏的獄中生活就来了一个轉机，变得非常輕松了。此后直到他刑滿出獄，所长尽管換了两次，他所享受的特殊待遇，却始終保持下去；直到出獄那天为止，以后的两年半中間，一直过着非常悠閑的監獄生活。

所长把弘藏调到图书室去，本来为的是让他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考虑，让他在那里看些书，写点东西，所以并没有想到派他什么作业。哪里知道原来的打算落了空，现在也不好强制他搞什么重新考虑，而在另一方面，又已准备在不久以后给他呈请假释，所以也就没有想到派他什么作业。他对弘藏这样说：

“图书室的工作谁都能做，而且现在人手也够了。请你搞这种事情，于事无补。这样的事情请一个学者来做，对于国家来说，是白白糟塌人材。姑且安心呆在这里吧；有什么东西想写的话，就随便写点什么试试吧。”

看来他似乎还没有死心，他还想让弘藏写点什么东西出来。因此，弘藏只要隐隐约约地装出一副“要写东西”的样子，光是看看书，就可以了。就这样地，由于所长有吩咐，他就仿佛成了图书室的宾客，处在犯人所从来没有前例的一种特殊地位上。

每天吃完早饭，他被开出牢房，尽管臂上并没有佩带“独步”臂章，却没有看守跟随着他，就这样地独自一人走出南舍那栋大楼，穿过走廊走到图书室去。本来，只有干了长期的苦工、完成了作业定额而被关在叫做优良室的特种牢房里的十几个犯人，早晨外出时，才可以不在搜查处脱得赤条条地受搜查；而弘藏呢，一开始就和这些人一样，一次也没有尝到在搜查处搜身的那番不愉快的滋味，而直接去到工作地点。

外出的时候，也不用再戴草笠了。以前昼夜独居囚禁的时候，即使到走廊里去一下，也必须戴上草笠，把脸遮住；而现在，那草笠变得一无用处了。本来这种东西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是谁都不带的；当时，弘藏能和这种东西断绝关系，心情也就舒畅多了。

到了吃午饭的时候，他又独自一人回到牢房里，不慌不忙地吃完饭后，然后再去图书室。

这样地在自己的牢房里吃饭，只限于昼夜独居的人们。普通，白天去工厂做工的人，三顿饭都在工厂的饭厅里吃；除了不做工的日子，平常每天在吃早饭以前出牢房，吃了晚饭再回来。至于白天在牢房外面、三顿饭却回到自己的牢房里去吃的，在当时只有弘藏一个。（这件事在他说来是个极大的幸福。为什么呢？因为在工厂饭厅里吃饭，匆忙得很，几乎什么都是囫圇吞下去的；而弘藏呢，从小就是吃东西特别慢的人。）当然，他的牢房，仍然和以前一样，是在一并列全是昼夜独居房的那栋大楼里。那里既然是昼夜独居房，一日三餐，自然每顿都有炊事夫从伙房里送菜送饭来。

下午，在吃晚饭的一小时前，他和在图书室里工作的三个犯人以及隔壁保管科、计算科的犯人一道去洗澡。这些人，左臂上佩有“独步”臂章，都是享有没有看守跟随就可以在所内一定区域独来独去的特权的“独步者”。这些人都是在长期服刑中没有丝毫缺点而受到当局特别信任的人，就好比是犯人中间的王爷。只有弘藏一人，没有“独步”臂章却夹在他们中间。

说到洗澡，去工厂做工的人，都在工厂附设的浴室里洗。每批洗的人很多，大伙儿要听从看守的号令，在六分钟以内一齐洗好，所以极其乱杂。可是弘藏他们却在南舍监房附设的浴室洗。洗澡的时候，也没有看守在旁边监视。洗澡时间自然也不是限制得那样死，简直可以像在外面一般澡堂里洗澡那样地洗。这又是特别爱洗澡的弘藏感到称心如意的一点。单独囚禁的时候，本来一星期只能洗三次澡，现在却每天都能洗了。

洗过了澡，弘藏和其余的人分了手，就此回到自己的牢房里。在图书室里都没有指派做什么工作，回到牢房以后，自然也没有什么作业要做。就这样地成天随便看看自己所喜欢的书，竟算是他的“作业”了。犯人而不用做任何苦工，这恐怕要数他是开天辟地

第一人吧。

昨天还过着被称做“监房中的监狱”的苦闷之至的独居生活，今天他却一下子变成了享受监狱里最大自由的身分。他好比在一夜中间从叫花子变成了王爷。

图书室工作

再说弘藏每天去的那个图书室，在弘藏当时看来，简直漂亮得使人不相信同在一个监狱里会有这样舒适、这样干净的地方。事实上，犯人工作的地方，再也没有及得上这儿的了。

前面已经说过，一千二百名囚徒，夜里睡觉的时候，分别关在南舍和北舍各自的牢房里。南舍和北舍中间，有盖着屋顶的走廊相通。走廊中部，西边是办公楼，楼下是所长室、医务室、警卫室、教务室等等，楼上那个大厅，就是能容纳全部犯人的教诲堂。走廊的东边，和走廊相连，是互相对称的两栋房子。这两栋房子都是二层楼房，一栋的楼下是南舍的优良室，另一栋的楼下是北舍的优良室。两处都有十六个房间，每个房间比普通单身房差不多大一倍。这种优良室，上面已经提到过，是为了优待那些长期服刑、毫无缺点、完成了作业定额而操行特别优良的犯人，而让他们住在里面的。

优良室的楼上，分成大小两间。属于北舍的那个楼上，大的那间是教育室（犯人中的文盲，就在这里受初步教育），小的那间曾经做过犯人用的接见室，这时空在那里。南舍的那个楼上，小的那间是保管室和计算室，从那里再往里走，里边那间大的是图书室。——弘藏每天去的图书室，就是这个地方了。

这个屋子里的书架上，陈列着犯人阅读用书约一万三千册。

(同一本书,有多至十部、二十部、甚至三十部的;像《明治天皇御制集》那本书,竟有二百几十部之多;因此册数虽多,品种却很少。)偶尔有人来参观,总是惊叹这里藏书之多;在大学里看惯了丰富的图书资料的弘藏,虽则对它的收藏量并不惊奇,却也为它的不像监狱图书室而感到出乎意外。

图书室里窗子很多,每个窗子上都没有嵌黑铁杆,也没有安设阻碍看野景的障壁。地上全都铺着油布(只有这间屋子是这样,隔壁那间却没有铺)。壁上挂着石印的大町桂月、澁澤荣一、东乡平八郎等人写的横幅,还有无名作家的巨幅绢画《恩讐的彼方》。

一进屋子的那片空着的地方,放了两张很大的桌子,供作图书收发之用;桌子旁边生着一个炭火很旺的四方形铁火鉢,火鉢上的那个大铁壶,冒着热腾腾的蒸汽。一个冬天从来没有见到炭火的弘藏,觉得那真是太奢侈了!

火鉢的周围,放着几张布面或皮面的小圆凳。弘藏初来这里的时候,有三个杂役夫在那里工作;每在休息的当儿,他们总走到火鉢旁边来烤火喝茶。住在单身牢房里的人,等级不升到二级以上,吃饭时候也只给喝白开水,终年喝不上一口茶。即使二级以上的犯人所喝的茶,也不过是把茶叶袋放进伙房里的大锅子煮出来的茶褐色的水而已。可是在图书室里,却能够随便喝沏在小茶壶里的黄色的茶。那自然是违反所规的,但是不知不觉中间却被默认了。这个图书室里,因为不配备负责监视的看守,所以变成一种自治领了。

起初,弘藏得到一星期的休假,于是自由自在地从书架上抽出所喜欢的书,在火鉢旁边埋头阅读。光是这样地能在火鉢旁边烤火,他觉得已经是了不起的殊荣了。他把小凳子挪到火鉢边,舒适地坐在那里烤火。旁边的人推给他一把椅子,劝他说:“反正空着,

坐这个吧。”一看，原来是一把和獄外的椅子一样大小的靠背椅。他长时期中間把洗脸台当作桌子、把馬桶当作凳子，头几天里只觉得这太奢华了，人家再三劝他，他也不肯坐。

三个杂役夫，各自有各自使用的桌子和椅子，靠南窗放着，中間隔着一定的距离。三个人中間，有一个名叫立川的，脸色蒼白，样子像是个知識分子，个儿高高的，年龄凭看法不同，說小也成，說大也成，他是这儿的“头儿”。他的桌子特別大，椅子是旋轉式的，和看守部长一类人所用的相同。桌上除了办公用的簿册而外，旁边还摆着小台钟啦（弘藏弄不明白为什么这种公家的东西竟成为他的专用品）、花瓶啦、日历啦等等，显得很漂亮。弘藏也和他們同样地領来了专用的桌子和椅子。这些东西都是这个刑务所的木工工厂里的出品，和警卫事务室里普通看守所用的沒有两样。

楼下的厕所，原是獄吏們用的，可是弘藏他們也用它。对于整整两年內专门用自己牢房里的馬桶的弘藏說来，单是用得上这样的普通厕所，已經是个莫大的变化。

所以，說他一夜之間从叫花子变成了王爷，这是一点也不假的。

12月25日那天他写出去的信里，如实地反映了上述的变化。那天是大正天皇节，一天不用工作，他独自躲在牢房里写了下面这样一封信。——具体的事情什么都沒有写，那是因为刑务所里的規則不許可。

“今天是灰沉沉的阴天，时而下几滴小雨。前几天特別暖，不像是冬季，白天一直不穿棉毛衫。（按：犯人中等級高的，可以穿自备的棉毛衫。弘藏在还没有升到这样的等級以前，就由所长破格給与了这种“特权”。）今天虽則下雨，却仍然和暖。今天是节日；要是在往常的話，今天給你写这封信定会感到非常快慰；可是由于前

几天工作有了改变，每天能到工作场所去，可以散散心了，所以一天天过得很快。因此，尽管是难得碰上节日给你写信，也不觉得有满肚子的话想写了。（按：这主要是因为有机会每天和人家说个话了。）俗话说得好：“家中有了钱，孩子就骄傲。”我现在已经不怎样爱惜这有限的信笺了。以前给你写信，总是忍受着眼疼，写那六号铅字大小的蝇头小字，而今天写的，却是二号铅字大小了。这正可以证明我每天的生活无忧无虑，所以请你放心吧。我身心都十分安好。……”

12月24日，也就是他写这信的前一天，重子因为担心他的处境和心情，到监狱里来和他作今年最后一次的会面。她看到弘藏又完全恢复了镇静和生气，非常高兴。

她分手时说了一句“那末祝您新年好！”喜气洋洋地走出了刑务所的大门。

一星期后，她和真知子母女两人，度过了一个不是去年可比的安逸的除夕。在她的日记里，她只简单地记下这样几行：

“12月31日。一切照常。

“真知子做了新年的红烧肉。

“下午发出贺年信。

“晚上早早吃完晚饭，舒舒服服地开了无线电，听晚上的曲艺和除夕钟声等广播节目。”

言归正传。由于年底弘藏来了一个游击战，所长于是决定在不久的将来为弘藏呈请假释；而恰巧在那个时候，弘藏却干脆放弃了假释的念头，下定决心服刑满期后再出狱。有趣的是，双方几乎是同时作出决定的。或者不如说是，由于弘藏死心踏地抱定宗旨服刑满期，因而所长觉得再逼也没有用，这才死了心，决定对弘藏实行假释。

从这里可以得出一个教训，愿为青年读者指出。

我们在监狱里，——特别是在像现在日本那种大量保留着封建遗制的国家的监狱里，——平常被压得头也抬不起。可是，尽管处在头也抬不起的监狱里，假如无所求于人的话，还是挺得起腰杆来的。所长为了贪功，想使弘藏转变方向；在这一点上说来，他是有所求于弘藏的。至于弘藏，却抛弃了假释的希望，对于所长已毫无所求。因此，他对于那位掌握着刑务所内的绝对权力的所长，就能昂然相对而无所馁。实在，一个人无论处在任何环境之下，假如无所求于人，也就能真正挺起腰杆来。

就这样地，弘藏得泰然迎接 1935 年的元旦。这次的元旦，他也能够和大家一道到教诲堂去了。那天见到了弘藏的锅山贞亲，在自己的“感想录”里记下了这样一段话：

“本田前些年发表的没落宣言，起到了否定我们的转变方向宣言的作用，我到今天还对这事感觉不满。要是反对我们的话，更明目张胆地反对不好么？要放弃党派立场就放弃党派立场，应该在政治上表示出更鲜明的态度。像本田这样的人，采取这种曖昧的态度，不仅对他本人没有好处，同时对于劳动者以及知识青年也会起到很大的迷惑作用。一般说来，我们就应该排斥只顾自己在学术上的兴趣和自己的信念而不顾现实形势和现实情况，也就是不顾国民大众特别是勤劳大众的生活和斗争状况的一般学者的利己主义；特别是一旦根据自己学术上的信念、投身于政治活动、给与国内外以极大影响的人，专门举出一些个人的情况而宣言没落，他们的利己主义的害处就更大了。……我对本田，一直有这种看法。可是，我也不能否认，当我接触到他那个恬淡得如同老和尚一般的风采时，我的这种气愤的念头就消去了许多。

“亲密接触，对于人们的交情是有决定的重要性的。”

看到这段文字的人，也许以为当时本田和鍋山大概曾经促膝谈心了吧；其实，他们只是在元旦那天走进教诲堂和走出教诲堂的时候，互相稍稍点头示意而已。当鍋山关在市谷刑务所的未决监里的时候，弘藏对他也像对佐野那样，曾给写了多次信，还给送了书去；可是，双方见面，元旦那天却是第一次。

现在他仅仅见到弘藏一面，就写出“气愤的念头消去了许多”这样的话来，也未免显得太没有原则性了；但是，坐在牢里的人，一般谁都对假释存着某种程度的侥幸心，而弘藏当时却已半点也不存那种心思，因此在成千的犯人中间，他的外表自然予人以一种“恬淡如同老和尚”的印象了。

从此以后，弘藏的狱中生活在精神上是如何地轻松愉快，鍋山这段文字不期然而然地透出了个中消息。

假释的风声

听到假释的风声

弘藏自从来到图书室以后，完全抛弃了假释的指望，因此，从此以后他不再为些许小事而有所动心。可是有许多人却从常识上认为他不久就将被假释出去。内中还有那种人，掌握了一定的根据而把这事通知了他。

比方说，有这样一件事情。——这事发生在他到图书室后不久，隔壁屋子里的一个计算工深泽，看准图书室里只有弘藏一个人，径直走到了他的身边。

上面已经讲过，图书室的隔壁，有几个保管科的人和搞作业奖金以及其他计算的人，一共大约有七、八个犯人，摆下桌子，整天在那里工作。虽然由于工作关系，狱吏们经常在那里出出进进，却没有特定的看守监视。这样，自然就有许多违反所规的事情发生。

深泽走到弘藏身边，从怀里拿出一个小小的纸包，说：“给你这个。”

“什么呀？”

“打开看看吧。”

打开纸包一看，原来是个小包子。这东西明明不是刑务所里的货色，大概是私自从外面买来的。当时还摸不清楚刑务所里的情况、一切犯规的事情都不敢做的弘藏，虽则一向不肯拒绝别人对他的好意，那时却露出一副进退维谷的神色，顿时加以谢绝，说：“这个我不敢收受。”

本来打算让弘藏高兴一下的深澤，听了这话，似乎很窘，却还是说：“怕什么，吃吧。”（其实这样的事情，在老资格犯人中间是家常便饭，弘藏自己后来也常常做这类违反所规的事，只因当时他还是刚刚从单身牢房里开出来，胆子还不够大，所以才没敢吃那样的东西。）可是由于弘藏不假词色地坚决拒绝，深澤像是改变了主意，连忙把纸包重新揣进怀里去了。后来他还是轻轻地对弘藏说：

“先生不久就要放出去了，哪天释放虽则还说不准。八条子爵在去年年底大正天皇节那天已经‘假释’了，他的刑期还不过刚满三分之一哩。先生的刑期也已满三分之一了，所以早则这次纪元节，迟则天长节，准会‘假释’的。我干了多年的保管金钱工作，对于这种事情嗅觉最灵，多半是没有错的。”

“哪里，不会有这种事情的。”

弘藏马上就否定了他的话。他心想：“咱又没有像那位王公大人那样转变方向，情况完全不一样呀。”可是觉得对这个什么都不了解的人说这种话，也没有用，所以什么也没有说出口。当时，深澤一心以为弘藏不久就会释放出去，所以托了他下面这样一件事。

“先生，您要是出去了，请您带信给杉田博士，说深澤问候他老人家。请您告诉他，深澤说过这样的话：‘深澤现在完全成了一个基督教徒，正在努力做个真正的人，虽然不知道哪天能出狱，可是出狱以后一定前去问候。’”

深澤知道弘藏是有学位的。他一心以为既然都是博士，必然互相认识。

“哪个杉田博士呀？”

弘藏这样一问，他就解释说：“就是在帝国大学教法医学的杉田直树先生。我受审的时候受过他的莫大照顾。是位非常亲切的好人。”

原来杀人强盗犯深澤，因为当时負責鉴定工作的杉田对他說話很和气，所以心里非常感激。而事有凑巧，弘藏当年去欧洲留学的时候，曾和杉田直树同乘一条輪船，所以还記得他的姓名。因此就答应了深澤的請求，同深澤分手了。

在听到深澤那番話的时候，弘藏是漫不經心地扔在一边的；可是，那时他如果熟悉所里情况的話，就一定可以从这件事上推察出，所里已經內定不久就要呈請把他假释了。

这里面的道理是这样的。《監獄法施行細則》第一百七十三条规定：“在认为犯人有可以允許假释的情况时，典獄应以判决书和执行指揮书的副本以及行状录和历史材料为附件，呈报司法大臣。”在为某一犯人呈請假释的时候，所长必須作成当时的行状录以及历史調查书；里面还得写出該犯在所时获得的作业奖金的总数。所以，假如內定为某一犯人呈請假释的話，一定会命令保管金計算工写出某人的作业奖金的总数，因此在犯人之中，第一个能推測到这种內定的，就是保管金計算工。不用說，那本来是件必須严守秘密的事情。可是，对于一个犯人來說，释放乃是莫大的喜事。而把人家的喜信及早通知他本人，以便討好一番，也是人之常情。因此，保管金計算工在知道这事以后，总是候个机会，私下对那个人吐露个消息。不过，有的时候，由于本人听到这消息，得意忘形，不能独自藏在心里，而向別人說了出來，結果弄得預定的日子到来之前，风声传遍整个刑务所，于是在泄露秘密的罪名之下，本人的假释因而暫時延期的事情，也是有的。

由于这样的关系，保管金計算工的情报，一向在犯人中間很有权威；而当时弘藏却一点也不知道这种情况，所以把深澤的話随随便便地听了过去，一点也沒有放在心上。

可是事实上，却正如深澤所想像的那樣，关于弘藏的假释，早

在正月里，所长就和司法省联系过了。而且风声传到新聞記者的耳朵里，多少引起了街談巷議。看一看重子的日記，在1月10日項下，有着这样的記述：

“1月10日。雨。

“晚上，《都新聞》的記者来了，說什么法院內定在2月里释放先生，向我打听了許多事情，然后走了。据說消息是确实的；如果真是那样的話，倒叫人十分高兴哩。”

到2月里，又有这样的記述：

“2月4日。立春前夜。

“《朝日新聞》的記者門田来打听消息，說：‘据說日內就要出獄，还没有什么通知么？’”

因为所长提出了假释这一层，所以2月1日那天，戶澤检察官就到弘藏这里来实行視察。

那天傍晚，已是快要洗澡的时候，弘藏和图书室里的杂役夫立川、田村三个人，围了火鉢，边喝茶边聊起天来。这时立川从里面取出一个大紙袋。一看，里面装滿了茶褐色的大包子。这样的包子，弘藏那时还是第一次见到，原是刑务所里的伙房做出来发給完成任务百分之一百八十到二百的少数犯人，作为作业奖励的。立川平素和伙房头目有特殊关系，所以那天从伙房里把那袋东西偷偷拿了出來。（合法奖給的包子，必須在食堂或牢房里吃光，严禁帶到室外。）

不是过来人，万万难以想像；关在監獄里在飲食上很不自由的囚徒，一个个都非常貪饕，特别是由于平常日子里几乎吃不到一点糖分，所以像弘藏这样的爱吃甜食的人，见到了甜点心，犹如大旱之望云霓。而且现在是同伙的人聚在一块儿吃，絲毫沒有客气的必要。

一声“請吃呀”，递过来一个大包子（那包子比普通市面上所卖的大两三倍）；弘藏毫不躊躇地接下了，刚狼吞虎咽地吃了一半的时候，所长亲自推开了門，把戶澤检察官領了进来。

弘藏吃了一惊，赶忙把嘴里的东西一口咽下肚，把手里剩下的半个包子塞进棉袍的前胸里。由于犯人所穿的衣服，为了不让隱藏东西，做得既沒有口袋也沒有袖筒，所以像弘藏那种动作迟緩的人，遇到这样的紧要关头，簡直不知所措。他露出一脸惊惶的神色。可是，对方是个检察官，平常就狐假虎威地靠吓唬人过日子，所以看见弘藏发慌的样子，倒也並沒有觉得奇怪。至于把吃剩的犯规包子塞在胸口，任凭他是检察官，却連做梦也沒有想到。

經驗丰富的立川，从門里——門上鑲着玻璃——一眼看到所长的脸，馬上就觉察出来了。轉眼之間，他飞快地把一大袋包子，沏了茶的水壶以及茶杯等类，藏得无影无踪，另外又把我們坐的凳子搬走，把椅子搬到火鉢旁边，以极自然的态度巧妙地收拾了局面。一时之間連嘴里含着的包子都沒法摆布的弘藏，对于立川的干淨俐落的身手，佩服已极。

領路的所长随即出去了，立川和田村也推說洗澡時間已到，走了出去。伶俐的立川临走对戶澤說：

“洗澡是犯人最大的乐事，要是不打紧的話，还請早点結束談話，因为時間一过，今天的澡就洗不成了。”

机敏的立川，早就看出弘藏把吃剩的包子塞在胸口，正在沒法摆布，所以才这样出来解围的。立川虽然背着强盜杀人未遂的罪名，在教务主任面前却极为得宠，一手包办着教务科的工作；他对新来的教誨师所采取的态度，几乎叫人家弄不清楚究竟誰是犯人；一般犯人尽管把他恨得牙痒痒的，然而还是送給他一个“天皇陛下”的綽号。毕竟名不虛传，遇到这样的情况，对着检察官說出那

几句话来的他的机灵乖巧，换一个人是无法办到的。至于那个犯强奸杀人罪的田村，就完全和他相反，谁都喜欢他，可是谁都不怕他，真是世上少有的好好先生；然而他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他的犯罪，就是小心谨慎的结果），尽管监狱里的饭他已经吃了十几年，遇到这种情况，却一点也不抵用。

由于立川临走说了那两句话，户泽的谈话果真很快就结束了。他吩咐弘藏：好歹研究点什么，写出点东西来。

“那末我就研究佛教吧。马克思主义把宗教说成是民众的鸦片，这是您所知道的。就请允许我研究一下这个吧。”弘藏答道。

听了这话，户泽倒躊躇起来，说道：“让你在刑务所里写反宗教的文章，那也不妥当。”

“好歹是从肯定宗教的立场出发的。不过在什么时候得出怎样的结论，请您一概不要加以束缚。要是没有这样的前提条件，是无从搞什么‘研究’的。还有，参考书希望能让自由送进来；因为图书要是受到限制，就不好办。”弘藏随即这样加以解释，并且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对于假释已经完全死了心，丝毫也不预备赶快写出什么讨好检察官的东西，所以他才十分生硬地说出这样一番话来。他心想，尽管答应检察官写点什么，只要结论不受拘束，时间不受限制，也就没有什么关系。

户泽看到他那副样子，当时就觉得“照这个腔调，根本还谈不上什么假释。”于是连他也不怎样急于想让弘藏写东西了。当下他就同意了弘藏的一切要求。这时，弘藏还是毫不放松地对他说：“请您对所长说明白，已经决定叫本田写东西了，希望给以充分的时间。顺便再请您说一下，希望图书能让自由送进来。”他丝毫都没有想要给检察官留个好印象，只是打算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巩固自己现在所已获得的自由而已。因为他觉得，这样一来，今后就

可以借口检察官命令他写东西，整天什么事也不做，光看看书，而且还可以让外面自由送书进来。自从来到图书室以后，虽則已經在糊里糊涂之中获得了这样的自由，可是这下有检察官作档箭牌，尽管整天閑着，也絲毫不用顾虑任何人了。

和戶澤的会面，馬上就結束了，虽則这位检察官是特地为弘藏而来的。

戶澤随后还到所长室去了一趟，对所长說，他本人反对在这次紀元节假释本田，然后走了。弘藏托他給所长說的話，他根本一个字也沒有提。

戶澤走后，只剩下弘藏一个人了，可是他已經不再想吃藏在胸口的那半个包子。他悄悄地把它扔进废紙簍里，急急忙忙走向浴室。已經洗完了澡、准备离开浴室的立川，看到了他，就招呼說：“已經完了么？”

弘藏兴冲冲地笑着回答：“托你的福，很快就完了。”說完就跳进了浴池。

批准写自传

紀元节到了。到了大节日，尤其是紀元节、天长节和明治节这三个节日，通常总有若干犯人成批假释，所以大多数犯人见了面，就专门互相談論这件事情；至于弘藏，却連做梦也沒有想到上面正在研究他的假释問題，所以漫不經心地迎接了紀元节，漫不經心地度过了这个节日。

这时他开始写起和歌来了。虽說哪首歌儿都写得很糟，可是为了証明他从这时开始产生了写和歌的冲动，不妨抄录几首在这里。

尽管是寂寞难耐的牢狱，时来运转，现在又是春天了。

一年像梦那般过去了，荒川堤上现在草色又将新。

这两首和歌，是回想起去年春天重子寄来的那首“探望了牢里的良人回去，荒川堤上草色又新了”而写的。弘藏自己都觉得，重子那首歌比他的两首强。

木瓜花儿插在玻璃水瓶里时，连监狱里也掩进了春天的踪迹

玻璃水瓶里已经插了薺菜花，今年的春天也快过去了吧。

教务室前面的院子里，有棵很大的木瓜树，开着满树的大红花。弘藏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折了来，把图书室里那个扔在一边的玻璃水瓶洗得干干净净，把折来的花儿插在里面，放在自己桌上赏玩。走过教务室前那个院子，折向西边，有一栋病房，病房前后全都是田地。一到春天，田里的野草中间，薺菜开着米粒大小的白花。弘藏从田里把它拔来，洗净根上的泥土，养在盛着清水的玻璃水瓶里。弘藏还自己掏钱买了一盆叫做太白冠的兰花。本来，在牢房里放盆栽，不是等级最高的犯人，是不许可的；可是弘藏去年冬天就被批准买棉毛衫又买盆栽了。当时他因为早就接到他弟弟武雄的来信，谈起家乡向山的兰花，他感到不胜怀念，所以赶快拿出两块钱买了一盆兰花。花两块钱买这种东西，这在他还是生平第一次；可是监狱里能买到的盆栽，一般都要一块钱以上。他买的那盆东西，盆里插有小小的白标签，上面写着“太白冠”三字。据说一到春天，就开幽香扑鼻的淡紫色的花。他是多么迫不及待地等着它开花呀！哪里知道直到他出狱为止，这盆兰花始终没有开过一朵花。

4月15日，他开始写起诗来了。

白云鬢鬚的春天，
獨自呆在牢房里，
似睡非睡地梦想着
落花繽紛的故鄉。

反歌：①

靠在牢房窗口怀念遠人，
想着那万里長空的春天！

他除了写这样的詩歌之外，又想試用小說体裁写獄中記。为了使这件事合法化，4月20日（他已故祖母第十三个忌辰的第二天）那天，他提出了下面这样的申請书：

“这儿我所要写的文章《宗教（佛教）和馬克思主义》，因为最后的結論还没有确定，所以无法把它写成一篇完整的論文，因此动笔的时机迟迟不容易到来。从而，我想暂时不采取論文的形式，而采取‘創作小說’的形式，——虽則我以前还没有尝试过，——非常具体地而且赤裸裸地把我在刑务所里对宗教的看法所起的变化，如实地写出来，用以塞責。（尽管我的想法还在动摇不定，可是要是如实地写的话，任何时候都可以写；即使今天，都可以动起笔来。固然，‘創作小說’体裁的文章，我以前从来没有写过，究竟能否順利地写下去，自己都没有把握。）但是，如果好不容易辛辛苦苦地把它写了出来，将来出獄时却不能公开发表，在我就无异于全部抛弃了出獄后最貴重的材料，这是非常痛苦的。正如以前所提出的那样，出獄以后，我不仅不再写談政治的文章或宣传馬克思主义的文章，連純粹的学术研究也决心不再搞；所以，只要这个决心不改变，我想出獄后自己的文笔活动，多半只会局限于文学的范围内。这会儿我正打算采取創作小說体裁写自传。因此，在牢獄里的思想变化，对于我来说，自然是最宝贵的材料。为此，迫切希望事先批准下开一节。敬呈。

計开：

本人准备在本刑务所受徒刑的期間中执笔的創作小說体的文章《宗教和

① 反歌是日本詩歌中附在長歌后面的短歌，用来复叙、概括或补充長歌的意思。
——譯者

馬克思主义(一个馬克思主义学者在刑务所那种特殊环境下的思想变化的具体个人經驗的記錄)»,将来出獄以后,(1)經過相当期間,(2)加以若干增补、删节、修改等,从而(3)不作为本刑务所內所写的文字,可以公开发表。

所长大人

1935年4月20日

753号 本田弘藏”

那位谷內所长,也許因为是个大资产家的关系吧,他的作风并不像一般小公務員那样小心翼翼。因此,对于弘藏这样一个申請,滿不在乎地批准了(要是后任几位所长,这恐怕是万难办到的)。他在弘藏所提出的申請书后面空白的地方,亲笔批了“自传稿件,照准”、“宗教和馬克思的創作小說稿件,照准”(那时他把“馬克思主义”写作了“馬克思”),又在两条批語下面分別盖了“谷內”的图章,然后发还给弘藏。

这样一来,弘藏就可以公然在刑务所里写起小說来了。而且,監獄里写的东西,在出獄的时候,本来要受检閱,有时还可能被沒收;可是,他却不仅做到事先防止了这种危险,还爭取到帶出獄外的稿件可以公开发表。

本来弘藏就想,既然下定决心服刑滿期后再出獄,此后尽可以优游岁月,干些对自己有意义的工作;这下果然如了他的願,大体上为他的原定計劃完成了准备。这样看来,弘藏这个人,表面上似乎一味憨直,其实有些地方却是很狡猾呢。再則,从他对所长提出的那个申請书看来,他确实如同重子所說,十分善于摆大道理。他巧妙地把大道理摆了一番,結果竟在不知不觉中間,把檢察官原来叫他写的稿子,偷換作练习写小說了。

后来,他在監獄里把关在市谷刑务所那段期間的事情全部用小說体裁写了出来。中心題目本来應該是宗教和馬克思主义的关系,可是他所写出来的东西,只是在某一个地方提了一句“求神拜

佛的心情——所謂宗教心——自始至終都沒有產生過”，此外全不過是獄中生活的回顧了。不管怎樣，在日本那樣的嚴厲的監牢里，他居然能用小說體裁來寫獄中記，這是有着上面所說的來龍去脈的。

前面曾說，毫不躊躇地答應了弘藏請求的所長，不像小心翼翼的小公務員；其實這位所長在4月初就已經把弘藏的假釋呈報司法省了。他在研究天長節假釋的候補人名單的時候，也把弘藏列入了。由於他認為弘藏大概不久就要釋放出去，才順水推舟、輕而易舉地答應了弘藏的請求的。

管弘藏那個牢房的主任看守，知道弘藏的假釋的呈報手續已經辦妥，很想早點通知他一聲。可是，這種事情是決不允許事先洩露秘密的，所以他只好托稱是做夢。

那是4月10日以後的某一天，弘藏剛從圖書室回到牢房里，平常板着臉孔不說一句笑話、無事從不來牢房的主任看守，那天居然打開弘藏的房門，說：“昨夜我夢見你假釋出獄了呀。”因為那話來得突然，弘藏最初不懂得他說的是什麼，詢問後才弄明白，當時弘藏只笑笑說：“是麼？”卻還是猜不透他那個啞謎。自然，更沒有把那句話放在心上。

這樣又過了幾天，到了4月20日，那個看守又來到弘藏牢房邊，說道：“這下可真就在眼前咧。”他本來就是個不大開口的人，那天又只說了這樣一句話，可是這一次弘藏從他那句話里，卻領會到前幾天他所說的做夢的話，是暗示着假釋；不過仍然認為那是主任看守搞錯了，幾乎完全沒有介意。這是因為他既不那麼想馬上出去，也並不那麼認為自己有可能馬上出去。

上面所說的這件事情，十足可以證明他是怎樣地完全死去了假釋那條心（當然，不是過來人，決不會理解到這一層）。他在牢里

所作的《人是忍受不了絕望的动物》的一首詩，是这样說的：

我看到某部詩集里有这样的句子：

“犹如囚人在无可比拟的絕望中的叹息。”

想对作者說：

凡是人，誰都不能在絕望中生存，

即使在別人看来是那么可怜无望的囚人，

他灵魂里仍然始終不可思議地怀着希望。

詩人呀，我在这重罪監獄里已經呆了两年，根据我在这里的見聞和經驗，

向你証明人是忍受不了絕望的动物。

判了十五年、二十年徒刑的人，

占这里犯人的一大半，

他們沒有一个不盼望着出獄的日子。

年紀过了六、七十岁的老人也罷，无期徒刑的累犯者也罷，

他們沒有一个打算死在牢里，

誰都盼望着那虛无飄渺的假釋。

要是連这样的希望都喪失了的話，

那末不管这里的戒备有多么严重，

总会自縊身死(每年总有一两个)。

詩人呀，可是你还唱道：

“这个看来似乎光輝灿烂的世界

不过是个黑暗的牢獄。”

这是事实，但是我要輕輕地說，

我不仅盼望着走出这鋼筋混凝土牢獄的那一天，

还盼望着走出人生的牢獄的那一天哩。

天快亮啦，再等候一会儿吧，

自杀嫌太早啦，

天快亮啦，太阳不久就要升起来啦。

这里所說的詩人，指的是在瀨戶內海跳海自杀的生田春月；弘藏
在牢里讀了他的詩集，觉得他的跳海自杀，乃是极其自然的結

果。

閑話少說。总之，所有的犯人都以这首詩里所說的那种心情在过着他們的牢獄生活，所以，假释的念头，可以說一分钟都沒有离开他們的脑子。特别是那些服役到一定年限，按說有希望得到假释的那类人，一遇到节日，都伸长了头頸，焦急地等待着，总以为这次該輪到自已了。这样的時候，只要有一点点儿风吹草动，尽管并不是什么对自己有利的事实，也总是馬上把它解释作对自己有利，頓时产生熾烈的妄想，认为自己此番准能出獄，匆匆忙忙地开始作着显而易见的内心准备。在旁观者看来，这实在滑稽，而且奇怪他們怎么会把那样的材料信以为真；不过，出这样的洋相，甚至相当有头脑的人都是难于避免的。一般情况尽管是这样，当时弘藏两次听到管他那个牢房的主任看守对他說那样露骨的話，居然絲毫都不介意，这就証明他已經死心踏地不再指望假释，实在是件令人感到有兴趣的事。——有一个时候，他曾經一心以为自己不久即可假释，可是，一旦下定决心非抛弃这种荒謬的妄想不可，就仿佛能乐^① 演員換掉面具那样，輕而易举地把那种念头抛到九霄云外了。善于像这样翻然改悔，乃是他的特征之一，因此，每当他看到执拗很深的人，就不禁自己佩服起自己来了。

妻对服役的杞忧

4月24日，重子来看弘藏。她因为看到最近情况总算安定了下来，就利用这个机会到京都去了一次，探望了好久不见的大女儿一家，昨天才回来。

① 能乐(简称能)是日本的一种古典乐剧，演員出場，都戴面具，謂之能面。——譯者

吉田山的山脚下，母女俩这时正在絮絮话衷肠，边吃着饭吧。

弘藏的诗稿里留有这样一首短歌，就是这个缘故。也许是当他吃晚饭的时候，一边坐在牢房的便桶上独自吃着麦饭，一边念念不忘地想到了京都的重子和喜志子而写的。歌虽十分无聊，可是，对弘藏说来，却包含着当时值得纪念的事，所以毕竟使人感到亲切。

再看重子的日记，那天是这样记着：“去小菅刑务所。他精神饱满，面色也好。据他说，他在狱中的日常生活毫无变化。今天管接见的仍然是往常那位老看守部长，他没有在身旁监视。”这是因为当局认为弘藏不久即可释放，所以那天也准许他们单独会面，不派人在场监视。（那一天以后，几乎就不再有无人在场监视的接见了。）

重子的日记里还写着：“据他说，主任看守对他说过‘没有几天了呀’那样的话。于是我就把外边的一般情况以及堀江、大塚等几位和博弟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他，并且劝他目前还是安安静静耐着性子呆下去。……”

本来，在弘藏说来，他不过是因为看到恰好没有人在场监视，于是轻描淡写地提了一下主任看守讲过的话；哪里知道多心的重子，却担心弘藏还在希望早日出狱，就借题发挥，谈了许许多多情况。所谓堀江的情况，是指弘藏的朋友堀江邑一新近也遭逮捕。所谓大塚是指大塚金之助，他虽则落到一个缓刑，可是发表文章却受到极大的限制。所谓博弟的情况，是指她最近在京都见过面的她弟弟末川博的事。那个时候，他牵连在“瀧川问题”^①里，辞去了

① 1933年4月，日本文部省认为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部教授瀧川幸辰在他的著作《刑法读本》中表现着自由主义思想，不合该省当局的要求，下令把瀧川停职。于是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部教授、副教授三十九人，全体辞职，表示抗议当局干涉大学自治。抗

京都帝国大学教授的职务，过着半失业的生活。

翻看一下弘藏的日記，里面記着那天重子預先声明“本来我不配說这些話，却还是願意尽情說一說”，然后說出的一番話：

“凡是設身处地为你着想的人都这样想：这个时候最好不要急于出獄。由于美浓部先生^①的宪法論在社会上引起了軒然大波，連京都帝大教宪法的一位年輕教授渡边先生——您大概不認識他——这次都辞职了，留下来的位置，据說要由东北帝国大学的佐藤丑次郎重新回到京都帝大来担任。还有，辞去了京都帝大教授而呆在立命館大学里的佐佐木先生，据說最后連立命館大学的教职也辞去了。整个社会既然是这样的形势，您即使现在馬上出了獄，也是任何意见都不能自由发表；好在目前您的身体还好，所以还是安心地呆在牢里，倒是上策。大家的意见都是这样的。”

重子說了上面这番話以后，还补充說：“您像这样地坐在牢里，大家都表同情；要是很快就出獄的話，人家倒要說，怎么已經出獄了呢。我知道您願意出来，可是，还是請您熬着点儿吧。”

其实那时弘藏早就抱着重子所要求的那样的想法，所以他十分順从地接受了她的劝告。他回答說：

“行，行，我全明白。事实上我虽非常想出去，可是，决不預备勉强而为，你放心吧。这个我是有把握的。”

事实上，正像他早就和重子說过的那样，他已經确定方針，准备受够了法律对他的制裁，然后出獄；这并非对重子口头敷衍，而是早就下定了的决心；所以听到她那番意见，不仅沒有一点儿抵

議斗争波及日本全国各大学，全国各大学学生卷起了拥护学术自由的激烈学生运动。

——譯者

^① 美浓部达吉(1873—1948)是日本宪法学者，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他因为主张“天皇机关說”，1935年以“不敬罪”被提起公诉。——譯者

触，而且不觉得有什么新鲜，暗中反而有些怪她不該又重新提起这件事。他所不禁感到有些出乎意外的，只是那个佐藤丑次郎，原来是政治学教授，十几年以前，从京都帝国大学調去东北帝国大学（由于他年紀不算大，却早已腐朽，所以他离开京都帝国大学，当时沒有一个人觉得可惜），现在已經快到退休的年齡；这样一位并非专门搞宪法的酒量宏大的老教授，现在这个时候回到原来的大学，重新独占京都帝大首屈一指的酒豪的令名，使学术界——不仅經濟学界，还有法学界——一下子倒退了十几年。他觉得，社会空气要是这样的话，那也許比監獄里的空气还要憋人。

由于旁边沒有人監視，他趁此机会，詳詳細細地談了一下自己现在做的工作。关于这一点，重子的日記里这样写着：

“据說现在申請了搞宗教和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理論研究工作，正在讀这方面的书。牢里的作业几乎一点都不做。他还說，现在在外面正是搞宗教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要是他采取奖励宗教的态度，影响一定不小，这一层他是充分警惕着，决不会做出否定过去立場的事情来，叫我放心。……由于这样的关系，今天只来得及約略地說了一些京都的情况。”

不知不觉中間，三十分钟的规定時間已到，京都外孙們的事情，就沒有時間細談了。

第二天（23日）是星期六。弘藏的日記，那天这样記着：

“估計在4月3日神武天皇节边大半将开花的窗外的櫻花，快到天长节的今天；已經完全綠叶成蔭了。工厂那边远远地像白云一样的一大片櫻花，现在也郁郁蒼蒼地都成了綠叶了。”

这是白天弘藏在图书室里所看到的景致。这个屋子的北窗下，有两棵瘦弱的櫻花树，整个冬天，寂寞地挺立在北风中，可是一到春天，却也开出犹如营养不良的女孩儿那样的单薄的花来，惹得

雀儿經常来啄它；而现在，花儿也都落尽了。工厂那边，沿着水沟的堤上，种着許多老櫻。这个刑务所的地基，本来是江川府的遺址，从前在封建幕府时代，地方諸侯来到东京覲见將軍时，就把那里当作寄寓的处所。那一带地方的年代久远的櫻花树，都是那个时候的紀念品。虽然古老的树干遭到虫蛀，日见枯萎，尽管如此，弘藏坐牢的那几年，每到4月里，花儿依然开得很茂盛。

弘藏在监牢里曾經五次看到了櫻花。

1933年的春天，在丰多摩刑务所病房窗下远远地看到了千瓣櫻。那櫻花树生长在北边的水泥高墙外面，枝干極杈，盛开的花儿簡直压得树枝都直往下垂，真是如錦如綉，烂漫已极。那时过着病房生活的弘藏，看到这个景致，心里每天在轉念，不知那櫻花是誰家院子里的，等到出獄的那天，一定馬上繞到高墙外面去一趟，看那里究竟是誰家的邸宅。可是，四年多以后，尽管恢复了自由，他却沒有能馬上就到那里去。回家之后过了一年多，他才想了起来，独自拿着一条手杖，去到那不熟悉的地方。关在护送車里第一次通过的正門前的广场，在他脑子里本来就沒有留下什么印象，可是車子开进正門，在办公楼西側獄舍門口停車的地方，他的印象却很深。从正門张望一下，那里还是从前那个老样子。还清楚地記得，当时在那里下車的时候，汽車司机說：“本田先生，香烟給了我吧。”他就随手把一盒蝙蝠牌香烟給了司机。后来他又轉到正門左边察看。他最初被关进的牢房，應該恰好就在那个方位，可是因为聳立着一堵水泥高墙，所以站立在高墙旁边，只能看到旧式牢房的屋頂和开在紅砖墙上的二楼小窗，絲毫也看不到弘藏自己所呆的牢房的窗子，以及窗外那个运动場的模样。沿着围墙走去，不多远就是个拐弯儿，那里树了一块“禁止通行”的牌子，西面里手一带是刑务所的附属庄稼地。他重新回到正門，这下又繞到正門右边

去察看。那儿是通向练馮^①去的公路，路西仍然高高地聳立着水泥围墙，路东全是刑务所职员们的宿舍。他一直循着那条公路沿着高墙走去，终于走到刑务所的北墙下。照说那个地点，应该有着五年前他从病房窗口所看到的大樱花树。哪里知道现在来到这里一看，却依然是刑务所的附属农场，苍苍茫茫地只是一片草木凋零的庄稼地，除此而外，所看得到的就是“禁止通行”的木牌，以及积肥小棚。至于树，连一棵也没有，不用说弘藏早先所想像的豪华的邸宅，就是以前他从刑务所的高墙里所看到的大樱花树，也连个影子都没有，看来是在什么时候被连根砍去了。——不过这是以后的事情了。

1934年春天，弘藏已经关进小菅刑务所的单身牢房，从那里看到了刑务所工厂区盛开的樱花。不过，这一年春天，只是坐在便桶上，伸长了头颈，隔着一重铁窗远远地看着工厂屋顶上露出的盛开的樱花而已。

1935、1936、1937这三年中间，他却从图书室的窗口望见了那些樱花。最后那年，还亲手折了来——因为那时他是教务科的杂役夫——养在教诲堂的花坛上。他每次看到樱花，都在他脑子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而现在，他是第一次从图书室看到了樱花。

在同一天的日记里，还写着：“把玻璃水瓶里养了一年、过了冬的四条朝鲜鲫鱼，释放到院中花岗石小池里。”

那几条小鱼，是图书室里的同事田村送给他的。田村桌子上经常放着一个玻璃瓶，有一次弘藏向瓶里瞧瞧，看见让青苔弄得阴翳不清的水里，有几个黑黝黝的东西。人一靠近，那黑黝黝的东西就像箭一般蹿到瓶底卵石下面躲了起来。

① 地名，在东京西北部。——译者

弘藏就問道：“這是什麼？”

田村說：“這是朝鮮鯽魚。打掃院外的清潔夫從荒川里捉來的。據說是朝鮮傳來的種。這東西的生命力可強啦，就這樣養在瓶子里，整年不給一點東西吃，放着不管，還這樣活潑哩。你瞧！”他一面說着，一面搖動那瓶兒給弘藏看。

弘藏聽到他的話，一下子想起了朝鮮族的工人。聯想到當了礦工什么的而被殘酷地剝削着，體力頑強無比而流離失所的朝鮮人，就不忍心讓這幾條小魚留在玻璃瓶里了。因此他就說：“既然已經讓它們過了一年監禁生活，也就可以了，莫如釋放了吧。把它們送給了我吧。”這樣，把那魚討了來。

弘藏還開玩笑說：“不過雖說釋放，大家都處在犯人的地位，也隻算假釋罷了。”於是就把那四條朝鮮鯽魚放到教務室前院中的花崗石小池里去了。小池邊上有一塊刻着“江川府遺迹”字樣的石碑，石碑旁邊有一口讓砂土填沒了的古井，周圍長滿了棠棣花之類。那幾條朝鮮鯽魚一放進池子，在水里就像箭一樣地游着，轉眼之間就躲進萍蓬草的葉子底下，不見了。

天長節假釋的風聲

4月28日是天長節的前一天，那天雖則是星期日，可是因為不是第三個星期日，所以仍然得工作而不休假。那天一清早就是陰天。從大前天起，工作服的棉上衣已經換成夾上衣了；而28日的早晨，牢房里所穿的長衣也換成夾的了。這次弘藏所領到的夾衣，不是人家穿舊了的，都是新的。那是因為作為一個犯人，他的等級已經升到第一級了。他因為根本沒有想到明天天長節假釋，所以，領到了未經穿過的新衣裳，心里喜歡得很。新發下的淺蔥色

獄衣，虽然由于长期堆在仓库里而带点霉味，但是仍然保留着染料的气味，给人以新鲜的感觉。

吃午饭的时候，弘藏照常从图书室回到自己那个牢房里来吃饭。饭刚刚吃完，管他那个牢房的看守就来和他攀谈。最初不明白那看守说的是什么，仔细一问，才知道他是来告诉弘藏明天就可以出狱的。可是，弘藏却完全没有想到这回事，所以立即问道：“是真的么？不会有那样的事情吧。我自己一点也没有想到那样的事情哩。”

看守一口肯定了，而且说：“不管你自己怎样想，我这里是掌握着确切根据的。……你也够辛苦了，幸好没有生什么病。而且经常有许多信寄来，家属也时常来探望，总算是幸福。”

说这话的看守是立在走廊里，弘藏是立在牢房的门里；当弘藏听到看守低沉但清晰的这几句话时，眼泪立刻涌了上来。那是因为看守提到“家属”这两个字的缘故。弘藏有个老毛病，只要稍稍动一下感情，他浑身就会发抖；现在他站立在牢房门里，自己就觉得身体有些发抖。他把眼光停在看守的露出了白白的大脚指的蓝布袜子上（前面曾经讲过，有的看守穿了制服，佩了短剑，却在脚上穿着布袜，趿着日本式草鞋），一声不响地、入神地听着对方的说话。

看守接着又说：“凡事都有个规矩；尽管你的处境值得同情，可是以我的力量，却爱莫能助。也许有的地方使你不满，请你不要见怪。……我今天马上就要下班回家了，明天是休假，我不来，所以我们不能再见面了，因此就想来跟你说个话儿。……请保重身体，但愿你今后长命百岁。”

尽管看守的话说得那样牢靠，弘藏当时还是半信半疑的，说不出“多蒙您长期特别照顾，感谢您的盛情”那样的应酬话来，只向对

方鞠了一躬，說声“謝謝您的好意”，就此分別了。

后来他随即走出牢房，回到图书室去。就好比串通了似地，半路上另外一个犯人拦住了他。这个犯人是獄吏們的食堂的一个炊事夫，臂上佩带着“独步”臂章。由于工作的关系，他和監獄里的一些職員都搞得很好，自然也就能够迅速觉察出所內的秘密。他一眼看到弘藏，就說：“恭喜恭喜，明天就要放出去啦。”

弘藏心想：“这样看来，事情倒像是真的哩。”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答說：“哪里，不会有这种事情吧。”一边說着一边就要走向前去。这时对方又把弘藏叫住，用下巴指向楼上的图书室那边，說道：“明天释放的是先生和保管科的杉本两位。警卫科的档案簿已經被調走了。事情是确实可靠的。”

弘藏又回答了一句“不会有这种事情”，就急急忙忙回到图书室。

走进图书室，坐到椅子上，弘藏仿佛刚睡醒一般，心里轉念：“这样看来，說不定明天真地释放哩。”

可是，尽管这样，他还是糊里糊涂，像被狐狸精纏住了一般，不能清楚地判断这件事情的真假。尤其是因为他长期关在单身牢房里，来到图书室还不久，所以完全不了解所里的情况。因此，对于这类流言有多大可靠性，沒有法子估計。

他坐在椅子上想了一陣子，終于下个决心，把刚才遇到的事情对同室的立川简单地讲了一讲。关于主任看守所說的那些話，因为顾虑到会牵累于人，所以只說是受到了明日可望出獄的暗示，詳情只字未提。

立川这个人，往常犹如口头禅那般地說，但願弘藏能早点出獄，要是弘藏出獄了，他自己也安心了。弘藏平常虽則极容易輕信人家說的話，却也奇怪一个陌生的人，怎么会那样为他的事情操

心，所以他听到立川說那种夸张的話，心里就很不愉快。可是，立川却經常照顾弘藏。再加他对所內的情况以及刑务所的各种規則都非常熟悉，所以弘藏想听听他的意见。

哪里知道一反弘藏的預期，立川听到弘藏的話，脸上立刻露出不高兴的神色，爱理不理的。弘藏总以为他会說既然主任看守說了那样的話，大概不会錯；岂知他却沒有这样說。同时，他也不說那类話靠不住。弘藏特地找他商量，哪里知道結果完全不得要领，弄得沒有了主意。

平常有說有笑的他，今天一声不响地和弘藏面面相对，这使弘藏感到非常彘扭。立川只是吞吞吐吐地說了下面这样几句话：

“能出去的話，自然是出去的好。”

“我虽則明明知道誰要假释，却一个字都沒有泄露过消息。这当然显得我太冷淡了。”

立川每天有一半時間做着和一般犯人完全不同的特殊的工作，就仿佛是教务主任的秘书那样，所以有机会最早地知道种种机密，而且他也因此而自命不凡，所以才說出上面那样的話来。再加，他又是大名鼎鼎的“天皇陛下”，他所不知道的东西，要是人家先知道了，或者对方从旁人那里获得了什么恩惠、方便或情报，他就会觉得非常不愉快。由于他是这样一个脾气，而明天天长节弘藏将假释这样一个机密消息，不是从他嘴里透露出来，他就觉得大大地損害了他的威信。所以他才无中生有地說，明天的事情我知道得一清二楚，只是不对你讲罢了。

但是，弘藏从对方的态度上却清楚地觉察到，他其实什么都不知道。而且事实也确是如此。因为同在图书室里当杂役夫的中島，最近由于违犯所规，革掉了“独步”的臂章，調到印刷厂里去做工了。他在被盘問的时候，說出违犯所规的人不止他一个，立川

违犯得更厉害，把立川违犯所规的事实一五一十全都和盘托出了。可是，因为立川毕竟是教务主任面前的紅人，沒有为此而受罰，但是許多重要工作都不让他做了，呈报假释的文件，也不像以前那样經過他的手了，所以明天天长节誰将假释出去，他完全不知道。

弘藏因为立川尽說些莫名其妙的話，所以沒法跟他談下去。沉默老是繼續着。过了一会儿，立川眼睛望着弘藏买来的一大堆书，就像自顾自那般地說道：“本田先生仿佛專門为了买书而进来的哩。”

弘藏心里想，要是果真出獄、要同他分別的話，很應該同他暢談一番，可是等来等去，对方老像憋着一肚皮气的样子，弘藏漸漸不愉快起来了。只管面对面地干坐着也不是事，最后弘藏想，至少該把結論弄个明白，原想問“那类話能相信么？”結果改問了这样一句：“那些人能知道实际情况么？”

这时立川回答說：“反正是什么地方泄露出来的。”两个人就沒有再談下去。

弘藏离开立川，坐到自己的桌子边，繼續抄录上午所抄的那本官书《不惑的人生观》。在这心神不定的时候，做做这种机械的工作，正好消磨時間。

不一会儿，已經是四点钟了。白天的工作到此宣告結束，随后就要和图书室里的杂役夫以及隔壁保管科的人一道去洗澡了。就在去浴室的路上，前些时候被謠传为假释候补人之一的保管科的杉本，輕輕地对弘藏說：“事情不一定靠得住，不过据說先生和我明天要假释。据說档案簿正由各該部門审閱中。刚才就想等个机会告訴你的。”

杉本从前曾經在熱鬧的銀座地区开过第一流的洋貨店，因为犯了放火罪而长期在这小菅刑务所受着徒刑；他根据长时期来的

經驗，很知道这种风声沒有絕對的可靠性。所以，他一开始就說“事情不一定靠得住”，可是，这句话並沒有引起弘藏充分注意。

洗完澡回来，单独一个人呆在牢房里的时候，弘藏开始觉得明天的释放十之八九是靠得住的了。

白做了一場假释的梦

不久就吃晚飯了。平常日子里吃得光光的飯，弘藏今天觉得一点也不香，所以剩下了一些。由于他有恃无恐，心想今后可以不必再狼吞虎咽地吃这种东西，大可改吃些富于营养的东西了，于是那麦飯的滋味就立即似乎減去了一半。

轉眼之間，就搖八点五十分的就寝鈴了。他脫掉窄袖的上衣，叠起褲衩，这时心里又轉念：这种东西也許今生今世不会再穿了，可是由于事情還沒准儿，所以还是心猿意馬。他躺在床上，开始想：“明天要是真地出獄，准会受到新聞記者的包围，今天夜里非要想好如何应付不可。”但是奇怪得很，想来想去，想不出个名堂。

無論呆多久，还是睡不着。这下又一再想到带出去的东西。可是，这里穿的吃的以及夜里盖的垫的，全是公家发的东西；能带出去的私人的东西，除了相当数量的书籍以外，仅仅只有批准了自費购买的手紙、肥皂、牙粉和紙笔之类而已。这些东西都现成地放在牢房里的擱板上，再說这类东西本来就无足輕重，可是，就仿佛那是眼前最重要的問題一般，脑子里老是在反复考虑着究竟把那些用賸的牙粉和手紙扔在这里呢，还是当做紀念品带回家，犹如数学的三百难题，怎么都解决不了。这問題要是不解决的話，脑子就不得安息，电灯光老是当头照着，怎么也睡不着；左思右想，終究打不定主意，脑子永远不得安息。

“想心事想得睡不着觉，被捕以来就只一次，那是来到这小营刑务所刑期满了三分之一的时候，最后决心不再指望假释的前夜。不过，如果獄中生活真地就此結束的話，今天夜里整夜不睡，也毫无关系。也許不睡更妙些。”

直到作出这样的决心，他才入睡了。

但是刚刚入睡，又复醒来。那时天已經亮了。他心里轉念最后的一个早晨终于到来了，这时听到通过鉄管子的水在作响。弘藏跳起身来，照往常那样用冷水擦了身体，过一会儿，就吹起床喇叭了。

开始发早飯了。

要是释放的話，不久就該来通知了。昨天他就打听好，向例是在教誨堂举行释放仪式之前，先通知本人。时间不会有多久了。他心里一边这样想，一边为了留个紀念，开始在“感想录”的空白部分給过去在里面寂寞地度过了二十个月的那間牢房作起速写来。后来他又想，要是情况許可的話，不妨給立川留下这样一封信：“多謝过去几个月里你对我的厚意，盼望我們两人在獄外重新会面的那一天早日到来。”并且附上这样一首短歌：“多奇怪呀，居然恋恋不舍地回头看那即将离去的牢房的窗口！”一起放在立川的抽屜里。因为大部分私人所有的书籍都放在图书室里，所以假如果真出獄的話，反正非去图书室收拾不可，今天是假日，立川不会在那里，是的，已經见不到他了，希望能趁監視的人不注意的时候，給他留下这样一封信才好。这样想着，他把信的内容都打好腹稿。

一切都准备好了。可是，伸长了头頸在等候着的弘藏的牢房門口，却听不到皮鞋声音近前来。

不久，看守大声喊叫：“教誨！”四面八方只听到开牢房門的声音，住在一楼、二楼、三楼的大房間和单身房里的人們，身上就穿着

那件窄袖的寝衣，排好了队，嘈嘈杂杂地低声讲着话，全都到教诲堂去了。留下的除精神失常者而外，就是关在三楼二舍以及一楼三舍里的思想犯，和正在受惩罚的人。

大家都出去以后的牢房里，静得鸦雀无声。

弘藏独自思忖着：释放的通知当真只限于举行教诲以前吗？不见得是那样吧？昨天再问得清楚些就好了；看来不一定是那样。尽管他这样想着，可是心里又是烦躁，又是不安，又是不快，真有一种无法形容、无法诉说的滋味。

一会儿，教诲完毕了，听到大家又都回到牢房里来。

不久弘藏的牢房门打开了，他愣了一下。可是，那是为了让他去教诲堂而打开的。因为当时即使是严格单独看管的犯人，那牵连在五·一五事件里的全部十几个人，以及左翼思想犯人中极少数几个受到特别对待的人（例如佐野、锅山等），每逢大节日，还是作为第二批，让他们去教诲堂（后来所长调动，对待的办法也变更了）。弘藏那时已经解除了严格单独看管，白天可以和别的犯人呆在一起随便谈天，既然处在这样的境况之下，他自然没有必要再受那种特别对待；只是因为所里的事情缺乏统一，所以还是按照老规矩，遇着假日，把他也和一般犯人隔离开。

有限的几个人坐在广大的教诲堂的前排凳子上，合唱了国歌，三呼天皇陛下万岁，最后由教务主任作了简短的训话，仪式就完毕了。

弘藏回到自己的牢房里，等候着他所认为一定会来的通知。可是，等来等去，音信毫无，而时间却毫不客气地过去。今天是节日，真知子也有一天休假，她一定从她所服务的那个医院里回到了家中；要是不能早点放出去的话，和真知子谈话的时间也就越来越短了。弘藏这样一想，心里真是着急。可是，笨重的牢房门始终下

了鎖，誰都不來開。

樓下响起兵地一聲，他的心臟抽搐了一下。他覺得就像睡在床上的垂死的重病人聽到了不吉利的鳥聲一般。那是炊事夫們挑來了湯和菜的木桶，放下担子的时候，随手把扁担扔在水泥地上的聲音。已經是開午飯的时候了！

今天發來的菜是牛蒡煮馬鈴薯。遇到節日，總得把農場里養的豬宰掉幾只，所以菜單上寫着豬肉。可是，所宰的豬肉，好的部分都以最便宜的价格賣給所里的職員了，到不了犯人嘴里。盛在碗里的菜，只浮着兩三片肥肉。儘管這樣，往常也就認為是了不得的好菜了；可是今天，却一點也不覺得好吃。比平日分量多得多的赤豆麥飯，怎麼樣也吃不完。盛在圓筒形模子里壓結實的飯，扣在飯碗里像山一般高，結果山腰以下弘藏全都剩下了。

不一會兒，發來了紅白豆餡年糕。那年糕比市面上賣的幾乎大兩倍以上。平常苦于胃病的弘藏，讓重子管得緊緊的，市面上賣的那種小年糕，每次都只讓吃一個，不讓多吃。可是下獄以後，他總是在吃了按頓的飯之後，馬上把兩個大年糕吃個精光。在豐多摩未決監時代，除了一日三餐以外，經常有點心和水果送進牢里來，所以天長節那天領到豆餡年糕，只是咬一口尝尝，就此扔掉了；可是下獄以後，三大節日發來這種豆餡年糕，卻使他高興得了不得，仿佛做人就專為吃年糕。即使昨天夜里，他還念念不忘地想着，假釋出獄，固然不壞，但是那豆餡年糕還是希望吃了再出去。——他拿到那新做成的軟綿綿的豆餡年糕，就好比小孩子那般把它放在掌心壓得扁扁的，美呀美呀地完全吃光。

左等右等，依然消息全無。桌子上，森鷗外的小說《澀江抽齋》攤開放在那里，看不下去。

迷迷糊糊之中，時間飛快地過去，終於又是吃晚飯了。扁担打

在水泥地上的兵地一声响，又传来了。那时弘藏才死了心，知道事情终于无望了；然而就在那一眨眼之间，他觉得就像得了救，仿佛乌云低迷的天空豁然开朗了一般。

等就寝铃一摇，他就上床睡了。睡觉时间，因为是节日，提早一小时，才只七点五十分；可是，他刚躺到床上，就睡着了。

本来，这几年来他已养成习惯，即使在夏天大热天，夜里也只要起来小便一次；可是唯有那天夜里，他却身也没有翻一个，一口气熟睡到了天亮。——第二天天亮以后，他的狱中生活，又每天继续着天气晴朗的日子了。

呈报假释后的经过情况

弘藏的假释，所长确实是呈报了司法省的；但是由于检察官反对，结果没有得到批准。前面也曾说过，凡是在社会上有些地位的人，等到刑期满了三分之一，原则上就准许假释出狱；所以知道所长已经作了呈报的主任看守，连做梦都不曾想到司法省会不批准。因此，他在天长节前一天下班的时候，更换了自己所负责的一舍三楼的“移动簿”，早就把弘藏的名牌取掉了。等到天长节的第二天上班的时候，他看到弘藏还关在那里，倒吃了一惊。他不明白为什么八条子爵顺顺利利地出狱了，而弘藏却始终留在牢里。不管怎么样，他总觉得和弘藏见面有些难以为情。

可是，一夜睡得很香的弘藏，今朝的心情却特别爽快。对于主任看守的“毕竟还是不成哩”那句寒暄，他毫不介意地一笑过去了。

弘藏吃完早饭去到图书室的时候，立川正在和田村一面喝着茶，一面谈论弘藏的事情。他对于弘藏的自以为能够出狱而终于

沒有出去，痛快得无以复加，正抓住一个不大开口的田村，独个儿在唠叨着。

弘藏一进图书室，他用一种笑脸相迎。弘藏快活地說道：“本能毕竟胜过理論。从道理方面說，我知道现在这个时候我决不会出獄，可是，因为出獄还是我所願意的，所以一听到什么风言风語，还是一心一念认为自己也許能出獄了。”

立川接着就說：“我們正在談論你的事情哩。”今天他的情緒忽然好起来了。

弘藏又談到了自己所发现的“真理”。

“昨天好容易吃上ジャガブタ(按：土豆煮猪肉的意思；从ジャガブタ这个发音，犯人有时用来指乐队)，可是觉得一点味道也沒有。心情这东西，对食物的滋味毕竟影响很大哩。从这次的事情上我体会到了这样的真理。”

立川听了大笑。接着他还快活地說出下面这样的話：

“居然連紅白豆餡年糕都觉得沒味儿，这可有意思。小孩子遇到第二天要郊游的时候，高兴得連飯都吃不下，也就是这个道理。不錯，心情影响着吃东西，这确是个真理。像本田先生那样一个爱吃甜食的人，居然連年糕都觉得沒有味儿，这可不簡單哩。”

其实这話說得有些牛头不对馬嘴。再說，那紅白豆餡年糕，一向喜欢吃甜食的弘藏还是津津有味地把它吃了的；可是他也不想加以糾正。

立川还繼續說下去：“那算什么，如果有心想知道的話，两个月以前我就能知道誰会在什么时候假释。这次假释的三个人，原田是4月5日，平井是3月30日，而望月那家伙是3月初就办理好了呈报手續的。”

原来他是昨天在释放那批得到假释的人們的时候，在教務室

里偷看了有关文件，今天才說这样的話的。在教务科服役的杂役夫，即使是假日，只要那天有人假释，也得去教务室帮忙干零星活儿。当时的弘藏还不了解这种情况，后来他自己都当起这样的差来了。

立川还接二连三、有声有色地举出许许多多轻信流言而结果空欢喜一场的例子。他一反前天的沉默寡言，今天简直是口若悬河。弘藏心想：“一样讲这番話，要是两天以前讲，該有多大参考价值呀！”却还是默默地听着。这时立川仿佛下最后結論那般說：

“說老实话，我已經彻底改变了自己以前的想法。一向认为听信了別人的話而心神不安，那簡直是傻瓜；现在却觉得，既然連本田先生这样的人，让人家一說，都馬上动摇起来，也就难怪那些沒有受过教育的家伙要出洋相了。”

弘藏听到这几句話，就觉得是當場揭了他的短，心上頓時很不高兴。

那天晚上，他讀了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罪与罰》。书中讲到瑪尔美拉陀夫被馬車压倒，受了致命的重伤，抬到自己家里，許多同居的房客都跑来看的时候，是这样描写的：“房客們一个个挤回到門口去，心里带着一种奇怪的滿足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当亲戚朋友突然发生不幸时，即使是他們的最亲近的人也常有的，也是任何人所免不掉的，尽管他們抱着十分真誠的怜悯和同情。”

讀到那里，他合上了书，寻思起来。那天他对立川的态度感到很不愉快，可是回头一想，那也許是人之常情。——不过，照弘藏后来在各种机会观察所得，立川那个人，幸灾乐禍的心理特別厉害。弘藏最初虽然受到他許多照顾，可是日子处得久了，就觉得他那种人可能就是所謂犯罪型的人物，所以后来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方針。

順便提一笔。两年以后，也就是 1937 年春間，弘藏不久就要

期滿釋放的時候，似乎是教務主任對立川說了些什麼吧（先前那個最信任他的教務主任，那時已經辭職了，他的主要工作幾乎全部被剝奪了。本來除了圖書室以外，他在教務室里還和教誨師坐在一塊兒工作；自從教務主任換了人，他在教務室里的桌子也撤除了。自然，他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樣，有機會知道各種各樣的機密了），立川開始作起不久他即將釋放的自我批准的“廣播”來。他向友好們吹噓說，只要他給教務主任一個答复，他就馬上可以出獄，不過目前他還不能作出明確的答复，所以這次的紀元節不能出去，到神武天皇節總可以出獄了。他一邊這樣到處吹噓，一邊暗中加緊作著出獄的準備。收拾身邊的東西啦，燒毀違犯所規的東西啦，把一些東西送人啦，把預備帶出去的東西歸在一塊兒寄放到保管科啦，這樣六神不安地忙了一陣子；等到3月底，已經準備得妥妥貼貼，隨時都可以出獄，只等著4月3日那一天了。正在那個時候，弘藏漸漸聽到人家背地里在罵他：“立川自稱要出獄，那種家伙，其實巴不得他早出去一天好一天，只可惜沒有那樣的便宜貨。”還有前面提到過的那個計算保管金的深澤，來到弘藏跟前，輕輕地說：“我那里什麼反應都沒有，准出不了獄。要是我那里沒有什麼征候的話，一時就出去。”後來果然，神武天皇節那天沒有放出去。甚至于十拿九穩的天長節那天，他的期待都成了泡影。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天長節那天，曾經做過圖書室雜役夫的中島倒被釋放了，還有一直在圖書室和弘藏這些人共事的田村也釋放了。田村早幾天就知道自己將被釋放，暗地里告訴了弘藏，兩個人互相說了些惜別的話，可是一直沒有讓立川知道。天長節那一天，教務室所屬的雜役夫立川、田村、弘藏以及新來的謀殺尊親未遂的無期徒刑犯桑原，吃完早飯都馬上去到運動場，幫著營繕科的人準備舉行儀式的會場。不一會兒，一個看守來叫田村；當他離開運動場去辦公樓的時

候，弘藏这几个预先知道内情的人，都齐声致意说：“恭喜恭喜！”唯独那个一心认为自己将出狱的立川，呆呆地站在那里，显出一副难以形容的尴尬样子。

就这样，在弘藏出狱以前，立川始终没有被释放。

在一旁看到立川落到这种下场的弘藏，心里也不禁产生了陀思妥也夫斯基所说的“奇怪的满足的感觉”，觉得真是痛快。

作原博士的助手

翻看一下弘藏的日记，天长节后第十天，即5月8日那一天，记着他和立川的对话。那是这样的：

“受了假释的错误消息的骗，现在已经不再感到难过了吧？”

过了十天光景，立川心血来潮地问了弘藏这样一句。弘藏心想：“这是说的什么屁话！”嘴里却回答说：“这种事情早已忘掉了。”

这时立川又自言自语地说：“多可怜呀。每天见到你的面，我就难受。……有些人会因此而自暴自弃哩。”

“我的一个特点，就是不把这种事情放在心上。”弘藏说了一声，就从他身边走开了。

特地把这种无聊的事情记在日记里，大概是因为立川那种话太使弘藏气愤了吧。事实上，本田弘藏这个人决不是想不开的人。世上确实有那种傻瓜，老婆不爱他而逃走，他却死乞白赖地追她，最后甚至干出杀人之类的勾当来；要是弘藏的话，那种女人无论有多美，也决不再回头看她一眼。至于过去了的事情，还翻来复去地放在心里盘算，自寻烦恼，这种愚蠢行为（在他看来，那实在是愚蠢的行为），他更是从来未曾有过。这是他有趣的特点之一；要是遇

到的是个談得来的人，他这时也許会趁机把自己的性格大談一番；可惜对方是立川，也就沒有心思跟他說那样的話了。

他的獄中生活，事实上像前面所說的那样，从天长节的第二天起，就“日日是好日”。只是他对立川逐漸感到討厌起来，所以总想設法远开他。正在那个当儿，在5月中旬，他被調到原博士的研究室里当助手去了。

原博士本是长崎医科大学的解剖学教授，最近才退職，据說今后将作为司法省的特約人員，利用他的残生来完成他向来所搞的刑事人类学方面的統計研究。他新近接受了司法省特約人員兼小菅刑务所特約人員的名义，路远迢迢地从长崎的医科大学把全部研究資料运到这个刑务所来，打算用刑务所里的犯人作助手，繼續搞那工作。

弘藏和他见了面。他看上去像个土老儿，头上光秃秃的，个儿矮矮的，身体胖胖的，稍許有些駝背，說話很快，因为牙齿掉了，发音不大清楚；許久以来看慣了刑务所里的獄吏們的弘藏眼里，他真是一点架子都沒有。他非但貌不惊人，服装也很朴素。这样一位老先生，在大学里已經到了退休的年齡，可是仍然不放弃研究，要每天来到这样一个不方便的地方繼續搞他的工作。弘藏初听到这种情节的时候，立刻就联想到前京都帝国大学教授足立文太郎；关于这位教授的生活状态，二十年来弘藏是了解得很清楚的。这位教授在大学教书的时候，长年过着极其朴素的生活；退休以后，把多年来所搜集的人体解剖資料加以整理，发表了一部有关体质人类学的庞大德文著作。弘藏这时想起了这位老博士，心想要是原博士也是那种类型的学者的話，大可出心出力帮他搞一下，私下欢喜非凡。

原博士的研究室設在北舍的优良舍楼上。和南舍的优良舍相

对称的北舍的优良舍的楼上,在南舍那边正好是图书室的地方,北舍这边是扫盲教室,用来教育犯人中的文盲。隔壁那间在南舍那边用来作为保管科等办公地点的小屋子,过去一直空在那里,现在就作为原博士的研究室。

弘藏调到研究室的第二天,又调来了另外一个助手,名叫大贯大八,他本来一向在印刷厂干活。弘藏的这个新相识,是年仅三十三岁的小伙子,在岁数上简直可以作为弘藏的儿子。他是中央大学毕业的律师,曾经当过樞木县大众党支部的总书记,还当过麻生久的选举事务长。1932年1月,在佃农和地主的纠纷中,属于大众党方面的农会的人,和地主方面的暴力团体生产党里的人发生了冲突,用刀和竹枪杀死了几个生产党党员。牵连在这个案件里的人,有的被判了非常长期的徒刑;支部总书记大贯,因为没有直接参加那次殴斗,只判处了三年徒刑。他和弘藏差不多是同时下狱的,由于受到一次减刑,那时只要服役两年三个月就成了。弘藏能和一个有这样经历的知識分子朝夕相处,感到非常高兴。

这个研究室,并没有派看守专门监督。再加北舍方面,白天一个犯人都呆牢房里,所以走廊之类地方,也几乎没有一个狱吏走过。那里简直是治外法权的世界,完全不受狱吏的监视。原老先生又是个极端节约的人,为了节省电车费,老远地从市区西部的澁谷,坐那最费时然而最省钱的市营电车,来到市区东头的小菅刑务所上班,所以当他出现于研究室的时候,总是快敲十一点了。与此相反,弘藏他们每天摸着黑就起身,吃完早饭,立刻穿过走廊来到研究室,所以从他们扫完地直到原老先生上班,中间那段时间是相当长的。在这段时间里,那年轻的狱内清洁夫近泽,老是趁着打扫楼下厕所的机会,躲过看守的眼睛,偷偷地把不知从哪里弄来的各种违犯所规的东西例如包子、榛子、酱菜、生胡萝卜、西红

柿、辣椒、牙签、有时甚至于芬芳扑鼻的香皂之类，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地送给他们。弘藏他们自然也还礼，那就是请他喝原老先生备下的茶。可是，这类事情都是躲过看守的眼睛，电光石火般飞快地干的，要不了多少时间。而且，除了这个近泽而外，再也没有别的人来张看这个屋子。因此，弘藏他们在原老先生上班以前，每天只是把各种各样的工作用具摊在桌子上，聊聊天过日子。

大贯大八是个品质比较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他真诚地相信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来临。因此，弘藏一有机会就给他谈马克思主义。本来，自从坐牢以后，弘藏一字也没有提到过马克思主义；这次由于对象和机会都好，才无所顾忌地谈起。大贯不久就明白社会民主主义的无济于事，他说此番出狱后，要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了。把马克思主义大致讲解了之后，弘藏每天早晨又给大贯上起初级德文课来。到后来，大贯的德文居然也有些像样儿了。

那时候，大贯老对弘藏说，此番出狱后，一定要和大众党一刀两段。可是，他出狱不久，就作为大众党的公认候选人，出马竞选东京市议会的议员，结果吃了一个大败仗（尽管当时大众党在一个极短的时期内很得人心，党员当选为各种议员的不在少数）。他后来一直当律师，由于时势正在急速法西斯化，想必早就把马克思主义这类东西忘得干干净净了。不过，他在监牢里对弘藏讲的话，倒并非虚言。一般说来，在监牢里所盘算的事，出狱以后，多半是办不到的。就比如弘藏自己吧，他在监牢里说过，出狱后也决心继续不吸烟，可是出狱不久，却又拿起了烟袋，尽管嘴里说不吸不吸，终于办不到。大贯还说，好容易受了教，出狱以后，至少也要把德文学到家。可是，这一点恐怕也和弘藏所说的不吸烟那样，没有做到吧。

但这些都是后話；总之，对于当时的弘藏來說，能够在監獄里得到一个知識分子作为对手，毫无顾忌地对他讲解馬克思主义，这已經可以算得是个大收获了。他因此大大地解了悶。

調到原博士那里去以后，弘藏觉得一切都比过去好，心里很高兴。只有一件事情不合适，那就是白天沒有空閑時間。以前在图书室里的時候，沒有任何固定的作业，一天到晚可以看自己爱看的书，现在却不能这样了。不过，假释既然暫时无望，也不便永远让他閑着，所以所长給他調了这样一个工作，这是理所当然的。

原博士的刑事人类学的統計研究

工作开始后不久，弘藏发觉原博士的“研究”竟是十分无聊，原老先生本人也是个十分无聊的人，絕不是什么值得尊敬的学者。

原手里的基本材料，还是当他在大学里教书的时候（那时他已經是司法省的特約人員），从 1921 年到 1927 年那几年中間搜集来的，当时他出差到某几个刑务所，除了調查犯人的罪名、刑期、原籍之类以外，就他們的身长、体重、胸围以及头盖骨等作了若干測定，制成了大約一万张卡片。

一万张卡片，听起来似乎不少，可是如果把 1935 年度全国有罪人員統計一下，除警察署當場解决的、檢察官认为罪行輕微不予起訴的、司法警察官认为罪行輕微加以释放的以及其他不予計算的而外，光是第一审有罪的人，触犯刑法的就有十二万余人，触犯特別法的六万余人，总計达十八万余人。仅仅一个年度的犯罪者，就有这么多的人；要是逐年累計起来，犯罪人数，更将达到一个庞大的数字；其中的一万人，只不过九牛一毛而已。而这位原博士却要拿这一万个实地調查的例子作为基础，对犯罪者的人类学特征

进行統計研究，也未免太不自量了。不过不久弘藏也就看出，連他老先生本人都沒有打算从中得出什么踏踏实实的結果来。

他在原手下大約搞了半年工作，根据这些卡片作了許許多多表格，全部是关于身長方面的。弘藏不再参与这个工作以后，有关身長的种种表格，以后究竟制作了多久，固然无从知道，不过总而言之，光是身長一項，就費了那么多的時間；所以他老先生的工作到底要搞到什么时候为止，那就簡直沒有底了。

这样一說，人們也許会摸不着头脑：关于身長就搞了那么多的表格，究竟是些什么样的表格呢？

本来从常識上讲，研究犯人和身長的关系，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犯人决不会比一般人高些或矮些。即使調查研究了一万个犯人的身長，得出平均比一般人稍高或稍矮的結果，怕也不能就此得出身材高的人容易犯罪之类的結論。可是，原却从一切角度利用他所搜集的材料，无穷无尽地作出有关犯罪与身長的关系的表格来。

举个例來說，让弘藏做的表格里面，就有一种有关身長和刑期的关系的表格。那就是說，把刑期分为五年以下、十年以下、十五年以下、二十年以下、无期徒刑等等，又把身長分成几个等級，然后把一万名左右的犯人按照表格一一填进去。

做完这样一张表格以后，此番又把刑期的划分方法加以改变，改分为一个月以下、三个月以下、六个月以下、一年以下、三年以下、五年以下、十年以下、十年以上、无期徒刑等等，然后又照式照样地把卡片上的登記項目重新抄写一遍。

而且制作这种表格时，数目字一个也錯不得（原开口閉口总說这是学者应有的态度），在最后完成以前，要用种种方法橫里豎里加以核对，另外弘藏所造好的表格要让大貫检查，大貫所造好的表

格要让弘藏检查。本来刑务所里关的人，经常在新陈代谢，昨天原老先生调查的时候还在牢里的矮个子，今天已经出狱，换了一个高个儿进来，这种事情，不论在哪个刑务所都是家常便饭，所以数字的计算无论多么精确，也没有丝毫意义。弘藏因为有着这样的想法，所以搞工作就认真不起来。再说他又最不善于计算数字，因此他造出来的表格往往有很大的错误，这就不得不根据一万张卡片从头检查一遍，费的劲就大了。

让弘藏造的表格中，还有一种叫作罪名和身长的关系表。来说小偷的手比较长，可是事实上，盗窃犯的身长决不见得就比一般人特别高，强奸犯的身长也决不见得就比普通人特别矮；可是弘藏却按照吩咐，就各种犯罪制作了身高分布表。可是，调查只限于触犯刑法的犯人，而事实上，犯人之中却有同时触犯刑法又触犯特别法的。比方说，有一个人犯了伤害罪（这是规定在《刑法》第二十七章里的）同时又违反了印花税犯罪处罚法（这个处罚法是刑法以外的特别法），结果被判处三年徒刑。像这种情形怎么办呢？那就要先翻《刑法》第二十七章，查出那里规定最重的刑是徒刑十年，再翻《印花税犯罪处罚法》，查出那里规定最重的刑是徒刑五年，然后按十和五的比例，把那三年徒刑中的两年划归刑法犯罪，一年划归特别法违反，然后把违反特别法的一年撤掉不管，把那个罪犯编入有期徒刑两年的伤害罪一栏里。这是为了便于理解而举出的特别简单的例子，实际上有些人一身兼有许许多多罪名，还有些特别法，已经废止了，现在的《法令大全》之类的书里不加收载，非查旧《法令大全》不可，那就格外费事，而原却口口声声把这种白费手脚说成是学者应有的态度。对原老先生说来，最不幸的一件事乃是：为了使他那专骗外行人的一套玩意儿发生作用，他的两个助手未免太优秀了些，以致他在弘藏面前不得不采取非常客气的态度。

总之，由于这样一种关系，光是身长的表格，就做了不知多少张，究竟做到什么时候才能做完，誰都难于预料。

讀到这里，讀者中間也許有人要問：做出这类举动的原老先生本人，会不会就是个精神失常的人呢？

怎么說呢，也許是个精神失常的人吧。可是，其中也不无缘故。

原来，在这个調查研究完成以前，原老先生可以用司法省特約人員的名义，每月領到一百块钱的津貼。問題就在这里了。一旦要是他的調查研究全部完成的話，他就再也領不到司法省那笔周济金了。可是，他却有心在他有生之年，——誰都不知道他打算活到什么时候，——把那从 1921 年到 1927 年的七年中間所調查的有关大約一万名犯人的身高、体重、胸围等等的一万张卡片作为取之不尽的搖錢树，而生发出每月一百元的津貼来。因此，尽管他那工作本来用不着在刑务所里找犯人作助手来搞，他却偏要采取每天亲自来刑务所上班的形式。而且这工作，急了固然不行，可是无所事事地閑着也不成，所以必須装出一副样子，让刑务所里的獄吏們觉得他每天是十分忙碌地搞着学术研究工作。要是普通一个研究人員，年龄已經超过六十岁，他一定急于趁在世的时候把自己的研究早日搞出一个名堂来；而原老先生呢，却完全相反，他活着一天，就非把材料的整理拖延一天不可。这位老先生的苦心孤詣就在这个地方；正因为如此，所以才把一条沙丁魚，一会儿烤，一会儿煮，一会儿炸；同是烤，一会儿用酱油，一会儿用盐，一会儿出骨烤，一会儿連骨烤；最后还想出种种加工法来，一会儿做罐頭食品，一会儿晒魚干；真是絞尽脑汁，沒完沒了。

不过，在沒有教养的人特別多的刑务所里（獄吏的教育程度，在公務人員中也是最低的），要是找个什么都不懂的犯人作助手，

那末光是前大学教授、医学博士这两个头衔，也就很吃得开了；可是对他来说，最最糟糕的却是挑来挑去，竟挑弘藏那样的人当了助手。后来，连他自己都觉得事情不妙，西洋镜已被拆穿，约莫过了半年光景，就呈请把自己调到丰多摩刑务所去了。直到现在，每天上午十点多钟，还是可以看到一个老头儿提着手提皮包，里面放着盒子饭，僵僵着身体，走进丰多摩刑务所的大门，那就是原老先生了。

原这个人的反常性，突出地表现在他那极端吝啬的性格上。年纪快活到六十岁的弘藏，生来还是第一次遇到那样的吝啬鬼。这也是和人有关的一个记录，不妨顺便在这里带一笔。

弘藏他们造统计表时所用的纸，是比白报纸更坏的粗纸，裁得像习字纸那般大小。造大表格的时候，必须把几张纸拼贴在一起。而统计表各栏的距离，又是按卡片严格规定的，哪里该几毫米，哪里该几毫米半，不得有差错。所以为了造一定大小的统计表而拼贴起来的纸，总不免多出一截。在原看起来，怎样使那暂时没有用的一截纸头减少到最小限度，就成了天大的问题。他绝对不允许粗粗地估计一下尺寸、把几张纸拼贴好、然后把多出来的一截裁下那种简单的办法，而要求预先就如何使裁去的部分做到最少，树立慎重周密的计划。凡有这类要求，他都只对大贯提出，不直接对弘藏讲，可是弘藏却不得不间接依从这个方针。

裁下的纸片，无论多么小，也不能扔掉。有一次，他让大贯把掉在桌子底下的小纸片拾起来。那是直径大约只有半寸、中间还有剪刀痕迹的一张小纸片。等他不在屋子里的时候，弘藏他们就說，把这纸片留下作个纪念吧，结果弘藏把它贴在自己的日记本里了，到今天他的日记本里，1935年7月25日星期四那天项下，还贴着那纸片哩。连这样一张小纸片都要特意地让人家拾起来，其

他也就可想而知了。鉛筆用短了，他就用留学德国时所买的老骨董鉛筆鉸刀來鉸，一直用到無法再鉸為止。墨水是他在長崎時用剩下的。至於廢紙，則連長崎的商店廣告傳單都帶了來，利用它的反面作筆算之類。

不用說，這類事情本來都是好事，一點都不該加以非難。何況儘管再小的紙片，到時候也可以用來粘貼統計表上寫錯的地方。尤其是弘藏這個人，決不是小看這種愛惜東西的行為的人。他早就在書上讀到過一些古今高僧的逸事，不禁為他們的無處不用心的修行事迹所感動。拿近一些的例子來說，天龍寺的峨山和尚，告誡他的一個每天早晨倒掉洗手鉢里的水的侍者道：“總以為哪天你自己能明白過來，可是等待了多時，你還是沒有明白，所以今天給你說一說。任何東西都不該隨便扔掉。用過的水，澆在那邊的草木上，也是好的。在這樣的大熱天里，草木多麼需要水呀；澆在那裡，不僅草木歡喜，連水也起了作用。殺生戒不在遠處，就在眼前哩！你每日毫不介意地在殺死水哩！”在書上看到這段東西，弘藏深深地覺得慚愧。他自然也很明白，不論是多麼小的紙片，都不應該隨便扔掉。儘管這樣，他還是絲毫不能尊敬原，這不是因為別的，而是因為原所愛惜的，只限于他自己的東西。

固然扯來扯去都是些無聊的事情，這裡就順便舉個例來說吧。

研究室里，夏天都備有一個小小的木制火鉢用來燒開水；弘藏每次添炭，總是適可而止。可是這却叫原看不入眼；每當弘藏他們去吃飯什么的、不在屋子裡的時候，他老先生就親自動手，在火鉢里添上一大堆炭，把他那柄從長崎帶來的、上面印有某家商店的廣告的爛團扇，對準炭火啪嗒啪嗒使勁煽。等到弘藏他們回到屋裡一看，桌子上飛滿了木炭的白灰；由於火頭過旺，火鉢的木邊都被烤焦了。不用說，炭和火鉢是公家發的，這和他自備的表格紙不一

样。对于公家发的这些东西，他不仅毫不在乎地超出需要地加以滥用，甚至仿佛以滥用为快。每次遇到这一类事情，弘藏心里总这样想：“这家伙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怪物。”

一般说来，犯人由于长年过着拘禁生活，精神多少总有些失常。当工作场所发生变动的时候，弘藏最初还非常高兴，认为自己侥幸能充当原这样一位博士的助手，从此可以和普通社会上的人接触了；哪里知道不久这种想法就归于幻灭。他终于死去了心，认识到关在监狱里，决不可能接触到什么好人。

假释出狱的犯人们

弘藏近来常常学着写诗。其中有些在家信里写不得，也不便给谁看，所以他经常只能抄在纸片上，给大贯看。其实呢，大贯完全是个当律师的性格，对于这类东西一无兴趣；可是除了大贯而外，再没有可以给看的人。本来不声不响地收起来也就算了，可是弘藏这个人，自己写了什么东西，总爱给别人看；所以大贯毫无办法，只得装出钦佩的样子来看弘藏所做的诗。那首诗是这样的：

人们最初看到
我和筋壮力健的青年们
一道入浴时的裸体，
也许要惊奇
天下怎么会有这样瘦的人，
甚至产生怜悯的心情。
可是，我自己却暗中安慰自己——
我的肉体虽则这样瘦，
我的精神却一点也不瘦，
狱中生活已经快满三年了，

灵魂却成长甚至丰满，
不瘦、不衰也不老。
我抱着这种想法，
浸在浴池的氾氾水波里，
从铁窗里
眺望着高耸在灰色岗楼旁边的
蔚蓝天空的一角，
静静地独自微笑。

这种既不像诗又不像文章的东西，老是得意洋洋地拿给大贯看，弄得大贯很头痛；而弘藏这方面呢，却由于大贯经常只想着假释，弄得很伤脑筋。最初大贯每天总是担心自己将成为俊宽和尚^①，而弘藏却先假释出去。

恰巧6月12日那天，检察官户泽来会见弘藏。那时他吩咐弘藏说，前些日子弘藏答应做的关于宗教的考察，此刻不妨用报告书的形式写出来。

户泽说了这样的话：“我的职务是抓人，对宗教之类是一窍不通。写得太深奥也没有用处，报告书可以写得浅显一些。”

“职务是抓人”——这是他的口头禅，可是弘藏听到这句话总是觉得不愉快。

后来他又问出狱以后还打算不打算继续翻译《资本论》。其实事情他知道得很清楚，这是故弄玄虚地问的。弘藏回答他说，关于这事，已经向所长提出详细的书面报告，自己出狱以后决计不再搞任何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翻译。户泽于是装出一副仿佛听到了什么新鲜话似的神气，从口袋里取出一本小本子，把弘藏的话一

^① 俊宽和尚（1142—1178）平安朝末期与藤原成亲、成经父子、平康赖等人同谋拥立白河天皇，消灭平清盛，事泄被流放至鬼界岛。两年后，成经、康赖等遇赦召还，俊宽因为是主谋，单独留在那里，同年死在流放地。——译者

字一句地記了下來，樣子十分煞有介事。

“今天這個時候，違反了治安維持法而轉變方向的人，已經超過六萬。這些人中間，有許多非常優秀的人材，駕御得當的話，很可以為國家做出一番功業。重要的是怎樣因勢利導，適材適所地作出安排。幸而今天已經有了一個組織，專門對那些人加以保護和善導，使他們真正得到更生。像我這種忙得不可開交的人，也被委託着經營那方面的工作。你要是一旦出獄，為了贖罪起見，希望能和我們合作，為這方面的工作出一把力，這是我個人的一點希望，不知你意下如何。請考慮考慮吧。如果需要的話，我可以把那方面的文件匯齊了給你看。”

“贖罪”這兩個字眼，弘藏聽了非常刺耳。他心里還想，真不知把人家當做什麼東西，居然叫人家和檢察官合作來了。可是，他口里還是應着：“我考慮考慮吧。”不過，關於那方面的文件，後來他一次也沒有申請要看。關於宗教方面的報告書，也並沒有打算馬上提出去。

過了幾天，教務主任把弘藏叫了去，吩咐他說：“檢察官來了通知，叫你把前幾天他所說的那個報告書，短些不妨，馬上就提出。所以請你趕緊寫出來，極短的也成。”

因此決定從那一天起，在兩星期內，每天下午二點鐘以後，放下原老先生那邊的工作，寫關於宗教的考察。結果在6月30日的晚上臨睡以前，他把題作“論宗教真理”的一篇文章養清完畢了。

在這篇文章里，弘藏肯定了科學真理以外還有宗教真理。這是他的真實的想法，並非是什麼和對方妥協。可是他覺得，這樣一來，就有了推托：足見他的文章並非籠統地反對宗教。

他在首先肯定了宗教真理之後，就毫不客氣地主張“但是，宗教是民眾的鴉片”。他寫了這樣一段話：

“在现实的历史里，却是以宗教真理为核心，結合哲学上和科学上的許多知識以及迷信、謬见、妄想、空想、欺騙、虛伪等各种各样的东西，形成一定的宗派的宗教。这种宗教一方面受到統治者的保护，同时又被統治者所利用，經常把它当作麻痹民众反抗的工具。最初掌握了宗教真理而向人宣传的宗教界的伟人，自然沒有指望把宗教作为政治的一个工具。可是，他所宣传的宗教真理，随着它的深入民間，丧失了它本来的精神，它的意义（完全与始祖的意图无关地）开始由社会力量的对比以及各階級的客观相互关系来决定。在階級社会里，这种事情是无可避免的。这样，宗教真理就被附着在它身上的許多杂七杂八的东西十重、二十重地遮蔽起来，完全失去了它的光輝。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这样的历史现实，而把宗教說成是民众的鴉片。我一方面相信进步的宗教里含有一定的宗教真理，同时在另一方面却和所有的馬克思主义者一样，认为宗教是民众的鴉片。”

他还批評了释宗演著的《临济录讲话》里所說的俄罗斯因流行的心病而灭亡的一番話。他写道：“可是，灭亡的只是旧俄沙皇以及沙皇的一伙，至于俄罗斯本身，却非但沒有灭亡，现在反而更加兴盛了。”他最初就絕沒有指望利用这个报告书来騙取假释，所以把自己心里想写的东西全都写出了。

在提出这个报告书以前，他先让大貫看了，說：“写出了这样一篇东西，不知道怎么样，請你給我看一看。”

大貫这个人，一向认为宗教只是愚夫愚妇的胡說八道，所以认为弘藏肯定宗教真理，是向統治階級妥协，可怜得很。而且他还疑心由于这一妥协，弘藏可能被假释。

“如果我是检察官，对于你这篇文章就滿意了。宗教是民众的鴉片这类話，不大妥当，可以不提，只說本田已經轉变方向，皈依宗

教，那就一定会把你假释。”

“哼，你要是检察官，也许会把我假释了，可是干检察官那行的，就不买这个帐。”

“不见得，我看不一定。”

两个人就这样地谈论着。后来弘藏又听了大贯的劝告，把“灭亡的是旧俄沙皇以及沙皇的一伙”改为“旧俄的政治机构”。因为大贯认为沙皇这两个字眼，怎么说都将让人家联想到别方面去，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自从弘藏提出那份报告书后，有一阵子大贯每天唠叨着：“现在光只我们两个人每天在一起工作，要是你出去了、我一个人被留在牢里的话，我是万万受不了的。”

不久就是七月半了。向例每年在这盂兰盆会的时节，犯人们可以吃得好一些。7月13日的中午，吃的是油豆腐什锦炒饭，晚上吃面条。14日中午吃油炸甘薯和牛蒡，晚上吃凉拌豆腐。15日中午吃凉素面，晚上吃牛油煮土豆。平常日子里，晚上的菜总和早晨一样，是酱汤；这几天中间能有这种特别的菜，是托盂兰盆会的福。

还有按照历年的旧例，每到7月15日前后，总有几个人要假释。犯人中间，自然而然地就产生了种种谣言。不过，谁都没有提到弘藏，提到的只是大贯。

前面也曾说过，犯人中间，有所谓“独步者”，他们可以在一定区域内自由走动。内中有一个“独步者”，10日那天早晨来到研究室，紧急报信说：“这个月的15日，大贯先生可能要出去。”大贯顿时半信半疑，一直惦念着这件事情；可是到了15日那天，却落了空。岂知那位“独步者”，在当天晚上又跑来说：“16日早晨大贯先生和另外一位——一共两个人——据说真地要假释出去了。”已经

失望的大貫，这下又精神振作起来；可是到了 16 日那天，还是落了空。弘藏在一旁看着，觉得那个满不在乎地信口胡說的“独步者”，实在莫名其妙，大貫似乎是听凭人家作弄了一场。于是，弘藏那时第一次告訴大貫，他自己前次在天长节那天，也有过同样的經驗。他还細細地为大貫分析：他那次是主任看守讲了告別的話，那样都落了空，何况是全然不相干的犯人同伙的不負責任的話，更加当不得真的。

可是，弘藏那番忠告，一点用处也沒有。此后大貫还是經常一本正經地听信人家的风言风語。看来，即使是随便編造出来的話，过后馬上証明是虛謊，可是每当人家对他說“大概你不久就可以出獄”的时候，他心里还是很高兴。这在旁观者的弘藏眼里，实在有些想不通。

七月半虽則过去了，可是假释的人，仍然照每年的老例，今天一个明天一个地零星出去。

7 月 19 日那天，前些日子就傳說將和弘藏一道在天长节那天释放的保管科的杉本，終于被释放了。弘藏的日記里写着：“由衷地为他高兴。”

8 月 3 日那天，弘藏进小菅刑务所时就做着南舍二舍三楼（关全部思想犯的地方）的杂役夫小林，也放出去了。他以謀杀尊亲的罪名被判了无期徒刑，那时已經服役滿十五年又两个月了。弘藏吃完午飯，从自己的牢房去原的研究室、走过教務室的时候，看到小林在那里的休息室里，不知等候着什么。他告訴弘藏，刚才通知他假释了，把一张好像学校里的毕业証书那样的东西递給弘藏看。桌子上放着十五年中間所买的十几本书，还有一个包袱，里面放的大概是自己买的衬衣之类，孤零零地放在那里；本人只穿了自备的夏季白衬衫和短褲。这是因为獄衣已經脫掉了，而接他的

入却还没有把替换衣裳送来。他的神色与其说是欢喜，毋宁说是快哭出来了。素常是个挺爱开玩笑的人，今天却非常一本正经。虽然料想他有无限感慨，可是也不便长谈，所以弘藏只是简单地向他道贺几句，就同他分手了。

又过了一个星期，8月10日那天，在第一病房当看护夫的杉原，假释了。杉原这个人，在未成年时就犯了强盗杀人罪，从少年刑务所到今天，一共度过了十四年零三个月的狱中生活。弘藏看到被叫去教务室的杉原穿着新和服、缠了黑腰带的背影，就默祝这个北陆地方造船工人的儿子、进了刑务所才开始识字的不幸的人，前途幸福无量。

这些人一个个地出狱，弘藏衷心为他们高兴。而大贯呢，看到别人出狱，自己却留在牢里，心里就愤愤不平。杉原出狱那天，他独自愤愤地说：“把强盗释放出去，真正岂有此理。请设身处地为那些被他所杀害的人的遗族想想吧。他们蒙受了无可挽救的毕生灾难！所以对于那些强盗杀人犯，不狠狠整一整是不成的呀。”一次次听到这样的话，弘藏对于大贯的气量的狭窄，逐渐感到不舒服起来。

急于想得到假释的大贯大八

8月也终于到了月底了。8月26日那天弘藏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我们每天有两次休息时间，每次十五分钟，一次是上午九点，一次是下午两点。

“有个叫南云的，是南舍一舍三楼的杂役夫，每到休息时间，他就爬到屋顶上去吹喇叭；我们只等南云的喇叭一吹响，就到附近第

二病房周围一带去散步。那里有几片花圃，小池里养着金鱼，金丝雀在竹籠子里啼唱着，多少足以娱乐耳目。我們最初調到现今的工作場所、到病房附近来玩的时候，秋葵还刚刚含苞。不知不觉之間，已經吐出紅紅白白的花朵，不久就盛开了。过不多时，开了很久的花朵凋残了，呈现出秽敗的顏色。秋葵花开过以后，接着就开大丽花和牵牛花。牵牛花盛开的时候，我們每天从病房借一盆来，摆在自己办事室的桌子上。可是，现在連种在畦地里的牵牛花都已萎瘁，显出秋色来了。现在已經没有什么像样的花儿了。但是，到天冷时，菊花就要开了吧。呆在这样的地方，对于一年四季的花开花落，会变得十分敏感。”

到了9月里，难得这个月底是一个节日，犯人又开始对假释議論紛紛。充当弘藏那栋监房的杂役夫兼喇叭手的南云，名列在候补人里。由于新近調来一个曾經在军队里当过喇叭手的小伙子作为南云的助手，因此誰都认定南云在秋分节边的节日，要释放出去了。南云这人，在弘藏入所不久，曾經說“先生不久就会得到特赦”，使弘藏产生了痴心妄想。哪里知道今天反而輪到弘藏送他出獄。他自己也存着此番一定能出獄的心，把素日自己所拾掇的五叶松的盆栽和一盆天竺葵，都送給弘藏作为紀念。

弘藏的日記在9月24日秋季皇灵节那天，这样記着：

“南云今天终于假释出去了。昨天上午和下午，我們互相恳切地道了別。今天早晨刚吃完早飯，走廊里有叫喚南云的声音，我想那大概就是叫他出去了。

“南云是专管我們这栋监房的杂役夫。每天早晨点名以后，只要不是休假日，就会听到牢房門一个个开閉的声音。这是在收罗打扫下来的垃圾，那就是南云的工作。因此，过去的七百多天里，每天第一个见面的就是南云。还有，三頓飯开飯的时候，南云就夹

杂在伙房里派来的炊事夫中間，帮他們发飯发菜。另外，每星期一早晨把十四张有明信片一倍大小的手紙递进牢房的是南云，照管洗衣服的也是南云。还有每星期三的理发或刮鬍子，也是一舍和二舍的杂役夫的工作，我多半总是由南云操刀。我下獄以来将近两年了，在这小菅刑务所一次也沒有換过牢房，所以到这个月为止，一直多承南云照料。现在和这样一个熟人分別了，这使我今天一整天心里都不舒服。

“整天淅淅瀝瀝下着雨，冷得离了节景儿了。”

他那天还做了下面这样两首歌。

秋雨綿綿的黄昏时候，独自在牢房里吃飯，多么凄凉呀。

当这秋天，媽媽在倚閭而望的故乡家門边的柿叶，也許已經落光。

就这样地，熟人一天天少下去，可是無論經過多少时候，不用說弘藏，就連大貫也始終沒有释放。不久，明治节又終於到了；眼巴巴地盼望到这一天，大貫却仍然落了选。

大貫尽是喊着出去出去，这时弘藏已經听得膩煩起来，到后来終於憋不住了。11月15日他的日記上記着这样的話：

“在同一研究室工作的大貫，起初以为我会得到假释先放出去，經常放心不下。老对我訴說：‘现在光只我們兩人在一起工作，要是你出去了、我一个人被留在牢里的話，可受不了。’他不仅对我这样說，见到誰就和誰說这样的話。可是，秋季皇灵节过了，明治节也过了，当他看到我暂时再也不会假释的时候，他不仅絕口不再提起一个人留在牢里的凄凉，甚至仿佛完全把它扔在脑后了。同时，他因为自己的刑期快要滿了（他的刑期到明年二月就滿了），所以显得非常有劲，每天不知道要对我讲多少遍：他的刑期已經

只剩下一百几十天了。不仅对我这样讲，对别的人也常常这样讲。要是把我在旁边听到他对别人说的也算在一起，每天不知要听到多少次同样的话。后来我渐渐觉得不耐烦了，不免认为‘那样诉说着一个人留在牢里的凄凉的人，换了一个处境，顿时就仿佛忘得一干二净，这种行为也太个人主义了，对别人太缺乏同情心了。’因此，就想给他计算一下今天一天中间他要讲几遍同样的话。结果一算，光是一个上午，就已经讲了三遍。

“有一次我到底开了口，说了这样的话：‘在别人跟前尽是喊着出去出去，似乎不妥吧。昨天晚上你还满不在乎地在无期徒刑的人的面前，说什么即使现在就写要求发还个人书籍的申请书，也来不及了，因为不久就要出狱了，所以连申请书也不写了。在无期徒刑的人的面前特意讲出这种话来，实在太叫人难过了。得稍稍为人家设身处地想想，否则就太忍心了。’

“这话表面上是要他顾虑一下别人，其实是要他顾虑一下我自己。

“这时大贯答道：‘这有什么，那种家伙都是些杀人放火的坏蛋，和他们客气是没有用处的。’还说：‘工厂里的人，都毫不在乎地尽说着自己怎样怎样哩。’

“我没有被派到工厂去过，那儿的情况无从知晓；只是像他那样的说话方式以及思想方式，不能不令我生气。所以我仍然强调说：‘不错，也许工厂里经常有这样的事，对着那些不知哪天能出狱的无期徒刑的人或十年、二十年的长刑期的人，毫不在乎地吹嘘自己不久就要出去；不过照说我们比别人有教养些，刑期又都比较短，所以，我们说自己不久就要出去和那些服役了将近十年甚至十几年的人说自己不久就要出去，同样一句话，听的人的感受完全不一样。总之，我觉得没有必要徒然引起人家的反感，所以，除非人

家問到我，否則我決不在長刑期的人和無期徒刑的人的面前說起自己何年何月出獄。’

“我這話也許說得有些過分了。不過，直到今天我不知聽了大貫多少怨言。起先那位原博士為了雞毛蒜皮的小事時常生氣發火，光是這個已經使我夠煩的了，再加大貫一會兒因為推遲了他的假釋而發牢騷，一會兒因為看到強盜殺人犯假釋出去而生氣，再不然就是為了不批准他買鞋而憤憤不平，諸如此類，不住地叨嘮，簡直叫人煩死了。好容易等到今天才進了一番忠告，自己覺得也許不是過分。……實則，不說別人，就是我自己，也許就在某些地方給別人添了麻煩，都未可知。應當深深地警戒自己，不要做出那種不成體統的事情來。”

把這種事情鄭重其事地寫在日記里，可見弘藏當時感到非常不愉快。其實呢，由於長期過着監禁生活，大貫的性情固然無疑地有些變態，弘藏說不定也和往常有些兩樣。反正兩個人的心情，都陰郁得和監獄里的空氣不相上下。

無聊的假釋的事情講得太多了——實則監獄里的生活本來就是永無止境的無聊事情，——到這裡已經可以結束了。

明治節才過，11月18日那天，該管看守長把弘藏叫了出去，傳達了當局的這樣一個命令：“不妨再寫點什麼東西。”大貫在旁邊還說：“准是檢察官認為你眼巴巴盼望明治節釋放出去而沒有成功，因而消極了，所以才想在這個時候再讓寫些東西。只要你稍稍寫得遷就一些，可能明天就會放你出去。”可是弘藏並沒有理會這個命令；直到刑期屆滿為止，始終沒有寫什麼。就在看守長傳達命令的當天，弘藏口占了下面這樣的三首歌。

有時候覺得，一個人爬山的寂寞是相當可貴的。

心想山路不久就会走完，忍受着寂寞，我一个人在旅行。

赴湯蹈火得来的学术信心，坐了三年牢，却絲毫也沒有动搖。

12月初，他生了病，住进了病房，在那里过了一个冬天。他就这样地和原及大貫分了手。关于他的假释問題，从那以后，連风声都沒有了。

病房生活

住进病房

弘藏是他母亲十七岁时所生的，可是生下地来那个瘦弱模样，倒像老太太所生的孩子，据说吃奶时期就有三种病症。他的外祖父（祖父死得早，死的时候弘藏的父亲还小）大概因为看在自己小女儿所生的孩子的份上吧，对于这个相貌丑陋、旁人看来谁都不喜欢的孱弱娃娃，却特别钟爱，在孙男一辈里要算喜欢得最厉害；看到弘藏小便不大畅，时常为他担心。弘藏从小没有胖过，老是瘦得像个干瘪枣子。年纪还不到十四岁，他就离开家乡岩国，进了山口的高等中学校预科。那时还没有火车，从岩国到三田尻只好坐轮船，从三田尻到山口只好坐马车或洋车。暑假过后，9月初就得去山口上学了；那个时候，往往正赶上赤痢之类的毛病流行的季节，乘轮船要受到防疫检查。所谓防疫检查，无非是瞧一瞧脸色，摸一摸脉而已。弘藏每每在防疫检查的时候通不过；同道的朋友都乘上了船，他却乘不上。那是因为他的脉搏跳得异乎寻常地快，比别人快得多。这种脉搏异常，一直到他晚年都没有改变。

无论在高等学校也罢，大学也罢，体格检查的时候，他总是被编进最坏的一等。大学毕业、结了婚以后，他保了人寿险；最初，保险公司的医生也不予接受。直到当了大学里的教师，由于保险公司认为他所处的环境好了，好容易才让他保了人寿险。尽管这样，保险条件还是非常苛刻，必须在十年以内交清全部保险费。

另外，自从结婚以后，他经常闹胃病。那时到东京来看看他的

家庭情况的祖母，身体非常健康，后来一直活到九十六岁；她看到弘藏每頓只吃一碗飯，而且得泡上开水才能咽下肚，就皺起眉头說：“年輕小伙子像这种样子，真是糟糕。”四十岁以后，他常常鬧劇烈的胃痙攣，等到五十岁前后辞去大学教授时，胃痙攣就鬧得越来越頻繁，这种状态一直繼續到 1933 年 1 月被捕时为止。

因为他的身体这样羸弱，所以他被捕以后，誰都担心他活不长久，这在前面已經提到过了。

果然他一被捕就生了病，未决期間，一半都是在病房里度过的。可是，奇怪的是下獄以后身体一直很好，什么毛病也沒有。1933 年和 1934 年的两个冬天——監獄生活以冬天为最难过，——連伤风都沒有鬧过一次，就平平安安度过来了。吃的东西尽管一下子变得非常粗恶，他的腸胃也照样很好地經受了过来。

大家都觉得奇怪。

但是，1935 年快到冬天的时候，他的胃却开始鬧起彘扭来了。这一年的 10 月底，长久不犯的胃痛，又犯了。

12 月初，他的胃脏似乎正式垮了；在那个月的 2 日，胃痛病又发了一次；几天以后，更发了一次十分严重的胃痛。

那一天是 12 月 8 日，正赶上星期日。早晨去到原的研究室不久，胃就开始痛起来。这一天因为原不来上班，所以他的伙伴大貫就主张不生火。可是，在这种时候，却最希望能烤烤火。弘藏肚子里本来几次想說：“我来負責，請你照往常那样取个火种来吧。”可是因为深知对方念念不忘地希望得到假释，經常担心会不会受到獄吏的批評，簡直小心謹慎得很，所以弘藏好不容易忍耐着，按着肚子，蹲在沒有火的火鉢旁边。托病房里的看护夫搞来一小包药，用凉水服下了。岂知吃下去的药，一点效驗也沒有。胃痛得更加厉害了。

不久就到了吃午飯的時候。大貫回到他自己的牢房里吃飯去了。剩下弘藏一個人，縮在寒冷的辦公室的一角，按着肚子直發抖。

大貫吃完飯回來，竟什麼也不管。遇到這種時候，殺人犯或強盜犯反而強上萬倍；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一味只想自己的事情，別指望他幫一點兒忙。弘藏心里儘管很想喝杯熱開水，却仍然熬住了。

胃痛終始不停止。弘藏讓大貫請來醫生給瞧過，吃了第二次的藥，經過批准回到自己的牢房里。回到牢房後，就縮成一團地躺在床上，可是仍然痛個不住。又吃了一包領來的藥，結果還是一點效驗也沒有。他翻來復去，一夜都沒有能睡覺。那天他整天沒有吃東西。呆在監牢里，連開水都喝不上。

第二天是12月9日，直到天亮，胃痛還是沒有止住。弘藏指望今朝大貫能來招呼他，那時可以托他請醫生；哪里知道大貫連門洞都沒有來張一張。大貫的牢房就在弘藏的牢房斜對過，中間只隔一條走廊。弘藏估計他吃完早飯去上工的時候，也許能來探望一下：這樣指望原是很自然的。可是，就是回來吃午飯的時候，大貫也沒有來招呼一聲。固然，這裡完全是嚴格單獨看管的牢房，禁止犯人同犯人說話。但是，弘藏和大貫每天在同一個地方工作，整天呆在一起，也沒有看守監視，如果預先向主任看守說明一下，探問一下病情本是无所謂的；可是小心謹慎的大貫，却連這一點勇氣也沒有。弘藏沒法，只得親自請主任看守把回牢房吃午飯的大貫叫了來，托他去請醫生急診。下午醫生來了，給了藥。根據醫務室的吩咐，病房里的看護夫送來了湯婆子，不過那湯婆子不熱，不中用。不過這一天多虧那個看護夫送來兩次加了紅糖的藕粉。除此以外，什麼東西也沒吃。到了夜里，痛還沒有止住，又吃了藥。

到了10日，还是一样。胃痛怎么也不好。到了夜里，痛得更加厉害。又服了药。

到了11日，弘藏才住进病房。住进病房的时候，衣服必须全部更换。弘藏以前一直穿浅葱色狱衣，和批准他自己花钱买的棉毛衣；现在这些衣服都得脱掉，换上病房里用的棉袄、内衣、短裤、日本式布袜子等等。这些东西一律都是粉红色的：粉红色棉袄，粉红色内衣，粉红色布袜子，粉红色短裤。弘藏穿了这种东西，直到第二年的3月7日，过了约莫九十天的病房生活。

在病房里，睡的是杂居房，床位在房子的中央部。和普通牢房不一样，病房床上铺着厚厚的草垫子，毛毯也多出一条。另外，白天和夜间，每天两次，还发给滚热的汤婆子。直到这时，弘藏才感觉自己冰冷的身体里的血液仿佛已经开始在流动，疼痛也随即好了不少，只剩下隐隐的一点了。每天除了喝三次米汤而外，还喝一次藕粉。量量体温，体温是三十八度五。脉搏本来就特别快，这时是一百一十跳。半夜里出虚汗。医生说是胃痉挛和感冒，其实可能是胆石病。

12日早晨，热也退了，脉搏也恢复了他平常的次数，胃也只有点儿轻微的钝痛，人已经好过得多了。从这一天开始，除了藕粉、米汤而外，他每天还吃到两个鸡蛋。

从14日开始，每天又增发给他一磅牛奶。米汤改成了粥。

此后病况很快地见好，恢复了平常的状态。

16日那天，什么都不知道的重子，来监狱里看他，一眼看到弘藏那个瘦削的面孔，大吃一惊，不由自主地问道：“您怎么啦？”当天她的日记里记着这样一段话：

“走进接见室，刚一看到他的脸，使我大吃一惊，因为他的脸色既不好，人也瘦了。我要求见医务主任，在旁监视的三浦看守部长

說不妨事，他会代我好好和医务主任讲的，因此沒有见医务主任就回来了。因为心里异常煩悶，不想立刻回家，就到日本桥去給眞知子定做了一件外衣，又轉到目黑，和哥哥談了一会，然后回家。”

准病房生活

后来弘藏只是虛应故事地发了两三回輕微的胃痛，不久就不再是病人了；可是，由于獄吏們帮忙，仍然被留在病房里。呆在病房里，不仅床鋪好，毛毯也多出一条，有些人(弘藏尽管并非害重病的人，却也被算在里头)还有湯婆子可領；另外，由于病情不同，有的不吃麦飯，还可以吃米飯。弘藏也是起先喝米湯，后来喝粥，最后吃米飯。那种飯称为十等飯，分量最少，可是只要不劳动，也足够了。弘藏一边吃着这样的米飯，心里十分担心将来再吃麦飯怎样过。再說，自从他完全康复以后，每天仍旧发給他半磅牛奶。在监牢里能过这种“奢侈生活”，这完全是病人的特权。弘藏为了不丧失这种特权，自然也只好繼續做病人。可是不管怎样說，事实上他已經不是真正的病人了；所以从12月27日起，他改受“准病人”的待遇。

所謂准病人，是指那些老衰残废，不能做普通作业的人。照說，弘藏这样的人，还不能算是准病人，只是由于主事獄吏帮忙，才把他放到这一伙里去的。不管怎样，当初把他的事情作为問題处理的谷内所长，那时已經調到別的地方去工作了，今番他的所以能受到这种特別待遇，完全是靠和他直接接触的那些獄吏們帮忙，这个他自己也很明白。做了准病人，不能像普通病人那样整天躺在在床上。弘藏被編入准病人的一伙的当天，就开始做作业，坐在床上縫抹布了。那时他的床位搬到了靠近門口的地方。

这里的杂居房里，总共有十六张床，分成四排，每排四张。这些床位偶然也有一两张空着的，不过多半总是住满了人。其中大约一半经常新陈代谢着，剩下来的一半永远是那几个人。那些人都是害了痼疾，可说背负着人世間最不幸的命运的人。

老病号里，有的是病人，有的是准病人。准病人本来指定住在北舍楼下的两间普通杂居房（就在病房的走廊那头）；不过，病房里要是没有住满病人、还有空床位的话，也让少数几个准病人呆在里面。弘藏现在就是其中的一个。

他的床位的北面那张床，住着一个四十多岁的麻脸矮个子，名字叫做岡崎秀之助。他本来是印刷工人，认识几个字，有点小才具。这人专管给屋里的准病人分发做抹布的材料以及剪刀啦、针啦之类的用品。做抹布的材料是旧囚衣，把它拆开以后，剪成抹布那样大小，而岡崎就专管剪裁。剪刀每天在工作开始时分发，夜间收工时收回，然后点了数，交还给主任看守：这也是岡崎的事情。弘藏成为准病人的时候，他就教弘藏怎样缝抹布。这个病房里的老资格、又是准病人的照料者岡崎，另外还给了弘藏种种照顾。在弘藏看来，这些人反而远比半瓶醋的知识分子懂道理。

岡崎害着许多病，到后来肺也不好，以至送进了隔离病房，而当时就引起大家注意的，是他每次小便的时候，总得自己把一根金属小管子插进尿道。那是因为他生了白浊，结果引起了尿道闭塞症。光是这个病，就叫他不能像一般人那样去工厂工作，因此弄不到几个作业奖金，连牙齿都没钱医治。

他前刑十年，现刑二十年，一共是徒刑三十年（他的档案簿里，写的是强盗未遂十年，强盗窃盗二十年，累计犯罪五次），所以不到七十几岁，就没有希望恢复自由。他第一次犯强盗罪、判了十年徒刑不久，就害了重病，几乎死去，因此暂时停止执行，把他放了出

去；岂知不久他又做起强盗来，这回判了他二十年徒刑，連原先的十年徒刑，也重新給他算上了。有名的第二个說教强盗^①就是他。

除了一个牧师以外，从来沒有人来看他，也沒有誰給他写信。弘藏看到他在年底圣诞节接到牧师寄給他的一张賀年片，高兴得要命，永远把它当作宝贝那样珍藏着的时候，就十分可怜他。有一次弘藏对他說，不到两年之后自己就要出獄了，出獄后打算給他寄几本书来，問他要什么样的书。他沒有推辞，回答說希望給他寄本辞典，因为辞典一直可以用，最合适。于是弘藏就答应他說，既然这样，就給寄本最近出版的《辞苑》吧，因为那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辞典，很合用。弘藏后来在两年半之后（一年半出獄后又过了整整一年），履行了他的諾言。后来教誨师給他写了一封信，信里有这样几句话：“那本书交給岡崎本人的时候，他的高兴，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他这几天不能和外界通信（按：大概由于违犯所规而受到处罚），所以托鄙人代他致候道謝。”弘藏履行了这个諾言，心里也很滿意，因为他想，《辞苑》这部书，尽管发行了好几十万部，却未必有像他送給岡崎的那部那样，天天被翻閱的了。不过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现在还是回到原来的話題上来吧。

这个小营刑务所的病房，一共有三栋，分設三处，归南舍管轄的是第一病房，归北舍管轄的是第二病房，另外还有一栋作为隔离病房的第三病房。弘藏住的是第二病房。这个病房里，只有一間单身房。思想犯弘藏，照說应该关在单身房里；不过，当初設計这个病房的时候，那間单身房是預备收容瀕死的重病病人的。弘藏住进病房的时候，那間屋子已經住上重病人了，所以他才有机会以一

^① 这种强盗，去人家搶劫时，还堂而皇之地給人家說教一番。——譯者

个有名的思想犯而获得了和许多人生活在一起的这种本来不容易获得的經驗。

临近年底，在小年夜 30 日的半夜里，住在那个单身房里的腹膜炎患者，终于痛苦万分地死掉了。那是一个判了无期徒刑的、年紀还輕的强盜杀人犯。他有两个胞兄，一个住在东京，他本人非常想见他的两个哥哥，最后还請人家給他們打了病危的电报，可是直到死去以后，他的哥哥連尸都不来收，这类話流传在杂居房的病人中間。据說那个人临死以前，还不断地哀声說：“是我不好，請哥哥饒恕我吧。”

单身房尽管空了出来，弘藏依然在杂居房里继续呆了十几天。要搬的話，本来馬上就可以搬进去住，不过那里刚刚死掉一个年輕人，叫自己一个人睡在那里的床上过新年，总不大願意，所以暂时还是继续和大家住在一起。

大年夜的夜里，病人們多久都不睡觉，拚命談着些色情方面的故事。在走廊里踱来踱去、从窗外監視着的夜班看守，独有这天晚上，听到了高声的談話，也装做沒有听见。

“今天晚上不听到除夕的钟声，誰都不許睡。”

大家众口一詞地这样讲。弘藏也随和着，那天晚上和失家一起听了除夕的钟声。

“听呀，钟声响了！”

豎起耳朵一听，果然那万物更新的钟声从遙远的地方一視同仁地传到这監獄的病房里来了。弘藏心想，大概其中也夹杂着浅草的钟声和上野的钟声吧，久久感慨无已。

病房里禁止用自备的紙笔。弘藏向看护夫借来一个鉛笔头，在手紙上写了下面这样一首詩。

1935年除夕之歌

—

响了响了，
钟声响了，
除夕的钟声响了。
凝神细听，
才听得出来，
是远处的钟声
轻轻地响了。
鏗——鉦
鏗———鉦
除夕的钟声响了。

二

1935年去了。
我在这个地方迎接了第三个新年，
抛下妈妈
扔下妻子
我终于落到这种黑暗的监狱里。
毕竟有了这样一天，
可以声言：
明年我将回家去！

三

高兴呀高兴，
钟声响了，钟声响了。
通知解放的日子即将到来的
钟声响了！
鏗——鉦

鏗——鈺

远远地輕輕地

除夕的钟声响了。

弘藏那天夜里在那千奇百怪的監獄的病監里和人世間最不幸的人們一道听到的除夕的钟声，多替也忘不了。出獄以后，有一段时期內，他一听到钟声，就会想起那个大年夜的钟声来。

准病房里的人們(一)

在一个屋子里生活着，弘藏逐漸得知了各种各样病人的經歷。

岡崎的床位的北边，靠着窗子，一个身材瘦小、脸色蒼白的二十多岁的青年，整天躺在床上。看护夫每天給他換大腿一带的密密层层の綑帶。他害着骨潰瘍，脓水不断地淌出来。經常发高烧，往往連飯也不吃，整天把他那弱小躯体蜷伏在被窩里。他从来不洗澡，小便撒在尿瓶里，只有大便的时候才下床，拄着一根拐杖，如履薄冰地上厕所去。

他是一年多以前用担架抬到这里来的，一来就收容在病房里，此后一直沒有离开过这病房的床鋪。他有一个弟弟，他的父母給他弟弟娶了媳妇，却沒有給残废的哥哥娶亲。他死乞白賴地要他父母給他娶妻，可是誰家的女孩子願意做这样的男人的媳妇呢？所以无论等多久，也不能滿足他的願望。他看不破自己的不幸命运，經常怨恨爹娘的硬心腸，有一天夜里，終於下了决心，偷偷地从床上爬起来，拿剃刀割断了他父亲的喉管。为此，他现在就落到呆在監獄里过活一輩子的境地。

弘藏的东边，和他斜对面的那张床上，睡着一个七十岁的老头儿，名叫坂井。弘藏来到这里的时候，他已經非常衰弱，一点东西

都不想吃了。到了这步田地，連刑务所也无可奈何，这才发給他苹果啦、橘子啦之类。那时他对看护夫有气无力地叹息說：“連这种东西都能吃上，足见我已經不中用了。”可是，尽管衰弱到这个地步，这个老头儿还是咬着牙、扶着男看护的肩膀上厕所，怎么样也不在尿瓶里小便。

那是弘藏住进病房后两个星期光景的事。四个看护夫正在床位中間来回忙个不停，分发早飯，这时坂井突然发作了心脏麻痺，当时大家还以为他死了，后来打了針，过一会才透过气来，他那样子，就像做梦醒来一般。大家都說，这老头儿看情形活不长久了；岂知后来竟然恢复了食欲，一点点健康起来，后来还和弘藏多次在一起洗澡。弘藏給他背上冲水，他还堆着一脸好好先生的笑容，只管說“对不起！对不起！”哩。后来弘藏听到人家說，他以前由于犯了强盜杀人罪，判了无期徒刑，一度受到假释的恩典，放了出去，在释放期間又做了强盜，才重新回到監獄里。弘藏听到他这样的經歷的时候，十分惊奇，觉得自己所想像的强盜杀人犯的脸相，和这个好好老头儿距离得太远了。

他虽則一时頗见康复，可是后来过了半年光景，終于因衰老而死在病房里了。弘藏出病房后，又回到教务科当杂役夫；每月两个非假日星期天，經常提了留声机到各病房去开給病人听；死了人的时候，还去尸体室帮忙搞装点門面的殯仪；由于这样的关系，所以后来还是有机会对坂井說几句慰問的話，并且吊他的丧。

弘藏进病房，是在 1935 年 12 月；正如他后面所說的那樣，到第二年的 3 月初，他迁出了那里。到了 4 月底，当他以教务科所属杂役夫的身分再去病房的时候，坂井已經搬到单身房里，身旁还安放着看护夫睡的床鋪。由此可以看出他衰弱的程度更加严重，半夜里必須防着点儿了。弘藏去探望的时候，坐在床上的坂井，滿脸

堆着笑容。弘藏招呼了一声：“怎么样，請保重吧。”就走开了。

6月中旬弘藏去看他的时候，他的脸已經浮肿起来了。尽管这样，当弘藏和他攀談时，他还笑着点头哩。

后来过了十多天，到6月底，他死了。在尸体室前面举行入殮的时候，他最后的工作場所紡織厂里的不滿十名的同伴，来到尸体室，等教誨师简单地誦經后，一个接一个地給死者献了香。

长时期間他积下的作业奖金，达六百八十五元之巨。如果在他临終之前，气还没有断的时候，有承受人把他弄出獄外，那笔奖金是可以带出去的；但是，既然死在監獄里，那笔奖金只好沒收入國庫了。来参加葬礼的那些人紛紛議論說：“奖金竟然接近七百元么？不錯，是該积下那么多的奖金了。因为死者一心认为只要得了致命的疾病，这番一定仍然会停止执行而重新呼吸到自由的空气，所以一向拼死命地干着活。”

等到大家走了以后，弘藏一边熄灭供在坂井遺骸前的蜡烛，收拾香炉里的香火，一边在心里向死者說了一番告別的話，然后把尸体室的沉重的門关上了。尸体室外边，准备着一只木箱，那上面写着“日本大学”几个字。他的尸首将被装进那个木箱，送給日本大学的解剖学教研室。在監獄里度过半世、結果死在監獄里的可怜人的一生，最后就是这样收場的。

言归正传。病房的东北角上，有一个害着气喘病的三十岁上下的人，名叫小西。这个人既不是小偷，又不是强盜，所以老是大着嗓子讲述自己的經歷。他以前做过大阪某紡織公司的炊事員，夸称自己曾經和一百几十几个女工发生肉体关系。他和一个年紀比自己大而且帶了前夫的孩子来的女人結了婚，不久还生了一个孩子；可是他那个早就打算逃走的女人，把生下的孩子馬上送到別人家去寄养，提出和他离婚。她的信条是：“不中用的男人等于不

中用的筷子，不能靠他吃飯。”那时男的气喘病已經非常厉害，老是躺着不能起床。可是，男的不肯离婚，劝女的領回所生的孩子，永远和他呆在一起。据他自己說，那女的十分可爱，所以尽管她百般吵鬧，他还是舍不得和她一刀两段。可是女的无论怎样也不答应，一定要和他离婚。为了杀雞給猴子看，他就把她带过来的那个五岁的孩子杀了。至于女的，他却始終不忍加以杀害。

他判的是十二年徒刑，和弘藏差不多同时下獄，減了一次刑，现在只要坐九年牢了。他經常有声有色地談起出獄以后的生活。他詳詳細細地算了一笔賬，如果在紗厂附近开一月吃食店，专做女工們的买卖，一下子就可以賺很多錢。大家背地里都說，不可能有那样好的事情；然而只要兴致一上来，他又搬出那套大賺其錢的話来了。

他来到刑务所以后，只去工厂做了几天工，馬上就进了病房，此后一直成了病号。他的气喘病常常发作，发作时就耸起两个肩膀，非常苦痛地咻咻地喘着气。因为尽在病床上躺着的话，一个奖金都弄不到，所以只要稍稍有些好轉，他就坐起身来，开始縫抹布；可是才做一两天，气喘病馬上又发作，医生給他打了針，又复睡倒了。因此，連弘藏都这样想：确实如同抛开他的那个女人所說的，这样不中用的筷子，是沒法用来吃飯的。呆在刑务所里，尽管伙食差了些，一日三餐，总还有得吃，必要的时候，还可以請人打針什么的；要是出了監獄，像他那样的人，恐怕馬上就要鬧饥荒吧；虽說事不关己，弘藏却在为他暗暗担心。而他本人呢，却老是一心盼望着出獄的日子。

这个人的南边的床上，睡着一个年齡和他不相上下、皮肤黑黑的瘦小的人。据說这个人由于得了胃潰瘍，一度停止执行，释放出去，后来毛病好了，才重新关进牢里来，可是忽然旧病复发了。这

个人逢人便吹嘘他曾經在浅草当过相公，仿佛是件体面事情一样，还經常学女人的样，把一条褪了色的粉紅腰带高高地系在胸口。

由于他害的是胃潰瘍，所以他每天吃的是两頓粥和一頓面包。弘藏非常羡慕他能吃到抹着白糖的面包。可是，刑务所里除了病情十分严重的病人，是不給面包吃的；所以直到出獄那天为止，弘藏始終沒有吃过面包。他时常想起十几年前在巴黎旅館里吃到的小面包的滋味。碰巧这时喜志子从京都寄来的信里，談起外孙們的事，說是这次郊游时，让他們带了附近新开的一家面包店进进堂所制的面包，充作野餐。看了这封信，弘藏心里只是想，就是这家进进堂的面包也是好的，此番出獄之后，一定随即到京都去，痛快快吃它一飽。

害着胃潰瘍的那个人，床鋪旁边放了一个带把手的又大又深的痰盂，一吃下东西，随即呕在痰盂里。尽管这样，他的食欲还是很旺盛，經常躲过了看护夫的眼睛，向新来的病人討剩菜吃。連沙丁魚的头，都吞到肚子里去。至于取来的药呢，反而总是偷偷地扔进痰盂里。大家背着他都說，他是想使自己的病鬧得严重些，这样才好再停止执行，放他出去。

这个胃潰瘍患者和前面提到过的那个老头儿的中間那张鋪上，睡的是一个叫大山的，他經常把被子兜在头上睡着。在弘藏看来，只有这个人是有稀有的例外，他仿佛早就作好精神准备，知道自己要死在監獄里。他睡在那里，仿佛等死一般，东西也不大吃。一味地睡着，也不和人家說話。据說他害着严重的痔瘻，可是不肯让医生給他动手术。他年紀大約五十岁上下，生得又高又大，弘藏刚进病房的时候，他的样子还很健康；可是，也許是不吃东西的緣故吧，眼看着一天天衰弱下去了。关于这个拥有强盜杀人、无期徒刑头衔的人，以后还有机会写到他。

不受新陈代謝的影响而永远呆在病房里的人,另外还有一些,不过他們全都生有重病,多半总是面容忧郁,整天一句話都不讲。可是,从工厂里来住上三天、五天的病人却不同,內中很多是口若悬河的。所謂口若悬河,它的內容十之八、九都是关于男色或女色的、露骨的猥褻話,有时几乎使人不得不掩起耳朵来。到了再也没有什么可說的时候,就翻来复去把已經說过的再說一遍。最初弘藏对于杂居房里的見聞还觉得新奇,弄到后来,那里的空气簡直叫他难以忍受了。因此,到1月中旬,他就离开杂居房而搬到单身房里去了(本来早就問他願不願搬去了);心里还想:“我要是有高尔基的才华的几分之一,准能把这杂居房的情况写得比《底层》更出色。”

到了1月底,監獄里感冒大大地流行,发着将近四十度高烧的病人,一个接一个地来睡病房,普通的病床已經不够应付了。因此,把原有的病床全都拆去,在地板上鋪了席子,让大家一个挨一个睡在地板上。以前占据着病房床位的准病人,全都搬到另外一栋房子的准病房里去了。弘藏那間小屋子里,也加了两张床鋪,得三个人同住在一个屋子里。

本来大家都是男人,可是在刑务所里,却被当作青年男女一样看待。所以,除了瀕死的病人身边可以睡一个看护夫之外,一間屋子里决不許住两个人。狹小的屋子里放了三张床,弄得弘藏身体都不能轉动了。

新搬进他那間屋子里的,是个四十五、六岁的带有前科的盗窃犯;他在工厂里做工,让机器拉断了一个大指。弘藏和他在一起洗澡的时候,因为他右手不能运用,常給他冲宽广的背,或絞干了浴巾擦身。为了报答这个情分,他常分給弘藏鸡蛋吃。因为,他是工伤,所以每天发給他两个鸡蛋作为优待。弘藏和他同在小屋子里

呆了两个星期光景，觉得这个前科五犯的小偷儿还是远比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懂道理。

另外一张床，只有夜间才有一个看护夫来睡。这个看护夫是一个已经坐了十二年牢的矮个儿强盗杀人犯，混名叫做“卓别灵”，为人很讨人喜欢，谁都同他有说有笑。他尽管并非病人，却盖毛毯，每夜用汤婆子。这是看护夫受到默认的外快。对于看护夫，另外还默认他们可以做其他种种违犯所规的事情。三大节日分发给一般犯人的红白豆馅年糕，病房里也是按人数照领的；可是发的时候，有的病人却不给，多余下来的，就一概算是看护夫的外快。纪元节那天，“卓别灵”把这种违犯所规的东西分给了弘藏，弘藏真是高兴。

准病房里的人们(二)

害痔瘻病的大山，到了2月里，眼看着衰弱下来；同时，他那患部发散出一种无法形容的恶臭，害得同室的人受罪不浅。

平常最多只住十六个人的杂居房里，现在有五十名以上的病人挤在一起，床铺也没有，只是把席子铺在地板上，席子上铺着被褥而已。大家头对头、一个挨一个、像穿成一串的沙丁鱼一般挤紧着睡在那里，只有枕头前面空出一点儿地方，让看护夫这类人走路。吃饭的时候，看护夫比平时忙了好几倍；为了分发食物，叭嚏叭嚏地穿着橡皮底草鞋走来走去，乱得简直像个火烧场。灰尘拚命从地板上扬起来。病人就得在这样的地板上摆下碗筷吃饭。所有的窗户都关闭着的室内，飞满着灰尘，中间夹杂着病人发热、发汗的体臭、尿瓶的臭气等等。再加上大山的痔瘻所发散出来的冲鼻奇臭，睡在那里的病人简直受不了。于是排斥大山的呼声越

来越高，弄得獄吏們也不能不管了。到了2月中旬，终于把他迁出杂居房，让他到弘藏那間小屋子里去住。

大概是因为大山已經病得快要死去，不妨两个人住一个屋子吧，一决定大山搬来居住，看护夫“卓別灵”就回到他原来的看护夫室里去，另外那个伙伴，也和大山相对掉，搬到杂居房里去了，結果那間单身房里，就只剩下弘藏和大山两个人。

大山一搬进弘藏那間屋子，好容易开了口，細声地打招呼說：“臭得很，实在对不起，請你原諒。”

弘藏和气地答道：“別担心吧。一点也不必有什么顾虑，自在着吧。要是有什么事情，請对我說，不必客气。”

弘藏心里想，眼看一两天里就要死去的病人，长期受到人家的嫌恶，一径顾虑重重的，但願至少让他在临死的时候，能安心咽气。弘藏嘴里虽則不好明說，滿肚子里却存着这样的心。

不过，等到当真呆在一屋子的时候，大山身上所发散出来的臭气，却几乎使人疑心要沾到自己身上来；一想到夜間把房門关上之后不知将怎样过，就不免担心。再加，这人不久就要断气了，并排睡在这样小的屋子里，在旁边看着，想必可怕得很。可是，这也是命里注定的。既然到了这个地步，就尽心使这个不幸的强盜好好死去吧：弘藏最后打定了这样的主意。

岂知才只半天，弘藏就被搬到准病房里去了。像他这种思想犯，让他住在平常沒有人監視的杂居房里，既觉得不妥；把他送到准病房里去呢，又觉得可怜；但是，现在和这个发散着恶臭的病人关在一个小屋子里，也觉得太惨了；所以管病房的獄吏终于采取了这样的措施。

前面也已經提到过，这个准病房，就在弘藏以前住的第二病房的走廊那头。那是把三层楼的北舍楼下的普通杂居房改成的，平

常只有兩間，每間規定住八人，那時又增加了一間，臨時擴充為三間。往日被收容在病房里的准病號，全都被趕到這裡來了。

弘藏就此獲得一個機會，首次在普通雜居房起居了。不論在監獄中呆了多久，以一個左翼思想犯而住在這樣的雜居房里的，除了弘藏而外，恐怕再也沒有第二個人了吧。

雜居房設在二樓和三樓上，它的構造都是相同的。這些分設在走廊兩旁的雜居房，外側窗下安放了寬大的洗臉台，周圍的小小的空地鋪着地板，左右兩壁，有着類似壁櫥的東西。一邊的櫥門上鑲着玻璃，里面分成几格，安放着碗盞啦、書啦以及其他別的零星東西。另外一邊的櫥門是木板的。拉開一看，因為沒有窗子，里面黑漆漆的；再仔細瞧瞧，原來是三尺見方的一个廁所。

靠走廊的那一面，是一排鐵框玻璃窗，從走廊里可以監視室內的一切，房門設在中間。打開門從走廊里走進屋子，中間是一條狹窄的走路的地方，兩邊各有四個人的鋪位。所謂鋪位，也不過是把地板略為墊高一些而已。整個鋪位，圍有五寸高的木板，再用同樣高的木板隔成同樣大小的四格，每格比一張席墊的地位略小。每一格里鋪上草席，就算是一個人的鋪位。

誰要是準備坐牢，就該生得矮些，否則是吃虧的。衣服雖則也分大、中、小三號，按照身材的高矮而分別不同的尺寸發下來，可是即使如此，矮個子的棉衣往往一直拖到地上，身材特別高的人，往往連小腿都露在外面。夏天倒也罷了，到了寒冬臘月，光是這一點，在防寒方面就有極大差別。尤其是在這雜居房里，鋪位是木板圍成的，跟箱子一樣，像弘藏這種身體雖瘦卻很高大的人，睡覺的時候，不把兩條腿彎起來就不成。幸亏身體瘦，還好些；要是高而又胖的人，睡在雜居房的鋪位里，就簡直成了裝在木箱里的行李卷了。被子不用說，總是突出鋪外。怎樣把它妥妥貼貼地塞進“箱

子”里，需要熟练的技术。坐惯了牢的人毕竟有办法，他们把被子一卷卷得像个卷饼，然后像结草虫那样钻进去睡。

白天把被子叠好放在脚边，抽起嵌在床头的那块五寸高的木板，横着搁在铺位两旁的板圈上，既可以当作饭桌子，又可以当作工作台。

弘藏自从搬到那里去以后，依旧缝着抹布。他不多久就掌握了作针线活的窍门。因为没有规定每天做多少，所以他就细针密缝，做出来的抹布全像刺绣一样。

准病房里没有派定看守，只有病房那边的主任看守偶尔来巡视巡视而已。所以那些准病人，大多数总是把做抹布的材料摊在搁板上，整天空着一双手，闲扯或是打瞌睡。

本来，这种只是吃饭睡觉的混日子的生活方式，尽管是在监狱里，也未免太没有意思了；可是，正由于呆在这里的缘故，弘藏一日三顿才能吃到白米饭，每天有半磅牛奶可领，夜里还照旧给灌汤婆子；结果，恋恋不舍于这几件东西，他终于一直过着这种生活，到3月初旬才算完结。

准病房里的人们(三)

弘藏初搬到这准病房里来的时候，他那间屋子里住着下面的一些豪杰。

占据弘藏的铺位的对面、门口窗下那个铺位的，是前科八犯、徒刑十年的惯窃松田。他年纪已经五十开外，中等身材，眼睛活像猫头鹰。据说他去年得了脑溢血病，久久人事不省，已经快要死了，不知怎地又救活了。左手由于中风的关系，已经不能动弹，说话也很勉强，要想说什么的时候，总是结结巴巴地说不出来。

弘藏搬到这里之后两天，他把弘藏吓坏了。他突然全身痙攣，手脚僵硬，咬紧了牙关，口吐白沫，差一点从鋪位上滾下来。弘藏吓慌了，以为他会就此死去。

看护夫来給他打了針，不久他的发作就一点一点鎮靜下来，不再口吐白沫，却不住地喊着“阿康阿康”。接着“阿康阿康”的喊声漸低漸緩，而且有了住口的时候，这时他逐漸清醒过来，一下子恢复了常态。

据說那是輕度脑溢血所引起的癲癇。他后来也时常发作，每次发作，他就不住地喊“阿康阿康”。起初人家都莫名其妙，不知道他喊的什么，后来問他本人，他在那双猫头鷹似的眼睛里露出微笑，回答說那是他从前的情妇喜代的名字。

真奇怪，这人誰对他都不好。医生也罢，主任看守也罢，看护夫也罢，都似乎存心冷酷地对待他；有的时候，甚至迎面給他一頓狗血噴头的臭罵。

有一天，他老毛病发作后，討来了冰枕，用湿手巾搗着头。那时正值雪堆得老厚的大冷天，他却滿脸通紅，渾身大汗。弘藏他們因为要去戶外做操，就打算順便把他的冰枕拿去，灌些雪在里面。哪里知道被主任看守看见了，主任看守阻止說：“如果是松田那种家伙的，就不許灌。”弘藏那时心里有些气愤，认为何必对他这样虐待呢。

弘藏私下很同情他。有一陣子，松田食欲不振，說是如果把飯做成飯糰，就吃得下去，于是用他那瘫痪了的手捏飯糰。弘藏看不过去，每到吃飯的时候，总是把自己的飯放在一边，先俐落地給他做出好多小小的飯糰来。于是他一边道謝，一边把自己那份菜分些給弘藏。平常日子里，他推說伤了风，要来伤风药和退热药，又推說有痔疮，討来錫紙包的坐药；結果那些药他自己几乎一次都沒

有用，都卷在做抹布的旧布里，像耗子做窝似地塞在铺位席子底下。那是他可以自由处置的唯一私有财产，为了笼络别人，除了用那些东西作为手段外，他再也没有别的东西了；而弘藏呢，既不需要退热药，也不需要坐药，所以他没有办法，只好把自己的菜分些给弘藏了。

他每次看到医生，就死乞白赖地要求让他到工厂做工去。因为，去工厂做工，多少可以弄一点奖金；像他那样整天在准病房里坐着，一个铜板也捞不到。其实他这种要求，并非今天才提出，过去就曾由于他纠缠不清，先后两次把他送进工厂试试，结果两次都是不到一星期，就在厂里翻倒，重新抬回病房来了。因此，尽管他发疯似地苦苦央求，给他看病的医生总是冷淡地拒绝了他。

弘藏在这个准病房里大约呆了三个星期光景，到了3月初旬，因为天气已经暖和起来，他觉得已经不要紧了，就决心离开病房。当他打定了这个主意的时候，松田对他的态度突然完全改变了。尽管如此，临别的时候，弘藏还是忠告他说：

“你的身体瘫痪，反正得靠别人照顾，所以如果不注意设法讨人家喜欢，就要吃亏的。还有，你嘴里尽嚷着要去工厂，既然这样的话，呆在病房里的时候，每天认真缝几块抹布也是好的。我到这里已经三个星期了，你不是一块抹布也没有缝么？这是不应该的。不认真干活的话，到头来还是自己吃亏呀。”

弘藏说这番话，完全出于一片好意，哪里知道松田听不入耳。他起初不吭声，过了一会儿，离开了自己的座位，走到弘藏跟前，耸起肩膀，扭着嘴巴，结结巴巴地向弘藏抗辩起来。谁都弄不懂他究竟说些什么，弘藏只听懂他说，他之所以不做活，是医生叫他那样的。他不胜愤怒地在弘藏跟前走来走去，扮出一种示威的样子。

直到那时，弘藏才明白为什么人家都那样虐待他——尽管他

是个很可怜的人——的道理，感到人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是自己所造成的。

松田的旁边，是七十九岁的骯髒老头儿才賀屋。他因为杀死了中风的老妻，还放火灭迹，被判了十年徒刑，下獄比弘藏还迟。据他說，他有一个孙儿，可是那孙儿既不給他来信，他也不給孙儿写信，平常完全是一副无牵无挂、一个人混到那里是那里的、无所謂的样子，也不发牢騷，整天只是一針針地縫着抹布。洗澡的时候，弘藏常常給他冲背；他呢，既不表示謝絕，也不表示高兴，只当做沒有这回事。由于他为人如此，所以沒有人对他好；不过，也沒有人嫌恶他。只不过往往由于弄髒了廁所，或是大便弄在衣服上、自己还不知道，受到住在一屋子里的人的叱責：“喂！老头儿，得注意点儿呀！否則人家受不了呢！”而他呢，似乎并不放在心上。

弘藏遇到的所有犯人之中，看上去似乎准备死在監獄里的，就只有前面提到过的害痔瘻的大山和这个才賀屋两人。至于松田那样的人，尽管今天身体已經癱瘓了，即使放出監獄，也不再能做小偷，馬上就得挨餓，照說刑務所應該是他最理想的归宿了，然而他还是一心一意地希望自己能因病而停止执行，重新呼吸到獄外的空气！

坐鎮在才賀屋旁边的，是監獄里資格最老的犯人松島龙藏。他年約五十左右，是个臉色蒼白、精神恍惚的人。他最初因为放火而坐牢，后来受到假釋的恩典放了出去，岂知回到家里一看，他的老婆在他坐牢时和他父亲通奸了，于是就把父亲杀死，結果判了无期徒刑，到現在已經在牢里坐了二十一年零几个月，所以是坐牢年数最高紀錄的保持者。

他整天一停都不停地縫着抹布。他縫得非常草率，一味貪快，一天可以縫上不知多少块。尽管几次三番叫他仔細縫，块数少些

倒没有关系，然而他还是老样子，从早晨起身到夜间睡觉为止，一分钟也不停手，一块接一块地缝出许许多多极其草率的抹布来。

他常常露出有些使人不寒而慄的微笑，自言自语，几乎从来不和别人说话。不过，有时忽然又高高兴兴地回答人家的问话，说什么“我的父亲是美国人，只会讲英语。母亲是印度人。父母所讲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是呀，我的父母现在都还活着，可是都不在日本。他们到底在哪里，我可不知道。我一点儿也不想看到他们。”可是过些日子，他又说他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英国人。他说这些话，究竟是开玩笑呢，还是当真呢，旁边的人就完全猜不透了。

每当他要上厕所的时候，大伙儿面前就出现一幅奇观。他把衣服后襟掖起，裤衩脱了，下半身脱得精赤条条的，然后走进厕所，大约要在那里蹲上四、五十分钟。屋子里只有一个厕所，由于他长时间独占了去，弄得大家都没有办法。从厕所里出来之后，他才把后襟放下，然后一再仔细地抖弄衣服。

他在工厂里做工的时候，因为经常捉蝉、蜻蜓、蜥蜴等爬虫以及老鼠之类活生生地吃掉，所以谁都知道他。他的番号是七号，谁都叫他“ナナバンサン(七号仁兄)”，而不称呼他的姓松岛。最初弘藏怎样想也想不出“ナナバン”这个姓用汉字应该怎样写。

松岛旁边的铺位上，睡的是一个七十八岁的大个儿，名叫纲手。以前在常陆山、梅谷^①的全盛时代，有一个幕后力士名叫大碓；大碓的末路，就是带有前科三犯、强盗杀人犯、无期徒刑的头衔的这个老头儿。毕竟过去是出名的幕后力士，弘藏和他在一起洗澡的时候，看见他依然体格魁梧，筋肉丰满，几乎有自己好几倍大；

① 这两个人都曾经是日本式摔跤(角力)的著名力士。——译者

尽管年紀将近八十，据說性机能还和少壮的人一样。弘藏心想，年过八十还生了三个孩子的蓮如上人^①，身体大概也就像这样的人吧。

有一次，在一起洗澡时，弘藏对他說：“在年紀将近八十的老头儿之中，像你这样的身体，算得是特別壮健的了。你会长寿无疆哩。”

他听了很高兴，說：“真的么？”

哪里知道他外表虽則这样壮健，当弘藏还住在准病房里的時候，就經常鬧毛病，有时忽然因为腰腿麻木，倒在厕所門口。由于他身体太魁梧，在这种情况下，光是几个准病人，抱也抱他不动，所以后来就把他弄到設有专属看护夫的病房里去了。

后来他的身体只管衰弱下去。等到弘藏出了病房、以教务科杂役夫的身分再到病房探望的时候，尽管那时已經是4月底暖洋洋的天气，而他却盖着厚棉被，张开着口，呈半睡眠状态。

后来又过了五十多天，到6月18日天亮的时候，他把腰带拴在澡堂的鉄栏干上，身体掉在浴池里，吊死了。

原来，他在未死前，經常把衣服弄髒，討看护夫的厌恶。（病人的衣服，规定由看护夫洗。）看护夫不耐煩，向他說了些埋怨的話，他还不服气，說什么人到了老年，必然会那样。于是看护夫們就越加討厌他。到了这个地步，一个老年人呆在监牢里，可就惨了。病人如果年輕，而且脸蛋漂亮的話，就受欢迎，被当成宝贝，尽管什么事情都沒有，看护夫們也老是偎到身边，爭着給做这样做那样，弄到后来，甚至造成看护夫和看护夫互相爭风吃醋。至于年紀快到八十岁的大个儿，临到老死的时候，誰也不会好好地照料他。大概

^① 蓮如上人(1415—1499)，名兼寿，本願寺的和尙，真宗中兴的祖師。——譯者

就因为看护夫拿他没法摆布，他自己也拿自己没法摆布，他才自尽的吧。

他死去的那天下午，弘藏到場参加了尸体室的法事，給死者献了香。他是1934年到刑务所里来的，比弘藏晚；进来以后，还不过两年。他留下的作业奖金只有五块多錢。他的尸首因为无人来領，照样被送到日本大学的解剖室去了。

以上的四个人，是弘藏来到准病房里的时候住在他对面鋪上的人。

从走廊进門，左边的統鋪是弘藏睡的。左边連弘藏也是四个人；这就是說，屋子里的八个鋪位都住滿人了。

一走进門，靠走廊一边的窗下那个鋪位，睡着一个名叫山崎的害气喘病的人。他原来是汽車司机，现在的头衔是：强奸未遂、强盜伤人、徒刑十年、三次坐牢。他整天不主动說一句話，是个非常沉默寡言的人。弘藏就睡在他的旁边，可是几乎从来沒有和他打过交道。由于他已經坐过三次監獄，所以睡觉时钻被窩的本領非常高强，就寢鈴刚刚搖过，他就像結草虫那样一轉轆钻在被窩里了。

弘藏的另外一旁，睡的是个名叫榎的四国地方的人。他本来因为杀人而判了无期徒刑，由于一度减刑，改为二十年有期徒刑。他是因打架而成为杀人犯的。他把对手杀了两个，伤了三个。不愧有这样一个經歷，他毕竟体格强健，富于膂力，年紀很輕，刚过三十岁，性情活泼愉快。他既有家属，也有亲戚，經常有信札来往。他曾經托弘藏代他写过几次信。弘藏为他做的事情，仅仅这点儿，他却給弘藏許多照应。比如夜里睡觉的时候，他看到弘藏不会鋪被头，經常代弘藏做好被筒。他本来在監獄的鉄厂里做工，因为腰部的筋肉出了毛病，才来准病房暂时休养；在这个屋子里，只有他

和弘藏两人既不是残废，又没有痼疾。到了3月里，他说腰痛已经好了，就要回到工厂里去；弘藏因为看到天气已经暖和了，这个人一走，自己也沒了伴，所以也打定主意离开，于是到了3月7日，就和他一道离开了这个准病房。

榎的旁边，就是前面曾经讲到的那个第二说教强盗岡崎的铺位。弘藏住到准病房里来的时候，据他自己说，他一吃东西就吐，很痛苦。他吃完饭不久，就上厕所，似乎在呕刚刚吃下去的东西。但是医生却轻易不肯相信，弄到后来，医生给了他一只大痰盂，对他說，果真呕的话，就把呕出来的东西留下来。这样一来，饭后他果真马上在大痰盂里呕起来。后来他說是吃什么都不抵用，还絕食了一些日子。尽管如此，医生还是疑心他装病。因为过去他有过这样一段经历。就是，在沒有来到这里以前，他作为未决犯关在市谷刑务所，在那里假装了将近三年的瞎子，把獄吏們全都瞞过去了；所以他的病到底是真是假，連整天呆在他旁边的弘藏，也不得而知。

后来弘藏离开病房，以教务科杂役夫的身分来到病房的时候，岡崎已经搬到专门收容肺病患者的隔离病房——第三病房里去了。据弘藏推想，他大概是因为装各种各样的假病，硬把身体糟塌坏了，此番才真地害上了肺病。不过，岡崎每次看见弘藏的时候，总是从病房的窗口探出头来，高高兴兴地和弘藏打招呼。可是后来忽然連隔离病房里都看不到他这个人了。一打听，才知道他企图越獄，计划被发觉，现在关进惩罚牢房里去了。弘藏当时听到那个消息，不禁发生了一种感慨，心想：他可能是由装病而真病，急于想获得停止执行，再一次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前科五犯、徒刑三十年，除此以外实在再也沒有合法出獄的可能），各色各样的病都装过而未能奏效，最后才企图越獄的吧。

真知子的結婚

离开病房

在病房里度过了一个冬天的弘藏，3月7日，在第九十天上，离开了那里。到将近2月底的时候，每天晚上領到的湯婆子，就越来越使人感到累贅了。一日三頓白米飯以及每天半磅牛奶，固然还很使人留恋；可是整天泡在准病房的非常阴郁的空气里，和一些稀奇古怪的病人面面相覷，却越来越叫人膩煩了。因此，他听到同房間的榎說要回工厂去，自己也就决心离开病房。他把多时未穿的自备短褲替换了粉紅短褲，把从未經人穿过的浅葱色囚衣替换了粉紅病号衣，心情来得很舒暢。他肚子里轉念：“只要再过一个冬天就行了；直到出獄为止，再也不願到这种地方来了。”于是穿上多时未穿的自备草鞋，精神抖擻地出了病房。

出了病房一看，原博士的研究室里已經沒有席位了。弘藏刚进病房的时候，研究室里只剩下大貫一个人在工作；可是在去年年底的大正天皇节，大貫终于受到渴望已久的假释的恩典而出獄了。大貫走后，就調进一个年輕的左翼思想犯岩船和一个暗杀井上准之助的右翼青年小沼，充当原的助手。于是，弘藏又重新回到图书館去了。——当初那个把弘藏安插在图书館里几乎过着游手好閑的生活的谷内所长，这时已經調到別处去了，新所长椎名，也不便把弘藏的待遇降低，所以使他重新回到了他原来的位置。这样一来，弘藏又成了沒有指定工作的人。虽則从此以后他总是尽量主动地找事情做，但是，直到他出獄那天为止，也沒有固定的作

业，始終維持了特殊犯人的地位。长时期中受着这种待遇的犯人，全国恐怕沒有第二个。

弘藏离开病房的时候，真知子的婚姻問題，已經进行得很有眉目了。但是由于二·二六事件的关系，獄内外隔絕，有好些时候他沒有能和重子见面，从她那里直接听取后来的詳細情形。

二·二六事件发生当时，弘藏还在准病房里，可是第二天就听到发生了某种大事件的风声。打扫走廊的那批所内清洁夫中間，有个政教社一伙的右翼政治犯，名叫高岛的，他在27日早晨，趁看守不在，从走廊里把头凑到准病房窗口，低声地說：“本田先生，似乎发生了什么大事件哩。詳細情况还不知道，只知道事情出在外面，不是獄里。据說宪兵来到監獄，把守着大門哩。”

到3月1日，弘藏早已听說事件的大致情况。本来，刑务所这种地方，是严格固守着秘密主义的，尤其是社会上有了什么騷动，原則上絕對不让犯人知道；可是就像准病房这样的絕域孤島，居然能透进这样的一星半点消息。

但是，由于二·二六事件的关系，害得一般犯人在很长一个时期内被禁止和獄外的人见面。

事件发生的第二天，2月27日的早晨，积雪还没有消溶，重子在人心恟恟之中，来到小菅刑务所探监。下了电車后要走的沿荒川堤那一段路，几乎没有什么人家，路非常坏。特别是从大街横里岔出的刑务所正面那条路，雪一点也沒有扫去，地上几乎連脚印子也不见一个。穿了高底木屐的重子，每步都得踩进很深的雪里，跌跌撞撞地好不容易才走到刑务所大門口。一看，那里和往常不一样，大門关得紧紧的，門口安着新的木亭，两个宪兵在那里站崗。

等了一星期，到3月6日，她又来到小菅，打听到暂时不許接见，就此回去了。

直到春分后的3月23日，弘藏才见到了重子。

弘藏哪天都在惦念着真知子，当时听到說已經为她择定了吉期，也就放心了。

真知子的婚姻問題，还是去年秋天开始提起的。最初她不肯听从母亲的話。1935年10月初旬的重子的日記里，記着这样一段話：

“到庆应医院去看真知子。真知子說：‘希望暂时千万别再提婚姻問題。尽管对方人品很好，要是错过机会，将来也許会后悔；但是，假如因为有人求婚，就馬上答应下来，开始过平凡的生活，那末当初来学产妇科，就完全成了多此一举。我打算独立生活下去，虽然这也許会是一场梦。不过，听到这样那样的一些話之后，連自己也沒了主张，这使人很恼火。’这样看来，她骨子里并没有什么坚决的信心，只是因为她辛辛苦苦筑起的立足点，眼看着将因环境影响而崩潰，才恼火的。”

关在牢里的弘藏，从来沒有和真知子单独談話的机会，因此全然无从知道她对助产妇工作寄与怎样的願望。他只是从普通做父母的心理出发，认为要是适当的婆家的話，机不可失，不管怎样，还是进行一下好。

因此，弘藏心里老这样想：果真拒絕結婚的話，那也沒有办法；只是在正式作出拒絕的答复以前，希望能和真知子见一次面，也好亲自开导她一番。

10月13日那天，重子領着真知子来探监了。最初弘藏以为事情絕无成功希望，只是打算最后叮嘱她一番而已，哪里知道真知子竟然答应按照父母的希望，平心靜气地重新考虑这个問題，这下弘藏可真是高兴得什么似的。

重子当时的日記里把真知子这个心理变化說成是“既使人高

兴,又使人觉得可怜”。

弘藏 10 月底收到重子的来信,信里写着这样的话:“牵牛花越开越小了,每天早晨却还开得很可爱。葫芦花的新蕾还很多。”重子现在住的地方,弘藏没有到过,所以任凭他怎样估摸,也描绘不出一个轮廓,正在无可奈何,却来了这样一封信,虽则短短几句,对于他来说,也非常令人神往。可是,比任何一切更使他高兴的,乃是像春天的嫩草日长夜大那样,真知子的婚姻问题似乎一天天有所进展。——向真知子求婚的那位青年都筑,最近曾亲自来到家里,向重子作了简单的问候,据说下一个星期天还要来,预定那一天真知子也回家和他见面。双方已经约好,先无拘无束地随便交起朋友来。重子那时的信上写的就是这样一些事情。

从那时起,弘藏一闲下来就在自己心里描绘着一对年轻人的种种情况,感到莫大的安慰。

到了年底,婚约就订定了。那时弘藏还住在病房里,向看护夫借来铅笔,在手纸上写了一首十六行诗,开头几句是这样的:

誰都夸贊你少年英俊,
小女儿哪配和你联姻,
如今蒙你垂青,
真为她行将出阁而高兴。
牢里的我才然一身,
只好在心里举杯相庆,
唱着这首歪诗,
怀念着没见过面的您。

以上这些都是弘藏还住在病房里的时候的事情。

离开病房以后,3 月底会到长久不见的重子,才知道真知子的婚礼决定在 4 月底或 5 月初举行。重子还详细地告诉他,到

那时打算只邀请几个至亲好友，十分朴素地办这件喜事。

隔了半年才见面的真知子

当时有关真知子的种种消息，简直使弘藏完全忘掉了牢愁。

他3月底收到的重子来信，信封上盖着“根据戒严令而启封”的紫色戳印，信里叙的都是些家常。

“和雄姑爷(按：指大女儿的丈夫田村，那时他正在外国留学)来了一封信(他好久不来信了)。信写得非常生动，我愉快地反复读了几遍。信上说真知子大喜，他非常高兴，还说岳父母也一定大大放心了。又说正式的贺仪会由京都方面致送，他自己送一只手提包，作为非正式的礼物。又说他在德累斯頓，沒有见到好貨色，去柏林的时候，利用半天空闲，跑遍了温特頓林頓、萊比錫、陶温丁等几条大街(等于东京的銀座、上野、浅草、新宿)，才好容易买到了。据说那是最时髦的貨色，我怕的是也許太漂亮了，和別的东西不調和；不过，花了那样大的心机送东西来，我多么高兴呀。想必您也一定高兴的。他信上还說，他很想亲自参加婚礼，只因留学期限还有一年半，沒法如願了。……”

“来信还说，他固然很牵記孩子們，但是，自觉身在国外，牵記也沒有用，所以索性把一切都交托給了喜志子，平常也就不怎样牵腸挂肚了。看到这些話，我心里真高兴。

“幸而有这样的好姑爷，排遣了多少丧失娇儿的凄凉呀！我真是太幸福了。……”

“现在只等一年多以后的大团圓了。

“两三年以前，成天担心着您和真知子的命运；现在一想到再过一年多，外表虽則和以前不一样，大家又可以在一起欢笑，总不

免觉得受之有愧(这话虽然说得有些不伦不类)。”

弘藏看完这信,眼角湿了。后来他又想到了田村。

田村一听到弘藏被捕,马上赶到东京,去中野警察署看弘藏。那时弘藏还不许接见外面的人,所以他只好把京都带来的名糕点“黄梁”送进了拘留所。弘藏收到之后很高兴。后来审判终结,法院判了弘藏五年徒刑;到弘藏撤回上诉、判决确定时,他又从京都来探望。那时正当残暑还很厉害,一天下午,他坐了汽车,来到市谷刑务所门口。无论那刑务所的大门也好,高墙也好,在他都是从未见过的东西。在传达室办完探监的手续,等了一会,他被领到接见处,就站在黑暗的小房间里。在旁监视的看守抽了一下绳子,挡在前面的木板霍的一声吊了上去,铁丝网那边出现了弘藏的脸。他一眼看到弘藏,似乎发了愣,不声不响地俯下了头。弘藏想起当时那个光景,至今还历历在目。到了1935年,田村以文部省留学生的资格到外国去留学,决定乘4月4日的香取轮动身,2月19日他到这小菅刑务所来向弘藏辞行。这到今天已经一年多了。他本来住在得累斯顿,为了给真知子买手提包,还特地去柏林,找遍了市内的大百货公司,看来他已经习惯了那边的生活了。

另外,在3月底,弘藏还接到长久不给他来信的真知子寄来的信。注明了3月25日的发信日期的那封信里,写着下面这样一段话:

“日子过得真快,后天我们就要举行毕业典礼了。我是否已经成为一个优秀的助产妇,连我自己都抱着很大的疑问;可是,也许因为平时干活认真和学科考试成绩良好吧,听说要奖给我一只表哩。”

还有重子来信又提到,毕业典礼那天,真知子被推为毕业生代表,宣读了毕业生答辞。

这类事情，在旁人看来，也许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对于身在狱中的弘藏，却是莫大的欣慰。那时他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得了一只表的消息，也使我欢喜非凡，甚至于疑心今生今世是否会再有这样使我欢喜的事。”

毕业典礼举行过后，29日那天，真知子收拾了寄宿舍里的行李，回到了重子身边。31日那天，母女两人一同来探望弘藏。学习期间，真知子没工夫来探监，所以这次几乎是半年来第一次的见面。

弘藏那天的日记里这样写着：“还以为助产妇的学习把身体弄瘦了呢，哪里知道并不是这样，看去倒胖了许多，很健康，这使我放了心，感到很轻松。”还做了这样一首歌：

在凡百偏爱的爸爸的眼里，发了胖的孩子呀，你显得更可爱了。

重子那天的日记里，又这样写着：“长久不去小菅刑务所，今天和真知子一道去了。他一切安好，说是身体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健。还只管喜洋洋地上上下下打量真知子。”

那时弘藏真把牢愁忘得一干二净了。

真知子的结婚

4月3日是神武天皇节，不用做工。那天清早就下着一阵阵的雨。弘藏呆在自己的牢房里，把宣纸铺展在鹭扭的洗脸台上，吮着笔毫（那时已经准他购买纸墨笔砚了），仔仔细细地在一张纸上录下题作“献给都筑君”的十六行诗（那首诗还是他住病房的时候做的），另一张纸上配合着诗的行数，抄出十六首短歌。十六首短歌的题目是“祝贺真知子”，全文如下。

祝賀真知子 短歌共十六首

岁尾年头做的歌

亲爱的孩子呀，祝你幸福无量；明年春天纯洁的爱情结了果，愿你兰桂齐芳。

明年春天你要出嫁了，牢里的我在睡不着觉的晚上都牵记着你。

真知子的春天毕竟到来了

芳菲的时节到来了，现在嫣红的桃花开得香喷喷的，正是烂漫的艳阳天。

花开遍地，蝴蝶都沉醉在芳香里了；去吧，趁这春光明媚的时节，成家去吧。

独自在牢里欢喜

娇儿快要出阁的春天，我心满意足，觉得一切都光明灿烂。

这样可喜的春天，竟单单一个人在牢里度过！

反复歌唱同一件喜事

坐了三年的牢，到今天我才深深体会到有生之乐。

今年的春天太使人高兴了，男子汉的我，不禁在牢里哭了。

祝福未来的新家庭

艳阳光里大朵牡丹花璀璨如锦的时候，正是你做新娘子的时候。

但愿你所开始汲取的泉水，是世代永远汲不完的泉水。

幻想出狱以后的事情

听说你住在吉祥寺，我们也想邻近那可爱的地方住下。

但愿哪天能和你一块儿去访问你爱人的家乡越后地方。

先是听说你祖母送给你贵重的腰带，后来又听说你姊夫路远迢迢

地从德国給你送来了真心誠意的礼物，高兴得不禁流了眼泪；我身为爸爸，却只能送你八联十六首拙劣的歌。

你爸爸因为在坐牢，除了送你几首拙劣的歌作为祝賀，别无他法。

要是在家里，也好把这拙劣的歌贴在小屏风上，作为你的嫁妆。

跋

我这几首歌虽則拙劣，有心人却准会看出其中所包含的真实感情吧。

有心人准会把我这十六首歌看成是串在紅綫上的真珠吧。

弘藏把抄好的詩和歌封在信里，交了出去。本来，未决时期拘留在丰多摩刑务所里的时候，那里的獄吏曾对他說，刑务所里的规矩，一律不准搞創作，所以信里不許写自己所做的詩歌。因此，他还担心这种东西封在信里，不知能不能太太平平地准許发出；結果还好，这封信似乎順利地通过了檢閱。不久弘藏就收到真知子的回信，回信的日期注明是4月11日，信里有这样一段話：

“今天早晨接讀了爸爸的信。信上慨叹說是由于身在囹圄，唯一的礼物就是这几首歌了；而我們呢，也觉得爸爸不在家，是一件莫大的憾事，因为如果有您在，我們將更加高兴。不过，此番收到您这样至誠的礼物，我觉得我的福气比誰都大，真正高兴得連話都說不出来。家里的三个人輪流地讀着，受到莫大的鼓舞，觉得爸爸为我們那样地欢喜，我們实在應該好好努力，以期不辜負现在的际遇。我們真正从心底里向您道謝。大家都說，馬上就去拜托津田先生，等到我們結婚那天，把它挂在屋子里，受爸爸的祝福。”

信上有“拜托津田先生”的話，那是因为弘藏信上叫他們去請他的朋友津田青枫在那两张宣紙上作些裝飾画。

津田青枫接到那两张从監獄里寄出来的宣紙后，就把折縫弄平，在每一张上画上金色的云彩，又在那首詩的周围配了綠色的春

兰，歌的周围配了粉紅的櫻花，另外在剩下空白的地方，遵照弘藏的要求，填了这样几句话：“叫我在尊人弘藏氏从没有自由的小菅刑务所寄来祝贺爱女完婚的紙片上画点东西，欣然命笔，就画了櫻花和春兰。”

填完以后，青枫也多少产生了些感慨。他终于用真知子的口气吟了这样一首歌：

欣逢疑是梦境的这个好春天，可怜爸爸却还没有释放出来。

5月11日，真知子婚礼的前一天，只带了一个最小的男孩子从京都来参加妹妹的婚礼的喜志子，伴同重子和真知子来看了弘藏。

第二天，5月12日，就是真知子结婚的日子了。那一天，当弘藏早晨起身的时候，雾还很重，不久就放晴了，整天苍空里没有一点云，只有一抹犹如飘在笔洗里的铅粉那样的淡白的雾气，乃是近来少见的上好天气。弘藏来到图书馆，一翻日历，原来是个黄道吉日。

那天弘藏领到了三个撒上黄豆面的、很大的蓬蒿糰子。那是所谓“完成任务百分之一百五十”的“优待”口粮。图书馆里杂役夫的工作并没有什么定额，而是随着作业等级的递升，被认为“完成任务百分之一百五十”、“完成任务百分之一百八十”或“完成任务百分之二百”。那时弘藏的作业等级被鉴定为二级，所以尽管几乎整天闲着不做什么事，还是被认为完成任务百分之一百五十，因而享受到作为奖励品而发给的这种特殊的食物。弘藏把这天偶然发给的蓬蒿糰子当作是今天自己的喜筵，津津有味地吃了下去。

13日那天，弘藏收到了“顺利成礼”的电报。他拿着这份电报，心里转念：婚礼结束后，喜志子恐怕就要回到京都去。因而

十分希望能再和大女儿见一次面，终于做出了下面这样两首歌。大概是由于旅途的劳顿，以及母女姊妹难得碰头，谈到深更半夜才休息的缘故吧，11日那天接见时，喜志子显得十分疲惫，因此弘藏心里一直牵记着这件事，很想再见她一面，端详端详她的模样。两首歌是这样的：

无论路有多么远，无论身体多么疲倦，要是能随心所欲，多么想赶去再见到你一面呀。

尽管是个男子汉，分手后想再见到你一面的做爸爸的痴心，望体谅吧。

真知子的婚礼顺利结束以后，弘藏每天伸长了脖子盼望一对年轻夫妇的来访。

那时候，弘藏在上午和下午的休息时间准去散步的第一病房的院子里，种着许多罌粟。罌粟花的骨朵儿眼看越来越肥大，早开的花骨朵，已经绽出轻纱般的花瓣，临风摇曳着。罌粟花的寿命十分短促，供在瓶里，一会儿就萎败了，即使在地里，也保不长久。只要有一点儿微风，花瓣就飘落满地；转眼之间，就只剩下青色的罌粟果儿，在雨里淋得湿湿的。等候一对新夫妇等得不耐烦的弘藏，给从来没有见过面的新郎寄去这样一首歌：

等你等得望眼将穿，你连信也不来一封，罌粟却花开花谢，零落得干干净净了。

弘藏盼望至少马上会来封信，哪里知道都筑也有他的难处：不等见过一次面，这封信委实不大好写。

直到6月28日，新夫妇才同道来了。那天恰恰是星期天，本来一般不准接见，可是都筑由于工作上的关系，除了星期天之外就不能来，所以预先申请批准了特别接见。

那天从早晨就下雨。因为那个星期天不是停工的日子，弘藏

整个上午提着留声机，依次訪問了第一病房、第二病房、第三病房和准病房，心里一个劲儿巴望着時間快点过去。

下午一点钟模样，新夫妇来了，弘藏这才初次见到了自己的女婿都筑。带他們两人来的重子，站在旁边，看到一声不响突然和都筑握手的弘藏，脸色刷地变得鉄青，心想他今天准是兴奋了。

由于一肚皮欢喜，弘藏那天做了五首歌。

只因为今天是待望已久的和你见面的日子，天才破晓就連忙起身了。

罌粟花还没有开，就尽等着，秋葵花开得紅紅白白的时候，好容易才见到你。

秋葵花开得紅紅白白的时候，才见到你，令人难忘的秋葵花呀。

看到眼前的一对璧人，高兴得不知說什么好，只能顾左右而言他。

和你相见的当夜，心里高叫說，这輩子活得好呀活得好。

那时病房的花园里，正盛开着秋葵花。幸运的是，那时弘藏的刑期，已經不滿一年，第二年的秋葵花都看不上，就要出獄了。

下 坡

所余无几的刑期。和伊藤証信见面

真知子結婚这件事，就仿佛使弘藏忘掉了越过那不易越过的最后一个山头的艰难困苦。一对年轻夫妇初次来到监狱里看他的时候，他的刑期已经不满一年了。既然一年都不满了，那末纵使关在监狱里，心情也顿时开朗起来。他的困苦的狱中生活，已经到了走下最后一个山坡的阶段。山脚底下，尽管隐隐约约，离得较远，但是暮靄里已经透出自己家里的红红的灯光了。弘藏打起精神来了。

经过这番死里逃生的旅行和颠沛流离，哪里想得到还能活着回家呀！

这首歌是后来他出狱时拿给新闻记者看的几首歌里的一首，其实早在一年之前——这年6月1日，就做出来了。因为，一交6月，他心里就勃然翻腾起明年6月就可以出狱的喜悦。

6月16日那天，剩下的一年刑期开始一天少似一天的第一天，看守们浑身上下都换了白制服。弘藏禁不住高兴，又慨然做了一首歌。

我的刑期毕竟快要满了，衰老的身体里弥漫着力量。

歌虽则做得不好，那时他却真是觉得身体里弥漫着新的力量。

重子在同一天给弘藏的信里也说：“今后连今天在内也只剩了一年了。从下一年的明天起，那种地方就不用再呆了。但愿今后一

年中身心更加健快。”

重在写这封信的前一天，曾經冒着烈日当空的炎热，来到大东京的东头的小菅刑务所，看了弘藏；回去的时候，又到西头的吉祥寺探望了真知子的新家庭。信里也讲到了这件事。

“昨天同您见过面后，还兜圈子去吉祥寺看了新家庭。屋子里空气很好，舒暢地坐在重藏姑爷（按：指都筑）給架起来的简单的帆布长椅子上，看着那一对极其簡朴却十分和睦的年輕夫妇，我就像在做梦一般。您寄到吉祥寺去的信，我也看过了。您提到临被捕前和真知子会面时的心情，使我連带想起了当时我自己的心情，不禁落了眼泪。当时一想到她舅父被捕以后，真知子不知将落个什么样的下场，簡直坐立不安，而这种事情，又不能对我哥哥讲，又没有一个可以商量的人，急得我有时就在大久保的鋪八张席垫的屋子里（按：弘藏逃出家庭以前住的那条街，叫大久保；弘藏走后，重在依旧独自一人在那所大房子里住了一些时候），嘴里叫着真知子的名字，一边哭着一边踱来踱去。真的，这四年来发生的种种事情，說也說不完。现在看到小两口子过着那样平凡而和睦的生活，一想起当初那样地提心吊胆，就觉得格外幸福，料不到这样的日子来得如此快，簡直疑心是在做梦。尽管这样想，人的欲望却是沒有止境的，又想到他們那里沒有自来水，要是能找到有自来水的房子多好呀，等等。”

6月底，弘藏写了这样一封信。

“刑期终于不滿一年了，定下心来想想，一想到明年的今天就可以不呆在这里的时候，无论看到什么，遇到什么，都不觉得那么叫人难受了。比如，现在牢里的病房旁边，秋葵花盛开，看到这个，我心里就想：‘明年可就不再在这里看盛开的秋葵了。’又如，蚊帐新发下来的时候，我又想：‘这回是最后一次在这里用蚊帐了。’我

心里絲毫也不焦急，非常宁靜地想着这类事情，一半还夹杂着类似珍惜的心情，一天一天打发着日子。我离家快四年了；当初离开家庭的时候，做梦都沒有想到会有今天这样的一天，可以屈指計算和大家欢聚的日子。”

越过了险阻的他們，到了这个时候，才仿佛走近有人烟的地方那般，大家不期然而然地同样追想过去，希望未来。

弘藏一路下坡的样子，在別人眼里似乎也显得很有劲头。7月18日那天，他青年时代的朋友，“无我爱”的伊藤証信来刑务所看他，后来在《无我爱》杂志上发表了下面这样一篇印象記。

“河上兄：。

“很对不起，請允許我称你河上兄。近来在报纸上看到你最亲爱的小姐此番締結了美滿的婚姻，据說你在牢里听到这个消息，高兴非凡，而且放了心。我无意之間讀到这个消息，深深觉得只此一端，也就充分表现了河上的为人的純真。同时我感到無論怎样都得和你见一面。

“河上兄！

“在我将和你见面之前，我心里不断地作着种种的推測和准备：推測你将不知怎样消瘦，脸容又不知怎样地忧郁，还考虑一见面自己第一句話将怎样讲。可是，等到见了面，和你隔着一张小桌子，对坐在那教务室旁边的屋子里的时候，心头忽然涌上一种无法形容的激情，再也忍耐不住，终于不自觉地当场哭出来了。事后回想起来，那决不是由于悲伤，也不是觉得你可怜的緣故，反而是因为看到你虽然消瘦，态度却爽朗愉快，无忧无虑，沉着融洽，有說有笑，于是我自己也放了心，松了一口气，觉得两个人的心忽然紧貼一起，絲毫隔閡都沒有，这才不由自主地哭了。”

弘藏的参加“无我苑”、热心地搞了一个时期的宗教运动，是大

女儿喜志子出世前后的事，已经是三十二、三年以前的老话了。后来记得还和伊藤见过两三次面，不过详细经过已经记不清了；这一次，他以自从脱离了“无我苑”三十年来第一次见面那样的心情会见了伊藤。按照老规矩，他也不知道来探监的人是谁，就糊里糊涂地被叫了出去；走到教务室里一看，出乎意料之外，来的乃是伊藤。他原来炯炯有神的目光，现在显得十分柔和，苍白的脸色现在变成赭红，头发白了而且秃了顶，衣服也和过去不一样，穿的是西装，可是骨相依然如故；弘藏见到他，就像见到家乡的人一样。这时伊藤没等开口，就伏在桌子上发出痉挛的啜泣来。事情来得突兀，弘藏一时不知怎样才好；等他恢复了常态，弘藏才滔滔不绝地随便谈着自己对于宗教的看法。当时有教务主任和一个看守部长在旁边守着。弘藏的话说完时，伊藤回头对身旁的教务主任说：“怎么样，不是谈得很好么？”

新从广岛调来的教务主任惶惑地答道：“我什么都没有听懂。从旁听来，有好多地方都很可疑。以后我再慢慢说吧。”

弘藏暗想，这个主任枉为和尚，浅薄得很，所以事实上我们的谈话，他可能真地丝毫没有听懂，实在可笑。

下狱前的弘藏，没有明确这样一个问题：自己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可是又认为有所谓宗教真理，这会不会和自己的立场发生抵触？因此，他也就难免抱有戒心，不大敢接近宗教家，怕弄得不好，会妨害他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但是，现在由于检察官的要求，他已经在《论宗教真理》那篇文章中把自己的看法做了一个总结，所以上面所说的那种顾虑，已经丝毫都不存在了。他本来一向非常尊重专家；不过现在，即使和一般所说的宗教家打交道，他也已经不致产生什么自卑感了。所以，见了伊藤，他也自始不抱什么戒心，能够非常随便地谈东说西。会见后伊藤所写的那篇文章

里，非常明显地可以看出他心里也确实是那样一种反映。

严格单独看管的牢房里的人们

6月1日起，弘藏又添了一项工作，那就是，开饭的时候，帮同伙房里的炊事夫给昼夜独居的人们分发饮食。

从伙房里运来的家伙，一个是浅口大木箱，里面放满了模子里扣出来的麦饭，一个是装菜的木桶（形状和大小完全和狱外所用的粪桶一样），还有一个是盛汤的木桶。其中，放着饭的木箱装在一辆手推车上，由一个炊事夫推着车，送模子麦饭，每个牢房一份；菜桶和汤桶装在另一辆手推车上，车前车后都有一个人，管发菜的那个人，向后倒退着走，给每个牢房送进适量的菜，管发汤的那个人，一边推车前进，一边给每个牢房舀一杓子汤。

这个队伍的前后，都有一个看守。走在头里的那个看守，把牢房的门一个一个打开。跟在后面的那个看守，一边监视分发饭菜，一边依次关上牢门。

牢房里的人，听到开饭的喇叭一吹响，就停止作业，把盛饭的大饭碗，装菜的同样的大碗（都是白陶器）以及盛汤的罐子，一一放在牢房门口；等门一开，依次拿出两只大碗和罐子，领那发给的东西。

前面也曾提到，工厂里附有饭堂，凡是去工厂做工的人，除了停工的日子以外，一天三顿饭都在工厂里吃。可是对于那些严格单独看管、整天关在牢房里的人来说，牢房既是工作场所，又是睡觉的地方，又是饭堂。因此，只有那些昼夜独居牢房，一天三顿饭，顿顿得由炊事夫把饭食分发到各个牢房里去。

这种昼夜独居牢房，前面也已经提到过，南部的各舍，每舍都

有一层楼。第一舍和第二舍都設在三楼上，只有关精神失常者之类的第三舍，設在最下的一层。弘藏刚进这刑务所的时候，思想犯全都关在第二舍的三楼上，却把弘藏一个人同这批人隔离开来，关在第一舍的三楼上。可是，后来思想犯越来越多，等到弘藏充当炊事夫們的助手的 1936 年的夏天，弘藏所隶属的第一舍的三楼上，也关了五、六个左翼思想犯；另外还有三个声称不轉变方向的左翼思想犯，被夹在精神失常者一块，关在第三舍的楼下。因此，当时第一、二、三舍，沒有一舍不关有左翼思想犯的。但是，开飯时候让弘藏去帮忙的，只限于第一舍的三楼和第三舍的楼下，不让去第二舍。这是沿用旧习，因为他刚入所时就是这样，当时思想犯全都关在第二舍，只有他一个人被严重地同那批人隔离开来。最初，所长本来对弘藏采取了严格隔离的方針；等到刑期过了三分之一的时候，对他的戒备就解除了，給了他几乎同“独步者”一样的自由；可是因为所长后来那个方針沒有貫徹到下面，所以直到当初那个所长早就調走了的今天，下面那批獄吏还是毫无意义地把当初的吩咐当作命根子那般地墨守着。这种办法，直到弘藏出獄那天为止，一直沒有改变。

根据炊事夫的需要，弘藏有时每頓飯都帮着发，有时只管中午和晚上，有时只管第一舍；不过大致說来，直到他出獄那天为止，将近一年中間，他每天都做这项工作。他管的老是最簡單的舀湯。

舀湯这件工作，造成了他和关在昼夜独居牢房里的各色各样的人們相接触的机会。那个工作虽則不算是什麼体面的工作，但是因为其中有这样的乐趣，所以他很高兴地承担了下来。

他所以能有机会看到关在第一舍楼下的、各种各样的精神失常者，也出于舀湯这件工作之賜。

有个名叫山岡的杀人犯，精神失常得比較显著。因为他随便

扯破被褥，所以終年只发給他一床褥子；他把那褥子直接鋪在地板上，成天躺在上面。隆冬天气，还是那样。碗盞等总被他打碎，所以不給他。他用一个浅口木碗盛菜，一片小小的木板放飯。菜总給得很少，飯給的总是分量最少的十等飯。唯独对他一个人不发給湯。因为据說营养一好，他就会乱吵乱鬧，所以才这样对付他的。

有一次弘藏看到他洗澡。他渾身脫得光光的，右手被反綁在背上，左手遮住阴部，让一个杂役夫像赶狗那样把他带进浴室。随后一个看守走了进来，这时杂役夫就把他的左手也硬掰到背后，用绳綁牢，然后把他抱到冲洗的地方，兜头給他冲上几桶水，渾身抹了洗衣肥皂，用刷帚嘩嘩地給他洗刷。那副光景，簡直慘不忍觀。

山岡的顴骨很高，目光炯炯；可是他隔壁房間里一个名叫河本的，有一张圓圓的虛腫的脸，經常是疯疯癲癲的样子。这个人用的也是木碗和木盘，每次发給他飯和菜的时候，他总要在木碗木盘上垫上三、四张手紙。

“喂！給你盛飯啦，把手紙拿开吧。”

“干么呀。拿开了紙，不把飯弄髒么？那成什么話呀？”

就这样，連帶湯的东西他都垫了手紙来接。发給他的碗和盘，都是工厂里做出来的嶄新的，所以他非常珍爱。这人犯的罪，是杀害尊亲，判的是十二年徒刑，据說他头年来到这个刑务所时，已經精神失常了。如果騙他說給他飯吃，他經常会到走廊里来，曼声唱些流行歌，这是他的拿手好戏。为了消遣，主任看守往往把他拉出牢房，让他唱歌，引以为乐。

另外有一个人，每当牢房的門一开，就像脱兔那样飞快地跳出来逃跑。那个人容貌丑陋，又瘦又矮，年紀不过三十岁上下。据說害着肺病，每天发着三十九度以上的高烧，可是还背着手带上皮手

鏽，滿屋子里隨地吐痰。大概是因為不能洗臉的緣故吧，滿臉雀斑、又小又黑的那張臉，越來越黑了。每到要開飯的時候，他就躲在門背後，看守如果不小心中開了門，他就立即躡到走廊里，飛也似地逃跑，結果每次總是隨即讓看守追到走廊盡頭，拳腳交加，揪着關進牢房。走廊的出入口，鐵將軍把着門，逃是無論如何逃不掉的；但是，儘管遭到那樣的毒打，只要有個空子，他總是忘命地逃跑。他每天只吃一頓飯，一心以為多吃了就會遭到毒打。如果別人勸他不用擔心，多吃些沒有事，他反而發怒，說人家存心和獄吏串通了欺侮他。他因為和繼母通姦，犯下把父親傷害致死的罪，可是只判了七年徒刑。大概在審判的時候，他已經精神失常了。

同樣是精神失常，有的人却很安靜。有個名叫柴垣的，也是個殺人犯，原來據說是和尚，他平常總是蹲在牢房門口，自言自語，聲音低得聽都聽不清。

“喂！吃飯啦，快把碗拿出來。”

“別嚷嚷。皇后娘娘正給我打電話哩。”

說完，他頭都不回一回，獨自應道：“是，是這樣的，您哪。”仍舊一個勁兒嘟囔着。

不過也有人和他正相反，常常心血來潮地大聲呼號。據說這個人半夜里叫起來的時候，住在附近牢房里的人，全都被他吵醒了。

這樣的情景，在一些精神病醫院里，也許是司空見慣的事，可能還有許多更可笑的病例以及更可怕的偶發事件；為什麼要在這裡費这么多的篇幅寫這類事情呢？這是因為這個第三舍樓下不僅關着這些精神病患者和精神失常者，夾雜在這些人中間，還有那些不肯轉變方向的左翼思想犯，永遠被關在晝夜獨居牢房里。

在弘藏幫同開飯的期間，那里關着下面這樣三個思想犯。

加藤定吉。牵涉在和歌山发生的共产党事件里；因为用手枪打伤了警察，所以除了违反治安維持法，还犯了伤害罪。徒刑九年零五个月，被捕以来一共关了六百十天。1935年6月入所。

胁村英彦。徒刑六年，被捕以来一共关了三百五十天。1935年3月入所。

板谷敬三。徒刑五年，被捕以来一共关了三百天。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毕业。被捕当时，在产业劳动調查所工作。1935年3月入所。

弘藏早就听说有这么几个人关在第三舍的楼下，当他第一天帮同开飯的时候，尽管一面得注意做那不內行的舀湯工作，却仍然觉察出誰是板谷。第二天，連胁村和加藤也辨认出来了。因为他們三个人都是知識分子出身，所以尽管身上穿了赭色囚衣，还是一看就辨别出来了。

到弘藏出獄那天为止，他們三个人一直关在老地方，沒有变动。看来，只要他們坚决不肯轉变方向，那末不仅不会解除他們的昼夜独居，恐怕还要讓他們一直呆在第三舍的楼下吧。尽管弘藏和他們一样，不肯在思想上轉变方向，但是，只关了一年半的严格单独看管牢房，就解了禁，他一方面为自己的幸运庆幸，另一方面不禁对他們三位在那样阴惨的空气里长期苦熬、却始終保全操守，表示同情和尊敬。

思想犯所写的讀后感

图书馆里有专门借給思想犯看的特种图书。那是什么地方捐贈的。因为哪个教誨师都懶得出奇，怕管这些事，所以这类图书的出借，也就完全交托給教务科的杂役夫头儿立川一手办理。本

来，凡是借这类特种图书看的人，有义务在借书时附带发給他的紙上写出自己讀后的感想；可是无论写出什么东西，懶惰的教誨师从来没有过目，倒是管借书工作的立川和他的帮手弘藏，还偶尔挑几篇有趣的看看。

弘藏觉得最有意思的，是那类讀后感照样表现着每个作者的性格。

在宣称决不轉变方向的几位思想犯里，弘藏对于板谷所写的讀后感最表敬意。有些地方，想法完全和他自己的一样，几乎疑心那篇东西是出乎他自己的手笔。

对于《对馬克思主义的哲学批判》那本书，板谷写了这样的感想：

“假如像著者所說的那样，馬克思主义不过是脱离实际的空洞理論，那末饒我怎样愚鈍，也不至于坚信这个主义，以致坐进監獄吧？”

“可惜的是，究竟是幸运呢还是不幸呢，我亲身所学习的馬克思主义，并不是那样的东西。和本书的著者正好相反，我确信只有馬克思主义才能使我们真正理解现实的社会和自然界，以及人类的精神活动。”

还有，板谷对于《共产党被告轉变方向的記錄》这本书，写了这样的感想：

“我绝对不相信日本共产党会消灭。同时，我认为日本共产党失败的原因，不在于它的‘共产国际主义’，反而在于它的‘背离共产国际主义’。換句話說，不在于它的‘一味談理論’，反而在于它的‘理論上不成熟’。

“如果我也像某某人那样，是个靠不住的馬克思主义者，那末我也一定会像他那样，被捕一次，就发誓轉变方向吧。但是，我所

信仰的馬克思主义，至少直到今天为止，乃是全世界一切主义中最最切合现实的主义，从而也是最正确的主义；正因如此，所以它是我的最高信念，即使把我的毕生贡献给它，我也毫不后悔。……

“我过去也曾經热烈地信仰宗教，流着眼泪发着抖，祈求理想的实现，所以能彻底理解宗教家們的空想的无能为力。正因为我不能满足于空想主义，我才开始信奉馬克思主义的。所以，今天再要叫我回到过去的空想主义中去，那万万办不到。”

身在囹圄而能这样坦率地表示自己的态度，要不是抱有坚定的信心，是断乎做不到的。弘藏看到这些文字，再联想到板谷的悠然自得的鎮定的神色，暗暗地感到深得我心。

开飯时间，弘藏去第三舍楼下帮忙的时候，虽然經常可以和板谷互相交换个简单的默礼，可是一則因为忙手忙脚，二則因为旁边有人，所以始終沒有机会和他深談。这一层，弘藏一直引为憾事；結果直到他快要出獄的时候，他才找到了这样的机会。那一天是1937年5月18日，再有不到一个月工夫，他就要期滿释放了；平常总和大家一块儿洗澡，那天他因为有点事情，提早五分钟左右，一个人来到浴室。一看，板谷恰巧一个人洗好了澡，正在擦干身体。旁边又幸而沒有監視的看守。弘藏一直想在出獄以前和他說一次話，觉得这真是个天賜良机。他們一面防着隔墙有耳，一面互相低声說了一些道別的話。

“我下个月就要出獄了；总想和你见一次面，老是沒有机会。”

“恭喜你健康地出獄。再过两年，我也可以出獄了。”

“我因为不曾在思想上轉变方向，所以是期滿才出獄的。”

“听到这件事，我非常高兴。既然产生了信仰，怎么能丢得开手呢？”

“就是嘛！”

这样說着的时候，弘藏的脸色又和素常那样，因兴奋而苍白了。正在这当儿，平日总是和弘藏一同洗澡的那批人，一窝蜂地拥了进来。弘藏脱了衣服走进浴池。板谷穿上赭紅的囚衣，戴上草笠，快要走出浴室的时候，一脸笑容地回头对浸在池子里的弘藏說：“那末，再见吧，祝你好。”

弘藏高声答应了一声，板谷的人影子早就消失在走廊里了。在这最后一段时期里，弘藏只帮着开第一舍楼上的飯，所以自从那次以后，直到他出獄那天为止，再也沒有机会见到板谷一面，也許今生不再能见到了；可是，板谷作为难以忘怀的极少几个同志之一，給弘藏的印象很深，永远留在他的脑海里。

話又回到原来的地方，现在再看一看板谷以外的一些人的感想是怎样写的。

风間丈吉是弘藏入党时的中央委員长，弘藏潜伏在地下的时候，只和他保持着联系，对于弘藏來說，是个忘不了的人。可是，他对于佐野、鍋山两人所写的轉变方向声明书《紧急的国内外形势和日本民族及其工人阶级》，却写了这样一个感想：

“貫穿于整个这本书的东西是，在紧急的国内外形势之下，指出日本民族的活动的进步方向，并且为此而献身的那种意志。真正爱护日本民族的人，对于日本民族向来所保有、而且今后必須永久发展下去的优良传统抱有无限爱好的一切人，讀到他們两个人的这本书，一定会表示由衷的共鳴和同感吧。日本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作为落后的亚洲的唯一巩固的独立国家而存在、具有优秀民族性的日本民族的立場；——从这些大处着眼，来解决种种迫切問題的那种态度，实在使我敬佩得五体投地。对于共产国际的批判的义正詞严，也是不可多得的。我們过去曾經一再听到共产国际内部的反对派以及被开除的人的哭訴，可是在他們两人的身上却

絲毫也看不到这样的懦弱态度。他們勇敢地和共产国际相对立，根据日本独自の改革的途径，真正作出了大丈夫气概的批判。回头看一看自己，觉得在共产党里的时候，所犯的錯誤实在太深太大了。……”

可怜弘藏入党当时的党中央委員長，竟是这样一路貨色！无怪乎司法当局很快就认为他确已彻底轉变方向；当真知子举行婚礼的时候，就已經解除了他的严格单独看管，让他去工厂和大家一起做工了。他听到真知子結婚的消息（監獄里的人，对于任何消息都如饥如渴，像这种微不足道的事，不知让誰听到了，也就馬上传遍了整个工厂），还写了短短一封信，附了俳句，托他們厂里的“独步者”偷偷地送給弘藏，表示庆賀之意。不惜冒了违犯所規的危險、給曾經同乘过一只船的人表示恋恋不忘，他这种溫情弘藏固然从来不嫌恶；可是，遺憾的是，直到最后，始終不能对他抱尊敬的念头。

下面所抄的，是佐野学对于津田左右吉著的那本《上古日本的社会及思想》的感想文。讀了这段文字的反动的壮士臭味，弘藏不禁联想到箕田胸喜^①那个反动家伙。

“这部书实在是部令人詫异的書。作者的合理主义、自由主义的立場，竟至全面地否定了我国神代史的主要事实。……既然否定了神代史是日本民族精神的发源点，那末要是把作者的见解加以引伸的話，天照大神的神敕和三种神器，以及天孙降临，就全都是捏造出来的了。以上种种，实在令人詫异；本来还以为为了証明他的见解，作者一定会摆出几分使人信服的科学根据，哪里知道作者只是一味对《古事記》、《日本書紀》这两部上古史的本文玩弄形

^① 箕田胸喜是反动的“原理日本社”的創办人，他专门仰承反动統治階級的鼻息，疯狂地攻击学术界的民主人士，日本战敗后，可耻地自杀身死。——譯者

式邏輯，百般挑剔，這種態度決不能使人贊同。……歷史的主要內容並不是物，而是精神。歷史的主角不是階級，而是民族。記載我們民族的精神生活的出發點的神代史，靠這樣的書，是不能弄清它的本質的。對於這樣一部徹頭徹尾侮蔑日本精神的著作的傾向，還沒有哪個日本歷史家對它加以大膽申斥；可是，為了弄清日本精神，這樣的批評肯定是需要的。總之，這是一部危險的著作。”

現在，再抄一段佐野學對於同一作者的《神代史的研究》的讀後感。

“正如我在借讀了這個作者的《上古日本的社会及思想》以後提出的感想文里所講的那樣，這個作者假借了科學的名義，對我國的上古史作了最淺薄的合理主義的解釋，提出了几乎是冒瀆神聖的主張。而這部《神代史的研究》，用了比前一部著作更粗雜的主知主義的態度來討論神代史，認為我們的《古事記》和《日本書紀》的神代卷全是虛構，是朝廷為了政治目的（就是為了使自己的征服行為合理化）像寫小說那樣編造出來的。這樣一來，被視為我國國民精神的淵源的許多事情，就几乎全讓這個作者抹殺掉了。”

現在順便再把五·一五事件的民間方面的犯人之一、愛鄉塾的主辦人橋孝三郎對於同一著作的感想抄在這裡吧。因為他自始就是一個右翼主義者，所以並沒有轉變方向的必要，而他對於同一著作的感想，卻和佐野學的感想完全不同。

“對於著者那種細針密縫、滴水不漏的學者式的研究態度，我首先萬分欽佩。還有，他在研究方法上，也指出了最恰當的途徑。這本《上古日本的社会及思想》，也和以前的《神代史的研究》一樣，給了我莫大的啟發，使我感謝不盡。”

在右翼政治犯首領之一的橋孝三郎看來，這部著作是這樣一部著作（這部著作甚至还歸在司法省送來的一套書里，主要作為

促使左翼思想犯轉变方向的資料);而在汲汲于极端反动化的佐野看来,却成了必須大声申斥的东西。这里暴露出了他的思想立場的标識,真是丑恶之至。——弘藏这样想着,在自己的日記里写了下面一段話。

“昨天还为我們服务、明天就能为敌人服务的不知廉耻的人們。昨天是我,明天是敌,轉变得这样快的一系列人們。近来我对于这类人,越来越感到憎恶了。这样輕易地轉变,适足以証明那些轉变的人所隨身攜帶的思想意識,是多么一錢不值呀。”

写了这些話的弘藏,8月9日讀到登在《外交时报》杂志8月号上的大平进一的《苏联对日本的包围政策》和中山貞雄的《斯大林宪法批判》两篇文章,在日記里写下了讀后的感想。这类杂志,本来只許寄給五·一五事件中海軍方面的犯人;不过送进来的全部图书杂志,在交給本人以前,总要堆在图书室里耽擱一个时候,因此弘藏有随时翻看別人书刊的方便。自然,無論是大平的文章或中山的文章,都不会同情苏联,可是为了說明苏联的可怕,都不期然而然地讲到了苏联最近的飞跃发展。弘藏的讀后感就是有关这方面的。他这样写着:

“眼前尽管烏云瀰漫,然而对于全人类來說,美好的世界一年年正在迅速地到来,这是毫无疑問的。我即使被关在監獄里,也时时刻刻都能听到这个伟大的新社会逐渐到来的足音。我一点也不后悔自己的一生有几年是在監獄里消耗掉的。……我为自己沒有背叛念书人应尽的义务、能为宣传真理貢獻出些微力量而感觉高兴。

“俄国革命后,仅仅經過了十八年,就起了如上的变化:我已經年近六十的老头儿了,可是,如果侥幸天能使我像我祖母、父亲、母亲那样长寿,我就能亲眼看到我最亲爱的这个日本、我亲爱

的女儿和外孙們居住的这个日本社会，将有一天发生会使我高兴得淌眼泪的变化吧。我一定要爭取长命百岁，而且一定要用最好的方法訓練我的衰老的身体，使它能够迅速适应新环境。”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随着刑期的縮短，弘藏越来越有恃无恐了。

对于《释放后的生活方針》的意见

到了10月里，又一次提到了弘藏的假释問題。那时他的刑期已經过了五分之四，即使照不减刑計算，不久也将达到最初判的五年刑期的三分之二了。一般犯人，到了这样的时期，总会被考虑假释的問題；现在所长虽則又換了一个叫柳原的，对于弘藏的假释，还是准备重新呈請一次。

10月中旬，刑务所发給弘藏一张鉛印的《释放后的生活方針》，叫他按栏填写。这种东西，普通总是附在假释呈請书后面的，可是以前的所长和教务主任从来不曾直接交給弘藏，让弘藏填写。但是新来的教务主任却不仅沒有学問，而且缺乏常識，只知道小心翼翼，按照規則办事，所以毫不思索地把它交給了弘藏。

这份东西究竟是怎样一个东西呢？首先，关于职业的部分細分为六栏：（一）要做什么职业？新做的职业呢，还是有經驗的职业？（二）要做的职业需要多少資本？誰拿出錢来？（三）估計上項职业有多少收入？一家的生活打算怎么維持？（四）有沒有便于維持生活的信用关系或其他办法？（五）全年的收入約数以及支出估計。（六）三年后职业的估計，五年后职业的估計。

弘藏一看到这个，就生了气。要是在下獄之初，或者还指望假释的話，也許不至于如此吧，可是，現在他已經有恃无恐了，所以一

面心里暗想这简直是开人家的玩笑，一面在每栏里简单地照下面这样填了。(一)著述业，有經驗。(二)不用資本。(三)难于預定。(四)有恩俸，估計靠此可以不愁衣食。(五)难于作准确的估計，著述业都是这样的。(六)打算終身从事著述。

第二是关于家庭的部分，細分为四栏：(一)家庭方面有没有困难問題？如果有的話，是怎样的問題？(二)打算怎样解决那困难問題？(三)有没有負債？要是有的話，打算怎样归还？有没有还清的希望？(四)孩子們打算怎么办？受过义务教育后，职业怎么办？有可去工作的地方么？

弘藏对于上面各項，只是这样填写了：(一)沒有。(三)沒有。(四)有两个女儿，已經出嫁。

第三是关于归居地。(一)归居地是哪儿哪家？房子是自产呢还是租的？答：家乡有自己的房子，但是准备在东京租房子住。(二)租房子住的話，租金要多少？量入为出，有力量付房租么？付房租有把握么？答：打算住三、四十元租金的房子，那样的話，光凭恩俸就够了。(三)为什么不回家呢？答：住在乡下，不能搞著述工作，不过住在东京，也还是自己的家。

最后其他。(一)释放的第一天起，誓必实行的是什么样的事情呢？答：没有什么要誓必实行的。(二)今后立身处世，认为最要紧的是什么？答：仰不愧天，俯不愧地。

弘藏故意不用敬語，就这样草草回答了，提了上去；后来副教誨师来找他，态度很客气地要他把职业一部分写得更具体些。弘藏因为自始就一肚子不痛快，所以气鼓鼓地干脆加以拒絕了。他強調說，出獄后自己本来不打算找什么职业，由于一定要填写职业名称，才勉强写了一个著述业，现在又叫更具体地写，可是按說上面該也能体諒到，呆在監獄里，絲毫不了解社会上今天是怎样一

个情况，不是想写也写不出么？他之所以采取这样强硬的态度，是因为他对这种缺乏常識的要求动了肝火，再也忍耐不下去。这样一来，教誨师显得左右为难，就說，他不过是受人差遣，主要是因为教务主任认为要填得具体才好，才让他来传話的。于是弘藏勉强在“著述业”之下，加了一个括号，填写了“究竟能搞哪种著述，除非等到出獄以后，完全无法預料。”交还給了教誨师。

后来才过半个多钟头，教务主任又把弘藏叫了去。仍然是叫他把职业一部分填得更具体些。弘藏怒恼对方的不明事理，气势汹汹地坚持了自己的主张；粗声暴气，大有压服对方之势。可是，教务主任說話依然和顏悅色，也不說“既然这样就算了”。弘藏心想，要是換了自己的話，一定会生气說：“那末随你的便！”可是对方却是低心下气的，弄得弘藏沒法，只好說：“既然命令我这样做，那也沒有法子，就重新再写一个吧。”然后退了出來。

在弘藏的牢獄生活里，和獄吏对抗，前前后后就这一次；归根到底，还是由于不久就可以出去了，所以才有恃无恐的。过后一反省，他觉得这件事做得并不体面。教务主任固然胆小怕事，却并非坏人，平常对弘藏也很帮忙；现在弘藏却对这个好好先生发威风，过后自己觉得太不像男子汉了。

第二天，他把《释放后的生活方針》里的职业栏，改写成这样了：

“由于我每月恩俸收入有一百几十块钱，所以我想尽可能过得俭朴些，躲在社会的一角，力求不妨碍人类的进步，安安静静度过自己的晚年（我这几年来觉得，有许多人主观上打算为人类进步作出贡献，而客观上却在妨碍它），因此不打算勉强找职业；可是，只要活在世上一天，我大概就一天不会不讀書写东西。由于这个关系，所以才說今后准备把著述作为职业。可是，凡是以宣传馬克

思主义为目的的論著，以及討論政治時事問題的策論等等，今生决計不再写了，所以，著述的内容，自然不会再是法科的东西，只会是文科的东西了。如果可能的話，我想姑且写些文学創作或文学批評文字試試。但是，文学創作和文学批評，在我來說簡直是老來學皮匠，能否写出見得人的东西，完全沒有把握。何況近几年来，出版界的情况可能变化很大；出版商对我的态度又会变得怎样，呆在監獄里也一点摸不着头脑；所以我这种願望要是說給人家听，也許会被当作一場笑話。由于我怕人家笑話，同时由于一旦說了出来，传到外面，駟馬也难追，所以在全然不了解社会情况的现在，我十分不願意把我这个心事輕易写出或者向人宣揚。还有，到出獄的时候，新聞記者一定会問起我今后的打算；对于这种問題，我不仅沒有办法回答，也决計不想回答；现在我已經抱定这样的宗旨了。只是因为上面命令我写，现在不容迟疑，才把心里盘算的念头写在这里。”

后来又把最后那一栏改写成“仰不愧天俯不愧地这句话，乃是我向来以及今后直到临死那天的終身格言。”

弘藏写好交了出去，隔了两星期，那天正好是 10 月 31 日星期六，一个到这里来见习的年輕教誨师，找弘藏有事，临走的时候，話中有因地对弘藏說：“終于就在眼前啦！”当下弘藏就明白，这个见习教誨师的話，是暗示着几天之后即将到来的明治节的假释；可是由于他确信尽管刑务所当局重新呈請了假释，檢察官方面决不会同意，所以一点也沒有把那句話放在心上。

明治节到了。教誨堂里，所长先朗讀了《教育敕語》，讀完以后，就作了一場訓話。弘藏入所以来的这个第三任所长柳原，乃是个十足的官僚。《教育敕語》的朗讀，是他开的头，这就是他的工作成績。他似乎认为話說快了就沒有威严，所以在这种場合訓話时，

拚命装腔作势，慢腾腾地说着，说几个字就停一停，说几个字就停一停，停的时间比说的时间还长。有时，尽是闷声不响地站在那里，大家还以为他的训话已经结束了；可是过了一会，他又开始说下去。到后来，他的话总算说完了，于是他就像自己号令自己一般，喊了一声“完了”，然后走下台去。

“秋气……越来越深，……菊花盛开的今天，……作为日本帝国的……臣民，……能获得……庆祝明治节的……欢欣，……乃是……我们的……莫大的……幸福。”

那天的训话是用这样一句话开头的。接着，他讲了明治节的来历，然后说：“说来十分奇怪，每逢这个节日，天气总像今天这样晴朗。从前常说天长节风和日暖，现在却是明治节风和日暖了。这是上苍的保佑，我想将来也一定永远是这样的。如果有人认为我头脑守旧，讲迷信话，那才是大错特错哩。”

事实上，那天天气的确非常好，纤云不见，是个少有的秋晴日子。但是，弘藏暗地里在想，所长说这样的话，如果明年今日下了雨，却又打算怎么办呢，不是恰恰证明他自己的话“大错特错”么？（顺便提一句，第二年的明治节，弘藏已经不在监狱里，没有能恭聆这个所长的训话，可是那一天恰恰下了雨。再下一年的明治节，又是下雨天。）

所长的训话一结束，就让犯人们听无线电广播。那时广播的正好是早晨的儿童音乐节目；一个看守部长站到台上，喊了八名犯人的番号，把他们叫了出去。这些人就是今天要假释的。他们让看守部长带领着走出教诲堂，而其余的一千二百名囚犯，仍然留在那里听儿童音乐。

弘藏和另外三个图书室的杂役夫，和假释的人们同时退了席，为的是把他们几个释放者身边的图书等类清理一下。弘藏和另外

一个伙伴拉了一辆车子，跑到每个释放者的牢房，把牢房里的公有书籍、私有书籍以及文具等等归在一起，分别包好，然后一边帮他们搬东西，一边把他们一个个送到腰门口。趁着这个机会，他还给好几个违反治安维持法的思想犯送了行。其中有的比他晚入所，剩下的刑期比他还长，这时却被释放出去了。

弘藏干完事情，回到自己的牢房里，并没有感到寂寞。他把田村路远迢迢地从巴黎寄来的十张一套的绘画明信片像小屏风那样插立在洗脸台上欣赏着。内中有一张明信片，上面印的是巴士底广场。现在，在那法国大革命开场的地方——巴士底监狱的遗址上，建立了自由圆塔，塔顶上是展翅欲飞的金色天使，亭亭千尺，高耸入云。那是二十年前弘藏旧游之地，那时尽管被熙熙攘攘往来的人群推来挤去，仍然想念着古人，舍不得离开。看到这张明信片，弘藏在他的日记里写道：“思念从前，想到今天，觉得非常愉快。”还附了这样几句诗：

也想和人们那样
做首悲伤的歌儿试试，
可是今年的秋天并不悲伤，
因为解放的春天已经近在咫尺。

和吉村检察官的一问一答(一)

明治节才过两天，11月5日的早晨，弘藏由于昨晚突然腰痛发作，也没有去帮忙打扫教诲堂，只是坐在图书室的椅子上，望着天空出神，冷不防看守来叫他出去接见。他心想一清早是谁来探监呢，去到外面一问，原来是法院传他去问话。弘藏觉得很奇怪，心想到了这个时候，法院里还有什么事情呢。

他身上穿起一件带袖子的条纹棉大褂(这种东西只有极少数几个完成作业定额的犯人在牢房里才能穿),随身带了伙房给他预备的匣子麦饭,由一个看守部长带着,坐上一辆汽车。那汽车不是押解囚犯的车子,而是普通的汽车。这一天,手铐也没有上。坐在车上,草笠也不用戴起来,只要拿在手里就成。弘藏心里很高兴,他想这可不坏,长久关在监牢里,今天却可以坐着汽车看看外面的风光了。

他和看守部长并排坐在汽车里,车子开出三年前迷迷糊糊地进来的那个监狱大门,马路两边是一栋栋的刑务所职员宿舍,围墙上爬满着常春藤。车子开上荒川堤下的大街,过了两顶大桥,就是上野广小路、骏河台、丸之内、日比谷之类熟悉的地方了。最后就开进曾经来过的东京地方法院、东京高等法院的后门。

下了汽车,照例被关进临时牢房。那里的守卫一看见弘藏,连连叹息说:“你不是本田么?变了样了呀!简直完全两样了。自从上次到过这里,已经三年了吧?”

在弘藏本人看来,这三年中间,他并没有多大变化。只是当初在未决拘押时期来这里的时候,鼻子底下留着髭鬚,下巴上的鬍子长得很长。另外,在开公审庭的时候,他身上穿的是新做的罗纱褂子和罗纱围裙。而现在呢,身上穿的虽则不是赭红色囚衣,却还是一件类似犯人所穿的棉袄那样的棉大褂,髭鬚也剃得光光的。变化仅在外表上。他心想:“咱还是当年的本田弘藏,一点也没有变哩!”对于守卫的大惊小怪,就感到不高兴。

在临时牢房里等待了一会,头戴草笠的弘藏就被同来的那个看守部长领着,在法院的长廊里彷徨了一阵,然后走进一个朝南的小房间。屋子里开着暖气;刚从监狱里来的人,甚至热得受不了。里面已经坐着三个穿西装的人,他们等弘藏一进门,不约而同地好

奇地看着他；內中坐在正面那个笑容滿面的胖胖的紳士，指着自已桌子前面那张椅子，对弘藏說：“請坐。因为有点事情想請教，才請你来一次的。”趁他講話的时候，其余的两人走出去了。

弘藏直到后来，也沒有知道对方是誰；实則把他传到这里来的，是东京高等法院的吉村检察官。原来，經办弘藏案件的那个戶澤检察官，那时出国了，他的工作由吉村代理。

吉村所提的全是思想方面的問題。弘藏毫不隱瞞地說出了自己的想法。

一般說来，这一种盘問，总是在明治节那样的大节日刚过不久才举行。主要是因为怕沒有挨上那些大节日的假释的犯人，思想波动，所以作思想检察官的人，有必要試探試探犯人的想法。前次教务主任让弘藏写的那个《释放后的生活方針》，果然也在他的桌子上放着。

可是，弘藏一点也不不是什么垂头丧气的样子。和未决时代不同，现在随便問他什么，他都爽爽快快地回答，神气仿佛是說：“现在我可沒有有什么可以害怕的了。”

对方那个检察官，也兴致勃勃地凑攏身子来談个沒完，連時間都忘了似的。刑务所的那辆汽車还有別的事，一再来通知“是时候了，該回去了”，他却說“再等十分钟吧”，談着談着，二十分钟、三十分钟都談过去了。等到經過几次催促而結束，時間早已过了正午，弘藏来不及揭开飯匣吃飯，就被带上汽車了。今天的談話，他虽則觉得一无收获，可是憋在肚子里的話，不得不尽情傾吐出来。尽管餓着肚子，他却意气揚揚地坐在車子里，睥睨着东京市的市容，回刑务所去了。

回到刑务所之后，弘藏把那天他和吉村检查官的一問一答，趁着还没有忘掉，記进了自己的日記。

問：对馬克思主义是不是重新考虑过了？

答：这在我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是我費了二十年工夫才建立起来的思想。照說下獄以来，我已經一再向刑务所当局声明过了：事到如今，断断乎沒有重新考虑的余地。

問：你到现在还认为日本絕對避免不了无产階級革命么？

答：是的。無論怎样，我不能认为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会是万世不变的东西。它是必然要演变而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而且，能够实现这种演变的，决不是资产阶级，却肯定地是无产階級。这里面的道理也是不用說的，因为，资产阶级决不会自甘灭亡。无产階級革命的不可避免，就在这个地方。可是无产階級革命并不一定意味着流血。在日本，我认为也許可以意外“和平”地实现这个革命。

問：你对社会法西斯主义沒有共鳴的地方么？不能和所謂社会法西斯主义者那批人携手合作么？你对二·二六事件的看法怎样？在我看来，那个事件的思想背景里有社会主义的成分，还有十分浓厚的革命傾向；你以为如何呢？

答：和社会法西斯主义者实在不能携手合作。尽管他們有时也卖弄社会主义的詞句，可是那可能全都是口头上說說而已。真心想打倒资本主义的，他們中間也許不能說沒有，但是，这些人本人的这种主观意图是根本不重要的，它絲毫也不影响到他們客观上是反动派。比如这里有一个病人，根据他的病情，必須断然快快动手术，可是这时却有人拿出菩薩的护符之类的东西，来反对必不可少的科学治疗；在这种情况下，不管他本人的意图是多么亲切，客观上却是要让病人送命，所以我們非极力反对不可。沒有本事却硬要挂出招牌給人治病，这就惑人不浅。我决不可能和那些人搞在一起。本来，要是我們有言論自由的話，我們完全能够說服那

些态度严肃的青年脱离法西斯阵营，转到我们这方面来；可是，要让我们倒向法西斯主义，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一点也不知道二·二六事件的思想背景是怎样的。北一辉的非法著作，我一行也没有看过。据你刚才所说的话推想起来，可能他的著作里颇搬弄了些“革命的”词句，但是我想，与此同时，其中必然掺杂着使真正的革命成为不可能的货色。他们和我们只是在外表上相像，那就是他们所采取的手段也是非法手段；其余就丝毫没有共同的地方了。

问：法西斯主义在欧洲逐渐强大起来了，你看那到底是什么道理呢？对于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势力的问题，你的看法是怎样呢？

答：我觉得日本的现状，表面上是在压制法西斯主义，实际上却是在发展法西斯主义。比如，最近对二·二六事件的弹压（对于有关者的较重的处罚等等）给与人民一个幻象，仿佛现政权是和法西斯主义对立的。殊不知，现政权本身就十足具有法西斯主义的倾向。

日本不会出现什么新的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也不会出现什么这类冒险家所率领的那种民兵团。可是，这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这种东西实际上早就存在了。这是因为，蕴藏着尖锐的矛盾和大量封建渣滓而挤上了世界三大帝国主义国家之一的宝座的日本这个国家，早就需要特殊的、势必比欧洲各国更加露骨的、强有力的镇压机构了。

因此，实际上日本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三大法西斯国家之一。三大法西斯国家，一个是希特勒的德国。除了苏联之外，德国的共产党，已经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共产党。这意味着德国的政治危机迫于眉睫。形势已经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资产阶级一刻也不能耽搁了。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希特勒捧上了台。具体的

情况我虽一点也不知道，可是我相信根本的道理就是这样，不会有有多大出入。三大法西斯国家，另一个是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意大利在世界大战后，也出现了人民革命的高潮，各地的工厂都被工人所占領。要是当时該国有一个坚强的共产党，說不定意大利已經走上了和今天俄国相同的道路。对于資产階級來說，实在已經到了間不容髮的关头。因此，墨索里尼才不得不火速登場。世界三大法西斯国家，最后一个就是我們日本。日本国内也面临着革命危机。竭尽全力防止共产主义，是可以理解的。像議会政治那样的不痛不痒的一套，已經沒法再搞下去了。軍部直接实施露骨的鎮压政治，现在是不可避免的了。这就是使日本成为世界三大法西斯国家之一的根本原因。

法西斯主义本是資产階級独裁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所采取的露骨的形式。資产階級独裁并不是什么新鮮玩艺儿。可是，少数人想压迫多数人，单靠武力是不可能的，因而資产階級早就极力設法从精神和思想上来欺騙和軟化人民。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用尽了一切办法，其中在政治方面，发明了議会政治这样一个东西。英国早就完成資本主义最正常的发展，在这方面，它是一个典型的国家，正因为如此，那里的議会政治也最有代表性。尽管自由党和保守党在本质上是一个东西，是忠实地代表資产階級利益的“一个党”，然而外表上却长期进行了对立斗争。这就是一般所說的議会政治、政党政治，它在欺騙人民、軟化人民方面起了莫大的作用，确实在人民群众中間散播了一种根深柢固的議会主义幻想(认为革命可以通过議会来实现，合法主义可以济事)。然而，資本主义的兴隆期早已过去了，现在它已进入总危机时期了，所以即使在議会主义的发源地英国，政治情况也起了显著的变化。由于危机迫近，就再也不能从从容容地搞欺騙、軟化的一套了，所以資

产阶级的独裁被迫采取或多或少露骨的形式了；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近几年来无论哪个国家都多少有法西斯化的倾向。可是，这并不是由于资产阶级强大了，相反，是由于它那独裁基础动摇了，这才不得不脱去它的假面具，所以我们大家用不着悲观。

如果懂得了法西斯主义原来是这样一种性质的东西，那末为什么日本过去就没有能“理想地”实行英国式的政党政治、为什么特别是到了最近竟闹起所谓一国一党主义来之类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法西斯主义并不具有什么统一的思想。由于它代表着行将崩溃的资本主义的利益，所以也不可能具有生气蓬勃的统一的思想体系。近来流行一种所谓日本精神，这也许是神话里的猴头、狸身、蛇尾的鹤鸟那样的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马克思主义能在转瞬之间掌握住一般青年的心，与此相反，反动阵营尽管拥有绝对的言论自由，却产生不出一个风靡一时的思想家，其中的道理就在这儿。

法西斯主义并不具有统一的思想，它的主张却像百衲衣那样，是把各式各样互相矛盾的思想体系的断片、碎渣拼凑起来的。其中有的可能像北一辉所写的东西那样，里面夹杂着社会主义的、反资本主义的、革命的蛊惑宣传。为了吸引小资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落后阶层，这无疑地是不可缺少的一味药。

尽管日本已经彻头彻尾成了法西斯主义国家，可是从表面上看来，却仿佛单独有那么一批法西斯主义者存在，同时统治阶级里也仿佛有一批人反对法西斯主义；可是归根到底，这不过是说明日本的法西斯主义阵营内部存在着对立，有一批人主张更迅速、更彻底地实行法西斯化，而另外一批人则认为那样性急没有好处，如此而已。

属于急进派的那批法西斯主义者，终于闹了二·二六事件那样的大乱子。可是尽管闹了那样大的乱子，资产阶级却一点也不惊慌，这在我們看来，是頗值得注意的。假如那个事件真地具有革命意义的话，那末，针对着那个事件，一定会立即制訂出类似治安維持法那样的特别法规来；可是誰都沒有打算那样做，反而仍然把据说已經完全崩潰的共产党当作恐怖的目标，而且听说新近还把违反治安維持法的人作为对象，制訂了什么保护观察法；从这件事情上也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出于它的本能，是多么正确地理解着当前的局势了。

和吉村检察官的一問一答(二)

吉村检察官听到弘藏这些话，心里已經有了一个底，知道根本談不到什么假释的問題。可是他并没有看不起弘藏，倒反觉得弘藏尽情傾吐的一番意见很有趣，从思想检察官的角度出发，就想听听他还說些什么话，因此叫僕人重新泡了一壶茶，继续盘問下去。弘藏觉得劲头一来，話未免讲得过多了，因此，后来就控制了一下自己。

后来他們的一問一答是这样的。

問：我认为馬克思主义即使正确，可是把它应用到日本的时候，也該照顾到日本的特殊性；这一点你以为怎样？

答：馬克思主义本来也就主张，有关日本的問題，必須考虑到日本的一切具体特殊性。我认为天下沒有固执千遍一律的政策の馬克思主义。

弘藏一听到吉村提起“日本的特殊性”，就知道又要来那一套，扯到“日本的国体”啦、“日本的天皇制”啦之类的問題了。因此，他

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抽象地回答了那问题，目的是想借此脱身。哪里知道吉村轻易不放松他。他进一步更具体地提出了原来那个问题。

问：在政治上仍然主张资产阶级革命么？

这个问题等于是问“仍然主张打倒天皇制么”。因此，弘藏当然不肯明白答复，只是说：

“我已经公开宣布今生决不再谈政治，即便过去我发表的东西，也几乎只谈经济，对于政治方面，我并没有进行深刻的研究，毫无把握，所以这个问题，请恕我不能作答。”

弘藏这样说，是想避开这个问题。哪里知道吉村一定要弘藏发表意见。弘藏认为也无须坚持。因此，在谈了一些别的问题后，他终于坦率地作出了下面这样的回答。

答：我认为，在日本，作为革命的第一阶段，资产阶级革命是必不可少的。这就牵涉到打倒天皇制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我觉得过去人们抱着许多误解。首先必须知道没有天皇也可以有天皇制，否则就不能理解这个口号的真正意义。简单说来，如果对今天的政治形态以及镇压机关不加以根本变革，无产阶级革命就根本不可能；而这种权力机关的根本改造——破坏旧的和建设新的，——我认为也就是打倒天皇制的内容。保留着今天这样的法院和刑务所等等，无产阶级革命就革不起来。因为这样，所以我认为资产阶级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关于这一问题，两人中间还交换了一些更具体的问答，这里不便写出。

另外，检察官和弘藏还作了下面这样的问答。现在也照弘藏备忘录抄出，不加变动。

问：你对围绕着西班牙革命的欧洲最近的形势，有着怎样的看

法？

答：我觉得正如我們早就主张的那样，关键問題不是国与国之間的战争，而是阶级与阶级之間的战争；而现在，即便从现象上看，这一点也已經很清楚。国际主义这样东西，不管人們說它是好还是坏，它反正已經成为无可置疑的事实了。呆在刑务所里的人，自然不可能明白詳細情况；可是談到圍繞着西班牙革命的国际形势的动向，我对上面所說的一层体会却最深。

問：你认为日本共产党将来有希望重新站起来么？你的推測如何？

答：我坚决地相信，无论怎样镇压，也扑灭不了我們的运动。只要有一百个党员存在，那末一旦遇上革命高潮，他們就能發揮一千、一万人的作用，所以决不能小看。关于这一层，我絲毫也沒有悲观的想法。

問：把《資本論》的理論应用到日本的农业上，情况会是怎样？（弘藏起先因为沒有弄懂他問这話是什么意思，所以沒有能回答，后来由对方作了解释，才照下面这样答复了。）

答：日本的农业，大部分还不是資本主义經營，所以《資本論》关于資本主义生产的理論，现在应用不上。自然，日本现在的农业是不会永远这样下去的。农民的生活太惨了，这样下去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應該的。我相信，在农业方面也有必要应用科学和机器。可是，如果不彻底破除现在的残余封建制度，这是絕對沒有希望实现的。

問：出獄以后，即使不談政治，不談經濟，但是，如果你对馬克思主义的信仰不改变的話，那末无论写文学方面的东西，历史方面的东西，或是一篇随笔，你的这种信仰也必然会影响社会。你不以为这样么？

答：这当然是这样的。所以我打算尽可能拣一些不怎样影响社会的東西写。

問：明年你就要出獄了，瞞着不让你知道也不是事，还不如照实告訴你。实情是这样：一旦你出了獄，左翼方面一定立即把你捧上台去。现在他們成立了一个类似以前的“产业劳动調查所”那样的学会組織，共产党的手已經伸到合法舞台上来了；你一出去的話，正好最有利用价值。我們现在正在担心着这个哩。

答：不，監牢已經坐够了，所以决不会干出再坐一次牢的事情来。

問：出獄以后，願不願意为犯人出獄后的保护事业出一把力呢？（弘藏心想，这大概是指所謂轉变方向者的保护了。假如是那个的話，那末戶澤檢察官也同他談过了。弘藏一边这样想着，一边简单地答复如下。）

答：一度也曾考虑过。可是总觉得那会成为反动的勾当，所以决定不干。

問：你这話自然是不錯的。如果你的思想不改变，那末即使让你去做保护事业工作，你也会馬上就要膩煩的。那末，做一点生产性的工作又怎样呢？

答：所謂生产性的工作是指的什么呢？

問：比如养鸡啦、經營果园啦等等。

答：不成，这类事情我干不了。我的体质单薄，需要体力劳动的事情，我根本沒法干。再加，这类事情我自小沒有干过。

問：用不着亲自干活呀，雇几个人干就行啦。

答：我对这类事情無論怎样也不感兴趣。实在，现在我这个人可真不好办哩。不过，我还是預备尽可能不劳您費心地生活下去。至于养鸡之类，却只有敬謝不敏了。哈哈。

問：这也只是我个人随便談談自己的一点想法而已，据說，就像我国从前德川家康父子的任用大久保彦左卫門那样，现今斯大林手下有一个极端厌恶共产主义的学者，充当顧問，墨索里尼手下也有一个和法西斯死对头的学者，斯大林和墨索里尼两人，經常听取这种人的肆无忌惮的批評，以資参考。我心里也曾想，可否就請你担任这样的工作呢？因为我总觉得，你下了一番苦功得来的东西，弃之未免可惜。

（弘藏給他說得哭笑不得，結果对于這個問題，一句話也沒有回答。）

問：我再問你，你出獄之后，会有哪些人来同你接近呢？这一点，你應該是知道的。

答：老朋友里，有几位我所尊敬的人，尽管思想立場和我完全不一样，可是对我都很关怀。我出獄之后，想先听听他們的意見，然后决定今后怎么办。

問：那些人是誰呢？是末川他們么？

答：末川因为是亲戚，自然会成为我的商量对手。另外还有一些京都帝国大学时代的老朋友，他們一定会替我出些主意，不让我死得太丢学者的脸的。

問：你要是再过什么不愧为一个学者的生活的話，将来会再一次进監牢哩。准定会这样的。

答：不，監牢是不想进了。我刚才所說的一些人，他們一定认为必須絕對避免触犯国法，我深信他們給我出主意，一定不会超出国法所容許的范围。

問：尽管是这样，可是那些人并不了解地下运动的形势以及檢察当局的方針等等，恐怕提不出什么适当的意見。談到这一层，倒是我們比較清楚，所以今后准备繼續給你想些办法。改天有机会

再請你过来談吧。

問答好容易結束了。檢察官最后那句話，使弘藏抱着一种預感，心想在出獄以前，一定还会把他传到法院去几次。岂知結果总算还好，直到出獄那天为止，——出獄以后就不用說了，——他再也没有和檢察官那类人打什么交道。

《1936 年岁暮之歌》

弘藏早就不指望什么假释了。这件事情前面已經一再讲过。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如果他对假释还没有完全死心的話，他就决不可能在吉村檢察官盘問他时回答出那样的話来。但是，犯人希望释放的念头却是万分頑强，弘藏一方面觉得事到如今，还是不假释好，可是，另一方面却又认为也許意外地能早日得到释放，这种想法直到这时都还没有完全抛弃。这一层，看上去似乎很費解，然而翻看一下当时他所記的日記，却清清楚楚地这样記着，也就毫无办法。

翻看一下 11 月 20 日那天的日記，可以知道，弘藏这天准备給都筑写信，可是心緒怎么样也安定不下来，結果写了一半，就把信扯掉了。这里所說的心緒不安，指的是他幻想着三天以后的新尝节那天，他也許意外地能获得假释。

为什么又会抱这样莫名其妙的幻想呢？这是多少有些根据的。他从法院回来之后，有两三个人告訴他說，他的假释已經呈报上去了。派在教务科的一个看守，直接对弘藏說：“我本来以为先生在明治节那天就可以出獄，結果似乎延期了。”还有 16 日那天，重子来探监，那时她告訴弘藏，新聞記者到她那里去过，据說从法院里听到消息，說弘藏不久就可以出獄。这些风声，其实并非沒有

根据。事实上，重新呈請假释弘藏的手續，在明治节以前早就办妥了。不过，先是由于检察官反对而宣告延期，接着經過吉村检察官对弘藏的盘問，終于决定无期延期了。可是弘藏本人一方面对吉村作了那样的回答，另一方面却让人家一讲，就产生了“也許意外地能挨上”的想法。正因为凭白地想着这样的事，弘藏才不能安下心来給都筑写信。

新尝节那天，假释了四个人。弘藏自然不在其內。

隔了两天，11月25日那天，弘藏終于全部完成了作业定額。他脫去了向来所穿的浅葱色小袖管囚衣，換上了灰底子白点儿的小仓布西装。外表虽則活像个老当差的，然而这样一来，他现在却变成一个特等犯人了。一千几百个犯人中間，穿这样的西装的，总共不滿二十个。凡是遇到他的人都对他說：“想不到先生穿了西装还呆在牢里。”

又过了一个月，12月24日那天，生了盲腸炎好久沒有来的重子，到刑务所来作今年最后的一次探监。因为已經快到“一年的最后办公日”，所以过了这一天，年內不可能再来探监了，因此临别的时候她說：“願您度过一个快乐的新年。希望这一次您能真正度过一个快乐的新年。”

这两句話，給了弘藏很深的印象；分手之后，他独自思忖起来。到明天的大正天皇节，即使把减刑四分之一撇开不算，刑期也已經过去恰巧三分之二了。在原博士那里一起工作的大貫曾經有名有姓地說过，許多人都是在刑期过了三分之二的时候出去的，到后来他本人也恰恰在那样的时期假释出獄了；时常同弘藏攀談的那个右翼政治犯高島，也按照同样的算法在三个月前释放出去了。要是自己能受到同样对待的話，說不定明天就能释放。假如那样的話，新正就可以在自己家里吃年糕湯了。——弘藏不由自主地

这样思忖着。

大正天皇节那天，假释了七个人。内中还有两个左翼思想犯。一个是姓朴的朝鲜人，刑期到明年1月5日就要届满，仅仅少坐了十天牢。另外一个姓岩船的日本人，刑期却还有八个月以上，反而是弘藏所余的刑期比他短些（因为弘藏的刑期到明年6月就要届满）。做教务科的杂役夫的弘藏，照例一个个地送这些人出狱。

弘藏走到朴的身边，和他握手。朴是老病号，弘藏每次提了留声机去病房的时候，他总是主动地来和弘藏招呼。弘藏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请保重身体。”这时朴含着眼泪颤声说道：“我第一次见到先生，是1927年先生在青山会馆里演讲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尊敬先生了，现在也没有改变，不，现在比以前格外尊敬先生了。先生的身体不怎样好，先生，请您好好保重吧。”

岩船是深川地区的木材商人的儿子，他身上已经换了绸衣，还穿了围裙。弘藏看见他的随身行李旁边还放着一双簇新的桐木大木屐。岩船这个青年，是“全协”（日本工会全国协议会）化学工会神奈川支部的领导人，没有念完早稻田大学而中途退学的知识分子。弘藏离开原博士的研究室后，他曾经在那里做过一个时期的工作，所以弘藏和他交谈的机会一向比较多；可是他和朴不同，那天对弘藏反而表示了疏远的态度。

第二天，弘藏做了下面这样一首诗，题目是《1936年岁暮之歌》。

一千多个人
同住在一所房子里，

可是当最后一班火车的声音
远远地消失在墳場般的寂靜中的时候，
監獄的夜晚
是多么凄凉呀！

二

透过窗隙的风
无声无息地像水一样流进来的
冬天的夜半，
独自醒来，
熬着陣陣的胃痛的时候，
衰老的身体
是多么可悲呀！

三

但是一想到
这是天使我的筋骨受苦、
为了成全我
而鍛炼我的志气的时候，
刀鋸鼎鑊
也就甘之如飴了。

四

就这样，我一边馳想于
伊貝利亚半島^①的
无产阶级的
英勇斗争，
一边奋起一腔热血高歌——
“老驥伏櫪，

① 西班牙半島的古名。——譯者

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
壮心不死。”①

1936年就这样过去了。

① 最后四句，引自曹操的《龟虽寿》。——译者

出獄前後

和藤井推事見面以及下定決心服刑滿期

1937年終於到來了。終於是昭和12年了。一想到今年准能出獄，弘藏就以十分愉快的心情，迎接了新年。

1月4日洗澡的時候，他和一個名叫早川的青年談話，那個青年的刑期也是今年屆滿。據那青年說，今年是他監獄裡度過的第十二個新年，可是像今年這樣歡樂的新年還是第一次碰到。他的父親是朝鮮人，所以他的笑臉上總彷彿表現着朝鮮血統。連弘藏這種僅僅度過了四個新年的短期犯人，一想到今年是在刑務所裡度過的最後一個新年，都非常高興。弘藏心裡想，不錯，像今年這樣令人高興的新年，不用說在以往的監獄生活中，即使在一生之中，恐怕也是第一次碰上吧。

對於弘藏來說，眼前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怎樣平安度過這個冬天。只希望這最後一個冬天，不要住進病房，能太平無事地過去。

他最怕的是胃痛。到了冬天，天氣一冷，胃痛就要發作。去年年底12月15日，已經出現了最初的徵兆。那天夜里，他在單身房裡坐着，收工喇叭吹響的時候，就覺得胃發痛。他伏在席子上，握着拳頭抵住腹部，眼巴巴地等候搖睡覺鈴。幸而那天這樣痛了一陣就好了。

到了23日午飯後，胃痛又發作了。這幾天來，天氣比較暖和，可是22日夜里突然冷了起來，弘藏猜想大概是受了寒，那天就把三件自備的棉毛衫一齊穿在身上。普通的囚衣本來都是臃腫的棉

袍，而弘藏呢，最近穿的不是棉袍，却是薄薄的小仓布西装，所以除了多穿几件棉毛衫之外，沒有别的办法。那天他晚飯也沒有吃，获得了許可，提早睡了；可是睡下以后，只觉得一陣陣地发冷。他素常对于发热不大能觉察出来，可是由于发冷发得很厉害，所以自己觉得体溫一定升到三十九度左右了。胃痛发作得厉害的时候，他似乎多半要发热。当时他一心以为那是胃痛，可是出獄以后受到安田博士診察的时候，說起原委，据說可能是肝脏有毛病。究竟是什么病，也弄不清楚。

隔了两天，到 25 日，又犯了同样的毛病。

过了新年，1 月 6 日胃痛又复发作。当时弘藏一直在开飯時間帮同炊事夫开飯；他逐渐熟悉了监牢生活，此刻每逢分菜以前，总是自己动手，先把自己那一份菜盛好。不用說，如果遇到好吃的菜，就滿滿地盛它一碗。这天中午，吃的是油炸的菜。弘藏貪心地搶了两块油炸胡蘿卜（一个胡蘿卜切成两半，所以两块就相当于一个胡蘿卜那样大），两块油炸牛蒡（和胡蘿卜差不多一样大小），四块油炸甘藷。刑务所里的这些菜，为了省事，一块总抵普通人家的三、四倍那样大。弘藏搶到的菜，足有两人的分量。心里虽然也担心可能过多了些，却仍然就着六等飯全都吃下去了。过了两个钟头，果然胃痛起来。（吃了油腻的东西就胃痛，看来也許是胆石病；不过他自己一直只把它当作胃痛。）靠在桌子上忍着痛，他觉得額上、頸上、两腋和背上全都在出虛汗。

明明知道油炸的东西吃不得，18 日那天他却又吃了。那天吃晚飯的时候，他又領到了一份油炸牛蒡和胡蘿卜的“特菜”（那时他得了一张“奖状”，每星期可以領到一次額外的“特菜”。打个比方，这就等于是发給得勳章的人的养老金。有些資格老的，一人甚至有三张这样的“奖状”。那些人每星期可以吃三次“特菜”），結果舍

不得扔掉，全都吃了下去。到了七点钟的时候，胃痛又发了。可能因为这一次吃下去的分量不多，所以发得比较轻些。

第二天 19 日的午饭菜是豆腐酱汤。如果呆在牢房里，等人家分发的话，弄得不巧，有时一块豆腐也分不到。弘藏因为可以先下手为强，就在木桶里尽拣豆腐舀了够两三个人吃的分量。本来，伙房送来的木桶里，几十个人吃的豆腐全都沉在桶底。要是轻轻地把杓子伸到桶底，把豆腐拨攏，然后轻轻地捞上来，杓子里就全是豆腐。那杓子一杓就有一磅模样，照说每人只能分到一杓；结果弘藏却总要舀上两三杓，所以他自己抢盛的豆腐酱汤，总有两三磅之多。尽管有时也吃剩下来，他的肚皮那时也算够大的了。前面已经讲过，这个小管刑务所，早饭菜和晚饭菜永远是酱汤，有时连午饭菜还是酱汤；不过中午那顿，酱汤里准有豆腐。这豆腐汤是弘藏爱吃的东西。有了自己动手盛菜的特权，他自然不能不多盛一些；既然多盛了，自然不能不扫数吃下。由于这样的关系，那天他吃了比一般人多出几倍的豆腐。结果报应昭彰，到了下午两点钟模样，胃又隐隐地痛起来了。

1 月 30 日的午饭菜，是大葱烧油豆腐。油豆腐也是弘藏爱吃的东西。那天大概又是多吃了油豆腐的报应，正午过后，胃部同一个地方又隐隐地痛起来了。

尽管从年底到正月，他一再受到警告，可是仍旧吃过苦头不改，拼命贪吃。也许是因为这个冬天异常和暖的关系吧，后来他居然没有闹什么大病，就在最冷的数九天里，也没有住着病房。

弘藏的身体，外表单薄，其实并不坏。他的精神，说来也有这种特点。他以那样单薄的身体，居然熬到今天，再过不到半年工夫，就可以期满出狱了。

既然已经熬到了今天，任凭怎么样，弘藏也不愿再让假释出去

了。他暗地里立誓：“好容易苦撑到今天，哪能再让假释出去呢！咱一定要争取服刑满期，大模大样地走出牢门。”而最后给他这个决心助一臂之力的，实在是承办他那个案子的审判长藤井五一郎推事。

藤井推事尽管为了“帝人事件”^①这个案子忙得不可开交，1月19日还特地到小菅刑务所来看弘藏。自从弘藏下狱以来，除去第二个年头，他每年1月份准要来狱里看弘藏一次。在小菅刑务所里见到藤井审判长，这在弘藏是第三次了。

那天刚要开始分发晚饭的时候，弘藏被叫到所长室。弘藏心想：“现在的所长从来没有和我讲过一句话，有什么事情要在这种傍晚时候叫我去呢？”等到走进屋子一看，原来只有藤井一个人站在那里。

所有的狱吏都已回家了，宽敞的所长室里一个人也没有。屋子的一角，摆着圆桌，桌上铺了厚厚的类似天鹅绒的台布，周围放着十分华丽的大沙发，简直像银行公会里所用的一样。大概是因为觉得犯人不配坐那样好的沙发吧，旁边放了一张不知从哪里搞来的蹩脚凳子。把弘藏领进室内的警卫主任，指着那张凳子，对弘藏说：“坐在这里！”说完就出去了。

藤井推事一见到弘藏，就露出一脸柔和的微笑说：“我是藤井。”

去年和前年在这里见面的时候，他也总是首先这样地通名报姓。一般说来，当官的见到犯人的时候，向来不自报官职或姓名，因此往往弄得犯人直到最后都不知道和自己说话的是怎样一

^① 1934—1937年围绕着帝国人造丝公司股票买卖的一件渎职案。当时大藏次官黑田英雄、铁相三土忠造、商工相中岛久万吉都因贪污受贿而被控告，内閣因而总辞职。——译者

个人；这是刑务所里的通則，也是对待犯人的一种官僚态度。一向受到这种对待的弘藏，对于这位推事的自通名姓，抱有极大好感。本来，弘藏纵然健忘，也决不会忘掉第一次在法庭上见到的他那副脸容——头上戴着推事帽、鼻上架着粗框架的黑边眼鏡、一字一句清楚响亮地审理的他那副脸容，一眼就认出来了；可是每次见面时他总自道姓名，这却給弘藏留下了一个异常良好的印象。其实，凡是想打开人家心扉的人，除非他是一个小偷，否則首先通报自己的姓名总該是一种应有的礼貌。

两下寒暄过后，藤井就說：“有什么事情想問么？我来看你，并没有什么事，有問題就問吧。”

弘藏随即答道：“没有什么想請問的，只是想表白表白我的謝意。前年在这里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已經說过，說不定高島也已經轉达給您听了（高島是已經假释出去的一个右翼政治犯。承办他那个案子的审判长也是藤井。他在出獄前曾对弘藏說，出獄后他打算去訪問藤井推事，要是弘藏有什么話，他可以代为轉达。弘藏这里就是指的这个）；我感謝您給作了公正的审判。受了刑罰反而表示感謝，听来似乎不伦不类，不过我是早就知道自己的行动触犯国法、会受到法律制裁的，所以即使受到較重的刑罰，也不会有什么怨言。固然，尽管有了这样的精神准备，事到临头，还是經不起考驗，在法庭上出了許多洋相；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却深怨自己那时沒有能保持更加理直气壮的态度，而觉得可耻。其实呢，刑罰的輕重，本来沒有有什么关系。只是自己是个搞学术的人，甚至可以說是就为了那学术的緣故，才自投罗网跑到这种地方来的；所以我一方面希望人家把我当作搞学术的人看待，另一方面也希望自己不致丧失搞学术的人的应有态度。……现在我唯一的想法是，把該受的刑罰充分受了，要是还能活下去的話，那末就让我躲到社会

的一角，安安靜靜地度過晚年。我因為抱着這樣的心情，所以認為在實質上我是受到了作為審判長的您的合情合理的處理；我所感謝的就是這一層。不瞞您說，去年明治節後見到吉村檢察官的時候，還有從前和戶澤檢察官見面的時候，我都對他們說過，我熱愛日本，並不輸於任何人。他們聽了我這話，曾說這是違反社會上一般的想法的；自然我自己也充分知道，我的想法和社會上大多數人的想法並不一樣。想法雖然完全不一樣，但是有一層却使我引以自豪，那就是，在想讓我們日本變得更好這一點上，我決不輸於任何人。因為這層關係，我到底也沒有在思想上轉變方向。這在人家看來，也許是我夜郎自大，不過事關學術，不該隨便放棄自己的信心，這是沒有辦法的事。”

仿佛积水傾瀉一般，弘藏一口氣說完了這番話。

默默地聽着他說話的藤井，這時就說：“當初要是你說話中聽，提前四、五個月出獄大概是沒有問題的。不過，為你着想，也許與其說一些違心之言，還不如遲幾天出獄，卻落一個心安理得的好。你的所作所為，一向光明磊落，檢察官站在個人的立場上對你是十二分同情的。”

弘藏聽到這番話，感到十分出乎意外，他只是說了一聲“謝謝”；不過，從職務上說來本該勸左翼思想犯轉變方向的推事，親口說出這些話，卻給了弘藏莫大的鼓舞。他頓時就覺得混身加了一把勁。

“我只是來看你一下而已。時間不早了，今天就談到這裡吧。”

一看藤井手邊，只有弘藏的一本檔案簿擱在桌上。弘藏看到這個光景，心裡轉念，今天藤井推事完全是為他一個人而來的了，於是由衷地表示謝意說：“承您百忙中幾次勞駕相訪，實在感謝不盡。”

可是，藤井似乎还有什么話要讲，并不馬上就离开。

“我来这里，并没有什么公务，只是想来看看你而已，所以最好請你不要对外宣揚，說我来过了。”

“知道了。决不亂說，使您为难。”

双方談了这些話之后，藤井又恳切地劝弘藏出獄后吃东西要小心。他再三叮囑說，一下子获得了自由，往往会乱吃好东西，这样一来，就准会搞坏身体，所以刚出獄的时候，第一要注意飲食。他說完这些話，才离了座位，最后对弘藏說：

“以后不再来看你了，保重身体吧。祝你长命百岁。再见吧。”他看着弘藏精神飽滿地走出去的后影，似乎感慨很深。

被捕以来，弘藏曾經会见过形形色色的官吏，唯独每次和藤井见面，事后总留下一種好感。那是因为無論在他的态度方面或說話方面，都不帶絲毫憎惡、輕蔑、威吓、缺乏理解的成分。弘藏那天在日記里記下了这样一段話：

“不久以前，某个獄吏还曾对我說起‘教务科长很关心先生哩’、‘先生大概不久就可以出獄吧’之类的話，因此我还是沒有丢开那种念头，觉得我說不定可以早几个月假释出去；直到会见了藤井推事以后，我才确信我决不会得到假释。与此同时，我觉得这可帮了我的大忙。一方面，我自然是願意早日出獄的，然而另一方面，索性等期滿再出獄的念头也頗为强烈。因此觉得，既然期滿出獄已是确定不移，那就很好。于是提早睡觉（按：那天大概由于身体有什么不舒适，获得了提前睡觉的許可），上床以后，只觉得滿肚子高兴，渾身是劲，一会儿就睡熟了。”

他的决心是直到这个时候方才最后下定的。

未见天日的《獄中贅語》(一)

从1月底到2月初，教务主任把弘藏叫去多次，要他转变方向。这个教诲师，和思想检察官不同，对思想问题既一窍不通，脑筋也不大管用，因此他讲的话，弘藏听了莫名其妙，弘藏讲的话，他也不能理会。他的话，弘藏只记得零零碎碎的几句。

“我么，不想和你谈学术啦、思想问题啦什么的。这方面的问题，我和别人倒也谈谈，却不打算和你谈。”

“我么”和“什么的”是他的口头禅。另外，他在讲坛上讲话倒还流利，和人面对面谈话时就口吃得厉害。

“我么，今天只想和你谈谈普通做人的道理。我么，不要求你承认学说是错了啦什么的。学说是学说。撇开学说不谈，无论怎样，你到底是一个日本人。再说你还特别受到国家的恩惠，领着巨额的恩俸什么的，如果不稍稍为国家着想着想，我么，认为很不对头。希望你站在日本人的立场上，今天另外想一想。这就是我的意思。你说你出狱以后不再搞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可是到了你期满释放的那一天，尽管你一句不开口，人家也知道你不是转变了方向才出狱的。这等于告诉大家说，本田虽则坐了四年牢，却终于没有转变方向而出来了。这对于社会上的一般青年，影响很大；这样，在你这样一个领着恩俸的人说来，就太对不起国家了。这一层希望你好好考虑考虑。

“你说你不能改变学术上的信心，这也罢了。我不勉强你作违心之论。我么，只希望你离开学者的立场，目光放得更远大些，站到人的立场上来。老是‘学术’‘学术’地死抱住学术不放，这就是佛法所说的我执了。我看你还得把这个我执什么的扔得光光的，

姑且不談学术，纵使学术并没有錯，也还是干脆把它丢掉，站到日本人的立場上来。”

他翻来复去讲着同样的話，还不时插进这样的声明：“不要以为我这样一說，就是答应把你假释了。”弘藏听到这話，差点儿沒有說出：“那末我就自动謝絕假释吧。”弘藏看得很清楚，随着期滿释放的日子越来越近，对方也就越来越着急。对于一般犯人，教务主任向来采取藐視的态度，犯人方面，总是低着头，必恭必敬的；而弘藏呢，說話的时候却把两只眼睛直盯着教务主任的脸，教务主任說話时反而要避开弘藏的視綫，望着窗外。随着期滿释放的临近，强者逐渐变为弱者，弱者逐渐变为强者，这是弘藏感到不胜痛快的。

接連作了一些不得要领的問答以后，终于让弘藏姑且把目前的想法写出来。弘藏觉得在出獄以前能总结一下自己的思想，倒也不坏，所以趁此机会写了一部稿子：《獄中贅語（刑期屆滿前我的思想情况）》。现在保留下来的那个副本里，末尾还注明：

“1937年1月31日起稿。

同年2月25日初稿写成。

同年3月18日誊清完毕。”

弘藏为自己誊清的一部，这样早就誊清完了，可是因为觉得不必急着送給上面看，所以另外又誊清了一部，直到5月21日才交給教务主任。

《獄中贅語》这个标题，是为了呼应未受审前在市谷刑务所里写的《獄中独語》而拟定的。不过，和《独語》比較起来，这个《贅語》要长得多了。建設社发行的“自由日記”簿，正好写得滿滿一本。

全稿共四章：第一章，《欢欢喜喜地盼望着释放的日子》；第二章，《关于馬克思主义》；第三章，《关于宗教眞理和宗教》；第四章，

《結束語》；其中第二章从第六节起至第十五节为止，共十节；第三章从第十六节起至第四十一节为止，共二十六节。

《贅語》和《獨語》不一样，后者是将要受审的时候写的，而前者却是快出狱的时候写的，所以势必至于变得气势汹汹了。弘藏是抱着“这时再被假释那还吃得消？”的心情而写那部东西的，所以肚子里想什么，就毫无顾忌地写了什么。可惜这部《贅語》没有像《獨語》那样整篇被各报刊登，只有司法省的几个当官的看过，而没有见到天日。这样，自然就成了弘藏生前的遗书之一。

这部东西，可以说是弘藏在监牢里削尖了生命的铅笔所写成的东西，对于他本人来说，它有着极大的重要性；不过，由于分量过大，这里不能详细记下它的内容，只能引用两节，借以使大家想像它的全貌。

在第二章《关于马克思主义》里，弘藏强调了他到底也丝毫没有改变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心。例如其中有着这样一些话：

“思想上转变方向，这在我是始终没有加以考虑的。最初下狱时，正碰上我向来所尊敬的同志、实际运动方面的老前辈、尤其是在共产国际以及红色工会国际里占据重要位置的佐野、锅山那批人一个个声明转变方向的时候，因此，对我来说完全还是个未知世界的刑务所，就被我认为是个具有神奇的魔力的怪物，——心里有些害怕，怕一个人要是长久被关在监牢里，也许会像喝了致命毒酒那样，使理智之类的东西全受麻痹；可是结果，也许是因为我的刑期幸而较短的关系吧，后来我的思想居然没有发生丝毫动摇，说实话，几年来的刑务所生活，反而使我的学术上的信心更加巩固了。”

“当我作为未决犯关在市谷刑务所里的时候，曾经收到一位好心朋友的来信，信里说，他看到我当时发表的《狱中独语》那篇短文

章，淌了眼泪，但是他对我的至今死捧住馬克思主义不放，却感到十分遺憾；接下去还說：‘監獄里想必安靜得很，那里既沒有客人过訪，也沒有家事要操心。我盼望你能在那个安靜的环境里从从容容地思索思索，把过去在学术上的錯誤清算掉。’那封信现在不在手边，其实原文給人的印象，比这还要自命不凡，里面表现着露骨的小主观、小感情，实在令人可厌。——到现在我还忘不了那封信当时留給我的这样一个印象。对于我这样一个为了探究科学真理、长年累月艰苦备尝、結果好容易掌握了学术上的信心、为了它甚至不惜把衰老之身葬送在監獄里的研究学术的人，以他那样一个对当前問題一无所知的外行，竟来多嘴进什么忠告，这不仅是全然不懂做人的规矩，而且好比是小学生对大学教授提出学术上的指点，真是十足的一位吉訶德先生！——想到这里，当时我一个人不胜憤慨。

“叫人在監獄里另外作出学术上的結論，那无异于沒收了医生的体溫計、听診器、X光照相机等等工具，使他和病人隔离得远远的，而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外行却神气十足地吩咐他說：‘我不滿意你的診斷，那一定是錯誤的。我看你还是用手按着胸口，好好考虑考虑，重新診斷一下为是。’本来这就太岂有此理了。要是和一切社会现象几乎完全隔絕的監獄，竟成了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最好的研究場所，那末现在各大学里的庞大的圖書館和研究室，就完全沒有用处了。而且为了培养大学教授，也用不着把青年学者送到外国去留学，只要把他們全部关进刑务所，让他們像从前的达摩大师那样面壁九年就成了。可是在实际上，‘必須搜集丰富的材料’（《資本論》第二版跋文里馬克思的話）却是探求科学真理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不用說，如果从一定观点任意选择研究材料的話，那末因选择方法不同，就可能只是从多方面的对象中（其实任何微小的

对象也有着无限多的方面)抽出任意的一方面;那种材料,也可能成为任何片面的謬见或单方面的偏见的証明材料吧。不过,那样得出来的結論,外表上尽管理由很充足,然而不切实际,离真实很远,对于人类社会,毕竟有百害而无一利。所以,科学真理的忠实探求者,总是要求首先无遺地全面地掌握有关他那研究对象的主要材料,认为这对他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才說,学者为了作出一个結論,得积累比勃朗峰^①更高的材料。但是,这种要求,对于監獄里的囚徒来說,是不可能实现的。”

因此,“刑務所这种地方,不是大学的研究所,从而,在这种地方是不可能重新掌握到什么科学上的真理的”;从而,自己在学术上的研究結果,在監獄里到底沒有加以任何修正,該是“十分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一层,就是弘藏首先主张的。

然后他掉轉笔头,对共产党員的“轉变方向”作了毫不客气的批判,說出为什么自己不能和那些所謂轉变方向的人同流合污;再轉而談到当前的社会形势,談到法西斯主义的抬头、苏联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危机等等,认为所有这一切事实,全都証明他自己的学术信心是正确的。

例如关于法西斯主义在全世界的急遽抬头,他这样說:

“这許多现象,在許多人看来,也許会显得是反共产主义的趋势汹涌弥漫于全世界;可是在共产主义者看来,这不是别的,却是共产主义代替資本主义的可能性——也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实力——在全世界范围内增长起来的表现。

“就拿我国德川幕府时代来說,当封建庄园主的势力还巩固的时候,諸侯可以只帶两三个侍卫,騎了馬在市民中間游逛;可是等

① 勃朗峰在法国和意大利交界处,是阿尔卑斯山的最高峰。——譯者

到封建势力极度衰退、即将崩溃的时候，諸侯出外，却就戒备森严，凡是他路过的地方，市民都得跪伏在地，甚至不准抬头看一眼。势力在实质上是衰落了，而外表上却反而显得格外威风，这是常有的现象。这无异于地球本来是围绕太阳转的，然而外表上却是太阳围绕地球转。馬克思主义者决不会对这种表面现象抱什么幻想。我现在呆在监狱里，詳細的具体情况一点也不知道，可是，尽管是呆在监狱里模模糊糊觉察到的世界大势，也一点不说明时事日非，却正好与此相反。这样看来，有什么可悲观的呢？只要人类不灭亡，那末出路就只有共产主义的一条，我們是永远不会失望的。”

接着他又谈到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危机迫在眉睫，最后說：

“往年的世界大战，参战的有三十四个国家，动员的人数是六千七百万，消耗金錢七百亿日圓，战死者不下七百零七万人，負伤者(除去法国、羅馬尼亚和俄国等)一千零六十七万人，战禍之慘，簡直无法描述。我們日本因为远离战争的中心，所以受禍最少，大多数国民对于近代战争的严重性也就認識不足，动不动就表现出要用战争来解决問題的那种好战情緒；其实要是我們考虑一下自从往年那次战争以后兵器的异常进步，特别是空軍的飞跃发展，那末即将到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会帶給人类多大的慘禍，也就不难想像。光說战死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死在戰場上的，就有七百万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恐怕要在几千万以上吧。我一想到这一层，就一方面在內心里設想着现世的阿鼻地獄，一方面感到像我这样学习馬克思主义的人，責任实在非常重大。

“为什么呢？

“因为除了馬克思主义者而外，沒有人能懂得使世界大战成为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同时，除了馬克思主义者而外，也沒有人能

懂得根絕世界大戰而把和平帶給人类的真正方略，並且不惜生命地為實現那方略而奮鬥。……

“每當想到這一層，即使還蟄居在研究室里研究着科學的時候，我也熱血翻騰。現在儘管關在刑務所里，可是平常並不吃能使心臟僵凍的蛇毒，我的血幸而還是熱的。”

第二章里，弘藏隨處都說着這樣的大話，還吆喝說：“要是模仿傅大士^①的話來講，那末我在監獄里實在是每天早晨和真理一道起身，每天晚上抱了真理一道睡覺哩。”

未見天日的《獄中贅語》(二)

《獄中贅語》里篇幅占得最多的，是第三章《關於宗教真理和宗教》那部分。弘藏在這一章里，談到了下面這樣五個問題：(一)什麼是宗教真理的問題；(二)怎樣掌握宗教真理；(三)人們掌握了這種宗教真理有什麼好處；(四)宗教真理和宗教的關係如何；(五)宗教真理和科學真理的關係如何。

在監獄里，科學研究是搞不成的；然而要是搞那講求九年面壁的宗教反省，監獄却並不比修道院差，是個理想的地方。——弘藏一開頭就抱着這樣一種想法。他在《關於馬克思主義》那一章里，只表述了自己原來的信心一點也沒有動搖，沒有提起有什麼心得；而在《關於宗教真理和宗教》這一章里，卻準備把獄中生活給他的新收穫說一說。但看他出獄後所寫的一篇東西里，就這樣地談到那件事：

“這一章東西，要是我不坐監牢，恐怕一輩子也沒有機會寫(如

^① 傅大士(497—569)是我國南北朝時的和尚，轉輪藏的創始者。本名傅翁。著有《心玉銘》、《金剛經頌》等書。——譯者

果不被关进监狱，我对于宗教这样东西怕就没有机会那样深入地思考)。再说，在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可能除了我之外，别人也不见得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来。这是享之千金的敝帚，连头带尾坐了五年的牢才写出来的，内中含有值得注意的独到见解。明知写出这种东西让人家看，不仅刑务所里的教诲师们看不懂，连检察官也不会懂，但是为了这一章，我仍然费去相当篇幅，那是因为我借借此总结一下自己的想法，可说是为我自己写的。”

这一章里所写的东西，牵涉的范围很广，遗憾得很，这里不可能一一介绍。要是光把它的大要摘录的话，那他所说的大致是下面这样。

除了科学真理(科学上的真)之外，他肯定了宗教真理(宗教上的真)。

关于科学真理，可以无须加以说明。问题只在于他所说的宗教真理到底是什么。

根据他的说法，宗教真理所讲求的，是意识那意识本身，以心反映心。它的基本特点就在这个地方。他说：

“我们人类具有高度发展的意识作用。靠了这个作用，我们才知道我们周围有桌子，有房屋，另外在小的方面，知道有肉眼看不见的细菌，在大的方面，知道有包括着太阳、星星和月亮的天空是什么样子。这些知识，随着科学的进步和发达，越来越正确，越来越丰富。我们利用这些知识，就可以更积极地改变我们的环境(外界_{的物})，无止境地改善这个世界(物的外界)，使它更有利于我们的生活。可是，宗教真理却和这一方面不发生任何关系，因而一点用处也没有。所以，像弘法大师那样开山、造桥一类的事，宗教家虽然也不妨做，却和宗教无涉。

“宗教真理不是关于外界事物的知识，而是关于意识本身的知识

識。有意識作用的人意識到自己，即意識的自我意識，這就是宗教真理的使命。在這種情況下，意識不是向外，而是向內。它不作用于外物，却作用于它本身。”

肯定真理的這兩個範疇，而說明它們的區分，這還不怎樣困難。對弘藏來說，最大的難題就是怎樣把這兩樣東西唯物主義地統一起來。關於這一層，他的主張大致如下面所說。

科學真理和宗教真理，是知識的兩大範疇，不過，就像上面所說，它們的對象和動向完全不同。科學真理主要是由西洋人加以認識的；至於宗教真理，則主要是東方人（特別是印度人和中國人）掌握得最深刻。西方文明和東方文明，一個是物質文明，一個是精神文明，它們的基本動向有所不同，主要就是由於這個關係。但是，這兩種真理並不互相排斥，兩者並不是處於這樣一種關係，即承認了科學真理就必須否認宗教真理，承認了宗教真理就必須否認科學真理。實際上倒是相反，這兩樣東西，儘管它們的課題不同，立場不同，認識方法不同，領域不同，却有着一個統一關係，必須互相配合，然後才能完成人類對物心兩界的認識（這就是辯證法所說的對立的統一）。我們在明確認識兩者的對立的同时，必須懂得兩者的統一。如果看不到它們中間的這種統一，那末站在肯定宗教真理這一立場上的我們，由於遇到無數的陷阱，就很容易跌進種種迷信、錯誤、僧侶主義等等的泥潭。例如那些康德學派哲學家，由於主張有所謂“不能認識的東西”、“和現象有本質的不同的東西、本質上不和現象屬於同一領域的東西”、從而“屬於那靠知識是終于不可能達到、只有靠信仰才能闡明的彼岸的領域的東西”即“自在之物”的存在，結果掉進了形而上學思維的泥潭，就完全是這個關係。現在，我一方面認為科學真理和宗教真理所處理的對象（物的世界和心的世界）不同，從而掌握這兩個真理的方法也不同，

另一方面却并不认为两者之間有什么不可逾越的絕對界限。我相信，無論掌握科学真理也罢（即通过对外界的观察而理解它的真相），掌握宗教真理也罢（即通过回光返照而理解心本身），同样都是依靠人的意識作用的認識，而这意識作用，不外乎是包含在人这个高等动物的有机組織里的高度发达的大脑等等的机能。所以，尽管我肯定宗教真理，却并没有逃避到神秘的云雾世界里去的必要，我仍然是个唯物主义者、无神論者。

这就是他的见解的要点。

他对自己能够达到这样的见解，似乎感到十分滿意。关于这一层，他在出獄后所写的文章里，亲自說过下面这样一番話。

“我相信，这个见解里含有前人从未說过的若干重要認識。至少，在肯定宗教真理的同时，又唯物主义地把它加以統一，这是我讀到的任何书本中所沒有讲过的。我之所以能不靠前人启发、但凭自己的力量而把这一层弄明确，深信是監獄生活帶給我的重要收获之一。

“回头看看，自从二十六岁那年一度参加无我爱运动，至今已过了三十多年。这三十多年中，我总认为让愚夫愚妇形态包裹着的宗教，有一套真理。大概这也就是基本原因吧，等到后来我信奉了馬克思主义，还是一再受到批評家的指摘，說我仍然陷在唯心主义、观念論的泥潭里，沒有改弦易轍。事实上，当那些年輕馬克思主义者搞反宗教运动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我也还是若无其事地在承尘上挂着释宗演——我曾經拜他为老师——所写的‘真无我’的三字匾額，直到 1929 年 1 月我离开京都时，才和它分別。在此以前的二十年中間，我每天都见到‘真无我’这三个字。就是当我讲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的时候，我也沒有想到要把那个匾額收起来。我并没有为此而感到矛盾；然而心里老觉得有

一个疑团沒有解决。后来，我住到东京，埋头搞着实际运动；这样一来，‘真无我’那个匾額就不看见了，于是自然而然地忘掉了宗教。从前留下来的关于物心两界的統一的那个疑团，终于沒有得到彻底研究，就被抛在一旁，听它保留在我心里。恰好那时我被捕了，在牢里連头带尾关了五年，有机会重新靜靜地看些宗教书。我就利用这个机会，解决了三十多年来的那个老題目：物心两界的統一。我把我近年来在民众的鴉片——宗教里所发现的一粒宝珠和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統一了起来。后来我之所以能在出獄时觉得：‘咱总算大致完成了近年来对自己提出的一件任务；今后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員，即使遭到与世隔絕的境遇，也沒有关系了；“朝聞道，夕死可矣”这句话，确实有道理’，感到非常太平和滿意，正是由于我邏輯地解决了这样一个近年来的老題目——宗教問題，而心安理得的緣故。

“这种物心二界的辯証統一，是我在監獄生活的最后一个时期里所达到的結論。实际上，我最初根据戶澤檢察官的要求而提出的《关于宗教真理》那篇文章中，还没有达到如此明确的結論。这实在是連头带尾五年的監獄生活的最后阶段所得出的結論，同时也可以說是酝酿了三十多年、直至活到将近六十岁时方才掌握住的結論。

“头脑敏銳的讀者，也許要笑我愚鈍，笑我为了懂得这样簡單的道理，竟花了那么多的時間。可是，同样一个結論，辛辛苦苦得来的，毕竟有力量。——由于达到这样一个結論，我获得了一个新的力量。”

总之，他自己就是这样想的。因此，他揚揚自得地用下面这番話結束了《贅語》。

- “如果把这篇文章給人看，人家对它的是非得失，毀誉褒貶，一

定会千差万别；可是我自己呢，现在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矛盾，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安，而且值得庆幸的是，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后悔。我只想回头对妻子说：‘启予足，启予手。’^①

“我已经是快到六十岁的人了。从小人家就说我身体单薄，而我却不仅居然一直活到今天，而且能把一生中最美好的时期用在自己认为最重要的学术研究上（我确信，研究学术，掌握真理，是增进人类幸福的源泉），特别是到了晚年，连头带尾度过了五个年头的监狱生活，还能坚守自己在学术上的信心，回想起来，只有抱着侥幸之幸的感激之情而已。下狱以前，我听到许多人转变了方向，深怕呆在监狱里思想会发生动摇，结果终于逃过了这一关。回想起来，我在1928年离开大学后不久，出版了《经济学大纲》，在那本书的序文里，我大致说过这样一句话：‘纵使赴汤蹈火，我也决不背弃我的学术。’（按：健忘的弘藏，那时本来记不起这句话。他那本著作，当然是禁止送进监狱的，可是有一个犯人，却偷偷地把它弄来读着。结果弘藏借来看了一天。因为这类事情是严重违犯所规的，所以故意暧昧其词。）到现在，我能免于耍笔杆、说空话的讥笑，是值得欣幸的。

“我回顾过去，一点也没有什么可后悔的地方。从这一点上说来，即使被认为毫无悔改之情，也无可如何。不过，等到期满释放出狱之后，我却决心完全从社会上隐退，不预备再触犯法网，回到刑务所里来。老实说，这倒并不是因为我认为马克思主义错了，或是共产主义运动错了，只是因为我的年龄眼看着就是六十，要是再触犯一次国法，那末除了死在监狱里，不会有别的下场；而在我说来，朝着这样一个方向前进，已经不是我能胜任的了。

① 见《论语》《泰伯》第八。——译者

“我为人处世的根本方针是：一个人活在世上，评起分数来，不求过高，却不要不及格。不自量力地把计划搞得十分庞大，半中间却陡然垮向反对方向，这样一来，目标本是正数的一百分，结果倒变了负数的五十分。我因为怕出这个丑，所以宁可量力而行，得个正六十分，也就心满意足了。

“像我这样能力薄弱的人，在现今这种时势下，要再为共产主义运动而工作，已经是沒有希望的了。如果再要搞这种不能胜任的事，我这个软弱的人，也许会垮向反对方向，落一个叛徒的下场。我怕出这个丑，所以决心趁此机会，干脆退下阵来，隐遁到老死，不再参加任何运动。

“作为一个研究学术的人，我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所能完成的任务。为了报答使我有机会研究学术的幸运——我觉得这是莫大的幸运，——自然应该竭尽力量，把学术上的信念鼓吹一番；可是，在这方面，我甚至已经做到了触犯国法的地步，所以自以为义务算是已经尽到了，可以不作他想了。——日本人把小小的摔跤台上转瞬间就分出胜负的摔跤作为国技，在十七音以至三十一音构成的全世界最短的诗歌——俳句和短歌里装进一刹时的印象或感情而感到满足；我是这样的日本人中的一个，所以不具备以斗牛为国技的西班牙人那样的韧性，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我已经做了应该做的事。我的心好比磨亮了的钢镜，沒有遺憾的锈迹，沒有后悔的伤痕，也沒有内疚的尘灰（我说这话，也许会被认为是狂妄的托词吧）。心境是坦荡荡的，现在只等候着冬去春来。——不久就是夏天了，大家都要脱去春衣了；到那时，我就可以欢欢喜喜地被释放回家了。到那时，我就可以一面抚摸着五年中间加在自己手脚上的无形桎梏的伤痕，一面盘膝坐在家中人特地为我的长腿缝制的大坐垫上，不受人监视、自由自在地和一家人

談天了。對我說來，哪有再比這個使我高興的事啊！——寫到這里，我注意到我的文章不期然而然地又回到開頭的地方去了。也該是結束的時候了。于是我微笑着放下了筆。”

做好了出獄的準備

正如前面所說，弘藏上面所說的那部《獄中贅語》，是1月底起的草，2月底寫好的。

2月初，他還試寫了一個備忘錄，那是預備在出獄時給新聞記者看的。那篇東西後來在文字上曾經一再修改，但是它的內容大體上和2月初寫的初稿沒有什麼兩樣。

就這樣，出獄的準備全都辦好了。到了3月7日，剩下的刑期終於只有一百天了。

3月19日，刑期還只剩八十八天的那天傍晚，伙房里的主任看守派人來叫他，說是有事。他懷着鬼胎去伙房一看，原來所謂“有事”，是給他包子吃（那包子原是發給一部分犯人的“優待”包子）。他獨自一人坐在伙房畸角上的炊事夫們的那個小飯堂里，把拿給他的五個包子全都吃了。這是由於他快要出獄、伙房的主任看守私下給他的照顧。自從那次以後，他在出獄前曾好多次受到這種特別的照顧。本來他心想，大概最後要讓他寫幾張冊頁了，哪裏知道並不是為這個。弘藏對於這樣的照顧。久久不能忘懷。

大概老天覺得他的喜事還不夠多吧，婚後不久就懷了孕的真知子，一交4月，就生了一個女孩。4月1日的早晨，他收到了都筑拍來的“女，母安”的電報。

這些日子里，教務室旁邊那個天井里的木瓜樹，已經開滿了花。剛解除晝夜獨居那年的春天，他曾經折取一枝，養在玻璃瓶

里，聊以自娛；今年它也開花了。櫻花也一星星一點點地綻出白色。從前唐朝的白居易靠在慈恩寺的門口惋惜“惆悵春歸留不得”的春天，居然又到來了。弘藏的心，却趕過了季節，早就春意闌珊了。

不料在這樣的時候，卻來了一個莫名其妙的探監者，因此弄得弘藏非常不愉快。他覺得這就好比花開時節下了一場雨。

4月1日，剛剛接到真知子平安生產的電報，弘藏就被叫到教務室。去到那里一看，原來藤井惠照來了。這人是个真宗和尚，弘藏關在市谷刑務所里的時候，他是那里的教務主任，這時已經調到了新辦的東京保護觀察所的保护司。弘藏到現在連頭帶尾已經有五個年頭沒有見到他了，所以怀着親熱的心情和他見了面。哪里知道和預料相反，對方却莫名其妙地板起了臉孔。久不見面，這和尚却沒有說半句“過得怎麼樣？”或“還好，总算你的身體還不錯”這類像人的寒暄話。他对着弘藏盡說些什麼“不轉變方向而出獄，很糟糕”啦，什麼“爭取提早兩三天出去，也是好的，反正也算是假釋，表示上面認為你‘有悔改之情’，否則出去之後很不利”啦；什麼“如果得不到假釋、期滿之後再出去的話，那末照《保護觀察法》的規定，出獄後住處可能受到限制”啦等等的話。他側轉着臉，一個勁兒吞吞吐吐地低聲嘮叨着。

弘藏肚子里轉念：“只剩兩個多月了，還轉變方向个屁！”因此他就像搜索對方躲避人的眼光那般地正視着藤井，毫不客气地說出了自己的意見。一向受慣了轉變方向者們的阿諛奉承的藤井，非常不滿意弘藏的態度。到後來，他越發生氣了。尽管最初給他們兩個介紹的这里的教務主任對弘藏留下了一句“今天你們寬談吧”才走開，藤井却像話只說到一半那般地溜了。他脫身就走，差一點兒沒說出“誰要聽你這套話！”

和藤井那次会面，留给弘藏极恶劣的印象。他在当天的日记里说：“会面后难受了一整天”。第二天的日记里又说：“昨天见到藤井那副面貌和神情，到今天心里还留下不愉快的阴影。……我怀着亲热的心情去见他，结果却有一种被弹了回来的感觉。……他说话简直不像个和尚，甚至不像个人；那番谈话，到现在还使我很不舒服。”

当初，当弘藏还关在市谷刑务所的时候，藤井以教诲师的身分经常到他的牢房里去看他。他因为以前在丰多摩刑务所关了半年光景，从来没有一个教诲师什么的到牢房看他，而移押到市谷刑务所来之后，却受到这样的待遇，所以心里感到很高兴。由于长期受到单独拘禁，他非常想和人家接触。再说，那时正当出庭受审和下狱的前后，心里总觉得惴惴不安。一个人关在牢房里，谁也不来和自己说话，就仿佛向深深的井底直往下掉一般；正在那个时候，藤井却一个劲儿地来找弘藏谈话，说要使弘藏变成一个真宗信徒，而且他那张油腻赭红的脸上，经常露着微笑，这在弘藏看来，简直好比是地狱里遇到了菩萨。现在隔了四年光景再见面，真是奇怪，他那满脸的红光，却不知消失到哪里去了。过去在地狱里所遇见的菩萨，现在竟变成一个拦在天堂门口的恶鬼了。正在高高兴兴地走向天堂之门的弘藏，看到这个恶鬼的面貌和神情，也就一肚子不舒服了。

藤井临走时，可能对刑务所里的狱吏们说了些什么，过后在狱吏们中间，流传着这样的风声：“本田实在可怜。据说出狱以后，东京不让住。”弘藏于是向所长申请，让他看看《保护观察法》的条文。拿到后一看，果然内中规定：违反治安维持法的人，期满出狱后，得限定其住处。弘藏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如果指定住址是不可避免的命运，那也只好承受。”

不过，好容易盼到快要出獄的日子，正在为此而高兴，却听到这样的坏消息，弘藏不禁有些发愁了。結果，他做了下面这样两首歌。

关在牢里五年，人都老了；释放以后，倒說还要受保护法的“保护”。
束手低头，声明什么事情也不做，却还得挨打；請看这世道吧！

弘藏出獄以后，还曾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和藤井见过几次面；可是自从那次见面以后，每和这个臭和尚见一次面，就要不痛快一整天。

5月21日，刑期只剩二十四天了（查一查弘藏的日記，自从3月13日那天写了“刑期只剩九十四天了”，后来几乎每天記日記总要写刑期只剩几天，沒有一天間断）；直到那一天，弘藏才給《獄中贅語》加上例言和目次，把它送交教务主任。同时，在那一天，他只在手边留下一本日記簿、一本高尔基的《意大利故事》和一本都德的《磨坊文札》，把其余书籍全部存到了保管科，并且声請：除了穿在身上的衣服和日常用品而外，其余的衣著以及零零碎碎的东西（都是經批准自己花钱买的），全部不要了。

又过了两天，5月23日那天，他在日記里写道：“一切都准备就绪了，现在只等着释放那一天了。”另外还写进四首短歌。

不知不觉中間，释放的日子总算快到了，信都来不及写了。
一眨眼，释放的日子就在眼前了，罌粟花在微风中开过又謝了。
常备的胃痛药可以扔掉了，获得释放的夏天快要到来了。
人家說青蛙在叫，細細听去我才听到，耳朵也証明人已經老了。

5月27日，刑期只剩十八天了；这一天，他的日記里是这样写的：“近来很奇怪，不知怎样，一点都不想看书。”另外还附有一首

歌。

一日三秋地等待着释放的日子，今天这一天好容易又过去了。

6月2日，刑期只剩十二天了；这一天，东京保护观察所的中村辅导官来看弘藏。对方的尊姓大名，弘藏照例不知道。这个年轻官吏，虽然据说是检察官出身，官架子十足，说起话来，却一点自信也没有。他自己无论想说什么话，都要借长谷川如是闲的话来帮衬一下，不是说长谷川如是闲这般说，就是说长谷川如是闲那般说。弘藏就驳斥说：“长谷川那样的人，哪里懂得马克思主义者的事情！”

这时中村说道：“你的性格，属于有岛武郎的类型，是很纯真的。出狱以后，但愿不要再被青年们抬着走，受他们利用，就好了。我正为这一层担心哩。”

弘藏非常不服气地驳斥说：“请别开玩笑。我这人哪里会和跟情妇一起自杀的文学家属于同一类型呢？我这人，要不是出于自己的宗旨，那末无论人家怎么说，我也不会有所举动的。把我看成听凭人家抬到东就东、抬到西就西的那样一种人，我可有点儿不服气。”

对方说的话，似乎每一句都使他生气，只要对方一开口，他马上就接着用鄙夷不屑的口气答复了。

最后，年轻的辅导官只好说：“何必这样生硬呢；大家对你都很关心哩。”显出认输的样子，随即结束了会见。

后来弘藏刚回到图书室，就又被叫到教务室去，说是有人找。他埋怨说：“真是烦死人！”结果去到教务室一看，原来这一次来找他的是这年2月曾来和他话别的、他那个案子的审判长，藤井推事。

“终于就在眼前啦。本来还担心您身体吃不消，结果却平安地度了过来，真值得庆幸。说句没分寸的话，你大概很高兴吧？”

他说这话时的口气和表情，弘藏觉得非常和蔼可亲。特别是他说的那句“你大概很高兴吧”，内中仿佛含有无穷意义，弘藏听了感到十分喜欢。

藤井这次来，是因为再过十几天，弘藏就要出去了，所以故意安排下个机会，先会见别的犯人，把事情办完，然后顺便看看弘藏，好再和他谈几句话。四年前的1933年8月8日，他在判决弘藏五年徒刑以后，曾经对新闻记者说：“一般人也可能会认为判五年徒刑判得太重了一些……其实，从人情上来说，我也深感痛心，深感难过，因为我所判决的是一个有地位的人，是本田先生，甚至应当称做本田老师……但是，作为国家的一个成员，我觉得是没有办法的。”据说他还曾对他的朋友吐露过这样的话：“这样使我心里感到不舒服的审判，生平还是第一次。”因此，此番能看到弘藏刑期届满、精神饱满地出狱，实际上他也放下了一件心事。

出狱的日子快到了

1935年2月，行将去外国留学的田村，到小菅刑务所来探望弘藏，向他辞行。当时接见是在所长室里举行的，那时的所长谷内，听到田村说要在外国留学整两年，就说：“这样的话，本田先生，等他回国的时候，你准能去接他哩。”这个所长，不像一个刑务所里的当官的，说话很随便，他一心以为不用两年，弘藏准会假释出去了，因此终于脱口说出了这样的话。

可是结果，弘藏依然被关在原来的监狱里，而田村却终于作完了万里之行，在这一年的6月3日就可以在横滨上岸了。弘藏不

能和大家一起去碼頭迎接，虽則有些遺憾，可是他的出獄却也越来越近在眼前了。

到你远涉重洋从外国回来的时候，我也会从葛飾^①的原野上回到自己的家里。

这首歌是弘藏寄給当时还在德国的田村的五首旋头歌^②中間的一首，而现在，回家的时候竟来到了。至亲骨肉，也不再为他的不自由而悲伤了。真知子在5月31日写給父亲的信上，有这样一段話：

“初次在小菅刑务所见面的时候，第一次看到爸爸穿着那身蓝布衣裳，我实在太难过了；一想到以后还得在監獄里呆好几年，就心如刀割，哭呀哭呀，一味地哭，长大成人以后，我还从来没有那样哭过；那时候，誰会想到再有今天这样熱鬧的日子到来呢？再过三天，姊夫也回来了。……刚才接到姊姊寄来的一个明信片，她說明天就要乘特別快車飞燕号到东京来。能够见到甥女百合子她們，自然很高兴，可是最高兴的，还是能让姊姊看看我的女儿純子。純子不怎样胖，可是逐渐懂事起来，要是逗逗她，她就发笑。外公虽然不怎样爱逗小孩子，不过我也极想早日看见外公逗逗她哩。”

弘藏入迷地讀着已經做了媽媽的小女儿写来的信，高兴得眼泪都淌出来了。

6月5日，刑期只剩九天了。这一天将近正午的时候，平安回国的田村同了喜志子一道来到了小菅刑务所。带回許多国外見聞的田村，在仅仅三十分钟的接見時間里，匆匆忙忙地只讲了他所专

① 地名，小菅刑务所就在那里。——譯者

② 和歌的一种体裁。——譯者

攻的电气工业方面的欧美的现状等等。弘藏觉得他的观察似乎很中肯，感到十分欣慰。

6月8日，再过六天就可以出狱了。这一天，吃了晚飯以后，弘藏把自己牢房里的便池搞得干干净净。三年零九个月以前，他最初关到这间牢房里来的时候，便池上粘着老大一层污垢，雪白的瓷器都变成茶褐色了。把手伸进便池，用刷子四面洗刷，弘藏最初还感到恶心得很，现在已经完全习惯了。他要把最初粘了一层茶褐色污垢的便池洗刷得和碗盞一样洁白，然后离开这个屋子。

6月9日，刑期只剩下五天了。这一天刚好是星期三，是规定剃胡子的日子。那天下午，弘藏心想“在监狱里剃胡子，这也是最后的一次了”，照常去南部一舍三楼的走廊里让剃了胡子。一想到“还有五天，只有五天了么”，他简直像做梦才醒一般。

傍晚时候，他一个人去到屋顶操场。因为他想这是最后一次上屋顶了，于是想量一量这K字型屋顶的一翼有多长。一量之下，才知道大约有三十步。这就是关在昼夜独居牢房里的人每天准许在这里作一次三十分钟运动的空間。弘藏为了把这里的光景记得更清楚些，又把周围观察了一遍。四周因为有水泥障壁像屏风那样包围着，所以如果不把身子靠到障壁上去，就只能看见远处的烟囱的顶端和大树的树梢，以及近在身边的、刑务所的伙房的大烟囱和威胁地耸立在半空中的、兼充钟楼的那个很高很高的了望塔。一想到三年零九个月以前的初冬时候，自己赤着脚、穿着草鞋，初次踏上这里，弘藏就几乎禁不住想和这水泥地面接个吻。尽管是使人不胜嫌恶的这个监狱，离开的时候，总还是觉得难过。

6月10日，刑期还有四天了。这一天，一直在图书室同道工作的桑原（他是一个杀害尊亲未遂的无期徒刑犯）走到弘藏身边说：“快出狱了，想必有度日如年的感觉吧？”

弘藏答道：“不瞞你說，夜里觉都睡不好了。”

桑原应道：“据说田村出狱的时候，住在他对门那个牢房里的犬飼，尽管事不关己，还是三晚睡不着觉哩。这是人之常情呀。”

弘藏那天在日记里写道：“要是14日那天夜里打过十二点钟出狱的话，这个屋子连今晚算在一起也只有四晚可睡了。尽管竭力不去想，结果还是一再思量，自己居然平平安安地熬到了今天，真是意料所不及。”

6月11日是星期五，还剩下星期六、星期日、星期一三天了。弘藏来到病房旁边的小花圃——那儿稍稍种了些用来供在佛坛上的草花，——时时沉湎在感慨里。近年来，每当休息的时候，他总是一个人到这花圃边来散步。他在固定的地点走来走去，每次总是计算着刑期，还得一年哩，还得半年哩，还得三个月哩，只有一个月了，就这样焦急地等待着释放的日子。可是现在，竟要和这个花圃告别了。想到这一层，他就把周围的许多杂草拔去，把那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感慨无量的他，不觉咏了三首歌。

来到即将离别的病房院子里一看，深红色的大丽花已经开出来了。

每当大丽花开放时，担任教务科杂役夫的弘藏，经常折取几朵供在佛坛上。今年这花儿又开始绽出红瓣儿了。

给快要别去的监狱的小院子拔草的时候，秋葵的花苞还紧裹着哩。

去年夏天，第一次在监狱里和都筑见面的时候，正当葵花盛开。“秋葵花开得红红白白的时候，才见到你，令人难忘的秋葵花呀。”那时弘藏咏了这样一首歌，心想明年总不会再看到这花儿了。现在一看，它还刚刚才含苞哩。

苍空晴朗朗的，微风飘拂着，我的焦虑的时刻快过去了。

仰看天空，万里无云，心想連这个晴空，在監獄里也是最后看到了。

第二天，6月12日，重子同了刚从乡間进京的武雄来探監。因为已經快要出獄，所以說了沒有几句话就分手了。这是弘藏和重子在監獄里最后一次见面。——她在一个月之前的5月9日，曾經写給弘藏这样一封信：

“从小菅車站到刑務所那条路，今后也只要再走四、五次了。記得1933年10月21日第一次去的时候，刑務所还没有休息室，我在收发室前面的走廊里，站着等了好半天。……今天又是那位岩佐看守，他向我招呼說：‘幸好身体爭气，一直沒有毛病’。想起第一年的冬天，一到阴沉酷寒的夜晚什么的，我就替您难过，簡直把老天恨得牙痒痒的。那时恰好离家很久的真知子获得释放，回到我身边，晚上临睡的时候，两个人只說一句‘好冷呀’，就再也不开口了。等您回家后，这类話，怕一时說也說不完吧。到那时，我会把我已經和大家說过的当时我的心情，再說給您听一听哩。”

那封信上說，“从小菅車站到刑務所那条路，今后也只要再走四、五次了”；而今天，却終於是最后一次了。从1933年10月到1937年6月，重子最初每月来一次，后来每月来两次，最后每月来三次；除了害盲腸炎睡倒的一个时期而外，她总是按时来探監，从来沒有錯過一次日期；可是今后弘藏却再也不用在这里的犯人接見室和她见面了。

6月13日弘藏的日記写道：“真是想不到！睡这牢房，竟只有今夜一夜了！真有点儿莫名其妙哩。”剩下的空白地方，还精心地画了一幅从牢房里看出去的窗景的速写画，算是“三年零九个月来每天終日眺望的窗景”。

最后一天

三年零九个月的獄中生活的最后一天终于到来了。

挂在弘藏那間牢房門口柱子上的“夜間独居”的牌子，昨夜就已經摘去了(弘藏所住的南部一舍三樓，白天放出牢房的，只有他一个，其余的人，全是昼夜独居的。因此，只有他那个牢房門口，挂着这样的牌子);門框上方，在“七五三”那个番号的旁边，挂了一块“释放前”的牌子。期滿释放的人，刑务所里规定从释放两天前的晚上起，得昼夜独居。所以弘藏昨天白天就已經和图书室里的同事以及隔壁屋子里的保管科、作业計算科里的熟識的犯人們告了別。今天得足不出户地在牢房里面呆一整天。

早飯前，他像下面所說的这样記了日記。

“6月14日(星期一)

“獄中生活的最后一天终于到了。

“昨夜也睡得很好。不过今天早晨快到四点钟的时候就醒了(按:最近走廊中部安了一个挂钟，因此可以听到敲钟的声音)，后来沒有能再睡。到四点半敲过、自来水开始出水的时候，起身了。不久敲了五点;现在，五点十分的点名也完了。我心想，只剩二十小时了。

“滿天阴霾。但願不要下雨才好。”

这里說的“只剩二十小时”，是因为前几天就和刑务所方面說妥了的，为了避免受到新聞記者的包围，今天夜里敲过十二点钟就释放。

刚吃完早飯，主任看守就来給他开了牢房門，对他說：“且去喝杯茶吧。”把他領到走廊中部的獄吏休息室。这是主任看守給他的

最后一次照顾。

午飯時間到了。弘藏昨天还夹在炊事夫們中間，帮同开飯，今天却得呆在牢房里等人家送来。伙房特地給他送来了一个五等飯。本来連七等飯都吃不掉，可是盛情难却，明知吃不完，还是道謝一声，受了下來。菜是煨赤豆。

下午一点半钟，一个人在三楼的小浴室里洗了个澡。这个浴室是弘藏洗慣了的，入所后一年半的昼夜独居期間，他每星期三，都是在这个浴室里洗澡的。

当他正洗澡的时候，主任看守跑来通知說：“刚才你弟弟把你的衣服送来了。”原来武雄把要在今天夜里穿出去的衣裳送来了。弘藏不禁有点伤心。

下午五点二十分，吃了晚飯。今天很难得，菜不是醬湯，而是烧青菜。再加今天是星期一，弘藏还有一份“特菜”：一小块咸鮭魚。

吃完晚飯，弘藏把三年零九个月天天使用的沒有花紋的白碗蓋收拾好，又把不要的东西归在一起。鏡子、墨水、信紙、牙粉、牙刷、毛巾、筷子、筷盒、縐紗衬衫和短褲、白絨布长衣，这些都是經過批准由自己出錢购买的私有物，他把它們包扎在一起，堆放在牢房的角落里。另外还有一身縐紗衬衫和短褲，一双藏青布袜子，穿在身上，預备到临出獄时再脫掉。

弘藏在那天的日記的最后，記道：“现在敲六点钟了。不到六个钟头之后，1937年6月14日就完結，我的刑期也就完結，可以走出監獄的門了。只要再忍耐六小时了。在这本日記簿里記日記，也到此为止；为了能够馬上拿了就走，随手就要把自来水笔、日記本、书、眼鏡和几封信装进紙袋里了。

“本田弘藏万岁！馬克思主义万岁！”

牢房里的电灯已經亮了。从牢房窗口看出去，天空先是灰色的，不久就漆黑的了。听到火車在什么地方开过的声音。过了一会，七点二十分。收工的喇叭吹响了。八点四十分，搖就寢鈴了。

弘藏想在临走前再睡一觉，就放下了床，穿了那件囚人穿的小西装，和衣躺倒。結果还是睡不着。不久敲了十点。他心想，还只有两小时了。

终于敲十一点了。弘藏一轆轤爬起身来，把被褥蚊帐之类照式捆绑在床头，竖起耳朵听着，是不是有人来接他了。結果，一点儿脚步声也沒有听到。沒有办法，弘藏只得让自己的枯瘦的身子重新躺倒在那已經把被褥蚊帐用带子綁起来的床上，等候着。又过了一会，远远地听到走廊里有輕輕說話的声音，随后，手拿着灯笼的主任看守部长，就来輕輕地开了門。弘藏馬上輕輕地照平常的样式把床鋪翻轉，把坐墊照老规矩拿起靠在床上，然后悄悄地走出牢房。本来，每間牢房里都通夜点着五支光的电灯，可是只有一綫微光从窺孔里透出来；每間牢房的鉄門都关得紧紧的走廊里，暗洞洞的。夜里的监房，靜得和坟場一样。

弘藏跟在看守部长后面，走下扶梯，从三楼来到一楼，然后和初来时所走的路綫相反，出了南舍，穿过走廊，来到警卫室旁的小小接见室里。这时，弘藏还不知道他姓甚名誰的一个年輕看守长走了出来，一副冷冰冰的面孔，宣布說是三十分钟之内可以释放。

今天武雄送来那包衣服，交到弘藏手里的时候，还包得好好的。包袱里是新衬衣、新斜紋嗶嘰单衫、新黑金紗腰带、新黑緞袜、新鞋，另外还有那記得在法庭上听宣判时穿过的一套罗紗大褂和罗紗围裙，就是这些东西。貼肉穿的衬衣衬褲之类，因为早就說好在牢里就換上自己新置的，可以不送，所以沒有送来。弘藏脫下小

仓布西装，把那些衣服一件件穿好。在教务科工作的那个看守部长，說是今天偶然輪到他值夜班，也跑来了，帮弘藏換了衣裳。当弘藏穿上围裙、扣着裙带的时候，他自己觉得嘴巴一裂，眼泪直往上涌。他在大学里教书的二十年中間，特别是后来那十年，几乎从来不穿西装，总是穿着围裙。他把围裙看成是搞学术研究工作的人所穿的衣服。当他脫下獄衣，穿上这围裙的时候，心里說不出地高兴，要是旁边沒有人的話，也許早就哇地一声哭出来了。

換好衣服之后，一个人在那里等着，弘藏觉得那不到三十分钟的时间，过去得真是慢得可怕。

警卫事务室里的时钟敲了十二点。弘藏本来一个人坐在警卫事务室旁的小接见室里等着，一听到钟响，随即站了起来。可是結果一个人也不见到来。

大約又过了十分钟，好容易才把弘藏叫去隔壁的警卫事务室。进去一看，穿了日本服的鈴木律师已經候在那里了。

“我想不妨向你道賀吧。”他边說边和弘藏握手。他又說：“正門外面，赶来了大批新聞記者，让我去敷衍敷衍他們，把那批人稳住，你就趁这当口請監獄里的人赶快把你从后門放出去吧。本該送你到府上，不过因为有这一层关系，只好就此告辞了。”說完就和弘藏分了手。

后来弘藏就由值班的看守部长和另外一个年輕高个子的看守提着灯笼帶路，經過暗洞洞的伙房旁边，打从被称为交換場的一个所在的側門，走出了高牆。一走进近旁那个刑务所附設的俱乐部，原来重子、武雄和都筑三人，早就拿着弘藏的帽子等候在那里了。教务主任和經常照应弘藏的一位药剂师，都等在那里送他。

弘藏这起人，趁鈴木应付着正門口那批新聞記者的时候，摸着黑，偷偷地乘上一辆預先雇好在那里的汽車，后面还跟着警察所派

来监视的汽车，深更半夜，从东京的极东，指向极西的杉并区天沼的寓所，一路往西疾驰。

回到自己家里

1937年6月15日上午一点多钟，弘藏回到了想望已久的自己的家里(那时距他离开家庭，已将六年；离他被捕，已经整整四年零六个月)。

真知子抱着纯子在门廊里迎接了弘藏。由于房子小，只有四间，连让警察坐的地方都没有，所以他们都蹲在两张席垫大小的门廊的角落里。弘藏走过警察面前，直接上了楼。老友堀江(他是弘藏的学生，又是弘藏最信任的同志，弘藏被捕前不久，曾到弘藏的藏身处看过弘藏)一个人在那里等着弘藏归来。

弘藏先和重子握了手。她簌簌地直淌眼泪。在依次和武雄、都筑、真知子一一握过手之后，又和堀江紧紧握手。

初夏的夜里，他们整整谈了一夜。

弘藏长期以来做着的梦，现在竟在他眼睛面前实现了。不过实际上和所做的梦不一样。

他在监狱里所写的《赘语》，开首就说：“这样那样地想像着即将到来的欢乐日子，也是一件令人快意的事。”他本来以为首先使自己感到高兴的，可能是这类事情：重新裱过、等他回去欣赏的杨守敬所写的王阳明那首七绝“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武雄可能已经按照他的嘱咐，从故乡带来了兰花的盆栽；他托武雄画的水彩静物和托津田青枫画的素描，可能已经挂在墙上了；……。然而，这却只是他在狱中所做的一场梦。固然，在事实上，杨守敬的字已经挂在摆设间

了，兰花的盆栽也已經带来了，青枫和武雄的画也都出色地画好了，然而现在吸引弘藏的心，却首先是人，而不是物。他也沒工夫去打量自己坐着的那間屋子的布置，只管同妻女和堀江其乐融融地談着談着，深怕错过了初夏的夜晚的每一分钟。

天亮之后，他到楼下起坐室里去吃早飯。那頓早飯，新聞記者說它是“重子夫人尽心調制的一頓粗餐”，就只有三样东西：豆腐青菜醬湯、燜黃豆、鸡蛋。

弘藏在獄中所写的《贅語》里，有这样一段話：“凡是坐牢的人，总是每天只想着吃。生活既十分單調，食物也完全缺乏变化，所以与其說是肚子鬧着饥荒，倒不如說是眼睛鬧着极度的饥荒。比任何东西都渴望的，就是变化！与其說是‘想吃’各色各样的东西，还不如說是‘想看’各色各样的食物。正因为这样，所以释放出獄那天到底首先吃什么？——想到这个問題的时候，就好比‘求人’的小广告送进了失业者群一般，不知其数的后补者，爭先恐后地跑来，簡直使你不知挑哪个好。”实际上，当冬去春来、不久即将出獄的时候，他几乎每天(到最后临出獄时，反而不是这样了)把空想集中在食物上，一径想着：回家第一頓，究竟吃牛肉鍋子呢，还是吃生魚片呢，还是吃油炸魚虾呢，还是吃西餐。可是，到了真地出獄之后，第一頓吃的东西却一反預料，清淡得了不得。醬湯，在牢里几乎每天都要一早一晚吃两次。燜黃豆，牢里也不是吃不到。住在病房里的时候，甚至还吃到鸡蛋。他並沒有打算一回家就吃这类东西，那实在是由于听了人家的經驗之談——“出獄后切忌食物驟然改变”，——所以重子才特地避免变化，給他做了这样的“尽心調制的一頓粗餐”。一般說来，这种做法，並沒有能使弘藏的官能得到滿足；但是，靠此他却免了像許多刚出獄的人那样把胃腸搞坏。

食物没有什么变化，可是，碗盞却完全不同了。坐上餐桌，弘藏看到每一件碗盞都既小且美，不觉吃了一惊，感到整个桌面真是五光十色，琳琅满目。一般而论，弘藏家里的碗盞，并没有什么特别漂亮的东西，那天的餐桌，也再朴素没有了；然而弘藏见了，却就像是有了什么意外的发见一般，吃了一惊，心想：原来一般人家的餐桌，竟是如此美丽。关在监狱里三年零九个月，他每天所用的碗盞只有三样：一个饭碗，一个菜碗，和饭碗一样大，还有一个茶盅。三个都是白底子的陶器，上面没有花纹，就像清明祭坟用的一样。那饭碗既大又厚，倒像一个鉢子。在过去的一千三百六十多天之中，一日三餐，弘藏就是把这样三件东西放在洗脸台上，坐在马桶盖上吃饭的。因此，现在看到家里的碗盞，就觉得无论饭碗也好，汤碗也好，碟子之类也好，都小得厉害，就像供在洋囡囡面前的餐具那般。再说，饭碗是白的，汤碗是黑的，茶盅是蓝的。不仅如此，饭碗上还画着青色的兰花；蓝茶盅上还画着三、四朵白菊花；而白碟子的边上，还画着一圈一圈蓝色的细线，中央还有两三条朱红色的丁斑鱼在游动呢。弘藏觉得这仿佛还是生平第一次看到这样绚烂多采的餐桌。

他这时恍然大悟：由于长时期的不正常的生活，他的感觉已经在不知不觉中间发生极大变化了。

顺便提一句，后来每当他出门站在街头，或者去屋子后面附近的田埂上散步的时候，他都有同样的不平常的感觉。

他即使看到贴在街头的一张电影广告，上面红的、黄的、蓝的画了一大堆，他也对它的色彩丰富感到喜欢。走在街上的人，又是多么五光十色呀！有男的，有女的，还有小孩子，每个人都各有各的色彩。

同样一个男人，有的穿着日本服，有的穿着西装，而这些日本

服和西装，又各有各的颜色和样子，没有一个相同。帽子和鞋子也都不一样。头发，有的留得很长，有的留得较短。髭鬚，有的剃得光光的，有的留成各式各样的形状。军人走过去了，学生走过去了。汽车开过去了，脚踏车踏过去了。卖花的拉了一车花不慌不忙地走过去了。卖豆腐的挑了豆腐担，吹着口笛，匆匆忙忙地走过去了。

小孩子多可爱呀。妇女多美丽呀。妇女的化妆和服装，那种五光十色，简直使人眼花缭乱了。

弘藏惊讶着，心想，想不到人世間竟然是这样五光十色而且美丽：监狱里是看不到妇女和孩子的。像他所关的小营刑务所那样的男犯监狱，关在里面，除了来探监的至亲骨肉以外，无论关多少年，也绝对看不到一个妇女。不用说活的妇女，就连画图里的妇女也看不到。不论是送进来的书也罢，买来的书也罢，只要里面有妇女的图画，也不管画的是怎样的妇女，总要把它涂成一片漆黑，这才发给犯人。坐牢坐得年代久了、待遇等级升高了的一部分犯人，一到每月两次的休假日，可以聚在一个屋子里看三十分钟的旧报纸；可是那些报纸上所印的妇女，不用说社会版里的照相，就连小说里的插图以及广告栏里的图画，只要是一个妇女，就不管是美是丑，是老是少，一律涂掉。所以，无论坐多少年牢，除了十几个打扫监狱外部的清洁夫和几个在农场干活的犯人以外，就连图画里的妇女都不能看到。日常所见到的，全都是和自己一样的犯人：头发推得短短的，髭鬚剃得光光的，身上穿着一样子的囚衣。除了极少数几个完成了作业定额的老资格之外，其余的人，一律穿着赭红色或者浅葱色的衣裳，那样子简直再难看也没有。自然，除了一般犯人以外，还有一些狱吏；可是，这些人大半都是穿着同样制服的看守。每一个人的服装，几乎是千篇一律的。

小菅刑务所的主要建筑物，都是灰色的。四周的水泥高墙，也是灰色的。牢房内部，无论墙壁或顶棚，也全是灰色。到了冬天，从窗子里看出去，甚至天空也都是灰色的。昼夜独居囚禁的人，每天所接触的几乎全都是灰色。当弘藏独居囚禁的时候，外面曾第一次给送进一本《真宗圣典》；当时他觉得那本书的装帧实在漂亮已极，许久许久还不能忘怀。其实那本书的装帧，只不过是大红布面泥金边而已；尽管这样，当时已经觉得美得了不起了。

刑务所那种地方，一切都缺少变化，特别缺少色彩上的变化。

弘藏回家后，去他家后面附近的田埂上散步时，看到那里的优美风景，一时不禁入了迷，顿时使他想起佛经《无量寿经》里所描绘的极乐世界来。事实上，他也感到已经来到极乐世界了。初夏的早晨的天空，晴朗得又是多么美丽呀。这里也属于武藏野的一角，地势平坦，一望无际。因为是最近才开辟的郊区，所以大部分还都是庄稼地。远远地看去，只见这里一个那里一个的红屋顶、蓝屋顶、黑屋顶和茅屋顶。近处有一所白墙洋房，也不知是谁家的第宅，占地相当大，它的背景是一大片高大的朴树，树梢透露在半空里，另外还有松树、杉树以及竹林之类。万绿丛中点缀着雪白的墙壁，又是多美丽呀。这幅景致使弘藏看得目眩神迷，仿佛刚开眼的瞎子第一次接触到外界一般。

弘藏在理性上也知道，监狱之中和监狱之外是两个世界。他当然预料到监狱之外，别有天地。可是，自己的感觉竟然起了这样大的变化，这却完全出于他意料之外。

当然，一个人无论坐牢坐得多久，也决不至于忘掉社会上是有妇女的，也决不至于忘掉碗盏上是有形形色色的花纹的。然而，当他从监狱里放出来、初次接触到有妇女的社会的时候，初次坐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画有花纹的碗盏的餐桌的时候，他却会感到全然出

乎意料之外的美。尽管一切是他所預料的，但是由于他并没有自觉到自己的感觉起了变化，所以尽管是早就預料的世界，也会使他在哪里发现一个未曾預料的世界，而感到惊异。

弘藏一个晚上只顾着谈话，当他初坐到早飯桌子前面的时候，发觉这样的感觉上的变化，而吃了一惊。

学究生活的告終

吃过早飯，堀江就走了。堀江前脚刚走，后脚就来了熟人鈴木安藏。弘藏曾經一度和他交情頗深，可是这个时候已經不大尊重他了。所以，在这样的时候要和他长久对坐下去，就不大願意。而且由于通宵未睡，人也相当困倦了。可是，来客却死纏着弘藏，輕易不走。

不久，和新聞記者約定的会面時間——上午十点钟到了。十几輛汽車，在門外空地里已經等候好半天了。

弘藏坐在樓上的一間屋子里，說道：“就在这儿接見吧。”他还說：“用不着那样害怕新聞記者。任凭他們怎样問，我也不会讲什么碍事的話。”

但是，重子不同意。她从自身所經歷的多次經驗出发，认为弘藏在这种情况下，一句話都不宜讲。她坚决主张：

“见了面，只要一开口，就完蛋了，他們会把你没有讲过的話，也写上一大堆；事后任凭你怎样否认，也都来不及了。这个时候，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不见他們。可不能让新聞記者上樓。今天只能把备忘录交給他們，您一句話都不能說。只把这个备忘录交給他們，就說一切要說的話，都写在上面了。照相沒法避免，您就下樓去讓他們照好了。”

弘藏认为她的話不錯，就走下了樓。

大批新聞記者都擠在狹小的門廊里，重子和都筑一面把早已抄写了好多份的弘藏那个备忘录分发給他們，一面和他們不斷地爭論。

“今天當事人非常疲倦，我們懇請諸位千万不要再去問他什么了。”

弘藏一边听着重子那种和平日不同的兴奋話声，一边走下起坐室前面的一丈多见方的院子里。各报館的攝影人員一齐挤到这个放着晾衣裳竹竿的狹小的院子里，几乎弄得身子都沒法轉动。弘藏听凭攝影人員摆布，手里拿着报纸，坐在一张日晒雨淋、半已腐朽的竹椅子里，給一次又一次地照相。新聞記者們也許是看到弘藏当时那副光景，不忍再同他糾纏，或者是重子的拚命阻拦起了作用，他們自始至終沒有对弘藏詢問什么。

当时的情景，《东京朝日新聞》是这样描写的：“和記者团約好集体见面的正十点钟，老博士輕輕地打开面对着小院子的楼下屋檐前的玻璃拉窗，相隔四年来第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他只向大家說了一声‘劳駕諸位！’往常那个高身材上穿着斜紋嗶嘰的单衫和罗紗外褂、站立在院子里的他那副容貌，憔悴不堪，头上的白头发也多了許多。他听凭攝影人員摆布，有时默默地坐着，有时站起来走几步，只管紧閉双唇，不回答一句問話，那副样子，令人想起他当年的斗志。这样大約經過了十分钟，无言的会见結束以后，博士让自己的弟弟武雄扶着，上楼去了。接下去就由重子夫人出来应付場面。她对于記者所提出的問題，也始終只是回答說：‘一切都写在备忘录里了，此外沒有什么可說的。’尽管祝賀的电报一个一个地送来，屋子里却靜悄悄的，不像有人刚从監獄释放出来的人家。据說因为怕生活上变化过驟，所以飲食方面也尽量采取俭朴的方

針。‘我們當家的並沒有什麼特別愛吃的東西，我也沒有做什麼準備。全家都很累了，今天的接見就到此為止，請原諒。’重子夫人說完這幾句話，就閉上了拉門。”

這天交給記者團的備忘錄，前面已經交代過，是弘藏2月初在監獄里早就寫好的，後來和重子他們商量過，又多少修改了一下，大致在四個月以前就已經準備好了。弘藏在監獄里的時候，預先用白紙仔細地把它抄了好幾張，帶了出來。出獄那天晚上，送給堀江一張，作為紀念。它的全文是這樣的：

“趁這次出獄的機會，我將結束我作為馬克思主義學者的生涯。這篇文章，就是它的挽歌，它的墓志銘。

“過去我作為一個學術研究工作，抱著為研究了三十年才好不容易獲得的學術上的信心而殉身的宗旨，向難於勝任的事業不斷地作了一些努力。可是，我力量微薄，現在已經將近暮年，再也沒有氣力在荊棘中前進了。我只好認為我已經完成了一個學術研究工作應盡的義務，不再作他想，從此徹底退隱，只和極少幾個老朋友以及至親骨肉相往來，聽任這刑餘衰老的瘦弱之軀自然老死。我這個退出戰場的老邁殘兵，現在只希望躲在社會的某個角落裡，非常安靜地生活著，而不致妨礙人類的進步。——有短歌三首，現在一併錄出，供大家一笑。

“經過這番死裡逃生的旅行和顛沛流離，哪里想得到還能活着回家呀！”

“為了讓長腿的我坐得舒適些，愛妻給準備下的這個坐墊喲！”

“唱出‘像澗水那樣無心而出山’的那位詩人的一身，多麼叫人眷念呀！”

直到弘藏結束了和記者團的無言的會見、回到樓上之後，鈴木還是不想走。弘藏因為不想和對方深談，所以盡揀些無關緊要的話，有一句沒一句地敷衍著，來消磨時間。直到吃午飯的時候，鈴

木才走了。过了几天，他就把当时会面的情况写成一篇洋洋洒洒的文章，发表在某杂志上。过了两个星期，他又来了；关于那次会面的情况，他又在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本来，在出狱后的一个时期内，新闻记者固执地来求见，弘藏总是拒绝了，却不料被熟识的铃木来访两次，终于让他给杂志社弄去了新闻记者所没有弄到的材料。——看到铃木的文章的时候，弘藏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心里很不痛快。铃木所写的文章里，不用说，胡乱猜测的地方自然很多。

报上发表了那个备忘录以后，弘藏收到许多来信。有不少封是不认识的人写来的。照说，在这种情况下，里面总会夹杂有几封反动家伙写来的冷嘲热讽的信；可是，这种东西这次却只有一张明信片。

内中有的人不把信直接寄给弘藏，却寄给了都筑。比方说，下面这封信，就是这样。

“……祝贺本田先生的出狱。对于先生的态度，我们表示由衷的敬意。据说先生在那个出狱声明书里，自称什么败兵，可是我们认为先生结果还是胜利了。先生那个声明书，在一般没有心肝的人看来，可能显得十分怯弱和悲伤，但是，我们这些和先生一同搞过困难的运动、一同经历了艰苦的狱中生活、亲身尝到了种种滋味的人，却深深体会到先生所说的那些话，似弱却‘强’。先生终于胜利了。我们同时还准备竭尽全力，帮助先生，使先生能太太平平地度过晚年。……”

“还有，我们相信一定有那样的一天，先生的‘志向’能克服世上的任何困难，最后得到贯彻。我们深信：先生的余生，不仅会是太太平平，而且会是心安理得，能在平安无事之中，作为一个尽了一切努力的社会人，坐看贯穿于他的社会生活中的那个‘精神’的

正确性日益得到普遍的证实。

“即使为了这一层，我们也觉得先生周围的各位，有必要特别注意来先生书斋里访问的客人的品质。我们相信：如果能获得几个益友，那末先生将不仅会有平安，而且会有希望。

“我们也向尊夫人表示敬意。……”

弘藏猜不出上面这封信是谁写的。可是，当他看到这封信的时候，知己之感，却不禁使他掉泪。实在，这封信和那装成本田弘藏的一个学生模样的铃木安藏在杂志上发表的一些文章，简直有天渊之别。

弘藏所接到的信里，还有笔迹幼稚、似乎是年轻人写的。比方说，宫城县长町地方的人写来的一封信，就是这样。信上说：

“本田先生：我是东北农村里的一个青年。今天早晨在报纸上重新看到先生的健康的容颜，不胜感慨，所以不揣冒昧，写这封信来安慰安慰您的心。我们和先生无一面之识。我们开始学习那富于希望的学问以来，经常把先生当作老师，而且先生也始终给了我们大力的指导。五年前先生突然不知去向的时候，我们是多么惊惶，多么悲痛呀。

“本田先生：现在的社会压得我们气都透不过来。（按：原信这里有空白。）我们抱有最大的决心，决不使先生吃的那番千辛万苦，成为白费。谁敢说先生在青年心里所点燃起来的人类解放以及真理的炬火，不会重新成为烧遍世界的巨大火焰呢？

“本田先生：我们每天都扳着手指等着先生出狱。今天，我终于重新看到了先生的令人想念的容颜。您一定累了吧！看到世界一下子变成这个样子，您一定大吃一惊吧。

“可是，先生，请您相信吧：无论在日本的哪个角落里，都有继承先生生命的许多灵魂，在为‘人类的进步’不屈不挠地继续努力

着。务望好好保重身体！”

弘藏看到他的备忘录里的“人类的进步”这句话被东北农村里的一个青年所正确理解，觉得非常愉快。他想像着全日本任何一个角落里，和他抱着同样志向的许多青年人，都日日夜夜地在为人类的进步不屈不挠地继续奋斗；而非常愉快。

弘藏出狱后，身体比以前健康得多。他的老毛病胃痛，也消失得不知去向了。他的饭量几乎和年轻小伙子差不多了。可能是“作为一个社会人尽了一切努力”的内心满足，使他的肉体变得这样健康的吧。

出狱后的第九个月，他的老朋友长谷部文雄从京都来看他，弘藏和他一谈到夜里十一点钟，精神还很好。长谷部回到京都后给他来信说：“已经有六、七年不见您了，您反而比以前精神得多，真令人高兴之至。您的皮肤虽则黑了一些，可是一点都不觉得衰老，实在意想不到。”

铃木安藏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里，随处都是什么“以软弱无力的心情唱出哀歌”啦、什么“上了岁数，再加经历了几年来的狱中生活，身心都衰弱了”啦；什么“未能豁出性命从事自己所信奉的事业的那种空虚感和寂寞感”啦、什么“今后只好听任身心自然衰竭”啦、什么“生活的目标到底在哪里”啦一类的话，其实弘藏的身心并没有变得像他所说的那样软弱无力。

不用说，他出狱以后，没有在报纸上写过一行文章。不过，这并非由于他失去了写文章的气力。说实话，这时他对写文章并没有完全死心。出狱后有一个时期，他经常在暗地里察看风色，心想：论文虽则不能写了，可是无论采取随笔的形式也好，回顾录的形式也好，不管采取什么形式，哪怕间接而又间接，只要有可能为

馬克思主义貢獻自己的力量，就不妨巧妙地利用机会，大大地搞它一番。

哪里知道不久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反动的法西斯主义的气焰驟然高张。像山川均、大森义太郎、向坂逸郎、猪俣津南雄那一伙多年来妨碍日本共产党发展的似是而非的馬克思主义者，都被捕了。唯一的合法政党——日本无产党以及唯一的合法工会組織——总評議会，它們的大大小的的干部也被一网打尽了。最后，連大内兵卫之类的、国立私立大学中那些最最小心謹慎、似乎从来不敢越出安全地带一步的教授、副教授和讲师們，也都被捕了。平常嘴巴里多少掉弄几句馬克思主义的革命辞句的一切社会民主主义者，也一个不剩地关进牢里了。这样的局面，真所謂是狡兔死、走狗烹了。

日本資本主义从内部崩潰的各种因素，已經达到烂熟的程度，危机迫切到連一听到社会主义这几个字眼都不得不胆战心惊了。除了积极歌頌帝国主义軍部的御用思想的东西而外，即使是单纯的事实报道，也会受到极度的压迫。馬克思主义者不用說，連站在进步立場上的自由主义者，都被禁止在杂志上发表文章了。

在这种局面之下，弘藏势必至于什么文章都不能写了。

因此，他出獄时发表的那篇东西，就变得再合适也沒有的东西。想不到竟像是他豫先看到这种时局的急轉直下，下了一着主动棋，就好比在舞台轉暗之前，不等鑼鼓停止，就踏着台步，退到門帘里去了。那时他有这样一段自己表白的話：

“时局越来越黑暗，可是我内心却从来也沒有失去光明。我一方面感到心安理得，因为我已經尽了我所能尽的一切努力；而另一方面呢，心里充滿着希望，相信：如果我幸而也能像祖母和父亲、母亲那样长寿，那末我一定能赶上那令人欢欣鼓舞的一天，亲眼看到

我所热爱的这个日本的国土上照耀着社会主义的光輝。我这个人——人家也許还会把我看成一个失意的人——的身上，现在既充滿着平安，也洋溢着希望。老妻也頗能安守清貧，懂得撫弄孙儿、打发日子的乐趣。看来我毕竟是个幸福的人。”

过了年，到1938年1月底，他把用了大約四十年的书斋里那张大矮桌，搬到楼下起坐室里，降格充作餐桌之用。那是因为又是会客室又是寢室的他那間书斋，地方太小；再則，现在他的工作，用不着在桌子上摆滿又大又重的外文书了。这是他一生中的大轉变的一个象征，他暗暗地感慨无穷。他临时把一张粗糙的桌子的脚截去，当作讀書的桌子。过了不久，重子給他买来了一张櫻木做的精巧的矮桌子，他也就高高兴兴地把残生的笔硯交托給它了。正好在那个时候，他开始研究平仄，学着做汉詩。下面这一首，就是他当时的作品：

守节游世外，
甘貧不卖文。
仰天无所愧，
白眼对青云。

过了一年，到1939年1月，他又写了下面这样一首詩。那年他的年紀已經滿六十了。

已达萃年白首翁，
枕閑书睡願有終。
羸鴛不与兵戈事，
心似山僧万籟空。

头一年里的獄中通信

严格单独看管时期身心方面辯証的变化

弘藏整天被关在单身牢房里，無論在他的肉体方面或思想方面，都可以发现“由于同一件事的不断反复而造成的辯証变化”。现在从他写給亲属的獄中通信里，挑选多少有些意思的部分，按发信年月日的先后抄录如下。

1933年10月28日的信

“10月20日，正是我生日，那一天，我从市谷刑务所被移送到这小菅刑务所。上訴是9月15日撤回的，因此，判决确定之后，算是在市谷刑务所关了一个多月。我是抱着长途旅行前在起点站等候開車的那种心情，度过这一个多月的。因为是生平第一次受刑，当时感到有无穷无尽的話要向你稟告，可是到了今天，却像是做了一场梦。

“被移送到小菅刑务所那天，是个风雨交加的冷天，冻得我直打顫；可是，以后几乎每天都是晴天，不感到怎么冷。尽管光着脚在地板上走，都还不觉得怎么凉。本来在未决时期，9月末就早想穿袜子了；人对环境的适应能力真是惊人呢！飲食方面，本来一日三餐，頓頓都吃得精光；可是，看来我的腸胃消化不了那么多，所以，现在每頓飯都要剩下一些。这儿菜給得很多，我吃得似乎有些逾量。夜里也睡得很好。总之，一切都很正常，千万請不要挂念。……渴望着真知子平安地回到母亲身边，并且能有一天来看我。”

1933年11月19日的信

“今天因为碰到第三个礼拜天，不搞作业。正好又是本月份准許寄信的日子，所以现在抱着莫大的乐趣，准备定下心来，用監獄里給的一张信紙給您写封长信。今天天上虽然阴云密布，可是并不怎么冷。我半开着窗子，让室外空气透进来，坐在窗下写这封信。

“我被移送到这儿，到今天整整一个月了。要是从下獄的一天算起，就已經两个多月了。这意味着刑期已經度过三十分之一，五年徒刑已經剩下四年零十个月不到了。我觉得，撤回上訴，这件事是做对了。不論怎样，刑期一天一天减少下去，心里总有了个着落。当撤回上訴时，我心里十分惴惴不安，就仿佛把好不容易抓住不让自己掉进无底深淵的最后一根绳子撒开了手一样；可是如果永远抓住这根绳子不放，那倒反麻烦了。

“我的健康情况非常良好。刚下獄时，在市谷刑务所里，眼看体重一天天减少，担忧得很。可是移送到这儿不久，就不再减瘦，现在倒觉得胖一些了。这儿沒有机会照鏡子，但用手摸得出来。清早一起来就用冷水擦身，吃完早飯开始作业不久，就被放出去做运动。……晚間就寝之前，有片刻的休息（按：因为沒有钟，也不了解作息時間表是怎样，所以他觉得这段休息時間非常短暫），但整理一下屋子，擦擦身体，再作一番西式健身操，余下的讀書時間就只剩两三分钟了。按规定，到就寝時間就必须馬上睡觉；而睡觉对我來說是一种享受。我睡得很香。不久以前重子来訪的那天，尽管是在意料不到的时候、难于設想的地点同她见了面，可是到了夜里，还是几乎头刚一着枕，就睡着了，除了起来小便之外（按：因为天冷，他夜里要起来小便四、五次，却也并不觉得怎样苦。直到后来，才向老犯人打听了种种办法，使得夜晚能睡得暖暖和和，起来

小便的次数也不那么频繁),一直保持着仰臥姿势熟睡到第二天早晨。每天夜里多半是这样;从来没有失眠过。这可能是因为不用脑子的关系吧。作业虽然主要是靠手指头进行,但眼睛片刻也不能离开作业对象,所以在作业过程中没有闲空想到别的事。因此,天天几乎都是毫无所思地度过去的。在市谷刑务所时,有时还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哀怨从我心头掠过:到这儿之后,却从来不曾有过这种事。其原因之一,可能是作业使我心无二用吧。

“立冬那天(从喜志子寄来的画片明信片上知道那天是立冬),发给了棉衣。可是因为工作服是短衣,下身又只穿一条单裤,所以膝盖以下冷得很,冷天甚至冻得直哆嗦;不过只要天气好,靠着阳光的照射,就不觉得冷了。去年秋天到初冬,老是下雨,今年却晴天多,真是好运气。在市谷刑务所时,一切还是自由的,我早已穿上衬裤了。虽然明知养成坏习惯不好,但当时因为冷得受不住,还是穿了。(人适应环境的能力真是了不得),现在已经 11 月,还毫不在乎地光着脚在地板上走,从不觉得凉。说来也怪,夜里也不感到脚冷了。总之,我现在并不觉得怎么困苦,请放心吧!

“最初,狱衣的赭红颜色老是刺戟神经,使人觉得不舒服,可是很快也就几乎完全习惯了。饮食方面也完全习惯起来了。胃口很好,晚上睡在床上,甚至觉得肚子饿(按:四点钟吃晚饭,九点钟就寝,肚子当然要饿了)。可是还吃不完规定的分量,所以现在领的饭还是比一般人要少。酱汤里几乎每天放有蔬菜,这是非常可喜的。午饭的菜里常有青鱼。味道极其鲜美,甚至可以說在青花鱼之上。

“在市谷刑务所时,白天黑夜都是一身衣服;可是这儿工作服只有白天穿,夜晚睡觉时要换上长衣。像今天这种非工作日,白天也穿着长衣,所以腿部很暖和。衬衣因为洗换很勤,穿起来觉得很

舒服。总之，只要能战胜寒冷，健康方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我的生活情况大致如此。从感觉上来说，这和出国坐在船上时最相近。既不看报，也不学习，这样过了一天又一天，每天只是渴望着结束漫长的航海生活的日子早些到来。完全是那样一种心情。在丰多摩刑务所生病的时期，脉搏总是跳动太快，现在也平静了。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心境的平静。现在我已进入了风平浪静的航程。

“对我这种瘦弱的人来说，本来总以为下狱就意味着生病和死亡；岂知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只要不害意外不幸的大病，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平安地坐满刑期，重新受到亲属们的温暖的照料；因而天天只是盼望岁月快点流过去。

“据说华严宗六祖——中国的清凉大师，自己立下十条誓愿，寿长的一生中始终信守不渝。十条誓愿中有一条是‘一生昼夜不卧’（意即一辈子不躺下睡觉）。和这比较起来，我现在的倒在床上贪求安眠的生活，倒该说是过于享福了。不过，我暗中也在勉励自己一定要度过不亏对古人的一生。这一点，也请放心吧。我会在注意身体的同时，加强意志的锻炼的。……”

弘藏从星期天的上午直到下午，在发给的那张信纸上，小心谨慎地使唤着那支借来的笔尖缺损的玻璃笔，用六号铅字大小的小字，写了一封长信。他生平最怕出外旅行或是访问人家，但动笔杆却从小就喜欢。他很久没有写这么长的信了，所以今天写了一封，反而觉得是一次很好的休息。

正像他信里谈的那样，下狱之后，他的健康状况出乎意外地良好。这在他的亲友看来也实在是件出乎意外的事。

当初，不但亲友们都认为如果弘藏下狱，说不定今世再也见不到他了；就连他自己，在受审前后，也多少有过这样的不安。

他还朦朧地記得他曾經讀过的森鷗外的《大盐平八郎》里，有这样两段話：“重罪犯三十一人里，在行刑时还活着的，一共只有四人，即杉山、上田、大西、白井彦右卫門。其余二十七人全已死亡，其中大盐平八郎、渡边、瀬田、近藤、深尾、宫胁等六人自杀，小泉被人杀害，格之助可能也是被人杀害，西村未遭逮捕而病死，余下十八个人死在牢里。9月18日那天，在鳶田把尸首处以磔刑后梟首示众。只有在江戸做了討飯和尚而去世的西村，因为埋在浅草遍照院的尸首已經腐烂，仅仅把坟墓毁掉了事。

“当时的罪犯們被关进监牢，不出一年必定死在牢里，死去之后，才宣判执行，結果就把那用盐腌过的尸体悬在磔柱上。不光是平八郎及其同党是这样，就是平八郎自己以前审理的天主教事件中的罪犯，所遭到的也是同样的命运。”

在弘藏的心目中，今天的刑务所只不过是从前那种监牢的繼續。正由于有着这种看法，所以一想到这就要下獄，他就变得非常忧郁。可是，下獄后还不过两个月，到11月中旬，他已能适应監獄生活，并且觉得照此情形下去，是可以坚持到底的。

这种想法在他的信里一次比一次明显地流露出来。

1933年12月9日的信

“现在正是下午十分钟工休時間（按：休息時間本来是十五分钟，但一天到晚关在单身牢房的弘藏，既沒有同別人說話的机会，也无法去看钟，所以就主观地断定是十分钟休息）。明天虽然是礼拜天，却不是停工日，不能像上次那样从容地写信，所以利用现在的休息時間，匆匆忙忙地給你写这封信。……

“我仍旧在做拆版工作。有时搞外文的；外文的鉛字小，很累眼睛。不过近来也漸漸做慣，完成的盒数也增加了。連日天气較好，所以摆弄鉛字也不觉得怎么冷。因为做的总是和文字有些关

系的工作，所以觉得比糊气球什么的要有意思。

“自从上次给你信以后，没有多大变化。若说变化，就是吃饭比过去香了。麦饭逐渐觉得好吃起来，每次不到开饭时间，肚子就觉得饿了；而且肠胃的消化能力也不错，所以从本月初期，已经开始领取足量的饭食，吃得和别人一样多了。近几年来，从来没有像最近这样每顿饭都吃得香的。连那没有粘性的麦饭吃着也觉得好吃，真是奇怪之极。记得今年2月刚进丰多摩刑务所时，每天三顿饭总是吃外面送来的盒子饭，有一次，看守怀着一片好心，端来一碗煮面条说：‘今天吃的是面条，趁热吃一碗吧！’都是晒干了的面条和着猪油和大葱煮的，粘糊糊的，有一股怪气味，因此尽管是人家好意送来的东西，却怎样也吃不下去，可是就此倒掉又对不起人家，于是只好闭着眼吞下去，剩下的偷偷地用纸包好，丢进泔水桶，真是煞费心机；可是，现在无论什么菜都觉得好吃了。人类生存能力之强，真叫人吃惊哩！来信问能不能吃到甜点心；提这问题，未免把事情看得太便当了。明治节那天发了红白豆馅年糕；如果这也算是点心的话，那末我是吃到了点心的。直到今天为止，只有那一次。恐怕只有在三大节日里，才能吃到这种带馅的东西吧！不过我现在一日三餐都吃得挺香，从来不想吃点心什么的。这和不想吸烟完全一样。当然，这所谓不想，或许是出于无可奈何吧。（以下节略了大约全信的一半。）

“吃晚饭时偷空写这封信，没写完，现在利用就寝前的休息时间，填补着最后的空白。……

“现在，空白已经没有了。今年的通信就到此为止。……再过四、五天，就是下狱后整三个月了。这就是说，刑期将要度过二分之一了。虽然前面的路程还很远，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也觉得很快。不久严冬就要到来了。但是冬天既然到来，春天也就不远

了；这在各种意义上都可以这样说。暂时写到这里。明年再见！”

那天弘藏借来的玻璃钢笔的笔尖似乎缺损得很厉害，所以这封信的字迹显得非常滞滯。

1934年——从冬天到春天

弘藏从12月月底到年初精心写成的信，每格写了三、四行小字，结果不许寄发。因此在1934年1月10日另外写了一封，信里这样说：

“……谨悉新年大家过得很愉快，我十分高兴。我的身体仍然很好，而且以极其平静的心情迎接了新的一年，并没有产生感慨无旁之类的异常情绪，请放心好了。这里要专门同母亲谈几句。12月26日的信，我已恭读了。请母亲就像信里所说的那样，健康地等待着出狱吧！过去我一直在繁忙中过日子，往往连从容探望母亲的工夫都没有。这一次如果能出去，我一定要改变方针，来个悠闲度日，那时或许多少可以稍尽孝顺之心。是哪一年的事，我不记得了，反正是寒假回家、不久就要回京都的时候，同母亲一起陪祖母到宫岛去玩了一趟。那时虽然是冬天，却是少有的小阳春天气。在一家饭馆吃罢午饭，从从容容地玩了一些时候，就在宫岛车站分手。我还记得当时我曾买了茶送到车厢里。现在我透过这儿的窗户放眼望去，脑海里浮现出故乡的天空，真想下次和重子陪母亲再去宫岛玩一趟。虽然离出狱的日子还很远，但千万请母亲健康地等待着。

“去年12月上旬，在这里见到重子、喜志子和真知子三人；正像大家所想像的那样，我非常高兴。可是接见的時間一眨眼就过

去了，真不舍得分手。想像着能同喜志子和真知子久別重逢，我在上一封信里把它說成是聚散无常的人世間的一場十分美好的夢。可惜這場夢实在太短促，就好比小孩子盼过节，好容易盼到，节日很快就过去了。当时我就是这样想的。

“上一封信里已經說过，我的胃口很好。广村的姐姐（按：广村是村名，姐姐是指重子的胞姐，弘藏的大姨）曾写信来叫我不問吃得下吃不下，尽量多吃飯。其实，近来我的食欲旺盛到甚至掉下的飯粒都要拾起来吃；不論吃什么菜，都吃得干干净净，像猫舔过的一样。只是手背皴得很厉害，每一条皴紋全变成裂口，往外流血，手巾全給染紅了。不过近来一連休息了几天，裂口就結了硬壳，不久硬壳也脫落了，现在整个手背开始柔潤起来，但恐怕以后还要皴的。今后我准备好好注意，况且冻疮之类也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病。晚上往往觉得冷，有时要冻醒好几次；但起来小便之后，馬上就能睡着，所以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苦恼。往后天气会愈来愈冷，可是我一定会战胜寒冷，請不要挂念。……”

这封信是在得到許可买来新玻璃鋼笔之后写的，所以字体写得工整漂亮。

1934年2月18日的信

严冬終於过去了。弘藏平安地度过了大家担心、自己也害怕的第一个冬天，感到非常高兴，他在信里这样写道：

“……我照样很健康。靠着一床薄褥子和一床硬被，終於熬过了一冬，既沒有生冻疮烂手，也沒有得过獄中广泛流行的感冒。虽然到了1月下旬；仍旧觉得冷，为此还曾写过一首歌：

‘看到天空里摇曳的星光，夜半牢房里的严寒多厉害呀！’

可是，从紀元节前后，天气就暖和起来了。呆在这种地方，本来对

于季节的变化特别敏感(尽管这样,喜志子来信总是告诉我立冬、大寒、立春等节气,这给了我许多方便),可是现在大冷天已经过去,比严冬时期好过多了。没有吃多大苦头,就度过了冬天,真是幸运。尽管如此,我仍然惊奇生命力的不可思议。以前住在西大久保的时候,买了几盆花,入秋后把它们一起堆放在院子角落里,结果压在最底下的那个盆里的球根,第二年春天发了芽,嫩芽终于从压在上边的花盆底部的漏水孔里钻到最上层的花盆外边来了。当时看到这种现象,我曾感到生命这样东西真是不可思议;而现在,竟在自己身上体会到了。近几年来,本来一到夜晚,膝盖往下就冷得不行;可是最近,夜晚睡下后,两脚暖和得就跟刚用热水烫过的一样。原以为会出脚汗,把袜子弄湿(按:他平常脚底老爱出汗,一天工夫就把袜底弄湿了),岂知袜子始终很干,一次也没洗过(按:这可能是两脚过分受凉所致;究竟如何,要问生理学家才能知道。说不定和伙食不好也有关系)。另外,身上受点轻伤,很快就长好了。所有这些情况,说明我的生理状况发生了变化,而且是向好的方面发生了变化。吃饭越来越香了。去年正是在这个时候闹了病,今年春天我想多半能够平安度过。请放心吧!(后半部分略去)”

1934年3月18日的信

弘藏的作业,已由拆版工作改为翻译外文书,那时他在信里这样写道:

“……我的身体仍旧很好。但是因为工作变更了,在两星期中,人就瘦了一段,连自己也感觉出来了。看来还是用脑比用手脚更耗费精力。除此之外,毫无变化。严寒时期,本来只好用自己的身体来保护自己的身体,因此不得不鸞鸞扭扭地跪坐在凳子(按:这里所说的凳子,是指马桶)上,弯身面向着桌子(按:这里只说是

桌子,其实是洗脸台);可是前几天下了一场大雪以后,天气就暖多了,随便坐着伸开两腿,也不觉得冷了。我很高兴,因为今后半年里也许可以过得舒服点了。可是现在还没有最后同冬天告别,一想到半年以后冬天又将到来,就不寒而慄。

“我本来就是個饕鬼,最近更是光想着吃。非常想吃甜的和油腻的东西(按:12月9日的信里,曾說从来不想吃点心什么的,其实应该说非常想吃,才是心里話)。請你做一个牌位,写上‘古今洞閉戶閑居居士’几个字,經常供些包子和鰻魚吧!一笑。……上封信里說脚已不出汗,袜子总是干的;岂知天暖以后,袜底仍然是湿滋滋的。看来不是生理发生了变化,而是前一时期天气太冷,冻得連脚汗也不出了。……”

“大概是见不到一点新鲜事物的緣故吧,經常梦见已故的人。不仅梦见过祖母和父亲,还三次梦见过洋一(已故的长子)。有一次还做过这样的梦,洋一說:‘不管到哪儿,都带着我去吧!’我高兴地回答他說:‘噢,好的好的!’可是到最近,这类梦不做,却做包子啦、毬糕(按:这是家乡岩国的点心)啦、羊羹啦之类的梦了。多滑稽呀!……”

1934年——从夏天到秋天

3月份的信里,弘藏說每天尽想吃的,可是到了初夏,他就不再說想吃的,而說想看綠叶了。这也許可以証明随着天气变热,他的消化机能逐渐衰退了。

1934年6月20日的信

“不知不觉冬天过去了,春天也过去了,夏天到来了。我照样平安无事,安安静静地过着日子,請您放心!……”

“从前在獄外的時候，非但每天可以有時喝杯茶，有時吃些點心，無形之中使飲食量適應氣候的變化，而且可以隨心所欲地不斷增減衣服（過去人家常常笑我，一天不知道更換多少次衣服），這裡卻沒有這種條件，所以季節的變化就表現在食欲上，而且像用寒暑表測量的一般，準確非凡。天冷的时候，老想吃的——津津有味地想着：這次出獄後，首先吃什麼好呢？包子？鰻魚？生魚片？豆沙糰子？牛肉？西餐？可是近來却非常想看綠葉，比想看紅花還厲害。因為從我整天坐在裡面的牢房向外望去，連個樹葉的影兒也看不到。

“武雄有一次來信告訴我說，他從家鄉向山的松樹下面拔了些素心蘭，拿回家裡，這件事情真使我神往。一想到素心蘭的秀麗的姿容，就彷彿牢房裡飄有一縷清香。這種蘭花，咱家前面院子裡也栽著，那是早先昶弟（按：指弘藏的二弟）從山上移植來的。我大概由於心臟衰弱，從小就欠活潑，爬山弄土這類事情，一概不來。……”

1934年9月5日的信

不久交了秋天；弘藏寫了這樣一封信。

“……終於是秋天了。眼前所見到的東西，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發生任何變化，連壁上的污點都總是原來的老樣子。可是四季的變化，卻能從外面不斷傳來的蟲聲分辨出來。本來，鋼骨水泥的三層樓的鐵窗下，連一根帶露的草都沒有，却有秋蟲唧唧地叫着，彷彿在通知人們‘秋天已到，冬天就要來啦！’這些秋蟲，也許是受到電燈光的吸引，從荒川堤上飛來的吧。30日那天下了一場雨，有點涼意了，甚至晚上已經感到腳冷。冬天很快就要到了。不過到那時，一天三頓飯都會吃得香噴噴的了。……”

“最近懷著極大的興趣閱讀著獄外送來的白樂天詩集。詠新

竹的詩里，有‘筠翠如可餐，粉霜不忍觸’^①等名句。意思是‘青青的竹子嫩得像可吃的笋一般；上面帶着一層宮粉似的粉粒，簡直叫人不忍用手去觸摸’。僅僅十個字，就描繪出了一幅出色無比的圖畫。竹和笋的繪畫，我過去不知看到了多少，卻從來沒有像看到這十個字的時候，產生這麼栩栩欲活的嫩竹的鮮明感覺。（按：其實這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名句，看來只是因為他是在監牢里第一次讀到這種句子，所以心情特別舒暢。）我能欣賞漢詩，真是幸福。過去由於有一種責任感驅使我，始終兢兢業業地對待自己所專攻的學術，所以連好好欣賞一首詩的工夫都沒有。

“下邊的詩也是白樂天的：

‘丈夫一生有二志，
兼濟獨善難得并。
不能救療生民病，
即須先濯塵土纓。
況吾頭白眼已暗，
終日戚促何所成。
不如展眉開口笑，
龍門醉臥香山行。’^②

“這幾句詩，彷彿遠在千年以前就替今天的我唱出來的一樣，真叫我百讀不厭。對於這位曾吟詠過‘懷哉紫芝叟，千載心相依’^③的詩人，我能在千載之後、萬里之外在這裡懷念他，可算得是獄中最幸福的人了。……”

① 見白居易詩《題小橋前新竹招客》。——譯者

② 見白居易詩《秋日與張賓客舒著作同游龍門醉中狂歌》。——譯者

③ 見白居易詩《授太子賓客歸洛》。——譯者

1934年9月19日的信

弘藏下獄后过了一年，从1934年9月开始，每月可以寄两次信了。在他下獄第二年的1月，頒布了有关犯人待遇的法令。根据这个法令，犯人被划分为四个等級(从第四級到第一級)，等級升得越高，待遇就越好。例如衣服，第四級发的是赭色的旧衣服。第三級发的虽則同样是赭色的，却是新的。第二級发的是浅葱色的旧衣服，而第一級則发給浅葱色的新衣服。接见和寄信也是这样。第四級每月一次，第三級每月两次，第二級每星期一次，第一級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不过如果是触犯治安維持法而又沒有轉变方向的切实表现的犯人，則不适用这个法令，永久只能受到第四級的待遇。所謂待遇令，大致就是具体规定上述事項的法令。可是不知为什么，弘藏老早就被編入了轉变方向的一批人里面，而适用于这个法令了。因此，这年9月升到第三級，每月也可以寄信两次了。9月5日寄了一封信之后，到9月19日又能寄出这一封信，完全是由于这个关系。

“……下獄已經一年了。如果把判決确定前的拘押日数也算在內，我的刑务所生活已經快滿两年了。本来我多少有些担心：随着时间的拖长，会不会和习惯于环境的同时，在精神上垮下来；結果，总算还好，拿目前來說，絲毫也沒有泄劲垮台的傾向；所以請大家放心吧！如果說有什么变化，那便是心境越来越安靜，大有雨过天晴、风平浪靜、鳶飞戾天、鯉游于淵之概。照这样下去，我自信以后也不会落到力尽气衰、受人怜笑的地步，所以希望大家不要为我煩心。《唐詩选》里有这样一首詩：

‘君問归期未有期，
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
却話巴山夜雨时。’^①

这首詩記得是李商隱作的，我在未决时期經常誦咏。这首七言絕句，是作者离开了洛阳，去到遥远的西南地方巴蜀（现在的四川）做官，在巴山脚下，讀到留在首都的爱人的来信，那时正当秋天的午夜，院子前面的池塘里，涨滿一池秋雨，作者于是叹息道：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家中，說說今夜的情景呢。身在囹圄，讀到这样一首詩，真有一种說不出的叩人心弦的感觉。只是，無論如何我现在并非‘未有期’，而是后会有期；所以再也不用担心意气消沉了。

“就拿坐牢一周年的第二天來說吧，那天恰好是休息日，我过得非常愉快。一連好多天都是阴天，那天却晴空万里，气温也略有上升；我本来就喜欢較热的天气，抱着‘秋风气味似春风’的喜悦心情，度过了那天。……再說，平时穿了做工的細筒褲衩，瘦骨一把的腰眼，总被褲带勒得发痛，那天也幸免了（按：因为休息日不用穿工作服）。每当讀到有意思的詩句，就四次五次、甚至六次七次地反复誦咏，一面心想：被捕以来，像今天这样愉快的日子，还是第一次呢。这样讀着讀着，不觉已是傍晚时分了。据此也就可以推察出我现在的心境吧？……”

故乡以及童年的回忆

整整一年的昼夜独居生活，从朝到晚只是对着墙壁，引人注意的新鲜事物一件也沒有，因而故乡的情况和童年的回忆就自然而

^① 见李商隱詩《夜雨寄北》。——譯者

然地涌到脑海里来。他在进刑务所滿一年后的信里，經常談到这类事情。

1934年10月4日的信

“一到10月，就发了夹衣；但是因为沒有棉毛衫可穿，所以这几天下雨，还是觉得有些冷（天气可能不正常）。一想到今后又要挨一个冬天的冻，就不觉头痛。但是正如去年信里說的那样，冬天一到，春天就不远了；所以我还是要欢迎冬天的来临。目前我一切如常，請放心。……”

“中秋节那天，今津八幡（按：这是故乡岩国附近今津村的守护神）的赛会搞得怎样？武雄来信中說，他和我一起去看的那次，好像是最后一次，至于我，却完全不記得了。不过，我記得当时靜間密先生曾从我們两人面前走过，所以那次大概是我在大学讀書时代的事情。那时幸田露伴在《讀卖新聞》上提倡新体短詩，我响应号召，写了一首，被登了出来。那首詩是这样的：

‘熱鬧的賽会的
鼓声已經停息，
路上月光雪亮，
村夫子吟詩而归。’

詩中所說的吟詩而归的村夫子，就是指靜間先生。这已經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想不到三十年后的今天，竟在这地地道道的鉄窗之下——隔着黑色鉄杆——又看到当年把道路照得雪亮的那个月儿。

“如果是大学讀書时代，那时学校該已开課了，怎么会在今津村举行赛会的时候，在家乡閑逛呢？这我现在完全想不起来了。当时赛会的情景，也毫无印象了。但是，幼年时期去逛赛会的印象

却深刻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小时候随着祖母和母亲，带了红毡毯、温酒的铜风炉和装着各种菜肴食物的提篮，去邻村看会，那印象到现在还非常清楚地留在脑子里。我们在道旁小山上一棵老松树下占了地方，毡毯铺在草地上，把带来的食物分装在小碟子和红漆盘子里吃着。提篮里花色繁多，有加生姜煮的铜盆鱼片，有切得薄薄的煮鸡蛋，有配上胭脂色洋粉和黄色煎蛋小丁的什锦饭糰，还有糖醋藕片。捡些松针生上风炉，祖母所爱喝的酒散发着扑鼻的香气。山上山下鼓声鏗鏘，不一会，那扮成封建幕府时代诸侯卤簿的仪仗队，肃静地从山上走下来。这些僕从模样的卤簿，腰里插着腰刀，一对一对地排好，手里拿着形形色色的枪啦、弓啦、箱子啦之类，重重地踏着步，边吆喝边向前走。有时候，队伍随着拍板的响声而中止前进，每一对人交换着他们手里所拿的东西。交换东西的时候，两人成一斜对面，脚下踏着拍子，互相把手里所拿的东西扔给对方。扔的时候，枪杆滴溜溜地转，枪缨左右飘拂，枪柄一弯一弯，在空中呆了半天，然后稳稳当当地落入对方的手里。幼小的我张大了惊异的眼睛在旁边观看，为他们捏一把汗。仪仗队之后，就是骑在馬上的神官以及神輿，最后就是各村抬来参加赛会的大鼓，鼓上载有花团锦簇的傀儡，扮的是儿童们在童话故事里早就熟悉的加藤清正啦、牛若丸啦、桃太郎啦等等事迹。那样的赛会的仪仗，今天居然还能看到，真叫人神往之至。不过，就像久客异乡、后来回到洛阳的白乐天的两句诗所说，‘昔别今来二十年，唯觅少年心不得’，赛会的仪仗虽然如旧，可是当年那颗瞠目而视的少年心，却再也找不到了。这样一想，过去的事情就格外使人神往，想说的话说不尽，可是纸却写完了。”

1934年10月21日的信

“妈妈：……今晚挺暖和，月色也很好。在这里，月亮如果不恰

好升到窗口，就无法看到（因为头伸不出去）；可是现在，却正好照进窗子。我一边想念着‘今晚的月亮大概从您住的那幢房子的窗戶里也看得见吧’，一边給您写信。不过后天是第三个礼拜天，不工作，所以今晚准备只写一点点，余下的留到后天白天去写，作为那一天的娱乐。……

“在这种地方呆定下来，同社会上的风波完全隔絕之后，心里的波浪也就日见平靜，于是过去的事情一件件兜上心来，就像沉在水底的石头逐渐变得历历可数的一般。今后我想把回忆起的东西，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一一写給您看，就仿佛到您屋子里，一边吃着家乡的羊羹，喝着茶，一边同您聊天的那样。可能有記錯的地方，那就請您問問您身边的武雄吧！

“最早的記憶之一，是乘日本木船去宮島进香的情形。去的时候是夜里。記得那时我才知道旧式木船夜間航行是不点灯的。回来的路上晕了船，从新港（按：这是距离弘藏我的家乡岩国大約六里的小港口）回航时，在八丁壩的茶館前呕吐了。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晕船。因为，我的适应能力很强，从那次以后，任何情况下我也不會晕过船。在大学讀書时代，有一次去房州旅行，乘的是一条江輪那样的小火輪，走到半路，风势愈来愈猛烈，小火輪像树叶一般在风浪里顛簸着，船上的人沒有一个不发晕，同去的朋友中，有的甚至上岸后还病倒了一两天才起来，而我却毫不在乎。赴欧留学时，坐的虽然是一万吨的大海輪，然而由于所經過的是无边无际的大海，所以在印度洋和地中海受到两三次暴风雨的袭击的时候，連船上的服务人員也晕起船来了；而我呢，那时却仍然滿不在乎，即使当飯桌上固定在木框里的碗碟以及其他各物都要滑落的情况下，也沒少吃一頓飯。其实心理作用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认为船是被波浪所搖蕩，那就会晕船；如果认为是自己在使船搖蕩，

那末站在舰桥上观看那滚滚而来的滔天白浪打在船头上，就会感到无比壮丽，甚至希望浪头来得更大一些。禅宗主张随时随地争取作事物的支配者；如果在遇到社会上的风波时，也本着这种精神做去，我想也许能不发晕而安然度过。……話又說回来，記得在八丁壩第一次晕船时，是揹在媽媽背上的，所以那大概是或五、六岁时的事情吧？要不然，也许是因为我生来体弱而任性，所以尽管岁数较大，还让揹在背上的吧？……”

1934年11月5日的信

他在后来的信里，继续写了过去的回忆。

“媽媽：……接着前信谈我童年的回忆吧。俗語有‘痴人说梦’这句话；的确，沒有比听人说梦更无聊的了。可是即使是梦話，由于是我的梦話，我想媽媽也一定会听下去的。

“上封信里谈到了宮島进香。和这同样，另一个最早的回忆，是到欽明寺岭去朝拜地藏菩薩（？）。那时我身体弱，爬山爬到半路，累得垮了下来，‘我在这儿等着，你们去吧！’这样說着，就此蹲在地上不走了。这件事可能是我大了之后，您或别人讲给我听的。后半段路，是不是媽媽揹着我爬上去的呢？这就記不清楚了。我脑子里的印象是：路右边有一条斜里岔进去的小径，四处都密密地长着一人高的草和灌木；拨开那些草木，再往相反的方向走一段，就是个小小的地藏菩薩庙，我們就是去朝拜那个庙的。那一次多半也是祖母发起的；可是，究竟是怀着怎样一种信仰到那种荆棘丛中去朝山敬香的呢，这却不得而知了。据武雄来信說，山阳铁路岩德段^①已经通車了，这个月算是試車；火車穿过那欽明寺岭的隧道，有六、七里长，是山阳铁路最长的一条隧道。今后我可能有机

① 指从岩国到德山的一段。——譯者

会乘火車經過那条隧道，但是，为了重溫五十年前的旧梦，徒步爬上山去的机会，今生恐怕再也不会有了。可是，此番如果能出獄，至少想請媽媽給我詳細談談当时的情况。

“順便提一笔，欽明寺岭所座落的那个地方，我看准是《万叶集》^①里所說的磐国山。

“越过周防的磐国山的时候，得好好献香，那段山路艰险得很哩！”

“这首歌据說是在太宰府衙門里当太宰少典的官儿的山口忌寸若麻呂做了送給驛使的。从前翻山的人在爬到山頂时，要給山神献香，因而山的最高处也就叫做‘献香 (tamuke)’，而山岭 (tōge) 这个名詞的发音，据說就是从‘献香 (tamuke)’的发音轉化来的。

“讀了这首歌，可以知道当时人們认为从九州回到京都的早路上最难走的地方就是周防的磐国山。所以，我认为磐国山一定就是我们家乡岩国附近的欽明寺岭，也就是现在凿通了山阳鐵路最长的隧道的那个地方。在連結岩国和德山的现今的岩德段筑成以前，鐵路是避开这条山路，远远地繞海岸那边过去的。万叶时代的人也許沒有繞那么远的路；尽管险阻难行，他們还是徒步翻过这磐国山了。

“除了到欽明寺岭去参拜地藏菩薩的一桩事情之外，还隱隱約約地記得一桩事情，就是住在森木的祖父（按：森木是岩国市的一个小地区。祖父祖母是指弘藏的外祖父母）到东京去。从家乡到新港去，先要走到市郊。到了市郊，在现在聳立着少年刑务所的高墙的地方，有个三岔路口，一条通向今津，一条通向新港。当时祖

① 《万叶集》是日本古代的歌集。——譯者

父他們乘着几辆人力車正要从那三岔路口出发，我老远望见，就哭了起来。那大概是我四、五岁时候的事情吧。当时即使上东京，也要从头到尾乘旧式日本木船；不过这是现在的猜想，小时候自然想不到这些。記不清后来过了多少时候，祖父他們又从东京回来了，当时的印象要深刻得多。我清清楚楚地記得，祖父当时給了我一个洋娃娃，它的脚上拴着绳，每次拉动绳子，头上戴着黑白道道的鴨舌帽的那个洋娃娃，就吐出它那又长又紅的舌头，绳子一松，舌头又縮了进去。祖父既然給我那样的玩具，可见当时我还完全是个孩子。

“媽媽，这样写来，想到的事情就不計其数。本来是因为想到，所以才写的，可是写的时候却又引起了新的回忆。可惜，紙张有限，写不了許多。陶淵明的有名的詩句中有这样两句：‘羈鳥恋旧林，池魚思故淵’^①。确实，恐怕动物园里的象、狼、狐狸等等，也会常常梦见自己小时候所馳騁的深山和高原吧。但是它們尽管会做梦，却不会写在信里，真是可怜哩。

“提到动物，就記起第一次釣到的鱈魚来。那时岁数可能比較大了，我跟着东老爹（住在附近的一位老年人）到海边釣了好多次魚（想起这事，我就要感謝教会我釣魚的故人的恩情）。去的路上，先在室木附近用捞网到路旁小沟里捞小虾。这是用来做釣餌的。我第一次釣到鱈魚，是在一个堤堰上。那地方离新港很近，从港口前面的小石桥这边往右拐弯，沿着凸入海中的新筑的堤防，拨开草丛往前走一会，就到了。如今可能因为海里有拖网漁船和輪船开来开去，魚类不大游近岸边了；可是当时，就在那样的地方也能釣到各式各样的魚。可是那一次費了好大劲釣到的那条鱈魚，当我把

① 见陶淵明詩《归田园居》。——譯者

它握在左手取釣鈎的时候，它却把身子一甩，从我手里滑了出去，碰在石堤岸側面，又复回到海里去了。我空瞅着只沾有魚鱗粘液的手，仿佛宝贝被搶了去一般，好不失望。东老爹看到这种情形，就把他自己釣到的放进我的魚籠里。当时我觉得他那种做法，真是宽宏大量。不过，魚虽則逃掉了，这毕竟是我第一次釣到魚。

“后来隔了差不多三十年，到 1913 年，我将去外国留学，請假回乡，向父母辞行。当时我陪同爸爸到新港的田部去釣过一次鱒魚。那天阴云密布，海面上有小小的波浪，因为根本不是釣鱒魚的季节，所以釣絲泡在水里一整天，也沒有釣到一条魚。直到天快黑的时候，我这个初次釣鱒魚的，好容易釣到一条。按照爸爸的指点，我馬上丢下魚竿，拉住釣絲。那鱒魚刚一浮出水面，就拚命往水里躡。我拉一把松一把，漸漸把它拉到跟前，最后让爸爸用网兜兜了上来。就这样，两个人花了一整天的工夫，才釣到一条魚；然而由于那条魚是我釣上来的，所以爸爸显得很滿意。在爸爸已經去世的今天，这桩事情成了我最宝贵的怀念之一。屈指一算，从那时到现在，又过了二十多年了。这二十多年里，我再也沒有釣过魚。六年以前，也就是 1928 年的初夏，有造他們帶着我和家里的人，一起去紀州海滨釣魚。据說那是同乡青年們为了慰問我辞去大学教职而发起的。当时重子有生以来头一次釣魚，却釣到了好几条，我反而一条也沒釣到。

“紙已經写滿了，今天就到这里为止吧。这种无聊的信，如果多少能使您得到安慰，那么下次将再写。祝您健康。”

1934 年 10 月 6 日的信

“武雄弟：过去一年里經常收到来信，多謝多謝。由于准許发信的次数增加了，所以把这封信写給你，也算向你致謝。……”

“你談到向山的兰花，我特別梦想着它。这里我要談的，和写

給媽媽的信里一樣，仍然是幼年時代的回憶。小時候，祖母曾經帶我爬過愛宕山。由於向來膽小，沿着陡坡下山的時候，踏在寸草不生的紅土上，剛一落腳，土就紛紛往下塌，因此不敢快步向下跑，結果受到同路的桑原阿姨從旁挖苦嘲笑。不過後來大家還是一再稱贊我始終鼓足勁頭，翻過向山山頂回到家里，很能走路。最後一次爬向山，是1926年年底回家探望生病的父親那次。那一天天氣非常晴朗暖和。我穿過橫亘東西的山頂上的松林，朝愛宕村走去，忽然聽到有人說話，覺得奇怪，往下一瞧，透過松枝，只見一泓碧水，水上浮着木筏。掌木筏的人手里拿着一根老長的旱烟袋，邊說着話，邊悠然地讓木筏順流而下。那種逍遙自在的情景，實在叫人心醉。後來我繼續向東走去，不一會來到山的東頭，眼界豁然開朗了。站在那個地方，十幾里外的大海、島嶼和白帆，都歷歷在目。周圍寧靜得幾乎連海上的漁歌也聽得見。你說那里長着很多蘭花，大概就是指那一帶的樹底下吧。那兒的山既不太老，又不太瘦，說句求全責備的話，要是半山腰有座小巧玲瓏的庵院，在庵院的柱子上挂上這樣一副瀟灑的對聯：

“月沉野水光明藏
蘭吐春山古佛心”

那末不僅將成為我理想的散步地點，即使死後安葬在這裡，也沒有什麼不可以了。……”

給母親和女兒的信

入冬以後，弘藏分別給母親和兩個女兒寫了下面這樣幾封信。

1934年11月21日的信

“喜志子：去年冬天，你從百里外趕來看我，轉眼已經一年了。

当时谈话时间很短，只相当于快車停站的那一刻工夫，但是印象却深深留在我脑里，再也忘不掉。那时刑务所刚刚发给我一本‘感想录’，让我写，所以就把当时的情景記在最前面了。不过因为容易勾起感伤，所以总是不去翻看它。

“经过一年的锻炼，今冬好过得多了（尽管年迈苍苍，看来仍然没有失去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去年冬天，衣服从来没有穿得那样少，既没有穿布袜子、褲衩，也没有穿衬褲，只穿一条单褲，所以立冬之后，两腿冷得厉害。到了现在这时节，遇着阴天，一到傍晚，就感到冷得受不了。可是今年，却满不在乎了。我听说许多人下狱后就病倒；而我呢，尽管长期过着书斋生活，却能经受住这种突然变化，实在幸运得很。

“我的情绪也很稳定。第十九封信写得消沉一些，引起了重子们的莫大不安；其实我心里丝毫也不悲观。记得去年这个时候，每到晚上，总是不知从何处传来一种叫声，很像家乡的猫头鷹叫。

“‘站在伦敦的繁华的街道上，怀念着猫头鷹啼叫的故乡。’

这是 1914 年我在英国时作的短歌，当时父亲读了之后說：‘看来有些寂寞哩！’联想起这些往事，心里并不是不感到类似旅愁的凄凉。你们不知道，在我小时候，靠近我家的河堤边的竹林里，每天傍晚，猫头鷹就各洛蚩、各洛蚩地叫。对小孩子来说，那声音是凄凉而可怕的。这儿所听到的叫声，和那种叫声非常相像，不过只是各洛各洛地叫，却不是各洛蚩、各洛蚩地叫。过后一琢磨，那可能是狗叫的声音，在高大的混凝土楼房里产生了回音，所以听来如此；后来那种声音忽然听不见了，那也许是因为那只狗已经死掉了（按：弘藏当时不明真相，所以这样說的；其实，当他刚进刑务所的时候，病房里的确养了一只小猫头鷹。至于后来不再啼叫，那是因为

它逃掉了)。总之，本来每晚总要随着苍茫暮色飞进我心里的猫头鹰，也已经忘却很久，今天还是第一次想起来。同去年这个时候比较起来，今年心情也愉快多了。总之，我的身心都很健康，请放心吧。……

“过去我在信里常常提起兰花；最近刑务所方面准许我用作业奖金买盆栽放在牢房里（按：按例如果等级不升得再高一些，就不许买盆栽；弘藏却受到特殊待遇，很快就获得了许可），就立即买来一盆兰花。我现在就把一盆插了‘太白冠’小标签的兰花放在面前，在给你写这封信。这是我目前所能看到的唯一植物，对我来说，真是无价之宝。纸已经写完，今天就到此为止吧。再见。”

1934年12月2日的信

“真知子：最近早晚的气温，似乎下降很多，拿今天早晨来说，出去做运动的时候，脚指都仿佛要冻掉，可是我一点也不怕。现在——12月1日的夜里（明天是休息日，这封信本来打算明天写，结果还是趁就寝前先写它几句）——我尽管不穿布袜子，两脚仍然热呼呼的。身心照样正常，请不要挂念。……

“榊田民藏的死，使我想起‘卒然捐馆舍’这句话来。听说榊田夫人慨叹：‘本田先生过两三年准能回家，而我们那个人，却一辈子也不回来了。若是等得回来，我十年、二十年也会等他的。’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一息不来，忽成千载不归之客’的，岂仅榊田一个人呢？由于朋友的突然死去，使得我许下心愿趁自己还能捉笔的时候，把过去的一生经历大致记录下来。不过当然，要是像写给你祖母那样的回忆，那是写来写去写不完的。今天我想对你谈的，却不是那种东西，而是可以作为我一生特点的、我的特殊精神活动。后半张信纸如果有空隙，我就要写这方面的东西。

“我二十岁在山口高等学校毕业，后来到东京去读书。在这以

前，我只讀过《論語》、《孟子》之类的书，从未接触过佛典和《聖經》。到东京后，才讀《聖經》。《聖經》里有这样的話：‘有人打你的右脸，連左脸也轉过来由他打。……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給他；有向你借貸的，不可推辞。’讀到这几句話之后，我一下子就受到巨大无比的影响，它对我的一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的灵魂自然而然地喊道：‘对呀！对呀！必須这样啊！’当然，那些話我并没有能够加以实践。但是一有机会，这些話就刺激我，鞭撻我，使我挺身从事‘异常的’行动。爱护自己、却也关心别人的我的一生，就是这样开始的。

“从东京搬到京都之前，有过这样两件事情。

“一件是听了救济足尾銅矿矿毒受害者演讲会，當場捐出围巾和外套，回到公寓以后，除去自己身上穿的以外，又把其余的衣服等类一古脑儿捆在行李里，捐了出去。这是因为我在演讲会上听到这样的話：‘很多人在矿毒地带挨着冻，生着病，处在死亡的边缘，所以希望大家把不用的衣服捐出来，哪怕旧袜子也是好的。’当时我深为感动，因而产生一种奔去搶救淹在水里的人的心情，把一切东西都捐出去了。这样一来，我还自以为做了一件好事，岂知事后被母亲狠狠責备了一頓，当时思想上十分搞不通。其实呢，也难怪母亲生气：母亲有衣服自己舍不得穿，寄給我穿，而我却毫不顾惜地一古脑儿送了人！这是我快要在大毕业的学生时代的事情。

“第二件是无我爱运动。这是我大毕业后过了二年、你媽媽肚子里怀着喜志子时候的事。无我爱是伊藤証信提倡的（伊藤现在仍在搞无我爱运动，但是究竟年代太久远了，因此名目虽則不变，内容却好像和以前大有出入），当时我把教学工作等一切都扔掉，参加了这个运动。岂知参加后方才知道，伊藤所提倡的和我原

来根据无我爱这三个字所想像的，内容大不相同。尽管这样，我还是听从了伊藤的主张，搞了一个时期的宗教活动。就在这前后，我下定决心，终身不睡觉；因而对于不久于人世，也做好了思想准备。不料这竟成了我的‘大死一番底时节’。我相信，后来我之所以能够轻松地度过自己的一生，就是这个缘故。回头看一看，一梦将近三十年，到了快六十岁的今天，而来到这种地方，它的根源也许可以说就在《圣经》上。无论我在丰多摩刑务所、市谷刑务所时，或者来到这里以后，人家都曾从外面给我送来《圣经》。其实，比起送《圣经》的人来，我也许和《圣经》有着更深的、真正的缘分。

“信纸太小了，连所发生的一件一件事情的目次也写不完。不过我总想把我一生的思想经历写出来，好给你们和外孙们留下一个可供回忆的材料，以便理解‘父亲(或者外公)原来是这样一个人’。……”

1934年12月2日同一天的信

“妈妈：……我和外祖父一样，手上的皮肤很柔嫩；到了这里，不知为什么，一到夏天，就更加柔软细嫩，稍一用劲摩擦，皮就破了；冬天却完全相反，皴的程度比在外边厉害得多。中国人用‘鸡皮’二字形容老年人的皮肤；一点不错，我的手一到隆冬，就粗糙得跟拔光了毛的鸡似的。再过些时候，就变得满手都是皴裂，令人想起契诃夫旅行西伯利亚时所写的信里的一句话：‘手上满是鱼鳞’。季节带来的这种变化，以前在狱外，既不明显，也很少注意到。不知这是什么道理。

“旧友榎田的死，使我想起和母亲陪着祖母去伊势神宫进香那天的情况。我们一连串坐了三辆人力车通过京都丸太桥的时候，正好让当时还在读书的榎田看见了。后来他对我说：‘但愿我也能像老师那样，将来把父母接到京都来逛一逛。’那时我去京都教书

还不久。本来因为把家搬到京都，一笔搬家費就把不多一点存款用光了。搬到京都之后，好容易积了一、二百元的邮局存款，就請祖母和母亲一块儿到京都来，由我陪着經由奈良去伊势神宮进香。到伊势时正下雨，我們是坐在三辆拉上車篷的人力車去进香的。我坐在最后一辆車上，眼泪一陣陣掉落下来。这件事，当时我也許沒有对您說起，我是因为心想居然能請最爱朝山进香的祖母健在的时候来到伊势进香，这才喜从中来，不禁掉下眼泪的。听說小时候祖母非常疼我，百般关怀，世所少有，所以正赶上我沒有錢的时候，能够多少报答祖母的恩情，心里有說不出的欢喜。我有一个朋友吉川，新婚旅行中是用父母的錢到这儿游玩的，而我却用微薄的薪水积下的錢，請祖母和母亲到这儿来玩。当时这样一想，我可能既觉得高兴，又觉得自己太可怜吧。可是如今，那么要好的吉川已經不在人世，櫛田也死了。……”

前面的几封信，不論哪一封，都是往事的回忆。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弘藏被关在单身牢房里将近两年工夫(連判决确定前的拘押日数算在一起)，他的心，主要是让过去的回想所占据了。他生平几乎从来不回想过去，如今却回头看了。这說明他现在的心境是走上了独善其身的方向。

給真知子的信中所提到的青年时代的回忆

弘藏 12 月 2 日給真知子的信里，提起了他大学毕业前后发生的两件事情。其中关于第二件他在参加无我爱运动时期体验到的“大死一番”的問題，他当时写过一部叫作《回顾三年》的稿子。在这部稿子里，他如实地記錄了大死一番的剎那間所体验到的不可思議的精神状态。他觉得在这不可思議的精神状态中，有他自己

无法解释的附带的偶然现象。但是他深信，属于本质的基本的东西，乃是禅宗所说的见性。当时他绝不是随便想想，而是真心诚意地准备抛弃自己的生命。弘藏自己觉得，这一决心简直彻底到极点。同时他觉得，由于下了这个决心，他把自己的生命扔了出去，然后又双手把它接住，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了一番。本来，人是无法用自己的眼睛去看自己的眼睛的；同样，人也无法用自己的心去了解自己的心。科学不论多么进步，要科学地解释人的心，就必须把心作为客观对象。然而既然成为客观对象，心就变成外界的东西而死亡，而不再是一颗玲珑剔透的活的心了。外界一切事物都可以作为心的对象而加以科学研究；惟有心，却不能活着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要十分确切地掌握活的心，就必须依靠性质和科学研究方法完全不同的极其特殊的意识的自觉作用。这就是古来禅家所说的见性，而他正是完成了见性这件大事。这一点，他当时是这样想，后来也终身没有改变这种想法。

后来他当了科学家，专门研究经济学，终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最后坐进监牢；他之所以能够走上这条道路，基本动力就在于往年完成了见性这件大事，下定了献身的决心。他在监牢里这样回顾着过去，并且在给真知子的信里流露了他的某些感慨。

《回顾三年》这部稿子始终没有发表，一直保存到现在。当时曾经在《读卖新闻》上作为不久即将出版的新书，登过广告，可是最后弘藏决定不予出版，长期把它压在箱底里。弘藏的作风，向来什么事情都喜欢公开，唯独这次，他却不愿让自己出生入死所做的事情，受世上一般缺乏理解的聪明人譏笑，所以尽管写了出来，终于迟迟没有公开发表。本来，这部东西是研究弘藏生平的一份重要资料，然而因为太长，这里就不引用了。

不过，这儿还是要顺便交代一句，那就是，他的内心活动的历史，是接触到《圣经》里“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这些话的时候，才开始了一个新纪元。他之所以参加伊藤証信的无我爱运动，就是因为他相信“无我爱”这三个字表现了那段话的精神；同时也是由于那段话的指引，才到达大死一番的境地。因此他认为他的内心活动的历史，受《圣经》的影响最大。正因为如此，他才在给真知子的信里写道：“无论我在丰多摩刑务所、市谷刑务所时，或者来到这里以后，人家都曾从外面给我送来《圣经》。其实，比起送《圣经》的人来，我也许和《圣经》有着更深的、真正的缘分。”

他关到小菅刑务所来以后，给他送《圣经》的人当中有一个是著名的森永糖果公司的森永市左卫门。

就在那年夏末，有一天，弘藏被叫到所长室去，介绍给一个留着雪白的大胡子、身穿西装的老绅士。这人就是森永市左卫门。他一见到为了接见、临时把赭色狱衣换成浅葱色狱衣的弘藏，立刻上前同弘藏握手。他身边站着一个头发分得整整齐齐的年轻秘书，张大两眼，好奇地看着。老绅士仿佛很畅快地瞅着身穿借来的不合身的狱衣、下面露出两只瘦长小腿的弘藏，以兴高采烈的口气，滔滔不绝地对弘藏进行了大约二十分钟的说教。他先谈到自己信教的经过，然后流利地引用他所背熟的《圣经》上的一些句子，赞美上帝的威灵。最后他说：“你现在落到这样悲惨的地步，也是由于上帝要把你领进信仰之门，所以是一件非常值得欣幸的事。我近来每天都在为你祷告，但愿你趁此机会获得永生。至于你是否听我的劝告，这由不得我主张，一切只能听凭上帝吩咐。我所能做的，只是继续为你祷告。”

说完这番话，他又伸出大手，再三紧紧地握弘藏的手。

弘藏看出这个森永老头儿当时十分洋洋自得，心滿意足。

接見结束后，弘藏回到牢房，扔下草笠，就急忙洗手。他把那被社会名流森永握过的手好好擦洗了一番，仿佛那手抓过了什么髒东西。

森永到这个刑务所来，还带了自己公司里制造的牛奶糖，分給全体犯人。这种东西，連坐了十几年牢的人也未曾吃到过，所以他們都像小孩子那样欢天喜地，不住嘴地称頌森永的功德。唯有弘藏，把送到单身牢房的牛奶糖原封不动地扔进馬桶去了。写給真知子的信里所以沒有提到这件事，是因为怕检查通不过，其实信上說：“比起送《聖經》的人来，我也許和《聖經》有着更深的、真正的緣分”，暗地里就透露了这种滿肚子的不高兴。

扯得太远了，还是言归正传吧。关于弘藏在大学毕业前后所发生的两件事情中的那个矿毒事件，木下尚江老先生在正当弘藏坐牢的时期写給森戶辰男的信里，有着詳細的記載。那是一封很有趣的信，现在把它抄在下面。

“朋友給我寄来 6 月 25 日(按：可能是指 1936 年 6 月 25 日)的《帝国大学新聞》，因而拜讀了你(按：指森戶辰男)的文章。今天把不肖的名字也堂而皇之地登在上面，实在使我慚愧。你的文章从同情心出发，充分理解到黄泉下的人們的心事，使我不由得不怀着敬意和感謝，反复拜讀了好几遍。讀了之后，我心里像夏云翻騰，百感交集。这里我想写点有关帝国大学的回忆，供你一閱。

“我在信州的山中生活了十年之久。有时給报纸写点文章，有时做做律师，反正是在除了天空和山之外什么也看不见的故乡度过了孤独的十年。尽管老想脱离这个环境，却总是被身边的一些瑣事纏得紧紧的，脱不了身。这时監獄救了我。坐了一年半監牢以后，1898 年 12 月(按：弘藏是那一年进东京帝国大学讀書的)，

我被攆出当时的鍛冶桥監獄的大門，来到东京市的中心。老朋友石川安次郎(半山)等候在牢門外边，馬上帶我去见了島田沼男先生。

“那时我心目中有两个敌国：一个是‘军队’，一个是‘帝国大学’。穗积八束那时正把持着帝国大学，高唱‘神权論’(按：指天皇神权論)，我則大力宣传‘普通选举’，一开口就高叫民主。新聞記者虽是我的职业，但是我并不善于写文章，总觉得耍笔杆得繞远路，不如大声疾呼来得直截痛快。

“当时演讲在社会上已經不那么盛行；演讲的会场，除了租用神田区的青年会館或本乡区的中央会堂，就找不到其他的地方。我常常在中央会堂大声疾呼。那是对‘帝国大学’这个敌人的大本营的挑战。(按：当时弘藏还是大学生，常去听他演讲。来自乡下的弘藏，那时听到木下攻击神权論的演讲，非常惊奇。尤其是看到听众从未发出反对的嘘声，反而热烈地鼓掌，更是惊奇不已。弘藏生长在藩閥的根据地山口县，求学于山口高等学校；对他这样一个人，破天荒第一次传播了民主思想的，就是木下的演讲。不比晚年，当时的木下长得很瘦。他多半穿日本服上讲坛，总是卷起袖子，滔滔不絕地談。)

“可是，有趣的是这时吉野作造和本田弘藏却正在准备走出大学門。我同吉野是由于基督教的关系而成为朋友的。……

“至于本田，則是因足尾矿毒事件而認識的。我到东京时，矿毒事件在行政方面已告一段落。1896年的松隈內閣，通过矿毒調查会的調查，对足尾銅矿矿主古河市兵卫发了一道預防矿毒的命令，就算把这个麻煩問題結束了。以后社会上还流传着一些冷言冷語，說什么‘矿毒問題实质上是田中正造的选举問題’。1900年的春天，矿毒地区的大批农民到东京請願，半路上突然发生了所謂

‘暴徒嘯聚’事件，于是事情又发生了波折。第二年的 1901 年，成立了‘妇女矿毒救济会’，这是社会运动史上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有两个人，对这件事有很大贡献。

“一个是島田三郎先生。島田先生在和田中两人视察矿毒地区回来后，发表感想说：‘矿毒问题，向来被当做政治问题加以处理，而今天却有必要进一步把它当做人的问题，从人道上加以处理。过去这件事是归政治家管的，而现在却应当改由妇女们用爱来办理。’

“另一个是潮田千势子老女士。当时需要找个拥护島田先生的主张的妇女来办理这件事，没有办法，只好找到基督教妇女矫风会。结果请矫风会的矢島楫子和潮田千势子两位老太太，在 11 月的大冷天，去矿毒地区实地调查，在那里设立了妇女救济会。潮田女士那时恰好六十岁，却是一位难得的实践家，因此就让她当了会长，听凭她独立活动。

“恰好那时东京高等法院会同各方面对暴徒嘯聚事件进行实地调查，推事、检察官、律师、鉴定人、新闻记者的大队人马连日在矿毒地区视察；妇女救济会的工作正好与此同时并进，就格外引人注目了。11 月 29 日的晚上，妇女救济会在神田区美土代町青年会馆召开了第一次大会，会开得很成功，成功到连我自己都感到惊奇。一句话，那可以说是个‘心灵’的集会。大会的主要目的是募集捐款，由一些妇女们在会场里拿着小竹筐，在到会人中间转来转去，进行募捐，成绩好得简直出人意外。

“尤其出人意外的是古河市兵卫夫人的自杀。据说她原来就神经衰弱，一直过着寂寞的生活；那天晚上她暗地里打发女佣人去探听大会情况，结果就在当夜跳进神田川自杀了。

“过了两三天，又在本乡区的中央会堂举行了第二次演讲会。

那天晚上的集会的盛况也不亚于第一次。演讲会结束后，有一位青年向站在門外的妇女問道：

“‘这次募捐只收現錢嗎？东西要不要呢？’

“‘捐东西是再好不过的了。’那个妇女这样回答以后，青年人立即脫下自己身上所穿的日本服外套，往那儿一扔就走了。

“第二天，我正在銀座的报館里，搞事务工作的人跑來說：刚才有一个人力車夫送来一个大包裹，說是捐給矿毒地区的，說完就走了；問他捐献者的姓名，他說本人叫他不要說，所以他不好讲。我立刻想起了昨晚捐出日本服外套的青年。因为觉得这件事情需要研究一下，就馬上打发人把潮田女士請来，两人会同把那大包裹打开。一看，里面既有日本衣服也有西装，既有冬天穿的也有夏天穿的，既有碎白点子布的也有染上家徽的。潮田女士摇摇头說：

“‘这可不能就这么收下来！因为我觉得这人說不定精神有点儿不正常。’

“麻煩的是不知道那个人的姓名。于是我們两人把所有的衣服都检查了一下。终于从釘着銅鈕子的大学生制服的口袋里找到一张名片，名片正面印着‘本田弘藏’几个字，背面印着‘本乡区駒込千駄木町×××館’的字样。

“潮田女士說：‘不知道这名片是本人的还是別人的。好歹去駒込的公寓打听一下，也許会找到什么綫索。’

“于是她馬上坐了人力車赶了去。过了一会儿，她回来了，說：

“‘果然就是名片上所写的那个人。本人不在家。我从公寓的老板娘那儿打听到了詳細情况。据說本人是一个非常感情用事的人，可是精神并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这人在大阪还有个闊气的舅父，所以生活并不困难。’

“沒想到在 12 月 10 日田中正造老先生拚死‘告御状’的事件

的背后，还有这样的光明的一面哩。

“有一天，本田突然到神田区猿乐町我的蜗居来看我。他说他想当新闻记者，要我介绍他进《每日新闻》报馆。我翻开他带来的杂志，读了他的文章。他的文章既有条理，又有热情，真是写得出色。本来，我们很需要这样的人，无奈报馆的经济情况不允许。我把这一层直截了当地告诉了他，他摇摇头说：‘钱的问题，请不要担心，只要能让我写文章就行。’我把这件事也告诉了岛田先生，想设法让本田参加报馆工作。记得为了此事，本田曾来看我两三次，后来据说他那大阪的舅父不赞成，因而他放弃了当记者的愿望，后来当了农科大学的教师。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和本田见过面，但是我常常想念他。直到后来，有一天——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时候了，——我乘坐山手铁路的电车回家，旁边有人在看晚报，一看，报上登着一大幅照片，是个男人的寒酸背影，瘦骨嶙峋的高个儿，腰里搭拉着一条布腰带。我心里不觉一惊，暗想：那不是活像我三十来岁时的小照吗？再仔细一看，原来照片上的人是本田，正被警察厅押解到什么地方去哩。这时我禁不住眼泪直掉。我和吉野，后来一直往来着；还希望有机会再和本田敞开心襟谈一次。7月24日。”

（记忆力好得出奇的木下，把将近三十年以前的事情，描写得犹如昨天才发生那样生动逼真。不过，他的记忆也多少有和事实不相符合的地方。比如，他说本田的名片背面印有住址；然而事实上当时他经常换公寓，所以这一点是有些靠不住的。再说，那时候他是住在本乡森川町，后来才搬到驹込千駄木町去。所以驹込千駄木町富士见馆那个住址，恐怕是他后来访问木下的时候，写在名片上，木下把它记住了。关于弘藏被警察厅押解到刑务所去时的照片，说是腰里搭拉着一条布腰带，这也是看错了。弘藏拘留在

警察署的时候，帶子就已被搜去了，只好用針織品的纏腰布来代替帶子，所以那搭拉着的不是腰帶，而是身上的衣服。順便再提一笔，木下写这封信的第二年，弘藏就刑滿出獄了，森戶却没有及时地給他看这封信。可是，这封信在寄到森戶手里之前，却有人把它抄了下来；弘藏还是由于那个人帮忙，才讀到它。当时他本想拜訪木下一次，可是因为不知道木下的住址，拖了下来，后来就在报上看到了木下去世的消息。这样一来，就从此再也见不到木下了；这一点，弘藏觉得非常遺憾。这封信在木下死后，曾由森戶把它发表在杂志上。有些字句，和上面所抄出的略有出入，恐怕还是上面所抄出的比較正确。)

足尾銅矿矿毒事件，是后来把陆奥宗光伯爵的次子作为义子的日本大富豪古河市兵卫变成大資本家的过程中所发生的悲剧。当时从他所經營的足尾銅矿里流出来的矿毒，污染了渡良瀨川沿岸各个村庄，轉眼之間，就把农民們的田地——祖祖輩輩传下来、賴以为生的命根子——化为不毛之地，使无数貧苦农民陷于餓死的絕境。不过，为了建立日本資本主义独立发展的基础，必須一方面有工业資本家，另一方面有人数众多的无产階級。为了这种需要，無論哪个国家，都赤裸裸地使用了暴力；日本自然也不是例外。

无产階級——工資工人，即为了获得工資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資本家的工人——产生的过程，無論在哪个国家，都表现为残酷地剝夺独立生产者生活資料来源的历史过程。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那“是用血与火的文字，写在人类的編年史中的。”^① 特别是“农村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剝夺，就是这全部过程的基础。”^② 又說：“如果照奧琪尔(Augier)說，貨幣‘出現到世上來，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04頁。——譯者

② 同上書，第905頁。——譯者

会在脸颊的一边，带着天生的血痕’，那末資本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骯髒的东西。”^①日本富豪古河的資本，最初实际上也是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骯髒，在足尾銅矿呱呱墮地的。

《資本論》是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出版的，但是广泛地在日本流传，却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当年弘藏甚至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部书，自然无从理解这一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必然规律。只是由于弘藏的年輕的心灵，受到《聖經》上“有求你的，就給他；有向你借貸的，不可推辞”的教訓的决定性的影响，所以当他听到矿毒地区农民的悲惨情况时，不由得就主动地脫下衣服捐了出去。聪明人可能会嗤笑弘藏的狂愚，但是他本人，对于听到別人的不幸而肯抛弃个人利益的自己的青年时代，却始終有着恋慕之感。他因为现在呆在監獄里，怀想着当年，所以才在写給真知子的信里，也利用有限的空白，追述往事。

12月中旬，弘藏解除了昼夜拘禁，白天可以到牢房外的图书室工作了，因而严正独居时期的通信，就到此为止。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61頁。——譯者

回忆(断片部分)

螃蟹、鸚鵡和朝鮮鯽魚

已經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我因为要去外国，回到故乡向长辈辞行。大概是夏天吧，我跟随祖母和父母亲，带着酒肴，坐船游了錦川。那是一条美丽的河，錦带桥跨在河上，我們的家就在桥下边。河堤下边是一片竹林，往前走，是布满小石子的河滩，再往前走，就是浅水滩了。

对岸是山，河水很深。人們称这一带为小赤壁。在我小时候，岩壁上还可以看到“水落石出”四个大字，据說是明末志士戴曼公到这里游玩时所刻的。（“水落石出”这四个字的意思，直到后来在学校里讀了《赤壁賦》，我才懂得。本来我一直以为那是上面挂着瀑布、下面耸立着岩石的景象，可是这儿根本没有瀑布，所以总觉得那几个字用得不是地方。）我們把小船搖到树蔭底下，祖母和父亲喝酒，其余的人就吃飯。吃完飯，把剩下的菜肴倒进河里的时候，长着火紅巨螯的大螃蟹，就从山岩小洞里爬出来，把它叨了去。河水非常清澈，所以水底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的。大概由于不久就要远赴外国吧，当我离开螃蟹的时候，竟情不自禁地产生一种感伤情緒。

我再沒有像旅居巴黎时候那样深刻地体会到异乡之客的滋味了。一个不懂外国話的人，靠着一张地图，乘坐公共汽車，在周围全是蓝眼睛的外国人的情况下，像丧家之犬那样惴惴不安地走过一条熱鬧的大街，这时突然发现一家店鋪前面挂着个鳥籠，籠子里

有一只形似鸚鵡的鳥兒。在這喧囂熱鬧的街頭，它失魂落魄般地保持着安靜。雖則處身在這繁華都市的中心區，它也許在思念故鄉的曠野吧。想到這兒，我不由得回憶起家鄉的紅螯螃蟹來。

那天晚上，我懷着一股旅愁回到公寓，寫了內容大致如上的一篇文章，寄給《中央公論》；結果不知是不被採用呢，還是中途丟失了，沒有見到那個雜誌發表。本來我過去寫東西，總是寫了就算了事，幾乎從來不放在心上；惟獨這篇未經發表的短稿，卻奇妙地常常想起來。

如今祖母已經去世，父親也不在了。那螃蟹和鸚鵡，恐怕也早已不知道怎麼樣了吧。

上面這篇短文章是 1928 年 9 月寫的，到現在已經十三年了。這篇東西曾經發表在雜誌《蘋果》上。那是一個僅僅只有四頁（把一張紙一折兩）的雜誌。猜想起來，即使當時喜歡讀我的文章、凡是用我的名字發表的東西全都看過的讀者，大概也不知道有這篇短文章。

提起 1928 年，那就是三·一五事件發生的一年；余波所及，我在那年 4 月間辭去了大學教授的職務。自然而然地，我就成了報刊文章寫作界的紅人之一，當時我所寫的任何斷簡零篇，中央級的大雜誌都會搶着發表。既是這樣的話，為什麼我要把那篇文章交給一家誰都不知道的雜誌呢？

事情是這樣的。那時經常有個古里古怪的人，拿着一只飯碗，到我家後門口來。他專要吃的，絕對不收錢。據說他原是個俳人^①，東京大地震的時候，弄得片瓦無存了。每次到我家來，什麼

① 經常寫寫俳句的人，稱為俳人。——譯者

話也不說，只是默默地取出飯碗。我一次也沒見過他，我妻却對他那副態度感到興趣，每次總盛給他滿碗的飯和現成的菜。後來他為了答謝起見，給我按期送《蘋果》來。那是紅墨油印刷的十六開印刷品，不知道的人還以為那是夾在報紙里分發的廣告呢。到後來，他索性要我為那個雜誌寫點東西了。

於是我就寫了上面那篇短文章。文章不久就在《蘋果》上登了出來。可是拿到雜誌一看，有許多地方都被改動了，因此我心里非常不高興。例如，寫作“その”的地方都被改成了“其の”，“つもり”被改成了“所存”。本來我對用字就非常講究，有時印刷廠為了遷就行數或其他原因，把我文章里的“その”改成“其”，“この”改成“此”，我都很不舒服。所以，平常給東京的雜誌寫稿，也總要他們把校樣寄給我，由我親自校對，這才放心。想不到我在这方面的一點苦心，竟讓《蘋果》隨便糟塌了。

為《蘋果》寫了這篇短文的第五年，即 1933 年，我以違反治安維持法的罪名被捕了。被捕後不久，改造社的人來找我，說是有人來賣那篇稿件，社里已經把它買下，打算在最近一期《改造》雜誌上登載，希望我應允。不用說，我請他們千萬暫時不要發表。因為我是以共產主義者的身分被捕，引起了社會上廣泛的注意，這時要是發表這種不三不四的東西，是和當時我的立場完全不相容的。本來，改造社已經出錢買下了那個稿件，刊登不刊登，也許由不得我作主；結果僥天之幸，他們居然接受了我的要求，這篇隨筆才算沒有成為我在雜誌上發表的最後的文章。順便提一句：自從 1933 年被捕以後，直到今天，我沒有發表過任何文章。

在未決監里聽到改造社的人那番話的時候，我才明白幾年前蘋果先生改動我的文章的內幕。現在才知道——當時卻一點也沒

有想到，——原来苹果先生把我的稿件另外抄了一遍，把抄出的一份送交印刷所，至于我的手稿，却被他保存了下来。看来他对用字并不讲究，因此在抄写的时候，就不加思索地按照他自己的一套习惯把“その”写成“其の”、“つもり”写成“所存”了。而在五年后的今天，趁我被捕入狱、引起社会上注意的时候，他跑到杂志社把我的手稿卖掉，看来这件事不是出于灵机一动，甚至可能是一开始就有计划地这样做的。为了这件事，我在监牢里感到很不愉快。

今年的初夏，附近的冰川神社举行赛会那天，我妻领着外孙女去看会，外孙女看见金鱼，就要买，结果买了三条。从那以后，尽管现在已经是深秋，我妻每天总要细心地为金鱼换水，挖小蚯蚓给它们吃，一天也没有间断过。在几乎到处都铺着水泥的东京市中心，想找小蚯蚓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因此只好到厨房水槽口小小一堆污泥里去捉，所以供应远远赶不上需要。于是她把那污泥先放在木箱里，然后用手指细心地剔出钻在泥里的蚯蚓，剩下的污泥仍然倒回原处。可是由于每天都捉，蚯蚓也就繁殖不了那许多，结果光是为了给三条金鱼找蚯蚓，就得花上半个多钟头（在我旁观者看来，有时她甚至要花一小时以上的時間）。尽管她总说忙得连写信的工夫都没有，每天捉蚯蚓的时间却毫不吝惜。金鱼可养得着实懂得和人亲暱，她指尖稍微碰一下水面，金鱼马上游上来舔她的手了。它们发育得很好，眼瞅着一天天大起来了。

可是我对这类事情，却完全漠不关心。

“你一点也不懂爱生物！生物很可爱哩！”

这几乎成了她的口头禅。而我呢，也确实全然不懂得爱鱼鸟。想起来，从童年直到今天六十三岁的老头儿，我几乎从来没有寄情于鱼鸟。我所难于忘却的，就只有家乡的螃蟹、巴黎的鸚鵡和小营

刑务所的朝鮮鯽魚而已。——现在让我順便說一說那朝鮮鯽魚是怎么一回事吧。

犯了强奸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已經服刑十四年的我的伙伴田村，桌子上摆着一个长滿綠苔的玻璃瓶。这我早已注意到，却直到 1937 年的春末夏初、我不久就要期滿释放、而田村却要获得假释而比我早一步出獄的时候，我才問他玻璃瓶里装的是什么。

他回答說：“那是朝鮮鯽魚，生命力真是强得厉害，一点东西不喂，却在这小玻璃瓶里熬过了一个冬天。那是在獄外劳动的那批人在荒川里捉来，送給我的。这种魚据說是附在朝鮮开来的輪船船底上带过来的，后来就逐渐在荒川里繁殖起来。”听了他这番話，我不由得联想起日本的朝鮮移民中的体力劳动者。

朝瓶里仔細一瞧，果然在綠色的渾水里，游着几条小魚，大小跟鱗魚差不多；搖动一下瓶子，它們就飞快地钻到瓶底卵石下面去了。

这些事全都发生在东京东郊的小菅刑务所里。这个秘密世界里的事情，誰都不大知道。为了让大家理解我所讲的故事，我还得加以必要的解释。

刑务所的四周是又高又厚的水泥围墙，墙外有一个附属农場。在农場干活的犯人，十几个編成一組，由一个看守監視着。他們每次出入刑务所的大門，都要受到严格的搜查。出去之前，要当着看守的面把衣服全部脫光，連下身的兜襠布也得解去，然后換上獄外作业服(獄內的普通囚衣是紅色的，獄外作业服却是青色的)。从外面回来的时候也同样要当着看守的面脫得精光，把衣服全部換过。因此，照道理說，想夹带任何微小的东西出去或是进来都不可能。事实上却不然，这里也和国际上的走私一样，不断地利用极其

巧妙的方法，进行着相当貴重的物品的走私工作。由于这种关系，把农場旁边的荒川里的朝鮮鯽魚带进監獄，也就絲毫不足为奇了。

关我的小菅刑务所里，一共有一千二百名犯人。他們的境遇的悬殊，有如封建时代的王爷之于貧雇农。其中王爷里的王爷，要推专管犯人图书閱覽的收发工作的教务科的杂役夫。我和另外三个佩帶独步臂章的伙伴，就是那里的杂役夫。

本来在任何情况下，都禁止犯人单独走动；唯有膀子上带着独步章的极少几个人，有公事时可以在獄内的一定区域单独走来走去，后面不跟随看守。这些人全都是勤勤恳恳地做了十年以上的苦工、完全获得了監獄当局的信任的人。按說我只判了五年徒刑，根本就沒有資格成为这种独步者。可是，我并没有經過誰的批准，这时却获得了差不多和独步者同样的自由。不佩帶独步臂章而一个人随便走路，至少在这个刑务所里，我是破天荒第一个。說不定在整个日本行刑史上，也是开天辟地第一个例子！

我們把大桌子摆在图书室窗下，坐在看守坐的那种椅子上，进行工作。图书室里一个看守也沒有配备，这在監獄里是唯一的例外。因此，我們自然也就敢于滿不在乎地做那些普通犯人所不敢做的、将被严重处罰的违犯所规的事。例如，天一冷，我們就大模大样地在大火鉢里烧起炭火，用吊子烧了开水，随意沏茶喝。茶叶是从伙房要来的。这类事情，獄吏們偶尔跑来看见了，也并不責备。于是，无形之中，就在公开的默許之下，获得了种种特权。再如，犯人私藏刀剪之类，本来是絕對禁止的；可是，图书室里却藏着一把剃刀；因此，一般犯人每星期只能刮一次臉，而我們的下巴却总是刮得干干净净的。情况既然如此，在玻璃瓶里养几条鯽魚——保有这一点私有財產(不得保有私有財產，原是犯人的特征)，自然也就算不了什么了。

按照監獄里的不成文法，誰要是釋放出獄，總是把這種私有財產轉讓給留下的人。所以我繼承了田村讓給的那個長滿綠苔的玻璃瓶。至於瓶里的朝鮮鯽魚，我在征得原主的同意後，馬上把它們放掉。

我說：“把它們永遠圈在這種狹窄的地方，實在可憐。我要放掉它們啦。”原主聽了這話，也沒有提出反對。

教務科屋子前面，有個還像樣的院子，那裡的松樹底下，有個花崗岩鑿成的圓池子。池子里長着萍蓬草；由於落葉腐敗，池水渾濁不清。我說了一句“這是假釋哩！”就把幾條朝鮮鯽魚放进池子。鯽魚像箭一樣游去，一轉眼全都看不見了。

(1941年9月)

荒木寅三郎的頭

失意的人說得意的人的壞話，聽來總叫人不舒服。這一點，我並不是不明白，可是下面所寫的，卻是對一個典型人物的難忘的回憶，這樣的人，我生平還只碰到過一次。

談起這件事，得先從手邊的《日本文化大年表》(四年前即1937年《中央公論》雜誌新年號附錄)摘錄幾條，作為引子。

1924年，

5月，《馬克思主義》雜誌創刊。該雜誌後來成為日本共產黨的理論雜誌。同月，為紀念馬克思誕生一百周年，成立了學生運動的全國性組織“社會科學聯合會”。

1925年，

2月，福本和夫在《馬克思主義》雜誌上發表就唯物史觀駁河上肇一文。從此，福本主義在我國工人運動中就風靡一時。7月，“社會科學聯合會”在京都帝國大學召開全國代表大會。

1926年：

1月，开始了所謂京大事件的逮捕。很多学生被拘禁。

上面这个年表中所提到的“社会科学联合会”，指的是以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为首的各学校的学生所組織的社会科学联合会的全国性統一組織；至于“京大事件”，又称学联事件，是社会科学联合会遭到暴力鎮压的事件。这次事件，是治安維持法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援用；由于大多数被告都是京都帝大的学生，所以一般称为京大事件。

就像这样，社会科学联合会全国代表大会不在东京帝大召开而在京都帝大召开，同时，当局对学生运动所进行的史无前例的大规模鎮压，主要也不是針對东京帝大而是針對京都帝大，这个事实，以及不久以后即1928年1月举行的普选中、劳动农民党（該党当时受日共领导）在全国提出三十多名候选人、結果仅仅在京都一个地方当选两名的事实，都說明当时的京都已經隱然成为左翼运动的一个主要中心。我当时在京都帝大，对于这种形势，似乎多少不无貢獻。

为什么这样說呢？这是因为，当时很多优秀的左翼学生从四面八方跑到京都来，都是由于我在京大任教的緣故（而且这些学生不仅对校內发生影响，就是对校外也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自然而然地成为京都、大阪地区左翼运动的一个原动力）。不过，在思想方面，我给这些学生的影响却是微乎其微的，至少在福本主义全盛时期是这样。这在上面所引用的那个年表的“福本和夫在《馬克思主义》杂志上发表就唯物史观駁河上肇一文。从此，福本主义在我国工人运动中就风靡一时”一段話里，已經表示出来了。

1924年到1925年，我成了新从外国留学回来的两个人的不

断狠狠攻击的对象。

第一个拿我当做批判对象的，是我多年的朋友櫛田民藏。1924年6月，我因病去和歌山轉地疗养，当时作了一首短歌：“来不及拂去衣服上的征尘，又要开始新的旅行了”；这首短歌表现了我的新著作受到櫛田批判后我被激起的发愤图强精神。本来，那时社会上已經称我为馬克思主义的权威；可是，自从受到櫛田的批判以后，我自己却开始觉得自己对馬克思主义学說还完全是个門外汉。因此，尽管自己年紀已經快到五十岁，而且一向身体也不好，却仍然下定决心，今后要重新振作精神，刻苦钻研，以便做到真正理解馬克思主义学說。上面那首短歌，就是怀着这种心情，在轉地疗养的旅館里写的；从中显然可以看出我的落后。

櫛田和我的交往很深。这方面想写的事情太多了，现在只好从略。

第二个批判我的就是福本和夫。他的論文带着俄国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气味。尤其是，他拚命卖弄着唯物辯証法这个名詞。再加上他那口号式的、独断的、松脆利落、別具风格的文章体裁，于是博得了当时已經大大受到俄国革命的思想影响的知識分子和工农群众的近乎宗教信仰的感佩，轉眼之間，福本主义就风靡了全国。

櫛田和福本那时一个接一个地拿我当做主要攻击对象，是有充分理由的。

本来，不論在哪个方面，我都最最缺乏作先行者的資格；就拿接受俄国革命的思想影响来說，我也比那些感觉灵敏的人落后得多。因此，尽管当时俄国国内在长时期中培养起来的对于馬克思主义(特别是对于它的哲学基础)的深刻理解，已經由于俄国革命的成功而开始引起全世界的重視，我却仍然对它一无所知。

實則，沒有唯物辯證法這一哲學基礎，就根本不可能有馬克思主義；因此，過去我所寫的有关馬克思主義的許多論文，不消說，根本談不上什麼真正理解馬克思主義。那些文章都只不過對馬克思主義作了一些通俗膚淺的解釋；要說有什麼功績的話，也僅僅是引起了大家對馬克思主義的關心而已（僥倖的是，我身居大學教授的職位，所以這方面的影響力很大）。說得難堪一點，過去我只不過是當了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一名吹鼓手罷了。但是，從真正理解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說，既然這樣的宣傳員在日本的知識分子當中始終相當吃香，那末，首先打擊這個河上肇，破壞他的威信，把他從學術界驅逐出去，就不能不成為當務之急。所以，不論櫛田和福本攻擊河上肇的主觀動機是怎樣，客觀上是有這種社會需要的。

幸而我這個人，一旦發覺自己犯了錯誤，就毫不固執，立刻改正。所以，當時雖然處在像熱病一樣襲擊着學生的福本主義的龍捲風里，卻只是千方百計地設法提高自己，而對左翼陣營絲毫沒有感情用事，採取對立的、反動的态度。但另一方面，也沒有盲目拜倒在福本主義面前。福本主義的內容畢竟是和馬克思主義毫不相干的東西，後來大家從夢中醒來，就像丟掉破鞋那樣把它拋棄了。本來，不論周圍怎樣敲鑼打鼓、大叫大喊，如果不是從心底里贊同，就不跟着跑，這是我的性格。因此，儘管虛心坦懷，我也未便同青年學生搞在一起謳歌福本主義。由於這種原因，我在這個時期，自然被看作不論在思想上還是行動上都和學生們的社會科學運動完全無關的人，而撇在一邊了。

當時許多學生，都把福本的文章的一個一個要點囫圇吞棗地背得滾瓜爛熟，動不動就在研究會或其他會上把它搬出來爭論不休。對於這種現象，我即使有所批評，也像箭碰到石頭，被彈了回來。

回想起来，那种十分奇怪的热病，居然在左翼运动中风行了一时，也真叫人莫明其妙。但是，当时受到福本主义的影响的不光是学生。1926年底，日本共产党在山形县五色温泉召开了組織工作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刚从外国回来的高等商业学校教授福本和夫，竟被推选为中央委員之一。

总之，由于这种关系，我和当时的社会科学研究会，不論在学术上或实践上，都几乎不发生关系。当年的种种一言难尽，我将留待其他的机会再写。这里只把上面所說的情况交代清楚就可以了。

1926年1月京大事件的逮捕，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的。当时我也受到牽連，住宅遭到搜查。下面要說的，乃是以后的事情。

发生了所謂京大事件以后，学校当局对于社会科学研究会这个組織，十分感到棘手。事情要是发生在1940年而不是1926年的話，那末，不容分說，研究会早就被立即解散了；可是当时却不好那样做。大学是以研究真理为使命的最高学府。既然要研究真理，就必须摆脱一切强权束縛，保持自由的精神（虽然这种自由，随着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換句話說，随着资产阶级的安全感日益受到威胁，而愈来愈遭受野蛮剝夺）。这是学校一贯的信条。当时这种传统依然存在，沒有被推翻。所以既然称为研究会，学校当局就不好一味蛮干，把它解散。可是在另一方面，对于有大批入会学生触犯治安維持法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又不好置之不問。

学校当局无計可施，最后作出新的规定，规定凡是学生組織的研究会，原則上都要有固定的教授加以指导。并且决定允許社会科学研究会繼續存在下去，不过也要照这个原則办理。

这样一来，社会科学研究会的指导教授，就只有我来担任了。

因为除了我以外，不会有哪位教授肯来承担这份麻烦工作。但是，前面我已经说过，对于当时那些趾高气扬的学生来说，在思想方面我并没有任何威信。再说，朋友也忠告我：“如果无条件地接受了指导教授的名义，对今后发生的问题负起全部责任，这可是一件麻烦事，所以还是好好考虑一下再作决定为是。”因此，我当时没有立即答应。

就在这时候，有一天校长把我叫去了。当时的校长是医学博士荒木寅三郎，如今他已经高升为枢密院顾问官。——这篇文章的引子挺长，其实我要讲的，主要是我被这位荒木校长叫去之后，同他在校长室见面的很短一刻工夫的回忆。

荒木校长把我叫去后，对我说：“现在想请你担任社会科学研究会的指导教授，什么责任都不要你承担，请你千万不要推辞。”然后又说了一句：“请你务必担任下来”，说完就站起来十分郑重其事地给我鞠了一躬。我是个瘦高个儿，脑袋圆而小。他和我正相反，又矮又胖，脑袋大得出奇，据说连合适的帽子都很难找到。而且，他那大脑袋的顶上，光秃秃的，几乎一根头髮都没有，看到的只是凹凸不平的红红的肉疙瘩。我见他那样郑重其事地对我鞠躬，几乎要把大脑袋碰到地面，不由得吓了一跳。所谓“俗子俗到骨，一揖已溷人”，大概正是指这种行礼方式吧。我有生以来还没有见过一个穿西装的人在西式房间里把腰弯到那么低的。虽然那是一瞬间的印象，却深深留在我脑子里，直到十六年后的今天，这个记忆仍然驱使我写出这段旧事。当时虽然旁边没有第三个人，可是我却觉得他真是没出息到了家，甚至对周围的墙壁都不免要害臊。我讨厌他的举动，可是又一想，既然年纪比我大十四、五岁的老校长，对手下的一个教授这般卑躬屈膝，想必他心里有说不出的为难，于是一下子可怜他起来，二话没说，就答应担任那谁都不愿干的指导

教授，退出了校长室。那时我还多少有点得意，可是现在一想，当时在我退出校长室的时候，荒木一定在我背后把舌头吐得长长的，做过鬼脸吧。（后面就会交代，两年以后，荒木劝我辞职的时候，就把我担任社会科学研究会指导教授这件事，作为理由之一。）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另一桩事情。为了克服一切困难使经济学部尽快地实现独立，我曾经带着给文部省的陈情书，跟荒木校长去过东京。当火车快要到达东京站的时候，荒木好像突然想起般地叮嘱我说：“喂！明天到了文部省，可不要乱摆大道理呀！那些当官的，即使让你用大道理说服了，他们也不会照你的意思去做；凡事应该多说几句拜托拜托，多点头哈腰才行！”现在想来，荒木的处世方法，就是为了打动对方的感情，自己先打躬作揖。因此，他尽管卑躬屈膝，把大脑袋碰到地面，其实心里却分毫也没有感到为难的地方；当年是我上了他的当。

仅仅为了研究会的指导教授这点儿小问题，就打九十度的大躬，对他手下的人做出那副没出息的模样，使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如果碰到更重大的切身利害关系的时候，他必定会向朱门权贵作出更为难堪的丑态，经常讨对方的欢心吧。就像这样，他一生全仗着把他那稀世的大脑袋一次次往地上碰，才从岡山医学专门学校的病理学教授爬起，到将近七十岁的时候，终于爬上了枢密顾问官的显要职位。枢密顾问官是特任官，也是终身官。他现在已经快八十岁了，既然爬上这么高的地位，可说已经保稳了这个身分：除对天皇之外，再也不用对任何人俯下他那个大脑袋了。仔细想起来，他也可以算是一种成功的人。尽管像我这样的人一辈子瞧不起他，可是对他来说，自然是丝毫都不关痛痒的。

据说从前陶渊明做彭泽县的县令，郡里（中国郡比县大）派来一个督邮，手下的人告诉他，要束带去谒见，他慨然说道：“我难道

能为五斗米折腰，低三下四地去侍候乡里小人嗎？”当天他就交出印綬，离开了那个县。像他那样的人，是千載难逢的。可是，像荒木寅三郎那样深得折腰之妙的人，在学者当中恐怕也算得上是稀世之珍吧。

我担任社会科学研究会指导教授的第三年的3月里，发生了众所周知的逮捕日本共产党的所謂三·一五事件，前前后后有四百五十人被提起公诉。其中果然也有不少人是京大社会科学研究会的會員。我本来和这个事件毫无关系，但是因为我是一个受人瞩目的馬克思主义学者，早就遭到社会上的議論，自然当局也就借这个机会考虑到我的去留問題，报纸上也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謠言。我当下就拿定了辞职的主意，家里的人也同意我这样做。事情摆得很明显，在当时那种形势之下，还毫无顾忌地公开宣称自己信仰馬克思主义的人，是不可能长久留在大学教授的位置上的。如果我对大学教授的地位多少有点留恋的話，我早就会采取适当的避禍方法了。现在我唯一关心的問題，就是采取什么方法辞职，才不致辱沒大学教授的地位。主动地辞职呢，还是坚持到最后被免职？不管怎样，事情总要做得妥妥当当，这对我是最重要的問題。

4月16日，吃过午飯，我正在院子里拔草。我妻說学校来电话叫我去。我說：“终于来了么！”就走出了家門。

我在学校里面的我的研究室里同荒木校长和經济学部資格最老的神戶教授会了面。他們两人一开头先強調說，今天是以朋友的資格相见(当时經济学部的教授里，东京帝大毕业的只有神戶和我，平素来往自然相当密切，常常一起带着爱人去看戏什么的。所以神戶說他是我的朋友，一点也不奇怪)，然后校长說文部省希望我辞职，理由有三点：第一，我在《馬克思主义讲座》的宣传小册子里发表的短文章有欠妥之处；第二，普选期間我在香川县的演讲有

偏激之处；第三，我担任指导教授的社会科学研究会会员中有违反治安维持法的嫌疑分子。我当即回答说：这都是不相干的事；如果仅仅为了这些理由，我不能辞职！后来闲谈了一会，就各自回家了。当时有一位副教授，一直在隔壁侧耳听着，荒木和神户刚出去，他就跑过来说：“不断听到笑声，还以为没有谈辞职的问题呢。”由此可见我在同他们谈话时，是多么若无其事了。

回到家里，法学部教授佐佐木和末川两位已经在会客室等着我。他们问我怎样办的，我说我拒绝了辞职，他们说这样也好。可是他们又说，那天上午经济学部开过教授会，作出了要我辞职的决议。法学部那天上午也停了课，接二连三地开教授会；经济学部教授会讨论了些什么，已经愈来愈清楚，反正作出了那样的决议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因此，劝我好好考虑一下。我听了这番话，当下随即就决定辞职。因为我一贯主张大学自治，这个决议既然是经济学部自己作出的，那末不问其理由是否充分，我认为都应该服从。

原来，荒木和神户之所以一致强调以朋友资格相见、对教授会的决议只字未提，是因为他们考虑到如果一谈之下，我就提出辞呈，那末教授会的决议就不用公开，谁都可以不得罪谁。这种作法的根本用意，是推卸个人责任。多够朋友呀！

我虽然决定辞职，可是为了慎重起见，却给神户打了个电话，问他教授会的决议究竟是怎么回事。岂知来接电话的这位“朋友”，尽管上午自己也是参加作出这个决议的一分子，现在却一口推说不知，要我去问学部部长。于是我又给学部部长打了个电话，哪里知道据说他既不在学校，也不在家里，上哪儿去了也不清楚。——本来，今天的被迫辞职，我在十年以前早有了思想准备。在这样的时世，教授会不论作出什么样的决议，我都不至于抱怨。我所

希望的，只是把事情弄弄清楚，出处进退，求个光明磊落。我起初总以为他们会理解到我这一点心意，岂知事与愿违，同事们全都躲躲闪闪，尽量来个一问三不知。（到现在照旧和我来往的河田教授，那时刚巧不在，没有出席那次教授会。）

最后我去校长室找荒木，才算正式问清了经济学部教授会的决议，同时我声称：既然教授会议决要我辞职，我就提出辞呈。顺便我还问了他一句：“得再请问一下，先前您说您是以朋友的资格跟我谈话的，既是这样的话，直到最后您也没有以校长的资格对我讲过什么话，是不是？”这时他拍了一下他那大脑袋，说道：“啊，那些话你就全当作是校长说的吧！”说完就嘿嘿地笑了起来。那副态度简直厚颜无耻到极点，我心头直冒火；荒木看到我直挺挺地站在那儿，说：“唉，不忙嘛，再谈一会儿嘛！”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声音，也是最后一次看到他的秃头，不过直到今天我仍然忘不了当时的愤怒。如果我是个市井无赖，当时准会对准他那大秃头狠狠揍上几拳，然后扬长而去。

回到家里，我马上写了辞呈。说明辞职的理由，是根据教授会的决议。依照一直等在会客室里的佐佐木和末川两位的忠告，我把辞呈油印之后再提出去。这样作，为的是怕那个破坏了多年来的惯例、连决议也不记在会议记录簿上的教授会，窜改我辞呈上的文字。大学里的同事，到了紧要关头，竟然会靠不住到如此的地步。陆放翁的两句诗“险诈沾沾不愧天，交情回首薄如烟”，正是指的这种情况了！

教师自画像

《岩波文库》丛书最近出版了一本喀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译

者石田宪次送了我一部。我写信去表示谢意，译者因此又写来了一封回信。其中有这样一些话：

“……这些话，也许已经说过一次了。这里不怕您厌烦，再说一遍。记得在和老师您还不大熟悉的时候，我就把您领到清水去玩，浪费了您整整半天的宝贵时间；有时去您的研究室或家里访问，本来没有什么事情，却一坐就是半天，使您很为难；有时还带一些无聊的稿件去麻烦您。直到现在我还常常要回想起这件事情，特别是当我的学生或别的人，把我过去对待您的种种加到我身上的时候。遇到这种时候，我常常感到烦躁，心里恼火，也时常同亲近的人谈起学生和毕业生给我吃的这种苦头。但是在这种时候，我一想到您对我的无限关怀和爱护，就觉得自己也应该对晚辈亲切一些，而尽量控制自己的急性子。我想这样一来，就可以把纪念老师对我的爱变成自己的爱，而传给一些晚辈吧。应当说，我是在您的锤子下面锻造出来的。

“我不知道今后自己能为别人作出多少有益的事情，但是即使粉身碎骨，也要尽量发扬光大您的精神。人和人之间的爱情和关怀是超越主义、学说的，您说是不是？”

“……京都方面的变化也很大。12月3日是小岛先生的六十花甲，他说要申请退休。我如果能顺顺当当地工作下去，那末到退休还有八年多。在这八年多之中，我要尽力多作些有意义的工作。在我退休以前，不，在我去世以前——死神来得早或晚，是无从知道的，——我一定分秒必争，多少为别人作点有益的事情。这一点，我想您也会赞成的吧。说了这样一些突如其来的话，自己也觉得幼稚可笑，难以为情，不过我想您会理解我的心情的。请原谅我的冒昧。”

石田现在是京都帝大文学部的元老教授。这段回忆，大致是

他还在文学部当学生时候的事情，算起来已经是二十余年前的事情了。当时我是经济学部的教授，和他并不是直接的师生关系，而今天他却将这种二十几年前的回忆写出来寄给我，实在叫我高兴。当然，他对我留下这样一段记忆，这完全是由于他的心地善良，丝毫也不表示我了不起。但是，这类文章如果把它在杂志上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加以发表的话，那末不管写的人的主观意识如何，总是容易成为自吹自擂，仿佛告诉人家说：“你们瞧，哪怕这点儿微不足道的恩情，我也念念不忘哩！”再不然就成为一种自夸自奖，仿佛告诉人家说：“你们瞧，人家一向多么看重我呀！”总之；不论写的是些什么话，看了总不会使人单纯地感到喜悦；而石田的这封信，却是一封私人信，并不是写给第三者看的，所以，我照字面领受他的盛情。一个人即使实际上不值得人家对他抱好感，但知道别人对自己抱有好感，也总会感到高兴和喜悦的，尤其是到了老年，体衰力竭，日暮途穷，面临着结束一生的时候，更是这样。相反地，如果回顾自己的一生，给人留下的全是些怨恨，那该多么寂寞和悲哀啊！

石田第一次发表的译作是纳斯钦的《给后来的人》。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当时我曾对这部翻译在文字上多少加以润饰，并且还介绍出版的书店，帮助做校对工作。正因为这样，说实话，我原以为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译者至少应该来道谢一番。哪里知道有一天石田板着脸，气冲冲地跑进我的书斋，开口就说今天是故意穿得很随便地跑来的，身上连围裙也没有套一条。我不知道他要说什么，原来是质问我：“听说您对别人讲，那本书译得并不怎样好。有意见不直接对本人提，却在别人面前说坏话，这不是太无情吗？”当时我正忙得紧（大概是正在准备第二天的功课），听到他这句话，当下勃然大怒，说道：“既然你这么不满意我的行为，那末从今天起我们就绝交好了，现在你就请回去吧！”说完就站起来，把

他送到門口。他沒想到我會來這麼一手，二話沒說地從二樓走到門口，可是似乎不願就此離開，就說：“我錯了，請您饒恕！不然我就不回去！”說完就在門口的洋灰地上跪下來了。我妻吃了一驚，跑出來怪我說：“對年輕人发脾气，這麼大的年紀都白活了！”回想起來，當時還曾有过這麼一回事情。固然，當時兩個人的舉動都不近人情，但是，我覺得那多少近乎父子或者兄弟之間的爭吵。隨着歲月的推移，這場風波，大概對石田來說，也成了十分有趣的回憶之一。這完全是由於石田具有值得尊敬的性格的緣故，我不能不對他表示感謝。

我從東京帝大畢業之後、在學院學習的時期，一位名叫松崎藏之助的老師，給了我特別的照顧。可是不幸得很，偏偏這位早已去世的恩師，沒有給我留下什麼好的回憶。

當時松崎先生在小石川區買了一所漂亮的住宅，搬住了進去。那房子非常闊氣，簡直與大學教授的身分不大相稱；房子的構造，對於過學者生活的人來說，也很不方便。一進大門，靠右手是一個白粉牆的庫房，迎面是便門，左手才是正門。進了正門，就是一個小小的西式房間，這兒本來似乎是來客被接見前坐候的地方，壁上掛着岳飛的字的拓本，冬天升有火爐；松崎先生平常總在那裡接見學生。穿過這間屋子，是一條曲曲彎彎的長廊，那裡有一間雙開間的日本式大房間。這才是真正的會客室。它的前面是一個漂亮的大庭園。這一帶恰好是小石川區的高地，面對江戶川，形成了一個陡坡，所以，面向庭園的這個會客室，顯得特別高敞。庭院里有池子，有松樹，還有石燈籠和石雕仙鶴等等。可是松崎先生的書房，只不過是個鋪四張半席墊的小房間，和前面的會客室有走廊相通，房間陰暗得簡直像一間貯藏室。至於圖書資料，却全部收藏在離書房

很远的大門口右边那間庫房的二楼。归根到底，这栋房子是不需要书房的人盖的。

松崎先生搬到这里不久，我曾到庫房二楼上帮他整理书籍。一清早干起，干了一个上午，到吃午飯的时候，只給我一碟飯糰，让我在門口的会客室里吃，他自己却和他的家属在里边吃。到现在我还清清楚楚地記得：当时因为从早晨就开始整理图书，搞得滿手都是灰尘，在取食飯糰之前，連个洗手的地方都沒有。搞完工作临回去的时候，松崎先生送了我一本很薄的德文小册子。內容十分无聊，我始終沒有讀过；但是由于是先生送的，所以长时期来一直保存着，說不定到现在还收藏在我寄放在京都的图书里呢！

松崎先生常常写明信片把我叫去。一去，就要我代他写东西。有的时候，口授一下大概的意思；有的时候，把演讲的速記交給我整理；由于里面有很多地方前言不对后語，为了把它改通順，我費了不少心血。有的时候，他只告訴我一个題目，整篇論文都由我来写，写好之后，往往只字不改，用他的名字发表。那时我刚刚結婚，生活相当困难，有时我妻連洗澡錢都拿不出；可是，他却从来沒有給我分文的报酬。

还有，我在学术研究上也沒有得过他的指导。可是我的职业，前前后后却都是他介紹的。到后来，他介紹我担任农业大学实科讲师，专科学校讲师，台湾协会学校讲师，学习院讲师，《国家学会杂志》編輯委員等，使我得到相当多的收入。这是他給我的最大而且是唯一的恩惠。按照一般的想法，代为介紹职业是給解决吃飯問題，是最值得感謝的；既然我的工作全是他給介紹的，那末，为他的著作和論文帮些忙，照說是应尽的义务；可是像我这种性情乖僻的人，即使现在回想起来，对于当时那位老师也不十分感激。那时候，我在各个学校担任的課程真是五花八門，有經濟原論、农政

学、工业经济学、交通論等等；为了备课，一年到头忙得不可开交，用在自己想搞的研究工作上的时间，少得可怜。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常常给我摊派一些临时性的工作，这对我来说，实在不是一件什么值得感激的事。后来好不容易盼到大暑天，各学校放了假，我才每天带着盒子饭，到上野的图书馆去从事研究；当时来往途中的那种苦头，到今天仍然记忆犹新。

老师的作风，人们并不一定照式照样地加以继承。现在回想起来，我当了京都帝大的教师之后，作风恰恰和自己的老师背道而驰。

首先我在京大任教的将近二十年中间，可说一次也没有为青年们介绍过职业和位置。固然，把个别的人推荐给学校或其他研究机关，这是有的；不过这多半是为学校或公共机关的利益着想。即使说考虑到被推荐者的个人利益，那也是从大局着眼，为学术界爱惜他的才学，决不是为了给他解决衣食问题。所以，即使被推荐者本人感到受了照顾，我这方面却根本没有要他们领情的想法，事后有时竟忘得一干二净。所以，如果从找职业、谋位置的观点来看，不用说，我这个教师是非常不热心的，甚至是极为冷酷的。特别是向直接和我有关系的大学推荐人的时候，我采取了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不论对方和我私交怎样好，我也从来没有因为这种关系而考虑到那个人的请求，因为我深信，向大学介绍人，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大学的发展前途。记得在这个问题上，曾经得罪过几个人。至于没有被自己发觉的，恐怕就更多了。

说起来，介绍职业，对于研究学术的人来说，其实是个很大的负担。要想广泛地照顾门生，平素就不得不和学术界以外的形形色色的俗人保持来往，这样一来，一年到头就要浪费许多时间，除

此之外，还要常常为学术工作以外的杂事劳神，这对专心钻研学术是有很大妨碍的。因此，我为了增进自己的学問这个自私自利的目的，这类麻烦事情可以說一概不願过問。不过我觉得，这样作的結果，日后就有可能借学問的力量，对更有利于人民群众的事业作出貢獻。我相信这才是一个学者应有的生活方式。这种看法，我至今认为沒有錯誤。因此，有些大学教授，一方面在生活上經常照顾門生，另一方面却把他們当作佣人看待，使他們負起封建性的义务——我一看到这种大学教授，甚至就感到一种憤慨。

我虽然沒有为人家介紹过职业和位置，却經常为別人的論文和譯稿煩神。在这項工作上我牺牲的时间說不定比任何一个同事都多得多。在这方面我敢自豪，我是一个非常亲切的教师。

我几乎从来沒有用自己的名字发表过別人的著述，不过生平却有两次例外。一次是我去京大任职以前出版的华格納的《經濟学原論》的譯本。这本书是现任伪滿洲建国大学副校长作田壮一譯的。当时他由于某种情况需要整笔款子，于是决定用我的名字由同文館出版这本书。而我呢，因为不久就把全副精神投入了无我爱运动，沒有工夫再看他的譯稿，結果一字未改，就把它出版了。翻閱一下，該书是 1906 年 7 月发行的。

另外一次是給《經濟学大辞典》(也是同文館出版的)写的有关日本經濟思想史方面的各个項目(太宰春台、荻生徂徠等)。确切的年代現在已經无法查考，不过該辞典是我到京大任职以后不久問世的，所以大致同样是 1912 年以前的出版物。这部《經濟学大辞典》里所刊载的这些項目，虽然由我署名，其实却全是小島佑馬写的，我一个字也沒有加以修改。因为稿子写得很好，并沒有加工的必要。小島今年也六十岁了，再过十天，就要辞去京大文学部教授的职务了(我现在这篇稿子是 1941 年 11 月 25 日写的);当时他

自称“抱关击柝”^①，情願作中学教員，靠教汉文和法制、經濟来維持生活。他很早就坚持不靠大学、独立钻研的学习方針，从而在购买汉文书籍上，經常要花不少的錢。那一次，也是因为他在这方面需要錢，我就把自己应承下来的給《大辞典》写稿的任务，全部让給了他。可是，后来無論費了多少唇舌，他只肯收下稿費的半数。結果沒有办法，我只好买些墨送他。总之，就像这样，我仅仅让人家借用了个名字，人家就硬給了我稿費的半数。文章让别人写，而我白拿稿費，平生就只这一次。通常，即使为別人校改譯稿費了很大的功夫，几乎等于自己重譯一遍，我也从来没有剝削过別人的稿費。在这一点上，我也是和我的老师的作风背道而馳的。

順便提一笔。听說小島一辞掉京大教授的职务，将不顾別人劝阻，馬上帶了家眷回到故乡高知县去。他现在除了担任别的职务外，还兼任着京大附設的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我认为这个研究所的所长，除了由他担任外，沒有更合适的人。所以大家再三請求他繼續留在京都，不是沒有道理的。但是我相信，任凭大家怎么挽留，也阻止不了他的南归。因为这是他几十年前就已經确定好了的方針，并且正是为了这个緣故，才搜集了万卷图书。摆脱一切俗务而专心讀書的日子，现在总算盼到了。我不能不为他晚年的清福而祝賀。遺憾的是我生活困难，凡事力不从心，只能致送古墨一錠，略表祝賀的心意。那錠墨的包装紙的正面写着“明墨五桂燕山”，背面写着“文久三年^② 癸亥秋日，中村公所賜”。这是一位朋友送給我的传家古墨。

在上文中，我似乎把老师的形像刻画得过于丑恶，而把自己的

① 意思是做看門、打更之类的較不重要的工作；語出《孟子·万章下》。——譯者

② “文久”是日本的年号；文久三年就是公元1863年。——譯者

面目描繪得过于美好了。不过在我看来，口头上的一套恭維，言不由衷的謙虛，乃是凡夫俗子的恶德之一。我认为一个人对任何事情都該讲真話，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說，即使說錯了也沒有关系。說实話，自己觉得作为一个大学教授，我够得上算个好教师。

好，索性再让我自画自贊一番吧。

1937年8月，鈴木安藏在杂志上发表的《回忆从前的老师》中，有这样一些話：

……不用說，由于这种关系，当时我虽則在文学部讀書，后来同河上先生在思想上、学习上都开始了接触。当时我经常考虑着唯物史观和伦理学、馬克思和康德的关系之类的問題。因此，我想閱讀一下登在《新时代》杂志上的考茨基和奥托·鮑威尔写的有关伦理学方面的文章。于是我就拜托河上博士給我借这本杂志。博士那时写給我的明信片，和我闊別了十二、三年，最近又回到了我的手里。本来当时因为学生事件，住宅遭到搜查，筆記和信札等全被扣留，經過再三交涉，才算免于毀灭。就在那些信札里，意外地发现了博士写給我的两张明信片。

一张是1924年10月30日写的——

“……我突然决定今天去和歌山讲演。前后要忙碌两三天。上次答应給你借《新时代》，自然也要推迟到下星期再办。請原諒。”

另一封，上面盖着11月8日的邮戳——

“《新时代》已經借来了，在我家里。明天上午或者下午三点以后，請光临。匆此致意。”

这不过是两张普普通通的明信片。但当时在大学院学习、后来做了副教授、不幸早死的五十嵐信（那时我受着他的照顾），有一次很惊讶地对我說：一个教授而不厌其烦地写这类明信片，說明这个教授非常热心待人，再不然就是特別鍾爱門生。我当时还不是河上先生特別鍾爱的門生，所以这充分反映了先生为人的誠懇，直到今天，我仍旧忘不掉。

这类事情只有別人还記得，我却忘得一干二淨了。另外还記得，两三年前整理櫛田夫人所保存的、我过去写給她已故的丈夫櫛

田民藏的书信的时候，发现了两张明信片：

“屢次請假，真不好意思，然而这两天又发生了急待处理的事情，沒有工夫备課，所以明天又不能到校上課，还請不要见怪。另外，大稿还沒讀完，請原諒我的懶惰。草草。河上肇”

这张明信片上的邮戳，是 1910 年 12 月 4 日的。下面这张，寄发日期是 1911 年 1 月 15 日。

“明天不上課。河上肇”

櫛田是 1908 年 9 月进京大的，从那以后，他就經常来我家。我写明信片的时候，他已經是三年級的学生，不用說，当时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学生。但是，当我翻閱自己写的旧信、忽然发现这样的明信片的时候，因为時間已經隔了三十多年，尽管是自己的事情，我也只觉得是別人的事情一般，不由得自己都佩服，这真是一位热誠的教师！

最后让我引用近卫文麿公爵的《清談录》（1936 年 8 月印行）中的一段話来結束这篇随笔吧。究竟是公爵身分，即使談論往年的教师，措詞也相当沒有礼貌。

“当时的河上，已經在研究馬克思，經常对我們說‘必須能讀通馬克思的著作，否則就不行’，却并不极端左傾。到他家里去作客，总是把我領去书斋，围着火鉢，吸着旱烟，心平气和地和我作長時間的談話。

“那时他送了我两本书。一本是斯巴尔戈的《卡尔·馬克思的生平和事业》（按：“生平和事业”是不通的；原书名大概是 Life and Works，譯作“傳記和著作”可能較為妥当）。一本是意大利都灵大学教授罗利亚著的《现代社会問題》。

“关于后者，交給我的时候他还說：‘这本书非常有趣，讀了就放不下手，我一夜就把它讀完了’。記得当时我也兴奋地一口气把

它讀完了。

“想来，那时河上也許还在努力学习馬克思主义，和实际运动还没有发生关系。不过嘴里老讲‘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人，应当經常做好被驅逐出国的精神准备’。

“在京都的时候，差不多有一年工夫經常到他家里去，后来他被派到欧洲留学去了。……”

我去欧洲留学的日期是 1913 年 10 月，所以近卫公爵到我家里来，我想大概是在 1912 年到 1913 年这个期間。送书的事我已經不記得了。不过，看来老师給的东西，印象总比較深刻，就像我没有忘記松崎先生送过我小册子那样，近卫公爵也記得我送过他书，而且事隔二十四、五年，至今連书名和作者他都記得一清二楚。这种地方，也許正可以說明教师具有特別大的影响力。不过，当时我生活还相当困难，怎么会把这类书送給他呢？这就弄不清楚了。只記得斯巴尔戈的馬克思传是又大又厚的一本书，里边有很多照片插图，不管怎样，总是当时唯一的一本馬克思評传；罗利亚的《现代社会問題》也是一本相当厚的新出版的书。现在想来，当时其实只要告訴他應該买什么书讀就可以了，一个穷副教授，偏偏送东西給有錢的王公大人，总觉得問心有愧。不过，我这个人，是从来沒有普通所說的政治野心的，所以送书給他，恐怕是看在他的公爵門第，影响力相当大吧。記得当时担任財政学这門功課的小川乡太郎，給近卫公爵的試卷打了一百分，自然而然地成了人們一时的談話資料。至于我的送书，却絕對沒有像小川送分数的那种意思。

由于收到了石田的信，就把想到的事情信笔写了出来。这篇东西因为并不准备对外发表，所以似乎无所謂；要是让人家看到的話，恐怕也会引起不舒服的感觉吧。

豆沙糯米糰子和腊八粥

我的祖父才一郎，是 1852 年 7 月 1 日病死在栗林家的一間鋪六张席墊的門房里的。他本是栗林家的第二个儿子，死的时候已經过继給河上家了。但是因为河上家的瀨兵卫夫妇还在世，他就一直住在栗林家的門房里。他身后留下三口家屬：五岁的大儿子源介（就是我的父亲），三岁的女儿朝（就是我的姑母）和二十五岁的妻岩（就是我的祖母）。他去世以后的十几年里，我祖母日夜废寝忘食地辛勤劳动。到了 1867 年时，总算熬出了头，大儿子源介已經滿二十岁，成了吃十九石祿米的成熟的武士，大女儿朝也成了十八岁的大姑娘。

就在这一年，我的姑母嫁給了藤村家。查一下家里保存的呈文底稿，其中有这么一张：

“藤村十郎兵卫长子规矩太郎，願聘吾妹为室，經余同意，已將婚約訂妥，伏望賜予批准，并轉請組長兼重重次郎兵卫垂察，一切望鼎力玉成为幸。此呈。

庆应三年①丁卯四月十一日

河上源介”

底稿上还追記了“4 月 27 日批准”的字样。

姑母沒有生小孩。后来不知为什么，在 1877 年 10 月 27 日，和藤村离了婚，回到娘家。那时她二十八岁。

可是，两个月以后，即 1878 年 1 月 5 日，她又嫁給一个叫做玉井进的。这个人当时在山口县衙門做事，所以姑母也跟着去山口

① 就是公元 1867 年。——譯者

了。

姑母嫁给玉井家那年，父亲已经三十一岁了，这一年的6月15日，他和同族河上又三郎的第二个女儿鹤结了婚。那就是我的母亲。她生于1862年8月，结婚时才十七岁，十足年龄才只十五岁零十个月。

我是1879年10月20日生的。因此，前面所说的那些事情我都没有亲眼看到。

但是，关于姑母的最初的印象，根据后面所说的情节，可以追溯到她嫁在藤村家的时代。小时候，祖母曾经带我到姑母家去过几次。

我家住在锦川河堤的近旁。沿着河堤朝着城山的方向走不多远，有个渡口。打这儿搭船过河，就是河西地区。姑母家就在河西的山地那边。过了河，先是街镇，走不多远，向右拐进一条胡同，那一带就是城山的峰尾山脚，所以路越来越陡，要翘着脚走路才行。从阴暗潮湿、林木苍郁的坡路往上走去，路的右边是一条挖得很深很窄的横沟，沟底流着碧清的水。姑母的家就在路左。我记得姑母曾让我在她家楼上看书。现在给儿童看的小人书出版得很多，普通人家的小孩，很早就能看到五颜六色的美丽的图画书；可是在半个世纪以前，当我小的时候，却根本别想看到这种东西。而且，据说我父亲开始当家的時候，我家从上代传下来的，除了房基之外，就只有当票。家境惨得如此，图书之类自然一本也没有了。所以，偶尔能在姑母家楼上看到的那些书，引起了极大的兴趣。那些究竟是什么书，现在一点印象也没有。只记得是些线装书，里面画有各种花卉。看来，当时我对那些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从来没有在人家过夜，那天居然说要住在姑母家。祖母虽然不放心，最后还是把我留下，一个人回去了。当时姑母说，晚上煮山薯

給我吃，就把我領到挨着房子的庄稼地挖山薯給我看。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連串长在藤上的紅紅的山薯，从黑色的土壤里挖出来，那情景使我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所以直到今天，那儿的黑土和从黑土里挖出来的紅紅的山薯的顏色，仍然清清楚楚地留在我的印象里。就这样，白天我过得倒挺高兴。可是到了太阳落山的时候，却拚命鬧着要回家。我本是个任性的孩子，既然鬧着要回去，就别指望我能好好睡觉。沒有办法，到了晚上，姑母只好把我送回去。

这些是我几岁时候的事情，已經弄不清楚了。不过，从要住在那儿这句话推测，当时多半还没有上小学。查了一下，我是1884年3月、四周岁零五个月的时候上小学的。而姑母和玉井离婚，是在1881年11月1日；不久以后，即同年11月21日，她又重新嫁到原来的藤村家。当时我是两周岁零一个月。这样看来，这儿所写的，多半是我两周岁零一个月到四周岁零五个月那段时间里发生的事情。我計算了一下直到前些日子为止同我住在一起，现在已經去上海的外孙女儿們的年齡，絢子現在已經四周岁零五个月了，因此我想，即使我现在就死去，她們的記憶里也会留有我的印象吧。

好了，再回过头来談姑母吧。姑母和藤村离婚，后来又重新嫁到他家，中間这段時間，我算了一算，是四年零一个月。在这段時間里，藤村續娶的那个，不知是离了，还是死了，反正我記得他家有个不是姑母生的男孩，年紀和我一样。姑母起初和藤村离婚是在1877年，而我是1879年生的，所以情况是符合的。

姑母重新嫁給藤村的第八年，即1889年的1月25日，又离了婚回到娘家。

姑母嫁了几次都不长久，沒有生儿育女可能是原因之一。論

起年齡來，那時她已經四十歲了。

和藤村離婚的第二年（即 1890 年），姑母又嫁到稻田家。那時我已經十周歲零九個月了。

稻田家在錦川下游，四周是田，離海很近。現在如果乘上山陽鐵路下行火車，過了麻里布站，就是岩國站。稻田家離麻里布站很近，而我家則離岩國站很近。可是，那時候還根本沒有這條鐵路呢！因此，姑母是乘船嫁到稻田家去的。

姑母當時穿的什麼衣服，我完全記不起來了，總之，她是走出家門，越過河堤，穿過竹林里雜草叢生的小路和河灘地的田埂，來到布滿小石子的河灘，然後下船的。那條道人力車無法通行。送親的人想必有祖母、父親、母親，還有我和弟弟。最小的弟弟是頭年生的，當時還不到一週歲，所以我們去送親的時候，想必留在家裡托給人家照看了。

一只鋪着紅毛氈的民船，載着一家人，讓夏天的河風吹拂着，順着錦河搖去；碧清的河水里，香魚和鱸魚在游着。

上岸之後，也許是坐人力車去稻田家的，我現在記不清了。只記得稻田家的大門，大得像廟門一樣，門上釘着獸環那類裝飾品。我們被領到一間廳堂，廳堂的紙門上，貼着大字，使人聯想到演戲的戲台。

稻田家那時已經算是士族了，可是在明治以前，他家的祖上做過一個姓香川的家臣頭兒的家臣，是所謂二家臣，所以門第比我家低。可是，在村里卻是個大地主；住宅等等，在那一帶也顯得很闊氣。

至於家風或者生活態度方面，也就是家庭的氣氛方面，就和我家大不相同。我家窮雖窮，卻保持着武士家風。可是，隨着歲月的推移，姑母終於被她的生活環境同化了，並且終於在這個環境里結

束了她的一生。

姑母既沒有亲生儿子，又不愁吃少穿，可是后来她居然搞起編草帽綆之类的副业，以积蓄几个零碎錢为乐，各方面都逐漸变得小里小气、土里土气了。不过她本人既然对于那样的生活不觉得怎么，而且終老于稻田家（不幸她先于她母亲、哥哥和丈夫而去世），那末最后那次結婚，我想在她可算是幸福的吧。

我虛岁十五岁那年，在家乡的岩国学校（这是升入高中的預备学校）毕业，进了山口高中的預科（当时高中是本科三年，預科二年）。那个时候，我每次回家差不多都要去探望姑母。我記不得是放什么假的时候了，只記得有一次，去看姑母，姑母給我做了外面裹一层豆沙的糯米糰子。

姑母深知我爱吃甜的。所以那次去看她的时候，她就說要做豆沙糯米糰子給我吃，于是让我等着，一个人到厨房里忙碌起来，又是淘糯米又是煮小豆，特地为我做起裹豆沙的糯米糰子来。可是，那时姑母已經在稻田家生活了好几年，完全变成了乡下人，連那煞費苦心做出来的豆沙糯米糰子也完全是乡下味道，一点也不合我这个趾高气揚的高中学生的口味。那糰子大得像干庄稼活的人吃的白飯糰，尽是糯米，豆沙很少，糖也放得不够。再加那时我一天除了三頓飯之外，再也不願意吃什么，所以姑母的那番美意，說实話，反而使我感到左右为难。可是，既然特意为我做了，姑母又再三劝让，所以就吃了两三个赶做出来的大糰子，而后告辞回家。

傍晚回到家里一看，母亲已經备下丰富的晚餐在等我。可是，我因为吃了糰子，再也吃不下晚飯了。母亲挺不滿意地抱怨我說：“你就爱顾情面，誰叫你硬着头皮吃那样的糰子呢！”然而，对我來說，那豆沙糰子是不能不領情飽餐一頓的；今天想起来，那糰子乃

是我一生中所吃到的最值得感謝的食品之一。

人是吃感情的动物。至少我是这样一个人：当人家請我吃飯的时候，总不免一边吃东西，一边辨味对方的感情。因此，只要是对方在他的生活范围内尽心竭力为我准备的东西，即使味道差一些，我吃了心里还是非常感激。与此相反，尽管是山珍海饈，如果用一种扔給狗吃的态度让我吃，那末吃下去也不香。在这种情况下，尽管特地备下丰盛菜肴請我，我絲毫也不感謝，反而起反感。有的时候，这种反感永远不消失，不时使我想起，加以回味，甚至愈来愈觉得难受。

我这种脾气似乎比一般人更加强烈。譬如，尽管是同一个鋪子里买的同样一种羊羹，京都的女儿送来的，吃起来总觉得比朋友送来的好吃得多。有一次，因为味道截然不同，我說两种羊羹一定不是同样的貨色，我妻只是笑笑，不答理我，看来也許是我的味觉受了感情的支配。（这篇文章写完之后，大約过了四个月，无意之間讀到高青丘的一首題作《吳中亲旧远寄新酒》的七絕：“双壶远寄碧香新，酒內情多易醉人，上国岂无千日酿，独怜此是故乡春。”我不由得深深感到：古人老早就道出了我的心事。）

总之，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在将近半个世紀以前、自己童年时代所吃的豆沙糯米团子的味道，到今天还没有忘記。糯米糰子的回忆，永远使我对姑母的形象感到亲切，直到今天还驅使我写出这篇东西来。

不錯，知恩感德的态度是优美高尚的，而怨天尤人的面孔是丑恶可鄙的。但是一想起下面这段回忆也是构成我的自画像的一个速写，丑恶的一面也就不能不順便記錄下来。——本来，因为所要写的不光是自己，还牵涉到別人，我迟疑不决了好多次，总觉得这

种事情，放在肚子里想想倒还罢了，把它写出来可不够妥当，但是最后还是写的願望占了上风，现在就接着写下去。

1923年9月，关东大地震之后，津田青枫把三个孩子留在东京，自己带着一个年轻女人搬到京都来了。当时我在京都帝大当教授，有一天，他忽然来訪，从那一天起，我們就开始来往。（1933年我被捕的时候，青枫曾給杂志报纸写过好几篇文章，談到他和我的关系。1937年我出獄后，他还写了两篇。所以，第一次见面的情况，一定在哪篇文章里詳細介紹过了。）从此以后，我們每个月都要到他的临时寓所聚会一次，作翰墨之游。經常参加的人，除了我之外，有經济学部的河田博士和文学部的狩野博士；法学部的佐佐木博士、竹田博士，文学部的和辻博士、澤村专太郎等人有时也去参加。每次总是早晨就聚齐，一直玩到傍晚才散。每人出五圓会費。午飯叫合适的飯館送来。那时有个半公开营业的旅館赤松屋（当时已經去世的有島武郎，每次到京都来，总是住那个旅館），这个旅館的女主人，每次都来給我們安排一切：替我們研墨啦，照料我們吃飯啦等等。（这位妇人总是希望把我們的书画当作外快带回去。她头上总是挽着一个圓髻，人长得并不漂亮，也不瀟洒，却幫我們活跃了集会的气氛。前些时候听說青枫因为某种关系和这位妇人絕交了，現在她已經去世。）

我在这个翰墨会上第一次学着在宣紙上画日本画。把册頁紙鋪在紅毡毯上，青枫画了一株老梅，叫我往上面添些竹子的时候，我躊躇了老半天，才像幼稚园的孩子那样，战战兢兢地提起画笔。自从那次以后，胆子渐渐大起来，后来曾由青枫、河田博士和我三人合作画过山水，由狩野博士題辞。河田博士只画画，狩野博士只写字，我則又写又画。大概是因为聚会的人搭配得好，所以沒有一個人觉得閑着无聊的。要是有人写起大字来，砚台里的墨一下子

就会用光，所以单是研墨，赤松屋的老板娘一个人也几乎忙不过来。那时正当我拚命钻研經濟学的时代，一个月一次的这种清游，对我來說，确实是沙漠中的綠洲，是繁忙中的小憩，使我感到无比地愉快。这是我平生做过的好梦之一。

后来进了监牢，在鉄窗之下，我常常要回想起这往年的清梦。随着出獄的日子一天天临近，我不断地沉醉于空想：如果幸而能够活着回到家里，此后既然必須断絕同社会上的一切来往，也就可以輕松愉快地常常去拜訪青枫的画室，即使不能举行过去那样的聚会，光和青枫二人写点字，画个画，玩上半天工夫，也够多么愉快啊！到临了，还从监牢里給青枫写了一封信，說出了我的这种想法（这封信，被青枫裱装了起来，后来他曾給我看過）。

1937年6月，我刑期屆滿，回到了自己家里。那时我家租住的房子很小，房租每月仅仅二十二元，地点在东京市西郊（几年前那里还是郊外）的杉并区天沼，隔壁就住着我在牢里的时候結婚的芳子一家。事有湊巧，那儿离青枫的住宅很近，步行只消十几分钟就到了。原来，几年前他从京都搬到东京来，一度标榜无产階級艺术，办过洋画私塾，这时已經改弦易轍，专画日本画，并且卖掉了先前的西洋画室，新置了一所日本式的房子，作为住宅。那房子虽然算不上闊气，却也相当讲究，和我租住的房子相比，不用說有天淵之別。

出獄后过了半年，就是1938年的新春了。当时我非常高兴，因为离家多年，那一次才在自己家里过新年。正在那个时候，正月初七的早晨，青枫跑来邀我到他家去新年試笔。这样一来，早在監獄里就抱着的幻想，終於实现了。于是我立刻高高兴兴地跟他去了。

青枫的画室是楼上一間双开間的房間。我們在那里又画又

写。可是事与愿违，玩得并不像獄中想像的那么愉快。不知怎的，总有一种索然之感，两个人的情绪都不太高。真是时过境迁，人老情淡，当年的好梦终于一去不复返了——我不由得吐露了这样的感慨。

到了吃午饭的时候，我们来到楼下的食堂。这间屋子是青枫最近按照自己的爱好加盖的；我觉得这间屋子和别号“杂炊先生”的他的画有某些类似的地方。他画油画的时候，曾经把日本画颜料——金粉掺合在一起用；而在专画日本画以后，他所使用的画笔，仍然全部是油画笔。至于这间屋子，也是那样；雪白的墙壁和护墙板是西洋风味，而把天花板直接钉在屋顶上，以及圆窗上镶着一樺一樺竹子等等，却是日本茶室或书院的味道。炬燵也做得别致，脚伸进褥子后，下面是空的，就像坐在椅子上一样，脚底下放着脚炉。拉窗外是院子，院子里铺满了白沙，据说这沙还是从京都运来的。

他们把炬燵架当做饭桌，请我吃午饭。青枫、青枫夫人、小姐和我四个人，各据一方，围着炬燵坐下。

我刚从监狱释放出来的时候，青枫就曾在银座的竹叶亭请我吃过饭；至于在他家吃饭，这却是第一次；因而直到这时，我才了解他们家庭内部的情况。使我吃惊的是，青枫夫人和小姐对待女佣人的态度，简直像对待奴隶一样。小姐已经快到上女子中学的年纪了，开饭以前，因为饭碗上沾着点什么，就命令女佣人重涮，女佣人出出进进的时候忘了拉上门，又是一顿叱责，反正在每件事情上，都不住嘴地说些不堪入耳的话责备女佣人；做客人的我，简直不敢抬头望一眼她那可怕的脸色。不过这好像已经是家常便饭，青枫和青枫夫人都并不加以制止。不但这样，就是青枫夫人的态度也有不少同小姐相类似的地方。饭后的点心吃剩下一半，青枫

夫人递给女佣人说：“拿到那边去吃了吧！”我目击着这个动作里表现出来的那副骄横傲慢的态度，觉得在客人面前被他们像狗一样对待的女佣人，实在太可怜了。只因为家里穷，就受到这样的侮辱，这不能不使我感到无比愤怒。处在这种气氛里，我烦躁不快到简直不忍张眼看下去。

前面已经说过，人是吃感情的动物。处在这种气氛里，不论请我吃何等丰盛的筵席，也不会觉得好吃的。不过，我好歹还是拿起筷子，吃了他们请我吃的腊八粥。说句不大体面的话，桌子上除了别致的酱小菜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可吃的菜。馋嘴的我，只好意兴索然地放下了筷子。

人要是倒了运，性情容易变得乖僻。可是，尽管别人可能把我当作穷途落魄的老头儿，或者可怜的倒运人，我自己却不一定这么想。我认为，不论何等的财主富翁或者达官贵人，都不见得能像我这样尽其所能地做自己想做以及必须做的事。而我呢，作为社会成员之一，却始终贯彻了自己的意志。回首往事，我仰无愧于天，俯无愧于地，到今天只觉得自己心安理得，无论什么时候死去都无所遗憾。古人说：“虽然穿着破棉袄，和那些披着狐貉的人站在一起，也毫不觉得惭愧。”我心里就有着这样一点自负。但是，无须讳言，我的名字正在社会上一天天地被人们遗忘，物质方面我是个勉强能够糊口的贫寒人，所以一旦受到别人的待慢，就连从来不在意的琐事，也会一件一件涌上心头。这样一来，我就难免要真正变成一个典型的失意老头子。我可必须注意避免发生这种情况：——我尽管这样警惕着自己，却总觉得那简简单单的腊八粥的招待，是待慢我的表现。

青枫和现在的夫人正式结婚时，形式上是我们夫妇两个做的媒，我们可并没有把这个当做一回事。可是，青枫在我被捕后发表

在杂志上的文章里，口气之中却把他和前一个夫人的离婚以及和现在这个夫人结婚等麻烦事，说成是我们一手成全，还三番五次地说：“我现在仍然对他们感谢不尽，今后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们的恩情。”看到这些话，我起初感到非常意外；到后来，我这个直性子的人，不禁大大钦佩青枫的为人，认为他对于轻而易举的一点儿小事情，都那么感恩不尽。——我当时正是怀着这种心情，第一次到他们家里的。料不到那儿的气氛对我来说，一切都出乎意外。后来回想，我大概是从那时起，才对这位画家的作风以及他的文章的真实性，产生怀疑的。

那年 11 月底，我又和河田博士一起去访问了青枫的画室。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河田博士说要趁这次来东京的机会，再搞一次过去那种翰墨会，我也积极赞成这个建议，于是事先商量好，大家在青枫的画室里画个画、写点字，玩上一整天，午饭在青枫家附近的一个素菜馆桃山亭吃，由河田博士会钞。

那天赴会之前，我幻想着当天的清兴，事先准备了一首诗：

十余年前翰墨间，
洛东相会送春还。
今日复逢都府北，
画楼秋影似东山。

所谓“画楼”，原指涂了彩色的楼阁，这里是借喻青枫的画室；“东山”是指京都的东山。

那时我学作汉诗还不久，诗做得很幼稚，不过当时我倒是确实抱有这样的希望的。但是，正像后面所说的那样，很可惜，对我来说，画楼秋影却没有能像从前的东山。

大家闲谈了一阵之后，就开始画的画，写的写，一会儿已是该吃午饭的时候了。这时候，青枫忽然提议晚上再去桃山亭，在那儿

吃完饭分手，中午就在家里吃点家常便饭。这样一来，想不到我又在青枫家叨扰了一顿。可是这一次不比上一次，菜肴丰盛得天差地远；而菜肴越是丰盛，我心里也越是不痛快。想起正月里那顿腊八粥，再看看这一天的盛筵，真成了鲜明的对照。到这时候，我才知道简简单单的招待不一定是他们的家风。再从当时的气氛和夫人的态度上，我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一种无言的声明，仿佛在说：你一个人是无所谓的，今天主要是为了招待河田博士！佳肴美点一道一道地端上来，而我的心情也愈来愈暗淡。人是吃感情的动物。那一次，我虽然受到盛筵招待，舌头上却永远留着苦味，而且后来越是加以回味，苦味也越浓烈。这或许是倒运老头儿的乖僻脾气吧。可是，这乖僻脾气是毫无办法的！

由于一再尝到这样的滋味，我逐渐和这位画家疏远了。

翰墨会的美梦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监狱里的时候，我本来甚至想过：今后似乎可以靠作画来打发晚年；而今天呢，几乎连拿起画笔的机会也没有了。

写出了上面的回忆后，我曾把它寄给故乡的弟弟，让他读给母亲听。据母亲说，姑母嫁给稻田家，不是 1890 年，而是前一年的 1889 年。我是按照父亲的札记写的，然而据母亲回忆，当时她正怀孕着我最小一个弟弟；这一点，是绝对不会记错的，所以多半是父亲搞错了。同时，我前面说送亲时想必把小弟弟留在家里，托给人家照看，这也是错误的；实际上弟弟当时还没生下。另外，母亲说我们上岸之后，曾经先到稻本客店打尖，姑母就是在那儿换的衣服。上文我提起，从离开家，穿过河滩地，直到上船为止，姑母穿的什么衣服，是不是穿着带家徽的衣服穿过竹林的，这我已经记不清了。结果，经过母亲这样一讲，这些疑团全都消除了。另外，母亲

还說，当时吃完喜酒之后，我們乘人力車回家，岂知車夫喝醉了喜酒，半路上吵起架来，我們都只能下了車，走回家去。

順便提一笔，这篇文章是 1941 年 12 月 10 日謄清完毕的；十天以后，即 12 月 20 日那天，我乘东海道鉄路的火車，从东京把家搬到一別十二年的京都。离开东京的时候，有两位朋友依依不舍，給了我意料不到的隆重招待，使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回忆。但是，有一件事情却使我为之黯然，那就是我和青枫的分別，实在簡單得不像話，人家还以为他是我毕生最要好的朋友哩。本来，我早就把搬家的想法告訴他了。有一天，我带着人家从北京带来送我的玉版笺，去看他，順便向他辞行，他不在家（在此以前，我也曾看过他好几次，可是很奇怪，每次他都不在家；而这一天又不在家）。后来他夫人来信說：“什么时候动身，日子要是定了，請来信告訴我們，照說應該請吃頓飯，送送行，一时又办不到，所以想送点东西，表表心意。”信上还問起现在的女佣人是否带到京都去，說是如果不带去，可否让給他們等等。我对于她那封信的写法，——說什么倘若走的話，想送点东西，希望通知日期，——已經很不滿，但是，到了临动身的时候，还是通知了具体的時間。于是，正当搬行李的人来搬东西、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青枫来了，站在門口說：“內人想請你們吃頓飯，今晚和夫人一块来罢。”那时因为正在忙乱，实在沒法領情，只能謝絕了他。青枫于是随口敷衍了一句，我們就这样在門口分手了。本来觉得自己今生怕再也不会来东京，这一別說不定是今生的永別，却万万沒想到青枫和我的多年来的友情，最后竟是这样結束的。原說要送东西，結果也沒有送来（其实哪怕送一张紙，只要是充滿友誼的礼物，我也会比誰都高兴的）。把这类事情都写了出来，日后給人看到也許会觉得我太卑鄙了，但是，作为《腊八粥》的补充，却不能不把这段事情写进

去。

(1942年2月2日)

大死一番

—

屡次想写这段经历，而且曾经写过一些，不过因为实在难写，半中间一直拦到今天。可是，明天就是我的六十四岁生日了，今后说不定能活到哪一天，因此，我决心从今天起动笔来写。

有两样东西，对我的精神，对我的一生，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一个是宗教，一个是科学。不论在哪方面，我都没有固定的老师，完全像瞎子找东西那样，四处乱摸，结果好不容易才摸索到手；可是，一旦摸索到手，不管别人怎样说，也不管自己的遭遇如何，就永不放弃它，这样一直活到六十四岁。

这里我所说的科学，指的是社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它的内容十分清楚，不消说明。至于我这里所说的宗教，既不是基督教、佛教，也不是真宗、禅宗，而是叫不出名字的、十足闭门造车的东西。

按照普通的说法，马克思主义是否定宗教的。可是我呢，一方面信奉马克思主义，同时却相信有宗教真理，这就是我这个人的特殊的地方。不过，我虽然认为有宗教真理，却不相信什么耶稣降世、西方极乐世界、或者阴间等等，既不念佛，也不坐禅，家中连佛龕也不供一个，整天躺着，也不念一句经。单从这一点看，别人说不定会把我当作一个根本不信宗教的人。我之所以自称是一个承认有宗教真理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我对所说的宗教真理抱有特殊的见解。关于这层，我在《狱中赘语》里写得很详细，那篇东西是

1937年我即将刑满获释时，按照当局的命令，在小菅刑务所里写的。本文后边虽然也许要提到它，但是目的绝不是去重复它的内容。本文只想写出年轻时候的体验，也就是大约远在四十年前，我是怎样掌握了我认为宗教真理这个东西的。

二

从小到大，我在家庭里可以说始终没有受过什么宗教的熏陶。我祖母活到九十六岁，父亲活到八十岁，母亲现在已经八十出头，仍然健在。他们一辈子没吸过烟，所以我家既无烟盘，又无烟袋。和这种情况一样，家里虽然有个供奉祖宗神主牌的简单佛龕，那只是虚有其名，实际上不过是个小壁橱，里面既没有一个佛像，也没有一本佛经。门框上方的搁板上，乱七八糟地放着一些东西，角落里摆着神龕^①。按照祖上传下来的习惯，神龕前供楊桐，佛龕前供芒草和鲜花。新打了酒，得先供神龕；早晨沏了茶，要先供佛龕。天黑以后，神龕前也要点灯。不过这类事情，犹如每天照例要打扫屋子、擦拭地板那样，只是作为日常的固定工作，惰性地做着罢了。反正不论祖母也罢，父母也罢，他们都像没有吸过烟一样，没有抽过宗教的鸦片。

我在不满十四岁的时候，考进山口高等中学校预科，于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开父母，从故乡岩国到县署所在地山口去读书，那时候还没通火车。后来学制改变，被编为山口中学的学生，后来又变成山口高等学校的学生，这样在那里前前后后度过了五个年头。但是，那时山口还是个偏僻的山间小城市，根本没有引起我注意的社会教育方面的刺激：既没有谈论政治的演讲，也没有宗教方面的

^① 神龕供的是日本固有的神，上文所说的佛龕供的是佛教的菩萨以及死了的亲人。——译者

說教。因此，我只能在学校里听到老一套的儒教的讲解，再也没有对人生问题发生过什么疑惑，经常弄弄文学（当时我想当文学家，所以读的是文科），在青春的美梦里度过了五年。

1898年9月，那时我还不到十九岁，考进了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初次来到日本的首都东京读书。顺便提一下，我是在高等学校快毕业的时候，由文科转到法科的。因为那年6月，中央政治界发生了变化（到6月底，日本就出现了第一个政党内阁），我受到它的刺激，就改了学科。现在查看资料，新内阁成立的日期是6月30日；这样看来，毫无疑问，我的决心改变学科是毕业考试前夕的事。从文科转法科，要考法学通论，这门功课本来要读一年，而我因为是文科生，却没有读过，记得临考试以前，我从图书馆里借来唯一的一本《法学通论》，匆匆忙忙地读了一遍。本来，当时学校当局推说没有这种先例，不肯接受我的请求，同时教我德语的登张竹风先生，也把我叫到他的家里，谆谆地劝告我，说我是诗人的性格，不适于搞法律；可是，我却狂妄地说文学不是大丈夫的终身事业，没有听登张先生的话。后来竹风先生在他所写的随笔里，还提到这件事情，那是我年纪将近六十、快要坐牢时的事情了。

言归正传。当时我到东京一看，那里和从前呆过五年的乡下小城市山口可不一样，演讲会风行得很（其实那时演讲会已经在走下坡路，只是我觉得很风行罢了）。等到稍稍习惯于东京的空气，我就开始对演讲会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时每星期六、星期天都有各种各样的演讲和说教在各地地方举行。就像现在每天的报纸上都有《今天的体育运动》一栏，预告棒球、网球的比赛一样，十九世纪末年的报纸上每天都有《今天的讲演》的专栏。我经常根据这种专栏所预告的时间和地点去听演讲。当时我从讲坛上看到的人物当中，下面一些人的名字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里：木下尚江，内

村鑑三，島田三郎，田口卯吉，田中正造，安部磯雄，西川光次郎，石川安次郎，河上清，幸德传次郎。那时片山潜可能主要是在工人当中活动，我属于知识分子，所以在一般的演讲会上从来没有见过他。

最使我感到兴趣的是木下尚江和內村鑑三两位的演讲。他們的演讲給予我思想上的影响，远远超过大学教授的讲课。我对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基督教等的关心，完全是由此而来。

关于木下尚江，我打算把自己的回忆整理一下，另外写一篇专文，这里就不詳細說了。这里只想声明一下，就是，提到木下尚江而不用敬称，我心上是过意不去的，其实我想称他一声木下老先生或者木下老师。

我在学生时代，曾經拜訪过木下尚江好多次，內村鑑三却一次也沒有拜訪过。我总觉得內村鑑三不大容易接近。但是，我之所以能够知道不間断地买《圣书研究》来看，并且讀《聖經》，却完全是受到內村先生的感化。

我幼年时代和宗教毫无接触，就这样地开始通过基督教而走向宗教了。

三

我讀了《聖經》之后，所受到的刺激十分强烈。同讀《論語》、《孟子》受到的刺激有本质的不同，这种刺激，是我从前讀任何一本书都沒有受到过的。

特别是下边一节，初次讀到的时候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弦，并且直到很久很久以后，还是始終以强大的力量支配着我的灵魂。那一节是这样說的：

“有人打你的右脸，連左脸也轉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

要拿你的里衣，連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給他；有向你借貸的，不可推辞。”（《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九至第四十二节）

我觉得这段話就是絕對非利己主义的至高无上的命令。我的良心无条件地向它拜服了。现在想来，觉得很奇怪，当时却絲毫沒有去追究其所以如此的道理，只是內心里叫着：“对呀！对呀！”我认为唯有这种絕對非利己的态度，才真正應該成为人們行动的理想。我还觉得我的內心深处有一种强烈的要求，要我不折不扣地按照这个理想来支配自己的行动。但同时我心里又有这样的疑惧：“你如果抱定这种态度，就不见得能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下去。你馬上就会把自己毁灭掉。”

就像这样，我心里第一次产生了对于人生的疑惑——應該怎样来规定自己的生活这样一个疑惑。我的苦悶就从这里开始了。可以說，这就是我的心的历史的起点。

有許多人之所以对于人生发生疑惑而引起內心的苦悶，往往是由于遇到了某种使自己对人生悲观失望的重大事件，例如亲友突然死去、自己得了不治之症、遭受失恋的痛苦等等；可是我呢，压根儿就沒有遇到这种事件，我是自己招惹的，可以說是在平地掀起的风波。

正在我抱着疑惑过着学生生活的当儿，1901年11月底（当时我已經升到大学的最后一年級），我到本乡区的中央会堂去听“妇女矿毒救济会”主办的演讲会。那是一次非常盛大的演讲会，目的在于募捐錢財衣物去救济足尾矿毒区的灾民。演讲会开到半中間，就用小竹筐收捐款。救济会因为准备給灾民送衣物，所以同时号召大家把用不着的衣服之类——哪怕破衬衫、旧袜子也好——送到救济会办公室去，以便轉送給灾民。我从一个接一个上台演

說的人的口中，受到強烈的印象，那就是許許多多災民都沒有過冬的衣服，正在礦毒地區彷徨。同時，我耳邊清清楚楚地聽到“有求你的，就給他；有向你借貸的，不可推辭”的聲音。于是我二話沒說，立即下定決心：除眼前需用的以外，把所有的東西一古腦兒捐出去。當我退出會場的時候，我就脫下隨身穿的日本服外套、大褂和圍巾，交給了管事的婦女；回到公寓之後，除了身上穿的以外，又把余下的全部衣物都捆進行李，第二天清晨，托一個人力車工送到救濟會辦公室。這些情節，準備在回憶木下尙江老先生的文章中再加敘述，這裡就不細說了。

這簡直是發瘋的舉動（救濟會的人就曾經懷疑我有神經病，這是近年從木下尙江所寫的文章里知道的）；不過現在回想起來，卻覺得自己當年實在可愛。最近有一天，看到老伴翻弄衣服，說要捐給山口縣遭到風災和水災的地區，我却在一旁說：“捐得太多了，當心以後自己沒衣服穿！”年紀已經超過六十，說不定哪天一命嗚呼，然而上了年紀之後，自己反而變得吝嗇起來，說來真是自慚形穉。

當時我自以為做了一件好事，馬上就把這件事寫信告訴了住在鄉家的父母；沒想到母親來信狠狠地罵了我一頓。這也難怪，因為我捐出去的東西，都不是憑自己的力量得來的，全是母親煞費苦心給我做的。比方說，一件外褂，就是母親親手養了蠶、繅了絲，為我織的。結果呢，我却毫不加以愛惜，一古腦兒送了人，現在想來，的確難怪母親要生氣了。（後來我把寫文章積下來的錢掃數捐給共產黨的時候，母親卻沒有發過一句怨言。）

當時我因為挨了母親一頓罵，心裡很難過。我想，《聖經》上說，“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連外衣也由他拿去。……有求你的，就給他；有向你

借貸的，不可推辭”，如果按照這番話去做，我就連父母也無法侍奉了，所以，這番話只好暫時不去聽它。

四

過了幾年平淡無奇的生活之後，1905年12月（這是前述事件發生後的第四年）我又干了一件類似發瘋的事情。但是，那次事情鬧得比較嚴重，問題也獲得一定程度的解決，因而，從那以後直到今天，大約四十年中間，我才能在為人處世方面有一定宗旨，而沒有發生多大的迷惑。

1902年7月（我二十二足歲零九個月時），我在東京帝國大學畢了業。不久結了婚，接着生了大兒子。那時我擔任着農科大學、學習院和專修學校的講師，生活上倒也不愁穿吃。後來我舅父的大兒子（就是現在的日本興業銀行總裁河上弘一）和另外一個舅父的大女兒都住到我家里來，從此以後，家里的氣氛就不適于我工作和學習，于是我決心暫時解散家庭，以便專心埋頭研究，結果把妻兒送到故鄉的父母跟前，自己則租了一間包伙食的房間住下。

我以為這回可具備了專心研究的環境了，因而決心在兩三年內抱着只當是到外國去留學的心情生活下去。万万想不到當我把全副精力（自己的生命）貫注到學術研究的時候，竟產生了一個很大的疑團，那就是：學術這樣東西，究竟值不值得用全副精力去加以研究。這樣一來，好容易安排好一天二十四小時全歸自己支配的環境，却不能充分加以利用。本來，家庭解散以前，住在一起的表弟和表妹白天往往把朋友領到家里來，嘰嘰喳喳地吵得我坐在桌子前面精神也不能集中。因此我主要在夜里用功，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讀書讀到五更天。當時住的是類似大雜院的房子，一牆之隔的鄰家的主人，在炮兵工廠工作。因為他的上班時間很早，他

的妻天不亮就起来研豆酱(和现在不同,那时要在家里把买来的豆酱研碎,因此家家户户都有研槌和研鉢。不用說,东京和京都不一样,无论哪家每天早晨都要做酱湯吃);我每天晚上总是听到隔壁的研槌声才上床睡觉。过去我那样用功,可是一旦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客观地說,这也許是因为离开了家庭,害了一种想家病),我的心却好比丧家之狗,局促不安,根本不能专心研究經济学,多数時間倒反抱着宗教方面的书本独自沉思。

“有人打你的右脸,連左脸也轉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連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給他;有向你借貸的,不可推辞。”我觉得这项至高无上的命令,挡住了我一心一意研究經济学的道路,妨碍我前进。我越来越感到自己为立身处世而选择的研究經济学的道路,归根到底只不过是向着追求个人名利的方向发展,同绝对非利己主义的方向是完全背道而馳的。于是,早就怀着的对人生的疑問——由于这个疑問沒有得到解决而产生的苦恼——就又猛然抬起头来。本来准备把全副精力献給經济学研究,这时却考虑是否应该放弃这个念头了。

我怀着这种疑問,像乞丐一样徬徨街头。我曾經到过九段坂下近角常观所主办的求道学舍听过讲道,还曾經参加救世軍的集会,听过山室軍平的說教。特别是有一天去本乡教会听海老名弹正的說教,印象十分深刻,到现在还清清楚楚地記得。那天我第一次接触到他的风采。头发秃得很別致的窄小的前額,滿是皺紋的細长脸,留得长长的浓黑髭鬚,深沉而清越的声音,又瘦又高的个儿,身上穿的带有家徽的黑色大褂和仙台綢围裙——他那样子,显然和市井俗人不同。可是他那一身衣服却很不順我的眼,我觉得无论是誰,如果真正按照“有求你的,就給他;有向你借貸的,不

可推辞”去做的話，是不会穿那么漂亮的衣服的。

正在徬徨不安的时候，我讀了托尔斯泰的《我的宗教》，方才知道现在活着的人中間(虽說是在遙远的俄国)，居然有力求不折不扣地奉行《聖經》教訓的思想家，因此大为感动。这感动究竟有多么强烈，从我当时所写的一段东西里可以看出来：“1905年11月28日，对我來說是一个非常值得紀念的日子。这天傍晚，我到专修学校去讲课，照例順便逛逛旧书鋪，沒想到在乱书堆里发现了一本托尔斯泰的《我的宗教》。我受到现代伟人之一的托尔斯泰的热烈信仰的影响，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而我最后下定决心抛弃当时的职位，也可以說完全是受了这本书的影响。11月28日因此就成了我最后一次登台讲课的紀念日。”

接着我又讀了伊藤証信編的《无我爱》杂志(名为杂志，实际上是把一张白报纸折成几折的散张印刷品)，于是又知道现在的日本人当中，也有和托尔斯泰走着同样道路的人，从而受到了几乎可以說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到后来我才知道，当时伊藤所提倡的无我爱，主要是认为人們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属于无我爱的活动。撫慰可以培养一个人的仁爱之心；鞭撻可以挫折一个人的执拗；反正无论怎么做，都沒有錯。人們只要明白了这个道理，就能立即获得绝对的平安和幸福。——这种說法，大致上不过是一种叫做“易行道”的真宗教义的现代的翻版而已(伊藤原是真宗和尚出身)。但是，当时无我爱这个名称却使我产生了先入之见，以为他所提倡的，同我所理解的绝对非利己主义是同一回事。另外，他的生活态度也給了我巨大的影响。他本来已經在真宗大学毕业，进了研究科，可是他却辞退了授予他的僧位，抛弃了真宗和尚的一切利益和生活上的照顾，一直住在东京郊外巢鴨的大日堂(那里据說原是叫化子窩)，过着清苦的生活，編这样一份杂志。现在我手头

沒有当时的《无我爱》杂志，确切情况不清楚，可是，在那样的生活环境里写出来的他当年的文章，我想一定充滿着吸引人的旺盛热情。我当时正滿怀苦悶，由于这份杂志的刺激，使我能下定决心，彻底抛弃一直看作是自己終身事业的經济学研究。人們是由于舍弃宝贵的东西而近乎道的。我因为下了这个决心，才得以开始朝大道之門前进。伊藤现在还在編《无我爱》杂志，可是它的内容已經和往年的无我爱不一样了。这可能是为了迎合时局的緣故，反正决不是我所能贊同的。但是，不管怎样，我对当年它給我的深刻的刺激，不能不始終不渝地表示謝意。（我說现在的伊藤迎合时局，或許有点言过其实。他在四十年前就已經主张：“我們的任何行为，不是培养別人的爱情，就是挫折別人的执拗，二者必居其一，所以不必有任何顾虑。总之，不論哪一种活动，它本身就是无我爱的活动。我們因为不認識这一点，所以心里不能泰然；只要懂得了这个道理，我們就会立即得到絕对的平安和絕对的幸福。”而现在他却宣称“天皇所統治的日本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最最可爱的理想国和极乐世界。佛教一向宣传极乐世界在西方十万亿土那边，这不过是因为他們不知道有我們这个日本国而已。所以，只要我們認識到我們的国体的可貴，問題就解决了，就会懂得充当天皇陛下的挡箭牌而战死，就等于进了极乐世界了”。仔細想一想，这不过是往年那种无我爱理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为了适应时局的一种自然发展而已。总而言之，他的根本立場一开始就是无条件地接受现有的一切事物，并不是到了最近他才突然改变了立場。通过他的一生，我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是不容易发生本质变化的。）

可是，以上所述，不过是我走向大道之門的第一步。至于真正走向大道（当时这样想，现在还是这样想）的特殊体验，却是很久很

久以后才领略到的。

为了详细写出达到这一步的过程，我当时选了一个标题，叫做《回顾三年》。如果翻一翻 1906 年春天的《读卖新闻》，那上面恐怕就登有这个书名的新书预告吧。但是，这本书写完之后，并没有送去出版。过去我写东西，向来不管好歹，一律加以发表，从来没有拒绝过要求出版我的文章的书店，而把原稿藏在箱底。只有这部《回顾三年》，算是唯一的例外。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我觉得这种宗教体验，对我个人来说，固然是一件极严肃、极重要的事情，但在缺少理解的人看来，也许只会把它当作疯子的行径，而加以轻视，归根到底，对多数读者不会有什么益处。

那本书写成后，到现在已经快四十年了。我虽然把一切东西都丢光，最近迁居到京都，把过去寄放在女儿家的中国箱子打开一看，却发现那个稿件还原封不动地保存着，不过标题却写成《我的懺悔和我的信念》了。这个标题，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我想，可能是在执笔的过程中，《回顾三年》自然而然地变成了那样的内容吧。这篇文章，现在读起来觉得很幼稚，不过下面我想照抄当时的记录，必要时加上适当的注释。至于事情的发生，是在 1905 年年底，我刚满二十六岁的时候。（下面要抄的，全部属于原稿里《我的懺悔》那一部分。《我的信念》那一部分，写的是伊藤的无我爱理论的真相以及对它的批评。这方面的问题，这里一概不谈。）开头一部分，同上文写过的有很多重复，这里还是不厌其烦地从头抄起。

五

绝对不可以自私自利，这是我经常听到的话，我不止一次地想遵循这个教诲来做人。

但是我又想：如果我彻底放弃自私自利，我一定会饿死，这样

一来，既不能贍养父母，又不能为社会服务，这又有什么好处呢？

因此，我既不能实行绝对非利己主义，又不能信奉绝对利己主义。在这期间，虽然有时阅读志士仁人的传记，而激昂慷慨，但终于没能动摇我的思想的根本。就这样，我对人生没有任何坚定不移的信念，读读书，当当教员，虚度了二十六年零几个月的宝贵光阴。最后我以一个学术研究工作者自许，把发现经济学上的真理作为自己毕生的目的。目标确定之后，我就一心一意直对着它奋勇前进，不分昼夜、心无二用、孜孜不倦地从事教学工作，前后有三年之久。以我这样的浅学，居然能发表三、四部著述，光荣地担任四、五个学校的讲师，这固然完全出于恩师的诱掖教导，然而我在报答这种知遇之恩方面，没有出现大的过错，却全靠不才的辛勤努力。

不久，我又觉得以一个学术研究工作者自许，十分无聊。一个星期要把几十部书的重要部分一一读完，以求不落在这门科学的后面，我实在无法做到。不仅如此，经济学这门科学的理论几乎经常变化，即使自己发表几百部著作，也还是不能借此为社会留下不朽的真理。既然这样的话，自己的事业就毕竟有限。而这种情况，是渴望永久生命的我所不堪忍受的。

飞黄腾达之路并没有堵塞，眼下也并不缺少穿的吃的；前辈都过分奖励我，学生也十分欢迎我，可是我的心却不能平静，总觉得人生的真正意义渺茫不可知，因而经常怏怏不乐。

当时我恰好在给《读卖新闻》写《社会主义评论》，偶然谈到托因比^①的旧事。（按：《社会主义评论》是我当时每天想到一点写一点的连续刊登的东西，因此我那时的思想活动自然而然地反映在

^① 托因比(Arnold Toynbee, 1852—1883)，英国的社会改良主义者。——译者

这些文章里。)托因比是英国的经济学家，一代的仁人志士，不幸壮年夭折。可是他胸中的至誠热血沒有白費，死后人們为他建立了托因比館，专搞貧民救济事业，受到这个机关的恩澤的人，到今天不知其数。想到他的旧事，我不胜感慨，再加上当时自己正摸不清人生的真正意义，所以內心里波瀾起伏，沒有一刻平靜。

正当这个时候，伊藤証信創辦《无我爱》杂志，大力鼓吹，“竭尽全力爱別人的主义”，我讀了之后，深深受到感动。因为不論怎么說，我觉得“竭尽全力爱別人的主义”总應該是件好事，而且我也曾經一再想按照这种主义来做人。可是，事实上我却长时期犹豫不决，沒有加以实行。究其原因，不外是自己认为现在宣传这种教义的人虽然不少，却都是紙上談兵，只說不做，所以这个主义終究不是人类所能实行的。但是现在从《无我爱》杂志上登載的《无我苑生活》看来，他們似乎不光是口头上宣传，而且在亲自实行。这就最有力地打动了我的。

于是，我的前途問題就变得更加迫切。也就是說，我应当繼續做經濟学教員呢？还是辞掉教职，效法托因比，从事貧民教育呢？追求名利呢？还是躬行仁义呢？我必須从中选择一条路。一方面，我一再想拖延这个問題的解决，而另一方面，却又觉得經常有什么东西督促我解决这个問題，一分钟都不让拖延。可是对我來說，放弃教員的职业，决不是一件輕而易举的事情，因此，在这个問題上，我左思右想，費尽了心机，久久还是决定不下来。直到去年 11 月 28 日那天，才毅然下了决心。

1905 年 11 月 28 日，对我來說是一个非常值得紀念的日子。这天傍晚，我到专修学校(按：现在的专修大学的前身，当时在九段坂下附近，就是旧书鋪集中地神保町的一条小胡同里)去讲课，照例順便逛逛旧书鋪，沒想到在乱书堆里发现了一本托尔斯泰的《我

的宗教》。我受到现代伟人之一托尔斯泰的热烈信仰的影响，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而我最后下定决心抛弃当时的职位，也可以說完全是受了这本书的影响。11月28日因此就成了我最后一次登台讲课的纪念日。

我下定决心辞去教职，专门从事贫民教育。不过，决心虽说已经下了，却还多少有些顾虑。因此，我在12月1日那天，就去巢鸭拜访伊藤，可是，没有找到他住的地方，白跑了一趟。我于是在当天夜里给他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我抱着十二分的敬意给你写这封信。

“我读了《无我爱》之后，受到很大的教育，但同时心里又十分不安，十几天来（或者几十天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思索这方面的問題。你說过有什么不懂的問題尽管提出来，因此不顾你的繁忙，想冒昧請教一个問題。不瞒你說，我曾好几次想写信請教，而且有一次已经写了，不过始终沒有寄出。因为我觉得这是应该自己好好考虑而加以解决的問題，所以要寄而沒有寄。

“可是，我急于解决这个問題，因此今天下午终于跑到大日堂，四处打听，还是沒有找到地方，傍晚时分，只得跑回来了。我虽然觉得这也許是上天给我的启示，告訴我这种問題即使不去問人，自己也能解决，却还是冒昧地来向你請教。

“先談一談自己的境遇。前几年，我毕业于法科大学，现在还在大学院学习，一方面担任着四、五个学校的教师、讲授经济学。近几年来，我很想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作出些贡献，所以一直想根据自己所学的东西，研究出一个‘为善易而作恶难’的社会組織。可是，据你說（或許是我誤会了你的意思），設計社会組織这类事情，毫无意义，謀求人类社会的和平和幸福，不用繞这样的远路，只要实行无我之爱，立刻就会达到目的。这样看来，研究经济学什

么的，实在没有什么意义，还不如竭尽全力，来宣传‘无我之爱’了。

“因此，觉得自己现在的职业没有意义；想争取博士学位的自高自大简直太可笑；有一种说不出的苦闷不安，不知怎样办才好。

“不瞒你说，我的收入的一部分得用来供养故乡的父母和正在大学读书的弟弟（按：那个时候，妻子住在故乡的家里，所以我当时可能不时寄些钱给父母。这里所说的弟弟是指当时在理科大学读书的二弟；由于我闹出这场风波，他不得不中途退学，这一点是我终身唯一的恨事）。我个人的事情随便怎么都行，至于我的父母和弟弟，我却希望他们不因为我的问题而受到影响。这样一想，又觉得自己还是应当安于现在的职位，努力学习下去。可是，同时又觉得这是不对的，如今应该抛弃现在的职业和将来的希望，全心全意地来宣传和实行‘无我之爱’。

“我还觉得，如果真正彻底理解了无我之爱，那末自己就有了一定的立场，再也不会担心谁发生困难等类的问题了。这样一来，我又觉得，自己能够清楚地懂得自己该怎样做（就说现在，也好像已经懂得了），然而我还是不放心，准备继续进行一番思索。

“问题十分无聊，可是，你看怎样办好呢？我是否应该抛弃现在的职业呢？希望你指教。有扰清闲，罪过罪过。敬白。

“另外，请你在下边空白的地方简单地告诉我，来看你时应该怎么走。（按：下边留有空白。）”

信已经寄了出去，我还在沉思。终于下了最后的决心，又给伊藤写了一封信，告诉他已经不需要回信了。可是，第二天收到了伊藤的回信。信上说：

“河上肇兄：

“回答你的問題，用你信上所說的話就完全够了。設計社会組織那类事情，是毫无意义的。人类的和平和幸福，只要能实行无我之爱，那末即使不搞那些繞远路的事情，也会立刻实现。因此，研究經济学什么的，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倒反應該竭尽全力，宣传和实行无我之爱。凡是妨碍这样做的事，可一律加以抛弃。

“巢鴨庚申冢有个《无我爱》的張貼处。从那儿向左拐，再走七、八百步，就是大日堂；到那儿一打听，就知道。請在后天上午十一点钟以后来吧。伊藤証信。12月2日”

正是这封信，給我的决心一个最后的鼓励，使我从此再也没有发生动摇。

过了两天，到4日那天，我第一次訪問了大日堂。它被郁郁蒼蒼的杉树包围着，屹立在寒冬的荒野上。这就是伊藤証信居住的地方。当时天色已晚，寒气逼人，可是堂中沒有半点火星，大日堂里的石佛使人感到格外寒冷。那天我直到夜里十点钟，才离开大日堂，踏着月光回到寓所。那天伊藤劝我：“唯有传道，才是最大的爱。”我信服了他的理論，决心今后摆脱一切，献身于传道事业。

5日，提出辞掉教职的辞呈。

7日，伊藤来訪，劝我不要再写《社会主义評論》（按：这是我当时在《讀卖新聞》上連續刊載的文章，它引起了社会上广泛注意，大大增加了报纸的銷路），应该公开表示懺悔。我接受了他的劝告，当夜就写了《擱笔的話》。在那篇擱笔的話里，我表示了懺悔，还給别人添了麻煩。这是因为当时我心目中只有无我爱宗的緣故；可是今天想来，总觉得慚愧得很。

8日，再次訪問大日堂。但是，返寓后，就打定主意脱离无我苑，独立进行传道工作。原因是我觉得那些无我爱的教友，口头上虽說要竭尽全力爱别人，行动上却沒有足以使我深受感动的地方；

尤其是他們晚上只知睡大觉，适足以証明他們还没有竭尽全部力量。因此到了第二天，也就是9日那天，我就完全脱离无我苑，独行其是，并且决心从此既不睡觉，也不休息，来传播这个真理，只要我这瘦骨嶙峋的身体还能支持，就最大限度地加以驱使，做到死而后已。由此可以想像出，当时我是怎样理解“竭尽全力爱别人”这几个字的，我的思想是多么偏激。或许有人要嗤笑我的狂愚，可是当时我却是怀着最大的真心诚意下这个决心的。就在下这个决心的当天晚上，我经历了最最奇异的体验。

六

摺了将近四十年，稿纸的边缘已经发黄的草稿上，写着上面那番话。这里我要补充几句重读这段文字之后的新的感想以及回忆到的事情。

写给伊藤证信的第一封信（写给别人的信件，我向来不留底，所以，这封信多半是被登载在当时的《无我爱》杂志上的），似乎太客气了一点；不过这可以说明我在见到伊藤之前，对他抱着何等尊敬的心情。

我是向来尊重专家的。就拿我自己来说，如果遇着一个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的人，却指手划脚地来对我提意见，我将毫不客气地加以抗拒。反过来说，如果别人谈他多年勤奋钻研的工作，譬如画家谈画，歌人论歌，反正只要对方谈的是他专门从事的工作，我就会抱着虚心坦怀的态度，倾听他的意见。而且我这个人最容易相信别人。特别是，我一旦相信起一个人，从一开始就无条件地全面地信任他，弄到后来，往往迟早不免产生失望，这时我的态度自然就和当初不一样，往往给对方造成不愉快或者麻烦。这是我一生的坏脾气，再也无从改起。不光对人是这样，即使对于一种主

义和思想，我像这样突然改变态度的例子也不少。唯有对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和本文所要讲的东方的宗教真理(为了掌握它们，我花费了很多心血，可是，一经掌握之后)，我的信念只见日益巩固，一直到生命即将结束的今天，也不曾有过动摇。交朋友方面也是这样；一方面，固然有一些令人感到遗憾的闹翻的例子，但是在另一方面，情谊与日俱增的朋友也不少。回顾一生，像我这样脾气古怪的人，能够不受周围的排斥，幸福地度着晚年，不能不说是意外的幸福。

援引大人物来比拟自己，也许太不自量，不过我总觉得我的性情脾气和苏东坡很相近。赵翼在他的《甌北诗话》中说：“东坡襟怀浩落，中无他肠。凡一言之合，一技之长，辄握手言欢，倾盖如故，而不察其人之心术，故邪正不分，而其后往往反为所累。”他举了种种事实，最后说：“平日交游，末路相背者，更不可数计。”由于性情相近的缘故，我从简简单单的这几句话里，就想像得出活生生的东坡的性格。

不知不觉扯远了；我之所以在这里插上这样一段话，是想说明当时同伊藤证信结成教友的时候，我起初对他百依百顺，一片至诚。我本来准备学托因比的样，献身于贫民救济事业，可是由于受到伊藤直接间接的影响，就改变了主意，准备搞传教工作了。他劝我不要再写《社会主义评论》，应该公开表示懺悔，我立刻就照办。这些事实表明我对伊藤的信任一开始就是无条件的。

我对他的这种信任保持了短短一段时间，大约过了六十天之后，我终于对无我爱宗举起了叛旗，脱离了无我苑。这样一来，曾经由于我的加入而顿时声名大振的无我苑也就解散了，同时，发行数量急剧增加的《无我爱》杂志也停刊了(按：伊藤证信现在仍然在出版同名的杂志《无我爱》；但是，它的复刊是很久以后的事情)。

回想起来，这和二十年后我对大山郁夫以及劳农党的态度如出一轍。劳农党由于我的参加，增加了不少声势，同时，我一脱离，該党不久就总崩溃了。所不同的只是：搞无我爱运动那个时候，一切問題都是在談笑之間解决的；直到现在，我同伊藤还保持着往日的交情。

虽則是在六十天之后举起了叛旗，然而事情的发生，我觉得一开始就有了萌芽。第一次拜訪伊藤的时候，我是怀抱着极大的尊敬而去的，但是，第一次见面的印象，未免和意料中的有所不同。等到第二次訪問之后，我就打定主意“脱离无我苑，独立进行传道工作”，理由就是前一节里所說的“那些无我爱的教友（按：信奉无我爱宗并且聚集在无我苑的人，当时是这样称呼自己的），口头上虽說要竭尽全力爱别人，行动上却没有足以使我深受感动的地方”。由此可知，我到无我苑去，似乎一开始就没有接触到使我滿意的真挚态度。

不过这也难怪。因为我当时十分偏激，甚至认为既然說要“竭尽全力爱别人”，就不应该为了休养自己的身体而在晚上睡大觉，否則就是违背宗旨的行为。

现在想来，当时我为什么专门計較睡眠这一問題，实在有些莫名其妙。因为，如果为了休养自己的身体而睡觉就是自私自利，那末吃飯穿衣也应该說是自私自利了。既然說要竭尽全力爱别人，那末世上饥寒交迫的人也不少，就应该有了可吃的东西先給他們吃，有了可穿的衣服先給他們穿；这样一来，除非实现了完全的共产主义，到了物資十分丰富的时代，否則連吃东西都不免构成“犯罪”。照理自己应当这样深入地想一想，可是，我当时偏偏专门計較一个睡眠問題，这真是奇怪。（几年前，我坐牢的时候，曾在刑务所置备的书里讀到这样一段記載，說是中国有一个禅僧，一生沒有

沾过床，从来没有躺下睡过觉。看了这段記載之后，我感叹不已，心想悠久的人类历史上，居然出现过这样的人物！可是现在怎样也想起不起那位禅僧的名字了。）

正因为我专门計較睡眠問題，剝夺了自己的睡眠，所以我曾經面临死亡。我在旧稿中虽然只是說“我就完全脫离无我苑，独行其是，并且决心从此既不睡觉，也不休息，来传播这个真理，只要我这瘦骨嶙峋的身体还能支持，就最大限度地加以驅使，做到死而后已。……就在下这个决心的当天晚上，我经历了最最奇异的体驗”，其实在当时的我来说，这完全意味着破釜沉舟。这根本不同于理論上的推究，因为从理論上說来，既然說要竭尽全力爱別人，照道理晚上就不應該睡觉，来休养自己的身体。要是一味空談理論的話，那末就同前面說过的那樣，专门計較睡眠問題，就显得很滑稽；既然睡觉不对，那末吃飯穿衣也不对了。而在当时，我却并非单纯在脑子里考虑着这种理論性的問題，而是真正下决心牺牲自己。我的体质本来弱不禁风，当初想保人寿險都保不上，所以要是坚持“既不睡觉，也不休息”的生活的話，不久必定会一命嗚呼。可是，我当时却毅然决然地下定决心，要过这种生活。因此，我不是单单考虑死的问题，而是决心一死，而且面对着死亡。这一点，即使临終的病人也无法做到。这种情况，就相当于禅宗所謂的大死一番。我通过消灭小我而超越了精神和物质的对立，做到了以心见心。这个瞬間，就是我掌握了所謂宗教真理的瞬間。（在此以前，我曾在《社会主义評論》的攔笔的話里說：“我是个才疏学浅、資质愚鈍的人，但是饶天之幸，现在竟掌握了最高真理，进入了朝聞道夕死可矣的境地”；可是后来一想，当时我仍然沒有彻底摆脫知識上的理解的境界。）

七

下面从我的《獄中贅語》一文里，摘录必要的几段。（按：《獄中贅語》是 1937 年 3 月刑期快滿的时候，我在小营刑务所根据当局的命令写的，写完就交给了当局，并没有发表过。）

“首先，宗教真理所讲求的是什么呢？回答是，宗教真理所讲求的，是意識那意識本身，以心反映心。它的基本特点就在这个地方。

“我們人类具有高度发达的意識作用。靠了这个作用，我們才知道我們周围有桌子，有房屋，另外在小的方面，知道有肉眼看不见的細菌，在大的方面，知道有包括着太阳、星星和月亮的天空是什么样子。这些知識，随着科学的进步和发达，越来越正确，越来越丰富。我們利用这些知識，就可以更积极地改变我們的环境（外界的物），无止境地改善这个世界（物的外界），使它更有利于我們的生活。可是，宗教真理却和这一方面不发生任何关系，因而一点用处也沒有。……宗教真理不是关于外界事物的知識，而是关于意識本身的知識。有意識作用的人意識到自己，即意識的自我意識，这就是宗教真理的使命。在这种情况下，意識不是向外，而是向内。它不作用于外物，却作用于它本身（我把这种意識作用称为回光返照）。

“其次，怎样才能掌握宗教真理呢？如前所述，宗教真理讲求的是意識那意識本身。所以毫無疑問，它应当超然于普通的意識作用之外。这一点正是它的基本特征。

“我們无法用自己的眼睛看到自己的眼睛。固然，如果用鏡子照，我們是可以看到自己的眼睛的；但是，这时所看到的‘自己的眼睛’已經不是‘自己眼睛的本身’，只是‘反映在鏡子里的自己的眼

睛’，自己的眼睛的映像而已。因此，眼睛虽然是用来看一切物体的器官，却没有办法看它本身。

“眼睛无法看到眼睛，舌头无法舔到舌头。和这个道理一样，通过普通的意識方法(我們平常意識外界事物的方法)，再也无法意識那意識本身。这一点正是关于心的知識和关于物的知識所以不同的地方，也是宗教真理和科学真理所以不同的地方。固然，像心理学之类的學問，是用对待物的方法来对待心的；但是，这时的心，就像反映在鏡子里的眼睛不是眼睛本身一样，已經不是活生生的跳动着的心本身，而是被对象化、固定化了的僵死的心了。”

我曾經写过上面这样一些話。总而言之，通过普通的意識作用，是无法意識到意識本身的。所以法然上人也說：“淨土宗的信徒，成为愚人然后往生”。所謂成为愚人，就是指抛弃普通的知識而言。《一枚起請文》^①里說：“要成为一字不識的愚人，要做一个像在家尼姑那样无知的人，不作聪明人所作的事”，也是同样的意思，并不是說一成为聪明人就算完蛋，一輩子也无法往生极乐。另外，在禅宗方面，譬如中国的临济和尚曾說：“三乘十二分教，都是擦屁股的廢紙”，“学人信不及，便认名认句，向文字中意度佛法，天地悬殊”，“道流，設解得百本經論，亦不如一个无事底阿师。道流，莫向文字中求！”这些話也包含着同样的意思。正因为这样，禅宗才标榜“吾宗无言句”，“教外別传，不立文字”，虽然有自力和他力的宗派之別，但是最后还是和标榜“一字不識”的淨土真宗打着同样的旗号。要是不懂得这一点，就无论如何也进不了宗教之門。換句話說，在掌握宗教真理方面，普通的知識、普通的意識作用是完全无济于事的。

^① 《一枚起請文》是日本淨土宗的开山始祖法然上人(1133—1212)写给門徒源智的、臚列淨土往生的要义的一张东西。——譯者

普通的知識是由外界事物反映到心里而产生的。外界事物是客，心是主，这里成为条件的是主客互相对立；这种主客对立的条件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相对的。而宗教知識，只有通过以心见心（即禅宗所說的见性）才能够获得，所以它是超越主客对立的；在这一点上，它是絕对的。只有回过头来把意識作用直接指向意識本身，即通过“回光返照”，才能掌握它；在这里，是以物心对立的揚弃，即物的对立物——心的湮沒（也就是普通所意識到的自我的湮沒），为必要条件的。

所以，如果把和普通情况不同的精神状态叫做神經病的话，那末，要掌握宗教真理，不发一陣神經病是不行的。禅宗向人家提出乍看令人莫名其妙的公案（例如一个人在父母未生他以前的本来面目之类），設法在既沒有怀疑又沒有苦悶的人的心里凭空掀起波瀾，这实际上不外乎是想把人們的精神引入这种异常状态的一种特殊教育手段。

幸而我有可能自己給自己提出了公案，那就是要不要不折不扣地实行这样的生活：“有人打你的右脸，連左脸也轉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連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給他；有向你借貸的，不可推辞。”同时我又幸而不遺余力地彻底分析了这个公案。最后我下了“既不睡觉，也不休息”的坚强决心，尝试着用自己的力量来消灭自己。我相信，正因我彻底按照这条路綫勇往直前，我才终于体验到自我湮沒、大死一番的瞬間。（一般人即使到了临死的时候，也还是掙扎着想活，所以直到最后的瞬間也不能有这样的体验。从这个意义上來說，这种人的灵魂既不能到达极乐世界，也进不了天国。可是，另外有一种人，往往在临死的时候，得到这种体验，高高兴兴地死去。这种人的临終，是一点也不惨的。不过要让我說的

話，不如在生前早一点體驗大死一番，安安稳稳地生活几十年更好。)

再翻看四十年前的旧稿吧。它里面詳細地記載着那天晚上的事情。由于陷入异常的精神状态，很自然地附带产生了异常的生理现象，不过，那只是派生的偶然现象。可是，我当时似乎对这种派生的现象十分惊讶。毫无疑问，要是让精神病学者說起来，那一定是一时的发狂现象。不管怎样，我还是把旧記錄原封不动地抄在下面吧！

八

当时我把那體驗的經過简单地記在备忘录里了(11日的夜里記)。现在把它略加补充，抄在下面。这篇記錄好像痴人說梦，希望讀者別見笑。

11月9日的夜里，我仔細地想到这个問題：世上有所謂竭尽全力爱別人的人，可是他們到了夜里就睡觉，这样人究竟能否說是竭尽了全力呢？另外，他們的言行无形中似乎在嘲笑別人(按：这些都是当时无我爱教友給我的印象。他們有种风气，把自己看作有自觉的人，妄自尊大，瞧不起別人，我认为不應該这样)，这样到底能不能算是竭尽全力爱別人呢？

后来我和朋友談笑了一会，又閉目深思了一会，过了几小时以后，终于下定决心，从今以后，要不再睡觉，来传播真理，做到死而后已。于是和竹内正一約好，組織“献身园”，出版《献身》杂志。

那时正好是半夜一点多钟，我想起給《献身》杂志写篇文章，先写了一个題目：《我們所确信的宇宙本性》，接着提笔深思了几十分钟，然后写道：

“一、組成宇宙的一切个体的存在，絕對不是依靠自身的力量，

絕對要靠外在的力量。

“一、組成宇宙的一切个体的活动，絕對不是以自身为目的，絕對要順从外在的目的。”

写好之后，我解释道：“宇宙是无限的，个体是有限的。既然是以有限对无限，可知个体有等于无。显然，一切个体絕對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而存在的，它絕對是依靠外在的力量而存在的……”我又繼續写下去，当我正要写“我們所确信的人生的真正目的”的时候，还没动笔，我就觉得我的思想出奇地明确，同时奇怪自己过去为什么沒有領会到这个最簡單而最崇高的真理，惊叹现在自己所領会到的真理的伟大。这是我当时的真实感觉。（按：当时我写在紙上的东西，是条分理析、层次分明的实际上那时我似乎作了所謂回光返照，領悟了佛教所說的无我。）

这个时候，我的头脑里瞬息間感到无法形容的清醒明朗，仿佛像玻璃一样透明。于是我就一边写一边望着在座的石野準說：“今天晚上好像神在使我写东西。”

过了一会，我觉得我的眼臉仿佛用灵药洗过了一遍，真稀奇，我的眼界突然开曠起来，視力頓時增加了一倍。我这时的心情，可以說是万里晴空，月到天心；不，那种舒暢无比的感觉，簡直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

一会儿，我又觉得好像有一种輕柔的羽毛般的東西，拂撫我的脑子；不，仿佛是我脑子里有什么东西蒸发了，冒出的气体，輕飘飘、軟綿綿而且一个紧接着一个地化成一个个圈圈，像水蒸汽那样升騰，飞散。

一会儿，我觉得我的身体好像輕飘飘地騰到了空中，似乎有什么东西把我的身体輕輕地柔和地抱起来了。一时之間，我伸开两臂，搖动身体，坐定在那里，听任身体自然而然地搖动，昇騰。（我

連着用“一会儿”这几个字，其实我記得这些现象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前后大約只有四、五分钟的光景。)

石野准在傍边看到这个情景，觉得非常奇怪，我自己也觉得很奇怪，拿出表来一看，当时正是半夜一点五十分。于是，我又拿起笔来，打算把刚才写的文章重抄一遍。抄着抄着，还没有抄完，突然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袭击我的头脑，于是我扔了笔，陷入苦悶之中(按：今天我认为，在这一瞬間，我是重新回到了物心对立的世界，下面所說的情景可能是随着这种意識状态的变化而产生的偶然的附帶现象)。我不知道究竟遭到的是什么东西的袭击，只觉得头脑里万分痛苦，就倒在席上掙扎着。这时感到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压我的身体，非把我压伏在席上不可。过了一会，我才明白折磨我的头脑的，是感到自己伟大的念头。本来，当我决心抛弃生命的时候，我还以为自己完全变成了无我的人。而现在我体会到，人即使到死，也仍旧有我执。不，人在大死一番之后，才能看到宇宙的本性。既然我已經看到宇宙的本性，也就無論如何不能不感到现在的自己的伟大。但是既然有夸耀自己伟大的心思，自然不能說已經去掉了私心。所以，我必須抛弃这种感情。可是，毫无办法，自以为伟大的感情，以确信真理伟大的同样的力量袭击着我，扑到我身上来！

我不住地苦悶着。我必須抛弃这个私心。可是抛弃它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假如我不抛弃这最后一点私心(其实，私心是不易根除的，即使立下大志，傾注全力，达数十年之久，恐怕也难以彻底根除，然而我当时却以为那是最后一点私心了)，那末我所获得的真理也就无法传給別人。这样一来，我活着就沒有意义了。不，我甚至相信：如果我不抛弃这最后一点私心，上天馬上就会把我的生命夺去。(这一节虽然同样像是痴人說梦，但是由于我当时

认为生死将决定于刹那之間，所以觉得在这一瞬間，自己好像站在生死的边缘上。)懂得了最高真理却不加传播而死去，是一件极大的憾事。可是，毫无办法，虽然懂得了最高真理，我怎样都不能不相信自己是伟大的。

我流着眼泪苦悶着。两臂撑在席垫上，两手抓住头，继续不断地苦悶着。我感到我的肋骨不断地颤动，胸膛仿佛要炸裂。

当苦悶稍微減輕一点的时候，我拉着在座的石野准的手，歔歔流涕，感叹不已地说(这时我逐渐感到，乾坤显出在我脚下遥远的地方，宇宙的精气像流水一样，滚滚进入我的脑子)：“唉！这个真理，早就悬在我们眼前。可是，人们不能自觉地领会，而只是沉溺在自私自利、固执小我之中，经受着生死的痛苦。因此，宇宙大自然有时颳暴风，有时发洪水，用尽一切手段来加以警醒，可是人们仍然不醒悟。自然，要想启发别人，必须通过语言；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即使由人来宣传这个最高真理，也由于人对人的猜疑，而不被相信。这个真理极其简单明了，而且至高无上；人们只要按照它来办事，就会得到无限的幸福。这岂不是通过最简单的方法进入最最幸福的境地的妙法吗？宣传这种妙法，人们自然是不会相信的。所以宣传这最高真理的人，对人必须绝对根除私心，必须绝对忠诚老实。换句话说，应该是人而又是神，是神而又是人。(我如今认为，这就是生活的理想。人生的意义就是向着这个理想勇往前进。)现在我才懂得宣传真理是一件极其艰难的工作，懂得真理早就悬在我们面前而我们没有加以理会。啊！我已经忘掉生死，我已经死而后生；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即使到死，也仍旧有我执。我如今懂得，人要到达绝对无我之境，是不易的。绝对的大是无限的，同样道理，绝对的小也是无限的。我原来以为走出了生死之境，就自然进入无我之境；现在我才明白，事情并不这么简单。

按：上述宗教體驗，我仅仅在十几年后的 1919 年，在《社会問題研究》上简单地提到，它的具体内容从来没有发表过。但是 1933 年（那年 1 月我被捕）3 月号《文艺春秋》上杉山平助那篇《求道者河上肇》里，却有这样一些話：

“西田天香的一灯园的主张是，要忘我地为别人服务，首先要从打扫厕所和給人擦皮鞋开始；我不知道当时的无我苑主张采取怎样的方式，才能实行无我的生活。那种生活，果真是无我的么？对于世人果真有好处么？沒有听說河上肇为这些問題而煩惱，只听說——而且他自己也这样說——他曾因自己晚上需要睡觉、把为邻人服务的時間耗費在自己的休息上而感到煩惱，认为这是一种利己的行为，煩惱得晚上觉也睡不着。他自己也这样說了。这种难能可貴而激烈、但是抓不住重心的思想方法，是河上的一貫的傾向，必須加以注意。

“凡是希望过无我生活的人，他所最感到煩惱的，就是不容易做到在精神上割断我这个念头。总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的那种自負自恃的念头，就像蒼蝇一样，赶都赶不走，日夜支配着他，因而使他感到非常苦恼。只要稍稍有点純宗教經驗的人，沒有一个不为此而苦痛。可称为无我之书的中世紀的那部《日尔曼神学》，反来复去讲的就全是这个道理。可是，这个最重要的問題，河上肇却不願意去想，只是为自己晚上睡觉不睡觉这样一个第二、第三义的問題而煩惱，只是打算走苦行头陀的老路。作为一个思想家來說，这是多么不深刻，多么不敏銳呀。从这方面來說，作为一个思想家，他对于我們的影响是意外地薄弱的。老实不客气地說，在我看来，他不过是个不值得多大尊敬的、东倒西歪的人物而已。”

讀者当中，自然不一定有誰会認真去听典型俗物杉山平助关于宗教的說教，不过他这番批評也实在太无的放矢了。其实呢，他說我不願意去想的东西，正是我直到最后为之苦恼的东西。

九

重讀四十年前的这份草稿，虽然有些地方觉得见不得人，有些地方想加以改写，如今却硬着头皮把它照原样抄出来了。

总而言之，我相信我是經由上述过程而看到了心（就是自我）的自体。我所說的宗教真理，实际上就是这个东西。

前面已經說過，我既沒有固定的老師，也沒有一個前輩可以向他提出我的看法，請他給判斷是非，所以我自以為通過上述體驗而徹見了大道，其實說不定是我的毫無價值的盲目自大。不過我懷着這樣的自信：有朝一日，如果有一個見高識廣的人，能夠不被我的廢話連篇以及夾雜在里面的亂七八糟的東西所妨礙，而深刻地看到本文里所透露的心的發展過程，他也許會面帶微笑，給予某種程度的印可。

總之，12月9日深夜我所體驗到的精神活動，看來非常激烈，以致在那以後的幾天里，我全身皮膚幾乎完全失去了感覺，即使用力掐手或腳，也不感到疼痛。這一點，當時覺得非常奇怪，現在回想起，就補記一筆；不過這種事情是無關緊要的。重要的是，我通過這次體驗，解決了多年來的疑問，因而從那以後，直到今天為止，四十多年來，我始終感到自己是輕鬆愉快的。

“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有求你的，就給他；有向你借貸的，不可推辭。”——從前我擔心實行這個就無法活下去，這是因為我把五尺之軀看作是自己的東西了。其實，身體並不是自己的，把它看作是自己的私有物是錯誤的；身體是天下的公器，不過暫時由自己保管而已。明白了這一點，就懂得自己的任務，就在於好好保養這個身體，到日後認為必要時，把它獻給天下。這樣一來，我才做到了一面信奉絕對非利己主義，同時毫無內疚地允許自己穿衣吃飯，睡眠休息，並且鑽研學問，積累知識。至於今後的問題，就在於要不斷地努力消滅私心，真正使自己的身體不愧為天下的公器。問題一經明確，從那以後將近四十多年來，我才沒有迷失方向，順利地打發了日子；中間雖然經歷過多次驚濤駭浪，却終於沒有毀滅。現在我的瘦弱的軀體早已變成骨董，只听憑它自然衰朽而已。

到此，我所要写的年輕时代經歷的宗教體驗，已經写完了。不过还要順便补充一点，就是經歷过这番體驗之后，我是怎样生活的。

四十年前的旧稿里，接着前面抄出的部分，这样写着：

“这篇文章恐怕不值識者一笑。但是，我个人觉得，从那以后，我的生活多多少少輕鬆了一些。这且不說；从那以后，我的传道的热情非常高涨。于是第二天(13日)就迁居到切通湯島，一心想把該島作为自己传道的根据地。后来心情逐渐平靜下来，15日那天傍晚，突然产生了回到父母跟前的念头。因此第二天早晨踏上了还乡的旅途；几天之后，又回到了东京。这时候，独立传道的念头已經完全烟消云散了。年底搬到巢鴨，此后就成了无我苑的教友。”

虽然說是搬到巢鴨，那只是把身体搬了去而已。当时我是《讀卖新聞》的記者，常常深更半夜才离开銀座回巢鴨。(我辞掉教职之后不久，就被讀卖新聞社請了去。那时正当《社会主义評論》获得极大好評之后不久，因而社会上似乎傳說我是以高薪被請去的，其实那时候我根本沒有閑心思去考虑工資多少；我拿的工資，实际上只有教員时代的一半而已。当时的《万朝报》，似乎以为我的一切都是有計劃地进行的，說什么河上肇是才子等等，使我非常生气，到现在还没有忘記。)記得有一天夜里，雪下得很大，已經沒到膝盖了，我穿过連像样的路都沒有一条的巢鴨的庄稼地，回到小小的堂屋，連被褥也沒有，穿着西服睡到天亮。那时候，即使这样，也一点不觉得冷。

翻閱一下旧稿，第二年的1月4日，我在巢鴨租了一所房子，把它称做无我苑第三分苑。一切費用都靠讀卖新聞社的月薪来維持。同时，一些所謂无我苑的教友們，随便地在那里进进出出，給我做飯，他們也在一块吃。

我从1月4日起，开始以“无我爱教友的一个速記員”的名义，給《讀卖新聞》写連續刊載的文章《人生的归宿》。写到2月初，我对无我爱宗开始感到怀疑，于是《人生的归宿》写到半中間就不再写下去了。（說是写到半中間，其实那篇文章一开始就不是按照有头有尾的形式来写的。）

不久我就完全脫离了宗教活动，一心一意当《讀卖新聞》的記者，主要負責經濟方面。接着又創刊了《日本經濟新志》，自己担任主笔。正在經營該杂志的时候，沒想到被京都帝国大学聘請了去。（旧稿里这些事情的前后經過写得很詳細，而且笔調比較激昂，现在抄出来也沒有意义，所以全都省略了。）

十

順便还得說一下。

1905年底，我曾經一度打算完全放弃經濟学的学习，連历年从有限的家庭生活費中东拼西凑买来的一点經濟学书籍，也都被我全部卖掉，一本沒留。可是，后来又重新搞起經濟学来；到1908年，又依靠素不相識的戶田海市博士的推荐，到京都帝国大学教起书来。我从而有机会安安靜靜地埋头于經濟学研究，約二十年之久，終于把自己造成为一个馬克思主义学者。可是，在成为馬克思主义学者的过程中，我也沒有固定的老师，因而走了許多弯路，长时期中感到无所适从到了能够談談馬克思主义之后，仍然未能輕易地摆脱似是而非的阶段；直到1928年辞掉了大学教授之后，才算真正懂得馬克思主义。关于这方面的經過，我另有机会写我的回忆。这里我只想补充下面一点。

1919年我創辦《社会問題研究》月刊之后，人們仍然常常批評我坐的是套着唯物論和唯心論这样两匹馬的馬車。这是由于我一

方面承认馬克思主义，同时内心深处又相信有宗教眞理的緣故。

另外，我在 1923 年即关东大地震那年，发表了《資本主义經濟学之史的发展》；刚出版的时候，受到了櫛田民藏的严厉批判。当然，我那时还没有真正懂得馬克思主义，这是毫无疑問的。不过这本书却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它从肯定利己活动的思想写起，而以否定利己活动的思想終篇，全书始終把利己活动作为考察研究的目标。这样做，并不是模仿什么人，而是完全根据自己的要求。这一层，我在 1928 年出版的《經濟学大綱》的序文里曾經提到。现在不嫌重复，把它抄出来。

“1898 年秋季到 1902 年夏季，我是东京帝国大学学生。在这个期間，我第一次閱讀了《聖經》。《聖經》里宣传的那种絕對无我主义，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弦。从那以后，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問題，始終占据着我的心。大学毕业后的第三年，即 1905 年的 12 月，我抛弃了所有的职务，参加了当时提倡‘无我爱’的伊藤証信的无我苑，也正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几年来所存在的問題，而决不是灵机一动，突然想起这么做的。后来又隔了三年，到 1908 年秋季，我去京都帝国大学任教，直到今春为止，在那儿工作了几乎二十年。我在那里所研究的，现在回想起来，在經濟思想史方面，在最初約十年間，主要仍旧是往年的老問題——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关系問題。正因为这样，我的旧作《資本主义經濟学之史的发展》，一开头才从孟第維尔肯定利己思想的主张写起，最后以納斯欽的否定这种思想的主张終篇。这本书与其說是經濟学史，不如說是反映在經濟学領域內的道德思想的历史。不管好坏，我觉得它总形成着一个完整的系統。这回重印这本书，我把亚当·斯密的价值学說和李嘉图的价值学說补充了进去。这些东西，旧作中都沒有談到，这从当时的計劃來說，倒反是理所当然的事；而现在

却把它們补充了进去，反而觉得破坏了全书的系統性。”

总之，我是由于年輕时候曾經反复思考过利己活动的是非問題，才在不知不觉之間，写出了这样一本书。

人們提出批評，說我的思想像两匹性情完全相反的馬拉着的馬車，将来一定会翻車的；結果究竟怎样呢？

1937年3月，也就是在快出小菅刑务所的三个月以前，我曾經写过一部《獄中贅語》，里面这样写道：

“最后我要談談宗教真理和科学真理的关系問題。

“通过前面的叙述，問題已經很清楚了。宗教真理属于內界，科学真理属于外界。这两种不同范畴的真理，它們的課題各不相同，它們的立場、范围也各不相同。……前面已經說过，属于自力宗的禅宗固然标榜‘不立文字’，就是外力宗也还是讲求‘一字不識’，宣揚‘淨土宗的信徒，成为愚人然后往生’。至于科学，却和宗教正相反，掌握科学真理是以‘搜集丰富的材料’为必不可少的条件的。所以科学家在对一定的問題作出一定的結論之前，要积累比勃朗峰还高的大量資料。和一字不識正相反，科学家必須熟悉研究对象的所有方面。一个以內界的心为对象，另一个則以外界的物为对象。两者在一切問題上都是对立的。通过‘一字不識’这道关口之后所能窺见的宗教真理，同解决社会問題毫不相干；同样，社会上所有的知識，只能成为获得信仰的障碍而无补于获得信仰。……”

“讀者当中或許会有人質問我說：康德派的哲学家主张有所謂‘自在之物’，也就是‘不可認識的东西’，‘与现象有原則的區別、原則上和现象属于另一个領域的东西’，因而‘是依靠知識永远也达不到、只有依靠信仰才能加以闡明的一种属于彼岸的領域的东西’；根据你所讲的，归根到底你的立場岂不是和他們一样嗎？这

不是意味着你这个向来否定形而上学的馬克思主义者，不期然而然地落入了形而上学的泥坑嗎？

“我回答这个問題說：不錯，我是把宗教真理和科学真理区别开来的。但是，同是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非但研究的对象不同，研究方法也不同。研究社会科学，我們不能像研究自然科学那样，使用显微镜，或者使用化学反应剂。同样的道理，科学真理和宗教真理所处理的对象(世界)不一样，因此，掌握这两种真理的方法也就不能沒有区别。不过，重要的一点是我并不主张这里存在着一种无法逾越的绝对境界。因为，不論是掌握科学真理(即通过观察外物来理解它的真相)，还是掌握宗教真理(即通过回光返照来理解心的本身)，都是依靠人的意識作用而进行的認識，而这种意識作用，不外是人类这种高級动物的有机組織的一部分——高度发达的大脑等等的机能。所以，我虽然承认了宗教真理，却并不因此就感到有必要逃避到神秘的云雾世界里去。离开人，离开反映在人的意識中的物质世界(人的意識本身也是物质的作用)，是不存在什么神和佛的。神和佛归根到底都是人类意識的产物。神和佛具有人格，具有和人相似的相貌，这并不是因为神和佛按照自己的模样創造了人，而是因为人們按照自己的形象凭空想像出了神和佛。說到最后，不是神創造了人，而是人創造了神。假如結核菌也有神的話，那末这个神一定是結核菌。总而言之，我虽然承认了宗教真理，但是絲毫也不因此就感到有必要卖身給形而上学。直到最后，我仍然是一个唯物論者，把心(意識、精神)看作是物质的产物。宗教真理是有关意識的真理。然而即使这种意識，也不外是构成人的肉体的物质的机能。”

我在《獄中贅語》里就是这样写的。我觉得，套着两匹馬的馬車，並沒有翻車。所以說，我一向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主张有宗教真

理的唯物論者，看成是一个主张有一定真理存在于既成宗教的核心里（尽管这种真理是被粘附在它上面的各种乱七八糟的杂质十层二十层地复盖着）的馬克思主义者。这就是我思想方面的特殊性，我为此而自豪。

因为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渴望并且坚信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在这种社会中，“有求你的，就給他；有向你借貸的，不可推辞”这句话，就会变成誰都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行动。现在我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漩渦中，安安靜靜地度着晚年，从容不迫地注視着形势的变化。

（1942年1月28日夜脫稿）

木下尙江老先生

1898年，我升学到东京帝国大学，那年9月里，初次去到东京；现在查考一下，木下尙江正好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他的东京生活的。他本人所写的文章里，就有这样一段話：

“我在信州的山中生活过十年之久。有时給报纸写点文章，有时做做律师，反正是在除了天空和山之外什么也看不见的故乡度过了孤独的十年。尽管老想脱离这个环境，却总是被身边的一些瑣事纏得紧紧的，脱不了身。这时监狱救了我。坐了一年半监牢以后，1898年12月，我从当时的鍛冶桥监狱的大門里被攆出到东京市的中心。老朋友石川安次郎（半山）等候在牢門外边，馬上帶我去见了島田沼南先生。”这就是說，这时他当上了島田三郎所办的《每日新聞》的記者。

接着上面那段話，他还說：“那时我心目中有两个敌国：一个是

‘军队’，一个是‘帝国大学’。穗积八束那时正把持着帝国大学，高唱‘神权论’（按：指天皇神权论），我则大力宣传‘普通选举’，一开口就高叫民主。新闻记者虽是我的职业，但是我并不善于写文章，总觉得耍笔杆得绕远路，不如大声疾呼来得直截痛快。

“当时演讲在社会上已经不那么盛行；演讲的会场，除了租用神田区的青年会馆或本乡区的中央会堂而外，就找不到其他地方。我常常在中央会堂大声疾呼。那是对‘帝国大学’这个敌人的大本营的挑战。

“可是，有趣的是这时吉野作造和河上肇却正在准备走出大学门。……”

那时我是东京帝国大学的法科大学政治科的学生，在宪法课上听的是穗积八束的天皇神权论，国法学课上听的是一木喜德郎的天皇机关说；没有课的时候，老到市区去听演讲会的演讲。

我第一次看到木下尚江，是在神田的青年会馆。那次大概是《每日新闻》主办的演讲会。当时他瘦得很。我听过他许多次演讲，从来没有见他穿过西装。他身上总是穿着粗布的日本服，套着围裙。

从他的嘴里，我听到了有生以来从未听到过的热烈的演讲。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的，是他对天皇神权论的露骨攻击。我在山口的偏僻乡下长大——山口乃是所谓藩阀的根据地，像木下所说的那类话，即使在个人的私下谈话里也没有听到过——听到了这样的演讲，着实吃了一惊。尤其是看到挤满了会场的听众一齐起来响应他，报以热烈的鼓掌，更是惊奇不已。我心想，要是在山口的话，演讲的人也许要遭到围殴吧。

叨他的光，我的眼界开阔了。说不定就打那时起，我心里萌发了民主思想。

此后又过了两三年，到 1901 年年底，我去本乡区的中央会堂听妇女矿毒救济会的演讲会。那次記得木下尚江、田中正造、島田三郎三位都作了演讲。平常在演讲坛上所看到的島田三郎，总穿西装；那天却穿了日本服，围裙系得高高的。那天晚上田村直臣牧师的演讲給我的刺激最大，他的演讲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后来人家告訴我，这个牧师是个演讲能手，凡是募捐的演讲会，总少不了他。果然，那次我也被說得十分感动。会开到半中間，为了向听众捐錢，小小的竹筐传到每个人面前。一看，坐在我右边的我的朋友岩田博藏（当时在文科大学的英国文学科讀書，晚年当了山口高等学校的校长），把他錢袋里所有的錢都倒了出来，而我呢，却没有带錢，也就爱莫能助，只好对那竹筐置之不理。不过，我在演讲会結束离开会场的时候，把自己身上穿的日本服外套、外褂和围脖等，都脫給了管事的妇人；第二天早晨一起身，除去身上穿的而外，又把所有其余的衣服一古脑儿捆进行李里，托人力車夫送到救济会的办事处。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好事，走出公寓，打算去告訴岩田，正匆匆忙忙地赶路，靚面就遇着他。我至今还記得他当时說：“我这正要去看你哩！看你昨天那个样子，推想你还要干出什么事来的。”

关于这件事情，当时的《每日新聞》（1901 年 11 月 23 日）上刊登过这样一則消息：

见义勇为的大学生

三天前（20 日）的晚上，本乡中央会堂举行矿毒地区救援演讲会。散会以后，听众中間有一个青年学生，挤出人群，来到主持大会的潮田跟前，說道：“现在可不可以捐东西呢？”潮田回答說：“可以的，现在就可以捐。”沒等潮田說完，那青年学生就脫下身上所穿的外套、外褂以及围脖，交給潮田，說：“請

替我把这些东西送给受灾的人吧。”潮田就说：“你一下子脱去这许多衣服，伤了风可不好。”对方却说：“不会伤风的。这些东西就麻烦你转送了，”连姓名都不讲，头也不回，就走了。从那人戴的帽子看上去，准是个大学生。再看外套的衣襟里，只有神田高桥裁缝店的店号。大家都谈论着，那个人的义举真不简单！哪里知道第二天早晨，那人又派人送来一封信和十二样东西。信是这样写的：

“我是昨天在中央会堂听演讲的听众之一。过去我也曾在同一个地方听过田中先生的演讲，掉过许多眼泪；然而我是一个穷学生，尽管眼睛里充满着同情的热泪，心里翻腾着悲愤的热血，也只能暗下决心，等将来学成之后献身社会，而不能有所作为。直到听了昨天晚上的演讲，我才知道即便像我这样的一个穷学生，也不是没有表达自己的一点儿同情心的机会，因而觉得非常高兴。附上的十二件衣服，虽则都很不像样，觉得拿不出去；但是，不瞒你们说，尽管如此，在我却是难于割舍的东西，因为那都是在家乡忍受着艰苦的生活而让我读书的父母所给的。实在对不起，反而麻烦你们；还希望你们体谅我的一点儿心意，适当地加以处理。你们使我有机会多多少少做了一点好事，我在这里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此致

妇女矿毒地区救济会

在中央会堂捐出破斗篷的一学生白

又，我热望正义在日本早日获得胜利，默祷急公好义的诸位健康和成功。”

那则消息的后面，还附有十二件衣服的清单：两股丝织绸夹袍一件，手工织夹袍一件，手工织棉背心一件，手工织单衫一件，西服一套（背心，上衣，裤子，钉有铜扣子和J字徽章），绒布衫一件，白衬衫一件，总计十二件。这清单大概是新闻记者加上去的，我信上并没有写明。因为，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什么叫双股丝织绸夹袍，当时是开不出那样的清单的。

过去的东西我大都丢光了，只有学生时代给报纸投寄的文稿，剪贴在剪贴簿里，那本剪贴簿还保存着，这则新闻也剪贴在那本东

西里面，所以幸而如今还保留在手头。（在那则消息旁边，我注有“12月23日”字样，可能是我当时搞错了。）

二

那时我完全受了《圣经》上“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那番话的支配，所以一听到矿毒地区灾民的惨状，再也没有躊躇的工夫，泰然地做出了上面所说的一番举动，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事；可是妇女矿毒救济会方面，却似乎把我当作了疯子。后来经过了将近四十年，偶然读到木下老先生所写的回忆，我才知道了这一层。老先生在他的回忆里写着这样一些事情。——前面的一半和我没有关系，可是，我觉得它的内容非常有趣，而且当这篇文章在《改造》杂志上发表的时候，重要的地方都打了××，所以这里就多抄些，前面和我没有关系的部分也抄了。

“有趣的是这时吉野作造和河上肇却正在准备走出大学门。我同吉野是由于基督教的关系而成为朋友的。我那时已经把基督教看作一具死尸了。

“一、1891、1892年前后，发生了认为基督教与教育敕语相抵触的‘宗教和教育的冲突问题’，那时候，教会方面的老前辈们异口同声地极力为这一问题辩解，说两者并不冲突。

“二、1894、1895年中日战争的时候，教会联合一致，派传教师到全国各地，宣传战争的正义性，表示基督教的爱国心。

“我在信州的山中远远地看着这两件事情。那种无可名状的丑态，把我气得要死。等到我当了《每日新闻》的记者的时候，海老名弹正先生以本乡教会为障地，开始宣传他的新神学。这个教会里有叫做明道会（记得是这个名字）的一派，那是学生的组织。我在明道会里认识了吉野作造、小山东助、内崎作三郎以及别的一些

青年。海老名的基督教，乃是武士道教，和我的宗旨完全相反，可是他倒很有气量，經常让我在本乡教会演讲。日俄战争快要爆发的时候，我向当时的社会主义协会提議，发表了非战論，結果促使幸德秋水成立了平民社。不过，对于我个人来說，提倡非战論，实在是发泄中日战争以来郁积在心头的激憤，自己即使为此而牺牲，也毫无遺憾。日俄战争开始以后，海老名先生也曾邀我去他那里演讲。有一次我和山路爱山在一起作了演讲。容貌魁伟的爱山，用他那破钟般的大嗓子，竭力贊美战争。当他大声疾呼說战争会使人心清淨的时候，海老名先生也晃动着他那长鬍鬚，滿面紅光地拍着手。我肚子里思量，天下哪里有这样岂有此理的基督教呢。接着，我就走上讲坛，痛罵战争論。这就是我和爱山成为朋友的开始。”

原来，正当我完全受了《聖經》上“有人打你的右脸，連左脸也轉过来由他打。有求你的，就給他；有向你借貸的，不可推辞”那番話的支配，而把手边多放几件衣服看成罪恶因而煩惱着的时候，日本的基督教却是这样的东西。

上面那段文章的以后的話，全都是和我有关系的了。

“至于河上，是由于足尾矿毒事件而認識的。我到东京时，矿毒事件在行政方面已告一段落。1896年的松隈內閣，通过矿毒調查会的調查，对足尾銅矿矿主古河市兵卫发了一道預防矿毒的命令，就算把这个麻煩問題結束了。而且当时社会上还流传着一些冷言冷語，說什么‘矿毒問題实质上是田中正造的选举問題’。1900年的春天，矿毒地区的大批农民到东京請願，半路上突然发生了所謂‘暴徒嘯聚’事件，于是事情又发生了波折。第二年的1901年，成立了‘妇女矿毒救济会’，这是社会运动史上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有两个人，对这件事有很大貢獻。

“一个是島田三郎先生。島田先生和田中两人視察矿毒地区回来后，发表感想說：‘矿毒問題，向来被当做政治問題加以处理，而今天却有必要进一步把它当做人的問題，从人道上加以处理。过去这件事是归政治家管的，而现在却应当改由妇女們用爱来办理。’

“另一个是潮田千势子老女士。当时需要找个拥护島田先生的主张的妇女，来办理这件事，沒有办法，只好找到基督教妇女矫风会。請矫风会的矢島楫子和潮田千势子两位老太太在 11 月的大冷天去矿毒地区实地調查，在那里設立了妇女救济会。潮田女士那时恰好六十岁，却是一位难得的实践家，因此就让她当了会长，听凭她独立活动。

“恰好那时东京高等法院会同各方面对暴徒嘯聚事件进行实地調查，推事、检察官、律师、鉴定人、新聞記者的大队人馬連日在矿毒地区視察；妇女救济会由于正好与此同时并进地展开了工作，就格外引人注目了。

“11 月 29 日的晚上，妇女救济会在神田区美土代町的青年会館召开了第一次大会，会开得很成功，成功到連我自己都感到惊奇。一句話，那可以說是个“心灵”的集会。大会的主要目的是募集捐款，由一些妇女們在会场里拿着小竹筐，在到会人中間轉来轉去，进行募捐，結果成績好得簡直出人意外。

“尤其出人意外的是古河市兵卫夫人的自杀。据說她原来就神經衰弱，一直过着寂寞的生活；那天晚上她暗地里打发女佣人去探听大会情况，結果就在当夜跳进神田川自杀了。

“过了两三天(按：我保留在剪貼簿里的那則消息，写的是‘三天前(20 日)的晚上……’，所以这第二次的集会，无疑地是 20 日举行的。还有，我在那則消息旁边注着 12 月 23 日的日期，这可能

是我把 11 月誤作 12 月了。因此，上面所說的‘11 月 29 日’，該是‘11 月 19 日’；‘过了两三天’，該是‘第二天’。木下老先生的回忆，似乎全凭記憶；我认为这点儿錯記或笔誤，是完全可以想像的），又在本乡区的中央会堂举行了第二次演讲会。那天晚上的集会的盛况也不亚于第一次。演讲会结束后，有一位青年向站在門外的妇女問道：‘这次募捐只收現錢嗎？东西要不要呢？’‘捐东西是再好不过的了。’那个妇女这样回答以后，青年人立即脫下自己身上所穿的日本服外套，往那儿一扔就走了。第二天，我正在銀座的报館里，作事务工作的人跑來說：刚才有一个人力車夫送来一个大包裹，說是捐給矿毒地区的，說完就走了；問他捐献者的姓名，他說因为本人叫他不要說，所以他不好讲。我立刻想起了昨晚捐出日本服外套的青年。因为觉得这件事情需要研究一下，就馬上打发人把潮田女士請来，两人会同把那大包裹打开。一看，里面既有日本衣服也有西装，既有冬天穿的也有夏天穿的，既有碎白点子布的也有染上家徽的。潮田女士摇摇头說：‘这可不能就这么收下来！因为我觉得这人說不定精神有点儿不正常。’

“麻煩的是不知道那个人的姓名。于是我們两人把所有的衣服都检查了一下。結果从釘着銅鈕子的大学生制服的口袋里找到一张名片，名片正面印着‘河上肇’几个字，背面印着‘本乡区駒込千駄木町×××館’的字样。

“潮田女士說：‘不知道这名片是本人的还是別人的。好歹去駒込的公寓打听一下，也許会找到什么綫索。’

“于是她馬上坐了人力車赶了去。（按：我那时住的是大学正門前森川町的公寓。可是，以前曾經住过駒込千駄木町一家叫什么‘富士見館’的公寓，这张名片大概就是住在那里的時候印的。我已經什么都忘得干干净净了，不过，那时候大学生还十分稀罕，

头上一戴四角帽，身上一穿銅鈕子制服，無論在自己或別人的心目中，都仿佛已經獨立成人了，想必因此就印了附有住址的名片。不過，不管怎麼說，值得欽佩的是木下老先生的驚人的記憶力。)過了一會兒，她回來了，說：‘就是名片上所寫的那個人。本人不在家。我從公寓的老板娘那兒打聽到了詳細情況。據說本人是一個非常感情用事的人，但是精神並沒有什麼不正常的地方。這人在大阪還有個闊氣的舅父，所以生活並不困難。’

“沒想到在 12 月 10 日田中正造老先生拚死‘告御狀’的事件的背后，還有這樣的光明的一面哩。”

木下老先生竟把我這種發瘋似的舉動稱為‘光明’。這真是可感！

三

關於田中正造老先生的事跡，別的文章已經有所記述，今後也自有記述的人；不過這裡既然提到了他的名字，我就順便把老先生的事跡稍稍說一說。

翻看一下《田中正造翁日記抄》那本小冊子，一開頭是這樣寫着：

木下尚江老先生把義人田中正造七十三年的人生涯分為前後兩期。那就是：

(一)前期——從 1841 年誕生到 1901 年告御狀

1859 年，十九歲的時候，做了里正；參加莊園主六角家的改革運動；1869 年出獄；

1879 年，三十九歲，開始搞自由民權運動；四十歲，當縣議會議員；四十四歲，和朽木縣縣長三島通庸的暴政作鬥爭；

1890 年，五十歲，當選為眾議院議員；五十一歲，在二屆議會首次提出足尾礦毒問題；

1901年，六十一岁，10月里辞去众议院議員的职务，12月10日告御状。

(二)后期——从告御状到去世

1907年7月，六十七岁，发生了强迫破坏朽木县都賀郡谷口村的事件；

1913年9月4日，七十三岁，归天。

总之，田中老先生的一生是以六十一岁的告御状作为轉折点的，在此以后，他就完全沈潜到宗教世界里去了；而在六十一岁以前，他的最主要的活动是为了足尾地区的矿毒問題，“以当地义人的資格，發揮他那烈火一般的气概，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我听过老先生許多次演讲。查看我那本旧剪貼簿，那年(1901年)的4月16日，我给《防长新聞》写过一篇《花时所感》，里面有这样几段話：

“4月3日，神田青年会館举行公德养生的演讲会，我也是旁听人之一。我近来的賞心乐事之一，就是听演讲；神田青年会館，我也常去(經常坐在第一排右边紧靠着讲坛的地方)，所以田中正造老先生的演讲，也曾听过几回。这一天，老先生又在为讀卖新聞社主办的演讲会作演讲。

“不用說，老先生还是蓬着头，飘着白鬚鬚，棉布外褂上染有五个特別大的家徽。一走上讲坛，他照例擂着桌子大声疾呼，說是如今道德敗坏，沒有至誠的人。老先生的演讲，多半說不上井井有条，然而总让人觉得他所說的是肺腑之言，所以每次听他的演讲，我总不免掉眼泪。他那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真有‘穿了破棉袍，和穿狐貉的人并立而无愧’的气概。他捐除个人的名利，粗衣短褲，一点也不觉得寒愴，日夜为了矿毒地区的几万人民东奔西走，席不暇暖，——联想到老先生这样一个生平，同时眼看着他大声疾呼的神情，我們怎能无动于中呢。……眼看着一个头发已經半白的老年人，飯都忘了吃，在大声疾呼，而我們却渾渾噩噩，又是搞恋爱，

又是吃喝玩乐，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呢？做学问有什么意义呢？出过吉田松阴和另外一批志士的周防和长门地区的人，不见得每一个都没有一点骨气；大家起来努力发奋一番吧！……在目前的情况下，最需要的是至诚的人，是舍身殉国的人，是如饥如渴地追求正义的人。如果不论在朝在野，都是这样一种人，就再也不会有什么贿赂等等！诸位究竟喜欢哪一种人呢？拿一国的政治家来说，诸位喜欢那种营私舞弊、侵吞公款、牺牲诸位的利益的人么？拿学校里的校长和教师来说，诸位喜欢那种只知道对诸位阿谀奉迎，以便保全自己地位的家伙么？喜欢为自身的利益而牺牲诸位的人，而嫌恶为诸位的利益不惜舍弃自己生命的人么？

“如果诸位喜欢为诸位的利益不惜舍弃自己生命的人，那末，诸位也必须不惜为人家的利益而死。世上决不应该有这样的自私自利的事：只要求别人为自己的利益而死，而自己却不愿为别人牺牲。耶稣要我们为别人做那我们希望别人为我们做的事，这是很有道理的。诸位，既然我们喜欢那些为我们的利益而牺牲的人，那末我们也就应该有为别人的利益而牺牲的决心。牺牲一己、献身行为、至诚之心，这对任何时代、任何事业都是必要的。特别是近年以来，世界大势十分险恶，国内形势又是如此，这就更加需要至诚的人。喀莱尔在他的《英雄和英雄崇拜》里说：‘幽深、伟大、纯粹的至诚，是一切英雄的最重要的特性。大人物要是没有至诚，就不能成为英雄。’吉田松阴说：‘从来没有不被至诚感动的人。’说需要有至诚，这并不是我的什么新发明。……”

这篇文章可能是听了田中老先生的演讲之后，一时兴奋，随手写出来的；因为是年轻时代写的东西，所以在四十年后已经成了白发老头儿的今天看来，觉得里面充满着青年人的急躁，实在见不得人。不过，总而言之，当时我从大学讲坛上的教授们那里所受到的

感化反而少，从校外的讲坛上的演说家那里所受到的感化反而得多。——在中央会堂脱下外套，其实并不限于那天晚上的一时兴奋。

不过，现在想起来，田中老先生几乎为之献出他的一生的足尾矿毒事件，无非是日本国内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所引起的一个不可避免的悲剧而已。正像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无比出色地描写的那样，资本这样东西，实在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骯髒的东西”^①而出现到世上来的。无论在哪个国家，资本主义最初为了站稳它的地盘，必须有一个残酷剥夺独立生产者的生存资源的过程。“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与火的文字，写在人类的编年史中的。”^②尤其是“农村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剥夺，就是这全部过程的基础”。^③因而“是由征服、压迫、劫掠、杀戮，简言之，由暴力起重大的作用”。^④总之，足尾地区的许许多多农民，失去了世代相传的土地，相继变成了无产阶级，那是为了使古河这个大资本家迅速成长（同时也是为了促进日本资本主义的温室成长，缩短封建的生产方法转化为资本家的生产方法的过程）所不可避免的必然的历史悲剧。而在这样一个悲剧里，出现了义人田中正造老先生，乃是值得引为我们日本的骄傲的。

田中老先生六十一岁的时候，告了御状，从此断绝了一切世俗关系。在前面提到的《日记抄》里，他写着下面这样一些话。

“我如果一样东西也没有，天地就都是我。我如果有一样东西，这样东西就会造成无限大的阻碍，不让我升入天堂。（1909年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961页。——译者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04页。——译者

③ 同上书，第905页。——译者

④ 同上书，第902页。——译者

7月7日)

“肉落,骨朽,神在。(1910年4月19日)

“我一飲一食,随遇而安。穷人是幸福的。(1910年6月11日)

“如果不能爱别人胜于爱自己,那末别人见了我,也不会产生分毫的爱,这是常理。丝毫的爱都不曾给与对方,却先要对方报答,这怎能算是志士呢?更何况欺騙人民,不给人民丝毫的爱,却先想夺取人民的财产,这叫什么呢?世上有财有势的人,大致都是如此。(1910年7月5日)

“虚飾离上帝很远。(同上)

“天堂是吃上帝的飯的地方。吃人的飯,还不能称为天堂。但愿有这么一天能进入吃上帝的飯的天堂的飯厅里去。(1910年12月18日)

“心随着上帝,就不怕上帝看见。呆在一間屋子里独自信仰着上帝,心就已經和上帝合一了,沒有比这个更使人感到踏实的了。(1910年12月28日)

“虽生犹死的人多;虽死犹生的人少。(1911年4月20日)

“要想得到天地,一定能够得到。可是,如果存着一点私心,那就什么都得不到。(1912年8月24日)”

这本日記选的編者,在卷末加了下面这样一段后記:

正造老先生的手記,記到1913年8月2日为止。

第二天病倒。

知道他病重,不再能好,拜訪他的客人多得像穿梭一般。

8月22日的半夜里,他坐了起来,大声叫道:“救救现在!”“救救现实!”

9月4日早晨,仰臥着低声地說:“今后的日本的……”看他的神情,似乎不胜忧悶。将近正午的时候,他要求让他起身,端端正正地坐着深呼吸了七、

八次，就此死去了。院子里秋虫的声音比雨声还密。

遗留下来的东西非常简单，仿佛是修道和尚的遗物。

蓑帽 一顶

头陀囊 一个

囊里的东西是：《新约全书》一册，日记三册，手纸少许。

我能亲眼看到这样一位义人，觉得是毕生的幸福。

四

再回头来看木下老先生写的回忆。

我在中央会堂听了那次演讲的第二年(1902年)的7月，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在此之前，为了想在毕业后当新闻记者，我突然去找木下老先生(那个时候的木下，按岁数说，当然还不能称为老先生)，请他介绍。老先生那时住在神田区猿乐町的一条小胡同里。还记得房子似乎很小，在一个大杂院里。我同他见面的屋子里，拉窗的前面放着一张小小的矮桌子，墙边放着一个衣橱，衣橱上有个小小的圆玻璃缸，里面养着金鱼。那时我的清教徒倾向似乎十分强烈，当我看到这样东西时，我觉得尽管是几条小小的金鱼，把它们装在小玻璃缸里不让它们自由，这种做法同自己理想中的木下老先生的为人似乎不大相称。我记得我曾访问过他两三次。他还同我去过麴町区某条街的岛田三郎先生家里。记得岛田先生住的房子漂亮得出乎意料之外，从会客室里可以看到葺治得非常讲究的大花园。

木下老先生这样记述着当时的情况：

“有一天，河上突然到神田区猿乐町我的蜗居来看我。他说他想当新闻记者，要我介绍他进《每日新闻》报馆。我翻开他带来的杂志，读了他的文章。他的文章既有条理，又有热情，真是写得出

色。本来，我們很需要这样的人，无奈报館的經濟情况不允許。我把这一层直截了当地告訴了他，他摇摇头說：‘錢的問題，請不要担心，只要能让我写文章就行。’我把这件事也告訴了島田先生，想設法让河上参加报館工作。記得为了此事，河上曾来看我两三次。后来据說他在大阪的舅父不贊成，因而他放弃了当記者的願望，不久当了农科大学的教师。”

老先生接着又写道：“从此以后，我再也沒有和河上见过面，但是我常常想念他。直到后来，有一天——已經記不清是什么时候了，——我坐山手鉄路的电車回家，旁边有人在看晚报，一看，报上登着一大幅照片，是个男人的寒酸背影，瘦骨嶙峋的（按：这篇文章后来在《改造》杂志上发表的时候，“瘦骨嶙峋的”被誤抄成“疲憊的”了）高个儿，腰里搭拉着一条布腰带。我心里不觉一惊，暗想：那不是活像我三十来岁时的小照嗎？再仔細一看，原来照片上的人是河上，正被警察厅押解到什么地方去哩。这时我禁不住眼泪直掉。我和吉野，后来一直往来着，还希望有机会再和河上敞开胸襟談一次。”

这里所說的照片，大概是警察厅把我押解到丰多摩刑务所去的时候，报館的照相人員拍攝的吧。拘留在警察厅里的时候，也不知道为的是什麼，他們把我外褂上的小帶子都搜了去，腰带自然不許用，所以我只好用針織品的纏腰布来代替，大概这在照相里就被誤认作布腰带了。既然不是腰带，就不可能“搭拉着”，但給人的总的印象是这样罢了。我从警察厅被押解到丰多摩刑务所去，是在1933年2月里，所以是在老先生写这篇回忆的1936年的三年之前。

老先生这篇回忆，是1936年7月24日写了寄給森戶辰男的。这一年，东京的《帝国大学新聞》上，連續刊登《先觉新聞記者的足

迹》，森戶給 6 月 25 日的該报写了一篇《尚江和热情》，作为其中的一篇。老先生偶然看到了那篇文章，因而給素不相識的森戶写了长长的一封回忆过去的信。

这封信，老先生大概是托誰轉交給森戶的吧。哪里知道因为那封信的内容很有趣，在交到森戶手里之前，被大家輾轉传閱了相当久。

当时我正关在小菅刑务所。我的二女儿芳子，那时嫁給了鈴木。鈴木在东洋經濟新报社工作，报館編輯部里的人給他看了这封信，他为了等我出獄后給我看，所以把它从头到尾照抄了下来。

1937 年 6 月 15 日，也就是这封信写后大約过了一年光景，我出獄了。出獄之后，我馬上就看到了这封信的抄本，当时由于闊別了四十多年，老先生还記得我的事情，觉得非常欢喜。老先生說“从此以后，我再也沒有和河上见过面，但是我常常想念他”；又說看到我被押解去刑务所的照片时，“禁不住眼泪直掉”；还說“还希望有机会再和河上敞开心襟談一次”。——这样一位老先生，我也四十年不见面了，十分想会见一次。

出獄后不久，我接受了朋友畑田的劝誘，有生以来第一次去到夏天的谷川溫泉洗溫泉浴。从溫泉回来，不得不閉門幽居，几乎足不出戶地过着日子，也沒有急急于打听老先生的住址，就这样地一天天过去了；到那年的秋末（11 月 5 日），想不到老先生竟永远抛弃了这个世界。我一看到报上的消息，既吃惊又非常抱憾，不过已經无法可施了。我在这里写这篇回忆的时候，还十分后悔自己的怠慢，觉得非常对不起他老人家。我现在手里还保存着遺族送的老先生晚年用楷书写的一首短歌的照片，歌詞是：“偶尔一看，自己蒼老得像不知哪个山里的烧炭夫了。”另外，还保存着老先生晚年在书斋里拍的一张小照。那张小照，和四十年前在讲坛上所看到

的风采几乎判若两人，这使我很感慨。

(1942年11月21日脱稿)

獄中的食物

—

这一阵，食物非常缺乏，不用說我最喜欢的水果吃不到，就連醬湯也不是每天早晨都能吃到，三頓飯也都掺杂着洋米或者麦，这倒罢了，問題是就連这样的飯也不能尽着肚皮吃，整天只觉得沒有吃飽。这样一来，像我这种沒有事情干的老头儿，自然一坐下来就光想到吃上去了。

想起来，过去六十多年的一生中，我经历了許許多多波瀾，而我的食欲也起过很大的变化。

关于幼年时代的全部回忆，都說明我是个食欲不振的孩子。后来尽管在大学毕了业，結了婚，記得那时来东京和我們一块住了几天的祖母，还一再說：“年輕小伙子一碗飯还得泡了茶才吃下去，怎么成呀！”后来当了京都帝国大学的教授，稿費的額外收入尽管相当多，那时我并没有怎样摆闊（这从我当时用极坏的印泥在字画上落款一事，就可以看出来）；尽管这样，我妻給我准备的飯菜，却經常是高价的名石銅盆魚，而我呢，也只不过吃上一两筷而已。到了晚年，触犯了治安維持法，关在丰多摩刑务所的时候，一日三餐，都是从獄外送进最高价的盒子飯；可是，往往筷子都不碰，就把它拿开了。从这些例子看来，我并不见得是个貪嘴的。不过，那多半是赶上我健康状态不大好的时候；相反，如果在我健康状态好的时候，我比誰都吃得多，几乎不知道有个飽；至少对于吃是非常感兴趣的。

现在我手里有一篇山口高等学校时代的游戏文章，那是我故乡的弟弟整理壁櫥的时候找出来寄给我的。内容如下：

檄

宁美尔王二世现将退位，特向天下志士颁发宣言，以征求候补者。

宁美尔王二世让位宣言书

宁美尔王一世即位以来，至今二百日，在此期间，维持我班生气，攻陷各处食城，其功永垂史册。现二世年事已高，行将让位。夫世不可无宁美尔王，否则天下将大乱，生灵涂炭，终至不可挽救。呜呼，愿天下志士能继其遗业。如其不然，则宁美尔王一世开基以来，仅传二世，凡二百日而亡，岂非曇花一现！呜呼！愿天下志士有以兴起。

1896年4月29日

宁美尔王二世

附白：如有意为宁美尔王三世者，可发起第一部第一年級饕餮临时大会，并利用之，庶几获得天下之霸权。特就商于饕餮界之群豪。

这篇东西，大概是在上课的时候，偷偷地从桌子底下传给全班看的玩艺儿。“宁美尔王”这个词，是德文“nimmersatt”的音译，意思是永远不知道有个饱。那时，我们班上把食量最大的人称为宁美尔王。记得是那年正月，班里开新年会，我吃年糕汤里的年糕，吃得最多，因此成了宁美尔王二世。全班数我最瘦最弱，吃起东西来，却不比别人少，由此一端也就可以知道了。

1933年秋天，我年纪将近六十岁而被关进小营刑务所，从此不再能吃到狱外送进来的匣子饭，一时之间，吃不进刑务所里的食物，感到十分痛苦。我眼看着逐渐瘦下去，正在担心今后的五年岁月怎样熬得过，哪里知道不久就习惯了那个环境，无论什么东西都吃得光光的，而且还嫌不够，初来时一日三餐无论菜和饭都要扔掉一大半的情景，简直疑心是做梦。那时我被关在单身牢房里（单身牢房的生活，大约继续了一年），除了上、下午各有不到三十分钟的

室外运动之外，整天坐在牢房的便桶盖上，最初整理印刷厂里的鉛字，后来翻譯外文，一点体力劳动也不做。尽管这样，記得我一会儿功夫就把二等飯吃得光光的。

发給犯人吃的飯(六成麦，四成洋米)，是一份一份装在圓筒形的容器里压結实的，換句話說，是个圓筒形的飯糰，可以像面包那样拿来拿去。飯按分量分成九等，二等飯堆得像山那样高，九等飯薄得像张薄餅。一等飯我沒有见过，也許普通不大准备。九等飯也完全是例外的，只給那些受減食处罰的人吃。像我这种在单身牢房里坐着干活的人，本来规定发給八等飯；其余在工厂或农場干活的人，按照他們劳动的强度而提高飯的等級；只有从事最繁重劳动的人，才发給二等飯。

当时像我这种整天留在单身牢房里的人(一般犯人清早一起身，就离开牢房，排了队上各自的工厂和农場去)，一日三餐是由几个管伙食的犯人用运貨車把食物运来，发到每間牢房里来的。为了不出差錯，总是由两个管分发食物的看守，会同着管单身牢房的看守(这种看守都佩劍)，走在运貨車的前后監視着。看守走在头里，起先推来运开水的車子；于是牢房里的犯人把吊子放在門口，接一瓢开水。随后是运菜的車子。有一个管发菜的看守跟着。犯人拿出碗来让发菜。最后是运飯的車子。仍然由一个管分发食物的看守跟着。因为都是单人牢房，所以，所有的飯都是八等飯。可是看守却預先从伙房里拿了一个到三个二等飯或三等飯，夹杂在八等飯里面，听凭他个人的酌量，把分量大的飯送进个别的牢房。而我呢，不知不觉中間却受到了这种特別的照顾，而且还非常欢迎这种照顾。

这种二等飯，据說有二合几勺，而我有时一天能得到两份(中午和晚上)，并且把它吃得光光的。现在想起来，那无异于一頓就

吃掉了今天一整天以上的配給量。和我同样有过坐牢經驗的我那小舅子大塚，据說后来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不禁为我的飯量之大而咋舌。

当时我能吃那样多的飯，保持那样旺盛的食欲，也許是尽管食物的营养价值一下子变得那样差，而我仍然能够維持身体健康的原因；不过，也說不定由于我岁数大了，运动少，吃得过多，反而影响了健康（固然，这样多吃，也只有入獄后的第一个冬天；到了后来，每年夏天連七等飯都吃不了）。总之，由于坐牢的关系，我的胃胀得很大，即使出獄已經五年的今天，也还是非比別人多吃許多，不觉得吃飽。赶上物資不足的今天，由于我年龄超过六十，米的配給量比一般人都少，每天只有二合，所以这一向我总是觉得吃不飽。由于这样的关系，再說本来我又是個貪嘴的，就終於想到写这样一篇回忆了。

二

查閱《監獄法施行細則》，第九十四條是这样規定的：

“給与在監者的糧食的种类以及分量，規定如下：

“一、飯（次白米十分之四，麥十分之六）每人每頓米一七二克、麥一九二克以下

“一、菜（每人每天五分錢以下）”

日	星期	早飯	午飯	晚飯
1	日	一 醬湯 (醬, 菜, 木魚粉, 芝麻鹽)	煮麵條 (干麵條, 菜, 木魚粉, 醬油, 咸菜)	醬湯 (醬, 黑海帶, 木魚粉, 芝麻鹽)
2	日	二 同上 (同上)	拌菜 (菠菜, 木魚粉, 醬油, 咸菜)	同上 (同上)
3	日	三 同上 (醬, 木魚粉, 咸菜)	煮菜 (猪肉, 土豆, 胡蘿卜, 洋葱, 糖, 醬油, 咸菜)	煮菜 (鮮魚, 蘿卜干, 糖, 醬油, 咸菜)

4日	四	醬湯 (醬, 蘿卜干, 木魚粉, 芝麻鹽)	煮菜 (鬼芋, 大豆, 糖, 醬油, 咸菜)	醬湯 (醬, 海帶, 木魚粉, 芝麻鹽)
5日	五	同上 (醬, 菜, 木魚粉, 芝麻鹽)	拌菜 (菠菜, 木魚粉, 醬油, 咸菜)	同上 (同上)
6日	六	同上 (同上)	豆腐湯 (豆腐, 菜, 木魚粉, 醬油, 咸菜)	同上 (醬, 菜, 木魚粉, 芝麻鹽)
7日	日	同上 (同上)	肉飯 (牛肉, 牛蒡, 糖, 醬油, 咸菜)	同上 (同上)
8日	一	同上 (醬, 黑海帶, 木魚粉, 芝麻鹽)	煮菜 (花扁豆, 糖, 醬油, 咸菜)	同上 (醬, 蘿卜干, 木魚粉, 芝麻鹽)
9日	二	同上 (醬, 菜, 木魚粉, 芝麻鹽)	煮菜 (蘿卜干, 干沙丁魚, 糖, 醬油, 咸菜)	同上 (醬, 菜, 木魚粉, 芝麻鹽)
10日	三	同上 (同上)	煮菜 (鮮魚, 菜, 糖, 醬油, 咸菜)	同上 (同上)

还有,《監獄法施行細則》第一百五十二條說:“对于應該受到獎賞的人,可授与獎狀,獎狀累計不得超過三張”;第一百五十三條說:“獎賞規定如下”,其中的第五項說:“給与特別的糧食和飲料”。按照那個規定,在上開菜單上所寫的日子里,有獎狀的犯人,除了上面所說的菜以外,還可以領到這樣的“特菜”:

1日(星期一)煮菜(鮮魚,糖,醬油),得一張、兩張或三張獎狀的人一律發給。

3日(星期三)青魚子(青魚子,醬油),發給得兩張以上獎狀的人。

5日(星期五)煮菜(鮮魚,糖,醬油),發給得三張獎狀的人。

8日(星期一)炸素菜(胡蘿卜,牛蒡,面粉,菜子油,醬油),得一張、兩張或三張獎狀的人一律發給。

10日(星期三)煮菜(花扁豆、糖、醬油),發給得兩張獎狀的人。

在那張菜單后面,還有一條“備考”:“在這十天里,將發給二月份完成任務百分之一百三十的人以及超額完成任務的工廠以年糕

小豆湯和包子”。

对于一般人來說，刑務所到現在還完全是個秘密世界，所以談到這些情節，我還得稍稍加以說明。

我關在單身房裏的時候，有一次在信上寫了伙食的情形，結果信沒有讓寄出去。監獄里吃些什麼東西，看來是不許向獄外洩漏秘密的。既然這樣，這個菜單現在怎麼會保留在我手邊呢？原來這是由於我入獄一年多以後，享受到了特殊的自由的緣故。初進監獄的時候，我本來日日夜夜被監禁在單身房裏，可是，不到一年，我似乎獲得了所長的莫大信任，一步登天地享受到了監獄里最舒適的待遇。白天出了單身房，整天在圖書室的一角，占據一張桌子過日子。這個圖書室里陳列着借給犯人看的圖書，除我之外，有三個人搞圖書的出納工作。我們每人都有一張桌子，放在窗口，各自在上面工作。監獄里哪兒都有看守監視，唯獨圖書室里沒有看守，所以我們在種種方面都保有特殊的自由，比如可以把各種東西藏在桌子的抽屜里或者圖書室的屋角里。至於住的那間牢房卻不然，看守每天都要進去檢查一次，所以除了規則所許可的東西以外，其餘一樣也不能放。即使是家里寄來的信，經過一定時間，也要搜去；准許記日記的人，他的日記經常得受檢查，所以牢房里是絕對沒有保存秘密的余地的。但是，我們有圖書室這樣一個治外法權區，於是我就把上面那樣的菜單抄在日記簿里，藏在圖書室里了。當時擔心的只是出獄那天能不能太平無事地帶出去，哪里知道出獄那天，保管科的看守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地放了過去，因而沒有遭到沒收的災難。

像上面那種菜單，管伙食的看守要寫好幾份，其中的一份恐怕還要送到司法省去，所以必須刻蠟版。而刻蠟版和油印的工作，他們既不內行，而且也嫌麻煩，所以總叫我們圖書室里的雜役夫代

办。我就趁此机会把上面那张菜单照抄一份，保留了下来。

此外，对于菜单备考栏里的“完成任务百分之一百三十的人”也必须解释一下。比如拿糊气球之类的作业来说，每人每天要糊多少个，订有一定标准；在一个月中间，要是超额百分之三十完成那个标准，就称为“完成任务百分之一百三十的人”，可以得到包子啦、年糕小豆汤啦之类的特别奖赏。在协同作业的工厂里，不可能审定每个人的工作量，因此对整个工厂规定出每月的生产定额，哪个工厂超额完成了任务，就算是“超额完成任务的工厂”，在那个工厂里做工的全体犯人，就可以得到特别供应。

我在图书室当杂役夫的时候，已经得了一张奖状，作业成绩——尽管我整天大部分的时间只是坐在桌子前面读自己所爱好的书——被审定为“完成任务百分之一百三十”，后来又被审定为“完成任务百分之一百五十”。奖状那个东西，得上一张就很不易，至于弄到三张的，多半是坐牢坐了十年以上的人，人数是极少极少的。

根据上面的解释，再看一下菜单，像我那样有一张奖状的人，在4月1日到10日中间，可以吃到下面这样一些荤菜。

1日 红烧鱼

3日 猪肉(和土豆或是别的东西一起红烧)，鲜鱼(和萝卜干一起红烧)

7日 牛肉(制成肉饭)

9日 干沙丁鱼(和萝卜干一起红烧)

10日 鲜鱼(和菜一起红烧)

假如我有三张奖状的话，另外还可以在2日吃到青鱼子，5日吃到红烧鲜鱼，8日吃到油炸素菜。

又，作为“完成任务百分之一百三十”的作业能率的保有者，在

这十天中間，我还可以吃到三个大荞麦面包子。

三

我回顾了过去的獄中生活，在这里詳詳細細地抄出这样的菜单，目的是为了明确一下：今天(1942年12月)，一般国民在战争时期的生活标准，已經比犯人都不如了。

想起来，当我坐牢的时候，我每天一早一晚都能喝到酱湯，而酱湯又是我所爱喝的，真是口福不浅。营养学告訴我們，大豆乃是“地里长的牛肉”，可以代替肉类，从这个意义上說，对于不大吃肉的日本人來說，酱湯乃是最有帮助而且最便宜的食物之一。可是如今，豆酱供应得非常少，我們几乎要每隔三天才能吃到一次。

監獄里的酱湯，經常和入相当大量的木魚粉。所謂木魚粉，乃是在精制木魚的时候，从表皮上刨下的粉末，实际上也就是质量較差的木魚的粉末。可是，如今我們一般市民家庭，已經好久买不到木魚了。我常常这样想：当时監獄里吃的那种木魚粉，哪怕有一点儿，又多好呀。

菜单里有一項芝麻盐，那是在沒有咸菜的时候，用它代替咸菜，撒在飯上吃的。而芝麻，在今天也是非常难得的东西了。另外，所有的煮菜里都用糖，这也是值得注意的。目前糖非常缺少，很多人家，煮菜都用不上糖了。完成百分之一百三十作业任务的人，还发給包子或者年糕小豆湯，許多人对此也会感到羨慕吧。

至于葷菜，在今天來說，似乎也是監獄強。如今买肉要肉票，我住在京都，几个月也領不到肉票，一个月要是能領到一张肉票，就算不錯了。买魚虽然不用票，还是所謂自由販賣制，可是，魚还没有运到之前，就得排队等上一两个钟头，而且尽管等了好长時間，也不一定就能买到手。如果不排队，那就只能偶尔在普通市

場上花高价买剩下的不高明的魚。根据上面那张4月上旬的菜单，当时我在十天中間就吃到六次魚和肉；至于得了三张奖状的人，十天中間可以吃到八次之多。

我写这篇东西的时候是12月，不久就要过年了。新年里能吃到些什么东西呢？这样一轉念，就回想起过去的監獄生活。小菅刑務所新年的菜单，几乎每年总是一样的。試把1936年新年的四天中間的菜单抄出如下：

1月1日——(早晨)米飯之外，菱形大切糕三块；紅烧猪肉、牛蒡和土豆；青魚海带卷两个；青魚子；紅生姜；橘子一个。(中午)紅烧猪肉、牛蒡和土豆；醋浸蘿卜絲。(晚上)糖燜黑豆；炒鱸魚干。

1月2日——(早晨)和元旦那天完全相同，不过水果不是橘子，而是苹果。(中午)清湯；鸡蛋一个；炒牛蒡絲。(晚上)煮面条；白芝麻、豆腐拌鬼芋。

1月3日——(早晨)和元旦那天相同，不过沒有水果。(中午)紅烧猪肉、牛蒡和土豆；青魚子。(晚上)紅烧牛蒡、胡蘿卜和青芋；糖燜花扁豆。

1月4日——(早晨)醬湯。(中午)咸鮭魚。(晚上)大葱煮油豆腐。

今年的新年，很多家庭恐怕連这样的菜也弄不出吧。拿我家來說，看来根本就弄不到猪肉、牛蒡、海带卷、咸鮭魚和油豆腐。新年虽然配給二合豆，可是因为沒有糖，所以不用想吃到刑務所里那种糖燜黑豆或糖燜花扁豆。

再看一下1937年的獄中日記，2月3日立春前一天記的是：午飯是牛肉飯，晚飯是面条。2月24日記的是：領到包子三个。3月11日(庆祝刑務所內的神宮遙拜所落成)記的是：中午的菜是紅烧牛肉、牛蒡和土豆，另外还有紅白餡儿年糕两个。3月19日

記的是：領到包子三個。3月23日(春分)記的是：中午是赤豆飯外加煮小青花魚一條，還有豆沙糯米糰子兩個；晚飯是醬湯和油豆腐飯。3月25日記的是：中午的菜是金槍魚的生魚片。4月29日(天長節)記的是：中午的菜是紅燒豬肉、土豆和胡蘿卜，紅生姜，另外還有紅白餡兒年糕兩個；飯是小豆飯；晚上的菜是面麩煮沙丁魚兩條，火蔥三個，等等。

如今，無論是誰，普通都是吃不到包子或者餡兒年糕的。(據說這些東西，軍隊的小賣部里一年到頭都有，但是，軍隊里又何止包子或年糕呢。牛肉、豬肉等應有盡有的呀。)

關於蔬菜，也要談兩句。像我們這種一夫一妻的家庭，目前京都每天的配給量往往只有白薯一個，或是洋蔥一個，或是胡蘿卜四分之一個，或是白菜半棵。量的方面，這就遠遠趕不上刑務所。我記得，刑務所里發給的拌菠菜，分量異常多；油炸牛蒡、土豆、白薯等，也非常豐富。

總之，關於刑務所時代的食物的一切回憶，使我有充分的根據斷定：現在一般國民的營養狀態，比平常的犯人還差。不用說，犯人的口糧，是拿生活的最低限度作為標準的，要是再低，就有損健康。所以，既然一般國民的營養狀態比犯人還差，那就意味着國民如今都處於飢餓狀態，得不到成長和生存所必需的食物量。雖則沒有人餓死，然而因為營養不良而逐漸損害健康的人，可能已經不少。今天早晨看報，大藏大臣還在要求全國人民下定決心死守孤城，哪里知道國民早已被迫過着死守孤城的生活了。從另一角度來看，全國人民可以說都已進了刑務所了。從早到夜只想着吃的東西，一開口就講到食物，終年特別盼望吃甜貨，這是犯人的特點；而我覺得，近來至少都市里的市民們，都具有這樣的特點了。當局經常叫大家做好進行長期戰爭的精神準備，可是國民怎么能長久忍

受这种饥饿状态呢？这不是什么精神问题，而是个生理问题。我不能不认为，这个战争是再也打不下去而快要结束了。

记忆中的种种食品

写完《狱中的食物》以后，我往往还是整天尽想着吃的东西。虽然是废话连篇，现在且凭一时所想到的，拉拉杂杂地把它一一写出来。

1. 山头的豆馅年糕

爬上山头，那里有一家茅屋盖的茶馆，屋檐前面拴着一匹拉货的马，马夫坐在旁边那张板凳上，在津津有味地吸着旱烟。我也在那张板凳上坐下，于是茶馆老板娘从茶锅里舀了一杯茶，装了一木碟豆馅年糕送来。我吃了几个豆馅年糕。那粗茶的颜色浓得犹如煎药，配上皮儿薄得连豆沙馅儿都看得出的新做出来的柔软的豆馅年糕，那滋味真是好极了。——这是我十五、六岁的时候，从山口高级中学徒步回家乡岩国，半路上所经历到的。（那时铁道还没有修通，从山口到岩国，要走旱路先到三田尻，再从三田尻坐轮船到岩国。有一次，我没有坐船，完全靠两条腿走回家。）事情到今天已经快过半个世纪了，不知怎地，我在那家仅仅路过一次，再也不会路过第二次的山头茶馆里所吃到的豆馅年糕的滋味，却永远牢记在心。有的时候，在我这老头儿身上，甚至唤起一种类似思念故乡的情绪和感触。

少年时候生活过来的故乡，为什么永远使人萦怀呢？少年时候所吃到的美味的东西，为什么老像家乡那样，使人那样地念念不忘呢？

2. 油炸鯽魚

我受到舅父的大恩，仅次于父母之恩，所以即使当我寄居在舅父家里时候，舅母待我不好，那些不愉快的回忆按說也应该尽量丢掉。可是，这在我却一辈子也做不到。尽管自己觉得怨恨之心丝毫也没有。

1898年9月，我二十岁那年，进了东京帝国大学。初到东京，就寄居在舅父家里。那时候，舅父担任日本银行的理事，在牛込区东五軒町江戸川的河边上，新盖了一所大宅子。宅子里面，管家的家属住的楼房，以及包車夫住的平房，都是另外盖的，和正屋不在一起。宽广的院子的正中央，挖了一个噴水池，水是从自流井来的，一天到晚嘩嘩地噴着，像瀑布那样地往池子里流注。东边的畸角上，还有一片种着許許多多老梅的梅林。女僕有五、六个，在我寄住之前，书僮也有三、四个。我刚到东京，住到舅父家去的时候，舅父到外国去了，不在家。我一到他家，为了向舅母請安，走进了上房。舅母那时似乎准备出去，正在換衣裳，站在那里束腰带。她看见我伏在她面前向她請安，还是只管站在那里束她的腰带，不过随便应酬了我几句。第一次见面的这样一个异常冷淡的印象，终于成了恶兆，此后在舅父家里，不得不一直过着不愉快的生活。

本来，我来之前，书僮有三、四个之多，可是等我来了之后，就只剩我一个人了。因此，每天早晨上大学以前，我不得不提早起身，干完許多工作。門廊旁边那間书僮房間（管家的办公桌子也放在这间屋子里），要我打扫，那是不用說的了，連里門和正門的門廊、門廊到会客室的那条长走廊（走廊里橫鋪着席垫，也就是說有六尺宽）、以及双开間的大会客室，都要我打扫。像会客室之类的地方，都得用干抹布擦。門廊里的灰泥地，得先用水冲，然后用撮布擦干

淨。一个早晨，要做完这些事情，然后徒步穿过小石川区到本乡区，赶八点钟以前到教室。那时候，大学的課堂設備很差，坐在挤滿了学生的教室的后面，听课非常不便。因此，那些在同一高等学校毕业的学生，就几个人結成一个团体，由一个人拿了好几个人的笔记簿（这是用来占位置的装装模样的笔记簿）先到教室里去占位置。这种方便我挨不着，所以只好自己找座位。因此每天早晨我总急得很；上面吩咐下来的打扫，自然只好馬馬虎虎，敷衍了事。为此时常受到警告，觉得很委屈。想起来，我现在住着这样小的房子，为了使得各处地方不至积滿灰尘，每天早晨我妻还不知要費去多少时间和精力。像舅父家那样大的房子，要我一个人打扫，准是十分潦草的。放学回家以后，我经常被差出去跑腿。尽管是买五分錢、一角錢的东西，都得要人家一笔一笔登在收据簿上，这使我觉得很膩煩。孩子們练过字的不多一点儿废紙，得拿到大紙店里去掉換几张新的宣紙，我也觉得太小气，不大乐意去。本来打一个电话就可以解决的事，特地要我跑一趟，我也感到不痛快。家里要是来了客人，为了叫个烤鰻魚什么的，就三番五次地让我去催。刚去了回来，馬上又让我再去。我心想，再急也沒用，不到时候，菜是做不出来的，后来就故意在街上閑逛，慢騰騰地走回来。有时叫了菜，客人却走了，于是又让我去把催得那样急的菜回掉。还有，到了傍晚时候，我得烧浴水。打扫浴室也是我的工作，我最討厭打扫那吐在浴池旁边的滿地痰唾。浴水要我烧，洗澡却挨在最后。有时女佣人洗澡，嫌水不热，也叫我烧。舅母洗澡时，要是嫌水不热，那就非赶快烧不可。因此，我就从堆放什物的屋子里取出装葡萄酒用的木箱的盖子，倒上火油，烧起来。舅父家放保险箱的地下室里，藏着上等的葡萄酒，需要的时候，就把它装在木箱里，拿去送人，所以备有許多木箱子。記得到了年底，发现木箱的箱盖缺少

了,引起了一番口舌。这件事情,自然怪我不好。可是,在我之前的那些书僮,据说还偷喝葡萄酒,喝了之后,就把空酒瓶扔进宅子前面的江户川里。当时我听到他们说起这件事,就觉得自己的罪过小得多了。到了夜晚,有时得陪舅母去逛神乐坂的庙会。舅母为了买一两角钱一盆的花卉,都和人家斤斤计较地讨价还价,往往因为相差几分钱而买不成。就这样地在庙会的夜市上和夜摊商人打趣闲逛着,买了一盆花儿又买第二盆,买了第二盆又买第三盆,一买买上好几盆。我从小身体就不好,再加任性惯了(据说上小学的时候,二弟走路,我却让人背;其他一切事情,都是这个派头),提着好几盆花儿走路,实在吃不消。

呆在家里,就是这种情况,所以遇到学校里教授请假,下午不上课的日子,我就到朋友住的公寓去玩,或者去逛神田的旧书店,再不然,就到牛奶房去消磨时间(那个时候,神田有一种牛奶房,卖牛奶和西洋点心,还备有几份报纸以及职员录),故意尽量弄到很晚才回家。但是,星期天却只好呆在家里了。到了每星期一次的星期天,我得彻底打扫那间西式会客室。要把桌子啦、椅子啦等等一一搬动,清除整个地毯上的尘土。打扫女佣人使用的厕所,也是我星期天的工作之一。名为打扫,实际上只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打桶水来冲一下板壁和地板,然后用抹布擦一下而已。另外,还让我锯木炭。本来,书僮住的那间屋子,火钵里只准用炭屑,我却不管这一套,把整块木炭混和在炭屑里烧。有时候,舅母直接闯进屋子来,用火筷从灰中挖出火钵里的木炭块,让它摊在那儿,然后一声不响地走开。

最受不了的是12月底的寒假期里。我每天总有差事,一直要干到大年夜的晚上才歇。得把好多根木鱼刨成屑,好多只鸡拔去毛,临了弄得大拇指的指甲痛楚不堪,像是灌了脓。由于实在疲

劳,正月初一那天,白天我钻在壁櫥里睡大觉(因为究竟是元旦,不好再叫我做什么)。派給我做的事情,也許并不算繁重,可是我不习惯于劳动,累得受不了;元旦白天睡大觉,就是个証明。

因为是这样一种情况,自然吃也吃得很差。舅母的表妹,和我同样是寄居在他家的,吃飯却和全家人一起在茶室里吃,可是,我总坐在厨房角落里吃冷飯。早飯菜总是一样咸菜。旁边虽則煮着一大鍋醬湯,我却吃不上。中午是盒子飯;盒子飯里的菜,也永远不变,每天总是一条干咸魚,鋪在飯上。晚飯的菜,每天总是煮湯剩下来的渣滓。那时候厨房里用的一个阿媽,熟識以后,常偷偷地給我澆些醬湯;要是来了客人,生魚片吃剩了,她就偷偷地把那个碟子合在我飯上。遇到那种情形,她总怕被人家看见。因为,要是让舅母知道了,准会責罵她。我长久以来忘不了她的盛情,可是后来一直沒有报答她的机会,到今天还觉得遺憾。

貪嘴的我,哪里忍受得住天天这样的伙食呢。于是,不知不觉中間,开始吃起油炸魚来了。小小的江戶川的对岸,有一家不高明的炸魚店,炸的是河里的魚。那还是 1898 年时候的事情。那时候花一角錢,可以吃到三、四条油炸小鯽魚。正好那时我每天要給故乡一个人寄当天的报纸。我每天总在天黑以后干这个工作。凑巧的是邮筒恰恰在对岸炸魚店的附近。不过虽然就在对岸,过桥却得繞些路,所以費去一时三刻,也不至于被怀疑。我拿着封好了的报纸,离开寓所,钻进炸魚店的門帘,买了一角錢的炸魚,包在竹皮里。店里的人还老給加上一撮蘿卜泥。我匆匆忙忙接了,走出两三步路,解开竹皮,边走路边吃着炸魚;走到桥上,就把蘿卜泥連竹皮都扔进江戶川里。——黑夜里一边走路一边匆匆忙忙地吃那連醬油也不蘸的炸鯽魚,托舅母的福,能吃到这样好吃的炸魚,生平只此一遭。

但是，炸鯽魚並沒有能把我羈縻在牛込區。江戶川也並沒有沖走多少張包着蘿卜泥的竹皮。因為，等到我發現這樣一條補充營養的道路的時候，我早已打算離開舅父家了。

外國去的舅父，年底以前回國了。那時候他精力非常飽滿（但看他不久就在日本銀行內部搞了一個聯盟總辭職，和山本總裁作對），火氣相當大，往往毫不客氣地訓斥人；可是對舅母却事事順從，一切都採取小心謹慎的態度。猜想起來，早就害着肺病、兩三年前曾病危過的舅母，那時可能還害了嚴重的癩病，這就使得本來對老婆溫和的舅父，採取那樣態度的吧。有人還說，舅父回國以後，我的待遇可能有所變化，哪里知道全然不是那回事。因此我終於決心離開舅父家。當時我肚皮里盤算：一旦離開了舅父家，大學里的學費就成問題，不過到那時我可以去賣報；假如故鄉的父母能多少補助一些的話，一個人的生活，大概總可以勉強維持。不過我光是有這樣一個打算，除此之外，也沒有確實的指望，事前也不同家里商量，就自作主張地找定了本鄉區台町的一家公寓。我9月里到的東京，第二年（1899年）1月底就住進公寓；算起來，在舅父家里還沒有呆滿半年。

我找的公寓房間，是那時最差的一家公寓的最便宜的房間。屋子只有三張席墊大小，另外有一個三尺見方的壁櫥，房飯錢每月六塊半。等到最後要離開舅父家的時候，我既不好不聲不響地一走了事，又實在不願去向舅父辭別，正坐在細麻繩捆好的行李上遲疑莫決，舅父卻把我叫了去，沖口就問：“聽說你在埋怨給你吃了牛吃的東西啦，是么？”當時我想，我對每天早晨吃的咸菜葉子，講了這種壞話；大概傳到他耳朵里去了。他雖然沉着臉，卻沒有像我預先估計的那樣把我臭罵一頓，我這才稍稍放了心。接着他又問我住公寓要多少錢。我照實回答了。於是舅父就說，既然那樣，以後

每个月給你两块半学費，六块半房飯錢，一共九块，你自己来取吧。我一生中曾經破釜沉舟地冒过好多次险，每次总是鴻运当头，渡过了难关。这次也是其中之一。我連做梦都沒想到，鬧得不欢而散，学費还能获得舅父的補助，心想这可太美了，于是向舅父道了謝，辞別了出来。

这样一来，我就不必去卖报了；零用錢不够，就由父母寄来，居然无忧无虑地讀完了四年大学。不过，表面上說是母亲寄給零用錢，其实母亲的錢也还是舅父給的，因此我的能够念完大学，可以說几乎完全是靠舅父的帮助。不仅这样，现在故乡的老母的生活費，也全靠舅父接济，不用我付出分文。因此，我过去所受、以及现在还繼續受着的舅父的大恩，是想忘也忘不掉的。但是，四十五年前的夜里，一边走路一边吃炸鱒魚的味道，也是到现在都忘不掉的。

3. 猪肉火鍋

我离开舅父家以后最初所找的那家公寓，由于費用最最便宜，所以买卖很不好。老板是个垂头丧气、萎靡不振的人，据說在准备参加普通文官考試，可是怎么也不像能够考中的样子。老板娘（整个公寓由她經管）呢，領着一个小孩子，連女佣都沒有，一个人干活，脸色憔悴，怀着第二个孩子的身孕，大腹便便。出租的屋子沒有几間，我所租的是其中最便宜的，前面已經提到过，面积只有三张席墊大小。这样小的地方，放上矮桌子、书箱、火鉢、炭簍子之类，夜里还得攤被睡觉，实在够噲；因此常被同乡朋友取笑說：“喂！枫月（这是我在高等学校讀書时代用的雅号），像你这样的高个儿，不懂你夜里是怎么个睡法！”他們又哪里知道，当时我的心境，真所謂“海闊从魚跃，天高任鳥飞”哩。那时我写給父母的家信，现在大概

还都保留在家乡(我父亲为我保存了我所写的一切东西),假如能找出来看看,里面一定写着这种心情的。

尽管是这样便宜的公寓,当时湯浅仓平却住在里面。湯浅后来做到警視总监,会計检查院长、宮内大臣,最后担任了内大臣这个重要职位,多年侍候在天皇身边,以至受封为男爵。可是,当时他大学还刚毕业不久(是前一年的9月毕业的),不过在內务省当个小差事而已,所以还是住在学生时代住的公寓里。他和我一样,也是山口高等学校(他毕业的那个时候,还叫做山口高等中学校,本科之外,还有两年預科)出身,所以要算是我的同乡老前輩。想到他当初住这种小公寓,可能学費也并不怎样宽裕吧。不过,同是家境不宽的前輩,像島田俊雄那样,却从学生时代就住着第一流的公寓,在自己屋子里摊着熊皮,放着长方形火鉢。这个人后来也爬得很高,成了政友会的勇将,两次当了大臣,还当过內閣参議,可是和湯浅却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物。島田在大学生时代,就做了高利貸的贅婿,不久又离了婚。而湯浅住在这家公寓里的时候,却和我家乡岩国的佐伯(当时住在东京,曾經当过牛込区的区长)的女儿訂了婚約。据说在相亲的时候,看到对方那个姑娘的手,由于衣服洗多了而弄得很粗糙,这才决定同她訂婚的。湯浅就是这种类型的人。

我住到这家公寓以后不久,湯浅就結了婚,离开了公寓,所以我們住在一起沒有多久,可是却有一件忘不掉的事情。那是我刚刚搬到公寓以后,有一个星期日,外面下着大雪,想不到湯浅把我請了去。我住的那間屋子,在楼上楼梯口,而他的屋子,在走廊对过的最里面,是一間朝南的鋪六张席垫的屋子。一走进他的屋子,他就对我說:“不知道你是否吃得来这种东西,煮了一鍋猪肉在这里,我們一块吃吧,怎么样?”当时他屋子里已經先有一位客人在那

里了，是同住在那个公寓里的文科学生长江有一（那次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以后在讀大学的几年中，一直来往着，还从他那里学会了欣赏謠曲《义太夫》，学会了下围棋。他后来当了地方上的中学校长，四十多岁就死掉了）。我们三个人，围着一只炭火很旺的小风炉，吃着黄酱烧的猪肉火鍋。那次也许是我生平第一次吃猪肉，似乎并不觉得怎样好吃，所以尽管当时也许很馋嘴，却并没有留下什么特别好吃的印象。

后来我对于猪肉也始终没有好感，不觉得它好吃。五十来岁时，参加了劳农党，那时家里来来往往的客人相当多，常常烤了猪肉留客吃饭，可是，我怎么也不想吃它，总让家里人另外给准备我个人的饭菜。一生中，唯有在小菅刑务所坐牢那几年，觉得猪肉的味道不错。和入很少一点儿猪肉煮的牛蒡、土豆的杂烩，在监狱里已经算是头等好菜了。

不过，关于监狱里的食物，我已经写了許多，就不再多写了。只有我在狱中所一再想吃的面包，还想谈它几句。

4. 美味的面包

我从1933年1月到1937年6月，一共坐了四年半的牢；不过最初还是未决犯，吃的东西可以从外面送进去。再加，我最初关的那个丰多摩刑务所，本来就没有关未决犯的地方，所以一般地说来，管得比较松，吃的东西也允许自己家里送进去。我那时，苦于食欲不振，因此中午那顿总是让送中村屋的面包进来。可是，牢房里没有收放食物的地方，送进来的东西，不得不直接放在地板上。牢房里只有一张席垫，上面放了被褥之类，席垫的周围都是地板，上面放了清水桶、泔水桶、饭盒、便桶等等。便桶是个椭圆形的木桶，清洁夫每天来倒一次，冲掉内中的粪便以后，就放进些消毒药

水，仍然送入牢房。因为倒得不仔细，那破旧的马桶的边上，还粘着粪便，到眼就觉得骯髒透顶了。我心里非常厌恶把仅仅包了一层纸的面包和那便桶放在同一平面的地板上。再说，到了夏天，黄油溶化了（那黄油装在一一只带盖的陶罐里，也只好放在蒙了一层尘埃的屋角地板上），用手掰开面包（监牢里不许用刀子），涂上那溶化了的黄油，就着白开水吃，就觉得非常恶心。我本来很爱吃面包，而且今天遇着这样的非常时期，又轻易吃不到面包，自然很想吃，然而一想到丰多摩时代的面包，连这个念头都打消了，可见那时候家里煞费苦心给送进监牢的中村屋的面包以及北海道的黄油，多么使我倒胃口。

不久我从丰多摩刑务所被移送进市谷刑务所。这个刑务所，是现在巢鸭的东京拘留所的前身，当时专关未决犯，各方面管得都很紧，食物只能由指定的牢饭铺送进一定种类的东西。（丰多摩刑务所那边，凡是家中送来的糕点之类，都被掰成两半，露出心子，以防夹带秘密通信。而这里，由于一切食物都由指定的牢饭铺送，所以这套手续就全都省掉了。）我在这个刑务所里，中午那顿饭，仍然让送面包。可是这家牢饭铺的面包和黄油，质量差到极点，因而我的胃口，比在丰多摩时更不好了。我也曾怀疑，那又臭又苦的黄油究竟是什么东西；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在市谷刑务所里，除了吃那牢饭铺里送来的这种恶劣的面包和黄油而外，别的什么也吃不上了。

等到判决确定，我就被移到小菅刑务所里去执行徒刑。一到那里，吃的东西就一概不能送了。按照法律规定，犯人的口粮照例是六成麦、四成米的麦饭；所以一旦成了徒刑犯，无论怎样想吃面包，任何粗恶的面包也不能到嘴，除非是生命垂危的病重的人，其余的人一辈子也别想吃到。可是，一旦和面包断绝了关系，却

又非常想念它。(尽管抽烟也是許多年来的习惯,我一下子就死了心;至于食物,却没有能这样。)关在小菅刑务所时,我曾害了病住过一个时期病房,在那里,看见严重的胃潰瘍患者,能吃到面包和白糖,当时我就想:哪怕生一場胃潰瘍也好,但願能弄上几片面包和白糖吃吃。就这样,我在吃不到面包的監獄里,日常想念着面包的滋味。可以說不知做了多少場面包的梦。

近来我老做梦到同一个地方去玩。梦里自己还想,怎么今天又到这个地方来了呢,可是一醒过来,梦境里的那个地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就說不清楚。我对于念念不忘的面包的回忆,也是同样情况。前前后后所回忆的东西总相同,仿佛做梦那样,場面变换得很快;而且头緒紛繁,非常凌乱。不管三七二十一,现在姑且写些出来。

每当我想到面包的时候,首先出现于脑子里的,就是 1907 年前后(大約三十五年以前)我住医院时所吃到的面包。那是我六十五岁的一生中所吃到的最美味的面包。这样美味的面包,我从来没有吃到过,今后到死也恐怕不可能再有机会吃到了。

依母亲的說法,我生下地就有三种毛病。至少在十三、四岁的时候,害着非常严重的鼻腔毛病,整年淌着鼻涕(照足岁計算的話,我不到十四岁,就离开了家乡。鼻腔毛病是离开家乡以前害的)。病情想必相当严重,因为曾找医生瞧过。我們家里,祖母活到九十六岁,父亲活到八十岁,母亲现在已经过了八十岁,精神还很矍鑠。大家平常很少生病,即使有点儿小毛小病的,也輕易不去找医生。可是我那鼻腔毛病,却长期找医生瞧,每天得吃三次药水,所以看来病情相当严重,連父母都觉得不能放置不管。也許是鼻腔里生了疙瘩,在潰烂吧。我找的那个医生姓飯田,因为他家的土墙涂了紅色,大家叫他紅墙飯田,是个旧式医生,不见得有什么耳鼻喉科的

新知識，看来只是随随便便开了一点药而已。那药水非常苦，上学时候，母亲总把一个甜包子和药水瓶放在一起，包在飯盒子包里。毛病自然沒有得到彻底的治疗，可是也并没有恶化，于是我渐渐习惯于这个慢性病，尽管鼻子总是不大好，也并不怎样感到苦痛，后来連医生也不去找，把它扔在一边，在山口讀了五年书，毕业了高等中学校的預科和本科，接着在东京帝国大学又念了四年（当时法科是四年毕业）。1902年大学毕业后，做了一阵教員，又当了一阵新聞記者。1907年前后，在前輩的帮助下，当了自己所創办的《日本經濟新志》的主笔。恰好就在那个时候，多年来一直觉得不大通暢的鼻腔，左右两边全都堵塞了，呼吸也很困难，到后来更痛得厉害起来，眼泪簌簌地掉个不停。不得已，我跑到附近的医生那里，請他医治，这离以前找那位紅墙医生已經相隔十五、六年了。毕竟这时医学大有进步，这次的医生用檢視鏡检查了我的鼻腔，随即对我說，疼痛可以給止住，但是要彻底治疗，得找耳鼻喉科专门医生动手术。那时候我住在三田，所以就到三田区最有名而且历史悠久的东京医院去求治。診斷結果，据說毛病相当討厭，必須住进医院才能动手术。于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住进了医院。（后来我只有在監獄里才住了一次病房。所以，我虽然从小就被认为身体孱弱，可是除了那两次以外，一輩子也沒有生什么非住院不可的重病。）果然，手术动一次还不行。大块的鼻菌很多，要全部取出来的話，得动三次手术，每次隔上四、五天。有些鼻菌由于大得出奇，被取出作了标本。哪里知道到第三次动手术的时候，有一块东西，最初医生也认为是鼻菌，其实却不是，为了把那块东西割掉，医生也似乎費了很大的劲，而我也吃了很大苦头。等到好容易割了下来，医生就把一块仿佛动物的牙齿那样的血淋淋的白骨拿給我看，說道：“你瞧，这样一块軟骨橫在里面啦。”因为这块东西也十分稀罕，所

以同样被取作标本。可是，我却由于硬被割掉这样一块东西，流血过多，而且怎样也不停止。早晨动的手术，直到第二天的傍晚，还在流血。这中间什么东西也没有吃；直到三十几个钟点以后，才吃了牛奶和涂了果酱的面包。当时所吃到的面包，滋味之美，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时如果吃的是年糕，那年糕也准会同样好吃；如果吃的是饭糰，那饭糰也准会成为毕生难忘的美味；偶然吃的是面包，因此面包就成了我毕生所吃到的一次最美味的东西，结果每当我想到面包的滋味时，首先就记起距今三十五、六年前在东京所吃到的这个涂了果酱的面包。

关于面包的回忆，从这件事情一跳就跳到巴黎。距今恰好三十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914年的年初，直到4月中旬春天将临的时候，我以文部省留学生的身分，在巴黎逗留了七十天。那时候每天早晨所吃的小面包，实在是今生再也尝不到的异味之一。我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跟了同事竹田省来到巴黎，找不到合适的公寓，两个人在巴黎街头徬徨了许久，最后想到以前在大学读书时代所爱读的《苦菜集》（什么都丢得光光的我，唯独这本旧藏书，到六十五岁的今天还保存在手边）的作者，那时也住在巴黎，于是先到大使馆去打听了他的住址，有一天，就去访问从未见过面的鸟崎藤村。他很高兴地接见了我们两人，并且说，不久他所住的那家公寓也可能空出房间来，在此以前，不妨先住在对门那家旅馆里，午饭和晚饭到他住的地方去吃。我们听了他的话，非常高兴，就在他对门那家名叫卢森堡大饭店的旅馆里落了脚。那家旅馆的名字倒够富丽堂皇，实际上却是一个极简陋的客店，房子是四层楼房，最最下面的一层是个破破烂烂的咖啡馆。这个地区名叫拉丁区，它在巴黎也数得上是最古老的市区，房屋设备陈旧不堪。我住的是四层楼上的一间屋子。楼梯很狭窄，大白天里都

黑漆漆的。厕所每层楼只有一个，还不是抽水的，要由茶房每天早晨提了水来冲刷。我天天得用这个贴肉坐在上面大便的西式马桶，觉得非常受罪。旧式火炉里烧的是煤球。没有电灯设备，夜里得用煤油灯。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二十世纪的初头，来到世界第一繁华都市的巴黎，竟然要用煤油灯。总而言之，我住了七十天的巴黎那个便宜旅馆，就是这样一个破破烂烂的地方。可是，每天早晨茶房从楼下和咖啡一起送到我屋子里来的小面包，我吃了以后，却不相信世界上居然有这样美味的面包。我一生中所吃到的面包里面，就只有这巴黎的小面包，每天吃也不腻味，永远觉得好吃。后来关在小菅刑务所里的时候，不知多少次想起它。可是，转念即使释放出去以后，这巴黎小面包，今生是再也吃不到的了，也就只好死了那条心。

不过我想，京都进进堂的面包，出狱后总一定马上能够吃到，因而始终盼望着那一天的到来。1930年我离开京都的时候，开往银阁寺的电车还没有通车，自从那条电车路修好以后，对着大学北面的里门的那条马路，就成了一条很漂亮的商店街，那里还新开了一家叫作进进堂的面包店，出卖很好吃的面包。面包的种类也很多。店里辟有一个雅致的西式食堂，里面安放着一套套的椅子和桌子，也可以在那里吃面包。住在大学附近的我的大女儿，经常带领着孩子们去吃东西，孩子们郊游的时候，也给他们带了进进堂的面包去当饭吃。这些事情，我是从大女儿寄到监狱里来的信里知道的；想到刑期届满、释放出狱的时候，准会去京都玩，那时自然能吃到进进堂的面包，就把这个当作出狱后的赏心乐事之一。

可是，1937年6月出狱以后，本来认为只要服刑完毕，就光明磊落、大摇大摆地哪儿都可以去，不料这种预想完全落了空，甚至于连回到故乡看一次老母也办不到。出狱后才过一个月，芦沟桥

枪声一响，所谓中日事变勃发了，战事有如燎原之火赶上了大风，只管漫延扩大，日本国内的形势也一天紧似一天，多少带点左翼色彩的出版物，连旧书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呢，根本谈不上光明磊落，反而只好像小乌龟那样缩手缩脚，躲在池子一角背阴的地方过日子了。老母为了想见见我，也只好从千里外的故乡特地赶到东京来。在京都的大女儿和女婿，也只好带着三个孩子来东京看我，我却一步也不许离开东京。那种日子，简直可以说是只有在生理上还活着，而在社会上却已经死去了。尽管如此，我心里还觉得总有一天能到京都去。当时来东京看我的大女儿和我曾经作过以下的对话，我始终牢记在心。“京都有很好吃的赤豆甜粥，软绵绵的栗子糕加上烂糊糊的赤豆甜粥，我想爸爸一定爱吃的。”“是呀，我特别爱吃栗子糕，光听你这样一说，已经流口水了。要是能去京都，你就请我吃那个吧。还有，进进堂的面包照常买得到吗？是吗，那末我去京都的时候，你每天就请我吃一顿进进堂的面包当饭吧。坐在牢里的时候，就想着这个了。”

可是，两年过去了，三年过去了，我终于连京都也去不成。到了1941年秋天，旅居上海的二女儿把留在我们身边的她的小女儿接了去，这样一来，原来和铃木二女婿全家（两口子 and 两个小孩）住在一起的那栋古旧而空曠的房子里，就只剩下我们一对老夫妻，我们寂寞得实在不行。再说，那时候世界大战也越来越扩大，一再流传着日苏关系、日英关系、日美关系恶化，而且日常生活也越来越窘迫不安。因此，我们决心迁居到京都去。但是，怎么样也得不到东京保护观察所的许可。因为像我这种曾因触犯治安维持法而问罪的人，如果不彻底转变方向，就要受到这种机关的察看，连迁居的自由也没有。后来我们好不容易获得迁居京都的许可，是在这一年（1941年）的12月8日，也就是对英、美宣战的那天早晨。那时

交通運輸已經十分緊張，再加眼看就是年底，在那樣的時候離開東京，給人的印象很不好，因此我們就像半夜里偷偷逃走那樣，匆匆忙忙收拾了家私，勉強趕年底以前搬到京都住下了。

就這樣地，我是出獄以後等了四年半之久，才好容易來到京都的。豈知到京都一看，加了軟綿綿的栗子糕的十分可口的赤豆甜粥，連影子也見不到了。糧食缺乏得相當厲害，大家一見面就先談吃的東西，仿佛每一個人都感染了我亲身体驗過的犯人習氣。遷居以後不久，恒藤恭曾到我寓所來看我，儘管十多年不見，一坐下來，馬上就談起吃的。恒藤恭這人，頭腦銳利得好比剃刀，頗有哲學家風度，長得又矮又瘦，乍一看，使人聯想到不吃烟火食的仙人，總以為他決不會提起食物方面的事情了，豈知現在連他都是這樣，世道也可想而知了。那時他一再在我面前推獎進進堂的面包，認為東京帝國飯店的面包都趕不上進進堂的。我聽了那番話，心中暗喜，心想：栗子糕赤豆甜粥雖則吃不上，進進堂的面包總還可以吃到吧。

等到在新居住定以後，有一天，我按照着人家教給我的那個鐘點，走進了進進堂一看，客人並不多。我心想，這裡的面包倒可以不怎麼費勁地吃上。豈知等了半天，最後才知道那時面包已經賣完，只有紅茶了，結果喝了一杯並不想喝的紅茶，失望地回到了家裡。再一打听，才知道那個時候，假如不在街上排隊，根本吃不上面包。後來有幾次出去散步，走過那裡，總看到街上排着長長的隊，我又沒有勇氣夾在年輕學生們中間排隊老等，所以總是就此走了過去；對於進進堂的面包，也只好暫時死心。

可是，到了去年 1942 年的 12 月 30 日，也就是遷居京都已經整一年的時候，我聽說大學已經放了年假，學生少了，於是又一次走進了進進堂。那時裡面已經坐滿了人，我也學樣坐了下來。人

还是继续不断地走进来。仔细一观察，才发现大家只是占一个座位坐在那里。我想，像这样等着，临了总该有些什么到嘴，于是既不吸烟也不看书（这是因为那时我到外面去不带香烟。由于买香烟得用空匣子交换，抽烟自然而然地也就节省了。可是，不带香烟不要紧，像这种场合，要是口袋里带一本袖珍本的《万叶集》，有多好呀，可惜当时却无书可看），只是呆呆地坐在那里等了四、五十分钟。一会儿，两个围了围裙的女招待，按着次序来卖票。红茶票卖一角钱，吐司（烤面包）卖一角一分，每人只能一样买一张，不能多买。票卖完之后，就有人来一边收票，一边发东西。翻一下辞典，所谓吐司，是把面包切成五毫米厚，去掉边皮，两面都烤得黄黄的。而这里凭吐司票发给的，却是烤也没有烤的面包，只是稍稍涂一层果酱。正当分发食物的时候，顾客还是继续不断地进来，可是因为没有座位，只好站在桌旁，看人家吃面包，等人家吃完后离座。“这些人大概也得像我那样，等候四、五十分钟，才吃得上依次出售的红茶和面包。”我这样一想，随即立起身来，推开门走上人行道。直到这时，我才想起：“对，对，空想了七八年的进进堂的面包，今天总算第一次吃上了。”这样慌慌张张吃下去的面包，只不过徒有虚名而已，从前那种风味，怕连个影子也没有了吧。归根到底，也和巴黎的小面包一样，进进堂过去那种面包，我今生怕不会吃到了。——五十年以后，我想谁都想像不到今天这样的粮食紧张，所以顺便在这里写了这些。

5. 瓢亭的日本菜

得预先交代一下，后面的一段文章是岛崎藤村的《回到了故乡》里的一节，否则，大家也许会奇怪，怎么文章突然高明起来。

“一、冷盘：生铜盆鱼片；青紫苏；

“一、湯：蓴菜豆腐湯；

“一、盆菜：蒸蛋羹加鹵；

“一、碗菜：小芋頭；扁豆；

“一、烤菜：鹽烤鮭魚；醋漬蓴菜；

“一、燴菜：嫩豆腐。

“光看看這個菜單，不全是好吃的東西么？抵達京都那天，K(H)君領我到瓢亭的一個小客室裡，消磨了一個晚上。《徒然草》^①裡曾講到古代去印度的和尚，生病時想吃家鄉的東西，看到故國的扇子而傷心；其實去外國旅行的人，大家都有這種心情，這是古今一樣的。巴黎的日本同胞，碰在一起，總是談論故國的食物，光是嘴巴上說說，就已經像獄囚所感到的那樣，覺得其味無窮了。真不明白，从小吃慣的東西，為什麼總是那樣美。盛在雅致的碗盞裡的京都式的菜肴，更加增添了我們談話的興致。當我夾起切成細長條的生銅盆魚片浸在醬油裡、喝着多年沒有吃到的湯裡的清爽的蓴菜、剔去鹽烤鮭魚的骨頭的時候，我一面聞着侍女燙來的日本酒的香氣，只管和K(H)君閑談着旅居巴黎以來的舊事，打量着這間陰暗的、屋頂低低的、仿佛茶室那樣的房子。這個地方，真像一間使人心曠神怡的草庵，宛然是中世紀武士的‘隱遁所’。身材高大的K(H)君，站起來就能碰到門框；門框外邊就是深深的房檐。點綴着樹木、石頭和流水的幽邃的院子，那景色簡直使人以為置身在森林裡。即使坐在这个小客室裡，也能看到屋子近邊樹林裡的清冽水流，以及淺淺的池子裡的成群鯉魚。就在這時，下了一陣祛暑的涼雨，打濕了院子里像含羞少女的臉蛋那般的合歡花。從終年很少下雨的巴黎回來，光是聽到這雨聲，就已經深深感覺到

① 《徒然草》是十四世紀日本的一部著名的隨筆集，作者是吉田兼好。——譯者

这里是祖国了。”

看一看藤村的年譜，1916年項下，是这样写着：“离开住了三年的巴黎，从英国伦敦启程东归。那个时候，旅行很不方便，也不安全。那次的航海，繞道南非的好望角，在海上走了五十五天，才重新看到了神戶。回国后，在东京芝区二本榎寓所給《东京朝日新聞》写了一篇《回到了故国》。”前面所引的那段文章，是距今(1943年)二十八年前所写的。那时我已在一年之前离开伦敦，經過地中海、印度洋而回到了日本。領藤村去瓢亭的K(H)君，实际上就是我^①。

前面也說过，1914年的春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我在巴黎受到藤村的照顾，每天要到他住的那家公寓去，和他一块儿吃午飯和晚飯；除了經常在食堂里碰头外，还不时在飯前飯后到他的房間里去打扰。他住的那个屋子很小，床榻旁边，沒有多少空地。藤村在那儿安放下一张桌子，写着寄到日本去的稿子。我多次看到桌子上放着两三张正在写着的干干净净的稿子。他多半穿着日本衣服。他把印了蓝色燕子花的雅致的布鋪在小桌子上，老請我們在那上面吃日本的粗茶，一边安閑地告訴我們，这茶是誰誰寄給他的，是打了包裹从西伯利亚寄来的。我是口沒遮拦的人，当时又不知道他后来在《新生》里所写的那番特殊的原委，所以几次三番冲着他問：“你为什么要到这种地方来呢？你一天到晚多半关在屋子里，穿着日本衣服，喝着日本茶，給日本报纸写着日本文，为什么要特地住到巴黎的一角来呢？”直到后来讀到他的《新生》，才后悔自己太冒失了；可是当时由于不明白其中原委，我确实像掉在

^① 本书作者的姓名“河上肇”的日本讀法是 Kawakami Hajime，所以縮写是 K(H)。——譯者

五里雾中一般，感到莫名其妙。我那时在巴黎写的文章里，还有这样的一段：“即使是来巴黎玩上三、五天的人，也必定要到那举世无双的卢佛尔国立美术博物馆去一次；唯独島崎，在巴黎住了将近一年，一次也没有去过那里。在历来到过巴黎的外国人中间，他可能是打破记录的人吧。吃饭时在食堂里碰头的法国大学生和德国青年们，往往用“到卢佛尔去过了吗”这句话来代替“你好”。同住在一个公寓里的人，似乎都弄不明白 Monsieur 島崎(島崎先生)为什么哪里也不去玩，而感到好奇。看他的样子，简直是把人家对他身世的揣测当作一种乐趣。”

夜里写完当天要写的稿子以后，藤村就到我们住的旅馆里来玩。从我住的那间屋子，可以看到他的房间的窗子。我经常等着他窗上的煤油灯光(藤村住的那家公寓里也没有电灯)熄灭。这时他的稿子已经写好了，过了一两分钟，他随身穿着日本衣服，就来敲我的门。于是就和竹田三个人聊起天或者玩起纸牌来。当时的情景，藤村的《法国通信》和《新生》里自然经常提到。(顺便提一句，藤村的文章里似乎把我写成比竹田早来欧洲了，其实不是这样，竹田比我早一年就来到比利时。只因为竹田性情忠厚老实，而我则趾高气扬，才造成这样一个印象的吧。)

由于有过这样一段关系，所以在藤村作客三年、从巴黎回国、路过京都去东京的时候，我一得到消息，就把他带到瓢亭，因为估计他对这个地方一定会满意。回想起来，过去我很少请人(无论是大批客人还是一两个客人)吃饭。现在能记得起的，前前后后，只请人吃过两次饭，地点都是在瓢亭；除了请藤村那次外，还有一次是大学读书时代的老朋友吉川泰岳居士夫妇来京都，我请了客。我在大学教书的二十年中间，平常总是埋头工作，一点闲心情也没有；既没有玩过大原，也没有在保津川的清流里泛过舟，也没有去

过苔寺；既沒有看过高雄的紅葉，也沒有訪問过月瀨的梅花；請人吃飯的心情自然更談不到。像我这样忙忙碌碌的人，为了和藤村碰一次头，居然領他到瓢亭去吃了一頓晚飯，这大概是因为巴黎的往事实在太可恋了。

京都三条大街一直往东走，迎面是东山的一連串山峰，走到和琵琶湖相通的疏水上架設索車的地方，向右拐弯，就是蹴上，再过去就是从前的山科街道。如果不拐弯，跨过疏水一直向东走去，就是从前賴山阳贊賞过的“一带青松路不迷”的南禅寺正門那条馬路了。现在那里的松树枯死了許多，有的还被砍去了，然而依旧保存着一带青松的遗迹。瓢亭这家飯館就在这条路上，但是并沒有有什么漂亮別致的門面，乍一看，倒像乡下的茶館，門口放着寬闊的旧板凳，板凳上挂了几双草鞋，如是而已。不过，一走进旁边的小門，就是一个庭院，院子里鋪着成串的踏脚石，鯉魚在泉水里悠然地游着，到了夜里，沿路都点綴着燃蜡烛的风灯。接待客人的屋子，带有茶室风味，天花板很低，墙壁和柱子非常陈旧，只有拉窗上的紙是嶄新的。冬天屋子里生了炉子，鉄壶里沸騰着开水；沒有电灯，点的是蜡烛。这里不让艺妓进門，食物都由穿着雪白布袜子的侍女端送，無論酒飯，侍女只給斟第一杯，盛第一碗，以后得自斟自酌，自己添飯。这是这里的规矩。食物的原料，每天由这里的掌柜的亲自上市場采办；原料一用完，就不再招待顧客。我請人吃飯所以要到瓢亭，就是因为我猜想無論是巴黎回国的客人也罢，东京来玩儿的客人也罢，对于这样一个沒有資本主义經營的臭味、却保存着京都传统的古色古香的飯店，一定会觉得不可多得（因为人的吃东西，是同时辨味着周围的气氛的）。至少像我这种既不喝酒，又不曾叫过艺妓的人，尽管在京都住了多年，一旦要請人吃日本菜，除了瓢亭之外，就再也想不起別的地方了。

1930年1月初旬，我离开了京都，以后经历了多少波瀾，到1941年12月底，整整过了十二年，才重新回到了京都。有一天，內弟末川在这个往事历历的瓢亭請我吃飯；可是，还没有入席，我就痛感到这里已經絲毫沒有从前那种气氛了。只听到一片喧囂的声音，震耳欲聋。客人大批涌来，嘴里高声哼唱着。这种现象是进入所謂非常时期以后才有的。由于现在规定每客菜一律最多只許收五块钱，所以原来价钱就該比普通飯館貴的第一流飯館，要不是做黑市买卖的話，就不得不一概降到二流三流的水平，因此無論从哪一点上說，都完全失去了从前那种风味。不过，表面上固然取締得紧，大家暗地里却似乎都在做黑市买卖；据說只要出黑市的价格，还可以吃到从前那样的东西。例如，盖交飯的官价，每客最貴三角五分；可是据說有些鋪子，却卖二元五角一客；到这种地方去，据說仍然可以吃到从前那样的美味炸魚盖交飯。有一位在大阪某公司做事的熟人亲口告訴我，他每月平均要参加三次会費五十元的宴会。另外还有一个熟人告訴我，他最近到东京去，人家請他吃飯，会帳的时候，两客炸魚和两人喝的酒，一共費去三十五元。像这种菜館，客人走进門，要不是熟識的，干脆就說今天菜已經卖完，加以回絕；只有可以放得下心的客人，才加以接待，据說这样居然还是能够賺錢。有些卖醋飯糰的鋪子，据說也是那样，店門口做着官价的买卖，可是，官价飯糰一会儿就卖完了，唯独有面子的客人，可以走进里屋，用很貴的价钱，吃到从前那样美味的醋飯糰。所以，尽管說是非常时期，什么东西都定出了官价，但是，骨子裏面全不是那回事，和从前一样的东西，有还是有的；可惜那些地方毕竟不是我們这种人力所能及、有緣进去的了。要是把这种黑市买卖撇开不談，那末，至少在表面上，市面上的情形已經和从前完全不同了。就像上面所說的那样，第一流的菜館，由于受到官价的限制，质量

已經远不如从前了。同时,在另一方面,由于通货膨胀的緣故,以前連脚都沒有踏进第一流菜館的一批人,现在都涌进这种地方来了。最近听說,大阪有一家专供招妓游乐的酒楼,經常有个年輕小伙子去那里大吃大喝,引起当地警察署里的警察的疑心。闖进去一調查他的身分,据說是个工人。問他收入,他說三十元。警察于是喝問道:“这点儿收入,怎么能这样大吃大喝呢?”哪里知道对方所說的三十元,是一天的工資,結果弄得那个警察臊得下不了台。原来,那个警察的月薪只有四十五元,一心认为对方是个工人,估計每月的收入也不过三十元而已;哪里知道軍需工业部門的工資是計件工資,目下比什么工資都高,据說一个身强体壯的年輕的青少年工人,做一天工,掙个二、三十块钱,不足为奇。像这种情况,各方面都或多或少地发生,所以现在第一流菜館的顧客,也完全和从前不一样了。因此,瓢亭这家菜館的全部气氛,也和从前完全两样了。从前带藤村去的时候,那里“真像一間使人心曠神怡的草庵”,“宛然是中世紀武士的‘隱遁所’”,可是现在呢,却变成了那些在通货膨胀的繁荣中或多或少捞了一把的人汇集轰飲的地方。不說别的,但看侍女端上来的东西,从前用的都是古色古香的碗盞,觉得非常雅致,而今天用的却全都是顏色鮮艳触目的新陶器了。至于吃的东西也是一样;虽然分量方面除了飯改用一份一份分好的办法外,其余和从前差不多;但是,质地却庸俗化了,連从前的痕迹都不剩一点了;送上来的菜,尽是一些任何菜館都能吃到的平常的东西。虽然还記得那时藤村輕輕地吩咐那接待我們的侍女說:“請你到厨房把今天的菜单抄一个来吧。”(几个月之后,就看到这张菜单出现在他的文章里,当时我还非常佩服他的細心)现在却再也沒有胃口附庸这种风雅了。今天,什么都一下子平均化了,有些独具风格、不容模仿的东西,全都失去了它的特征(黑市不在此限),降

低到平常的水平了。这样,无论是进进堂也罢,瓢亭也罢,只剩下一块招牌,早就有名无实了。

我已经老了,再也没有声色的欲望,自然只好在吃的东西上打主意了。不过思想起来,如今似乎连人物的风味也和食物的风味一样,越来越不是味儿了。明治时代,无论政治家也罢,新闻记者也罢,大学教授也罢,宗教家也罢,好歹都各有各的特色,现在却渐渐平均化起来,变得不相上下了;特别是进入非常时期以后,大家都走着所谓国策路线,这种倾向更迅速发展。到了今天,即使是国务大臣,张三和李四似乎也没有什么区别。某某大学的教授这个名称尽管还存在,其实却和进进堂的面包或瓢亭的菜肴相仿佛,只勉强留下一个招牌而已。

不论食物也好,人物也好,哪天才能恢复符合于令名的实质——特殊的风味,独特的风格——呢?

正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东京的伊藤佑之助昨天寄来一个包裹。里面有森永糖果公司的可可粉,还有紫菜和加味木鱼粉等等。伊藤是个无教会主义的耶稣教徒,属于内村鉴三那个系统,是京都帝大的早期毕业生,他到现在还像这样时常分出他那并不富裕的收入的一部分,买些东西寄给我这个老年的马克思主义者。像现今这样的世风下,居然还能体验到这种友情,我觉得真是三生有幸,使人感谢不尽。就在同一天,大阪商大的福井孝治,又特地从堺市带了牛肉、鸡蛋、芹菜、冰糖、红糖等等,来访问蜗居。我觉得,在今天这种时势之下,分给我食物,无异分给我性命,实在太可感了。因为没有一点东西可以招待,我就急忙把伊藤刚刚寄来的可可粉冲了一杯,敬远来的客人。闲谈了一阵以后,我们就同到京都东郊的法然院扫了冰谷(就是河田嗣郎)博士的墓,回家时到银阁寺大街,在一家茶馆里打尖。原意是想请客人吃些甜东西。店头

貼着“年糕小豆湯一角五分，點心加茶二角五分”的字条。近来的风气，因为点心很少，普通一个点心带一杯末茶（带茶卖，价钱可以卖得贵些），就卖二角五分。我们贪心，两种都叫了。一会儿，一个瘸了腿的矮小中年男人把四份东西托在盘子里送了来。我们一看，可就呆住了。那年糕小豆湯，是十足的有名无实，看上去仿佛像一碗白开水，连碗底都看得见，面上飘着几小方块儿的洋粉。本来还以为是糖湯，哪里知道喝了一口试试，连糖湯的甜味儿也没有，而且不大热。碗底里，沉着两三个赤豆壳。至于二角五分钱一份的点和茶，是三颗小小的糰子串在一起，还有一杯同样不大热的煎茶脚子。所以，年糕小豆湯也好，点心也好，簡直都是欺騙。我觉得非常气愤，心想干这种事情赚钱的这家铺子的瘸腿男人，死后一定要进地狱。可是，再一想，今天即使是大学教授，有的也和这家铺子的年糕小豆湯一样徒有其名，只不过还没有构成法律上的詐欺而已。这样看来，也许不好单单责备街头的小商人。想到这里，我才想通了，不再因为使远来的客人失望而徒然难过了。

（1943年1月22日脱稿）

常 爱 出 错

最近我给人家写了两个墓碑。一个是亡友河田嗣郎博士的，另一个是京都帝国大学的早期毕业生菅原昌人的母亲的。两个墓碑都是好久以前就托我写的，可是去冬和今春的天气太冷，又没有那许多木炭可烧，炬燵里放进一个炭团，要对付一整天，所以即使想写字，手也冻得直哆嗦，写不起来。一天一天地拖延下去，菅原的母亲死忌3月3日都已经过了。河田博士的墓碑，说是希望能在

3月21日以前建立，由于这样的关系，恰巧10日过后遇着一个好晴天，我打定主意当天把它写出来，于是收拾好屋子，铺好了红毡毯，把纸摊在毡毯上，洗了手，漱了口，焚了香，心平气和地就了座。这时我妻走到我身边，一再提醒我不要写错，不要写错。因为她深知我生性爱出错。但是，我心想，总共才只写那么几个字，还能错到什么地方去呢！心里尽管这样想，嘴里却还“好吧，好吧”地连声答应着。正要拿起笔来写菅原托我的一张，这时我妻说：“墓石的大小没有搞错吗？看上去似乎太高了些啦。”我回答说：“哪里，墓石是七寸阔，二尺七寸高，这样大小是错不了的。”但是我妻看来仍然不放心，拿尺子来量了一量，结果虽则差了一分，尺寸大致还是不错的。我心里却想，写字的时候，最好不声不响地给我走开些，不要来瞎张罗，插嘴反而误事。正待拿起笔来写，她又在隔壁房里提醒我说：“千万不要把死亡的年月日写错。”我很有把握地答道：“知道了，放心吧，对方早就把单子交给我啦。”她这才好容易到厨房里去了。

在京都，这是一个难得的小阳春好晴天。一点风也没有。连我这个嗅觉非常迟钝的人，也闻到刚才放在炉火里的“梅花香”的香味，觉得浑身舒畅。于是我一鼓作气，用应手的稻稭笔矫健地写了菅原的母亲的戒名“诚觉院一心妙通大姊”九个字的草书。由于纸头长达二尺七寸，所以字写得相当大，在我算是成绩挺不错了。自己觉得这几个字可以不用重写，也就放下了一段心事。接着把该刻在墓碑右边的四行小字写了又写，重写了好几次，还有一首该刻在墓碑左边的短歌“戴着紫头巾的妈妈，闭了嘴唇安睡在窄窄的棺材里”，也反复写了三、四张。为了写这样一点东西，弄得我精疲力尽，当天就此歇手，拿了浴巾上澡堂去了。

至于河田博士的墓碑，第二天一吃完早饭就动手，花了半天工

夫把它写了出来，一写好馬上就让我妻送到河田家去了。

这样，就把一直挂在心上的笔債还清了。我真像放下了一个大包袱，还对我妻說：“这就沒有心事了！”

可是，沒有心事只一会儿工夫。因为，过了两三天，菅原那里来信說是尺寸弄錯了，河田家来通知說是逝世的月份和日子搞錯了。

冰谷博士是5月21日去世的。最初我倒是沒写錯，可是后来一再重写，不知怎样一来，最后竟把它写成了6月21日。菅原的来信是这样說的：“承您的情給写了，只是墓石容納不了那样大的字；要是那样大小的墓石，打算另换一块；不过，要是换不到大墓石，还得麻煩您給重写一张”。我妻看到了这封信，就說：“那样一再提醒，結果还是弄錯了么？您說那是布尺的尺寸，我早就疑心不对，可是您却坚持說不会錯哩。”这时我固执己见地說：“布尺不布尺，并不是我写的，明明是菅原亲笔那样写的，所以这可不能怪我，是对方搞錯的呀！”可是，不久菅原亲自来到我家。当着菅原的面，取出原先那张給我作为参考的单子一看，上面固然写明是布尺，但是长短先是用墨笔写的“一尺七寸”，后来用鉛笔在“一”字上加了一橫，改成了“二”字；“七”字的旁边，同样用鉛笔写了一个小小的“一”字。換句話說，如果仔細看看，就可以看出已經改成二尺一寸了，而我却漫不經心地把它看成了二尺七寸，所以責任还是完全在我身上。

这还是不几天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这种常出錯的毛病，我不断地犯。人家也許以为这是由于我岁数大了，人变糊涂了，其实并不是这样。从我年輕时候起，一直就是如此。下面且就記憶所及，写上几件。

二

这件事情发生在 1906 年 10 月，我正好二十七周岁的时候。——既然我在数字上老搞错，人家也许疑心连这年月说不定都是错的；不过这个我敢保险。

我现在手边有一则 1910 年 9 月 26 日《读卖新闻》的剪报。那大概是创刊几周年的纪念号吧，内中有一栏“我在报馆的时代”，里面登载着我的一篇短文《豆馅年糕的午饭》（因为我只留下自己那篇文章，所以前前后后登着哪些东西，现在已经没法弄明白）。现在抄录其中的一节如下：

“我在报馆里的时候所写的东西，一一都做了符号，寄给了家乡的爸爸；只有我认为有必要保存的东西，才剪下留在身边。可是，天长日久，我自己剪下的东西全都散失了，今年回到家乡去一看，连我所认为没有用的论文或翻译，爸爸全都给保存了起来。”

看来我不知什么时候把爸爸代我保存的东西全都要了回来。既然到了我手，自然又不免大部分丢光。最近租到京都东部吉田町的一家破屋，把它作为自己终老的地方，借此机会，开始整理半生放浪所留下来的一些文件，无意之间，从以前寄存在大女儿家的书箱底里翻出了一部分剪报。每张剪报，都有爸爸亲笔所填写的年月日。这样看来，我从爸爸那里取回的剪报，至少有一部分总算没有散失。虽则那只是短短一个时期中间的东西，可是，只要登有我的名字，哪怕是不多几行的消息，也都剪下来了。内中有一则 1906 年 10 月 21 日《读卖新闻》上登载的消息，内容是这样：

演讲会电报(20日午后八点七分甲府市发)

尽管有为西园寺首相举办的游园会，下午五时，会场仍然拥挤得水泄不

通。六点钟，河上致开幕詞，掌声雷动。接着是横井博士的演讲，讲到一半，会场里已座无虚席，后来就謝絕听众进场。这样的空前盛况，甲府市的市民都为之吃惊。

正是靠了这条剪报，才弄清楚当初我在讀卖新聞社工作，該社在甲府举行的那次演讲会，是1906年10月20日(那天恰好是我生日)的夜里。这就是說，这个年月日决沒有錯。

那时候甲府正在举行一府几县的联合共进会，在这期間里，举办了各种各样的文娱活动。讀卖新聞社的演讲会，也是其中之一。演讲的人是农学博士横井时敬和文学博士福来友吉两位。报館命令我先去准备。我就单身去甲府，首先租定县里的礼堂作为会场，然后在当地发行的两三种报纸上大登广告，一切准备就緒后，在那里等候。本来我以为演讲会是在10月19日举行，当天早晨报館里的會計主任来了，这才发觉日子被我弄錯了一天。当时我固然很窘，會計主任也感到十分为难。于是馬上給报館打了一个电报，要求把演讲会比預定的日子提早一天举行。报館回电說不能提早举行，因为演讲者沒有時間。會計主任就說：“既然这样的話，除了打退堂鼓，沒有别的办法了。”因此就准备在市內各处张贴演讲会停止举行的布告。我也帮同着写了几张布告，半中間忽然想到：难道20日那天就騰挪不出会场么？何不再去問一問呢？这样一想，我就丢下笔，独自走了出去。本来这个企图是百分之九十九沒有指望的。因为，当时在共进会会期里，各式各样的文娱活动都赶在一起举行，礼堂每天都已有人租定，日程排得满满的，后来还是死乞白賴地交涉，才好容易租到19日那么一天。现在再要向人家开口商借20日一天(那天是全国基督教信徒大会举行的日子，預定要开一个盛大演讲会，島田三郎和其他出名的牧师都将出席)，那簡直是不近人情了。要是把这件事情去和管会场日程的人商量，

当下就准会遭到拒絕。因此，我灵机一动，决定去找县长。当时的山梨县县长是武田千代三郎，他听我把話說完，也不和手下的人商量，當場就应允了我的請求。我为此非常得意，所以直到今天还清清楚楚地記得事情的經過。当时我去县衙門找他，衙門里的人說，县长到共进会会场去了，于是我就跑到共进会的大会场，到处找寻。最后，在会场的一条过道上遇到了他。县长站在那里听我把話說完，馬上就把事情答应了下来。

我如获至宝地赶紧回到旅館里，报告了經過情况。會計主任不用說，同来的两三个社員听了也都高兴非凡。他們都称贊我說：“虽然各方面一定会有意见，不过既是县长亲口答应了，那就万妥万当了。事后即使有人有意见，也不怕了。这都是河上君的神通，該賞給金鷄勳章功一級。和这样的大功比較起来，弄錯日期，簡直算不得什么了。”

像这样的經驗，也許給了我一个信心，那就是尽管出了些小差錯，事后总是可以挽回的。那次虽然出了那样大的洋相，事后我一点也不接受教訓，四十年来，直到今天，还是依然故我，几乎每天或多或少地在各方面出差錯，特別是数字上的差錯。

三

1910年3月到4月的《新广島》——这份报也是爸爸剪的——上，登有一位署名萧郎（法学士永井八郎）的长篇連載《广島紀行》，里面不假半点矫揉造作，写了我的爱出差錯。那篇东西固然无聊，但是，反正整个《回忆》尽是些无聊的东西，所以不嫌它冗长，抄录一节如下：

“开幕。舞台是吉田山，源君邸宅的会客室（按：这里的源君就是指我），場面上有三个人面对面坐在那里。笔酣墨飽的‘真无我’

三字橫額挂在背后牆上，下面坐着監察員身分的主人源君。房間正面正襟危坐着客人菊大人（按：這是指已故襟兄藤田菊太郎），他的對面是衣冠楚楚的蕭郎，也裝模作樣地危坐在那里。作了初次見面的寒暄之後，菊大人開口了。

“聽說您到彥根去過了。”

“看到蕭郎有些發窘，監察員感到莫名其妙，接口就說：

“是呀，聽說您回故鄉去過了，您那家鄉彥根呀。”

“蕭郎覺察到事情不妙，明明是把他當作彥根人而介紹給菊大人了，于是不愉快地答道：

“不，鄙人的家鄉是能州，根本不是彥根。如果是彥根人的話，腦袋不是早該在櫻田搬了家么？”^①

“我搞錯了，我搞錯了。”

“哈！哈！哈！哈！哈！”

“當菊大人呵呵大笑的時候，真如堂的大鐘響了一下；一聲梆子，幕就閉了。

“從这一幕，日本又多出一個新成語‘彥根’，它的意義就是搞錯。”

從上面這件事情，可見我在給朋友作介紹的時候，首先就搞錯了人家的家鄉。蕭郎的紀行文里還有一段，談到送他們兩個人西下，從京都去須磨，是我領的路，在京都站上就把火車的班次搞錯了。

“源君清夢初醒，在晨曦中驅車去上京區。一起是三個人。貪睡的東山仿佛一覺還沒有醒來。宛如夢境一般從籠罩着朝霞的太極殿前來到加茂川岸邊，三本木一帶的樹林，比水墨畫還要雅淡。

^① 井伊直弼（1815—1860）是德川末期的政治家，彥根的藩主，他由于未得天皇詔令而與外國訂立條約，被水戶浪人殺害于櫻田門外。——譯者

京都的一切，都显出是个爱睡懶觉的。山紫水明楼据說就在附近，它是出名爱睡懶觉的賴山阳为了戒掉早起喝酒的习惯而盖造的，他甚至給东山加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头衔，說它犹如盖着被在睡觉。总之，京都到现在还没有改掉睡懶觉的习惯，这真是非常奇怪的现象。說时迟，那时快，不觉已經来到七条，于是匆匆忙忙地跳上了火車。

“源君是个不介意火車时刻的人，而菊大人是个乐天家。到达大阪一看，原来这班火車不开往須磨。于是不介意的人就說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乐天家笑称有趣有趣。天下真是太平得很。反正事到如今，再介意，再說沒趣，也不中用了。在梅田車站等候了两个多钟头，才好容易乘上沒有錯儿的火車。

“到了須磨，要和源君分手了。好操心的我，怕不介意的源君回去的时候再弄錯火車，叮囑他留意，菊大人听到了，又搬出他的拿手好戏呵呵大笑說：有趣有趣。”

我极少旅行，偶尔单身旅行的时候，总是由我妻送上火車，这在近年来已經成了习惯。因为，不是这样，就会出差錯，本該乘上行車的，我却泰然自若地站在下行車的月台上等候。我想即使弄錯，大不了誤了一班車，所以尽管記錯了，还說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这就是我日常生活的哲学。

还是那个《新广島》的 1910 年 8 月 5 日的报上，登了破山襄三的一篇《訪問閉戶閑人》。在这篇短文里，同样談到我的老毛病，所以順便抄一节在这里。

“由于閉戶先生一再在信上劝我今年去玩，說什么看慣了中国的山水，看到京都的山水定会觉得特別美丽；所以剛一回国，馬上去京都旧地重游。上午九点钟，从七条火車站坐了一辆洋車，向吉田山出发。閉戶先生的寓所就在这座山的半山腰。先生自称是

閉戶閑人，豈知去到他那里一看，門倒是有，可是要閉却没有門扉。接談中間，一再有客人來訪，還有信件送來，很不像是閑人。送給他從中國帶回的岳飛的墨跡拓本和《楞嚴經》的手抄本，先生嘆賞不已。（按：岳飛的墨跡拓本和《楞嚴經》的手抄本，後來不知弄到什麼地方去了，現在我手邊找不到。今天甚至連破山襄三是誰的筆名，都想不起來了。）

“過了一夜，第二天同去逛知恩院、清水寺。……到圓山公園的時候，已經是下午兩點鐘，覺得有些餓了。先生說要請我吃京都的名產，走進一家茶館，請我吃了祇園糰子。糰子是三分錢，茶是兩分錢，真是價廉物美。

“回家的時候，先生到路過的竹鋪里去買架絲瓜棚的竹子。一間價錢，每根是四厘錢。一捆不滿四十五根，先生想還還價，就說：‘便宜些，兩毛五分賣給我吧。’竹鋪里的掌櫃就說：‘不用那麼多，一角五分賣給您啦。’這時我站在旁邊看着，覺得畢竟是閉戶先生的生意經。”

近几年我退隱在家，不問世事，開始學着下圍棋。其實呢，下在這裡，只能得兩子半，如果下在另一個地方，一輸一贏，可以得到六子——像這種建立在斤斤計算數量得失的棋道，根本不合我的性格。因為，我這個人，只值一角五分錢的東西，還要人家二角五分錢賣給我哩。但是，不管成敗得失如何，我所感到興趣的，只是鬥爭的本身，所以儘管始終沒有進步，只要找到對手，我還是經常愛下臭棋。

四

我妻長年在身邊看到我非常愛出差錯的性格，擔心我不仅在日常生活上，連在學術研究工作上也可能一直犯着同樣的毛病。

殊不知学术研究工作是我的职业，我的精神从早到夜集中在上面，无论写作也罢，讲课也罢，都比人家格外谨慎仔细，所以几乎从来没有粗枝大叶，闹出笑话。无论讲课或者演讲，我总是事前仔仔细细地打下底稿，这已经成了多年来的习惯。所以，同样讲课或者作演讲，我比一般人更觉费力。站到大学讲坛上讲课的时候，让学生记笔记的那些部分不用说，即使不必记笔记而只是阐释课文的部分，在我自己的讲稿上，也连标点符号和语气都一一仔细加以推敲，凡是要说出口的，就一字一句都写下来。这样一来，我所讲的东西里自然就没有多余的重复；可是，相反地，稍一马虎，听讲者可能就不能领会我所讲的东西。为此，在写讲稿的时候，我经常煞费苦心，要求自己写出朗读一次就能使大家明白它的意思的文章。讲课倒也罢了，等到辞去大学教职以后，参加了不内行的政治运动，要对文化水平不齐的听众作演讲；那个时候，我也由于二十年大学生活的惰性，经常备下周密的底稿；底稿上没有写的话，几乎从来不提。后来不得已而参加竞选众议院议员的时候，一天要作两三场演讲，我也总是照着演讲稿朗读。不准备底稿而作演讲，是从竞选运动接近尾声时开始的（那时候，我的嗓子完全垮了，几乎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所以在走上讲坛之前，要由耳鼻咽喉科医生打了针，这才能讲几分钟的话）；不久以后，我就被捕，也就永远不能再作演讲了。

正因为像上面所说，我对写作和讲课等等尽可能小心谨慎，所以我自信在学术工作方面，基本上没有出过日常生活中每天出的那种不经心的差错（careless mistake）。想起来，学术界方面的人，很少有像我这样，经常被形形色色的人当作人物评论的对象的；但是，我最明显的特征之一——疏忽大意，却从来没有受过什么人的指摘。这是因为，那些人都是通过我所写的东西来看我的人的，所

以也就看不出我的毛病。与此相反，只要是来看过我、在我家里住过一夜的人，像上面所提到的萧郎和破山囊三那样，馬上就会发现我的粗心大意，而为之咋舌。

拙于生計

正如另外一篇《回忆》里讲到的那样，我这个人老爱出差錯。特別在数字方面，馬虎得更厉害。对于数字的記憶或者計算，我簡直完全不成。既然这样缺乏数的观念，对于理財，自然是不相宜的。所以，我是个最最拙于生計的人。既然提起了这件事，順便就稍稍写下几笔。

大学毕业不久，我就結了婚，从此以后，一家的日用开支，全都交給我妻經管，四十年来，每月有多少收入，有多少儲蓄，余下来的錢又是怎样用的，我全不过問。至于买东西，我最大的支出只是买书，其余像帽子、鞋子之类，一概只是把尺寸告訴我妻，让她給我买。因此，我的錢包里，永远只有几个买香烟的錢；偶尔請老朋友上館子吃飯（这种事情是不大有的），我妻总是不声不响地把几张鈔票塞在我的錢包里。除了遇到这种特殊情况外，我平常的花消，一般不是以元为单位，而是以分为单位。总之，我这个人，活到六十五岁的今天，一向只对付过几个零用錢。这样，总算能够不欠一个錢的債而死去；要是我亲自当家管帳的話，虽則也不会奢侈浪費到哪里，不过由于我本来缺乏数字观念，永远漫无計劃，一家的財政，到今天准会搞得一塌糊涂的。

在还没有結婚的大学生时代，我經常向朋友借錢。这倒并不是由于我生活放蕩。要說放蕩的話，至多不过吃吃点心、牛肉或者

西菜而已。

就說吃点心吧，太貴的點心我是从来不买的。住在本乡区千駄木公寓里的时候，附近有一家小小的点心鋪子，店号叫梅月，鋪子里边有一間小屋子，有几分像现今的吃茶店。那里的点心，只有一种西式的，叫做窩伏儿^①，其余全都是日本式的。一到那里，店里的人就把日本点心端上来，把不同的几样装在一个浅口的木匣里，另外还加上一杯茶。于是我就随心所欲地挑选爱吃的吃了，吃几个，付几个的錢，付了錢就走。遇着要开夜車的时候，往往忍痛多花几个，买上十只窩伏儿带回家。究竟十个窩伏儿要多少錢，現在已經完全不記得了，不过，反正不是什么太貴的东西。

离大学正門不远，在本乡第几条街上，有一家牛肉鋪，招牌上写着“三枝”两字，发的音却是“Saigusa”；我时常商同住在一个公寓里的文生长江有一，去那里买最上等的里脊肉。那上等里脊肉平常总放在里手的抽屜內。一到那里，鋪子里的人就把它取出，放在厚厚的案板上，用銳利非凡的割肉刀切下若干块，給包在竹皮里。我們平常究竟每次买几两或者几角錢，已經記不起了。买到家一看，牛肉的块数总是那么些，不多也不少。所以我們合計过，一块牛肉合到几分錢。牛肉买来，我們就在公寓楼上搬来小风炉，和入豆腐、大葱，煮了吃。这牛肉火鍋，大概是我那时最大的奢侈品了。

我还常常和一位同乡朋友名叫岩田博藏的文科生到西菜館去吃西餐。名为西菜館，其实不过是公寓附近的一家小館子，菜也不过叫上一客牛排而已。“怎么样？今天去来它一个 large piece(大片儿)好不好？”只要这样一提議，双方就心照了。

① 一种厚而軟的餅，加奶油、蜜糖等吃的。——譯者

大学生时代我的奢侈，大致就是这些，所以，在当时的大学生里面，还算不上是特别会花钱的。可是，只要钱包里一有钱，梅月我也奉陪，牛肉火锅我也赞成，大片儿的提议我也不拒绝，因此，原来就不丰富的我的学费，用不着等到月底，就花得光光的，连房饭钱都付不出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和今天的战时内阁采取公债政策一样，靠借债来应急。岩田那时岁数已经相当大，他在山口高等学校毕业后，曾经当过一个时期的中学教员，在家乡还有一个妻，所以，学费不一定怎样富裕；可是，平常他很有算计，手头总留有一些钱。（此人在英国文学科毕业后，当了中学校长，最后当了山口高等学校的校长。至今还活着。）还有一个同乡朋友岡村市正，他是在山口高等学校和我同班毕业的，毕业后也和我一样，进了大学的法科，是个一丝不苟的正派人，吃喝嫖赌，一样都不来，也从来不缺一堂课。而我这个学生呢，往往因为听演讲会而不上课，即使上课，如果觉得讲的东西乏味，就在教室里临摹教师的肖像，笔记也不记，所以到了考试的时候，常常临时抱佛脚，去借岡村的笔记补抄。到了月底，自然也经常向他借钱，因为他手头总是留着一些钱的。（岡村在大学毕业，当了大藏省的官儿，后来在秋田税务监督局局长的任上，因裁员而被革职。那时他还很年轻，后来一直郁郁不得志，就此什么工作也不干，躲在家乡过着地主的生活。听说不久以前，已经生病去世了。此人在高等学校的时候，经常考第一名，进了大学，考试成绩也总不出五名，我总考在他下面，可是他毕业以后，始终没有怎样飞黄腾达。）长江是岡山县人，自从最初同住在一个公寓里的时候湯浅仓平给我们介绍认识之后，我们一直来往着。他是教我下围棋、教我听义太夫、教我吃牛里脊的朋友。我也常常向他借钱。（他在历史科毕业后，当了中学校长，年纪轻轻就生病死了。）

月底沒有錢用的時候，只要到上面所說的幾個朋友那里去，總能借到我所需要的數目。使我佩服的是，無論哪次去向他們借，他們總有錢借給我。現在想起來，這大概是因為我所借的數目，本來就不大，再說，普通一個大學生，誰都隨時拿得出那幾個錢的。

不過，我雖然這樣經常向朋友借錢，卻從來沒有叫人家吃過倒賬。那末，我是怎樣彌補虧空的呢？這一點，我已經記不大清了。到現在只記得一件事，那就是父母寄給自己買罩在日本服上的外套的錢，被我像上面所說的那樣吃光了。那時我的二弟已經從物理學校畢業，在炮工學校工作，每月有工資收入了；他知道了這件事，就同我一道去估衣店（那個時候，神田柳原町河岸上，一併排全都是估衣店），拿他多餘的工資給我買了一件日本服外套。1901年的12月，我在本鄉區中央禮堂舉行的礦毒地區救援演講會上所脫下的日本服外套，就是那一件。當時《每日新聞》上還說什麼“外套的衣襟里綉着神田高橋這家裁縫店的店號”。大概那件東西就是在高橋那家鋪子裏買的現成貨吧。照說呢，應該是哥哥照顧弟弟，可是我這個哥哥，却由於吃點心、牛肉什么的，剝削了弟弟的工資。這一點，真是說不過去；不過，正因為如此，我到今天都還記得那件事。

二

大學畢業以後，就像上面所講的，我不久就結了婚，日用開支全都交給我妻經營，所以再也沒有發生過什麼問題。

我的妻也怪，她的性格完全和我相反，甚至一舉一動都是這樣。例如，哪怕飯後喝杯粗茶，我愛喝既濃又燙的，而我妻卻把我認為正合適的茶先用開水沖淡，然後用涼水兌冷。我對人對事易於頭腦發熱，感情激動，而我妻卻從來不感情用事，頭腦始終很冷

靜。我这个人，感觉极为迟鈍，而我妻却比誰都敏感。另外，我是个十分富于冒险精神、乐观精神的人，而我妻却非常深沉，經常考虑到最坏的情况，而在内心作下准备。

由于夫妻两个的性情如此不同，所以我家穷虽穷，总算到今天还没有人来逼債。其实呢，我妻也并不是什么理财能手。錢多的时候，她只知道存定期存款，不把它放在自己身上。至于盘算利息、尽量設法使那笔錢越变越多的本事，她一点也沒有。和我比較起来，仅仅具有不乱花錢这样一个消极的长处而已。不过，她这样一点长处，也就成了防止家庭經濟破产的安全瓣。我并不需要积錢，只要不背一屁股債或破产，就行了。所以，不論收入較多的时候也罢，像今天这样收入十分可怜的时候也罢，全都让我妻当家，我一概不管，专门依仗这个十二分可靠的安全瓣，坐享清閑。

可是，一生中間，我曾經有过一个时期，不得不离开我这样的一个妻，而过着独立营生的生活。那就是 1913 年 10 月到 1915 年初春，我作为文部省选派出国的留学生，而呆在国外的一年半左右那一段時間。

糟糕的是，文部省发給的学費，总是一次发下半年的。因此，錢多的时候，我的錢包里装着半年光景的生活費。但是，我不仅从来就沒有想到應該把这笔錢分成六份，每月限定用多少，有計劃地去用，不使超出預算，免得将来拮据；即使想到，也万万不是我所能做到的。因此，尽管除掉来回坐船的時間外，我在欧洲才不过呆了一年零两个月，結果在这短短的一段時間里，我却一下子就用亏空了几个月的学費。

文部省派出的留学生，一般都很年輕，再說又是身在外国，出了丑也沒有人知道，都处在不負責任的境遇里，所以許多人都胡搞女人乱花錢。但是，我的錢却不是那样花的。当初到达伦敦的时

候，身居日本邮船公司要职的我的一位亲戚，正出国考察，刚刚离开伦敦，知道我不久将要到达伦敦，就托公司里的人来照料我。这样，当我到达的那天，公司里的那个人就到船上来接我，为我找好旅馆，晚上还领我去看杂耍。这时，他看到观众席里有个年轻的英国姑娘，就走去和她讲了一些不知什么话；一会儿回来，轻轻地对我说：“那个女的是娼妓，不过来历分明，可以放心，价钱是一镑（当时合到日本钱十元）。”这样看来，说不定那个姑娘是他专门为了给我介绍而叫来的。可是，我却不是随随便便和一个漠不相识的女人发生关系的那种人。后来到了柏林，也是如此，那里有外号叫做第一税关、第二税关的女人，专门做日本人的生意，在咖啡店里出出进进，据说日本留学生谁都得通过这些税关，然而我却始终没有向这种税关纳过税。

可是，我却花费人家所不花费的钱。历来有这样一句老话：“嫖客吃的是冷饭，穿的是草鞋。”这是说爱嫖的人，在日常生活方面却很节省。而我呢，嫖虽不嫖，在日常生活方面却简直是胡来一气。现在举个例子来说吧。

三

离开京都的时候，我西装背心的口袋里放着一只廉价的镍壳表。到巴黎的时候，那只表不走了。拿去修理了一下，结果所花的修理费几乎相当于买一只表的代价。在巴黎耽擱了七十天，去到柏林，岂知那只镍壳表又不走了。我一怒之下，对那只破表死了心，就索性跑到一家大百货公司，买了一只新表。那只表相当漂亮，是钢壳子的，很扁很薄，放在燕尾服口袋里，都觉察不出。钱花得相当多，数目却不记得了，当时还拿到一张保用二十年的保单。

为了学德语，我本来准备长期呆在这个国家。哪里知道年初

到那里，才过暑天，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那时日本和这次世界大战中不同，它参加英美方面，对德国作战。我就在我国对德宣战的前夜，光身逃出柏林，经过荷兰、比利时，逃到了英京伦敦。行李大半丢在柏林，手里只提着一只旅行皮箱。可是，保用二十年的那只钢壳怀表，却好好地带在身边。

哪里知道到伦敦不久，这只表也不走了。在柏林买的时候，讲好二十年内可以免费修理，可是，这个约定现在毫无用处了。托公寓老板娘拿出去修理，回说发条断了，由于表是德国货，现在配不到那种零件，所以没法修。——这并非是我听错了话，当时我和专攻英国文学的高等学校教授户泽正保（他后来当了东京外国语学校的校长）住在一个公寓里，我是请那位教授当的翻译，所以决不会弄错。殊不知后来回国的时候，当作废物压在箱底的这只表，没有请教钟表店，仅仅由我那麻俐的小弟弟自己修理了一下，居然就管用了。我不懂为什么伦敦的钟表店当时要说那样的话。

总之，因为当时伦敦的钟表店说是不能修理，我当真火了，打定主意这番怎么样也得买一只上等表，于是当天就赶到规模宏大的约翰·贝乃特勋爵商行。这家商行据说创办于1750年乔治二世的时代，是伦敦第一流的著名老铺，专做钟表和珠宝买卖。我让铺子里的人给我看最好的银表。对方拿出来的，是一只带着环纹盖子的相当大的怀表；表的正面，打开厚厚的银盖子，才是普通表那种玻璃蒙子；表的背面，同样是厚厚的银盖。打开那个盖子，里面另外有一层薄薄的银盖。拿在手里一掂分量，和柏林买的那只飘轻的表相反，简直重得厉害，看上去挺坚固。我就问店员，这种表能用多久，对方笑着说：“Life long（能用一辈子）。”至于价钱，是十镑（当时大约合日币一百元）。我就说：“好，就要这个表。再把和这表相配的表链拿出来给我看看。”于是对方就取出了一条白

金表鏈；它的價錢，異常昂貴。我說要一條便宜些的，對方答稱那就只有金的。本來我想，表既然是銀的而不是金的；和它相配的表鏈，就該比金的次些；現在既然沒有更合適的，无可奈何，只好買條金的了。表鏈的價格是六鎊十五先令，約合日幣六十七元。兩樣東西，總共一百六十七元；這樣，一個月的生活費（一百五十元）一下子就此花光。

順便提一筆，這只表到現在還放在一個盒子里，擺在我的寫字台上。那盒子的蓋子里邊，寫有這樣幾個字：“1914年11月3日購，表價十鎊，表鏈價六鎊十五先令”。由此看來，這只表是大約三十年前的明治節那天買的；正如約翰·貝乃特勳爵商行里的店員所說的那樣，這只表確實很堅固，看來管我用一輩子。以前在大學研究室時，我曾經兩次把它從桌子上跌落在地上，可是機件一點都沒有損壞。英國人製造東西，專門講究堅固耐用，那種作風是可靠的。目前正在和英國打仗，大家開口閉口詆毀英國，不過人家究竟是一度稱霸世界的民族，有許多值得學習的長處，雖則笨重，然而却很牢靠踏實。當年我在《回顧祖國》里也曾說過，我是捧英國的。至少，當我看到一只三十年前買的懷表，到今天還分秒不差地在桌子上走着的時候，我心里挺舒服。

不過，那條花了六鎊十五先令買的金表鏈，後來怎樣了呢？順便也交代一筆吧。當時在約翰·貝乃特商行里，我在騎虎難下的情況下，雖然把它買了，可是過了不久，就覺得搞學術研究工作的人，胸前掛一根金表鏈，實在不大得體，因此就以半價讓給了同住一個公寓里的河田嗣郎。還記得那時在一旁看到這事的戶澤，勸阻我說：“何必賣掉它呢！”我却猶如拿着的是什麼有毒的東西那樣，恨不得立刻把它甩掉。

我就這樣地買了一個和自己的身分很不相稱的表。另外，呆

在伦敦的时候，我还以同样的派头定制了一套燕尾服和一套晚礼服。那时住在我的公寓隔壁的竹田省，却不学我的样，只是买了一套合身的现成礼服穿了。这就恰好合乎文部省留学生的身分。自然，并不是說一切都是这种脾气不同的結果，不过总而言之，竹田博士现在身为大阪律师公会的会长，家私巨万，而我呢，却只靠有限一点恩俸的收入，过着勉强餬口的日子。

上面所說的那套燕尾服花了我多少錢呢？最近搬家的时候，整理书箱，找到了当初做衣服那家鋪子的收据。“这种东西为什么还仔細收藏着呢？”我一边这样琢磨，一边就把它撕毀扔掉了。现在想起来，大概因为当时对我來說那是一笔相当大的款子，所以才留下帐单以备查考的。那收据要是还在的話，倒可以在这里順便把它抄出来，这样一想，就把所有的废紙簍都倒出来找，可惜再也沒有找到。（这篇稿子誊清到这里的时候，我还不甘心，四处找寻，好不容易把那张收据找到了。收据上面写着：“黑色鏡面呢燕尾服，包括上衣、背心、褲子、无尾常礼服，十鎊十先令。——白色礼服，背心，十八先令六辨士。总計十一鎊八先令六辨士。”裁縫店是 1879 年开业的韦伯思脫裁縫店。十一鎊八先令六辨士約合日币一百十五元；这也就是說，在这两套衣服上，我又用去了大約一个月的生活費。收据上的日期是 1914 年 10 月 20 日，在买表前两星期，那天恰好是我的生日。）

我这个人，只要身上有錢，就这样毫无計劃地乱花，有一次算了算帳，已經用亏空几个月的錢了。两三个朋友聚在公寓的火炉旁边閑談的时候，我說起这种情况，同事的富田（他是专门研究刑法的，体格非常好，可是回国后不久，就得肺炎突然去世了），还不相信，說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我于是取出口袋里的鈔票夹，打开給他看，他也不胜惊奇。（那时候我們这批留学生，大家都怕麻煩，不

把那点儿学费存入銀行，都是放在鈔票夹里随身带着。)

照这样下去，生活不久就成問題。因此，为了节省起见，我就暂时离开伦敦，搬到伦敦西方的沙桑普頓附近的农村里，租了农家的一間小屋子住下。同事河田，是专门研究农政学的，他虽則并非由于生活上有問題，却和我一起去了。到达目的地一看，那是个非常穷苦的村子，吃的东西，每天几乎就只有紅茶和面包，洗个澡也得乘火車，真是太不方便了。因此，我們只住了一个月，就又回到伦敦。离开伦敦的时候，因为没有皮箱，我新买了一个。这样一算，在乡下仅仅住了一个月，并没有节省什么錢，反而另外做下了一笔买皮箱的亏空。可是，那只皮箱毕竟是英国貨，后来，京都帝大的石川留学的时候，借給了石川，谷口留学的时候，又借給了谷口，路上无疑碰过許多釘子，它却仍然紋风不动，还很管用，到现在还留在我家里。

所以，当我縮短留学年限、提前由伦敦回国的时候，照說还該剩有几个月的学费，手头該很宽裕。哪里知道，連繞道美国回国的旅費都沒有了。无可奈何，只好和出国时那样，坐了日本邮船公司的船，乏味地再一次經過地中海、紅海、印度洋而回国。好在乘坐輪船，只要先买好船票，就什么都不用管了，吃飯睡觉也不用花錢，只要有几个零錢就行了。叨这点光，像我这样的人，居然也平平安安地回了国。

可是，回国之后，文部省却来了一份公事，要我报銷，把用亏空的几个月学费归还。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很多的稿费副收入，所以尽管接到了两三次催促的通知，却没有力量立刻归还那笔錢。过了一阵，终于連催也不来催了，我也就老着脸皮把那笔錢賴掉了。欠了錢而賴掉不还，我生平就只有这样一次。

(1943年4月19日脱稿)

随笔《断片》

那时我在京都帝大经济学部当教授。1920年9月，新学期一开始，我就被任命为经济学部部长。这个职位是一般教授所垂涎的，但在我来说，却是个很大的累赘。因为我已经在头年1月创办了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多半是每月出版一本，加之，经常还要赶着备课，实在忙得不可开交，所以不愿再参与不相干的学校行政事务。不过，按照经济学部的内部规章，每个教授都要根据任职的先后，轮流担任一年部长，所以我也不好不干。

巧的是不到一个月，我就闹病了。闹的是感冒，躺了几天，始终有些发烧，于是请当时在医学部当内科教授的岛菌博士给瞧。岛菌博士说：“病倒不重，但是你人瘦体弱，还是换个地方疗养一下好，我给你开诊断书。”这意外的幸运，真使我高兴，于是决定马上辞去部长的职务，到南海海滨的小城市——纪州的田边镇去转地疗养。岛菌博士是纪州人，事先给那里的女学校校长写了一封介绍信，托他照料我的一切。因此，我一到那里，那位校长就到船上来接我；承他照料，我得以在小旅店的一间屋子里安顿下来。旅店靠近海滨，那里的沙滩上长满大片松林。那是一家价钱便宜的旅店，我住的那间阴暗的屋子，摆设间里挂着粗俗的立轴。正南的松林里有一座漂亮的旅馆，笃实的校长大概是替预定长期住在这里的人考虑到费用问题，所以没有让我去住那家漂亮的旅馆，而在这家简陋便宜的旅店里为我租定一间屋子的。而且给我同旅店里讲妥，每天的房饭钱，比规定的价钱要便宜得多。我本来就觉得未免太便宜了，后来住下来一看，果然送来的茶具、餐具、被褥都很差，

以致像我这样平常在家里过惯简朴生活的人，都觉得未免太差了一些。器具之类姑且不說，伙食也糟得厉害。我想，吃这样糟的伙食，那末这次特地到这里轉地疗养，岂不是失去意义了吗？于是不久就主动地加了房飯錢，可是，仍然沒有多大效果。有一次还給我吃腐敗的青魚，害得我全身出疹子。不过我本是一个处在任何境遇都能知足的人，遇到暖和的日子，我就到海边去散散步，或者到离旅店三、四里远的鎮上去买些点心（我特別爱吃甜的，每次到乡下去，总是因为吃不到好点心，而感到不称心。田边鎮是乡下的市鎮，所以即使到鎮上的大街去买，也仍然买不到精美可口的点心）。或者带着画具去写写生（我把大儿子用的画具和两三块画板帶了来。我那时一共画了三张画：一张是院子里桔子黄熟、檐下晾着蘿卜的农家的写生；一张是靜物，画的是摆在鉢子里的苹果；再一张是自己的肖像。我一生之中，前前后后就只画过这样三张油画）。偶尔也看看书。就这样从 12 月到 1 月，在这寂寞市鎮的寂寞旅店里整整过了一个月。

我带来的书不过两三本，其中有一本薩克著的談俄国革命的书：《俄国民主主义的誕生》。我讀了这本书，觉得很有意思（就像后边所說的那样，这篇文章所談到的一段事情，整个是因为讀了那本书而发生的。当时我倘若不是生病来到这种地方，再也沒有工夫看这种书）。因此，回到京都以后，在 2 月間，我就以此为材料，写了一篇題名《断片》的随笔，寄給了《改造》杂志。随笔全部采用 S 和 B 对話的形式，两个人一面整理已故友人 K 的遺稿断片，一面交談感想。（S、B、K 这三个字都是随便想出来的。可是社会上却有一部分人議論說 S 是指堺利彦，B 是指馬場孤蝶，K 是指幸徳秋水）。这篇文章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篇所謂中間讀物（即使不好把它登在小說栏）。論性质，其实不能当作論說文看待。然而，《改

造》杂志竟把它登在4月号的卷首了。杂志是3月中旬发售的，刚一发售，就马上以妨害治安的罪名而遭到扣留。我所写的作品遭到类似的灾难，这是第一次。

二

平常我很少旅行，当时碰巧出差到山口。那是为了聘请山口高等商业学校教授作田庄一（后来当了京都帝大教授，退職后当了伪满洲建国大学的副校长）到京都帝大任教，而去该地同该校校长直接交涉的。作田是东京帝大毕业生，当时还没有出版过什么完整的著作，论文也发表得极少，所以不大出名。但是，我同他有旧交，相信他的能力，所以向教授会提議，聘请他到京大当副教授。由于我热烈主张，教授会终于同意了。可是，他是山口高商的重要角色，横地校长轻易不肯放他走。尽管我不爱旅行，也只好发个狠前往山口。

事情大致办完，正准备第二天晚上回京都，岂知那天夜里，半夜忽然来了电报，我已经入睡，也给闹醒了。电报是改造社打来的，通知我4月号的《改造》已被禁止发售。不一会儿，又来了一封电报，是同事河田嗣郎为同一件事情从京都打来的，

深更半夜来电报通知杂志被禁止发售，听起来似乎有些小題大做。但是，根据当时的形势，这样做倒不一定是小題大做。我已经說过，从两年前的1月份起，我出版了《社会問題研究》杂志。我之所以创办这个杂志，是因为决心今后尽量利用大学教授的地位来宣传社会主义；自然，創刊后不久，它就在統治阶级中引起了物議。从前在京都和我相处得很密切的瀧正雄（后来在近卫内閣时，由法制局局长升为企划院总裁，退職后被敕选为貴族院議員。当时我和他的交情不错，当他辞去京都帝大经济学讲师职务，第一次

参加竞选众議院議員的时候，我这个不爱演說的人，曾經到他的选区爱知县去作过几天演說，給他打气。那时，他已經当着床次內务大臣的秘书官了），当时写信給我說：“先生的《社会問題研究》，现在屡次三番引起了人們的議論，劝您乘着还未出乱子的时候，及早把它停刊吧。”我看了他的信，心想：虽則是好朋友，可是他现在毕竟是政党的成員，內务大臣的私人秘书；所謂出乱子，至多不过免职罢了，万万不能被人一吓唬，就主动后退。于是，我对这个表面上亲切的忠告，就給了一个不加理睬。另外，在那个时候，福田德三看到我在《社会問題研究》第四册上全文刊登了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資本》一书的恩格斯校刊本的譯文，就大肆叫囂：“河上是以研究为名，而宣传社会主义；內务省为什么不禁止它发售？”然而，1919年和1920年都平平安安地度过了，现在是1921年3月。我終于被当局貼上了大学教授中“危险思想家的首領”这样一张标签，保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出事情。至少人們已經在煞有介事地議論紛紛，說什么我的作品一旦被当局禁止发售，我准会馬上被免职；而我自己，也早已作了这样的思想准备。（不仅是我，凡是大学教授，所写的作品一被加上妨害治安的罪名，而禁止发售，就有被免职的危险。因此，一般人总是在看到有这种危险的时候，趁未遭禁止发售之前，搶先从市場上收回自己的著作，并使之絕版。京都帝大經濟学部的教授中，河田嗣郎在很早以前，石川兴二在最近，都采取了这种措施。）考虑到这些情况，就会明白两封电报突然送到旅居的枕边，并不是沒来由的。

大学教授的作品被认定为妨害社会治安而加以查禁，恐怕这还是破天荒第一次。所以，警保局檢閱科的官吏的态度，也不那么放肆，只說《断片》以外的論文、小說也有两三处不妥当的地方，尽量把事情弄得无从捉摸。报纸上还刊登了頗像辯解的官方談話，

說什么大学教授既有研究和发表的自由，照道理根本不必用那种方式讲话。如今想来，簡直像做梦。总之，二十多年前的大学教授，有着相当大的权威，他們虽則处在軍部的、警察的帝国主义統治之下，却蟠据在大学的角落里，勇敢地保卫着言論自由。（当时我享有远比民間社会主义者广泛的言論自由。同一件事情，堺利彦、山川均等人写了，官方就馬上加以禁止发售，而我却可以毫无忌諱地写，連一个××都不用。这是因为，在1927年年底日本共产党公开出现在日本人民群众面前以前，日本资产阶级还没有丧失自信，所以对大学里的学术研究自由，还比較寬大。而且，京都帝大依靠大正初年同盟辞职的压力而赢得的研究自由，已經成为这所大学的牢不可破的传统，我受到了它的不少恩惠。）

却說当时在山口一家旅店的二楼被电报鬧醒之后，我心想：“灾难终于临头了！”可是一关上灯，还是很香地睡着了。第二天早晨醒来，自己都佩服自己竟那样沉得住气。

当天晚上，我离开了山口。我心里估計，这一回自己的大学教授生活可要結束了，要是这次不坐軟席，今生怕再也没有机会坐了，于是就发个狠，买了軟席臥鋪票。直到临開車的时候，我才好不容易上了車。不知是因为我慌手慌脚的样子显得土气呢，还是因为我的仪表太寒酸，我一走进臥鋪車，就有一个茶房走过来对我說：“这是軟席臥鋪車！”后来他看见我只是嗯嗯答应了两声，根本没有走开的意思，就要查我的車票。出乎他意料之外，我居然从衣袋里掏出了軟席票和臥鋪票。他看了之后，这才一声不响、有气沒力地給我預备了臥鋪。我因为憋了一肚子气，所以后来一个小費也沒賞給他。

一到京都車站，看见突然西下的改造社山本社长在站台上等着我。他坐的汽車，就等在車站前。他馬上帶我坐上汽車，把我送

到吉田二本松的住宅。另外，他自然还告诉了我东京方面的消息；至于说了些什么，现在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

后来改造社寄来了几百元稿费，我马上退了回去。因为，当时我想，4月是大众杂志的旺月之一，任何一种杂志印的份数都比平时多，特别是，那一期《改造》是三周年纪念的特刊，篇幅既大，份数也加印了很多，结果却全部报了废，所以我给改造社所造成的损失实在不小。赔偿这笔损失虽然不可能，给人家造成了巨大损失，自己还要拿钱，就更加过意不去，所以那笔稿费再也不能要人家的了。可是，改造社从东京派来了一个记者，对我说：“无论如何请把这张支票收下，否则不好交代。”我再三说明自己的想法，对方还是坚持说：“如果就此把支票拿回去的话，那简直成了不会办事的小孩，太没脸了。”说什么也不肯让步。两个人围着个大陶瓷火鉢说着说着，我终于发起火来，说道：“那末只好把这张支票烧掉算了。”刚要放进火鉢，他就按住我的手说：“烧了对谁都没有好处，您既然这样坚决不受，那我就拿回去吧。”

当时我的作品被查禁后，就只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我既没有免职，也没有退职，甚至连警告也没有受，就完事了。在那以后的七年中间，我还是平安无事地当着大学教授，直到1928年4月，才被迫提出辞呈。（但是，坐软席卧铺，那次却是第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

三

如果《断片》所掀起的风波就此结束的话，那末我就不写这篇回忆了。当时我做梦也不曾想到，这篇文章竟给一个青年造成了决定性的影响，以致在这篇文章发表两年半以后，发生了那严重的所谓虎门事件。

原来，那青年名叫难波大助，早就抱有革命思想，当时正酝酿着一个极其大胆的计划，要刺杀天皇，从而使民众对天皇制发生怀疑。他读了《断片》之后，下定了最后决心，从此更加热心地着手于实现他的计划的准备工作。

他的故乡是山口县熊毛郡岩田村。他的家庭是当地的世家大地主。当时，他的父亲是众议院议员。因为他的祖上早年和已故的伊藤博文公爵是好朋友（伊藤公爵也是熊毛郡人），所以家里保藏有伊藤过去在英国首都伦敦搞到的一支手杖形的手枪。那支手枪制作得十分灵巧，光看外形，和普通手杖毫无差别，可是弯开一看，里边却装有极其精巧的手枪。有一天，大助说他学打猎，要求他父亲让他用这支手枪。本来，他父亲见他平素呆在一间屋子里，哪儿都不去，好像在考虑什么事情，总担心他这样下去会妨碍健康。现在见他心机似乎有了变化，就高高兴兴地答应了他。后来，大助弄到了公开购买火药的执照，于是，拿着那支手枪上山练习了很长时间的射击。最后，逐渐有了把握，又到东京住了一个时期，研究东京的情况和地形。

1923年9月1日（《断片》发表后两年多的时候），关东地区发生了大地震。霎时之间，东京变成了火烧场，成千上万人悲惨地死去，损失达五十五亿元之多。就在这时，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惨遭宪兵上尉甘粕杀害；南葛工会干部平泽计七、河合义虎等人也在龟户惨遭杀害；无名的朝鲜人无辜被害的，更是不计其数。大概这件事情也给了难波大助不小的刺激。

他为了实现自己的宿愿，地震后离开东京回到故乡。他是回去取那支手枪的。那时正当地震后不久，交通运输尚未恢复正常状态，不时有自称受灾的人来讨钱借钱，周围充满着不平静的空气；就在这时，有一个青年到吉田二本松我家里找我。我妻出去一

問，青年說：“我是山口县熊毛郡岩田村人，姓难波。从东京回故乡的途中，把旅費用光了，走投无路，能不能借給我一点錢？”我妻当时虽然也曾想到，岩田村就是她胞弟去作贅婿的那个村子，却没有想到亲戚之中有一家姓难波的。青年又拿出一张紙条說：“請交給先生看一下。”我当时正在二楼会客室同友人小島祐馬談話，一看我妻拿来的紙条，一手鉛筆字写得很潦草，也沒有姓名住址，只写着本人是共产主义者，其余的話就和他口头所說的一样。我問小島对这件事的看法怎样，他說：“如果不写什么共产主义者倒也罢了，既然这样写着，就說不定是特务之类的家伙，还是拒絕他好。”我也以为小島說得有理，就照他的話做了。青年也沒有强求，空着手就走了。

直到后来才知道，这个青年竟然就是难波大助。他在我家里遭到了拒絕，隨即去找他的亲戚——医学部的市川教授，在那里借到了所需的旅費。由于这样一个关系，虎門事件发生以后，市川教授还被传到法院里受了一番盘問。借給他旅費的人倘若是我，再加上《断片》，就成了双重关系，事情也許相当麻煩。然而，难波当初不去先找那和他較亲的亲戚，却先找我，这大概是因为他对《断片》的作者怀着一种友情吧。而我呢，却叫他失望而去，现在想来，总觉得有些对不住他。

难波回到故乡之后，带着那支手枪又去东京，在那年年底12月27日天皇出席議會開幕典禮的时候，等仪仗队过后，瞄准天皇开了枪。本来，当时沿途的警备照例极为森严；但是，他帶的手枪，外形和一般手杖完全相同，所以誰也沒有疑心他。子弹打中了天皇坐的車子的玻璃窗；可是，玻璃是特制的，子弹沒有笔直地穿过去，所以天皇絲毫也沒有受伤。

这就是所謂虎門事件。由于对这一事件負有責任，大約三个

月前的9月2日在大地震的慘禍方酣时成立的山本权兵卫内閣，当天就宣布总辞职；当时的警察总监湯浅仓平（后来官做到宮内大臣、内大臣）則受到了惩戒免职处分。

当时，我做梦也未曾想到这一事件和自己有什么干系。因为难波家和我内弟大塚有章去作贅婿的国光家有姻戚关系，所以预审的内容尽管全部严守秘密，却还是让我知道了难波在审讯中交代过“《断片》使我下了最后的决心”的话。第一次听到这件事情的内兄大塚武松，当时担任文部省維新史料編纂官，他看到事情严重，十分担忧，就让住在东京的我的三弟左京，特意到京都来告訴我。因为連写信都怕出岔子。

这位叫作难波大助的青年，是一位世上少有的意志坚强的人物，他至死坚持自己的信念、自始至终抱着毅然决然的态度（后来一些共产党员一被捕，上自有名的大人物，下至无名小輩，都相继立誓转变方向；而他却与此相反）。当时担任他那个案件的审判长的最高法院院长（名字不記得了），晚年退休之后，曾回顾自己几十年来的司法官生涯說：“我审理过的被告多到不可胜数，可是在那許多被告中間，却从未见到像难波那样坚强不屈的人。”他对一个理当視為大逆不道的人居然作出这样的評語，可见难波的态度是多么光明磊落了。（我記得，那篇文章是以《法窗回顾》之类的标题連續刊載在《大阪每日新聞》上的。好事的人，如果到图书馆去查一查，一定能找到。我现在却没有余力作这种事。）

难波绝对沒有說他后悔自己的行动。可是，皇国日本哪怕只出了一个像他这样的人，对皇室的尊严來說，也是一件极其犯忌、极其严重的不祥事件。所以，当局在进行审判之前，曾千方百计地劝被告悔悟。为此，用尽了一切苦肉計。难波起初坚决不答应，后来当局让他最心爱的妹妹和他见面，在他面前一次又一次地哭泣，

这才弄得他没有办法，表面上总算答应按当局的要求做去。于是，当局作了这样的安排：举行审判的那天，首先由被告表示自己的所作所为完全错了，现在真诚悔悟；然后由审判长宣布被告改悔之情显著，酌情减死罪一等，判处无期徒刑。因为，这样一来，一则可以表示全日本毕竟没有一个人存心要谋害天皇，二则可以借减死罪一等的作法，在以天皇名义进行审判上来显示皇家的无限仁慈。于是，推事、检察官、律师、父母兄弟，都打着这样的算盘而放了心。哪里知道等到举行审判的那天，站在法庭上的难波，却出乎所有在场者的预料，竟然理直气壮地申述了自己坚定不移的信念，最后还放开嗓子高呼了三声。“共产国际万岁”。无论是推事、检察官或律师，所有在座的人都大惊失色，这才明白自己是上了当。但是，事情已经无法挽救了。难波就这样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年纪轻轻地就义了。（顺便说一下，共产国际早就反对对个人采用恐怖手段。然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日本的共产主义者还很幼稚，还不十分了解共产国际的政策。假如难波再迟些时候出来活动的話，我想他一定会采取另外一种行动的。）

四

以上事实，详细知道的人恐怕很少。我是因为碰巧难波和我的内弟家有姻戚关系，这才得以详细知道这些事实的。可是，后来我还因为偶然的機會，知道了埋葬难波大助的详细情况。

1935年冬天，我正在小菅刑务所服刑，有一天胃痛得要命，就进了病房。像我这种违反治安维持法的犯人，本来应该送进和其他犯人隔离的单身牢房里。但是，这间病房只有一间单身牢房，当时已经住着一个垂死的重病人，因此，只好把我关在摆着几十张床铺的杂居牢房里。想不到病房里对犯人闲谈管得那么松，因此，我

得以从睡在旁边床鋪的一个犯人口里，听到了为难波挖坟墓那天的詳細情形。

难波被处死刑的地点，恐怕是市谷監獄，因为小菅刑務所沒有死刑台的設備。可是，荒川溢洪道的对岸有一座小寺院，那里有这个刑務所附設的墓地。难波的尸体就埋葬在那里。当时謠传有一群社会主义者准备在半路上拦劫他的尸体，因此当局神經过敏起来，在各方面采取了特别的警备措施。告訴我这些情况的那个犯人，有一天晌午，和伙伴们一起被带到上面所說的那个义冢地（这种在監獄围墙外干活的犯人，用監獄里的术语来称呼，叫作“外役”）去挖墓穴。当时他非常納悶，为什么要挖那样大、那样深的墓穴。此外，还准备了几根半尺粗的四棱大木料。埋葬是夜里进行的，这个犯人也去帮了忙。当时，荒川的堤坝上到处有打着灯籠的警察和宪兵在放哨。棺材深深埋进地里，上边纵横交織地放上早就准备好的木料，压得結結实实，最后盖上了沙土。等到工作完毕，他才从主任看守那里听到了具体情况。他还告訴我說，每当春分、秋分以及每年10月20日为死在獄里的人作法会的时候，总有担任外役的犯人去扫墓，难波大助的墓标到现在还在那里。当时由于我听得热心，他也繪影繪声，讲得格外起劲，把所有情况都一五一十地告訴了我。可惜我现在已經記不清楚，只好写出以上这一些。

本来我听了他那番話，心想出獄后一定要去凭吊一下这块墓地；可是出獄以后，連这一点也未能如願以償。

最后，談一下关于难波的判决书的事情。

因为审判是在禁止旁听的情况下极其秘密地进行的，所以审判长念給被告听的判决书也絕對保密。当然，司法部門以及别的部門的大官們可能知道全部情况。可是，事关皇室，尤其是被告的态

度有損皇室尊嚴，所以那些小心謹慎的大官們，沒有一個人敢多嘴多舌。幸運的我，這才沒有遭禍。假如這篇判決書在報紙上發表出來，那末我早已被甘柏上尉那類人不知殺害過幾次了。

為什麼這樣講呢？這是因為，那篇判決書雖則很短，內中有一段却明明寫着：讀了河上肇的《斷片》，才下了最後決心。這個判決書，從前在京都帝大教授時期跟我相處得很好的同事某教授，曾經從司法省保存的秘密檔案中把它摘錄下來給我看過。現在想來，真是可惜；那麼短的東西，當初把它全部抄錄下來就好了。

談到可惜，《斷片》原稿丟失也是件憾事。原稿一度送交印刷廠，上面還用墨水標明了鉛字號數，後來我托改造社寄還給了我。對於這份原稿，我特別重視，由於過分重視，唯恐當局在搜查住宅時把它沒收，就把它另外放在一個地方。現在翻遍文件櫃的所有抽屜，也找它不到。

五

寫完上述回憶之後，我深深感到，我實在是個幸運者。

拿出紙邊現在已經發黃的當年那本《改造》雜誌翻了一下，原來《斷片》那篇文章，首先敘述了俄國青年恐怖主義者格里戈利·蓋爾舒尼被判死刑的情形，這位青年曾經在1904年計劃並指揮暗殺內政大臣西庇雅金、烏法省省長包古諾維奇和哈爾科夫省省長奧保連斯基公爵等人（這位蓋爾舒尼雖被判了死刑，後來却越獄逃跑，經過日本、美國，逃到了法國，結果病死在那裡。他從長崎去東京的時候，日本的社会主義者曾經為他舉行了莊嚴的歡迎會；離開橫濱之前，還曾特地為他舉行了歡送會）；在這段敘述的後面，我寫下了這樣的感想：“請注意，有時暗殺者會有一顆比被暗殺者更敏銳的良心。”另外，文章里還談到那位年紀才只二十八歲、就在

1906年走上了断头台的柯諾普利安尼考娃，她在法庭上說：“我知道你們会判我死刑的。可是，不論我死在什么地方——絞刑架上也罢，流放地也罢，其他什么地方也罢，我只抱着一个念头死去，那就是：‘朋友們！原諒我吧！我能給你們的，仅仅是我的生命，只不过生命。’这样，我就会抱着詩人所謳歌的‘沙皇将跟隨倒下，自由的太阳将在整个俄罗斯大地上升起’的日子必定到来的坚定信念而死去。”还說：“生活本身教导我：……你不能拿刺刀去刺杀思想，同样，你也不能光靠思想去对抗刺刀。”想起来，这类話不論是哪个国家的什么人說的，今天要把它用鉛字印出来，也許誰也絕對做不到吧。可是，尽管那是二十多年以前的事，我却竟然把它发表出来，而終于沒有受到絲毫責备。这一点，如果对现在的人談起，恐怕誰都会觉得奇怪吧。

就在最近，京都帝大經济学部教授石川兴二，因自己的著作而惹了禍，停了职（而且他那著作早在两三年前就由作者自动从市場上收回，并使之絕版了）。石川这个人，本来还竭力鼓吹国体主义，宣揚天皇中心思想；只因为偶一不慎，过分指責了資本主义制度，就立刻遭到了这场灾殃。本来，他那本成問題的著作，並沒有被查禁。有一时期，曾經太平无事地流传在社会上。现在忽然遭到这场灾殃，大概会使他感到意外吧。和这相比，我却幸运得多，因为，按說光是那篇《断片》，当时就可以断送我的教授职位。然而后来我竟繼續在大学里工作了七年之久，照样随意写作。离开大学之后，还为所欲为地搞了一阵，至今依然平安地活着。在这世界大乱的时节，虽則穷些，却悠閑自在，趁着兴致，还偶尔写写这样的回忆，快快乐乐地度着晚年，这不能不說是实在太幸福了。我怀着这样的心情，在这里結束这第十一篇回忆。

（1943年4月24日完稿）

歌 五 首

“多么想念以前在山头茶馆里吃过的豆馅年糕呀，它的滋味和故乡一样雋永。”

“怀着高兴的心情吃客人吃剩的生鱼片的过去，怎么也忘不掉。”

“晚上睡在租到的三席的小屋子里，却有海阔从鱼跃之感。”

“小面包多好吃呀！天天早晨吃的巴黎的小面包，味道多好啊！”

“现今世上，食物的味道和人的味道都一天比一天差了。”

小 国 寡 民

陆放翁有一篇《东籬记》，内容如下：

“放翁告归之三年，辟舍东茆地，南北七十五尺，东西或十有八尺而赢，或十有三尺而缩。插竹为籬，如其地之数。薶五石瓮，瀦泉为池，植千叶白芙蓉。又杂植木之品若干，草之品若干，名之曰东籬。放翁日婆娑其间，掇其香以嗅，撷其颖以玩，朝而灌，莫而鋤。凡一甲坼，一敷荣，童子皆来报惟谨。放翁于是考《本草》以见其性质，探《离骚》以得其族类，本之《诗》、《尔雅》、及毛氏、郭氏之传，以观其比兴，穷其训诂，又下而博取汉、魏、晋、唐以来一篇一咏无遗者，反复研究古今体制之变革。间亦吟讽为长谣、短章、楚调、唐律，酬答风月烟雨之态度。盖非独娱身目、遣暇日而已。昔老子著书，末章‘自小国寡民，至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其意深矣。使老子

而得一邑一聚，蓋真足以致此。于呼！吾之東籬，又小國寡民之細者歟？開禧元年四月乙卯記。”

我讀了這篇文章，非常羨慕放翁晚年的清福。

我本來就不喜歡宏壯的第宅和華麗的居室，特別是晚年退隱之後，經常空想着能有一所僅僅兩三間小屋子的庵堂那樣的房子住住。賴山陽寫《日本外史》的那個山紫水明樓，據說就是兩間小屋子，一間是四張席墊大小，另一間是兩張席墊大小。現在我覺得，如果又當書齋又當臥室，那末四張半席墊或三張席墊大小也就可以了，如果光作書齋用，那末三張席墊或兩張席墊大小也就可以了。但是，屋子的周圍，最好多留些空地。如果能有一所蓋在寬廣房地的一角的小宅子，那就稱心了。遺憾的是，這樣的房子，在京都想租也租不到。

不知什麼道理，京都人總是喜歡窄小的院子。儘管是郊外很空曠的地方，要是京都人設計房子的話，也會把院子設計在房子的中央，在那狹窄的院子里，搬來許許多多石頭，造個假山，挖個池子，修座石橋，安個石燈籠，種幾棵松樹和槲樹，栽上些杜鵑花，把它造成庭園的式樣。儘管是小小的出租房屋的有限一點兒空地，也盡量照式布置一番，這就是京都人的作風；而我卻不喜歡這種人為的庭園。我寧願屋子小些，空地多些，屋子周圍什麼布置也沒有，只在平地上栽種各種各樣的花卉。讀了《東籬記》以後，我就神往着那樣的住宅。

放翁的文章里說，埋了五個石瓮在地里，貯以泉水，種上許多白蓮；要是可能的話，這種池子我也想要一個。距今三十年前，我初到京都教書的時候，曾去千賀博士家問候。他住的那所房子雖則是茅草房頂，客室的南面卻有個很大的池子，金色大鯉魚經常在活水里活潑潑地游來游去。我見到那種布置，心里非常羨慕。那

里恰好紧靠着下鴨神社，地势較低，高野川的河水不断地渗进地里，可能只要稍稍掘去几尺土，清泉就会自然而然地噴涌而出。不仅那个地方是这样，一般說来，像京都那种四围是山、中間是河的小小的盆地，并不一定要靠近山边，即使在市中心，有許多地方也只要稍稍掘去几尺土，就会有泉水噴出来的。

放翁的文章里还說，夹杂着种些树和花卉；这恰恰是我所最想效法的。大学生时代，我住在公寓里，就經常在庙会上买些花卉盆栽回来，放在案头或者窗台上，以供观赏。那时候，同輩中間几乎沒有人干这类事情，所以，他們經常取笑我說：“你似乎十分爱花哩。”现在到了晚年，要是让我随心所欲的話，我将在自己的书斋里放滿各色各样的花卉。我不打算在院子里种什么松树或槲树。因为一般說来，除了无花果是我所喜欢的而外，其他一切阻挡太阳光的树木我都不爱，所以将尽可能少种。有棵把紅梅就够了。既不开花、又不結果的植物之中，我只爱竹子。可是，我却不願意在我住的地方来一个“修竹千竿”，把四围遮得密不通风。只要在书斋的窗洞外边种那么两三棵，就好。其余的空地，既不要造假山，也不要安石灯籠，留一片空地，全种草花。說起花儿，像大丽花那类从西洋移植过来的过于华美的品种，我也不喜欢。我喜欢日本历来就有的百日草、桔梗、芍药、牡丹和罌粟。說是这么說，今天我即使到死，也絕對沒有希望依照自己的心願經營一个哪怕很小很小的草庵了。所以，讀了放翁的文章，不禁感到羡慕，只能海闊天空地胡思乱想一番而已。

放翁的东籬是可以羡慕的。但是，老子的小国寡民比东籬更可羡慕。

以大国众民、富国强兵为目标而一味推行軍国主义、侵略主义的祖国日本，几年前掀起一場孤注一擲的战争，终于弄得一败涂

地,明天9月2日,就要和美国、英国、苏联、中国等联合国签订无条件投降的条约了。这时候,每个人都正在抱恨和悲愤;独有我这个本来的失败主义者,却高兴得了不得。因为,从古以来,国家这样东西,就只不过是少数统治阶级利用它来镇压大多数人民的权力机构。如果打败了仗,那个镇压机器从此开始崩溃,这对人民大众来说,是再好也没有的事情。我相信,日本国民如果趁此机会明白了老子所说的小国寡民的深刻含义,那末他们今后反而会比过去幸福得多。本来,一个国家如果在外国对别的民族使用暴力和武力,那末,它在国内对本国人民(被统治阶级)也一定实行暴力和武力的镇压。侵略别的国家而获得好处的,主要只不过是少数统治阶级、权力阶级,除此以外的一般民众,至多不过沾点儿余沥,然而却不得不永远窒息在压制政治之下。这决不可能是幸福的。现在日本战败了,不得不抛弃武力侵略主义了。与此同时,国民的自由眼看着就要发扬起来了。这是一件好事。要是能更进一步,两三年内全国能改变为苏维埃组织的话,那末,今后只消四、五年工夫,就会恢复战前的生活水平,以后国民的福利会同样飞速地逐步增进吧。

讲到这里,我想起了现已成为苏联的一部分的高加索。高加索仿佛是小亚细亚通向苏联欧洲部分的咽喉,它南面和土耳其、伊朗接境,东面是里海,西面是黑海,面积有四十多万平方公里,几乎和日本本土差不多大小(日本本土大约三十八万平方公里,战前总面积是六十七万五千平方公里),人口仅仅一千二百万,和日本战前总人口一亿五百万相比较,几乎十分之一都不到。然而那里却分成七个共和国和几个自治州,不得不称为小国寡民的地方。

可是,高加索这个地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帝俄时代,到处都是富豪、贵族的别墅,那里还有沙皇的离宫,富豪、贵族们冬

天去那里避寒，夏天去那里避暑，和克里米亚并称为俄国的乐园。那个地方，一般适于园艺，特别是黑海沿岸，不仅出产优良的苹果、桃、梨，巴统市附近还盛产橘子、檸檬、橄欖，葡萄也生产得很多，所以有这样一句话：“想吃新鲜水果的人，非去高加索不可。”不仅如此，另外还有这样一句话：“画画的人，想接触奇风异俗的人，温泉疗养的人，都非去高加索不可。”首先，这是因为那地方的风景好极了。正亲町季董就曾说过：“高加索风景的雄大秀丽，我虽然游遍了日本内地，也还没有找到一个可以和它相比拟的地方。”其次，是因为那儿住着各种各样的少数民族，那些民族又各自保有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其中像果鲁克族人的服装，非常美丽，男的头上戴了羊皮制成的高帽子，身上穿的外套长得拖到地面，腰里束着饰银的细带，细带上都插着短剑。女的都长得很美，从古以来就以美人而出名。这样一来，高加索山中自然经常产生一些风流韵事，诗人普希金和文豪托尔斯泰就曾把这些风流韵事作为题材，写出了一些有名的作品。再其次，是因为那里的山中，到处都是温泉，所有这些温泉连同以前沙皇的离宫、贵族们的别墅，现在都成了劳动人民的财产。所以，高加索这个地方，实在不妨称之为老子所说的“小国寡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模范。我这个人，就像不愿住宏壮的第宅而宁愿住小庵一样，不愿意做一味推行军国主义、侵略主义的大国的一个成员，却宁愿做这种小国寡民的国家的一个国民。今后日本究竟会变成怎样，虽然不得而知，但是，总而言之，今天目覩军国主义一下子彻底崩溃，我不能不感到特殊的高兴。

啊！高加索！我要是能在这个人口仅仅数倍于京都的小小的地区——冬暖夏凉、吃得好、穿得美、人人个个都能安其居、乐其俗的小国寡民的国土——当一个无名的良民，晚年在自己书斋旁边

开辟一个东籬，那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人生清福了。我现在所衷心羡慕的，与其說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等人的伟大，倒不如說是那些在这样的大政治家所代表的联邦的一角、安享晚年的无名的人民。

(1945年9月1日脱稿)

談 饅 头

媽媽：我猜想您可能感到寂寞，早就想找机会写点东西給您解解悶，几次拿起笔来，却怎么样也打不起精神，总是半中間擱下了。可是，近来打了葡萄糖針以后，总算有了写东西的气力，因此就想即使短些也成，今天可得給您有头有尾地談点什么。

我想先談饅头。听到这句话，您也許要說，不管怎么个談法，与其听些紙上空談，还不如真地吃它一个饅头。其实呢，我也很想吃饅头。但是，一时之間又吃不上，沒有办法，只好来談談它，借以画餅充饥。人一上了岁数，誰都思恋故乡，想念小时候所吃的东西。据科学专家說，那是因为大脑的某一部分从小起了变化，有生理学上的一定原因，是无可奈何的。现在住在我身边的洵子和浩子，生在东京，后来去到上海，搬到大連，又来到京都。像他們这样年紀还不滿十岁，就到东到西，是一輩子也不会思念故乡的。而我呢，十四、五岁以前却一直生长在岩国；因此等到上了年紀，就再也沒法不想起小时候的事情来。哪怕是饅头，我也觉得岩国的饅头最好吃。

岩国的烤饅头，看来是当地的特产。直到今天，我在別的地方从来沒有看见过那样的东西。查查字典，也只有烤年糕、烤糰子，找不到烤饅头的一条。要是我沒有弄錯的話，那种饅头，主要是做

佛事时候用的，是馒头中最粗恶、最便宜的一种。馅儿是红糖豆泥馅，外边那层皮子，也不是上好面粉。烤馒头用的铁模子板，一次能烤好多个馒头。排成一排的一个一个圆形的凹模子，雕刻成各种花色，有桔梗花、菊花、梅花、枫叶、浮在水上的菊花，再不然就是锦带桥风景等等。和好了的面，就浇在模子里。听说普通的馒头，和面粉时加的是甜酒，可是烤馒头的面粉里加的却是饴糖。烤出的馒头的外皮所以变成那样一种颜色，也许就是饴糖的关系。这一点，现在我不能确定，要是您知道的话，来信请附带告诉我，再不然让左京告诉我也成。模子里浇进和好了的面以后，放上一个搓得圆圆的馅儿，上面再浇一层和好了的面。这些原料放进铁板上一排模子里以后，就把钉在铰链上的铁板盖盖好，放在炭火上，像烤年糕那样烤。烤馒头就是用这种方法做出来的。记得小时候，我曾站在馒头铺门口看他们做过。普通的馒头是蒸的，烤馒头却不是蒸的。查一查《言海》^①，上面说馒头是一种圆而扁平的食物。可是，现今的馒头，式样很多，不一定是扁圆形；而烤馒头却正如字典上所说，是扁圆的。

记得我小时候并不那么爱吃这种烤馒头。再说呢，事实上这种烤馒头也未必是最好吃的东西。但是，可能因为它是岩国的特产吧，更确切些说，可能因为我一心以为它是岩国的特产吧，到了上了岁数的今天，对这种具有特殊外形、特殊颜色和特殊风味的烤馒头，真是想念得厉害。

现在想起来，乡下的做佛事，很是有趣。做佛事那天，接到通知的人家，每家都送各式各样祭品来上供。祭品中最多的，就是馒头。固然，有时也送鲜花或者水果，还有送豆腐的，但是，大都还是

① 日语字典的名称。——译者

送饅頭。做佛事那天早晨，許多饅頭店(大約有四、五月吧)陸陸續續地把新出籠的饅頭送來。送來的時候，盛放在一只有蓋子的大漆盒里(那種盒子，叫什麼盒子呢？木板厚厚的，沉得很)。做佛事的人家，只把盒子裏的東西收下，盒子得退回。揭開蓋子一看，裏面整整齐齊地擺着冒熱氣的饅頭，饅頭上面還放有一張紙條子，用墨筆大字寫着姓名。到後來，就漸漸改用鉛印名片了。像這種地方，我覺得還是老派的作法來得使人感到親切得多。饅頭之中，送得最多的是烤饅頭，有時也送腰高饅頭、五彩饅頭或者毬糕。那種腰高饅頭(普通把“腰高”二字念作“koshidaka”，岩國地方卻把它念成“koshitaka”)，裏面包着上等的豆沙餡兒，個兒比烤饅頭小，可是外形不是扁平的，而是像常禮帽的帽頂那樣圓圓地隆起的。顏色雪白的那種，是江米粉做的，裏面摻和着山芋、山藥、佛掌蓆的粉。顏色黃黃的那種，可能不是用江米粉，而是蕎麥粉做的。這種饅頭，因為用的原料都比烤饅頭好，所以大概價錢也比較貴。還有那毬糕，是把江米粉捏成皮子，裏面包上餡兒蒸出來的。形狀扁平，外面粘有一層染了黃色或者紅色的江米粒子。要是外面什麼也不粘，似乎叫作白玉。現在想起來，覺得最有趣的是那五彩饅頭。饅頭鋪子把東西送來，揭開蓋子一看，滿盒子都是小孩腦袋一般大的大饅頭，疊成兩層。這種饅頭，雖則是扁平的，可是由於饅頭本身大，所以就厚：餡兒也厚，外面包的皮子也很厚。上面的顏色，可能是饅頭蒸熟以後，剝去外面一層皮，然後着上的吧。顏色有的是深紅，有的是深藍，十分鮮艷，看上去有點俗氣，可是現在想起來，它卻有一種異國風味，叫人聯想到中國的色彩，非常有意思。那種饅頭，主要是用來供在靈台上的，吃起來也許並不可口，因為皮子太厚了。不過，饅頭這樣東西，我已經有三、四年沒有吃到，現在要是那樣的五彩饅頭從天上掉下來，我也許會高興得

跳起来吧。

做佛事那天，因为大家都送馒头来，馒头太多了（烤馒头小的大概是一分钱一个，大的大概是两分钱一个，每盒少则装三十个，多则装五十个，所以人家送来的每份祭品，少则三角钱，多则也不到一块钱），没法全部摆在供桌上，只好约略供上一些不同种类的。（盛馒头之类的那种供具叫什么，现在再也想不起来了，记得是个圆圆的红漆盆，只有长长的一只脚。）祖母死的时候，人家送来的祭品，仅仅把极少一部分上供，爸爸觉得那会辜负了人家的一片诚心，就让我把送祭品的人的姓名，挨个儿抄在一张纸上，贴在灵台前面。记得当时曾把灵台的布置拍了照相。还记得照相里拍着一袋米。那是一个姓稻田的大地主亲戚，送来代替馒头的。战争时期，黑市米价最高的时候据说每升二百元，合算起来，一粒米就是一分钱；即使在大大跌价了的今天，每升米据说还要七、八十块钱。照此看来，那一大草包的米，在今天代价是相当可观的。可是那个时候，大家并不把它当作一回事。

就像上面所说，各家都送馒头来。这许多馒头，自然无论怎样也吃不了。起先我还担心不知怎样处理，哪里知道，内中的一部分，在款待来宾吃饭的时候，三个五个地搭放在给每人带回家的礼品里，差不多全都分掉了。

话不免扯远了，做佛事时请人吃饭，可算得是少有的风俗。大都市里，这种风俗不用说早就绝迹了。现在岩国也已经变成一个市，外乡人愈来愈多，那种风俗大概也将一点点废除吧。再过五十年，这封信也许会变成风俗史的一个资料哩。

祖母去世、我回家的那次，听说做佛事那天客人要来很多，我还忧心尽管卸掉纸门，把停灵的那间屋子和会客室打通，地方也不大，容纳不下那么多客人（我们家里长久没有碰到丧事，给祖母

办的那次佛事，还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的经验)。殊不知車到山前自有路，习惯这样东西自有办法。

先来的客人，坐了一回，吃了一点东西，随即起身告辞；于是后到的客人，馬上填了他的空。就像这样，一会儿工夫，一张坐垫就換上好几位客人。坐垫虽則只有那几张，可是，由于客人川流不息地迅速新陈代谢，所以事情还是进行得很順利。固然，也有些至亲好友，一坐就是半天，喜欢喝酒的，一杯又一杯地只管喝，不喝酒的，就吃了一碗又一碗地大吃杂燴啦醬湯什么的。可是，这一点也不碍事。絲毫不用担心，一切事情都自然而然地会順利妥貼地过去。

做佛事人家回的礼，除了烤饅头之外，以前似乎还有山薯、藕、慈姑、胡蘿卜那类蔬菜，把这些东西切成大块子，或者根本不切，就那样用水煮熟。这种东西，不是当场吃的，而是让带回家去，重新加佐料做来吃的。近来这种东西可能已經不再用，而代之以白薯泥和栗子做的糰子，或者洋粉做的假羊羹，或者飯糰等等了。我只是在六、七岁时碰到过外祖父、外祖母的佛事，在自己家里碰到过祖母和父亲的佛事，所以我的记忆模糊不清，不大可靠。

至于正式請客人吃饭时，除了米飯而外，記得也只有豆腐丁醬湯、飞龙头^①（关东地区叫做雁拟；飞龙头这个名称，大抵是中国传来的吧）、大杂燴（把芋头、蘿卜、鬼芋、胡蘿卜、牛蒡、藕等等煮在一起，湯汁很多。本来还該加些鸡肉，可是素斋里不用鸡肉，只靠香菌和油豆腐来提味）、白壘（把豆腐拌碎，里面和入各种蔬菜的拌菜）那类东西。

話又扯到別的地方去了，现在还是回过头来談饅头。做佛事

① 一种掺有菜丁的油豆腐。——譯者

人家回礼时，尽管大手大脚地用去那許多烤饅头，余下来的还是不少。記得那些余下来的，就送给佛寺啦、亲戚人家啦以及关系比較深的人家。五彩饅头数量既少，个儿又大，所以总是一切四，把它搭在几个烤饅头里。毬糕、粽子和腰高饅头也搭上几个。供品这样适当地搭配好以后，就装在盆子里，送到各家去。本来就心人家送来那許多饅头，无法摆布，这样一来，就都解决了。那真是非常有趣的风俗。

总之，从来做佛事就离不开烤饅头，沒有烤饅头，可以說就做不成佛事，所以一提起饅头，我也就想到了做佛事。

我现在很想吃那种刚烤好的烤饅头。因为它的餡儿甜而不膩，无论多少都吃得下去。我真想把它当飯吃一个飽。像风月堂的栗子饅头啦、虎屋的羊羹啦那类东西，太甜膩了，不能把它当飯；可是，烤饅头却和夹心面包差不多，是可以当飯的。說起这一层，用蕨根的淀粉做原料的具有一种特殊风味的山口的米粉糕，以及那不知用什么原料做成的岩国的紅羊羹，味道都很清淡，即使稍稍多吃一些，也不至于倒胃口。这种地方，是很可取的。

最近有一位久居京都的朋友来看我，他說：“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前，出町桥有个卖烤糖餅的摊头，我经常从那儿买了带回家去。很大的糖餅，一分錢一个，要是买一角錢，还饒上一个，在紙袋里給装十一个。回到家里，边喝着茶，边吃糖餅，吃完一角錢的餅，肚子就飽得厉害，由此可见那糖餅有多大了。像那样的便宜粗点心，倒也別有风味。我现在老是想念着那种糖餅。”听完他那番話，我說我也有同样的想法。可是，像媽媽这样一径呆在岩国呆了八十多年的人，也許想念的不是土里土气的烤饅头，而是到东京和京都玩时所吃过的东西吧。您会說，“比起烤饅头来，我更想吃窩伏儿餅”吧。那种窩伏儿餅，是把面粉用发酵粉調好，加进糖、鸡蛋

黄、牛奶，放在涂过牛油的模子里烤焦，然后取出来，把烘焦那面朝外，一折两半，里面夹进果酱或者乳酪而制成的。照道理說，自然也應該比烤饅头好吃，而且也确实是先进得多的上等食品。我記得媽媽也和我一样，喜欢吃包果酱的，而不太喜欢吃包乳酪的。可是，那种东西不能像烤饅头那样，一次吃上許多。不过，所謂先进的上等食品，本来也就不需要多吃。只有野蛮人，才吃营养价值少的杂七杂八的东西。正因为那类东西可供吸收的部分不多，所以不多吃就不能感到滿足。这样一来，肚皮自然而然地就撑大了，以后無論吃什么，如果不是一次吃上許多，就仿佛沒有吃东西那样了。換句話說，吃得差，吃得多，肚皮大，乃是野蛮人的特点。人类越是进步，吃的东西就越富于营养，用不到多吃，因此肚皮也小，您說是不是？拿西洋人和日本人比較，日本人吃得較差，肚皮也較大；同是日本人，越是乡下人，就吃得越差，肚皮也越大。就拿豆沙糯米糰子來說，越到乡下，做得就越大、越粗糙。歌人橘曙览，在他的一篇夜宿山寺的文章里，說过这样的话：“送来了刚做好的过节用的牡丹糰子，足有孩子的脑袋瓜儿那般大小，糰子里掺有芋泥，外面包有一层豆沙。我和今滋两个人，勉勉强强才吃了一个。”讀了这个，就記起少年时代到稻田姑母家去吃牡丹糰子的那回事来了。我去看姑母的时候，姑母就說：“来得正好，今天我做你心爱的东西請你吃。”于是她馬上在灶膛里点起火来，煮糯米，煮赤豆，給我做豆沙糯米糰子。姑母家离城虽只六、七里地，却已經是乡下；做出来的糰子，和住在城里的媽媽所做的糰子大不相同。豆沙包得很少很少，尤其是，因为舍不得多放糖，所以一点也不甜，但是个儿却很大。由于是特地为我做的，姑母又一再劝我吃，我勉勉强强吃了两个，就再也吃不下了。我說烤饅头不錯，可以一次吃上許多，把它当飯，可能也只說明我的土气罢了。像我这种人，不比从小生长

在大都市里的高貴的人們，倒属于肚皮撑大了的野蛮人那一类。所以像现今这样每天只能配給到二合左右的主食，一日三餐，就每頓都感到沒有吃飽，很不好受。因此只好画餅充饥，空想着把烤饅头吃它一飽了。我說这些話，要是让高貴的人們听到了，他們也許会皺眉吧。因为，实在讲起来，一个窩伏儿餅加上一杯咖啡，或者栗子饅头、蛋黄饅头、高級羊羹之类的东西加上一杯末茶，要高貴得多。北美有一种叫做爱斯基摩的未开化人，关于他們有这样的記述：“他們身上穿着許多衣服，肚子里也积蓄着大量的营养品。那是欧洲人所想像不到的。据說一个爱斯基摩人，平常一頓飯要吃下十公斤到十四公斤的脂肪、油、和肉类。不过他們那种大吃特吃，是补偿长期的絕食的，他們健康却不致因此而受到多大危害。”一公斤相当于日本的二百六十七錢，十公斤到十四公斤，可就了不得。看来我还没有不开化到爱斯基摩人的程度，所以听到这种大食量的故事，我也不免皺眉。

話又扯远了，赶快打住吧。媽媽最后那次来东京，那时我們住在中野区冰川町。下了高架电車，沿着栅栏边的小路走不多远，就是陆桥。不走过陆桥却向左轉，不多远就是我的寓所。在一下高架电車的地方，有三、四家比較好的点心鋪子。可是都在桥的那边，只有一家開設在这边的桥堍下。媽媽吃的窩伏儿餅，多半都是在那家鋪子买的。那家鋪子，并不是专做西点的鋪子，而是一边做着日本式糕糰，一边附带做些窩伏儿餅，所以还不是什么高級品。不过新做出来的，吃起来还是很可口哩。我自己也曾經到那家鋪子里买过两三次东西，可是据說今年因为遭到空袭，冰川町一带完全烧光了，所以我以前那寓所以及桥堍下那家点心鋪子，现在也許早已无影无踪了吧。

住在冰川町的时候，家乡也曾寄来过烤饅头。邮寄要隔好些

日子才收到，自然饅頭都發硬了。不過把發了硬的饅頭放在炭火上烤焦了吃，卻又香又好吃。我的牙齒不好，剛烤好的饅頭嚼不動，得澆上熱茶再吃，味道也覺得不差。

烤饅頭之外，還有一樣東西我到現在也忘不掉，就是小時候媽媽給買的大鼓饅頭（大鼓饅頭這個名詞，字典里查不到，也許又是岩國的土話）。那是我十歲前後吃到的（後來大概不再時興了吧），離現在已經五十多年，我也記不大清楚了。只記得似乎是一家叫做二宮的鋪子做的，因此大家把它叫做二宮的大鼓饅頭。現在可能街面的樣子也已經改變了。記得當時二宮那家鋪子，開設在離商店街老遠的、小學校北邊一所冷清清的士族第宅旁邊。店面不擺出饅頭來，只不過掛着一塊招牌。他家沒有做現成的貨色，誰要買饅頭，得去預定，一兩天里給做得。那饅頭是扁圓形的，大小恰好和孩子玩的鼓相仿，平常總只買一個。大鼓饅頭的皮子和蛋黃饅頭、豆沙烤餅的皮子一樣，大概都是在面粉里和上雞蛋黃和糖做的。餡兒是白小豆沙的不含水分的干餡，很像京都出產的一種叫做“滿月”的名點，它的特点是無論擱多久，既不腐敗，也不變味。那時候媽媽總把大鼓饅頭放在里房的衣櫥的小抽屜里，聽憑我要吃的時候去一点一点掰着吃。我的食欲，一生中間升降很大，有時候非常不好，比誰都吃得少，有時候卻又非常旺盛，比誰吃得都多。您買大鼓饅頭給我吃的那個時候，正趕上我食欲不振的時期，一個饅頭，個兒固然大了些，我總要吃好多天才能吃完。現在我雖然歲數快有七十，却正趕上食欲旺盛期，要是讓我吃那種東西，不費吹灰之力，一天我就能吃它一個。

順便談談十二年前所吃到的一次饅頭吧。那時我呆在小菅刑務所，被關在單身牢房里讓整理鉛字。休息的時間，每天只有上、下午各十分鐘，其餘的時間，除了三頓飯之外，得從早到夜繼續不斷

地摆弄鉛字。所以，上、下午各十分钟的休息時間，就被看得非常寶貴，这是沒有坐过監牢的人所無論怎样也体会不了的。可是，有一次教务主任却叫我在這寶貴的休息時間里到他那儿去，吩咐我做一件临时工作。原来那时刑務所里正在向一千几百个犯人征求可以作为犯人的注意事項的標語，征求到的標語的数量相当大。从征求来的大量標語之中，要評出甲、乙、丙三等，另外还要选出十条佳作来，这就是临时工作的內容。我对工作本身虽然倒不怎样討厭，可是，休息時間被耽誤了，心里十分气憤。我心想，教务主任是个吃了多年的刑務所教誨師飯的真宗和尚，年紀也相当大了，平常接触的时候，总給人一个通情达理、老于世故的印象，为什么这次竟然如此不加体諒，找这样的事情来叫我做呢？为此而憤憤不平。不过，毕竟那种工作是自己所喜欢做的，所以不久就完成了任务。

过了四、五天，我又让教务主任叫了去。跟着領我的看守去到設有佛坛的教誨堂一看，已經有二、三十个人，围着拚成正方形的桌子，坐在那里了。我也听从吩咐，一起坐下。再一看，每人面前竟放着十个相当大的腰高饅头，用紙垫着！随后教务主任就对大家說：“今天这个茶話会，是呈請了所长，从街上點心舖里买来了饅头，借以奖励標語的当选者，同时慰劳选標語的人的。在这半个钟头里，大家可以舒舒暢暢地說个話儿。饅头要在这里吃完；关在单身牢房里的人，也不要带回牢房。”我听了这一番話，才明白教务主任派我做选標語的临时工作，完全出于特別照顾，于是我不仅不再气憤，反而非常感激。

尽管是关在刑務所里，平常也并非吃不到饅头，比如作业成績优良的人，就会得到糰子啦、饅头啦那类奖品。可是，那些奖品，都是刑務所伙房自己做的，而且小营刑務所里的饅头，总是荞麦做

的。那时我刚下獄，由于教务主任的照顾而意外地吃到的腰高饅头，却是街上的点心鋪做的。东西十分讲究，顏色、滋味和触觉，跟长崎出产的一种名叫輕羹的甜点心相仿；那饅头的皮子里，准摻和着山芋泥。我翻着白眼，依照教务主任的話，一会儿工夫就狼吞虎咽地把十个腰高饅头吃光了。那时我才下獄不久，每月还只能和家属见一次面，好容易盼到了秀子来看我的那天，一走进接见室，我馬上把我竟然吃到十个腰高饅头的得意消息告訴了她。自从穿上紅囚衣，进了監獄，四年中間，吃到那样的饅头，事实上也只有那么一次。

关于饅头，罗罗嗦嗦讲得很多了，下面再补写一段媽媽并不见得爱听的話，来結束这番长談吧。

“饅头”这两个字，研究起来真正奇怪。“头”这个字，在“头角”、“头发”的时候，念成“tō”^①，“头取”二字念成“tōdori”。可是，在“头痛”、“头幅”的时候，就不念“tō”而念“zu”^②。只有在“饅头”的时候，却念成“jū”，真正叫人莫名其妙。事情的来历是这样的：距今約六百年前，有个名叫林淨因的中国和尚，归化了日本，在南都（当时把京都称为北京，相对地把奈良称为南都）第一次教给人家做饅头，从此就有了“饅头”这样一个名詞。当时中国是元朝的天下（元朝共有十代皇帝，九十年天下，从公元 1279 年到 1367 年），“manjū”这个称呼，可能就是那时候元来的发音。

再說“饅”这个字十分古怪，除了“饅头”二字联写在一起而外，无论什么地方都用不上，单独一个字的时候，就沒有意思。这可能是因为“饅头”原来写作“蛮头”，念“banzu”的音，后来文字和发音

① 这里所說的是日本讀音。以下仿此。——譯者

② 按：在日本某些地区，至今还把“zu”发音为“du”。——譯者

都起了变化。据说在一本叫做《事物起源》的中国书里，有这样一段记载：“从前诸葛亮（是将近一千七百年以前的人）南征，要渡过滤水，根据当地的风俗，本来必须砍下人的头来祭河神，于是诸葛亮就用猪和羊作为祭品，另外把面粉做成人头形状，来代替真的人头，这就是今天的馒头的起源。”所以这两个字本来写成“蛮头”，就是野蛮人的头，到后来才变成“馒头”的。既然不是光用来祭神，而成了人们吃的东西，蛮头这个名称自然未免有些杀风景，可能这才按照一般食物的名称把“蛮”字改成“饅”字的。“曼”字念“ban”，也念“man”。这和“万岁”、“万里”、“万物”、“万世一系”的“万”字念“ban”而“万一”、“万效”、“万病”、“万分之一”的“万”字念“man”，是一个道理。依我看，是采用了“曼”这个字，然后加上“食”字的偏旁（因为它是吃的东西），才造成这样一个新的“饅”字的。所以，“饅”这个字，就只用于“馒头”这个场合了。而发音呢，本来是“ban”，以后就一概念成“man”，“banzu”变成了“manzu”，到了元朝，终于变成了“manjū”。

由此看来，馒头这样东西，本来是人头那般大，里面不包什么馅儿的。前些日子，有个人来看我，给我送了馒头，他说：“听说先生想吃馒头，所以家里做了给您送来了。”当时我心里非常感激，岂知掰开一看，里面什么馅儿都没有，仅仅像蒸的面包或江米糰子那样。事后，我还对家里的人诉说我的失望道：“本来一团高兴，结果却大失所望。没有馅儿的馒头，我生平还没有听说过哩。”其实呢，说不定是我错了。也许馒头本来就是什么馅儿也没有的，到后来才渐渐变成甜点心，翻出种种的花样，有所谓烤馒头、栗子馒头、蛋黄馒头等等，形状也完全不像人头了。您看有趣不有趣呢？整个说来，东西的名称，查考一下它的起源，是很有意思的。日本人把马铃薯叫做 jagatara 薯，而 Jagatara 却是南洋的地名（就是爪哇

島的雅加达)，这次太平洋战争期间，报纸上还经常见到哩。Kabocha（南瓜）也同样是南方的地名（印度支那的柬埔寨）。岩国不把它叫 kabocha，却叫 bōbura；我想这多半也是什么地方名称吧。

今天就谈到这里为止，最后把近来做的有关馒头的短歌抄录在下面。

“天如果容许我，但愿能让我吃了刚出笼的热馒头再死。”

（7月4日作）

“蒸些大馒头，边喝着茶，大嚼一顿，这样的時候不久会来到吧。”

（日本投降后8月15日作）

“听说我想吃馒头，特地做了来，掰开一看，却没有馅儿。”

（9月1日作）

“但愿能住个草庵，边吃大馒头，边看樱花。”

“要是我死了，供一束鲜花吧，供一盆大馒头吧。”

（以上两首，9月7日作）

“我现在最想吃的是馒头、毡糕、馅儿面包和豆沙糯米糰子。”

“死的日子和容易买到馒头的日子，究竟哪个先到来呢？”

（9月8日作）

“世上没有比厚厚的豆沙馅儿馒头更好吃的东西了！”

“肉和鱼都不怎样想吃，只有馒头，一天比一天想得紧。”

“年老多病，只想念着故乡的烤馒头的豆沙馅儿的香味。”

“多想念从前做佛事人家供桌上堆得像山一样高的馒头呀！”

（9月9日作）

“外孙女递来了老妻给做的馒头，还带一杯末茶。”

这封信是9月24、25日前后开始写的，一直写了十天工夫，好

容易才写完。要是在从前,半天工夫就把它写好了;现在却要十天之久。不过居然有心情写这点儿东西,这就足以证明精神比前一时期要好。过几天还想给妈妈写点什么。祝您健康!

(1945年10月3日脱稿)

〔附记。在家乡早晚侍奉妈妈的左京弟弟给我来了信,内容大致说:“谈馒头的信,已经拜读了,觉得很有趣。不过有一两处地方,哥哥似乎弄错了。我走过的地方不多,尽管这样,在关东地区却曾几次吃到和家乡一样的烤馒头。制法和您来信所说的不同。照来信所说的那样,是做不出那种馒头来的。详细情况,过几天再写信告诉您吧。”大约因为每天忙得紧吧,他到现在还没有再给我来信。〕

河上肇年譜

这个年譜，是在河上博士給《自传》写的年譜的未完成的一部分——只写到 1928 年“辞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那条为止的“根据记忆的自記”、以及世界評論社印行单行本《自传》时所加的补充部分(把 1928 年以后的部分补齐)的基础上，依照原来的形式，又从头加以补充而成的。新添的东西，是按年代順序增补的那些对于了解博士在学术上的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主要著作；另外，和博士的一生多少有些关系的日本以及世界大事的一部分，也作为附記写上了。

《自传》的脱稿，大致是 1944 年前后。博士公开发表的著作，不下一百种。每种著作，交稿时从第一頁到最后一頁都是整整齐齐的；独有这个年譜，却没有写完，这大概是因为連他自己也没有料到那样早就去世吧。1945 年，日本投降以后不久，《世界評論》創刊号发表《自传》第一部分的时候，博士已經臥床不起，生命垂危，据说連那本杂志都拿不动，只能撫摩一下封面而已。

(内田丈夫記)

河上肇年譜	大事記
1879年(明治 12 年) 10 月 20 日生于山口县岩国鎮。父亲叫河上忠，母亲叫田鶴，娘家也姓河上。后来生了暢輔(异母弟)和左京(胞弟)两个弟弟。	

	<p>1897年</p> <p>足尾矿山下流的矿毒事件，鬧成了社会問題。</p>
<p>1898年</p> <p>山口高等学校毕业，进了东京帝国大学的法科大学政治科。</p>	
<p>1901年</p> <p>11月，听了为救济足尾矿毒区灾民而举行的演讲会，第二天，除随身所穿的以外，把全部衣服捆成行李，送到救济会的办事处。当时《每日新聞》（1901年11月23日发行）还为了这件事情刊出了一則《见义勇为的大学生》的消息。</p>	<p>5月，“社会民主党”成立，发表了八項二十八条的綱領，当天就被禁止結社。</p>
<p>1902年</p> <p>大学毕业。和大塚秀子結婚，后来生了长子政男、长女靜子、次女芳子。</p>	
<p>1903年</p> <p>当了东京帝国大学农科大学实科的讲师，后来又兼任专修学校、台湾协会专门学校、学习院等的讲师。</p>	<p>11月，幸德秋水、堺利彦等印行了《平民新聞》周刊第一期。</p>
	<p>1904年</p> <p>《平民新聞》刊登了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p>
<p>1905年</p> <p>以千山万水楼主人的笔名，在《讀卖新聞》上連續发表《社会主义評論》。意外地引起了社会上的注意，报纸的銷数因之驟增。</p> <p>同年12月，中途停止写上述的《社会主义評論》，辞去一切教职，参加了伊藤証信的无我苑。那个組織，现在說起来，就和西田天香的一灯园差不多。因为当时学士头銜还很吃香，所以这一举动更引起了社会上的注意，頓时成了新聞人物。到现</p>	<p>1月，“流血星期日”。彼得堡几十万工人、妇女和儿童向沙皇請願，要求結束战争、保証政治自由以及經濟生活。沙皇的軍队用开枪回答了这次請願，杀死了一千多个工人。</p> <p>6月，“波将金号”铁甲艦上爆发了起义。</p> <p>10月，成立了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維埃。</p>

河上肇年譜	大事記
<p>在还記得当时《万朝报》的記者曾經說什么“河上肇是才子”。其实,那次参加无我苑,并非有意識地要想沽名釣誉,而是认真地那样做的。半夜三更冒着大雪回到巢鴨的大日堂、穿着透湿的西装、被褥都沒有就睡觉的那番气概,现在想起来頗觉可羨。</p> <p>不久以后,当了《讀卖新聞》的記者。</p>	
<p>1906年</p> <p>在《讀卖新聞》上連續发表《人生的归宿》。《社会主义評論、附无我爱的真理》单行本由讀卖新聞社出版。</p>	<p>1月,日本平民党和日本社会党合并組成“日本社会党”。</p> <p>3月,堺利彦主編的《社会主义研究》出版,登載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譯文。</p>
<p>1907年</p> <p>脱离讀卖新聞社,創刊新杂志《日本經濟新志》。提倡保护貿易政策,和田口卯吉博士所創办的《东京經濟杂志》的自由貿易論相对抗。</p>	<p>1月,《平民新聞》日报出版;4月,受到禁止出版的处分,因而停刊。同月23日,“日本社会党”也被勒令解散。</p> <p>3月,足尾銅矿的三千六百名矿工,起来要求改善待遇,高崎团部派兵三营加以暴力鎮压。</p> <p>8月,第二国际举行斯图加特大会。</p>
<p>1908年</p> <p>9月,当了京都帝国大学法科大学讲师,从东京搬到京都。</p>	
<p>1909年</p> <p>当了京都帝国大学的副教授。</p>	
<p>1910年</p> <p>《經濟学的根本概念》(《經濟全书》第一編)由宝文館出版。</p>	<p>5月,幸德秋水等三十几个人因所謂“大逆事件”而被捕,自后鎮压严厉,社会主义运动差不多全被赶入地下。由于这个事件,十二个人被判处死刑,十二个人被判处无期徒刑,五个人死在牢里,还有几</p>

	个人发了疯。
<p>1911年</p> <p>皮尔逊著《价值論》（和河田嗣郎合譯）由宝文館出版。《經濟与人生》由实业之日本社出版。《时勢的变化》由讀卖新聞社出版。費特著《財物的价值》由有斐閣出版。</p>	<p>10月，片山潜等組織“社会党”。</p> <p>12月，在片山潜领导下，东京市電車工人六千多人实行总罢工。</p> <p>12月，中国革命軍占領南京，孙文就任临时大总统。</p>
<p>1912年(明治45年,大正元年)</p> <p>費希尔著《資本和利息率》由博文館出版。</p>	<p>2月，中华民国誕生。</p> <p>8月，友爱会成立，鈴木文治任会长。</p>
<p>1913年</p> <p>初冬，赴欧留学。</p> <p>《金錢、信用和物价》由京都法学会出版，《經濟学研究》由博文館出版，《經濟原論》、法依特著《唯心的个人主义》两书由有斐閣出版。</p>	
<p>1914年</p> <p>在柏林时，遇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留学期中，为《大阪朝日新聞》写了一些通信；这些通信，后来都收入《回顾祖国》里。留学期中，由于博士会的推荐，获得了法学博士的学位。</p>	<p>6月，东洋紡織工厂女工一千名被解雇，发生罢工反抗。</p> <p>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p>
<p>1915年</p> <p>初春回国，被任为教授。</p> <p>《回顾祖国》由实业之日本社出版。</p>	
<p>1916年</p> <p>《法制經濟教科书》（和佐佐木惣一合著）由长澤金港堂出版。</p>	
<p>1917年</p> <p>《貧穷故事》以及費希尔、費斯克合編的《怎样生活》两书，由弘文堂出版。</p>	<p>十月革命爆发（新历11月7日）。</p>
<p>1918年</p> <p>《社会問題管見》由弘文堂出版。</p>	<p>8月，富山县的一个漁村滑川村的主</p>

河上肇年譜	大事記
	<p>婦們搶了米店，由此波及全國，成為搶米暴動。後來由於國家動員警察和軍隊加以鎮壓，好容易才平靜下去。被起訴者達七千六百餘名。</p> <p>12月，東京帝國大學里成立了“新入會”。</p>
<p>1919年</p> <p>從1月份起，個人雜誌《社會問題研究》（89期以前由個人編輯，90期至95期與人合編，96期至105期仍由個人編輯）由弘文堂創刊。在學生和知識分子中間發生很大的影響。</p>	<p>3月，朝鮮京城鬧事，六個月中間，全國各地發生朝鮮獨立暴動，與統治當局衝突（三·一事件、萬歲事件）。</p> <p>3月，共產國際第一次大會在莫斯科舉行，有十九個國家派出的五十名代表參加。</p> <p>3月，墨索里尼組織政治團體，和意大利社會黨對抗。</p> <p>5月，中國一萬五千名學生舉行了反對中日軍事協定、反對簽訂凡爾賽和約的示威遊行（五四運動）。</p>
<p>1920年</p> <p>《近世經濟思想史論》由岩波書店出版。</p>	<p>3月，發生了東大教授森戶辰男的一篇介紹克魯泡特金的文章所引起的筆禍事件。</p> <p>5月，舉行日本第一次的五一勞動節。參加的有一萬人。</p> <p>6月，高島素之完成了《資本論》的全部翻譯工作。</p>
<p>1921年</p> <p>在4月號的《改造》雜誌上發表《斷片》（內容是依據薩克的《俄國民主主義的誕生》寫的），那一期《改造》因之遭到禁止發行。作品中第一次遭到禁止發行的，就是《斷片》。</p> <p>兩年後發生的“虎門事件”（1923年</p>	<p>7月，中國共產黨舉行成立大會。</p>

12月27日)里的难波大助,在法庭上供称他是讀到了那篇文章,才下定最后决心的。

馬克思著《雇佣劳动与資本》、《工資、价格与利潤》、以及《唯物史观研究》各书由弘文堂出版。

1922年

《社会組織和社会革命》以及《唯物史观略解》由弘文堂出版。

7月,日本共产党不合法地举行成立大会;11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上,正式承认日本共产党为共产国际的日本支部。

10月,墨索里尼发动政变,建立了法西斯政权。

11月,“学生联合会”成立。

11月,在莫斯科召开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大会,有六十二个国家派出的三百四十个代表参加。

1923年

4月,祖母去世,享年九十六岁。由于小时候受过她的大恩,就给《我等》杂志写了一篇《追忆祖母》。《經濟原論》(1923年度的讲义稿)由京都經濟学研究会出版,《資本主义經濟学之史的发展》由弘文堂出版。

9月,趁着大地震的混乱,統治当局惨杀南葛工会的河合义虎、平澤計七等九人(龟戶事件)。同时还杀死朝鮮和中国的工人六千六百人。

9月20日,宪兵大尉甘粕惨杀了大杉荣夫妇。

12月27日,难波大助在虎門狙击皇太子(虎門事件)。

1924年

重新翻譯的馬克思著《雇佣劳动与資本》和《工資、价格与利潤》两书,由弘文堂出版。

3月,野坂参三等設立产业劳动調查所,創刊《产业劳动时报》和《国际》。

5月,創立学生社会科学联合会,以紀念馬克思誕生一百周年。

1925年

3月,长女靜子嫁给京都帝大副教授工学士羽村。《馬克思資本論略解》(第一卷第三分册)由弘文堂出版。

3月,国会通过了治安維持法。

5月,上海工人示威游行,和外国警察发生冲突,死伤的人很多。由此发展成

河上肇年譜	大事記
	<p>为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全民运动（五·卅惨案）。</p> <p>9月，《无产者新聞》創刊。</p> <p>12月，京大学联干部被捕，后来全日本的学联干部都被捕。</p>
<p>1926年（大正15年，昭和元年）</p> <p>1月，因为“学生事件”，住宅受到搜查。从此以后，里里外外事情就多起来了。</p> <p>9月，长子政男死了。他自从1910年得了心脏病之后，經常生大病，虽經百般医治，終于沒有效果，死时才二十四岁。为此一再想辞去教职，浪迹江湖，終于沒有做到。</p> <p>《階級斗争的必然性和它的必然轉化》、德波林著《列宁的辯証法》两书，由弘文堂出版。</p>	<p>1月，“京大学生事件”里的三十一个学生，第一次以违反治安維持法的罪名被起訴。</p> <p>12月，日本共产党在山形县五色温泉不合法地举行第三次大会。</p>
<p>1927年</p> <p>4月，父亲去世，享年八十岁。葬在家乡。他是作者所写的一切作品的周密的收藏者和爱讀者；从此以后，就失去了这座靠山。</p> <p>12月，为了参加《馬克思主义讲座》的演讲会，旅行到一别七年的东京。</p> <p>馬克思著《經济学批判导論》（和宮川实合譯）、布哈林著《工农俄罗斯的社会主义建設》（和大桥积合譯）由弘文堂出版，馬克思著《資本論》（《岩波文庫》版第一至第五分册）、《雇佣劳动与資本》、《工資、价格与利潤》（后两者也是《岩波文庫》版）由岩波书店出版。</p>	<p>7月，田中內閣第一次出兵山东。</p> <p>8月，日本共产党代表渡边政之輔等，在共产国际領導之下，在莫斯科制定了有关日本問題的《27年綱領》。</p> <p>12月，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議上議决采用27年綱領，并彻底重新建党。</p>
<p>1928年</p> <p>4月，辞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的职</p>	<p>2月，第一次普选，劳农党当选的</p>

务。辞呈提出的第二天，在一般报纸上发表了《辞职理由书》，两三天之后，又在《京都大学新闻》上发表了一篇《面临辞去大学教职之际》。

《经济学大纲》（改造社《经济学全集》第一卷）由改造社出版，《资本论入门》（第一至第八分册）、《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翻译，《分类列宁选集》第一分册）由弘文堂出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由上野书店出版。

〔以上是在河上博士自己所写的“根据记忆的自记”的基础上，多少加以补充而成。〕

增 补

1928年

决心把历来的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开放，让年轻同志们参加编辑工作，在第八十九期上发表一篇《站在暴风雨中》，从此以后，逐渐深入实践运动。

1929年

和大山郁夫等组织新劳农党。

3月5日，旧劳动农民党选出的国会议员山本宣治遭到暗杀，匆匆赶到东京，8日在入殓礼堂上致悼辞的时候，刚讲到第一行“坚决作斗争”几个字，立即被勒令中止发言。

《资本论入门》（第一卷上册）由弘文堂出版，《克服幼稚病》由同人社出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改造社《经济学全集》第八卷）由改造社出版，《为了马克思主义》由希望阁出版。

1930年

1月，为了参加新劳农党本部的工作，搬到东京，住在西大久保，担任《劳动农民新闻》的编辑。

2月，由新劳农党提名为京都的国会

是山本宣治、水谷长三郎；社会党当选的是安部、铃木、西尾、龟井；日劳党当选的是河上丈太郎；九州民宪党当选的是浅原等人。

2月，日本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赤旗》创刊。

3月，全日本三府二十七县的共产党员遭到统一逮捕，被捕者共一千六百多名，被起诉者四百多名（三·一五事件）。

6月，治安维持法修改得更残暴了。

12月，日本工会全国协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

3月，暴力团七生义团团员黑田，刺杀山本宣治。

4月，以市川正一为首，日本共产党员在全国范围内遭到统一逮捕（四·一六事件）。

8月，大山郁夫等发表了《组织合法的左翼无产政党的提案》。

8月，劳农党分裂，小岩井净、细迫兼光等被开除出党。

河上肇年譜	大事記
<p>議員候選人，去京都競選。</p> <p>8月，得出新勞農黨大不對頭的結論，倡議解散該黨。</p> <p>10月，解散新勞農黨，和大山等分手。在《中央公論》雜誌上發表《論勞農黨的發展的解散》，停刊《勞動農民新聞》。</p> <p>《什麼是產業合理化》由同人社出版，《第二貧窮故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改造文庫》版）由改造社出版。</p>	
<p>1931年</p> <p>新勞農黨解散後，重新成了書齋里的人，不過只持續了一年光景。</p> <p>馬克思著《政治經濟學批判》（和宮川實合譯）、馬克思著《資本論》第一卷上冊由改造社出版。</p>	<p>9月，柳條溝事件勃發，成了侵略中國東北的開端。</p>
<p>1932年</p> <p>5月，離開家庭，進入地下活動。</p> <p>8月，根據日本共產黨的委託，翻譯32年綱領“日本的形勢和共產黨的任务”。</p> <p>9月9日，正式加入日本共產黨，從此以後，對黨的機關報《赤旗》的編輯工作，不斷提出意見。</p> <p>《資本論入門》由改造社出版。</p>	<p>3月，偽滿洲國宣布獨立。</p> <p>4月，共產國際以歐洲局的名義發表《關於日本的形勢和日本共產黨的任务的綱領》（32年綱領）。</p> <p>5月，發生了陸海軍和農民等所進行的暗殺事件（五·一五事件）。</p> <p>10月，奸細混進日本共產黨內，發生了“共產黨襲擊”川崎第百銀行大森支行的所謂搶劫事件。</p> <p>10月，日本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在熱海開會時，遭到警察襲擊。全國三府九縣的一千五百零四名共產黨員被逮捕，其中一百四十二名被起訴。</p> <p>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岩田義道被捕並遭慘殺。這一年，學生的左翼運動進入高潮，有一千一百七十個學生被逮捕，發生的事件計三百零五件。</p>

1933年

1月12日，本来隱藏在中野区住吉町三十号画家椎名刚美的家里，这一天被捕。地下生活大約过了一百四十多天就結束了。

8月，以违反治安維持法的罪名受到审判；8月8日，第一审被判徒刑五年；9月15日，撤回上訴，于是五年的刑期就从这一天算起。

《馬克思主义批判者的批判》由希望閣出版。

2月，作家小林多喜二被捕并遭惨杀。

4月，学生运动因京大瀧川教授的問題而漸趋熾烈。

6月，佐野学、鍋山貞亲两人发表转变方向的声明。

4月，中国共产党发表《抗日宣言》。这一年，中国的苏維埃区，遍及全国六十八县。

1934年

4月，佐野、鍋山等在上訴审中提出“一国社会主义”的口号。

4月，中国共产党决定了北上抗日的基綫；10月，主力紅軍实行大规模西迁（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5年

2月，众議院里告发美浓部学說（天皇机关說），右翼发动了攻势。

7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大会，决定采取“人民战綫战术”。

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

1936年

次女芳子嫁給了鈴木重岁。

2月，东京部分駐軍爆发了所謂二·二六事件。

11月，实施思想犯保护观察法。

1937年

6月15日，由于一度因皇太子誕生而减刑，这一天刑期屆滿，释放出獄。先住在杉并区天沼，后来搬到中野区冰川町。自号閉戶閑人，以汉詩、和歌、书法、篆刻等消磨岁月。来往的朋友只限于十几年来的不多几个相知，生活清苦。

7月，发生华北芦沟桥事变，成为侵略战争的开端。

12月，逮捕了以日本无产党、日本工会全国評議会为中心的“人民战綫分子”四百名。禁止日本无产党、日本工会全国評議会的結社。

河上肇年譜	大事記
	<p>1938年</p> <p>2月，在全日本逮捕劳农派分子三十八名。</p> <p>5月，禁止五一劳动节。</p> <p>7月，組織了以协调会为主体的产业报国会联盟。</p> <p>10月，东京帝大河合教授的著作受到禁止发售处分。</p>
	<p>1939年</p> <p>1月，东京帝国大学的河合、土方两教授免职（经济学部事件）。</p> <p>7月，所謂諾蒙罕事件严重化，日軍損失惨重。</p> <p>这一年，内务省加强图书检查取締方針，禁止一切帶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图书、杂志、論文、小說，“舌禍事件”相继发生。</p>
	<p>1940年</p> <p>2月，民政党国会議員斋藤隆夫在国会发表反对軍部的演說，有“假借圣战的美名”等語，結果被交由懲罰委員會懲处。</p> <p>3月，津田左右吉博士因笔禍事件被起訴。</p> <p>11月，大日本产业报国会成立。</p>
<p>1941年</p> <p>12月20日，回到一別十二年的京都，定居于京都市上京区圣护院中町。</p>	<p>3月，大政翼贊会改組，柳川平助中将任副總裁。</p> <p>10月，东条英机組織新內閣。</p> <p>12月，太平洋战争开始。</p>
	<p>1942年</p> <p>5月，翼贊政治会創立。</p> <p>12月，決定取消一切以英語命名的杂志。</p>

<p>1943年</p> <p>1月，着手写《自传》。</p> <p>4月，搬到上京区吉田上大路九号。</p> <p>7月，次女芳子病重，夫人去大连看护病人，作者开始自己做饭吃。</p>	<p>6月，共产国际决定解散。</p>
<p>1944年</p> <p>9月，夫人带同洵子（八岁）、浩子（七岁）两个外孙女从大连回到家里。</p>	
<p>1945年</p> <p>2月间，由于寒冷和营养不足，身体衰弱，病倒在床上。从此以后，好好坏坏地一直没有痊愈。</p> <p>8月15日日本投降那天，欣幸重新建设日本的日子已经到来，做了这样两首短歌：“哎呀！多么高兴呀，居然能活着逢到战争结束的今天！”“好，我也要离开病床，仰起头来迎接万里晴空的阳光！”</p> <p>10月底，德田球一、志贺义雄两人出狱，作者从病床上寄以激昂慷慨的短歌。</p>	<p>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p> <p>10月，日本共产党首脑人物释放出狱。废除特别高等警察和治安维持法。</p>
<p>1946年</p> <p>1月17日写的《迎接野坂同志》的诗，成了绝笔。诗里面有这样的话：“我要是年轻十岁，一定提笔挺身而出……乘着澎湃的人民革命的滔天波浪，一同叱咤风云……”。</p> <p>1月26日，病状突变，并发了肺炎，不久就吐血痰。</p> <p>1月30日上午四点五十三分，结束了波澜起伏、向真理勇往迈进的一生，享年六十八岁。</p>	
<p>1946年以后出版的书：</p> <p>《回忆》（断片部分）由月曜书房出版，《杂草集》（诗集）由大雅堂出版，《杂草集》（二）由日本科学社出版，《旅</p>	<p>1月，举行了欢迎野坂参三归国国民大会；野坂倡议结成民主人民战线。</p>

河上肇年譜

人》（詩集）由兴风館出版，《故乡》（詩集）由朝日新聞社出版，《河上肇給櫛田民藏的信》（大内兵卫編）由鎌仓文庫出版，《獄中贅語》由河原书店出版，《自传》（四卷）、《獄中日記》由世界評論社出版。

其他主要的重版书：

《資本論入門》由世界評論社出版，《貧窮故事》由岩波书店出版，《經济学大綱》由改造社出版，《第二貧窮故事》由三一书房出版，《什么是資本主义的剝削》、《階級斗争的必然性和它的必然轉化》由永美书房出版，《馬克思主义經济学》由真理社出版。

大事記

封面
正文